罗马尼亚通史简编

〔罗〕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Miron Constantinescu
Constantin Daicoviciu
Ştefan Pascu

ISTORIA ROMÂNIEI

Compendiu

Ediţia a II-a revăzută şi adăugită
Bucureşti 1971

内部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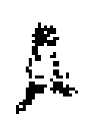
罗马尼亚通史简编

（全三册）

〔罗〕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主编
陆象淦　王敏生译
徐文德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43 1/4 印张 封套15 插页 605 千字
1976 年10月第 1 版　1976 年10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65　定价：4.60 元



目 录

目　　录

前　　言 5

本简编是对我们祖国——罗马尼亚由太古迄今历史的综合性概述。这部«罗马尼亚史»的编著者认为，这样一部体现可靠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史书，不仅是人们所盼望的，而且也是必须的。我们相信，它是劳动人民所期待的，对他们来说，了解以科学的、生动的和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我国历史，是十分有益的。这部通史简编，由于其基本观点，由于若干新的思想和解释，亦将引起研究史学问题的我国学者的兴趣。我们并不认为我们这一观点是错误的。

在证实和阐明史实和事件时，编著者坚定不移地遵循经过严格科学研究检验的客观真相，认为这是任何历史著作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觉得一些问题的若干侧面尚未完全澄清时，则在«问题与讨论»这一章里予以指出。在觉得必要时，同样在此章里，还介绍了解决某些较重要问题的经过

情况。

对文献资料的解释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基础的，对我国领土上人类社会的演变的评价及其特点的概括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出的。在这种最先进的观点指引下，我们相信，我们向读者展示了确实的、未经篡改的史实，同时又力求赋予这部民族历史论著以教育作品的特性。《罗马尼亚史》既包括罗马尼亚人民的历史，又包括诸共居民族的历史。要更广泛地阐发诸共居民族的历史，就必须把迄今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进行的研究继续下去。

上述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也促使我们这个编著集体把罗马尼亚的历史，包括它的一切时代和时期，同周围世界，尤其是同东南欧和大体上同欧洲
6 的相应演变联系起来考察。这样，我们相信，我们比较清晰、比较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罗马尼亚人民及其祖先对人类不断进步的贡献。

对本书编著者来说，一项特殊的工作就是既十分重要而又甚为困难的罗马尼亚史分期问题。经审慎斟酌，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比较正确并比较合乎我国实际的分期如下：

罗马尼亚古代史包括我国领土上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时代，即上古时代（原始公社）和古代（达契亚初期奴隶制及罗马初期奴隶制）。上古时代始自人类社会在我国出现，下延至整个达契亚社会初期奴隶制关系形成，以及达契亚国家诞生（约公元前600000年—100年）。古代则包括达契亚国家出现至罗马军队和行政机构撤离达契亚省之间时期（约公元前100年—公元271年）。在继续维持着罗马拜占庭统治的多布罗加领土上，奴隶时代晚期还延续约三百年。

继之而来的是漫长的向封建制过渡时期（通常称之为先封建时期）。在这个时期，达契亚—罗马人，罗马尼亚人的祖先，同诸迁徙部族，如：萨尔马特人，哥特人，匈奴人，格庇第人，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在喀尔巴阡山—多瑙河地区接触乃至共居。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已不是奴隶制生产方式；此时，在土著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乃是农牧村社型的社会经济关系。这些村社对某些迁徙部族负有进贡义务。而贡税制又反过来促使土著社会本身产生某些新的经济关系。

贡税制生产方式的理论问题，专家们尚在讨

论。要是我们在罗马尼亚实在的历史中，不是大略地探讨，而是完全尊重真理，我们就应该看到，不运用马克思创造的、并为恩格斯和列宁以及许多当代史学家所证实的这个概念，我们就不会理解我国过去许多世纪的史实。确实，这种生产方式以罗马尼亚人所特有的形式实际存在于罗马尼亚诸国的历史中。在罗马尼亚区域性村社联盟内部，这种经济和社会关系标志看当时状况的特点，而在同诸迁徙部族——哥特人，匈奴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佩彻涅格人，库曼人，鞑靼人等几世纪的接触中，这些部族征收的贡税又巩固了这种关系。统治阶层以及后来的统治阶级（对人的统治和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成为这种制度的特点）行使着双重职能：除劳动、徭役、差赋义务外，从村社成员的产品和收人中为自己同时也为外部统治势力提取分额。

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着双重贡税关系，即村社联盟内部的和外部的，而在封建国家出现后，则表现为国内和国外关系。

土耳其人人侵前和人侵后，这种特殊关系阻碍了封建制度的发展。这就是研究工作者必须尊

重的史实。

复杂的经济关系导致日益加剧的社会经济分 7
化，这种分化是未来封建关系的前提。

中世纪时代在我国领土上始自九世纪，此时已可以感觉到封建关系的始初。至于真正的封建制度，则只能说是从十一世纪开始的。在阐述封建制度时，除我国整个领土上的共同特征外，还必须考虑到特兰西瓦尼亚不同于其他罗马尼亚国家——蒙特尼亚、摩尔多瓦状况的若干特点。

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状况分析的结果表明，近代在罗马尼亚诸国开始于1848年以前。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是这个时代的鼎盛时期之一，当时已经出现在封建社会母腹内的新的社会关系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因而它不能是近代的开始。近代事实上始于十八世纪下叶，是随着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经济中新的生产和交换关系的出现而开始的。近代与以前时代的区别也就在于一种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产生，一种新的思想方式的产生。

因此，要确定罗马尼亚近代从何时开始，就必须研究标志着这些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出

现的史料。

从对于这些问题的整个研究中所得的结果是：在生产中，雇佣关系出现于十八世纪末；在商业领域中，国内和国际的交换在同一时期日趋加强，新的经济和法律关系也在当时的法制中得到表现。十八世纪，在建立和巩固罗马尼亚诸国——蒙特尼亚、摩尔多瓦、特兰西瓦尼亚和多布罗加的统一经济市场方面也标志着一个转折点。

在文化的主要领域内，出现了一股革新的潮流，从迪米特里·康特米尔到格奥尔基·欣卡伊、彼得·马约尔、伊昂·布达伊·德列亚努、萨米尔·米库、伊昂·皮乌阿里乌·莫尔纳尔医生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光荣的阿尔迪亚尔学派，无不如此。科学著作和文学创作不能再受封建文化框框束缚，而开辟自己的道路，不可遏止地树立与诸共居民族的近代文化息息相关的罗马尼亚近代新文化的特质。

根据这一观点，无论是霍里亚、克洛什卡和克里尚领导的1784—1785年起义，或者是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1821年革命运动，两者均具有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序幕的性质，因而

都属于罗马尼亚史的近代时期，而不属于封建时代。

资本主义关系在其中居统治地位的真正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阶段，则在1848—1849年革命后，尤其是在近代罗马尼亚国家建立以及由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和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进行的伟大改革之后，才发展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罗马尼亚人民的国家统一的完成，开始跨人罗马尼亚历史的现代时期。这个时代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二阶段，即垄断资本在主要经济部门内形成和发展，并出现财政资本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延续至1944年8月23日，那时胜利的武装起义开创 8
了我们祖国的罗马尼亚人民和共居民族的新生活，标志着人民革命在罗马尼亚的开始。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和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二十多年来，罗马尼亚民族在我国建设着社会主义。

正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所指出的：“8月23日历史性行动的实现，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团

结一切工人力量、反法西斯力量，同民族爱国力量和军队代表，包括同君主政治进行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是在争取退出反动阶级和纳粹德国强加于罗马尼亚的反苏战争，争取推翻军事法西斯独裁并与反法西斯同盟站在一起的斗争基础上实现的。”

我们祖国从法西斯奴役下获得解放以来所走过的二十五个多年头，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年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新的互助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繁荣灿烂，坚持不懈地努力执行各国人民间和平与友谊的对外政策——这一切乃是这个新社会制度的特征。

这部通史简编的作者并不把他们的作品引为自己的骄傲，而是认为他们只是对养育了他们的人民，对给予他们这一任务的党，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向读者致敬！

大学教授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

康斯坦丁·达伊科维丘院士、教授

大学教授什特凡·帕斯库

罗马尼亚史资料 9

一、上古和古代

整理罗马尼亚上古和古代史，最重要的资料系考古、文字和金石资料。

考古资料是人类生活和活动的实物遗迹，保存于地下（但有的在地面），偶或保存于水底，可用于恢复过去人类生活的面貌。史学的辅助科学——考古学以其固有的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发掘、研究和解释。

考古资料的重大优点在于它同样保存了古代作家所未注意的地区或时代的资料，亦即文字资料所未述及的资料。而且，考古资料不仅说明过去统治阶层的生活，并述及人民群众的生活。但是，象其他资料一样，只有不抱先人之见，给予恰如其分的、正确的解释，考古资料才有价值。

文字资料或叙述性资料是我们所见到的古代

作家的历史记载 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真正史学家的著作，如：希罗多德（给予我们关于葛特人的最早的报导），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其著作记载了关于德罗米凯特斯统治下的葛特人的材料），卡西乌斯·狄奥（描写了多米提亚努斯和图拉真两朝罗马人与达契亚人的战争），约尔达尼斯（制布雷比斯塔后裔表）等。在一些古代地理学家的著作中也可发现珍贵的记载（如：斯特拉波谈到了达契亚人和布雷比斯塔王朝），甚至有些诗人，如被奥古斯都皇帝放逐到托弥斯的奥维德也描写了当时多布罗加的情况。

使用文字资料时，必须极其慎重并持批判态度，因为古代作家的记载未必尽然可靠，况且他们的阶级立场往往促使他们对某些事实置若罔闻，对另一些事实则夸大其词。应该看到，一般说来，古代作家极少关注经济和社会问题，极少关心群众的生活和斗争；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剥削阶级及其代表——帝王将相身上。

金石资料是铸刻于砖、石、金属、骨、木等硬物上的铭文。研究这些铭文，可搜集有关军政大事及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量材料。对于罗马尼亚古代

史来说，达契亚省、多布罗加的拉丁文铭文及多布罗加的大量希腊文铭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研究古钱（即古钱学资料）、研究古代或稍近 10
时代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地名和口头语言（语言学资料）、研究民间文艺创作、服装和风俗习惯（民俗学和人种志学资料）及研究人类骨骼、动物和植物存迹（古人类学、古动物学和古植物学资料），对认识我们祖国遥远的过去均有一定作用。

不言而喻，对资料这样分类是相对而言。过去的铭文、钱币、人骨和兽骨也可看作考古资料，尤其如果是从发掘中发现的。一篇拉丁文铭文是一项金石学资料，但也可视为语言学资料，因为它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我国的口头语言。古文书关于我国的记载微乎其微。

二、中世纪时代

象对上古和古代史的研究一样，对中世纪史的研究是以极其驳杂、极其浩瀚并且与日俱增的资料为基础的。

在各类资料中，对了解中世纪史较为重要

的有：

（一）考古资料，对其他诸类资料较缺的早期封建主义时期，考古资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全国各地的设防居留地或一般居留地，如加尔文、德伯卡等的发掘，使我们有可能了解这一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政治体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等主要问题。

考古资料对封建主义繁荣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程度上不一样。例如，故都苏恰瓦、阿尔杰什宫、特尔戈维什特等诸城堡废墟的发掘，说明了城镇发展问题、罗马尼亚诸国的政治行政组织、防御体系等。

（二）人种志和民俗学资料，主要帮助我们了解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方面：居留地、住所、活动、服装、习俗、传统、童话、诗歌、音乐、艺术等。

（三）文献和外交资料，系中世纪史最重要的资料。这种资料比其他资料更多地述及那个时代的所有较重要的问题：所有制的各种形式和各个方面、物质财富的生产和销售、社会关系、城乡群众争取改善生活的斗争、机构、国内政治状况、

对外政策、文化生活等等。

文献资料有两类：国内的和国外的。国内文献资料包括我国领土上诸国行政当局（罗马尼亚国、摩尔多瓦君主和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行政机关，以及城市、教会、州、县、郡和区行政当局）颁发的文件。

国外文献是其他国家行政当局颁发而同我国历史有关的文件。其中较为重要的，对罗马尼亚诸国来说，是教廷颁发的文件；对特兰西瓦尼亚来说，是匈牙利历代王朝颁发的文件；对摩尔多瓦来说，则主要是波兰历代王朝颁发的文件。君士坦丁堡教长及历代奥斯曼苏丹颁发的文件，对罗马尼亚三国都有重要意义。

（四）叙述性资料，包括年鉴、大事记、编年史、札记、回忆录等等，就其重要性来说，属第二类中世纪史料。叙述性资料比这个时代的其他各类资料更突出反映作者的阶级立场，而且往往还反映作者所属的政治门阀的立场。因此，使用叙述性资料，象使用其他一切资料一样，都必须十分慎重，都必须持严格的批判态度。

叙述性资料同文献资料一样，有两类，即国

内的和国外的。国内资料同时发端于罗马尼亚三
11 国，亦即十五世纪下半期。此时是罗马尼亚诸国的中央集权倾向有所表现，弗拉德·采佩什，大什特凡和马特伊·科尔文独裁朝廷确立的时代。弗拉德·采佩什朝成为两部“故事”的对象，一部是贬意的，由同采佩什为敌的萨克逊人集团用德文编写，另一部则是褒扬的，由他的一名近臣用斯拉夫文编写。在大什特凡时代，编撰了一部斯拉夫文的宫廷大事记——官方编年史，虽已失传，但存有五种改写本：《无名氏纪事》、《普特纳纪事》、《摩尔多瓦——日耳曼编年史》、《摩尔多瓦——波兰编年史》和《摩尔多瓦——俄罗斯编年史》。在特兰西瓦尼亚，第一部国内编年史由十五世纪下半期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德拉格菲家族的一名御用文人用拉丁文撰写。

由此时始，国内编年史日益增多，先是用斯拉夫文和拉丁文编写，而从十六世纪下半期起，也用罗马尼亚文及共居民族文字——马札尔文和德文编写。

就其所包括的记载来说，国外的叙述性资料也是宝贵的，尤其是对于国内资料缺乏的早期封

建主义时期。载有同我国有关材料的最重要的国外叙述性资料是十至十五世纪拜占庭编年史，十一至十八世纪匈牙利编年史，十至十八世纪俄国编年史，十五至十六世纪波兰编年史以及整个中世纪的许多西方编年史。

（五）其他各类资料。法律资料，包括最早的不成文法律习惯以及后来从十六世纪开始的各种书面法律；金石资料，包括砖、石、器皿、壁面的铭文；古钱学资料，在罗马尼亚诸国铸造或在这些国家流通的钱币；纹章学资料，刻有象形构图和意味深长的传说的纹徽和印章；测绘学资料，全球地图、海志图（包括地理资料、甚至历史资料的地图）和山志，等等。

科学地、客观地和真实地了解中世纪史，要求同时研究该时期的各类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是互为补充的，统观这些资料才能更好地说明历史事件。

三、近代和现代

对史料进行深刻了解和全面研究这一原则，

同样也适用于近代和现代史。

首先必须研究国内的文献档案。无论在布加勒斯特或各县均保存着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文献资料，要对罗马尼亚史进行科学的研究，舍其不可。对报纸和期刊进行细致的研究也是毋容忽视的，对近代和现代来说，报纸和期刊起着日志、周志、月志和年志的作用。近代和现代史的重要材料还有议会辩论，各种司法机关所需的社会调查，政治家和其他从事公众活动的人物的政治著作和演说及其回忆录。随着工人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十九世纪中叶），必须对这一运动的报刊和文献进行仔细的研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创立后，党的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代和现代史问题在统计学、社会学、经济、财政、法、机构史、文化史等著作中均有所研究；所有这一切领域里的研究，如果是以科学态度进行的，那末对正确了解过去是具有特殊价值的。

不仅一些毗邻领域专家们的科学著作，而且有些文学作品（特别是社会长篇小说或象卡米尔·彼特雷斯库的《一个普通的人》这种类型的长篇小说）也对完整地展示历史图景有所裨益。

由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研究近代和现代史较之研究其他时代的历史更有必要研究保存于邻国或远方国家档案馆和博物馆及其出版的期刊和书籍中的有关罗马尼亚历史的文献和其他资料。批判地鉴别这些史料，大大有助于我们丰富见闻，充实论述。

上古时代(原始公社)

13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石器时代

地球上何时出现人和人类社会，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人类的生存不超过六十万年，另一些学者则推断人类的年龄为两百万年。可以肯定的是，人和人类社会极度缓慢地发展了几十万年的时间，逐步实现生产和文化的进步。这种发展在广袤的地理地域上是相似的；我国的发掘与欧洲其他地区、亚洲、非洲的发掘均相类似，这证明人类的共性。

旧石器时代
（公元前600000—10000年）

从人手制造的最早的工具（普通河卵石一头粗陋地敲击成锐锋）缓慢地进到熟练和精细地制作的石器工具。然而，将近六十万年的时间内，制造工具的技术本质上是相同的，即用一石块敲击

另一石块。由这种远古的方法及所使用的物质脱化出人类历史第一个时代——它的真正幼年时代的名称：旧石器时代（来自希腊文 palaiós＝旧和 lithos＝石头）。在罗马尼亚境内，这个时代与地球上其他许多地区大致开始于同时，即距今约有六十万年。在这期间，由于冰期（气候剧冷时期），14
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与今不同的地质条件。住所是山洞或岩石下的隐蔽所。

专家们将这个漫长的时代划分为三期，即旧石器时代初期、中期和后期；最近二十年的研究表明，我国境内存在所有这三个时期的遗迹。例如，在奥尔特县德尔若夫河谷发现的只有一头敲尖的河卵石、同样在此找到的手斧（亦即无柄斧）和在摩尔多瓦北部普鲁特河的一个台地里皮切尼觅见的敲击过的石片制成的工具，均属最古时期（旧石器时代初期）。在奥哈巴—波诺尔（洪尼多阿拉县）石洞，巴亚—德—菲耶尔（奥尔特尼亚）石洞及其他地方，发现属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称为穆斯特文化[1]的遗迹：石尖具，石刀，石刮具。代表旧石器时

① 在考古学中，"文化"一词不能理解为文学、艺术等，而是指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形迹的复合：居留地（不设防的或

代后期的，在我国是在恰赫勒乌、洪尼多阿拉地区乔克洛维纳石洞和里皮切尼石洞发掘出来的更大量、更多样的投枪尖、凿子、刮具、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用途的石头薄片；在约塞舍尔（比霍尔县）甚至发现了几处蛋白石（一种水晶石）加工作坊遗迹。这个时期，除石制工具外，出现了数量日渐增多的骨制工具。

旧石器时代人的进步及社会组织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工具不仅数量增多，而且也制作得较好、较适合于各种劳动。如果说在旧石器时代初期用同一块粗陋敲击的石头来宰割野兽，剥制兽皮，清除兽皮污垢以蔽体，或从泥土中挖出可食用的根茎，那么在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就拥有了石制和骨制的专门工具：狩猎用的投枪、刀、刮具、鱼叉、钻和针等等；此外，当然还有

设防的）和住所的形式与组成；不同用途的建筑；工具和器具、武器、陶器、装饰品、日用器物、食物残余、穿著、祭祀器具、宗教礼仪和丧葬仪式等等。根据习惯，文化的名称以最早的发掘地或较重要的发掘地命名（如：穆斯特文化这个名称就是来自法国西南部的穆斯蒂埃石洞）。考古学上，文化这个概念决不能同人类种族概念联系起来，只在某些情况下同居民或部族概念相应。

木制工具。所有这一切都是巨大的进步，虽然人类尚未达到自己生产食物的地步，而是通过渔猎和采集从自然界觅取食物。同样，人类首先学会利用自然火(旧石器时代初期)，尔后学会取火(旧石器时代中期)。

在同自然界斗争与劳动过程中，人类在身体上亦得到了发展。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人(穴居人，猿人）的外貌保存着类人猿的许多特征：体形前 15
曲，额头狭窄而扁平，眉骨前突，浑身多毛。经过一系列过渡形态，在旧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与今天人相似的“真人”(homo sapiens)。

起初，由于人比野兽机体弱，由于他们的工具很少从事生产而具有的原始性，必须群居；但最初的公社组织很差：一群(一伙)人生活在一起，类似某种野兽，而公社成员间两性关系的毫无限制损害着人在生物学上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血缘观念，在同一血缘的人们之间禁止发生性关系。一群有血缘关系的人构成一个氏族，两个或更多个氏族联合便产生了部落。群婚制（一个氏族的一群男子是另一个氏族的一群女子的丈夫）的存在使父母中只有母亲得到确认；当然，血缘关系依照

女系来算，因此氏族是女系的或母系的。

人的思维发展

在几千年行程中，人的思维也取得了进步。起初，人类无从识别其自身与周围大自然的区别，本能地将自己当作大自然的组成部分。想来，直至旧石器时代初期末或旧石器时代中期初，人才意识到他们自己的人类特性，将自己同自然加以区分；此时，他们开始试图解释自然现象，但贫乏的经验和知识不允许他们对这些现象有合理的理解和准确的解释。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开始相信存在某些力，谋求以各种巫术和牺牲使这些力驯善；同时，出现了对墓穴彼岸生命的幼稚信仰，其表现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和后期的人开始对死者表示关切，实行墓葬。

据许多专家的意见，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最初表现就是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用精美的现实主义图画装饰了法国、西班牙和北非的一些洞壁，展现狩猎的场面和野兽等等；在他们幼稚的观念中，描绘这样一些场面将使他们狩猎顺利并确保有所收获。在我国，这类

洞壁画(亦即岩石画)目前尚未发现，但最近的研究开始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艺术遗迹，其中有在布达(巴克乌县)发现的石凿人像。

这些巫术一宗教信仰尽管带有幼稚性和虚构性，毕竟代表人类抽象思维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中石器时代
(公元前10000—5500年)与
新石器时代
(公元前5500年—1900年)

中石器时代

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来自希腊文 néos＝新和 lithos＝石头）经过一个相对来说较短（公元前10000—5500年）并在我国很少为人所知的时期，称为中石器时代（来自希腊文 mesos＝中间)。此时，人类获得的主要进步在于使用弓箭，使用以植物纤维绑上易于把握的木柄的斧，使用独木舟，驯养狗和其他畜类。但制造工

具的技术仍停留于敲击。

新石器时代 生产及社会组织

然而，上述技术终于在新石器时代让位给较先进的磨石技术。借助这种技术，可制作较富生产性的工具。进而，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人又发明钻石的方法；此时，石斧已钻孔并固定于木柄
16 上。但磨和钻这类劳动相当困难和费工，不能普遍运用，敲制工具继续存在于新石器时代。

在新石器时代，除较古老的编织手工艺外，出现了新的家庭手工艺：纺织和制陶。人们学会用手塑造泥土器皿，在阳光下晒干并烧制，起初是在露天的土坑里，尔后有了真正的陶窑。烧制的泥器皿大量生产；这种器皿有很重要的意义，使人类能以加温的办法准备一部分食物，较好地储存植物性食品和肉类。

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进步无疑是人从采集者和渔猎者转变为消费品的生产者。确实，此时人已驯养几乎所有为今人所知的牲畜，并学会种植食用植物和可纺植物，借助兽角制的锛耕作土地（原始的、园圃式的种植）。这两项成果显著地减少

了人对变幻无常的大自然的依赖，使他们能积累食物储备，从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及社会的普遍进步。

改进的工具同旧石器时代比较虽然大大提高
了劳动生产率，但在生产中继续长期存在若干大
集体合力干活的需要。生产资料，首先是土地，属
全公社，种植植物和饲养牲畜也是集体进行。这
种情况有助于氏族组织的巩固，恰恰就在此时，氏
族组织达到了鼎盛时期。母系氏族是社会的基本
经济细胞，而部落则代表人数众多、结合得好的
人类集体。种地和制陶的妇女劳动具有极大重要 17
性；因此妇女在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中占有特殊地
位，享有高度的尊敬。妇女往往在氏族和部落中
保持统治地位，因而新石器时代亦称母权时代(来
自拉丁词 mater＝母亲和希腊词 arché＝权力)。

新石器时代的居留地及文化

各方面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着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一些石洞虽然仍充当住所，但人类已主要沿富饶的河谷定居于台地，住在地窖，或甚至构筑木架房屋，以树枝编织并涂泥作壁。有些房

屋建于支架上，高出地面。新石器时代的住所中还不乏炉灶。

在新石器时代三个发展阶段（早期、发展期和后期）的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文化，其主要特点是存在某些特定类型的工具及某些特定形式和装饰的陶器皿。由于这些文化大部分是类似的，因而与邻国——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苏联（乌克兰）领土上发现的文化有着近缘关系；我国的新石器时代是更广泛的欧洲新石器范围的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不应把新石器文化的差别视为人种的差别：两种不同的文化不一定代表不同的居民。在罗马尼亚领土上，构成新石器时代居民的是土著部落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因素（例如来自南方和东南方，参见64页鞑靼里亚问题）。

早期新石器文化（几乎遍布全国的克里什文化，特兰西瓦尼亚的图尔达什文化及其他）尚无穿孔斧，很大一部分陶器仍相当粗糙。在发展的新石器时代，则有蒙特尼亚的博扬文化及图尔达什文化的新阶段，两者的特点是出现了穿孔斧和质地较好的陶器；就在此时，居留地中出现了最早的紫铜细具——钓勾、针及其他，并有了黄金装

饰品。

从考古学着眼，发展的最高度乃是拥有彩陶的后期新石器文化：佩特雷什蒂（特兰西瓦尼亚）文化，库库特尼—阿里乌什德(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东部)文化，古美尔尼察（蒙特尼亚）文化。在这些文化命名地及全国其他许多地点进行的发掘勾划出当时若干大居留地的图景：富庶繁荣，屋舍构筑坚实、井然有序。除大量石器工具外，可愈益频繁地见到赤铜工具。精心选料、搅拌匀和、在封闭的窑中烧到火候的陶器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器皿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容积，其中许多涂着白、红、黑三彩，鲜艳夺目，螺形线和折线构图跃然器面。其他器皿则如初期和发展期新石器时代一样，仍以印(刻)纹为装饰。新石器时代末，还出现了弓形鼻陶器。

精神文化也发生了归根结底和新的经济现状 18
相联系的深刻变化。新石器时代的居留地中，表现女性—象征肥沃和丰收神的形象或动物的烧制泥塑和石雕屡见不鲜；这类新的信仰和崇拜同人类新的重要活动——种地和养畜密切相关。同时也不乏男性小雕像；在切尔纳伏德发现的属

新石器中期哈曼吉亚文化的两个雕像(一男一女)已名闻于世。

对死者(祖先)的祭祀此时具有新的形式。死者葬时身体蜷缩并被固定于这种姿态,可能是为了防止死者回到生者中间来;有时,尸体撒上一种红色(赭色)矿物,可能象征血液。在属于库库特尼—阿里乌什德文化的一处居留地发现的一个土祭坛,是用来进行某些宗教仪式的。

新石器时代的终结

以新石器时代使用的锛种地不能保证生产有太大的增长;因此需要以畜拉犁在较大面积上耕作的农业。想来,装有石犁铧或鹿角犁铧的最早原始木犁在新石器时代业已出现(奥尔特尼亚的拉斯特及蒙特尼亚西部克斯乔瓦雷列的发掘);但其广泛使用,则迟至下一个时代。犁的使用及大群养畜(在一些部落畜牧业已成为主业)的发展,促使男子劳动的重要意义增大,妇女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下降。妇女开始丧失迄至当时在社会中拥有的地位,母权氏族逐渐为父权大家族(来自希腊文 patér = 父亲)所取代。在父权社会中,后裔和

血缘承袭父系，年龄最长的男子被认为家庭的绝对主宰。

随着原始耕种的出现，新石器社会趋于没落，从考古学上说，这一事实从这时期的居留地中反映出来。母权氏族社会的崩溃过程，由于从东方和东北方来的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的一些游牧部落深入我国领土而加速。经过一个称为“赤铜”时代的过渡时期（公元前1900—1700年），新石器时代终于让位于一个新时代——青铜时代。赤铜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其特点就是大规模的部落运动。畜牧业成为主业。旧的新石器文化泯灭了，另一些新文化取而代之；这一时期我国领土上最有代表性和传播最广的文化乃是科措芬尼文化(以奥尔特尼亚的一个地点命名)。游牧部落的深入，将标志这个地区居民印欧化过程的开始。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青铜时代 19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便开始冶炼金属，制造赤铜工具和器物。但赤铜这种金属过软；直至发现铜与锡或铅合成一种硬度要强的物质 青铜时，

冶金术才获得迅速发展。在一千年（公元前1700—700年）期间，青铜是制作一系列工具、武器、日用器物及装饰品的特有物质；正因为这样，这个时期以青铜时代闻名于世。此时，冶炼黄金也繁荣起来。

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政治组织

使用青铜的好处是很大的，主要工具（斧、镰）和兵器（匕首、剑、战斧、枪头及箭镞）均用这种新合金制造。但青铜是一种相当名贵的物质，因为天然赤铜矿很快趋于枯竭，而锡和铅矿在整个欧洲是稀有的；这就是迟至青铜时代晚期继续制造并使用石器工具的原因，尽管金属工具的生产率比较高。

改进的工具的出现并不是生产力领域内的唯一进步。木犁使人能在以刀（青铜斧）耕火种方法开垦出的较大面积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青铜斧有助于更迅速地加工木材，而畜拉车则便利了运输。放牧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成为一些部落的主业；其他一些部落则着重从事农业。农业部落和牧业部落间的这种劳动的首次社会大分工

刺激了过去虽然存在、但不经常的交换活动；此时，牧人的畜产品定期同农业部落的农产品交换。再者，牧人与牧群从山区到平原地区，有时甚至到极遥远地区的这种迁徙，在整个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促进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素的传播。材料证明，青铜时代存在着远至迈锡尼的交换关系；迈锡尼型的青铜剑在我国不同地点发掘出来。家庭手工业（纺织，制陶，加工木材、骨、皮、石）也有所发展，居于一切手工业首位的则是要求一定专门知识的金属冶炼；锻冶工在那个时代的公社内部具有重要作用，并享有某种威望。

人类公社在父权制基础上进行组织。氏族和部落继续存在，但父权制家族成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它耕作从公社土地中分得的小块土地并占有自己的劳动果实；同样，父权家族占有其所使用
的工具，并是其饲养的牲畜的所有者。这样，除远 20
古的集体所有制外，又出现了私有制，从而逐步导致部落内部财产分化；从部落成员的群体中开始分化出一个富裕阶层——军事贵族。

部落贵族之所以同军务有关，乃因为此时部落间冲突趋于频繁；占有富饶地区，占有他部落的

畜群、食物储备或金属储备，凡此种种莫不成为武装冲突的起因。为了壮大实力，有血缘关系的诸部落联合成由军务酋长统率的大部落联盟。由于部落成员间形式上的平等依然存在，武装男子大会有权决定最重要的问题，这种组织形式在史学上取名为军事民主。然而，贵族愈益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部落一般成员，这愈促使军事民主变成国家出现的一个先导发展阶段。

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使个人能生产超过其自身消费的产品；于是就出现了人剥削人的倾向，战俘不再象过去那样由战胜部落杀死或收养，而是被役使为奴，强迫劳动。从而出现了父权奴隶制。

社会的精神生活继续被无知产生的宗教信仰所统治。新石器时代对于丰收和肥沃的旧有崇拜尚未消失，但其重要性已有所丧失；其地位日渐为对自然力的狂热，首先是对太阳的崇拜所取代。在各种器物上出现了太阳的象征：环形，带四辐的环，螺旋体；在锡吉什瓦拉发现了一个以这种象征作装饰的炉灶，在布泽乌地区的塞拉塔—蒙特奥鲁则发现一处献祭肉类和谷物供品的名副其实

的祭祀场。约于青铜时代中期，墓葬的习俗改为火化(焚烧)的习俗，这一现象无疑也反映对于来世生命信仰的某种改变。

在艺术上，晚期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装饰为青铜时代陶器上的缕刻或镶嵌于陶土上的几何构图所取代。几何装饰（螺旋形漩涡，“星形”构图）也见诸金属器物，尤其是兵器，镯子，镶裹宽皮腰带的青铜薄片。现实主义的表象(人和兽的形象)颇为罕见；一般说来，这种装饰不一定再具巫术一宗教性质，而是反映作为社会意识提高表现的美感发展。

青铜时代的文化

象以往诸时代一样，青铜时代也被专家们分
为三期：早期、发展期和后期。第一期的特点是居
留地较为简陋，其中青铜器依然罕见。冶炼青铜 21
从第二期开始高涨，其时形成了繁荣的文化：蒙特
奥鲁(蒙特尼亚)文化，佩里亚姆—佩契卡文化(巴
纳特)、奥托马尼文化(克里沙纳)和锡吉什瓦拉文
化（或以位于特兰西瓦尼亚该城附近的一个山坡
——威登堡命名），它们拥有极大量和多样的陶器

及各种金属工具和兵器。临近公元前两千年末，由于摩尔多瓦的诺瓦文化深入特兰西瓦尼亚，放牧的重要性加强。尔后，也出现了筑于高处的设防大居留地，作为人及牲畜的栖息地和庇护所；这样的土堡发现于索梅什一雷切（克鲁日附近）、梅迪亚什和锡格一马尔马提亚等地。

但是，冶金的鼎盛时期是青铜时代末期；考古学家发现并研究了主要是在特兰西瓦尼亚找到的几处大型青铜锻冶作坊的沉渣。其中，于穆列什河上乌约瓦拉发现的一块沉渣重量超过一吨。特兰西瓦尼亚这些作坊的产品远销至中欧及波罗的海南岸。

青铜时代我国的居民

由于新石器时代土著部落与自东方和东北方来我国的骑马的游牧部落的融合，此时产生了一种操印欧语的新居民。稍晚，从这种居民中将分化出古代资料提到的居住于欧洲大陆东南部的诸族：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达契亚一葛特人。因此，我们应将青铜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和代表者视为我们民族的远古直系祖先。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第一代铁器

随着冶铁术的出现，原始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获得了决定性的进步。公元前两千年初发明于近东的冶铁术逐渐传布，至公元前700年亦为我国领土上诸部落所掌握和广泛应用。由此时起，算作铁器时代开始，从考古学观点着眼，这个时代延续至公元106年，但作为原始公社时代，则结束较早，即在公元前一世纪初叶。

铁器时代的一般特征及其分期

如恩格斯所述，在全欧洲，铁器时代取得的生产进步比以往所有时代的总和更为丰富。这正是因为运用了新金属，使工具抗强度增大并较富生产性。铁铧犁使人能获得丰富的收成，铁斧、铁 22
钳、铁锤、铁锯、铁凿、铁钻、铁镐和铁铲则大大提高了各个活动领域内的劳动生产率。铁制兵器对铜制兵器或石制武器同样也表现出这种优越性。

普遍使用铁器引起的跃进同样见诸与冶铁没有直接关系的经济领域。例如，养畜，纺织和制陶

亦均有发展；此时，我国境内也开始使用陶轮。手工业实践活动要求越来越细的专业化，许多手艺已不能再同农业和养畜一起附设于家庭。其结果是，发生了劳动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者划分为部落内部单独的一个社会阶层。产品的交换愈益活跃；此时，可以说有了真正的商品生产，亦即一种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虽然为数尚少。为了便利产品交换，开始使用货币。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着我国境内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奴隶的人数及其在生产中的作用增大。父权家族分化为许多小家庭（由父母和子女组成），以他们自己的劳动保障自己的生活。自然，这些一夫一妻的小家庭此时成为工具、牲畜和劳动果实的占有者；逐渐，停止实施从公田中分出小块土地，于是可耕地就成了私有财产。氏族的联系丧失其重要性，父权制公社的地位此时被以村落为单位（或以地区为单位）的村社代替。村社将住在同一村落的家庭组合起来，其间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不言而喻，私有制的扩大和普及导致社会成员间财富不平等的加深及氏族—部落贵族的强大。

诚然，铁器时代的所有这一切特征不是同时表现出来的。以新金属制斧早就发端于公元前700年左右，而铁犁铧则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二世纪。货币象作为父权公社崩溃的其他现象一样，晚至这个时代的中期才出现。以技术—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为依据，科学将铁器时代分为两期或两代：第一代铁器，根据奥地利的一个地名，亦称哈尔斯塔特或哈尔斯塔特时期；第二代铁器，根据瑞士的一个地名，亦称拉铁尼。哈尔斯塔特时期占有公元前700年至300年这一期间，拉铁尼时期或拉铁尼文化自公元前300年至公元106年。

铁器时代的居民

历史科学尚未准确断定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我国境内发生的所有人种学现象的日期。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约早在第一代铁器中期，就从色雷斯部落群体中分离出葛特—达契亚人；事实上，古代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14年就提到了多布罗加的葛特人，认为是人了兴旺的色雷斯族的一个别支。据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达契亚—葛 23

特人乃是今天罗马尼亚境内哈尔斯塔特文化的创造者和代表者；此外，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在不同时期还有一些异族居民深入：黑海北岸草原的西密利安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奥尔特尼亚和巴纳特留下他们经过的各种遗迹（其中可例举比亚的黄金器皿及博瓦尔塔的若干装饰品，这两类器物均见诸阿尔迪亚尔）；来自东方的斯基特人定居于摩尔多瓦和东特兰西瓦尼亚；伊利里亚人横渡多瑙河，深入我国西南部；南色雷斯人（奥德里斯人）于公元前五世纪将其统治拓殖至多布罗加，凯尔特人自西北方深入特兰西瓦尼亚（凯尔特人的影响也见诸奥尔特尼亚），巴斯塔尔尼人则自北方来，定居于摩尔多瓦。在第一代铁器时期深入我国的居民中，以斯基特人所起作用为最重要。

公元前600年左右，来自东部的乌克兰森林—草原地区的阿加菲尔斯人（据希罗多德所说及考古发掘证明是斯基特人的一支）深入罗马尼亚领土。他们沿上穆列什河谷和特尔纳瓦河谷定居于特兰西瓦尼亚；考古学者在丘姆布鲁德（阿尤德附近）、契珀乌（离特尔古—穆列什不远）、布拉日及特兰西瓦尼亚其他诸地发现了斯基特人墓

塚,其中除骨骼外,尚有铁匕首、铁枪头、铁箭镞、青铜箭镞、骨箭镞、青铜镜、泥烧器皿,等等。另一股斯基特人于公元前四世纪深入并定居多布罗加,那里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可见到许多斯基特人"管事"。由此产生了多布罗加后来的别名(小)斯基蒂亚。斯基特人促进了葛特—达契亚部落冶铁术的发展,在银器艺术中则形成了一种色雷斯—斯基特人"风格",这可证诸阿季吉奥尔(土耳恰县)一个墓塚中发现的器物。斯基特人以被土著人同化而告终。

第一代铁器的主要发现

哈尔斯塔特时期前半期的特点是巴萨拉比文化在我国领土上的形成和传播。在巴萨拉比(奥尔特尼亚)、布加勒斯特、波亚纳(摩尔多瓦)、勒赫乌(特兰西瓦尼亚)及其他诸地发现的居留地和公墓,证明了冶铁的发展及土著部落走向以农为主。这种情况在这个时期的第二阶段仍然延续,这有伯尔塞什蒂(弗兰恰地区)和费里杰列(奥尔特尼亚)的发现可以证明;在这两地找到了大火葬墓场(公墓),大土丘(塚)高高隆起于埋着大量金属器

物和陶器的墓穴上。同时，还发现了保存铁器和青铜器工具的库房；其中以文楚—德—若斯（特兰西瓦尼亚）和伯尔佛内什蒂（奥尔特尼亚）两处的库房最有特性。

自哈尔斯塔特时期末期（更确切地说，是从公元前五至三世纪），新近发现的斯滕切什蒂、科特纳里（摩尔多瓦）等地葛特人城堡亦开始出现。

在第一代铁器时期还发生了一个将对葛特—达契亚社会发展有深刻影响的事件：希腊人在多布罗加黑海沿岸建立殖民地。

24 多布罗加的希腊殖民地

举世闻名的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希腊大殖民，引起广泛反响并留下丰富遗迹，这一现象也波及我国领土。在黑海（Pont Euxin）的多布罗加海岸，早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古希腊海员和商人就开始在此落脚，在这里及在黑海东、南、北岸诸地区先建立小城镇，然后组成真正的殖民地。

希腊城邦的奠立及发展

公元前七世纪末，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米利都城的伊奥尼亚人在多布罗加海岸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座落于锡诺耶湾(今天的锡诺耶湖)沿岸的这座新城从希腊人那里取得了伊斯特洛斯之名，罗马人后来则称之为希斯特里亚。约过了一个世纪，在多布罗加南部，今天的曼加利亚地方，来自黑海伊拉克林城的多利亚殖民者奠立了卡拉提斯城，与此同时，米利都人也定居于今天的康斯坦萨地方，创建了托弥斯镇。居住于这些殖民地的希腊人开采海、陆自然财富（小麦、木材和鱼），并同土著葛特一达契亚人进行产品交换：古希腊商人从葛特一达契亚人那里取得谷物、蜂蜡、蜂蜜、兽皮、木材乃至奴隶，从希腊运来葡萄酒、植物油、名贵陶器及装饰品。

多布罗加沿海的希腊城邦在经济上的重要性逐渐增大。土著居民需求的一些商品继续从希腊进口，但许多东西此时在希斯特里亚、卡拉提斯和托弥斯的作坊里就地制造。首先出现真正商品生产的是希斯特里亚，约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该城

商业（首先是与葛特—达契亚居民的商业）盛极一时，以至它铸造本城的银币和青铜币；过了一百年，卡拉提斯和托弥斯也先后步其后尘。然而，约自公元前三世纪始，一方面出于历史环境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锡诺耶湾出口淤塞，希斯特里亚的经济衰退，于是卡拉提斯殖民地跃居首位。

多布罗加沿岸诸殖民地是生活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条件下的希腊人奠立的，所以一开始就是作为奴隶制城邦国家（póleis）出现的。在最初一百至一百五十年间，希腊人的政治制度乃是寡头共和制（来自希腊词 oligos = 少数及 arché = 权力）；换言之，政权掌握在少数富商阶层手里，在他们中间选举城邦“大法官”（执政官）。大多数自由民——渔夫、水手、手工业者以及为数相当多的奴隶，受这少数人剥削。

逐渐，生产阶层（首先是手工业者阶层）及同邻近乃至较远的葛特—达契亚人交易的小商人的经济作用上升，这导致他们进行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约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作为这种斗争的结果，在希斯特里亚建立了奴隶民主制；公元前五世纪末和四世纪初，希斯特里亚人的榜样为卡

拉提斯和托弥斯殖民地所效法。

多布罗加希腊城邦政治史 25

关于多布罗加希腊殖民地政治史的记载相当少,而且很不确切。无疑,建立在葛特—达契亚人中间的这些殖民地必须同土著居民保持睦邻的政治关系,但是缺乏同此有关的具体材料。偶或,关系恶化,甚至酿成冲突;这种情况似发生于公元前514年,当时希斯特里亚人帮助大流士一世,这位波斯国王在远征斯基特人途中经过多布罗加并打败了葛特人。平素,葛特人和希腊人是盟友,如公元前339年,他们一起抗击斯基特人酋长阿提亚斯人侵多布罗加。

在此事件后不久,整个多布罗加沦于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占领下,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则又处于他的一个部将和继业者(继承人)色雷斯王莱辛马卡斯占领下。在卡拉提斯殖民地领导下,希腊城邦曾两度爆发反对莱辛马卡斯的起义,但均告失败。莱辛马卡斯死后,希腊殖民地虽取得独立,但经常受到巴斯塔尔尼人和色雷斯人的侵袭,被迫以高额代价觅求葛特—达契

亚人和斯基特人酋长们的庇护。最后，在公元前 72—71 年的罗马与彭特王密特里达提的战争中，多布罗加土地首次遭罗马军队践踏。卢库卢斯将军强迫希腊殖民地同罗马缔结盟约，将其置于完全附属罗马政权的地位。

文化生活

在多布罗加诸殖民地，文化生活颇为活跃，并具有真正希腊古风。官方和私人碑石皆以纯准的希腊文刻写；青年按古希腊传统在古典中学受教育，与其他希腊城邦的文化关系也颇盛。在希斯特里亚，据知甚至还有一座剧院。从多布罗加诸殖民地还涌现出一些对整个希腊文化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的学者（如卡拉提斯城的地理学家德米特里和语法学者赫拉克利图）。

从希斯特里亚发现的多利亚风格的寺宇以及从发掘中找到的许多建筑艺术残片、石像、金属和陶器说明，多布罗加诸殖民地的艺术也是古希腊式的。多布罗加诸殖民地的居民礼拜古希腊诸神，虽然在这方面看来也接受了一定的土著影响。

希腊殖民地在葛特—达契亚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同希腊人不断密切接触中，葛特—达契亚
人在物质文化方面接受了较强影响。在塔里维尔
迪(希斯特里亚附近)土著居留地，在属于公元前
六世纪的地层中发现了许多阿提卡名贵器皿残
片。罗德岛和萨索斯岛的希腊双耳瓶流传于我国 26
外喀尔巴阡山的几乎全部地区，而且葛特—达契
亚人也开始仿造。逐渐，他们从希腊人那里接受
了陶轮、改进了的冶铁方法和货币的使用，等等。
希腊殖民地促进了土著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兴
盛，提供了社会政治组织范例，从而加速了葛特—
达契亚社会的原始公社崩溃过程。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第二代铁器

一般特征与分期

葛特—达契亚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在拉铁尼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冶铁业大为高涨；越来越多的工具用铁制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

促进农业发展的铁犁铧。兵器亦用铁制，陶器日益借助陶轮制造；其他手工业也取得大幅度发展。饲养大牲畜、养羊等畜牧业仍然是一项重要活动；考古学者在奥勒什蒂亚山区还发现几处达契亚人牧羊场遗迹。同样在拉铁尼文化时期，达契亚—葛特人受希腊和马其顿钱币启发，开始铸钱。原始公社解体过程临近结束：父权公社最终为村社所取代，达契亚—葛特部落组合成强悍的军事联盟，足以抵御任何敌人。在这个时期，达契亚—葛特社会距国家形成只有一槛之隔，行将跨门而入。

从第一代铁器过渡到第二代铁器是葛特—达契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虽然可能有某些地区在某一时期进步稍快，但从第一代铁器到第二代铁器的过渡在我国全境内几乎发生于同时；拉铁尼时期的始初可以推定在公元前300年左右。

外部的影响虽然是第二位的，毕竟加速了从哈尔斯塔特时期到拉铁尼时期的过渡过程。在外喀尔巴阡山地区，希腊殖民地与多瑙河南部的色雷斯人的影响尤为明显。在特兰西瓦尼亚，有助拉铁尼文化形成的要因则是凯尔特人的因素。

凯尔特人在古代形成印欧诸族的最西支，系

西欧拉铁尼文化的创造者。他们从法国和德国南
部向西方、南方和东方拓展，其东进者直达小亚细
亚。在我国领土上，即在特兰西瓦尼亚，凯尔特人
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侵入；在丘梅什蒂(萨土—马
雷县)发现一个凯尔特人居留地，他们的墓则见诸
丘梅什蒂、阿帕希达(克鲁日附近)、锡利瓦什(阿
尤德附近)、梅迪亚什等地。凯尔特人带来经过改
进的铁加工法和制陶技术(陶轮)，为达契亚人所 27
接受。在其同土著人共居过程中，凯尔特人终于
被土著人同化。

从考古学观点着眼，第二代铁器所特有的拉铁尼文化从公元前 300 年延续至公元 106 年，亦即罗马人占领达契亚这一年。拉铁尼文化可分三个段阶：第一阶段延续将近一个世纪(公元前三世纪)，系这一文化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公元前二世纪至一世纪初)是其最后结晶和普及阶段；第三阶段(公元前一世纪初至公元 106 年)的特点则是达契亚拉铁尼文化的极度繁荣。

从社会经济角度看，作为原始公社最后阶段，则拉铁尼时期仅延续至公元前一世纪初，亦即在达契亚形成划分为对抗阶级的社会和布雷比斯塔

国家诞生之时。

达契亚与达契亚—葛特人

我国领土上拉铁尼文化的创造者和代表者是色雷斯族北支达契亚—葛特人。达契亚—葛特人在希腊史料上习惯称为葛特人，在罗马史料上则称达契亚人，实际上是同一宗。如考古发现所揭示，他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惊人地一致，古代地理学家斯特拉波清楚地告诉我们，达契亚人和葛特人操同样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印欧语大家庭范围内色雷斯语的一支方言。至今罗马尼亚语中保存着达契亚人语言的许多词汇，如：amurg（黄昏）、aprig（急烈的、严峻的）、brad（杉）、brînză（干酪）、copil（孩子）、gorun（橡树）、mal（岸）、mazăre（豌豆）、moş（老人）、prunc（婴儿）、ţărînă（田地）、viezure（獾）、viscol（暴风雪）、zăr（乳清）、zburda（欢跃）、zestre（嫁妆），等等。

达契亚—葛特人分为阿普利，布里，科斯托博契，特里齐等部落和部落联盟。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各占一定地区，以一个较大的设防居留地为中心。这类大居留地的名称往往含有 dava（达

瓦）的结尾（在达契亚语中，dava 意为设防居留地，镇）。古代史料给我们保存了这样一些名称：阿尔杰达瓦、布里达瓦、皮罗博里达瓦、塔马西达瓦、齐里达瓦、苏契达瓦及其他。当然，并非所有达契亚—葛特人居留地都有这种结尾的名称。诸如萨尔米泽杰图萨、德罗贝塔、阿普卢姆等名称不含 dava 这个词。

达契亚人身材适中，蓄发留须。他们的服装大体上与罗马尼亚山区农民相似：长衬衣，紧身裤，御寒的大羊皮袄和斗蓬。只有贵族（tarabostes）戴皮帽。他们脚穿一种上马刺的靴，以便在雪地和冰上行走。妇女穿短袖衬衣和裙子，头围大披肩。

达契亚，从达契亚—葛特人发祥地这个意义上说，大致与今天的罗马尼亚领土相应。然而，在某些历史时期，达契亚人超过了这个疆域，他们的住所向西方和西北方延伸至中多瑙河和斯洛伐克，向南至哈埃穆斯山脉（巴尔干山脉），向东至布格河口。

葛特—达契亚人的居留地和墓场 28

考古研究发现了这个时期的许多达契亚—葛

特人居留地和几处墓场，其中不少发端于哈尔斯塔特时期。在皮罗博里达瓦（波亚纳，在摩尔多瓦南部）、皮斯库一克勒萨尼洛尔（在雅洛米察河上）、圣格奥尔基、莫雷什蒂和梅迪亚什（特兰西瓦尼亚）发现了由地窖和地面住所构成的大小不一的居留地。有些居留地设有土壁垒、木栅和壕沟。居留地器物丰富；有铁器工具、青铜器物、银饰和大量陶器：以手工或陶轮制作的各种形状和大小不同的器皿、织布机锤、纺锤及其他。有些地区，如在济姆尼恰和穆里吉奥尔（多布罗加）还发现了墓场：死者先火化，然后通常用叫做瓮的器皿盛放骨灰并葬入地下。同骨灰一起照例葬有属于死者的器皿及某些物品。

这个时期的葛特一达契亚人居留地展示出经济的迅速发展。葛特一达契亚银币从公元前三世纪下半期开始流通，同样说明这一点。如上所述，效法希腊和马其顿钱币，或仅受其启发铸制的葛特一达契亚货币是为了适应各地区部落间日益增长的商品交换需要的。

公元前六至二世纪达契亚—葛特人政治史

古代资料只是断断续续地保存了一些关于葛特—达契亚部落历史的记载；这种情况阻碍我们详细地、连贯地重新展示喀尔巴阡山—多瑙河地区整整几个世纪中发生的事变，而只能浮光掠影，草草一瞥。

“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五世纪)给予我们关于葛特—达契亚人最早的历史记载。在谈到大流士一世远征黑海北岸的斯基特人时，他还忆及这位波斯王经过多布罗加，在那里遇到“色雷斯人中最勇敢和最正直的”葛特人的抵抗。葛特人败北后，被迫随波斯人远征，他们继后发生何事，希罗多德没有告诉我们；但他简短的叙述已足以构成一幅关于公元前514年在多布罗加(当然，不止在这里)存在某些葛特—达契亚部落联盟的实景。

关于公元前五世纪及四世纪大部分时间，历史记载几乎完全空白(我们只知道多布罗加的葛特人在公元前五世纪向奥德里斯色雷斯人国王纳贡)。直至公元前339年，我们才又发现葛特人在

一个名字业已失传的酋长统率下抗击斯基特人阿提亚斯越过多布罗加。由于腓力二世战胜阿提亚斯，多布罗加沦于马其顿统治之下。四年后，亚历山大·马其顿在兴师征伐不宾服其至尊的特里巴里人（多瑙河南岸的一支色雷斯人）时，对多瑙河北岸奥尔特尼亚（或蒙特尼亚）的达契亚一葛特人也进行了一天征伐，占领他们一个小堡。

29 接近公元前四世纪末，在蒙特尼亚平原上出现了一个由德罗米凯特斯领导的葛特一达契亚部落的强大联盟。德罗米凯特斯以奥德索斯河（阿尔杰什河）地区为中心，在一个广阔得多的地域行使其权力，包括多瑙河右岸多布罗加的若干据点。但这些据点被上面提到的莱辛马卡斯占领了。

莱辛马卡斯进而企图占领多瑙河北岸的领土，约于公元前300年遣其子阿伽托克勒进攻德罗米凯特斯。但葛特人酋长赢得了战争胜利，俘虏了王子。几年后，德罗米凯特斯想同莱辛马卡斯建立睦邻关系，释放了他儿子；但色雷斯国王非但不赞赏这一姿态，反而觉得此时手足束缚已除，便亲率大军，再犯阿尔杰什河地区的达契亚一葛特人（公元前292年）。但德罗米凯特斯又一次战

胜莱辛马卡斯，将其活捉，囚回其部落联盟中心海利斯(该地实址尚未核实)。

在葛特武士要求处死莱辛马卡斯时，德罗米凯特斯反对，力陈释放莱辛马卡斯是唯一能带来持久和平之举。德罗米凯特斯的主张付诸实现，莱辛马卡斯获释，所换取到的是使达契亚人受惠的和平，他们收复了前所失陷的多瑙河右岸诸堡。德罗米凯特斯娶莱辛马卡斯公主和亲，莱辛马卡斯留下人质，从而确保了谅解。

在同一世纪，即公元前三世纪，蒙特尼亚(或多布罗加)的另一个葛特人酋长扎尔莫德吉科斯从希斯特里亚拘取人质，其权力在这个城邦深感咄咄逼人。

公元前180年，希斯特里亚不得不求助于另一个部落联盟首领赖马克索斯，以战胜威胁该城的色雷斯人酋长佐尔特斯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我们获悉了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达契亚部落联盟的最早记载；在他们的“王”奥罗勒斯统率下，这些达契亚人成功地挡住了于公元前三世纪末定居摩尔多瓦，此时企图越山而过的日耳曼族的巴斯塔尔尼人。奥罗勒斯与另一个达契亚人酋长鲁博

博斯特斯是同时代人，或略比其早；一种拉丁文资料告诉我们，在鲁博博斯特斯统治下，内喀尔巴阡山地区的达契亚人力量增强。这一现象，我们应视为葛特—达契亚人权力中心从蒙特尼亚平原向特兰西瓦尼亚转移的开端，这个过程将以布雷比斯塔国家的出现而告完成。

与罗马尼亚领土上原始公社史有关的问题、资料和参考书目 30

在认识距离我们今天时代如此遥远的那些时代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空白和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专家们对原始公社制度的若干问题过去有所争论，现在继续在争论。这里我们仅举几个同我国上古史特别重要的一些方面有关的例子。

人在罗马尼亚境内的出现

大约十年前在德尔若夫河谷发现的属于称为“碎石文化”的原始工具证明，六十万年前我国境内就有人存在。更近的一次发现——布朱列什蒂（奥尔特尼亚）发掘提出了人类极远祖先——南方古猿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遗迹问题。确实，在布朱列什蒂找到许多看来是有意击破的兽骨，其中有些显出使用过的痕迹。但是，只有对这些推断获得确切的信证，才能谈得到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就有南方古猿在外喀尔巴阡山的我国境内生存。

中石器时代问题

近年来，在专家们队伍中愈益频繁地出现反对使用中石器時代这个名词的呼声。据这些学者的见解，所谓中石器时代无

非是旧石器时代的延伸，旧石器时代的若干晚期文化一直贯穿
至新石器时代开始。因此，建议中石器時代这个词由另一个词
31 epipaleolitic 代替，其意为“后期高级旧石器时代”、“高等旧石器
时代”（希腊文中 epi＝超过，在…之上，在…之后）。由于这种观
点尚未被一致接受，我们继续选用人们较熟悉的中石器时代这
个旧名词。

图尔达什新石器文化源渊

1961 年在中穆列什河黠粗里亚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一组巫术—宗教文物，一个土穴内埋有图尔达什文化的器物，其中有三块纹有奇怪符号的陶版。专家们的研究迅速证明，这种符号是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原始苏美尔人使用的古字。

黠粗里亚的发现重新提出了图尔达什文化及其近缘南斯拉夫的文查文化的源渊问题。据许多专家的见解，陶版的出现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向西北的一次迁徙（居民运动）的毋庸置辩的证据，这次迁徙也波及我国领土。

从第一代铁器到第二代铁器的过渡

专家们一致同意，第二代铁器文化的形成首先是由达契亚—葛特社会内部的发展决定的，希腊人、色雷斯人和凯尔特人的外部影响则是第二位的。但有所争议的是这一现象在我国不同地区产生的日期。据一些专家的意见，从哈尔斯塔特文化到拉铁尼文化的过渡在我国全境几乎发生于同时（约于公元前 300

年);另一些见解则认为,在多布罗加,蒙特尼亚平原和摩尔多瓦南部,早在公元前450年左右就出现这个现象,但在内喀尔巴阡山地区和摩尔多瓦中部和北部,迟至一个半世纪后才发生。至今,第一种意见似乎更接近历史一考古实际。

资　料

以上所述时代的主要资料来源是考古研究和发现。迟至铁器时代,我们才拥有关于我国境内的达契亚—葛特人居民的若干文字记载。

因此,自然不存在关于我国领土上石器或青铜时代的古代文字记载。迟至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希腊作家才首次提及这里的居民。除希罗多德谈到与公元前514年事件有关的多布罗加的葛特人和斯基特人(他忆及在马里斯河,亦即穆列什河上有斯基特人出没),米利都的海卡透也给我们提供了某些资料。他提到了多布罗加南部的两个葛特人部落:特里齐和克罗比齐。同样,索福克勒斯在其残存的一个悲剧的很少片断中,谈到一个名叫“卡尔纳本”的人“统治着葛特人”;但我们无从肯定他所说的是我国境内的葛特人还是巴尔干半岛同名的另一族。关于稍后时代,资料略多一些。这里我们仅举出希腊人阿利安关于亚历山大·马其顿在葛特人国家征伐的叙述及另两个希腊作家狄奥 32
多斯(西西里的)和波萨尼阿斯关于德罗米凯特斯与莱辛马卡斯战斗的记载。关于奥罗勒斯和鲁博博斯特斯是一个拉丁作家庞培尤斯·特罗古斯告诉我们的。希腊和拉丁作家关于我国的记述已搜集成册并译成罗文:《罗马尼亚史资料》。该书第一卷业

已出版(1964年,布加勒斯特,科学院出版社)。金石学也给我们一臂之助，关于扎尔莫德吉科斯和赖马克索斯的记载和资料就是得自希斯特里亚发现的碑石。

参考书目

想掌握关于我们祖国境内原始公社制度时代更广泛、更详细的知识的读者，参考1960年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罗马尼亚史»第1卷(«Istoria României» Vol. I. Ed. Academiei 1960)是有益的，尽管该书一些章节需根据更新的发现进行补充或改写。关于这些问题的一本综合性近著是196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迪·贝尔丘«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地区历史的曙光»(D. Berciu: «Zorile istoriei în Carpaţi şi la Dunăre», Ed. ştiinţifică 1966)。关于希腊殖民地的历史和文化,我们介绍子午线出版社出版的«我们祖国的里程碑»丛书的三部著作:埃·康杜拉基:«希斯特里亚»;康·普雷达:«卡拉提斯»;弗·卡纳拉凯:«托弥斯»(Em. Condurachi: «Histria»; C. Preda: «Callatis»; V. Canarache: «Tomis»)。多布罗加自远古至罗马占领的历史在迪·米·皮皮迪和迪·贝尔丘著的«多布罗加史论丛»第1卷(科学院出版社,1965年)中有所阐发(D. M. Pippidi şi D. Berciu: «Din istoria Dobrogei» Vol. I. Ed. Acad. 1965)。要熟悉达契亚人所讲的语言问题，我们介绍伊·伊·鲁苏的著作«色雷斯—达契亚人的语言»(布加勒斯特,科学出版社,1967年,第2版)(I. I. Russu: «Limba traco-dacilor», ed. aII-a Ed ştiinţifică, Bucureşti, 1967)。合适的图书还包括我们所未引证的较

老的著作。至于历史—考古研究取得的进步，可参阅专业性刊物，如：«达契亚»(«Dacia»)，考古研究所通报，新辑，布加勒斯特；考古研究所期刊：«古史研究和论辑»(«Studii şi Cercetări de istorie veche» (SCIV))；布加勒斯特历史研究所期刊：«研究»(«Studii»)；布加勒斯特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古钱学研究和论辑»(«Studii şi Cercetări de numismatică»)；«古典论丛» («Studii clasice»，布加勒斯特)；克鲁日历史博物馆通报：«纳波森西斯博物馆学报» («Acta Musei Napocensis»)；雅西历史和考古研究所出版的«摩尔多瓦考古学»诸卷(«Arheologia Moldovei»)。

古代（奴隶制时代）

35

由布雷比斯塔至德凯巴鲁斯的达契亚国家

国家出现的前提

公元前二世纪，出现于上一世纪乃至更早的葛特—达契亚人居留地获得扩展并愈益富庶。除这些居留地外，达契亚人还兴建了新的居留地，如：波佩什蒂（于阿尔杰什河上）、佩契卡（在阿拉德附近）、提诺苏（于普拉霍瓦河上）和锡吉什瓦拉等。该世纪下半期，出现了筑于高地、以土壁垒和寨栅设防的砦堡（部落中心与部落联盟中心），如：科斯特什蒂（洪尼多阿拉县，奥勒什蒂耶山区）和克珀尔纳（阿尔巴县，塞贝什河谷）等。对所有这些居留地的研究，证明当时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综合性的发展：出现了冶炼铁矿石炉，铁制工具数量与品种益多，铁犁铧开始见于达契亚人村落，农业有了显著进步；丰硕的收获储藏于四壁经火焙烧的深坑内。养畜业被普遍从事，成为主业。

开采铁矿和冶铁居各种手工业发展首位，此外，岩石加工、木工、金银细工等业亦有所发展。家庭手工制陶尚未消失，但专业作坊用陶轮制作的器皿此时日益增多。一言以蔽之，关于公元前二世纪和一世纪初，考古发现描绘出一幅农业生产提高、手工业专门化及其产品增多的经济繁荣景象。

各个生产部门的跃进决定了交换的加强。佩契卡、波佩什蒂或切特采尼（于登博维察上游河谷）等居留地就是沿古交通动脉兴建并成为贸易中心的。流通的货币量增加，除外来和本地古币 36
外，古罗马银币此时也愈益频繁地出现。活跃的交换逐渐准备着劳动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亦即出现了商人。

关于达契亚所有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这种发展的一致性，必须予以着重指出。大家将会看到，正是由于这两种因素，达契亚国（其中心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布雷比斯塔）才得以迅速勃兴并达到那样繁荣昌盛和疆域辽阔。毫无疑问，除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各种物质资源，外喀尔巴阡山地区的谷物、牲畜、鱼类等财富也成为布雷比斯

塔政治的经济支柱。

这种迅速的经济发展，在社会上产生重要的结果。用铁斧和铁犁开垦的土地早已成为耕种者家庭的财产；村社内部定期划分地亩业已停止，可耕地转化为私有财产。手工业者也成为其所使用工具及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品的所有者。

私有制的普及加深了葛特一达契亚人诸部落成员间财产的分化。部落共同体的酋长们享受战利品的最大部分，因而通过战争、经商、剥削和侵夺公社一般成员的财产来发财致富；公社一般成员有时因向富人举债无力偿还而丧失土地。贵族蚕食公地肥私，将主要物质财富集中在他们手里，广大部落成员则日益贫困。简单的财产差别此时转化为一种社会分化：贫困者阶层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富裕贵族奴役，被迫为贵族工作，并养活他们。除原有的对奴隶的宗法制剥削，此时又出现了富人对自由贫困者阶层的剥削。贵族(tarabostes, pileati）变成真正的剥削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使他们同为数越来越多的受剥削的平民(comati)和奴隶处于对立的地位。

达契亚国的出现及其性质

这些对抗性矛盾的存在，使旧的部落政治组织不可能再维持，因为如果全民大会继续有权决定全公社的最重要的问题，贵族就无从保持其对社会和经济的统治地位。因此，贵族结束了军事民主：全民大会变成一种单纯的咨询机关，或干脆取消，贵族机关——元老院开始执政。从元老院中选举贵族利益的代表——国王。统治阶级建立了自己的镇压机器：常备军，监狱，法庭；它还让人们为它兴建了强大的城堡，一方面固然为了保卫国家，但另一方面则为了防备群众的骚动和起义。此时，以国王身边的重臣和有影响人物大司祭为首的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僧侣在达契亚社会中具 37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其地位的日渐巩固，国王开始产生传位于子的欲望，统治权因此转成世袭。这样，产生了对抗的阶级以及作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的工具的国家。达契亚国应认为是初期奴隶制国家，因为奴隶制关系尚未包罗一切，自由民劳动在社会生产中仍占最大比重。

外来的双重威胁要求土著部落联合起来，这

种威胁的逼近加速了国家在达契亚的出现。在西面，凯尔特人部落占据了自古以来就是达契亚人居住的斯洛伐克的土地，正沿蒂萨河谷而下，逼近特兰西瓦尼亚。从南方来的罗马的威胁日趋严重；罗马早已占领了希腊和马其顿，其军队离多瑙河，亦即达契亚边界已经不太远了。

布雷比斯塔统治下的初期达契亚国

达契亚国形成于特兰西瓦尼亚西南部，以奥勒什蒂耶山脉地区为中心。接近公元前二世纪末和一世纪初，这里有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可能是鲁博博斯特斯部落联盟的后裔。在布雷比斯塔统辖下，团结在这个部落联盟周围的有特兰西瓦尼亚的其他达契亚人部落。

布雷比斯塔是达契亚国第一个知名的国王。他于公元前 82 年登位，统治至公元前 44 年。在大司祭德凯尼乌帮助下，布雷比斯塔不仅成功地将内喀尔巴阡山区的部落，而且将蒙特尼亚平原、奥尔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的部落统一和组织起来，

从而其统治遍及全达契亚。在其旧部落中心奥勒什蒂耶山区，布雷比斯塔开始构筑强大的堡垒体系。

年轻的达契亚国面临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威胁。凯尔特人更是近在眉睫，抵抗他们是布雷比斯塔的当务之急。公元前60年或59年，他击溃西方的凯尔特人部落（博伊人和塔乌里斯契人），其国家疆域拓展至中多瑙河和斯洛伐克山脉。

然而，尤为严重的是日见逼近的罗马人的威胁。早在公元前74年，罗马将军库里奥就率军从巴纳特右岸某处推进至多瑙河，但“慑于黑暗的森林”，没有渡河。稍后，于公元前72年至71年间，卢库卢斯将军与黑海西岸的希腊城堡缔结盟约：罗马的威胁直指多布罗加，从而也就逼近达契亚国东陲。

布雷比斯塔对这种形势作出强烈反应。正如斯特拉波所描述的，他成为“罗马人之腹患”。公元前55年后，经三年苦战，他占领了自奥尔比亚（布格河口）至阿波罗尼亚（保加利亚）的黑海沿岸地区，然后乘胜麾师直进哈埃穆斯山脉。这样，达 38
契亚国疆域已极其辽阔：布雷比斯塔的统治自中

多瑙河和斯洛伐克山脉伸至奥尔比亚，自北喀尔巴阡山到巴尔干山。无怪乎一篇希腊碑文称布雷比斯塔为“色雷斯第一个最伟大的国王”，古代作家则称其统治为帝国(arche)。

公元前 48 年，布雷比斯塔干预恺撒与庞培的罗马内战。他派狄奥尼索波利斯（今天的巴尔契克）的希腊人阿科尔尼翁为使节前往马其顿见庞培，承诺达契亚人将援助庞培反对恺撒。但未能践约，因为公元前 48 年夏，恺撒打倒庞培，已成为罗马国家的主宰，并且在以后数年内，准备发动对达契亚人的战争。布雷比斯塔放弃了过去一直奉行的积极的对外政策，集中力量巩固奥勒什蒂耶山区的防御体系。

一部分葛特—达契亚贵族不满于中央权力的加强，因而策划了一个阴谋。布雷比斯塔成了这个阴谋的牺牲品。公元前 44 年，几乎在恺撒于罗马被其政敌刺杀同时，这个国王亦遭暴力废黜。

自布雷比斯塔至德凯巴鲁斯的达契亚

由于缺乏经济和政治的牢固统一，布雷比斯

塔幅员辽阔的统治趋于崩溃。这个国王于达契亚以外的占领地区一去不复返，而且即使在达契亚，一些地区也从中央集权的国家里分裂了出去。但是，这个国家并未消灭；它仍存在于特兰西瓦尼亚，继续以奥勒什蒂耶山区为中心。登上这个内喀尔巴阡山国家王位的相继多人：布雷比斯塔的近臣、并握大司祭的教权和王权的德凯尼乌；同样既是大司祭又是国王的科莫西库斯；德凯巴鲁斯的父亲斯科里洛；杜拉斯—狄乌尔帕尼乌斯(约公元69—87年，可能是德凯巴鲁斯的叔父)；最后则是德凯巴鲁斯本人。

从布雷比斯塔国家分裂出去的达契亚一些地区此时为形形色色的“王”统治着，我们应把这些“王”视为部落联盟或初期小国的酋长。这样的一个酋长科提索统治着巴纳特山脉两脊，由此经常攻击南多瑙河地区。在蒙特尼亚平原，著名的“王”有科松和狄科米斯（后者曾援助安托尼乌斯反对屋大维——未来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多布罗加由三个酋长——罗勒斯(在南部)、达庇克斯(在中部)和齐拉克塞斯(在北部)分治。

布雷比斯塔死后一百二十多年间，达契亚一

葛特人对抗着罗马的威胁，经常组织对多瑙河南
岸的征伐。但罗马的压力日益加强；奥古斯都皇
帝的部将克拉苏斯首先击败科提索，然后于同年
（公元前28年），在罗勒斯帮助下，占领多布罗加。
39 达庇克斯身死，齐拉克塞斯逃往多瑙河北岸。除
了希腊城邦，多布罗加由代表罗马并为之效劳的
罗勒斯统治；罗勒斯死后，多瑙河与黑海之间的这
个地区成为奥德里斯色雷斯人的保护国，而他们
也是罗马帝国的被护民。沿海地区的希腊城邦直
接隶属罗马；著名罗马诗人奥维德就被奥古斯都
皇帝放逐至托弥斯城。公元46年，整个多布罗加
附属于美西亚省。

多布罗加被占领后，达契亚人和罗马人之间的冲突依然如故。对达契亚人的频繁攻击，罗马人报以报复性讨伐。其间一年（公元11—12年），卡图斯将军把蒙特尼亚平原的五万葛特人迁徙至多瑙河南岸；也就在这一次，济姆尼恰、波佩什蒂和皮斯库—克勒萨尼洛尔等居留地遭夷毁。奥古斯都皇帝在其著名的“政治遗嘱”《圣奥古斯都行状》（《Res gestae Divi Augusti》）中谈到这些讨伐，毫无根据地断言他征服了多瑙河北岸的（全部）达

契亚人。

达契亚国时期达契亚人的物质文化

较近的研究证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达契亚呈现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高度繁荣。达契亚文明在达契亚全境惊人地一致，奥勒什蒂耶山区的居留地和城堡则是这种文明的最高度的古典表现。这里创造了一个由大大小小堡垒组成的强大防御体系，把科斯特什蒂、布利达鲁、皮亚特拉—罗希耶、伯尼察诸堡联接在一起。所有这些堡垒均以保卫萨尔米泽杰图萨（格勒迪什蒂亚—蒙切尔卢伊）大居留地为目的。类似的城堡还见诸特兰西瓦尼亚其他地区乃至摩尔多瓦：克珀尔纳（塞贝什河谷），皮亚特拉—克拉伊维（阿尔巴—尤利亚附近），蒂利什卡（锡比乌附近），科瓦斯纳（阿尔迪亚尔东部），伯特卡—多瓦姆内伊（摩尔多瓦，皮亚特拉—尼亚姆茨附近）。

一些十分类似的城堡和居留地存在于达契亚不同地区，是达契亚人的统一性及全国所有地区经济发展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它同样证明，达契

亚国在地域上从来也没有仅仅局限于奥勒什蒂耶山区。这里只是达契亚国王们的中心、首府，达契亚国从来就包括一个广袤得多的地区，喀尔巴阡山始终没有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达契亚人的建筑

达契亚人城堡一般说四周环绕三米厚的坚固城墙，由巨大石块构筑而成，其建筑技术效法古希腊。石城顶部由粗烧的砖或木头建成。也有只以堑壕和装上寨栅的土壁垒设防的砦堡。

40 考古发掘还发现了若干达契亚人的民用居留地。有些是名副其实的城（oppida），也就是说具有准城市的性质，例如格勒迪什蒂亚—蒙切尔卢伊，在这里发现有冶铁和锻铁作坊、水道、粮仓等；另一些则是村落和集镇。在平原上，住所是地窖或地面建筑。在山区，则全部是建于天然或人工台地上的房舍：四角形或圆形木屋，以石头为基，用木瓦或希腊型瓦盖屋顶。在奥勒什蒂耶山区还发现几处达契亚式的羊舍遗迹。

今天人们还找到了达契亚人的祭坛，其中以在萨尔米泽杰图萨发现的数量最多，规模较大。

一种祭坛是四角形的，由一连串的石柱或木质圆柱构成，保存至今的则只有石灰石或安山岩柱基。另一种祭坛是圆形的，由排列成环形的石柱构成。在萨尔米泽杰图萨还发现一个象征太阳的安山岩祭坛；这个祭坛以一块圆形石板为中心，四周十块石板象征光芒。

达契亚人居留地的器物

达契亚国时期的物质文化是繁荣的铁器文明（拉铁尼文化）。在奥勒什蒂耶山区及其他诸地的居留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铁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犁铧和犁刀、锹、鹤嘴镐、长柄镰、小镰刀、刮刀、修剪葡萄藤的刀、两脚规、钉耙、铁匠用钳、砧、锯和钻。一些日用品也用金属制造，如鞋掌、马嚼、马掌、楔子、钉、两爪钉（均为铁制）、器皿（铁或铜制）等。兵器是铁制的；可见到剑、匕首、枪尖、矛、箭以及盾的残片。凡此种种发现，莫不雄辩地说明达契亚国时期采矿和锻铁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达契亚人的制银业已十分发达，用银制造器皿、项圈、手镯、项链、戒子和衣服扣针（别针）等。在科斯特什蒂和佩契卡发现

了几处达契亚人“珠宝”作坊遗迹。

陶器皿是达契亚人居留地器物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手工或陶轮制的陶器，体积大小不等，用途也很广，既有储藏用的大双耳缸（高达一点八米），也有化银或化铜用的小坩锅。还发现了不同类型的罐、钵、罐、油灯盏等。在奥勒什蒂耶山区诸居留地发现的风格独特的几何、植物和动物构图彩陶占有特殊地位。

布机锤、鱼网锤、纺锤、将泉水引入蓄水池和居留地的水管等也用陶土制成。

各色各样的进口器物（金属制品、玻璃制品和陶制品出现于这个时期的居留地），证明达契亚人同希腊—意大利人贸易的繁盛。

41

达契亚人的精神文化

达契亚—葛特人的宗教信仰

希罗多德是给予我们关于葛特—达契亚人宗教知识的第一个史学家。他说，葛特人相信永生不死，还告诉我们两个神的名称：植物和肥沃的地下神扎莫尔克西斯以及光明天神杰贝列伊齐斯。

达契亚人还崇信一个类似玛尔斯的战神，以及一个类似罗马的狄爱娜女神的月亮和森林女神本狄斯，等等。因此，他们的宗教是多神的。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每五年达契亚人以一人作牺牲，派遣他作为觐见扎莫尔克西斯的使者；他还叙述了达契亚一葛特人在暴风雨时对天射箭的习俗，其用意可能是为了帮助杰贝列伊齐斯神驱散乌云。从另一些资料中我们发现，达契亚人给战神供奉祭品。但是，他们如何在考古学家发现的祭堂中举行仪式，尚不详。

达契亚人尚火葬，也就是说将死者火化，然后放人骨灰罐葬于地下。在酋长和贵族墓上往往有土塚隆起。奇怪的是在奥勒什蒂耶山区居留地网至今尚未发现一个墓场。但这样的公墓已在达契亚其他地区，如波罗利苏姆(莫伊格拉德，泽拉乌附近)和萨尔卡(奥拉迪亚附近)发现。

文字与科学知识

考古发现证明，达契亚人会书写，最初使用古希腊字母，尔后则用拉丁字母。在萨尔米泽杰图萨的祭祀场地区发现一些上面刻有一至三个希腊

字母的石灰石块；这些石块按其原来的排列，想见是组成关于达契亚人的神、国王和大司祭的某种册谱。同样是在萨尔米泽杰图萨的一个多边形房屋中找到了一个圆锥形大祭器的残片，器壁上印有 Decebalvs 和 per Scorilo 字样的图章。达契亚语中，“per”是“儿子”之意；因此祭器上的铭文应读作：“德凯巴鲁斯，斯科里洛之子”。

在古代文字资料中同样也有关于达契亚人认识并使用文字的线索。狄奥·卡西乌斯谈到，在结束同达契亚人的战争时，多米提亚努斯皇帝送交元老院一封德凯巴鲁斯国王的信；这个史学家还谈到，公元 101 年夏，德凯巴鲁斯的盟友们送交图拉真皇帝一封用拉丁文书写的短简（写在一个蘑菇上！）。

诚然，文字在达契亚社会中传布尚不很广。只有统治阶层，首先是僧侣和王朝文牍机关使用。

无论文字资料或者考古发现都证实，达契亚人已具备一些植物学、经验医学和天文学的知识。一些药用植物的达契亚文名称保存至今，在许多
42 居留地中可见到医疗器具。至于天文学，在萨尔米泽杰图萨发现的文物中有一个矗立着安山岩石

柱的圆形大祭坛(直径三十米)，这是达契亚人的历规——阳历，每年三百六十日，分十二个月，每月三十日，每“周”为六日。

艺　术

达契亚艺术遗迹保存至今的数量较少，因为艺术家最常用的一种物质——木材不能保存于地下。但我们知道，爱美的达契亚人甚至在实用器物(工具、金属器皿和陶器)上也用波浪形凹线和带状凸线等装饰。达契亚钱币上的人、兽(马)形象栩栩如生；在奥勒什蒂耶山区发现的陶器上所绘的动物表现出较浓厚的现实主义手法。

比较杰出的艺术品，可举出于皮亚特拉一罗希耶发现的模拟植物的装饰品和一头野牛或牦牛形象的皮盾铁壳，在同一城堡中发现的画着某一女神(可能是本狄斯)的青铜面具，乔瓦拉(特兰西瓦尼亚)的银版，蒙特尼亚的波亚纳一科措芬内什蒂的金盔，特兰西瓦尼亚东部森克勒耶尼的银器皿和镀金银器皿宝藏。没有东西能阻碍我们将一些驰名的艺术珍品，例如巴亚一德一克里什(特兰西瓦尼亚)的“矿工”雕像也视为土著达契亚人的

艺术，尽管它受到凯尔特和古希腊艺术的显著影响。

* * *

无论达契亚人的物质文化或者精神文化均存在着希腊、色雷斯、凯尔特等很多外来因素。但达契亚人在吸收这些因素时，或能融会创新，别具特色，或能掌握贯通，据为己用。因此是创造性地吸收外来的文明因素，是把这些因素与本地的古老传统相结合。作为这种吸收和结合的结果，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高度达契亚文明。

德凯巴鲁斯　罗马人征服达契亚

达契亚诸部落再度统一

罗马人出现在多瑙河畔对达契亚构成愈益严重的威胁，促使达契亚诸部落重新统一起来。达
43 契亚一葛特人重新团结在特兰西瓦尼亚达契亚国周围这一过程可能早在斯科里洛朝就已开始，延续至杜拉斯—狄乌尔帕尼乌斯时代。在这一朝，爆发了与当时在多米提亚努斯治理下（公元 81 — 96 年）的罗马人的一次严重冲突。

为了防止罗马的蓄谋进攻并削弱其力量，于公元85年(或86年)冬，达契亚人进袭美西亚，夷烧清野，美西亚省总督奥庇乌斯·萨比努斯本人死于战斗。罗马立刻作出反应：多米提亚努斯亲临战场附近，达契亚人被赶出美西亚。为了更妥善地管理和防卫，美西亚此时一分为二：上美西亚和下美西亚。罗马人入侵达契亚的准备于公元87年就绪。

面临这燃眉之祸，杜拉斯—狄乌尔帕尼乌斯禅位于德凯巴鲁斯。据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描写，德凯巴鲁斯“擅长战事，办事达练，进退自如，巧于用计，作战勇敢，妙能操胜，善能避挫”：换言之，是一位天才的将领和熟练的外交家。

与多米提亚努斯之战

外交是德凯巴鲁斯使用的第一个手段，他向多米提亚努斯提出和议。在美西亚之胜后，议和对达契亚人有利无弊。罗马皇帝拒绝和议并派科尔奈里乌斯·富斯库斯将军率军北渡多瑙河。想来，富斯库斯推进至奥尔特河谷，可能是在土耳努—罗舒狭谷陷入德凯巴鲁斯设置的埋伏：罗马

军被击溃，统帅被杀。

次年，多米提亚努斯再次派兵，由能征惯战的忒提乌斯·优里亚努斯统率。此次，罗马人从巴纳特向前推进，并在塔帕埃（特兰西瓦尼亚的铁门，在卡兰塞贝什至哈采格的路间）获大胜。德凯巴鲁斯求和，过分自信自己兵力的多米提亚努斯予以拒绝。但由于几乎与此同时发动的对日耳曼族的克瓦兹人和玛尔科曼尼人的战争失利，罗马皇帝被迫妥协。与达契亚人的和约缔结于公元89年，其条件对罗马人有利：他们获得多瑙河左岸若干桥头堡，并有权经过达契亚领土开赴克瓦兹—玛尔科曼尼人战线，德凯巴鲁斯成为必须听命于帝国的被护民。

能干的外交家德凯巴鲁斯善于利用89年和约的条件，化弊为利，反使罗马人吃亏。他并未把从富斯库斯手里缴获的全部武器和战俘退还罗马人，而且将其作为被护国君王资格得到的补偿金和工匠也用于加固诸堡，装备和训练军队，以期东山再起，反抗罗马帝国。可以说，多米提亚努斯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

几年后，这一事实在罗马也已显而易见，那里

开始把多米提亚努斯缔结的和约视为帝国的耻辱。因此，公元 98 年图拉真皇帝登位后，权衡一个自由达契亚的存在对罗马的危险及占领达契亚的经济利益，断然停止对德凯巴鲁斯的金钱、工匠和 44
军事教官的援助，并且积极备战。达契亚国王深知这一危险，也不束手待亡；他加强自己的军队并在邻族中找到了盟友。

图拉真的第一次达契亚战争
(公元101—102年)

战争爆发于公元 101 年春。在图拉真指挥下，罗马军架浮桥渡过多瑙河，从巴纳特向前推进，并步步为营(castre)，以保护交通线，巩固占领地区。第一个战役亦发生于塔帕埃；罗马人遭重创，但终于获胜，于是图拉真的军队涌人哈采格国。秋天的来临使图拉真停止进军；但谁也不怀疑来年春天他将抵达奥勒什蒂耶山区。

正是出于这种估计，使德凯巴鲁斯铤而走险，试图扭转战争命运。他同他的盟友萨尔马特人和巴斯塔尔尼人一起，踏冰南渡多瑙河，袭击多布罗加的罗马人卫戍部队；打垮卫戍部队意味着直捣

南多瑙河诸行省，行将迫使图拉真放弃西部战线，驰援受威胁地区。但这个计划未能成功：许多达契亚骑兵因冰破溺水，罗马卫戍部队顶住了进攻，图拉真只用部分部队回援。达契亚人及其盟友败退；下美西亚省总督拉贝里乌斯·马克西姆斯统率的罗马军横越蒙特尼亚平原，深入特兰西瓦尼亚。

随着春天的到来，图拉真亦再举进军。他的部队进入达契亚人堡垒地区，也就是狄奥·卡西乌斯称之为“以石城加固的群山”地区。这位史学家还告诉我们，罗马皇帝“冒险逐一攻取群山”（考古学亦证明此时科斯特什蒂堡已经失陷），接近“达契亚王朝的都城”，亦即萨尔米泽杰图萨。就在此时，拉贝里乌斯·马克西姆斯俘获达契亚国王的姐妹。德凯巴鲁斯败北求和，而图拉真也鉴于其军队业已精疲力竭，接受和议，但留下卫戍部队驻扎达契亚各据点，其中包括位于哈采格国的未来城市乌尔皮亚—图拉真—萨尔米泽杰图萨。

这一次，和约条件十分苛刻，德凯巴鲁斯无论如何再无法加以利用。达契亚国王把公元87年从富斯库斯手里缴获的武器、战车、战俘及军旗退

还罗马人；他必须献出转到他这方面来的全部罗马流亡者，夷毁城池，不再接纳帝国逃兵，割地给罗马人（特兰西瓦尼亚东南部，巴纳特，奥尔特尼亚，蒙特尼亚平原及摩尔多瓦南部），尤为甚者，还必须“以罗马人之友为友，以罗马人之敌为敌”（狄奥·卡西乌斯语），也就是说必须抛弃任何独立的对外政策。

显而易见，这样的条件无异变达契亚为与罗
马未来战争中的刀下俎。图拉真并未放弃占领达
契亚的念头，增兵集结于上、下美西亚，并授命建 45
筑师大马士革人阿波罗多洛斯在德罗贝塔（土尔
努—塞维林）架设横跨多瑙河的石桥。

德凯巴鲁斯意识到一场新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便背约重建诸堡，制造兵器，接纳罗马流亡者，紧张地觅求盟友，并进尔进攻罗马人的盟友——蒂萨河平原上的雅齐基人。有鉴于此，罗马元老院再度宣告德凯巴鲁斯为罗马国敌。

图拉真的第二次达契亚战争
（公元105—106年）

罗马人于公元105年夏发动第二次达契亚战

争，其地位比第一次有利得多，因为达契亚人部分领土此时已归属他们。达契亚国中心地区腹背受敌：受到来自穆列什河，日乌河谷和奥尔特河谷，可能还有特兰西瓦尼亚东部的四面攻击。科斯特什蒂堡再度陷落并被夷为废墟。达契亚人的萨尔米泽杰图萨陷于重围，图拉真圆柱上的一个悲壮场面说明，那里的达契亚人不但遭到敌人的攻击，而且要忍受缺水的折磨。由于饥渴力竭，一部分守卫者献出了城堡，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以德凯巴鲁斯为首，奔逃得脱，想在山中组织新的抵抗。派来追踪德凯巴鲁斯的罗马骑兵赶上了这个国王；德凯巴鲁斯眼见自己有被俘之危，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宁死而不可耻地束手就擒。图拉真把他这可怕的敌人的头颅随同丰富的战利品（大量金银）一起，也送到罗马，晓示帝国首都的臣民。

达契亚人最后的抵抗于公元106年夏被罗马人挫败。奥勒什蒂耶山区的居留地被夷毁，这里的居民被流徙至平原地区，以便于监视和剥削。达契亚国被废，其大部分领土建成达契亚行省。

有关达契亚国时期的问题、资料和参考书目 46

达契亚国起源问题

我国所有历史学者都同意，在社会经济方面，布雷比斯塔国家的起源应归结于公元前二世纪末与一世纪初达契亚人生产力及社会的迅猛发展。但关于何处是这个国家的摇篮，何处是达契亚诸部落由之开始统一的中心这个问题，专家们各执己见。大多数史学家从一开始就推断这个中心在奥勒什蒂耶山区，但有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布雷比斯塔政权的摇篮是蒙特尼亚平原，其首府则是阿尔杰什河上的波佩什蒂居留地。

我们在这里虽不能详细论证，但应该指出，布雷比斯塔国家发源于外喀尔巴阡山这样的论点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古代文字资料（尤其是地理学家斯特拉波），一开始就指向西方的布雷比斯塔的整个对外政策（与凯尔特人之战）以及科斯特什蒂，萨尔米泽杰图萨等地较诸波佩什蒂丰富得多的考古发现等等，莫不证明达契亚国诞生于奥勒什蒂耶山区。

达契亚—葛特人宗教的性质

四分之一世纪前，史学界盛行这样一种意见，即达契亚—葛特人崇拜一个神（可能有多种属性和外貌）；换句话说，他们的宗

教是一神论的。这种观点的基础在于曲解了希罗多德关于葛特人信仰的那一段确实有些混乱的叙述。康·达伊科维丘对于这段文字比较严谨的通读和诠释排除了谬误的意见，确定了达契亚一葛特人宗教的多神论性质。考古发现（祭坛，诸神的形象）肯定了达契亚人信仰多神。

主 要 资 料

与前一个时代一样，对于这个时代来说，考古资料（奥勒什蒂耶山区达契亚人居留地和波佩什蒂居留地的系统发掘，全国各地的有组织或偶然的大大小小的其他许多发现）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在文字资料方面，古代并未给我们留下一部关于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一世纪达契亚的详细历史；但各个作家保存了这段历史的点滴片断。关于布雷比斯塔时代，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和在狄奥尼索波利斯(今天的巴尔契克)发现的一篇碑文极为有
47 用。关于这位伟大国王的后裔，史学家约尔达尼斯说得比较清楚，至于布雷比斯塔死后达契亚其他地区的事态，则有苏埃托尼乌斯(《十二恺撒生平》)和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的记载。

关于多米提亚努斯，尤其是图拉真与达契亚人的战争，古代有许多描写。图拉真皇帝本人对战事有所记述，而随同图拉真出征达契亚的医生克里通和辩士狄奥·克里索斯托姆斯也都著书叙述了这几次战争。阿庇亚努斯和阿里安等史学家也描写了这些事件(参见《罗马尼亚史资料》)。

但是，所有这些著作均已失传，有的散佚殆尽，有的只剩极

少的残简断片。唯一比较连贯的资料是狄奥·卡西乌斯的叙述，但即使这一种记载，我们也只能见到拜占庭时代(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的节写本。

图拉真圆柱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者力求以图拉真圆柱为基础来整理达契亚战争史。根据图拉真的诏令，公元 113 年树立在以图拉真命名的罗马广场上的这个大理石圆柱，在其柱身上雕有占领达契亚的两次战争场面。圆柱既是第一流的艺术文物（似乎也应归功于大马士革人阿波罗多洛斯的天才），又是重要的历史资料，上述浮雕场面是图拉真所写的达契亚战争著作的图解。但圆柱浮雕的文献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们毕竟不是“照相”，而是艺术作品。艺术家们不可能完全洞悉达契亚的实况，他们广泛地运用了象征、典型化、概括等手法。因此，对圆柱浮雕场面的解释必须慎重，必须同其他历史资料不断对照。

对于我们罗马尼亚人来说，圆柱是一座具有特别巨大意义的纪念碑。圆柱描绘了占领达契亚——达契亚殖民化和罗马化的前提的图面，因而成为记载罗马尼亚民族诞生的一种不寻常而又真实的文献。

参考书目

除 1960 年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罗马尼亚史》第一卷有关章节（255—341 页，由康·达伊科维丘主编），读者可参考 1965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哈·达伊科维丘的《达契亚人》（H. Daico-

viciu:«Dacii» Ed. stiinţifică 1965)以及康斯坦丁·达伊科维丘和哈德里安·达伊科维丘的两本著作:«萨尔米泽杰图萨»(子午线出版社,1962年第2版)和«图拉真圆柱»(子午线出版社,1966年)(Constantin Daicoviciu şi Hadrian Daicoviciu: «Sarmizegetusa» ed. a II-a, Ed. Meridiane. 1962 şi «Columna lui Traian», Ed. Meridiane 1966)。关于达契亚人其他诸堡和居留地,参见拉杜·武尔佩:«蒙特尼亚的葛特人居留地»(Radu Vulpe: «Aşezări getice din Muntenia»)和一本集体著作(米·马克雷亚、奥·弗洛卡、尼·卢普、伊·贝尔丘合著):«特兰西瓦尼亚南部达契亚人诸堡»(M. Macrea. O. Floca. N. Lupu. I. Berciu: «Cetăţi dacice din sudul Transilvaniei»),两书均由子午线出版社于1966年出版(«我们祖国的里程碑»丛书)。还可参阅1969年布加勒斯特子午线出版社出版的尼·戈斯塔尔的«摩尔多瓦的达契亚人诸堡»(N. Gostar: «Cetăţi dacice din Moldova» Ed. Meridiane. Bucureşti 1969)。有关这方面的著作还有较早的书目。并请参阅本书67页参考书目栏中所指出的期刊。

罗马达契亚 48

疆界，行政和军事组织

从罗马人占领达契亚起，罗马尼亚领土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对罗马尼亚部族和语言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阶段。关于罗马对达契亚的有效统治范围，我们可以肯定并非达契亚的全部领土均纳入了罗马帝国范围。诸如马拉穆列什、克里沙纳、摩尔多瓦北部等地区就从未被图拉真占领过，在罗马时代这里依然由自由达契亚人居住着。即使在被占领的领土中，也只有一部分组成新行省达契亚；摩尔多瓦南部、蒙特尼亚平原、奥尔特尼亚东部和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最初归属下美西亚省(至公元117年或118年)。

但是，我们所说的罗马达契亚疆界，不是指占领之初若干年，而是指稍晚时期，亦即最终被占领和保留下来的多瑙河北岸全部领土组成这个省的

时候。虽然并无有关疆界线的绝对确切的材料，但这条线大致可以根据镇守占领地的罗马军营来划。

罗马达契亚的边界线大概是从蒂萨河流入多瑙河的入口处溯蒂萨河而上。到达蒂萨河与穆列什河交汇点，疆界便沿穆列什河而上，至米契亚（韦采尔，德瓦附近）；由此折向北，再转向东北，以博洛加（于西部山脉中）和波罗利苏姆（泽拉乌附近）的设防大军营为标志；然后，与索梅什河的平行线及东喀尔巴阡山的特兰西瓦尼亚一侧山麓构成疆界，直至安古斯蒂耶（布雷茨库，奥伊图兹隘口入口）。由此，边界走向沿南喀尔巴阡山至布兰，然后以对角线直下多瑙河。

自由达契亚人

在未划入帝国的地区，文字资料和考古发现均证明居住着自由达契亚人：达契亚省北部和西北部的大达契亚人，东北喀尔巴阡山两脊的科斯多博契人和中摩尔多瓦的卡尔皮人（公元三世纪起）。在梅迪耶什—阿乌里特（萨土—马雷县）发现了一个自由达契亚人的大居留地；这里找到

的许多陶窑证明制陶业十分发达。在梅迪耶什—阿乌里特、森塔纳—阿拉德和波耶内什蒂(在摩尔多瓦)还发掘出达契亚人火葬墓场。

自由达契亚人同达契亚省保持着活跃的贸易关系，他们的传统物质文化也受到罗马物质文化的影响。但由于不存在罗马的统治，没有罗马移民和退伍军人，这些达契亚人没有罗马化。

有时，自由达契亚人攻打达契亚省的边界。

罗马对达契亚统治的性质 49

被罗马人占领并长久统治的地区进入了古典奴隶制世界的轨道，从而出现了生产力的无容置辩的进步、贸易的兴盛、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在罗马达契亚，采矿和手工业获得发展，农业劳动有所改进，货币经济把更广泛的生产部门纳入其范围。到处出现了建有石头公共建筑物、水道系统等具有城市性质的居留地。相对说比较简陋的达契亚人较老的居留地，如纳波卡或德罗贝塔，仅在二、三十年间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城市——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的繁华中心。拉丁文化的成果，首先是语言，当然还有文字，也在这个新的行省传

布。此时认识和使用文字的阶层比布雷比斯塔—德凯巴鲁斯时代已广泛得多。所有这一切乃是罗马在达契亚统治的积极方面。

但这种统治也有其消极的方面。确实，不应忘记，一方面罗马的占领束缚了同样属于古典世界的达契亚文化的很有希望的发展；另一方面罗马时代取得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奴隶和被征服的土著人的残酷剥削。

因此，罗马对于达契亚的统治具有两重性，其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是互不可分的。从史学的角度看，罗马统治可以视为一种进步现象，因为它是我们民族存在本身的基础。

罗马达契亚的行政组织

图拉真统治下的达契亚
（公元 106—117 年）

图拉真建立的达契亚省包括特兰西瓦尼亚本土（但奥尔特河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东南角不在其内）、巴纳特和奥尔特尼亚西部，其余被占领的领土，上面已经说过，已归并在下美西亚省。这个

新行省驻有两至三个军团的卫戍部队和大量的辅助部队，是一个帝国行省，也就是说直接从属皇帝，由一个头衔为奥古斯都执政代表（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的元老级总督管理；这个总督是执政官衔的，这就是说在来达契亚之前曾在罗马的帝国最高执政官团充职。行省首府是乌尔皮亚—图拉真城，由达契亚首任总督德契姆斯·特伦蒂乌斯·斯考里亚努斯于公元108—110年以皇帝名义兴建，地点在今天的哈采格地区(因此不是德凯巴鲁斯故都旧址)。

阿德里亚努斯统治下的达契亚（公元117—138年） 50

公元117年图拉真死时，达契亚爆发了与自由达契亚人及萨尔马特人的进攻相结合的土著居民大起义。新帝阿德里亚努斯虽然扼杀了起义，打退了进攻，但不得不放弃难于防卫的摩尔多瓦南部和蒙特尼亚绝大部分地区。由原属下美西亚省的多瑙河北岸其他地区（东奥尔特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与奥尔特尼亚西部一起组成一个单独的省，取名下达契亚(形容词“下”是指该省

比公元106年的达契亚地处多瑙河的更下游)，图拉真原来组织的达契亚省，此时更名为上达契亚。在上达契亚，元老级总督此时降格为行政长官衔(也就是说仅在罗马充任过行政长官)，因为驻防在这里的军队比过去减少，只有一个军团及各种辅助部队。帝国代表同时又是驻扎在阿普卢姆(阿尔巴—尤利亚)的格米纳第十三军团司令，由一个驻在乌尔皮亚—图拉真的司财政事务之职的财务代理人协助。下达契亚则只有辅助部队驻防，由一个骑士级的首席代理人领导。该省省府是德罗贝塔。

罗马达契亚的第二次改组同样发生在阿德里亚努斯统治时代，约于公元124年。为了加强上达契亚省北部的保卫，阿德里亚努斯把穆列什河上游和阿里耶什河谷北部地区从该省划出去；这个地区组成一个单独的省——波罗利森达契亚(来源于波罗利苏姆这个地名，该地是保卫北部边界的真正关键)，也由一个代理人管辖；其首府为纳波卡(今天的克鲁日)，上达契亚的首府则仍然是乌尔皮亚—图拉真—萨尔米泽杰图萨(但总督按惯例坐镇格米纳第十三军团驻地阿普卢姆)。下

达契亚首府仍然在德罗贝塔。

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与达契亚的最后一次改组

在这个皇帝统治下，罗马帝国处于同玛尔科曼尼人统率的广大的“蛮族”部落联盟的战乱之中。战事在多瑙河中游的达契亚附近地区进行，甚至蔓延到达契亚本土，这决定了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皇帝对该省实行新的改组。改组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他取消下达契亚省（公元168年），将其同上达契亚合并，取名为阿普伦达契亚。然后，他把巴纳特西部从阿普伦达契亚划出去（公元169年），组成一个单独的省——马尔文达契亚，以马尔瓦为首府（巴纳特某地，实址尚未确切核实）。三个达契亚省——阿普伦达契亚、波罗利森达契亚和马尔文达契亚此时归一个元老级的、并曾任执政官的最高司令官（总督）——达契亚三省奥古斯都执政代表（legatus Augusti pro praetore Daciarum trium）统辖。在三省中，只有马尔文达契亚设一名首席代理人作为首脑（同时也是这 51
个省驻军司令）；波罗利森达契亚只设一名财务代

理人，以副总督身分行使马其顿第五军团（详见下）司令官之职。阿普伦达契亚的财务代理人在必要时代替最高总督（agens vice praesidis），其驻地是乌尔皮亚—图拉真。这次改组保持至罗马统治末期。三个达契亚的首府（京都）是乌尔皮亚—图拉真城，该城自阿德里亚努斯时代开始也称萨尔米泽杰图萨，而从亚历山大·谢维路斯时代（公元222—235年）起又获得京都（Metropolis）的称号。

罗马达契亚的军事组织

达契亚是深插在“蛮族”世界的帝国前沿堡垒，因此需要大量军队保卫。在整个罗马统治时期，达契亚屯兵达三至四万人，约占帝国军队总数的十分之一。

军队由军团和辅助部队组成。军团是精锐的步兵部队，只在罗马公民中征召。辅助部队在非公民的行省居民中征募，分步队（cohorte）和骑队（ale）。构成辅助部队的还有其他部队：总督卫队及其他特种支队（numeri）。二十五年乃至更长

的兵役期满后，辅助部队士兵获得罗马公民权，并且通常在其服役的行省取得土地；这些士兵由于他们在那里定居，构成了罗马化的一个有力因素。

达契亚不象其他诸省那样由一条连绵不断的工事线（壁垒或城墙及堑壕）保卫，而是由封锁通向省境内的入口要道的军营扼守。军营是罗马军队常设的设防营地；它们有一至两道防护壕及一道土壁垒或石城墙。军营线前面，有一道哨塔线（例如该省西北边界上的梅塞什）。连绵不断的土壁垒仅存在于奥尔特河左岸（所谓边界——limes Transalutanus）及波罗利苏姆城前面几公里长的地段上。最近的研究注意到封锁由西进入扎兰德盆地通道的一道土壁垒，这可能也是罗马的一道边界(limes)。

除上述主要边界军营外，还必须提到省境内的军营：阿普卢姆的格米纳第十三军团营地和波塔伊萨（图尔达）的马其顿第五军团（167—168年间来此）营地。省境内还有若干辅助部队军营，用以维持内部治安。

达契亚的防御体系证明是完全有效的。在罗马统治的一百六十五年间，达契亚较诸其他行省

所受外来攻略要少。即使后来罗马军队撤离该省时，亦并非因为无力防守，而是由于多瑙河南岸诸省更需驻在达契亚的兵力。

52 罗马达契亚的土著和移民 达契亚人的罗马化

罗马统治下达契亚人的连续性

在对图拉真的两次战争中，达契亚人遭受了重大伤亡："达契亚男子业已竭尽"，古代史学家优特洛庇乌斯不无夸张地说。但事实是，大部分达契亚居民在罗马统治时期依然生存着。罗马人统治时期土著人的存在证诸各种大量证据。

有助于说明连续性的金石学和语言学历史证据

从不同资料得悉，在图拉真及继其之后登上罗马皇位的历代皇帝时代，约有十三至十五支辅助军部队由达契亚人组成。其中有些是在公元三世纪上半期征募的，如果不是在罗马达契亚存在

大量土著居民，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事实是达契亚这个省自图拉真至公元三世纪中叶，相对说给帝国提供的辅助部队最多。这并非事出偶然；达契亚人善战的品格是出名的，并得到好评。

屡次震撼罗马达契亚的起义也应视为是败而不屈的达契亚人的业绩，其中尤以117—118年的起义为最重要。

在图拉真缔造的这个省的拉丁文铭文中也见有色雷斯—达契亚人姓名，其大部分属土著人，而不属移民。这种姓名为数很少：只占金石所佐证的姓名总数的2％，但这是事出有因的。达契亚人主要居住在农村；他们不习惯而且也没有物质手段去树立费钱的碑石。至于住在城市里的达契亚人，实际利益促使他们尽量少宣扬自己的血统。许多达契亚人，尤其在贵族中，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并从此起了铭文中比比皆是的纯罗马姓名。

连语言学，或更确切地说，地名学(地理名称)也支持连续性的论点。绝大部分罗马达契亚城市继续使用达契亚名称，这种情况绝非偶然。阿普卢姆、纳波卡、德罗贝塔、波塔伊萨、蒂比斯库姆(茹帕，在卡兰塞贝什附近)、波罗利苏姆是占领者

直接从早就定居在自己土地上的土著人那里沿用的旧名称。河流的名称也是达契亚式的，诸如马里斯河(穆列什河)、萨穆斯河(索梅什河)、阿卢图斯河(奥尔特河)、蒂比斯库斯河(蒂米什河)、萨尔杰蒂亚河(奥拉什河？或斯特雷伊河？)。

在这方面有特殊意义的是罗马达契亚省首府的事例。座落在哈采格地区的这个城市兴建于108年—110年间，开始取名为奥古斯都乌尔皮亚一图拉真的达契亚殖民地。诚如所见，直到阿德里亚努斯扼杀117—118年的大起义后才附加上萨尔米泽杰图萨这个德凯巴鲁斯旧都的达契亚
53 名称。只有在达契亚省存在大量达契亚居民的情况下，皇帝的这个姿态才有意义。阿德里亚努斯是想通过强调德凯巴鲁斯国王与罗马统治之间的连续性来争取达契亚居民的支持。

达契亚人连续性的考古学证据

较诸其他任何证据更有说服力的，恐怕是在罗马达契亚境内发现的约一百多处属于公元二至三世纪时期的达契亚物质文化遗迹（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甚至在安古斯蒂耶(布雷茨库)、奥

尔海伊—比斯特里察、米契亚、阿德—梅迪亚姆(梅哈迪亚——伯伊勒—海尔库拉内)等地的罗马军营进行的发掘，也发现同罗马器物混合在一起的手工制造的达契亚器皿和器皿碎片。显然，这些器皿不属于使用高级陶器的罗马士兵，而属于从土著人中间征募来的士兵和罗马人征发来建造和修理军营的土著居民。对于许多钱币宝藏的考察证明，它们属于土著人。

由于近年来的发掘，今天人们可以见到属于该省达契亚居民的农村居留地；这种发现见诸列金察—德—穆列什、卡绍尔茨、奥布雷扎(在阿尔巴—尤利亚附近)、诺什拉克(靠近阿尤德)及其他许多地方。

在农村地区甚至还找到了达契亚人的公墓，诸如卡绍尔茨(锡比乌县)墓场、卡尔博尔(布拉索夫县)墓场、索波鲁—德—肯皮耶(离图尔达不远)墓场，等等。这些墓场内有二至三世纪的数以百计的坟墓，根据葬仪(火葬)以及发现的特殊器物，尤其是陶器，极易识别，是达契亚人在罗马时代继续大量生存的最好证据。

达契亚的殖民化和罗马化

“来自整个罗马世界”

在达契亚省，土著居民同优特洛庇乌斯所说的“来自整个罗马世界”(“ex toto orbe Romano”)的移民生活在一起。确实，已发现的铭文证实达契亚既有来自达尔马提亚的移民(矿工!)，来自上、下美西亚、潘诺尼亚和色雷斯的移民，也有来自较远地区，如意大利、希腊、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等地的移民。同殖民化或多或少是自发进行的其他行省不同，在达契亚，由于罗马帝国希望有尽量多的罗马因素散播在帝国的这个前沿堡垒，因而殖民化是由罗马国家有组织推行的。当然，除官方的殖民化外，也还存在个人的移殖：怀着生活得较好或发财致富的希望自动迁来的移民。

54 殖民化的有组织性和大规模性使达契亚居民受到罗马的强烈影响。罗马的技术和精神文化的优越性；在行政和司法中使用拉丁语；商人、庄园主、尤其是一般移民以及退役时取得土地从而定居于达契亚，同本土人通婚成家立业的大量士兵；

凡此一切,莫不促进着殖民化。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发生了土著居民的罗马化:达契亚人掌握了征服者的文化、习俗、信仰和语言。

最初,罗马的物质文化因素深入达契亚人中间。价廉物美的罗马陶器赢得了市场:在达契亚人墓场中,大部分陶器是本省的罗马货。较先进的生产工具(例如罗马型犁铧),各种实用器物和装饰品同样受人欢迎。吸收罗马的物质文化还不等于罗马化,但它说明达契亚人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同移民经常密切接触的。这是真正罗马化的前提和条件。

达契亚人掌握了罗马的物质文化,进而逐步采用了罗马的信仰、习俗、姓名和拉丁语。有的土著人树立了罗马型的墓碑;还有的土著人采用了罗马姓名,而把自己的达契亚人旧名作为别号。没有直接证据证实达契亚人依旧崇奉古达契亚诸神,这表明至少在城市里罗马的信仰很快占了上风。同样还可以看到,在占领前的达契亚人墓中没有发现钱币,而在也是属于土著人的罗马达契亚墓中,钱币则屡见不鲜,这是达契亚人吸收罗马

人习俗的雄辩例证。最后，由于同移民生活在一起，除了拉丁语没有其他沟通工具，达契亚人养成了说拉丁语的习惯。跻身于罗马公民行列所能享受的利益决定了他们逐步抛弃自己的语言，其中较少的词汇进入达契亚境内所讲的民间拉丁语中，从而也在罗马尼亚语中保存了下来。拉丁语——统治阶级的语言和帝国的官方语言，高度文化的语言，军队和生产过程的语言在全达契亚省立足生根。

就是这样，在奥列里亚努斯撤离达契亚的时候，居住于该省的已是积重难返的十足罗马化的居民。

罗马达契亚的生活

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伴随占领，达契亚进入罗马古典奴隶制轨道，出现了活跃的经济生活。手工业、农业和商业在该省建立后最初六十年间尤为发展，继后，由于玛
55 尔科曼尼战争出现一个停滞时期。自塞普提米乌

斯·谢维路斯皇帝时代起，尤其是在谢维路斯·亚历山大统治下，达契亚省又进入经济高涨新阶段，一直延续至公元三世纪中叶，即罗马帝国的总危机也在达契亚呈现消极后果之际。

农业和畜牧业

农业仍然是主要经济部门。最肥沃的土地属移民；其大部分是中、小土地所有者。使用奴隶或受奴役的土著人劳动的大庄园主较罕见；在这类庄园中心座落着包括住宅、仓房和作坊等等的领主“邸宅”（Villa rustica）。这样的建筑在达契亚有所发现，例如，在霍比察（萨尔米泽杰图萨附近）、丘默法亚（克鲁日附近）及其他诸地。

达契亚以种植粮食为主，是邻近诸省军队的名副其实的粮仓。同时，还存在着关于种植葡萄和开伐森林的痕迹。

象在前罗马时期一样，畜牧业是重要的生产部门。达契亚的广阔草场大部分是皇帝(国家)的财产，由一些富人赁租。饶有兴趣的是，这些人既作为赁租草场者又作为赁租盐矿者（盐是牲畜的必需品)出现在铭文中，有时他们甚至还经营省内

的食盐贸易。

采矿和手工业

开发金属，特别是黄金，在罗马时代出现巨大高涨。西山的金矿此时通过大量的坑道和竖井进行开采；也从河沙中淘金。

金矿是帝国的产业，由罗马国家直接开采。在坑道里做工的既有奴隶，也有自由民；早在图拉真时代，就把两族罗马化的达尔马提亚人（皮鲁斯特人，巴里杜斯特人）——采矿专家移居到这里，其他皇帝想来也效法他的榜样。矿区在巴亚—德—克里什，布拉德，巴亚—德—阿里耶什等地，其中心在阿尔布尔努斯—马约尔（罗希亚—蒙塔纳）。金矿的全部管理机构设在阿姆佩卢姆（兹拉特纳），由一个头衔为金矿代理人（procurator aurariarum）的帝国官吏领导，他手下有一支下属官吏组成的队伍协助。

除了黄金以外，在同一地区还开采白银和铅。赤铜矿座落于米契亚，铁则在洪尼多阿拉地区的盖拉尔和特利乌克开发。

为了适应兴建楼宇和纪念碑等建筑物的需

要，开辟石场采石(萨尔米泽杰图萨附近布科瓦的大理石、克兰的石灰岩、德瓦的安山岩等等)。在萨利纳(奥克纳一穆列什)，奥克纳一德日，科日奥克纳(克鲁日附近)等地开采达契亚蕴藏十分丰富的食盐。

铭文和考古发现使我们知道在罗马达契亚有许多种手工艺。冶铁、冶铜、石工、木工、陶器、56
纺织等业大大发展。手工业者结成称为同业会(collegia)的职业协会，这种协会同中世纪的行会不相似，更多地象一种俱乐部和互助会。最出名、分布最广的是铁匠同业会(collegium fabrum)，但加入的也有木匠、陶器匠，也许还有泥水匠。在达契亚还可见到金匠、毛织匠、细木匠、石匠、船工、伐子工和轿夫等同业会。有些同业会的成员想来还充当达契亚各城市的消防队；这样也许才能解释为什么他们划分为什伍，而且一般说同业会都按准军事形式组织起来。

手工业生产的重要中心首先是罗马达契亚的各个城市(见后)，但也有若干农村居留地，如米契亚(石头加工)和特尔古一穆列什附近的克里斯特什蒂(陶器)。制砖场以及油灯、泥塑作坊等也屡

见不鲜。

商业、关卡和赋税

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决定了繁华的商业。大量的商人(其中许多是东方血统的)征诸于全达契亚境内的碑文。除了内部商业以外，还存在着同其他罗马行省及帝国以外世界的贸易。达契亚把从金矿开采出来的黄金送往罗马，把粮食、盐、蜂蜜、蜡、木材、纺织品、牲畜和皮革运至各省，换回青铜，凸纹装饰的细陶器（terra sigillata）、油灯、毛料、植物油、高级葡萄酒及其他奢侈品。同罗马和意大利的交换是不等价的，象其他行省一样，达契亚是被剥削者。

铺砌极好的道路纵横全省，并且竖有标示里程的石碑（milliaria），在商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出于便利军队调动这一战略目的建筑的道路，在和平时期便利了商品流通。有一条干道纵贯全省，以多瑙河上的列德拉塔为起点，经蒂比斯库姆、乌尔皮亚—图拉真—萨尔米泽杰图萨、阿普卢姆、波塔伊萨、纳波卡，抵达波罗利苏姆。另一条重要路线则沿穆列什河谷、特尔纳瓦河谷和特

兰西瓦尼亚境内的奥尔特河谷，通往安古斯蒂耶，然后出奥伊图兹隘口，横跨摩尔多瓦，抵达德涅斯特河口的蒂拉斯城。还可举出迪耶尔纳——蒂比斯库姆线、德罗贝塔——佛尔坎隘口线和自多瑙河溯奥尔特河谷而上的道路。

通过在省界、城市入口、渡桥等处设置关卡收税，罗马国家获取可观的收入。截止目前在达契亚发现的这种关卡(stationes portorii)有迪耶尔纳(奥尔绍瓦)、米契亚和庞斯—奥古斯蒂(在蒂比斯库姆与萨尔米泽杰图萨之间)等处，但设想在德罗贝塔和波罗利苏姆等地也应设有。关卡最初租给私人(conductores)，后来设财务代理人(行政官)，由罗马国家直接经营。

赋税是另一个收入来源。土地和不动产所有者交纳地产税，只有享有意大利权的某些城市的居民才能豁免；在达契亚，享有意大利权的城市有萨尔米泽杰图萨、阿普卢姆、纳波卡和波塔伊萨。57
所有自由民都交纳人头税，亦即丁口税。这两种税是直接税；除直接税外，还有许多间接税，如继承税、奴隶获释税、出卖奴隶税和出卖产品税。

达契亚的城市和乡村

帝国具有城市性质的居留地分为两类：殖民地(coloniae)和自治市(municipia)；实际上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差别，但殖民地被视为地位较高。

在达契亚，有以下几个城市达到这一最高等级：乌尔皮亚—图拉真—萨尔米泽杰图萨、纳波卡、德罗贝塔、阿普卢姆(实际上这里存在两个不同城市)、罗穆拉(奥尔特尼亚的雷什卡)、波塔伊萨和马尔瓦。其他城市则只获得自治市的称号，这些城市是：迪耶尔纳、蒂比斯库姆、阿姆佩卢姆和波罗利苏姆。新城市接二连三的兴建，乃是达契亚省逐步罗马化的最可靠的标志。

诸省城市管理以罗马的模型为法。设有市议会(ordo decurionum)及各类法官。最高行政官员在殖民地一般是两人(duumviri)，在自治市一般是四人(quattuoviri)；他们负责城市的全面领导，执行什长会议作出的决议，审理某些案件。其他法官则是市政官(edilii)和财政官(cvestorii)，前者司公共建筑管理、城市治安、街道维修、市民供应、组织演出等职，后者管理城市财政。所有这些

法官均从富裕公民中遴选，他们的服务是无报酬的。

乡村也分两类：镇(帕格-pagi)——处于一个罗马殖民地领地内的较大的乡，以及大量的村。(维克—vici)——普通的自然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由一个或两个官吏(magistri)治理，或者由一个长官(praefectus)管辖。达契亚的农村居留地中最重要的有：阿尔布尔努斯—马约尔、米契亚、阿卡埃(克兰)、萨利纳，苏契达瓦(在奥尔特河流入多瑙河处附近的切列伊)。有些村落虽已由考古发现，但不知道它们的罗马名称，如克里斯特什蒂、列金察—德—穆列什、奥布雷扎，等等。

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

如同在整个帝国一样，奴隶主和奴隶是两个基本的阶级。但还存在一个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由法律上的自由民——农业劳动者、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组成，大部分土著人属于这个阶层。

统治阶级的核心是享有全部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罗马公民(cives Romani)。但他们之中也还存在财产和等级的巨大差别，从有钱有势的帝

国官吏和承租人直到普通的移民。

58 生产阶层则由土地和手工业作坊的小私有者、被奴役的达契亚农民及奴隶组成。奴隶受到最残酷的剥削，在十分恶劣的条件下劳动于田头、森林、作坊、矿区和石场，直至精疲力竭。只有少数例外——伴读奴隶、庄园管理人等。但由于达契亚缺少大庄园，奴隶数目并不太大。在生产中，特别是在农业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依然生活在古老的村社中（至少是一部分）的本地农民。

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在罗马达契亚引起了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在一些地区开展了所谓侠客（latrones）运动——一种绿林好汉，主要在外来攻略时抢劫富人。

但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起义。由于奴隶数量较小，这种运动主要是被征服和被压迫的达契亚居民的运动。声势最大的起义发生在图拉真死后，即公元117年—118年间。另一次起义可能发生在公元167年，同玛尔库曼尼战争有关，因为一篇颂扬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皇帝的铭文谈到这位皇帝从双重危险（可能是指内乱外患）中拯救了达契亚的首府乌尔皮亚——图拉真。

达契亚省的文化生活

文字和铭文

伴随占领，拉丁语言和文字在达契亚迅速传布。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情况是：至今，在达契亚境内发现的拉丁文铭文已累近三千篇，希腊文铭文却只有三十五至三十七篇。以达契亚人名字具名的碑石向我们证明，拉丁语言和文字已在本土人中间流行。这种事实是无足为怪的，因为格勒迪什蒂亚—蒙切尔卢伊具铭器皿的发现说明，达契亚人早在前罗马时期就开始使用拉丁字母。

也许，达契亚有教读、写、算的初级学校，虽然在这方面尚无明确的证据。豪门富户在家教育子弟，以伴读奴隶相辅。

这样，在达契亚自然应存在文学作品。但除了一些简短的诗句铭文（以在杰尔米萨拉——乔瓦朱发现的为最成功），想来在罗马达契亚应形成的文字作品却丝毫无存。

宗教信仰

罗马达契亚境内发现的铭文和艺术文物证明这里膜拜的神很多，而且极端驳杂。但如果我们注意到该省居民的种类异杂，也就是说既有土著人又有“来自整个罗马世界”的移民，那末这种事
59 实也就理所当然了。

占据首要地位的是罗马诸神，如最高神朱辟特及其妻子朱诺娜；智慧女神和手工艺保护女神米涅尔瓦；贸易神美尔库里乌斯；光明和太阳神阿波罗；美和爱情女神维纳斯；原野和森林神西尔瓦努斯；植物和葡萄酒神里贝尔和里贝拉，狩猎女神狄爱娜。此时在整个罗马帝国广泛流传的东方神（埃及、叙利亚、帕尔米拉等地的神）为数也相当可观；其中最著名的是米特拉（或称不可战胜的太阳神），起源于波斯，象征善与恶的斗争。

所谓混合神（sincretism）现象常见于达契亚，也就是说把不同起源的类似的神融合于一体。崇拜混合神朱辟特—多利凯努斯，亦即把罗马的朱辟特神同小亚细亚多利凯城的闪族巴尔神融合为一体，极为盛行。另一个有代表性的现象是在罗马

名称下膜拜非罗马神（interpretatio Romana）；例如达契亚诸神的命运就是如此，他们此时隐身于奥古斯都狄爱娜、赫尔库利斯——英维克图斯，乃至里贝尔和里贝拉这一对神的名称后面。崇拜所谓“多瑙河骑士”，亦即具有伊利里亚—色雷斯—达契亚源渊的诸神，在罗马达契亚也很流行。政治—社会的意义大于宗教意义的一种独特的崇拜乃是对奠立了皇朝的奥古斯都的崇拜。有一个专门的政治、宗教团体——奥古斯都祭团掌管帝国的这种祭祀，其殿堂已发现于乌尔皮亚—图拉真。

艺　术

达契亚的城乡此时出现了典型的罗马建筑式的建筑，诸如寺宇、圆形剧场、公共建筑物和公共浴场（thermae）、城郊别墅和农村别墅等。考古学者已在许多城市（及农村）发现若干寺宇的遗迹，在萨尔米泽杰图萨、波罗利苏姆和达契亚则还有角斗士格力及角斗士与野兽格斗的圆形剧场。至于公共浴场，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军营附近也有发现。

无论在建筑技术方面，还是在艺术创作方面，

达契亚都接受了帝国各个地区驳杂的独特影响。有些文物呈现出纯粹的东方影响，例如：扶壁，顶盖上砌着角饰（凸角）的屋形石椁，古人幼稚信仰中用来驱魔守墓的灵狮，等等。但占主要地位的是西方的影响，装着死者肖像的椭圆形灵位，弧面金字塔身形的碑石以及其他种种，莫不同达契亚西邻诸行省——潘诺尼亚、诺利克、里西亚乃至意大利北部相类似。

60 诚然，在达契亚发现的艺术品价值是各不相同的。除了艺术造诣高的珍品——意大利或希腊艺术家的产品（在萨尔米泽杰图萨发现的狄爱娜雕像和戴克优斯皇帝青铜头像，在波罗利苏姆发现的卡拉卡拉皇帝的大骑像残片等），还有价值较低的本地工匠们的大量作品。达契亚本土产品主要是泥烧陶像，其低廉的价格使省内比较广泛的居民阶层都能享有。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镶在戒指上的经过镂刻的半贵重石头——宝石这个雕刻艺术的单独部门；镂刻宝石的作坊大概设在罗穆拉和波罗利苏姆。最后，在萨尔米泽杰图萨和阿普卢姆的某些发现证明达契亚存在镶嵌艺术。

如上所述，罗马达契亚的艺术从整体上看主要同帝国西部诸省的艺术类同。如果注意到使用拉丁语较诸使用希腊语广泛得多这一事实，那末可以断言达契亚省的文化具有西罗马的性质，即罗马的“精华形式”。

达契亚省的政治史

公元106年夏，从德凯巴鲁斯手里取得的部分领土组成达契亚省。图拉真对于这个省的组织殊为注意，驻军密布并进行大规模的殖民。在他这一朝，达契亚处于平静状态。由于刚刚遭受惨败，达契亚人难于再奋起反抗罗马。

图拉真在远征安息人的归途中死去（公元117年），这使达契亚复燃起解放的希望。在同时进攻帝国边境的雅齐基萨尔马特人和罗克索拉尼萨尔马特人的帮助下，达契亚居民起而斗争。形势如此严重，以致死去的皇帝后裔阿德里亚努斯（117年—138年）不得不亲临多瑙河。采取初步对策后，阿德里亚努斯把昆图斯·玛尔西乌斯·图尔博将军留在达契亚反击侵略和扼杀起义。绥靖

的结果就是达契亚省的第一次改组（公元118年），即建立上达契亚和下达契亚。几年后（公元124年），阿德里亚努斯又建立波罗利森达契亚。象在其他行省一样，他在这里推行同土著居民妥协的政策（这就是他在乌尔皮亚—图拉真殖民地名称后加上萨尔米泽杰图萨这个名称的用心）和罗马化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两个大居留地——德罗贝塔和纳波卡取得了自治市（municipium）的地位。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阿德里亚努斯才能于118年从达契亚撤退图拉真留下的部分军队，达契亚此时只剩一个军团——格米纳第十三军团，驻防阿普卢姆。

61 玛尔库曼尼战争

达契亚保持着平静，即使在安托尼努斯·披乌斯朝时期（公元138年—161年）也是如此，尽管他约于143年和157年—158年两度与省北部和东部边界的自由达契亚人开战。但在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统治下（161年—180年），达契亚也为166年开始的玛尔库曼尼战争所震撼，多瑙河上游和中游的罗马边界均受到以玛尔库曼尼人为首

的广大部落联盟的攻略。敌人于次年深入达契亚境内,夷毁波罗利苏姆军营,劫掠西部山脉的金矿区。萨尔米泽杰图萨也一度岌岌可危,尤其是省内一部分达契亚人也乘机起义。这种严重形势迫使马其顿第五军团调往前线,然后于167年或168年间进驻达契亚,扎营波塔伊萨(图尔达)。

新形势促使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对多瑙河北岸的这个省进行最后一次改组,把下达契亚并入上达契亚(从而它改称阿普伦达契亚),并在巴纳特建立马尔文达契亚。三个达契亚省置于一个统一的军、政长官统辖下,其首任是玛尔库斯·克劳狄乌斯·弗朗多,他在同雅齐基人及日耳曼人的战斗中丧命。

其后,达契亚再未遭入侵,但直至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去世和他儿子康莫都斯(180年—192年)继位,几乎始终连绵不断的邻省战事使达契亚的创伤医治缓慢。直到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193年—211年)和卡拉卡拉(211年—217年)两朝,迟迟恢复的和平才使经济产生新的高涨。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授予几个达契亚居留地以城市的地位,并重修驿道。想必也是在他那个时

代，兴筑了一条由一道土壁垒、一道堑壕及一系列军营和小堡垒组成的名副其实的新边防线（即所谓 limes Transalutanus），保卫奥尔特尼亚和奥尔特河左岸的罗马领土。

谢维路斯·亚历山大（222年—235年）

谢维路斯·亚历山大朝是罗马达契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时期。显示对达契亚省特殊关怀的一系列措施是同这个皇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此时设置了由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代表组成的全省代表会议（concilium Daciarum trium）。会议在萨尔米泽杰图萨（也正是在谢维路斯·亚历山大时期它取得了达契亚京都的地位）召开，由帝国祭司团的大司祭主持（coronatus Daciarum trium）；会议讨论本省的问题和需求，弹劾不法的官吏，颂扬在职的总督，表达对皇帝的忠诚。

殊为重要和有意义的是，这样的会议只设置在完全罗马化或罗马化取得可观进步的行省。因
62 此，达契亚三省设置这种会议是罗马化过程在多瑙河北岸的这个行省取得成功的一个证明。

虽然达契亚省后来再未遭玛尔库曼尼人战争

那样的入侵，但受到自由达契亚人的相当频繁的攻略。三世纪中叶，摩尔多瓦中部高原的卡尔皮人有时单干，有时同哥特人合伙，屡次攻略罗马帝国。这些入侵大部分指向下美西亚，但在242年和245年，卡尔皮人深入达契亚。他们的第一次入侵被戈尔地亚努斯三世皇帝（238年—244年）击退，第二次被阿拉伯人菲利普（244年—249年）击退；但后者不得不放弃蒙特尼亚的狭长地带，退守奥尔特河作为省界。尽管发生了这些事变，达契亚的局势并未动荡不安；就在此时（246年）这个省获得了铸造青铜币的权利。

撤离达契亚

帝国的总危机终于在达契亚也呈现出显著后果。在伽里耶努斯皇帝（253年—268年）时代，经济情况急遽恶化，其表现之一是货币流通的萎缩以及于257年停止发行省铸铜币。达契亚的军队克尽己责，外来的攻略对该省危害极微。但这种攻略却使多瑙河一线处于与日俱增的重压下，奥列里亚努斯皇帝（270年—275年）面临严重的抉择：或者放弃达契亚，把这里的军队撤至急需的多

瑙河一线，或者保存图拉真创建的这个省而冒多瑙河南岸诸地区被毁灭的风险。奥列里亚努斯选择前一种方案，为帝国最高利益牺牲达契亚。根据他的诏令，罗马军队和行政机构在公元271年—272年撤离图拉真创建的这个行省，而把大量罗马化的居民留在原地。

罗马放弃达契亚，揭开了达契亚历史的新篇章——向封建制度过渡时代。

同罗马达契亚有关的问题、资料和参考书目 63

罗埃斯勒理论

达契亚人在罗马占领时代继续生存这种自然而合乎逻辑的观点，曾被过去的某些历史学家所否定，这岂非咄咄怪事。这些人以近乎犯罪的十分轻率的态度把一个在德凯巴鲁斯时代将近有五十万人的部族用肉体被消灭和被流徙等見了一笔勾销。这些历史学家中最出名的是罗伯特·罗埃斯勒，因而那种否认达契亚人和达契亚—罗马人连续性的理论通常称为罗埃斯勒理论。

罗埃斯勒及其新老追随者（我们时代的某些历史学家也毫无根据地拣起了这种理论），对说明达契亚人连续性的历史证据视而不见，随意解释优特洛庇乌斯的叙述，把“达契亚男子业已竭尽”这句话当作达契亚部族全部被消灭的一个论据。罗埃斯勒理论的信徒们虽然也偶或承认少数达契亚人似乎幸存，但断言他们生活在同罗马移民完全隔绝的状态中，因而也就无从罗马化。

这种理论基于反动的政治原因，而不是科学的推论。罗埃斯勒理论断言达契亚人已经灭绝，或者少数幸存者在罗马占领时代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可能罗马化，进而得出结论：公元

271年，由图拉真移居来的全部讲拉丁语的外乡人撤离了达契亚。这样，达契亚在三世纪末变成了某种几乎杳无人烟的荒芜地区，任迁徙部落为所欲为，而且据说这些迁徙部落还把幸存于这里的、没有罗马化的达契亚人同化了。这种理论还断言，罗马尼亚部族不是在自己祖国的领土上，而是在多瑙河南岸的某个地方形成的，后来才迁徙至此，真可谓登峰造极。这种毫无科学性的理论的用心是为外国占领特兰西瓦尼亚或为霍尔蒂法西斯主义的扩张野心辩护的。

罗马尼亚史学界的大部分人早就给予了这种理论以应有的回击，用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了达契亚人在罗马统治的一百六十五年间的连续性。如同在这一章里所指出的，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成就是通过近十五至二十年来的研究所取得的。罗马撤离达契亚省以后的达契亚—罗马人的连续性问题将在下章中叙述。

关于达契亚的组织

达契亚省的组织问题曾经是罗马时代历史的最大难题之一，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依然如此。例如，几十年前人们还认为，达契亚是在公元107年才被征服的，而且直到1960年还存留着一种错误观点，说什么波罗利森达契亚省是在公元158年由安托尼努斯·披乌斯皇帝建立的，并且同时建立了阿普伦 64 达契亚省和马尔文达契亚省(又是一个错误!)。今天，罗马达契亚的各阶段组织状况大致已经知道，但还存在许多疑点，尚待未来的研究加以澄清。

这些疑点之一就是阿尔迪亚尔奥尔特河流域的霍吉兹、钦

克绍尔、费尔迪瓦拉等地的罗马军营的存在。既不能确切知道这些军营建于何时，也不清楚有何作用：是否公元102年至105年间建作达契亚被占领部分与仍然处于德凯巴鲁斯统治下地区之间的边界营地？抑或是奥尔特河上游与喀尔巴阡山之间地区在公元106年未被占领，而是较晚才被占领的证据？抑或是一条保护交通要道的防线？尚无最终的答案。

关于巴纳特西部归入图拉真创建的达契亚省问题，关于划归统一的达契亚的奥尔特尼亚领土的面积和划归下美西亚的奥尔特尼亚领土的面积问题，以及下面将谈到的关于马尔文达契亚省的领土和马尔瓦的实址问题，亦始终存疑。

马尔文达契亚的实址

在马尔文达契亚及其首府马尔瓦殖民地的实址问题上，今天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断言，这个达契亚省位于巴纳特，而马尔瓦城实址可能是在巴纳特的登塔乡。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马尔文达契亚包括奥尔特尼亚领土，其首府在罗穆拉(雷什卡)。

应当说，目前尚无具体的、绝对可靠的证据，足以说明上述任何一种假设。但逻辑的—历史的论据是同把马尔文达契亚实址按在奥尔特尼亚的观点截然对立的，而倾向这个省的实址在巴纳特；因此，这种观点也为我们接受来阐述罗马达契亚的行政组织。

撤离达契亚的时间

古代文字资料在罗马军队撤离达契亚这个问题上是相互矛

盾的。确实,稍晚的古代作家奥列里乌斯·维克多、奥洛西乌斯、优特洛庇乌斯、鲁菲乌斯·费斯图斯和约尔达尼斯都谈到在伽里耶努斯皇帝时期(公元253年—259年同他父亲瓦列里亚努斯一起执政,公元260年—268年单独执政)撤离达契亚("amissio Daciae")。但这些作家中的后三个人还谈到奥列里亚努斯(270年—275年)时期撤离达契亚的事实,而《奥古斯都史》(一部写于四世纪的帝皇传略集)中的《奥列里亚努斯生平》尽管把伽里耶努斯朝描写得漆黑一团,却并未把丧失多瑙河北岸这个行省的罪责加在这个皇帝头上,而只提到奥列里亚努斯时期撤离达契亚。

可以把考古学和古钱学的资料作为基础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资料毋容置辩地表明,伽利耶努斯未放弃达契亚,罗马军队和官吏撤退至多瑙河南岸是出于奥列里亚努斯的诏令。至多可以认为,在伽里耶努斯时期,但更可能是在他的前人特列波尼亚努斯·伽路斯(251年—253年)时期放弃了没有一个罗马城市的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地区。里西亚省也有类似的情况(参见康·达伊科维丘:《古代特兰西瓦尼亚》,布加勒斯特,1945年版,第183页及其后。C.Daicoviciu: «La Transylvanie dans l'antiquité». Buc. 1945.)。

资　料

65　关于这个时期,仍然以考古资料为主(罗马时代的居留地、军营、堡垒、墓地等等的发掘)。

关于罗马达契亚的古代记载较少,而且散见于许多作家。这些作家中最重要的已在上面阐述罗马撤离达契亚的时间问题时提到。铭文对于整理达契亚省的历史更为有用得多,其大部分

已发表于«拉丁文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 简称 C.I.L.)这部不朽的集体著作第 3 卷，后来发现的其他铭文则见诸各专业期刊。

对于古钱发现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实际。

参考书目

请阅 1960 年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罗马尼亚史»第 I 卷有关章节(米·马克雷亚和迪·图多尔主编)(«Istoria României» vol. I,Ed.Academiei,1960)。再以下列著作为补充也许是有益的：康·达伊科维丘：«古代特兰西瓦尼亚»，布加勒斯特，1945 年版(C. Daicoviciu: «La Transylvanie dans l'antiquité», Buc., 1945)和«特兰西瓦尼亚史论丛»第 1 卷，布加勒斯特，1963 年，第 3 版(«Din istoria Transilvaniei» Vol. I. ed. a III-a, Buc.. 1963)；米·马克雷亚：«罗马达契亚的生活»，科学出版社，1968 年版(M. Macrea: «Viaţa în Dacia romană», Ed. ştiinţifică, 1968)；康·达伊科维丘和哈·达伊科维丘：«乌尔皮亚—图拉真»，子午线出版社，1966 年第 3 版(C.Daicoviciu şi H. Daicoviciu: «Ulpia Traiana»,ed. a III-a, Ed. Meridiane, 1966)。关于奥尔特尼亚可参见迪·图多尔：«罗马奥尔特尼亚»，布加勒斯特，1966 年第 2 版(D. Tudor: «Oltenia romană», ed. a II-a, Bucureşti, 1966)。关于达契亚罗马化，参见康·达伊科维丘«阿普卢姆»一书第 7 章第 1 节，阿尔巴—尤利亚，1968 年版，第 261—272 页(«Apulum», VII, 1, Alba-Iulia, 1968, p. 261—272 页)。另见本书第 67 页所列期刊。在上面所提到的著作中也提供了一些较古的参考书目。

66 # 罗马和早期拜占庭时代的多布罗加

多布罗加的历史与罗马达契亚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不同。多布罗加受罗马影响较早，在克拉苏斯远征（公元前28年）后，它又归并于美西亚省（公元46年）而受罗马统治，直至公元602年它始终是帝国的组成部分。因此，奴隶制关系在这里延续时期较长。

公元一至三世纪的多布罗加

作为控制蒙特尼亚平原的棱堡，多布罗加在整个罗马统治时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帝国以重兵驻守，其中就有马其顿第五军团。公元106年—167年间，该军团驻防特洛埃斯米斯（伊格利察）。多瑙河一线由军营防守，其中最重要的则是阿克西奥波利斯（切尔纳伏德）、特洛埃斯米斯和阿埃吉苏斯（土耳恰）等地的军营。多瑙河的地位

在多布罗加的罗马军事体系中具有首要作用。

罗马统治时代多布罗加的居民

在罗马时代，黑海(攸克辛海)西岸的希腊殖民地完全丧失了原有的独立,但仍保持内部自治。公元一世纪，这些希腊殖民地，包括希斯特里亚、托弥斯、卡拉提斯、狄奥尼索波利斯和奥德索斯等五个城邦(后两个位于保加利亚境内)，组成一个文化—宗教共同体（称为五邦联盟 Pentápolis)。公元二世纪，又有梅萨姆布利亚(在保加利亚)加入,此时称为六邦联盟(Hexápolis)。联盟首府是托弥斯，驻有一个号称黑海之首领（pontarh）的具有帝国司祭团大祭司身分的首领。

这种共同体机构的作用在于巩固罗马在刚刚占领的这块领土上的统治。希腊城邦的寡头政治已无能遏制贫困群众的不满，因而在多布罗加存在一种强大的奴隶制统治对它完全有利。作为对古希腊寡头政治合作的报答，罗马让黑海诸城邦实行内部自治，并给予一系列经济上的优惠，例如,给它们铸造青铜币之权。在这种情况下,希斯特里亚、卡拉提斯、尤其是托弥斯殖民地在公元二

世纪出现经济繁荣是很自然的。

但葛特—达契亚本土人享受不到这些特权，尽管他们构成多布罗加居民的大多数。在多布罗加归并美西亚后，本土人的土地被转化为“公地”(ager publicus)——罗马国家财产，大部分分给了移民。本土居民一般说处于经济和法律上的低
67 下地位；关于没收某些葛特—达契亚公社的土地，并将其转归移民公社占有的史实，确凿有据。大量的罗马移民及其所居的统治地位，使多布罗加内地有可能罗马化，而其沿海地区则大部分仍保持希腊传统。

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

多布罗加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向我们展现出一幅同罗马达契亚相似的画面。生产力的进步在这里也显而易见，这决定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多布罗加的全部城市(也许还有某些农村)都有冶铁和制陶作坊；希斯特里亚有一家专门制造陶土油灯的作坊，托弥斯则有一家玻璃作坊。建筑用石、铁矿和铜矿得到大力开采。水陆贸易一片兴旺；铭文不仅提到大量商人，甚至还记载着从

事海上和多瑙河上运输的船工协会。

罗马人出于战略目的而修筑的驿道网，象在各地一样，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三条干线(一条沿多瑙河，一条贯穿多布罗加中部，一条沿海岸)纵割自南至北地区，而其他几条则横贯东西。

新城市的出现

在公元一至二世纪经济高涨的情况下，不仅旧城有所发展，而且新城崛起。一度是马其顿第五军团驻地的特洛埃斯米斯和图拉真凯旋碑城（阿达姆克利西）于公元二世纪获得自治市(municipium)的地位。

罗马多布罗加的社会阶级惯见于帝国的各阶级。统治阶层由罗马公民和富裕的非公民——土地、作坊所有者、商人等组成。主要在手工业作坊中使用的奴隶以及被奴役的本土居民是被剥削者群众。此外，还有一个中间阶层，包括移殖至多布罗加的某些居民、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业者、自由民等，他们即使不直接受奴隶主剥削，也遭罗马国家剥削。

文 化 生 活

与文化生活打上西罗马烙印的106—271年的达契亚不同，多布罗加的文化生活具有希腊—罗马性质。沿海诸希腊城邦依然是主要文化中心，建筑艺术遗迹、雕像等在这里俯拾即是。但是，除古希腊传统外，这里还播下了越来越多的罗马因素；罗马型的公共浴场（thermae）纷纷兴建，雕刻家以罗马现实主义手法雕塑人像，出现了罗
68 马诸省常见的典型的墓碑。颇为明显而又理所当然的是，罗马的因素在多布罗加内地较诸沿海尤有特色。

图拉真于公元109年在这里创建了一座凯旋碑，其附近的城市因此命名为图拉真凯旋碑城（Tropaeum Traiani）。这座凯旋碑不仅在多布罗加，而且在整个多瑙河下游地区堪称罗马艺术的最杰出的珍品；从其式样来说，它是整个罗马世界独一无二的。它周长95米，高度超过20米，首先以宏伟引人入胜。装饰该碑的雕塑艺术价值较低（除植物构图的两缘外）；这些由本省匠师们刻凿的雕塑，譬如说，无法与图拉真圆柱的浮雕匹

敌。然而,其历史价值相当高;石碑垄间壁和雉堞的雕塑使我们知道,图拉真第一次对德凯巴鲁斯战争时曾经必须在多瑙河下游与达契亚人、美西亚人、萨尔马特人和巴斯塔尔尼人等族居民作战。图拉真的这次胜仗对第一次达契亚战争命运有重要意义,并且诚如所知,对南摩尔多瓦、蒙特尼亚、东奥尔特尼亚及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曾一度归属的下美西亚省的领土拓展起决定性作用。正是为了庆祝这次胜利,才树立了这座凯旋碑。

三世纪的危机

由于玛尔库曼尼战争急需军队,削弱了多瑙河沿岸的防守,特别是在马其顿第五军团由特洛埃斯米斯调防波塔伊萨后。居住在东北喀尔巴阡山两脊的达契亚族的科斯托博契人,乘此机会在公元170年南渡多瑙河,劫掠多布罗加,并在被罗马军队完全摧垮以前到达了希腊。公元三世纪,形势愈益恶化,是罗马在多布罗加统治的真正危机时期。“蛮族”,特别是哥特人的攻略在很短的间歇内连续发生:公元248年,哥特人夷毁希斯特里亚,公元251年戴克优斯皇帝本人在下美西亚

同哥特人战斗中丧命。公元271年，奥列里亚努斯勉强击退了哥特人的进攻，两年后，又好不容易才挡住了色雷斯—达契亚族的卡尔皮人对多布罗加的袭击。

公元三世纪下半期，多布罗加列入边界在“蛮族”压力下处于严重危险状态的多瑙河南岸诸地区。但由于奥列里亚努斯放弃达契亚后调来的新兵力加强了防卫，多布罗加在以后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仍然是罗马和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组成部分。

四至六世纪的多布罗加

公元三世纪的罗马帝国危机的结束是同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皇帝（284年—305年）的事业分不开的。这个皇帝在政治、行政和军事上采取有力的适当措施，恢复了遭受破坏的国家统一。同时，他在罗马帝国开创了独裁君主制（多米那特）。

69 罗马多布罗加也受益于狄奥克列齐亚努斯的改革，成为叫做斯基蒂亚的单独一个省，隶属一个更大的行政单位——色雷斯行政区（dioceza）。多

瑙河防线得到巩固；尤其是在将帝国首都迁至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的康士坦提努斯皇帝(306年—337年)时代，继续了这项事业。此时，多瑙河边境变成保卫首都本身的前沿，多布罗加屯积重兵，其境内驻有两个军团和大量辅助部队（尤其是骑队)，战略驿道和城堡进行了修缮。康士坦提努斯大败哥特人，确保了多瑙河下游数十年的安宁。

但是，随着匈奴入侵，这条边境的稳定状态于公元376年遭到破坏。哥特人在匈奴追逐下，求得罗马当局许可，南渡多瑙河。但随即爆发了一场冲突，罗马人败北，瓦楞图斯皇帝本人在战斗中被杀。他的继承者提奥多西乌斯一世同哥特人缔结了和约，哥特人虽然因此变为罗马的盟友和多瑙河防线的保卫者，但多布罗加仍未免除频繁入侵。直至公元五世纪末，在拜占庭皇帝阿纳塔西耶时代，多瑙河边界始又巩固；但此时，多瑙河与黑海之间这个地区亦为维塔里亚努斯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火焰所席卷，拜占庭竭尽全力才扑灭了这次起义。

提奥多西乌斯一世死后，帝国于395年分裂为两个国家，即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拜占

庭），多布罗加属东罗马帝国。

查士丁尼（527年—565年）是能确保多布罗加有效防卫的末代皇帝。在修建拜占庭帝国诸堡的伟大事业中，查士丁尼也重修了多瑙河一线及内地的堡垒，诸如杜罗斯托鲁姆（锡利斯特拉，于保加利亚境内），卡皮达瓦，乌尔梅图姆（潘特利蒙努—德—苏斯），阿埃吉苏斯及沿海诸堡（如：卡拉提斯）。在查士丁尼时代，成功地挡住了“蛮族”的攻略，但查士丁尼死后，攻略复又加剧，尤其是在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组织下，愈演愈烈。

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

斯基蒂亚省已不能与罗马统治最初几个世纪的多布罗加同日而语。象在整个帝国一样，货币经济衰退，日甚一日地向自然经济倒退；大部分城市（托弥斯和卡拉提斯这两个中心例外）经济处于尤为困难的境地。大土地所有制上增，小农所有制受损，伴之而来的现象就是小农的受奴役。虽然小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依然存在（尤其在边界地区），虽然奴隶制继续保持，但这个时期的多布罗加已有封建社会的萌芽产生并发展。

公元四至六世纪是承袭希腊—罗马传统的多
布罗加文化繁荣末期。建筑活动依然大规模进
行：在希斯特里亚和图拉真凯旋碑城兴建了会堂、
公共浴场、柱廊，铺设了街道，修建了水道，而在四
世纪的托弥斯，还兴建起一座以镶嵌艺术品贴面 70
的公共大厦。但建筑艺术虽尚能有一时之盛，雕
塑艺术却没落了。

此时，精神文化方面的最重要现象莫过于基督教在多布罗加的传播。尽管有几个皇帝，特别是狄奥克列齐亚努斯，曾加以迫害，但新的信仰以迅速的步伐向前猛进。在多布罗加的各城市中心发现了二十多座古基督教堂，而许多城市，诸如托弥斯(京都)、杜罗斯托鲁姆、希斯特里亚、卡拉提斯及其他城市，成为主教的驻在地。

自然，随着拜占庭统治的崩溃，罗马型的城市生活及同此联系着的全部文化行将在多瑙河与黑海之间的这块土地上告终。

多布罗加的陷落

公元587年，多布罗加遭阿瓦尔人浩劫，杜罗斯托鲁姆、图拉真凯旋碑城等城市被夷毁。拜占

庭于592—602年间组织的对多瑙河北岸的讨伐均无决定性成效。公元602年，驻守多瑙河的拜占庭军队哗变，反对摩里士皇帝，进军君士坦丁堡。他们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并拥立百夫长发喀斯为帝。由于军队撤守而大大削弱的多瑙河边界终于一触即溃，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及后来的保加利亚人涌入多瑙河与巴尔干山之间地区。象在多瑙河南部其他诸地区一样，斯拉夫人自七世纪开始，积极移殖于多布罗加。早在六世纪中叶就同阿瓦尔人一起统治着多瑙河下游北岸领土的斯拉夫人，此时大规模定居多瑙河南岸（多布罗加和今天的保加利亚），并以不久后也入侵多瑙河南岸的突厥血统的保加利亚人为霸主，于679年在这里（包括多布罗加）建立了所谓第一保加利亚—斯拉夫王国。这一事件的重要意义在于下多瑙河北岸大部分领土暂时落入了保加利亚—斯拉夫人的名过于实的统治（八至十世纪）。还值得提到的是，公元十世纪末，在齐米斯凯斯皇帝时代（969年—976年），拜占庭曾一度恢复了对下多瑙河诸地区（包括多布罗加）的统治，但仅延续至十二世纪末，即第二保加利亚—斯拉夫王国建立之时（1186

年)。

参考书目

关于罗马多布罗加和罗马一拜占庭多布罗加，参见：拉杜·武尔佩和伊·巴尔涅：《多布罗加史论丛》，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8 年版，第 2 卷(Radu Vulpe şi I Barnea «Din istoria Dobrogei»Vol. II. Ed. Acad. Republicii Socialiste România 1968)。另见 66—67 页所列诸期刊。在上述这一著作中提供了大量较旧的图书。

向封建制过渡时代

73 ## 前达契亚省境内的达契亚—罗马人的连续性

公元271年至十世纪初这一时期是向封建制度过渡的时期。在绝大部分达契亚领土上（多布罗加例外），罗马军队的撤走结束了奴隶制关系。过渡时期亦称先封建时期，其特点是存在着土著村社这个由于缺乏国家权威而复古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

在政治方面，先封建时期的特点是一些迁徙部落：哥特人、匈奴人、格庇第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流经我国，并暂居于达契亚。就这一点来说，这个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71年至七世纪中叶）是首批迁徙部落，相继深入达契亚，并相当迅速地流逝；第二阶段（七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则是斯拉夫人的定居及其被达契亚的罗马化居民同化。在此阶段中，罗马尼亚部族和罗马尼亚语言的形成过程行将完成；这一过程可以认为

在十世纪初，亦即中世纪史料提及最初若干早期封建类型的罗马尼亚政治形态之时，本质上业已终结。

关于罗马撤离达契亚的古代史料

无论在撤离达契亚的时间，还是在撤出该省的人员方面，古代作家的叙述均不十分清楚。确实，有些史料笼统地提到“罗马人”，而另一些史料提到军队和外省人，或只提军队。逻辑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是罗马达契亚的全体居民都愿意迁至多瑙河南岸；深受剥削的阶层自然宁愿留在当地。事情正是如此，无论是罗马尼亚还是 74
外国的大部分著名史学家，都把古代文字记载解释为奥列里亚努斯撤退了军队和部分居民。最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清楚地证实了这个结论，并断然论证了这个前行省的达契亚一罗马人的连续性。

达契亚一罗马人的连续性

多瑙河周围地区的连续性是无容置辩的。在巴纳特南部和奥尔特尼亚南部发现了时间上属于

罗马撤退以后时代的大量罗马遗迹，而货币流通自奥列里亚努斯时代至六世纪在这里始终没有停止。何况，在康士坦提努斯(306年—337年)和查士丁尼(527年—565年)两朝，多瑙河北岸的广大领土处于帝国的统治下，康士坦提努斯皇帝还在苏契达瓦建了一座横跨多瑙河的大桥。公元四至六世纪，德罗贝塔、苏契达瓦和罗穆拉依然是罗马的城市。

特兰西瓦尼亚的达契亚—罗马人的连续性也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得到完全证实。在萨尔米泽杰图萨发现了建于四世纪的城墙，而且可以看到，也就在此时，圆形剧场的大门被堵塞起来，整个建筑变成一个堡垒。在许多地方，诸如阿普卢姆和波罗利苏姆等地发现了属于达契亚—罗马居民的墓和墓场，而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器物则见诸于波塔伊萨、锡克(德日附近)及其他许多地方。在耶尔努特(卢杜什附近)发现了一个火葬墓场；其中有一个罗马达契亚省型的骨灰罐，内存一枚发行于公元275年，亦即奥列里亚努斯撤退后四年的罗马银币。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前达契亚省居住上的连续性。

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在纳波卡、阿普卢姆、阿姆佩卢姆、德日和波塔伊萨发掘出的属于四世纪或者五世纪的基督教石碑和器物（约十五件）。就在这时，基督教开始在达契亚传布，但如考古发现所证明，仅限于达契亚的罗马化地区，亦即仅在达契亚—罗马人中间传布。在属于哥特人的任何一起考古发掘中，不存在具有基督教特点的器物；这种新宗教稍晚才深入至前达契亚省境内的迁徙居民（这里所指的是哥特人和格庇第人）中间。

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留在前达契亚省领土上的居民是一种讲拉丁语的罗马化居民。在米契亚发现了一个已变形呈戒指状的四世纪的银扣针弓，上面有“夸尔提纳，祝你长寿！”（QVARTINE VIVAS）的铭文；很显然，无论是这件附有友好祝愿的器物的赠送者，还是接受者都会讲拉丁语和用拉丁文书写，否则铭文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在罗马时代出名的地方——比耶尔坦（梅迪亚什附近），发现一具青铜器物（可能是一个枝形烛台的一部分），上面有四世纪典型的基督名字的拼合文字以及“余，泽诺维乌斯，谨献”（EGO ZENOVIVS VOTVM POSVI）的铭文。我们所见到的

可能是献给教堂或祀祠的贡品；泽诺维乌斯把拉
75 丁铭文铸在贡品上正是为了让来教堂的人能读到从而知道他这位慷慨施主的姓名。因此，这些人是讲拉丁语的人，而不是讲其他语言的人。

奥列里亚努斯撤退后，货币在达契亚省境内继续流通，虽然较诸罗马统治时期有所缩减，这是本地居民继续存在的另一个确凿证据。特别具有说服力的是，大部分货币是青铜的，只有少量银币。在萨尔米泽杰图萨和其他地方甚至还发现了四世纪的古钱宝藏；其中有些古钱宝藏在奥列里亚努斯之前就开始积聚，并且在其正式放弃达契亚之后继续收藏。大家知道，迁徙部落不使用也不接受铜币，喜欢银币，尤其是金币。因此，只有在前达契亚省存在达契亚—罗马居民，才能说明铜币的流通，因为他们习惯使用适合其低水平经济生活需要的小钱。语言学断定，奥尔特河、穆列什河、索梅什河等河流名称是从罗马时代使用的名称——阿卢图斯河、马里斯河、萨穆斯河等脱化而来的。这些名称的演变保留着六至七世纪居住在我国的斯拉夫人使用的痕迹，但毫无通过日耳曼语渠道传递的迹象。这个事实说明，斯拉夫人

不是从某种日耳曼族的居民那里，而是从讲拉丁语并保留着罗马统治时代使用的水名的居民那里知道这些河流名称的。

语言学还表明，在前罗马达契亚省的领土上，拉丁语是基督教的喉舌。确实，在罗马尼亚语中，关于基督教学说的基本语汇清楚地来自拉丁语源，如：十字架(cruce)、上帝(dumnezeu)、基督徒(crestin)、天使(înger)等等均脱胎于拉丁语。

这方面最重要的是“教堂”(“biserică”)这个词。只有在罗马尼亚语(以及拉丁罗马语!)中保存着这个来自拉丁语(basilica)的词汇，在罗马语系的其他语言(法语，意大利语等)中，这个词脱胎于希腊语 ecclesia (法语为 église，意大利语为 chiesa)。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在公元四世纪，当 basilica 一词为 ecclesia 所取代时，达契亚—罗马人已经不属于罗马帝国。如果我们的达契亚—罗马人祖先生活在多瑙河南岸，亦即在帝国的范围内，那末这种革新也许会进入罗马尼亚语，教堂这个词想来在我国也会被一个脱胎于希腊语 ecclesia 的词所代替(例如，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人就采用了“qeshë”这个新词)。

由此可知，考古学和古钱学的全部发现以及语言学资料表明，罗马人全部离开达契亚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些发现和资料证实，在前达契亚省留下了大量讲拉丁语的居民，并在稍晚将由此诞生罗马尼亚部族和罗马尼亚语言。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迁徙部落

先封建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些迁徙部落相继流经我国领土。这些浪潮的大部分瞬息即逝，只有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比较固定地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我国各地区。

76 哥特人，属日耳曼族，其西支(西哥特人)首先出现在奥列里亚努斯放弃的内喀尔巴阡山领土上，给我们留下了实物遗迹，诸如森塔纳—德—穆列什的墓场，也许还有希姆列乌—西尔瓦尼亚的宝藏。但是，属于哥特人的发现——同其他部落的遗迹一起构成所谓森塔纳—德—穆列什——切尔涅霍夫文化——在蒙特尼亚平原更多(斯潘措夫和特尔格绍尔的土葬墓场，某些火葬墓等)，这证明四世纪时大量哥特人居住在前达契亚省境

外。公元376年，哥特人恰恰是在外喀尔巴阡山东部地区被匈奴打垮的，这种情势决定了他们大规模迁徙至多瑙河南岸；少数留在原地的哥特人将逐渐融化在土著居民群众中。一般说，哥特人对于前图拉真达契亚省的统治是名过其实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哥特人是作为一种军营出现在土著居民中间的。他们仅限于向土著居民课收贡赋。由此可知，哥特人对达契亚的罗马化土著人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影响。至于萨尔马特族的雅齐基人和日耳曼族的汪达尔人，前者深入巴纳特，后者居住于克里沙纳，但均未越过山脉进入前达契亚省。哥特人的东支——东哥特人，据今天的考证，在布泽乌地区的皮耶特罗瓦萨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金器宝藏(公元五世纪)。特兰西瓦尼亚的某些属于五世纪的发现，无疑也属于东哥特人，虽然至今一直被安在格庇第人头上（例如克鲁日附近阿帕希达王墓)。

匈奴，哥特人的战胜者，是突厥族的游牧部落。公元376年的胜利后，他们没有深入内喀尔巴阡山的达契亚，而向西北进发，穿过北喀尔巴阡山诸山口而下，居住于蒂萨河西岸的匈牙利平原

（也可能溯多瑙河流域而上到达这里，但也未经过特兰西瓦尼亚）。主要在五世纪上半期，匈奴人在阿提拉领导下由此发动了多次向西方和南方的掠夺性远征。多瑙河沿岸的罗马—拜占庭城堡成为这种征略的牺牲品，其中包括苏契达瓦在内。但阿提拉对于这些广阔地区的牢固统治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保证了这些地区的政治稳定。阿提拉死后（公元453年），匈奴人的力量削弱，于翌年被格庇第人打败并流散。

由于匈奴人对达契亚领土的统治只是时时进行劫掠的远距离统治，因此他们在我们国土上留下的考古遗迹很少。

格庇第人，属日耳曼族，曾一度臣属匈奴人，后来起而反抗并打败匈奴人，取得对潘诺尼亚的统治。格庇第人也未能对前罗马达契亚实施有效统治，虽然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也到达了这里。在莫雷什蒂（于穆列什河上）和波鲁姆贝尼—米契（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可见到六世纪时的格庇第人居留地（实际上是军营）。在这里，发现了放着石磨的地窖，陶器皿和织布机锤。但是，有几个居留地中发掘出的一些器物（如：刻笔、铁扣针），属于

同格庇第人共居的土著人，尽管这种共居规模不 77
可能很大，而且也不可能具有我国历史工作早先赋予它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这里不仅发现格庇第人的居留地，而且还发现他们的墓场，这一事实就证明他们同土著居民共居过。公元567年，格庇第人被阿瓦尔人和伦巴尔德人打散，并且被他们以前统治地区的土著人同化（约至公元650年）。

阿瓦尔人，来自蒙古的部落，是战胜格庇第人以后的主要受益者。他们取得了对于中欧诸地区的统治。事实上，他们建成一个异常辽阔的“帝国”，自黑海草原直伸至亚得里亚海。七至八世纪，阿瓦尔人出现在达契亚，但数量不太大；这已为考古发现证实，例如，费尔纳克（穆列什河下游南岸）的一个银匠的墓、特尤什的若干墓等等。虽然他们的统治也不是真正有效的统治，但他们的物质文化对土著人和斯拉夫人的文明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阿瓦尔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股可怕的军事力量，经常单独或同斯拉夫人一起攻略拜占庭帝国的疆界，但在八世纪过程中日趋衰弱。八世

纪末，法兰克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进攻终于结束了阿瓦尔人的统治；阿瓦尔人败北，分散成小股，逐渐被其他居民同化。

斯拉夫人，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一致证实，斯拉夫人在公元六世纪出现在我国的外喀尔巴阡山领土上。历史学家约尔达尼斯和普洛科披乌斯谈到了斯拉夫人在下多瑙河对拜占庭帝国的攻略，而苏恰瓦的斯拉夫人居留地的发现及塞拉塔—蒙特奥鲁的斯拉夫人墓场的发现，确证斯拉夫人居住在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

但斯拉夫人大规模深入我国领土发生于七世纪过程中。关于七至九世纪，斯拉夫类型的发现数量要大得多，既有摩尔多瓦的多罗班茨和赫林恰的居留地，又有特兰西瓦尼亚的努什法勒乌和索梅舍尼的巨塚墓场。由于斯拉夫人是人口众多的农业部落，所以在我国境内的平原和广袤的谷地上定居下来，同土著的葛特—达契亚人及达契亚—罗马人生活在一起。达契亚—罗马人由于数量上和物质文化方面都占优势，逐步将斯拉夫人同化，但从斯拉夫人文明和语言中吸收了大量因素。正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的斯

拉夫人(他们没有经历奴隶制度)对于罗马化的土著人的社会、政治组织产生了一定影响,加速了封建关系的形成。

保加利亚人是突厥语诸族的组成部分;公元七世纪,他们一部分自高加索北部草原移向伏尔加河中游,另一部分则在阿斯巴鲁·赫统率下西进。约于679—680年,他们南渡多瑙河,定居在今天保加利亚的东北部,统治着人数众多的斯拉夫居民,但最后终于被斯拉夫人同化。由于保加利亚人的到来及其统治,达契亚领土同南方的拜占庭世界虽然尚未完全隔绝,但产生了显著的隔阂。

保加利亚人的斯拉夫化这个过程发生于公元 78
八至十世纪,即在封建关系形成现象出现的同时。在公元九世纪初的克鲁穆汗和奥莫尔塔格汗时代,据大量发现,尤其是蒙特尼亚平原上的发现证明,保加利亚的统治扩展至多瑙河北岸。但他们的主要是名义上的统治还伸展至巴纳特(森尼科拉乌—马雷的宝藏)和穆列什河上游,以保证进入金矿区和特兰西瓦尼亚盐矿的通道。这种统治促进了土著社会的封建化过程,同时也有助于基督教会在多瑙河北岸诸地区(包括前罗马达契亚)按照

斯拉夫形式组织起来(在保利斯公时代,保加利亚人于864—865年大量皈依基督教)。

*　　*　　*

土著社会的发展在先封建时期的第二阶段十分迅速，至公元十世纪初，文献已提到由“瓦拉几亚人”杰卢(于索梅什河)、梅努莫鲁特（于克里沙纳）和格拉德（于巴纳特）统辖的最早的罗马尼亚--斯拉夫人的公爵领地和总督辖区，顽强抵抗马札尔人人侵特兰西瓦尼亚。

罗马尼亚部族和罗马尼亚语言的形成

不言而喻，罗马尼亚的人种起源（部族形成）是我国古代史的基本问题。长期以来，这个问题的客观的、科学的方面被形形色色的政治动机所掩盖。这些政治动机有时是进步的。例如，当阿尔迪亚尔学派的代表们坚持达契亚人被罗马人完全消灭的论点时，其用意在于证明罗马尼亚人民的纯罗马血统，并在这个基础上要求罗马尼亚人同特兰西瓦尼亚的其他“民族”具有平等权利。但是，

这种论点往往为外国统治者的反动政治利益服务，被他们用来支持那种排斥在特兰西瓦尼亚有土生土长的罗马尼亚人的理论，从而为他们统治特兰西瓦尼亚领土的野心张目。

罗马尼亚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罗马尼亚史学剔除了对这个基本问题研究上的任何违背科学的做法。正是由于研究工作的彻底科学性和客观性，使我国历史学家有可能对罗马尼亚部族及其所讲的语言在何时、何地和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这个三位一体的问题给予明确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五至十世纪的连续性的考古学证据

上面已经指出，四世纪时在前达契亚省境内存在着货币流通。从发现的各种钱币同样可考证
五世纪上半期也存在货币流通。古基督教的器物 79
和遗迹的情况也可以肯定，它们的存在不仅限于四世纪；其中有许多流传至下一个世纪。何况，考古发现的稀少在原则上不能作为不存在土著居民的一种标志，因为在四世纪末，整个罗马世界都抛弃了晚期罗马的物质文化形式。

如考古发现表明，五世纪下半期在前罗马达契亚领土上揭开了一个深刻动荡和变乱的时期。迄至当时作为达契亚—罗马居民栖身之所的所有大大小小知名地点可能全被遗弃。究其原因，无疑在于阿提拉死后匈奴“帝国”崩溃所造成的形势。此时，诸“蛮族”争雄称霸，角逐匈奴的遗产，前达契亚省疆土一再遭他们的入侵和骚扰。

尽管一则这种形势使达契亚—罗马土著居民行踪不能再那样确凿无疑地见诸于考古遗迹，再则对先封建时期的系统研究相对说来还为时不久，但是公元第一千纪下半期达契亚—罗马人连续性的种种迹象已开始揭晓。首先，这几个世纪的先封建时期的陶器，就形式和技术而论，同达契亚土著陶器及罗马达契亚省制陶器密切相关。再者，在布泽乌地区的塞拉塔—蒙特奥鲁发现了一种陶轮制作的、并据推断是非斯拉夫型的（至少部分是这样）六至七世纪的陶器。这种陶器同在特兰西瓦尼亚中心地区莫雷什蒂和班杜—德—肯皮耶发现的陶器完全相似。关于内喀尔巴阡山区域的这后一类陶器，过去曾确信属于格庇第人，而且仅属于他们，这从理论上说似乎是正确的。但格庇

第人从未统治过蒙特尼亚，因此上述陶器不论在外喀尔巴阡山区抑或内喀尔巴阡山区均不能推断为他们所专有。更正确地说，这类陶器很大一部分应属于本地居民。况且，除格庇第人特点的墓场外，在特兰西瓦尼亚又考证出这一类型的居留地，这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在时间上属于六至七世纪的发掘点如果都断定为属于格庇第人或断定为其所专有，那末其数量未免过多(50个以上)，因为，上面已经谈过，格庇第人的中心是在达契亚境外的潘诺尼亚平原。因此，四至五世纪的森塔纳—德—穆列什—切尔涅霍夫型陶器的情况于此重演了：一旦达契亚—罗马居民的存在通过墓场、基督教石碑及货币流通得到揭示，其土著的基本因素也是毋容置疑的。

还有一系列具体的考古发现应推断为属于达契亚—罗马本土人。它们是在蒂比斯库姆发现的一个古基督教器皿的盖(公元六世纪)，察加(盖尔拉附近)、索波鲁—德—肯皮耶和契珀乌(卢杜什附近)等居留地，也许还有布拉特伊(梅迪亚什附近)居留地，均属五至六世纪。

上述这一切雄辩地证明，达契亚—罗马居民

80 全部撤离达契亚省是无稽之谈。必须看到，所有迁徙部落，出于他们本身的利益，无不乐于宽待生产财富的土著居民。诸迁徙部落的统治只能看作一种取得贡税、物质财富和人力收入的名义上的统治。

没有任何理由设想六世纪以前在前达契亚省被证实了的达契亚—罗马居民会离开达契亚的土地。我们相信——不是没有根据地，因为同其他地区的类比是有说服力的——，他们只是离开了入侵者道路上的旧居留地，避居偏僻的谷地、坡岭和山区，一句话，也就是住进能稍免迁徙部落不断骚扰掠夺的地方。

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被土著居民遗弃的地方和城市的古名被人遗忘，而在斯拉夫人来到后取了斯拉夫名称，尤其是平原和开阔的谷地上的居留地，这种名称更为常见。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时间，本土人又回到开阔地带，同处于统治地位的斯拉夫人杂居；尔后，作为共居的结果，在短时间内同化了斯拉夫人。

这种事态一方面说明某些考证为本土人的居留地，其历史为什么较短，另一方面又使我们很难

在这几个世纪的居留地或坟墓的发掘物中明确和绝对肯定地分清哪些是本土人遗物，哪些（大部分或全部）属于斯拉夫人。

研究先封建时期后期的连续性的这些问题必须极其慎重，极其客观并持极大的责任感。这种研究不仅必须注意考古遗迹，而且应考虑无论是历史还是语言学所提供的成果或证据。当提出何地是罗马尼亚部族和语言形成的核心这个问题时，必须把经历早期（二至三世纪）罗马化过程的地区与没有罗马化也不可能发生罗马化的、我国的另一些地区加以区别。

在这一方面，有两个考古学的有力论据和一个也是十分有力的历史论据是不容忽视的。这个具有头等文献价值的历史论据是通过贝拉三世国王的无名氏史官的记载，证实了在特兰西瓦尼亚广袤领土上有若干罗马尼亚一斯拉夫人总督辖区，其中有一个叫做杰卢的人（无名氏史官注明是伏拉赫人（Blacus），即罗马尼亚人），其统治中心在十世纪初首批马札尔人部落入侵阿尔迪亚尔西北部时位于索梅什河上某地。

至于考古论据，其一是通过考古证据，证实至

少于六世纪前在前达契亚省的领土上存在着达契亚—罗马居民，其二（也很有决定性意义）则是在索梅什河上离盖尔拉不远的德伯卡发现一个“封建王朝”的城堡，据最近的发掘表明，这个城堡建在一个以寨栅设防的九世纪土堡上。显而易见，这是杰卢的先辈和这个总督本人的城堡。

81

地志与连续性

无论通过对地名和河流名称的研究或是对罗马尼亚语特征的研究，语言学也成为史学家的一臂之助。可以确切地断定，巴尔干半岛的地志（地名）和水志（河流名称），除了从地理观点上看非常零星而且从时间上讲也较近的若干地名和河名以外，都是非罗马尼亚式的。相反，我国的地名和水名则80％是罗马尼亚式的。确实，有些名称也许较新，属中世纪和近代，但不可能全部如此。尽管许多地名出现的时间难于断定或不可能断定，尽管许多中等河流有着斯拉夫的名称，但罗马尼亚的几条最大河流的名称是罗马时代就使用的达契亚古名，如：阿卢图斯河—奥尔特河，马里斯河—穆列什河，萨穆斯河—索梅什河，克里锡乌斯河—

克里什河，蒂比斯库斯河一蒂米什河。近两千年的时间一直使用同一水名乃是生存连续性的明显证明。

至于萨尔米泽杰图萨、纳波卡、波塔伊萨、德罗贝塔等罗马地名的湮没，也是无足为怪的。由于这些城市和乡村在先封建时期均被夷毁，它们的名称也就从被迫逃进坡岭和山区，并长期在那里过着牧羊、养畜和农业生活的本土居民的记忆中消失。

罗马尼亚语与连续性

语言学研究很早就证明了罗马尼亚语的罗马语族特性。它是拉丁语的直接继承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罗马尼亚语是我们时代在多瑙河北岸口头使用的拉丁语，正如法语是今天在法国口头使用的拉丁语，西班牙语是在西班牙口头使用的拉丁语等等一样。

不言而喻，罗马尼亚语同其他罗马语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有大量相似之处。但罗马尼亚语有其不同于西方罗马语的特点；这些特点已被专家们清楚地确定了下来。

直至上一世纪末，在多瑙河南岸的达尔马提亚沿海地区使用过的一种独特的罗马语——达尔马提亚语，今天已经消亡。按正常情况说，如果罗马尼亚部族是在多瑙河南岸接近达尔马提亚语形成的地域上形成的，那末在我们的语言和达尔马提亚语中想必应存在某些特殊的、只有这两种语言具有的、有别于西方罗马语的因素。然而，这样的因素不存在，这证明罗马尼亚语是在远离达尔马提亚的地域，也就是说在多瑙河北岸形成的。

那末又怎样解释同阿尔巴尼亚语共同的词汇，如岸（mal）、豌豆（mazăre）、獾（viezure）等等呢？它们无非是更古的原始罗马语——色雷斯—达契亚基本语汇的陈迹，被这两种语言分别继承下来。而且，如果罗马尼亚语同阿尔巴尼亚语是在同一地域上形成的，其结果应当是同一语言的
82 两个分支，而根本不会成为两种全然不同的语言。

最后，甚至我们语言中的斯拉夫词汇也排斥把巴尔干半岛西部看作罗马尼亚部族的形成地。这些语汇属于南方斯拉夫语的东部方言，其所以出现在罗马尼亚语中，应当从这些斯拉夫人于先封建时期后半期出现在我国领土上这个事实本身

中找到解答。

瓦拉几亚人这一名称的意义

罗马尼亚人在证实其生存于特兰西瓦尼亚的最早的历史资料(出自无名氏史官之手)中被称为瓦拉几亚人。瓦拉赫(Vlah)是一个日耳曼语源的词汇,日耳曼人用来统称罗马血统(拉丁渊源—latinofone)的诸族居民。在南方斯拉夫人的语言中,这个词以瓦拉赫(vlah)形式出现,在东方斯拉夫人的语言中则为伏洛赫(Voloh)。南方斯拉夫语中的形式为拜占庭人借用,称为blachos,唸作瓦拉科斯(vlachos),一般用来统称巴尔干半岛的罗马语系的居民。在拉丁文资料中,这个词以Blacus或Vlachus的形式出现。东方斯拉夫人把多瑙河北岸的罗马语系居民称作伏洛几亚人,而不叫瓦拉几亚人。这个事实证明,他们从一开始就直接知道多瑙河北岸的这一族罗马语系的居民,没有南方斯拉夫人作中介。如果罗马尼亚人是在九至十三世纪由多瑙河南岸迁来的,那么东方斯拉夫人应该以多瑙河南岸使用的斯拉夫词,也就是说以瓦拉几亚人的名称来称呼这种新的

居民。

瓦拉赫这个词也被其他一些部族用来称呼罗马尼亚人,例如匈牙利人以 oláh 的形式使用这个词,同匈牙利人用来称呼意大利人的词 olasz 相近。

但应当记住,罗马尼亚人本身始终只用罗马尼亚人或鲁马尼亚人(români—rumâni)称呼自己,这个词来自拉丁词罗马努斯(Romanus),而其语言称作罗马尼亚语(românească)或鲁马尼亚语(rumânească)。

迁来论及其荒谬性

大家知道,罗埃斯勒理论的信徒们把这个问题的三个侧面中的两个侧面置之不顾,却拚命"证明"罗马尼亚部族起源于多瑙河南岸。他们或是坚持说,达契亚居民已经完全被消灭,或是说达契亚人的罗马化不可能在罗马统治这块土地的一百六十五年间发生,因为一则时间太短,二则幸存的达契亚人生活在与罗马移民隔绝的状态中。罗埃斯勒理论的追随者断言,缺乏关于先封建时期多瑙河北岸的达契亚—罗马居民的记载,就是这里

不存在这样一种居民的证据，而且援引罗马尼亚语与阿尔巴尼亚语的某些词汇的相似之处，由此得出荒谬的结论：罗马尼亚部族是在多瑙河南岸，巴尔干半岛的中部或西部某地形成的，然后从那里迁到多瑙河左岸，公元九至十三世纪再由此深入阿尔迪亚尔。

罗埃斯勒理论某些前提的不可靠性已在前章 83
中指出。在那里，无论是关于达契亚居民在罗马统治下的继续生存和罗马化的证据，还是关于在罗马人正式撤出后的一个世纪（四世纪）中达契亚—罗马人在前达契亚省生存的证据，均已得到广泛阐明。

结　　论

通过批判性分析考古、历史和语言学资料进行考察的结果，罗马尼亚部族和罗马尼亚语的形成过程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发生和结束这个问题的答案业已具备。由于图拉真的达契亚省的殖民化和罗马化，罗马尼亚部族是作为东方罗马世界的一个罗马语系部族在一个长期过程中形成的。罗马尼亚部族在它的祖国领土上的诞生，取

决于罗马正式放弃达契亚后在哈埃穆斯山脉与达契亚喀尔巴阡山北部之间的整个地区上的拉丁血缘居民的连续性。毋庸置疑，下美西亚(包括多布罗加)，即多瑙河南岸的罗马化因素，对保持达契亚的罗马人社会作出了有效贡献，多瑙河从来没有把南北两岸隔绝。

罗马一拜占庭政权在多瑙河右岸没落（公元600年刚过)后，达契亚一美西亚罗马社会的重心转向达契亚，多瑙河美西亚罗马社会几乎完全被斯拉夫人同化。正是在600年以后这个时期，达契亚一罗马居民拓殖至罗马化程度较浅的达契亚某些地区。这种达契亚一罗马居民在迁徙部落入侵的某个时期过着牧羊、养畜和从事农业的生活，从而分散于或多或少较固定的较小居留地。

因而，可以合乎自然地推断，在从事其牧羊这部分活动时，原始罗马尼亚人在平安时期往返于坡岭上的居留地与多瑙河沼泽和滩地地区的季节性栖息地之间。

据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阐述，这种生活方式无论对于达契亚人，还是对于达契亚一罗马人都不是什么陌生现象，只是在转折时期，这种生活变

成了具有某种代表性和占主要地位的生活。

达契亚—罗马居民日趋稳定，经过同定居在罗马尼亚土地上的斯拉夫居民几个世纪的共同生活，终于在共居过程中将占统治地位、但人数自然较少的斯拉夫居民同化。由于同斯拉夫人生活在一起，必然引其为借鉴，因而在特兰西瓦尼亚境内出现了三个初期封建型的罗马尼亚—斯拉夫人总督辖地，于十世纪初抵抗匈牙利人入侵阿尔迪亚尔。也就是在这个最后阶段，可以说，以前罗马达契亚的坡岭和山区作为其形成和自卫的核心地域，下多瑙河北岸喀尔巴阡山—多瑙河地区的罗马尼亚部族和罗马尼亚语言的形成过程业已完成。

84 # 同先封建时期有关的问题、资料和参考书目

考古实物的时限和人种归属

我们觉得应该提醒读者注意，虽然各种考古器物具有现实的文献价值，但应记住这种价值往往受到局限而且不能肯定。例如：

甲、关于陶器，时限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靠的（有时以十年计，例如罗马和希腊陶器），但往往对某种陶器的确切时限存在有根据的疑问，专家们常常意见相左，重新改变时限的情况屡见不鲜。关于金属器物（装饰、穿著物等），当然还有宝藏，情况也是如此。

乙、但更困难、疑问更多的则是考古实物的人种归属。对于罗马、希腊、拜占庭的陶器，归属某一种居民或源流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但涉及出现在我国领土上的某种陶器时，情况就很不同，在其归属问题上疑问很多，而且均不无道理。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严格的形式标准（风格、技术等）以外，还应注意到历史——语言学的复杂性以及出现这种陶器的文化地层。

关于金属器物，情况雷同。在这方面，"模式"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但把某器物绝对地归属某一民族那就有犯错误的危险。

几处珍贵物品宝藏的时限和人种归属的例子是很有说服力的。譬如：著名的皮耶特罗瓦萨宝藏（“孵小鸡的母鸡”）过去把时限断定为四世纪，归属（出于毫无确实根据的理由）于西哥特人国王阿撒纳里克。今天，在风格类比的基础上，推定这个宝藏的时限在五世纪，并且假设为归属东哥特人；阿帕希达（克鲁日）的三个宝藏过去认为属格庇第人，现在也断定属于东哥特人（五世纪）；希姆列乌—西尔瓦尼亚的大宝藏（由将近三代积聚的器物组成）约藏于公元400年（参见R.诺耳发表于《考古分析》的文章，1968年第4期第801—808页）；森尼科拉乌—马雷的宝藏正确的归属想来应是保加利亚人（九世纪），但过去时而被归属于马札尔人（十至十一世纪），时而又把时限断定为八世纪。例子可能还很多。诚如所见，不能断言考古学绝对确切而无讹误（见下面德里杜问题）。

壁垒问题

横亘我国不同地区的相当长距离的若干土壁垒（很少是石垒）的时限和隶属问题在专门著作中论争纷纭。在多布罗加的阿克西奥波利斯与托弥斯之间有三道这样的壁垒（两道土垒，一道石垒）。最近的研究断定石壁垒的时限似乎较晚（公元十世纪）；至于土壁垒，尚未充分研究，但看来在时间上也不会早于公元五世纪。

以“诺瓦克之垒”这一名称闻世的蒙特尼亚的壁垒的情况也 85
不清楚；不同的研究者推断其兴建的时代各不相同（从奥古斯都至康士坦提努斯一世），至今莫衷一是。

巴纳特的土壁垒问题也只能期待未来的研究加以澄清。

关于连续性的确切含义

经常可以读到或听到关于东蒙特尼亚或摩尔多瓦境内的连续性的议论。

但我们不应忘记，连续性问题很早以前就在历史学中提了出来，而且它具有十分确切的内容，不允许我们随心所欲加以改变。这个问题是专指罗马达契亚领土而言的；罗埃斯勒理论的信徒否认在罗马统治下这块领土上有达契亚居民继续存在，否认公元271年后这块领土上的达契亚—罗马人的连续性。罗埃斯勒的追随者还认为，罗马尼亚人是在九至十三世纪从多瑙河南岸"迁来"这块领土上的。因此，连续性问题是一个与罗马达契亚领土相应的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在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就不存在人类生存的连续性呢？根本不是！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从来没有荒无人烟，但那里涉及的不是罗马统治下的达契亚人的连续性，而是自由达契亚人的生存连续性；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奥列里亚努斯撤退后的达契亚—罗马人的连续性，其原因很简单，106年—271年间罗马人并未占领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因而那里至多只能有罗马化的苗头，奥列里亚努斯的撤退几乎没有改变这些地区情况的丝毫。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的达契亚居民的罗马化，那是后来的事情。

这就是连续性和连续性问题这些名词只能用于曾经组成罗马达契亚的地域，特别是内喀尔巴阡山地区的原因。

“德里杜文化”

这个名词是我国某些考古学者经常使用的，标志约在先封建时期末仅流传于外喀尔巴阡山某些地区的一种物质文化（但不流传于特兰西瓦尼亚，据考证那里至多只在穆列什河中游的两个地方有此种物质文化[1]）。这些专家认为，德里杜文化是古罗马尼亚人或者甚至是罗马尼亚人的物质文化。

“德里杜文化”这个名词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种类型的实物遗迹在形成这种文化的保加利亚境内数量更多并更具代表性。它是一种早期斯拉夫（或更确切地说是斯拉夫一保加利亚）文化，它之所以流传至多瑙河北岸，是因为来自南岸的影响及第一保加利亚王国的统治曾一度扩展至多瑙河北岸的若干地区。我们以为，蒙特尼亚北部山坡和丘陵地带的所谓布科夫文化的古罗马尼亚人或罗马尼亚人的特点可能要突出得多。这里发现了罗马尼亚文化的若干特殊细节。譬如在陶器方面，除了斯拉夫陶器和多瑙河南岸类型的陶器以外，还出现了在迅速转动的陶轮上制作、并烧成红色的陶器，这脱胎自四至六世纪的罗马达契亚省土造陶器，因而是罗马尼亚人所特有的。

南巴尔干罗马尼亚人、美格伦罗马尼亚人和伊斯的利亚罗马尼亚人问题 86

语言学方面的标志（方言和地名）以及某些历史性记载（如十一世纪的拜占庭作家凯考门诺斯，十四世纪初的无名氏地理学家），证实这三支罗马尼亚人远徙他乡，至今犹存。这是由于他们牧羊往返，脱离达契亚一美西亚罗马人群体时间较晚，从而

避免了斯拉夫化。同样是从这个多瑙河罗马群体中还游离出了迁徙至达契亚山区的罗马化的牧羊人，从而扩大了前达契亚省的罗马群体。

资 料

关于先封建时期，文字资料一般说很少，因为达契亚领土处于罗马—拜占庭帝国之外，不为罗马—拜占庭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所注意。这里我们仅举出阿米亚努斯·玛尔凯利努斯、普里斯库斯、约尔达尼斯和恺撒里亚人普洛科提乌斯的作品。凯考门诺斯（十一世纪）之所以令人感到兴趣，因为他是第一个谈到瓦拉几亚人及其“达契亚”血缘的拜占庭作家。此外，还有当时的各种编年史（如无名氏史官的编年史和伪尼斯托尔的编年史）。

考古资料、古钱资料和金石资料（极少一部分）十分重要。只要给予正确和恰如其分的解释，这些资料是我们关于这一时期达契亚领土上所发生事件的知识的基础。在罗马尼亚语言和部族的形成问题上，语言学研究也具有决定性作用。

参考书目

关于奥列里亚努斯以后的达契亚，参见：«罗马尼亚史» 第1卷第4部分(«Istoria României»,vol. I. Partea a IV-a)；康·达伊科维丘：«古代特兰西瓦尼亚»有关章节，布加勒斯特1945年版，(C. Daicoviciu:«La Trans. dans l'Antiquité»,Buc. 1945)；康·达伊科维丘：«达契亚的连续性问题»，克鲁日，载«古代研究所年鉴» 第3卷（1936年—1940年）(«Problema Continuităţii în Dacia»,în «Anuarul Inst. de Studii Clasice»Cluj, vol. III(1936—

1940)); D. 图多尔:《罗马奥尔特尼亚》布加勒斯特, 1966 年第 3 版(D. Tudor:«Oltenia Romană»,Ed. a III-a Buc. 1966)以及其他较旧的图书。关于罗马尼亚语言和部族的形成问题,可参考《罗马尼亚史》第 1 卷第 4 部分(科学院出版社,1960 年版),特别是由康·达伊科维丘、埃·彼特罗维奇和格·什特凡主编的关于罗马尼亚语言和部族形成的最后一章。还可参考《特兰西瓦尼亚史论丛》第 1 卷第 4 章和第 5 章(布加勒斯特, 1963 年第 3 版第 58—87 页)。

此外,还有康·达伊科维丘关于这个问题的较早的著作《从最近的研究看罗马尼亚部族起源》,收集于贝尔丘主编的《罗马尼亚人民历史上的统一性和连续性》一书,(科学院出版社,布加勒斯特, 1968 年版,第 83—98 页)(«Originea poporului român după cele mai noi cercetări»în volumul«Unitate și continuitate n istoria poporului român»Buc., 1968、Ed. Acad., P. 83—98)。在第 67 页上提到的各种期刊上也广泛讨论了这个"先封建"时期的问题。

中古时代(封建时代)

我国领土上中世纪的开始
及封建关系的产生

89 中古时代或封建制时代的内容与分期

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名称与内容

在我们今天时代前不久，更确切地说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大多数历史学家称这个历史时代为中世纪。中世纪这个概念（medium aevum），作为人文主义的创造，一直为十七至十九世纪的编年史家使用，其意义为旧时代与新时代（或近代）的中介、中间时代。

中世纪和封建关系不是同时出现在经历这种制度的所有地区的。新近的研究结论认为，中世纪和封建主义的萌芽早在三至七世纪就可感觉到。

在我国领土上，中世纪和封建制关系的因素出现于九世纪，亦即与罗马尼亚语言和部族在喀尔巴阡山一多瑙河地区形成过程的完成同时。

此时，罗马尼亚部族作为一个特殊的实体，以瓦拉几亚人或弗拉几亚人的名称出现于世，同时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证实在罗马尼亚部族居住的从特兰西瓦尼亚到多瑙河下游的不同地区存在着初期国家的政治形态：总督辖区，公爵领地，贵族砦坞。

如同其他重要的历史过程一样，对于封建社会，必须根据世界不同地区的具体社会条件来考察其发生和开始。例如，在奴隶制达到完全成熟 90
的地区，封建制通过租佃为中介，随着奴隶关系的崩溃而诞生。在不存在奴隶制关系的另一些地区，封建制度直接通过氏族关系的解体而产生。有些地区不完全成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与氏族关系的因素并存，还有广大地区则存在着东方生产方式(马克思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则由于奴隶制关系的崩溃和不同形式的氏族关系的矛盾发展，形成了封建关系。

封建制度的分期

封建制度包括一个漫长的时期，虽发展缓慢，但从未止步不前。就这种发展来看，封建制度或

中世纪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初期封建主义时期，亦即封建关系形成和结晶时期。这个时期的上限相当于封建主义的萌芽，亦即九世纪下半期，其下限则是独立的罗马尼亚诸封建国家形成过程的结束，亦即十四世纪上半期。

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同时也标志着第二个时期——封建主义发展期或繁荣期的开始，这个时期延续至十八世纪中叶，亦即出现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逐步破坏封建关系之时。

最后一个时期是封建主义崩溃时期，同前两个时期相比，延续较短（从十八世纪下半期至十九世纪上半期），其原因是出现在主要经济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关系顽强地破坏着封建主义的基础。在新关系的压力下，人身奴役被废除，机构趋于近代化，统一的民族文化开始形成，罗马尼亚民族的主要特征——语言、文化、经济生活的共同性，心理或精神面貌的共同性开始成熟，部族意识转化为民族意识，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共同斗争成为主要特征。

九至十一世纪的社会经济生活、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

封建关系的出现过程

从九世纪向十世纪过渡时期被特别形容为
“一年等于一千年”，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和社
会的主要方面——社会、经济、人口和文化诸领域
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技术的某些进步（劳 91
动工具的改进，更合理地使用牲畜牵引力）使农民
能进一步通过开荒和垦殖给农业增添新的耕地。
由于这些改进，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人
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这样不仅使人口增长有可
能，而且使人口以较大密度集中，从而缩小了无人
居住地区间的距离，便利了人们之间的接触。

村社中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

新的封建关系的形成过程是由生产力一定水平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作为前提，就需要有生活于固定居留地的定居人口。最近的考古发掘以及文

字资料（拜占庭的、俄罗斯的、匈牙利的），都证实我国许多地区存在这样的居留地。同时，这些资料还大致考证了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

罗马尼亚人民生活在村社中，共同耕种一部分土地(其目的是以收获的产品建立公共储备)，另一部分土地则按户分成小块，由家庭成员种植。逐渐，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愈益表现出把土地，首先是村里的土地、房前屋后的宅边地，尔后是村边常用的土地、园圃和葡萄园据为己有，化为家庭私产的倾向，尤其是境遇较好（份地较大、较肥沃，牲畜较多）的那部分人。农业用地、牧场、森林、河流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依然为全体共同占有。

农民村社的组织方式

对于公社绝大部分土地的全体共同占有决定着村社生活按相同的形式组织起来。对于政权的义务由整个村社负担。对在境内发生的刑事犯罪同样由村社全体负责。在遇险的情况下，也是全村社负有保卫之责。村社代表选举“年高德望者”为自己的领袖和主要执掌司法事务的法官。村社领袖再选举几个村社、村社联盟的政治和军事领

袖——公爵和总督。

村社的崩溃过程 92

技术尤其是农业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的增长,使剩余产品、村社供上层支配的附加消费品的数量有可能增加。村社领袖及其家庭成员由于所履行的职务也占有较强的社会经济地位,特别是供职时间较久时。这样,他们就逐渐脱离以工役、差赋或劳动养活他们的村社一般群众。他们同政权结合所得到的其他经济和政治性质的利益越多,这种情况就越严重。因而,实际上在村社内部就存在着未来封建阶级的萌芽。通过侵吞的手段占有其他公共财富则进一步加深了裂痕,促使村社崩溃并产生封建性质的社会分化。

土著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

社 会 分 化

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证明,社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形成不同阶层。在考察下多瑙河(加尔文)、多布罗加(利曼努)、特兰西瓦尼亚(莫雷什蒂,德

伯卡)等地的居留地时,发现了地窖型的半截埋在地下的简陋住室，里面的器物很贫乏（用陶轮制作的技术较原始的普通陶器，玻璃珠等)。这一切描绘出一般居民的生活。

但同样在这些居留地中还发掘出比较宽敞的地面住宅（有的是两间）及较为豪华的进口器物(拜占庭陶器，拜占庭镀金的银装饰品，查理大帝式的镀金铁马刺等)。这无疑属于从村社内部分化出来、正处于形成为统治阶级过程中的那个阶层。在一些较发达的居留地，如多布罗加的佩雷亚斯拉韦楚，十世纪末可见到捷克和匈牙利的马和银装饰品，俄罗斯的皮毛、蜡和奴隶，拜占庭的毛料，这样一些进行交换的产品也是供给这个阶层的。在加尔文和德伯卡发现的拜占庭或匈牙利古币均归统治阶层所有。

这些统治分子的代表是俄国编年史提到的十世纪下半期出现于多瑙河的那些城镇——比较发达、有时设防的居留地的主宰。据拜占庭史学家的叙述,在此同时,拜占庭皇帝的代表同这些人进行谈判,拉他们进行合作。十世纪初,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总督们(公爵们)的近臣就是由这

些统治分子构成的，而据贝拉三世国王饱学的史官无名氏告诉我们，他们拥有手持弓箭的“穷人” 93
组成的军队。《使徒杰拉尔德传》中关于十世纪末和十一世纪初巴纳特社会关系的记载则更清楚，更有说服力。此时一方而存在着使徒传称为新贵（nobiles）的统治阶级代表，他们是自由地(allodia)、宫室（curiae)、绵羊和山羊群、马群和畜群的主人，另一方面则存在着依附于他们的牧人(pastores)、奴仆或奴隶（servi)。这些受奴役的人们，见诸于巴纳特总督辖区的中心——莫里塞纳（切纳德）的修道院以及那个地区的各个村落。

居民的职业

当时的土著居民通晓并从事那个时代人类的一切主要技艺。在平原和丘陵地区，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在高寒地区以放牧和养畜为主，农业居辅。河滩尤其是大河的滩地，鱼产丰富，使这里的居民能以渔业为主，农业和畜牧业居次。在各种矿藏丰富的地区，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居民以采矿和加工矿产为生。日常的饮食、衣著、起

居、防卫、祭祀和装饰的需要则由当时的能工巧匠来满足。但是，无论是矿工、盐工还是工匠均同时兼营农业和畜牧业。

今天的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已能提供足够证据来证明土著居民从事的上述全部职业。在多布罗加地区，史料提到十世纪末种植黍（当时保障居民口粮的最主要作物）、小麦和大麦。在全国各地经过考察的居留地中，发现有面包炉、储谷坑、炭化的种子、农具、铁链和犁铧、镰和锹等。

主要农作物，如小麦、大麦、黑麦、黍、亚麻、大麻，农具，如耕具、镰、叉、斧等，农活，如耕、种、筛等拉丁语源的术语也证明罗马尼亚人民从未间断务农。

关于居民的第二种基本职业的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也是十分有说服力的。在各种编年史中提到了巴纳特的马群和羊群，在考察居留地时，发现了牛骨、马骨、羊骨、猪骨、羊毛剪、畜铃等。同样，有关牧羊的事和物，如牧场、羊栏、羊干奶酪和乳清等产品的达契亚—色雷斯古语源的术语以及主要家畜及其产品，牛、奶牛、马、羊、猪、牛奶、干酪、羊毛等拉丁语源的术语，无不证明罗马尼亚人民

自古就从事畜牧业,同样从未间断。 94

在各地,特别是在多布罗加发现的渔具:钓竿、鱼网锤、鱼骨和鱼鳞,则证明在大河附近有人从事渔业。

许多拉丁—马札尔编年史提到夹带金沙的河流以及从特兰西瓦尼亚盐矿开采的盐,考古发掘则在喀尔巴阡山南部和北部都发现了矿渣和矿石。金矿和铁矿的工人把开采出来的矿石供给工匠,制成日常生活必需品。

在全国许多地方发现的冶铁炉,大量的铁器:刀、斧、锤、钳、剪、钉、枪尖,或青铜器:壶、铃、装饰品(戒指、耳环、珠)等,证明铁工和金银细工的发展高度。

正如全国各地极其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明的,陶器工匠已掌握高速陶轮技术、器皿上釉和装饰技术。

使用直式布机(特兰西瓦尼亚)和较先进的横式布机(多布罗加)的织布匠也不逊色。

泥水匠已学会建筑设防居留地的石墙(见诸于多布罗加)和祈祷堂的石墙(见诸于特兰西瓦尼亚)。

在新制度的最初几个世纪中罗马尼亚土著居民的技艺、发达的社会状况以及同其他部族和国家的各种各样的联系，凡此种种都证明我国领土上此时的社会，象其周围或较远的其他社会一样，正处于向上发展阶段。

政治组织

特兰西瓦尼亚的政治形态

自克里沙纳和巴纳特至多布罗加的我国不同地区的已经证实的土著居民当时的政治组织，是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在贝拉三世（据近来的议论，也可能是贝拉二世）国王的书记—史官无名氏的《匈牙利人业绩》（«Gesta Hungarorum»）一书中提到三个政治形态，亦即罗马尼亚人或罗马尼亚—斯拉夫人的三个"国家"，称为杜卡特（伏耶伏达特）：一个在巴纳特，由格拉德（可能是弗拉德）统辖，一个在克里沙纳，由梅努莫鲁特统辖，第三个在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Blasii et Sclavi）居住的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归一个名叫杰卢的罗马尼亚人辖治

(guidam Blachus)。这些总督辖区组织较好。有设防居留地：三个在克里沙纳，其中最重要的是奥拉迪亚附近的比哈里亚，另三个在巴纳特，其中以库文为最重要，还有一个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索梅什河上，也许就是克鲁日附近的德伯卡堡。罗马尼亚人总督(公爵)拥有武装部队，曾试图用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抵御马札尔人部落的入侵。这些 95
“国家”同毗邻的或较远的其他国家，诸如拜占庭帝国、法兰克帝国、保加利亚王国和大摩拉维亚国有着经济和政治联系。

无名氏所叙述的把罗马尼亚人或罗马尼亚—斯拉夫人的政治形态卷入其中的这些事件，亦即潘诺尼亚的马札尔人部落向特兰西瓦尼亚深入，发生于十世纪初年。因此，这些形态的发端当在更早，至迟是在九世纪下半期。它们的组成也为最近的考古研究所证实，如德伯卡的最早的木栅和土垒建于十世纪前。

这样的政治形态可能也存在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其他地区，但由于未同马札尔人部落发生接触，为无名氏史笔所不记。“弗格拉什国”，“哈采格国”，“马拉穆列什国”，“奥瓦什国”，“泽兰德国”

以及其他类似的形态也许也发端于上述同一个世纪之初。

多瑙河地区的政治形态

类似的政治形态也存在于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地区。弗拉什卡(罗马尼亚人国家)，弗勒西亚森林(罗马尼亚人森林)等地名使人回想起罗马尼亚人统治的古"国"和广阔森林，这是毗邻的异族居民给予的称呼。

在下多瑙河存在另一些类似的形态，可从拜占庭史学家们的叙述推见。据他们记载，这里的豪强们拥有设防的居留地（φρνρια），其中以康士坦提亚（可能是阿尔杰什河流入多瑙河处的罗马—拜占庭古堡康士坦提亚纳—达夫纳）为最重要，拜占庭人曾觅求他们的支持。多布罗加的一个政治形态的首领想必就是那位"迪米特里老爷"，在米尔恰—伏德发现的一块残碑记有其人，碑的具款日期为943年。

政治形态争取自治的斗争

特兰西瓦尼亚和多瑙河的所有这些政治形态

都在它们保卫自治权斗争之际见诸于史册。这种斗争以暂时胜利告终。马札尔部落群被迫后撤，集结于潘诺尼亚，而拜占庭的统治也不得不照顾到地方首领们的要求。这样，罗马尼亚的政治形态能够保持，甚至得到发展。

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被当时的编年史描述为“十分广阔、十分富饶”，在十世纪末和十一世纪初包括自梅塞什山口至穆列什河中游的诸地区，其主要中心为阿尔巴—尤利亚这个由土、木材和石头建成的堡垒城市。另一个总督辖区，即巴纳特总督辖区，以切纳德或者莫里塞纳(穆列什河上的一个城市)为中心，还包括梅努莫鲁特原来统治的穆列什河北岸的一部分领土。巴纳特总督辖区的首脑是格拉德的一个后裔，名叫阿赫图姆，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的首脑名叫季拉或格武拉，不 96
是十世纪初马札尔人部落领袖的后裔，就是佩彻涅格人血统的一个酋长。这些总督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辖区的财富及居民的正教信仰，这两个方面是推动匈牙利国王圣什特凡及其周围的封建主在十一世纪初试图征服罗马尼亚这几个总督辖区的原因。经过激战并利用几个权欲薰心之徒的

叛卖，才使两国首领屈服。但是，他们的国家未被征服，在佩彻涅格人的名义统治下，依然生存了将近一个世纪。

文化生活

一个经济状况较好、社会方面相当发达、政治上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不可能没有与之相应的文化。

应当着重指出的这种文化的首要特点乃是它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无论是陶器、住房和炉灶建筑，还是神话、巫歌、巫术等等，莫不如此。究其原因，就在于它继承了达契亚一罗马的古老传统。这种传统由于同罗马尼亚部族在先封建时期联系的诸部落的文化，尤其是斯拉夫和拜占庭文化相接触而更加丰富多采。罗马尼亚民歌的结构乃是拉丁诗歌的结构，类似法国和西班牙民歌结构，这证明了文化的连续性。一些拉丁语源的词如写和书等则提供了另一个证据，表明达契亚一罗马居民及以后的罗马尼亚部族从未中止过书写和阅读。

在那个时代，写字和读书是教会的一项专利。在我国领土上，这种活动是直接或通过保加利亚教会(主要在下多布罗加和巴纳特)、俄罗斯教会(在摩尔多瓦较为明显)、摩拉维亚教会(主要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施加的希腊东正教会的影响下组织的。因此，民间文化语言是罗马尼亚语，而书面文化语言却是斯拉夫语。

九至十世纪的书面文化遗迹保存于多布罗加的巴萨拉比和阿克西奥波利斯、蒙特尼亚的布科夫的壁铭，多布罗加的米尔恰一伏德的石铭以及巴纳特的森尼科拉乌一马雷的器皿铭文，具有北欧古字体、格拉哥利茨字体、基里尔字体和希腊字体的特点。

那个时代的艺术主要具体表现在建筑上。建筑文物中比较重要的有：特兰西瓦尼亚三个总督辖区的以土、木材和石料建成的设防居留地和军营，卡皮达瓦居留地的最古老的城廓，卡拉苏河谷的壁垒，以砖、石建成的太阳城珀库尤的拜占庭城堡(三处均在多布罗加)。在多布罗加的巴萨拉比还有在石灰岩山群中凿成的一整套教堂殿宇，不仅在建筑学上，而且在壁画方面都颇有价值。

97 在全国各地发现的上了釉和绘有饰物的各类陶器以及青铜或银制的装饰品，均可算作独具一格的艺术创作，或借鉴于邻族艺术的作品。

十一至十二世纪的社会发展

我国境内的佩彻涅格人和库曼人

佩彻涅格人的居留

来自亚洲的一些草原部落的入侵干扰了罗马尼亚社会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中的正常发展。这些部落在其侵袭我国时较诸罗马尼亚部族处于具有游骑部落特色的落后发展阶段。其中首先涌入我国境内的则是九世纪末的佩彻涅格人（比塞尼人，佩彻尼亚齐人，巴札那克人）。佩彻涅格人以部落为组织，以放牧和养畜（主要是马）为主业，起初过着半游牧生活。他们先是对摩尔多瓦，尔后又对蒙特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行使主要是名义上的统治，强制居民交纳贡税。十一世纪中叶，一部分佩彻涅格部落居留于多布罗加。其他部落分散于特兰西瓦尼亚，至十三世纪初其踪迹犹存。他

们同罗马尼亚人、萨克逊人和塞凯伊人一起参加了1210年的一次征伐，1224年有人提到“罗马尼亚人和佩彻涅格人的森林”(silva Blachorum et Bis-senorum)。

库曼人的居留

十一世纪中叶，佩彻涅格人的地位为其同族的库曼人(库曼人、科曼人、波洛伏齐人)取而代之。象佩彻涅格人一样，库曼人也结成部落，过着牧人和养畜者的半游牧生活，具有同样的生产方式。逐渐，在土著居民的影响下，库曼人抛弃旧的生活方式，开始从事农业并兴建其定居点。库曼人社会分化成等级。由于头人皈依天主教并在米尔科夫河上设置库曼人主教区(1227年)，封建关系愈益扩展。

直至十三世纪初，库曼人一直对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实施政治统治，因此在当代史料中称这些地区为黑色库曼尼亚。

在罗马尼亚人同佩彻涅格人及库曼人共居过程中，这些部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密切起来。

98 拜占庭统治下的多布罗加

经济和军事战略两方面的利益——多布罗加的财富和贸易，保卫拜占庭帝国免遭来自北部的入侵——促使拜占庭扩张至多瑙河（971—972年），然后组织一个称为帕拉杜纳冯或者帕里斯特里翁（多瑙河畔的城市）的“管区”（1018年）。这个管区包括多布罗加和保加利亚东北部。拜占庭人在这里兴建堡垒，调集大量军队，以保卫下多瑙河和黑海沿岸地区。

但是，拜占庭的税收和军事政策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他们通常在大城市周围组成自治的政治形态。表达这种不满的常见形式之一就是十一世纪末的起义。当时，地方首领塔托斯（也称德尔斯托尔—锡利斯特拉人卡利斯），维契纳人塞斯拉夫以及萨察三个人实际上代表出现于下多瑙河的一个单一的国家政权。

拜占庭以消耗巨大力量的代价，在库曼人帮助下才把帕里斯特里人的反抗挫败。1088—1091年间在多布罗加发生的军事事件一方面表明，帕里斯特里诸城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巧妙地

进行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也说明多瑙河两岸的居民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阿列克塞·康乃奴统率下，拜占庭人终于占领了德尔斯托尔，这标志着恢复了拜占庭在多瑙河地区一个世纪的统治。

马札尔人占领特兰西瓦尼亚

马札尔人是芬兰—乌古尔血缘的部族，远古时代住在乌拉尔山区，伏尔加河中游及卡马河流域。他们在这些地区同突厥和保加利亚诸部落接触，借用了这些部落的一些语言因素和某些风俗习惯。九世纪，马札尔人出没于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地区，由此发动了多次西征。在佩彻涅格人的压力下，于九世纪末离开这个地区，暂居于德涅斯特河西岸和黑海北岸称为阿特尔库兹的地区。895年被保加利亚人打败，流向基辅和加利奇。然后越过喀尔巴阡山，居住于潘诺尼亚和蒂萨河平原。为了扩大草场和得到特兰西瓦尼亚的地下资源(尤其是盐)，一些部落侵人特兰西瓦尼亚。

土著居民为保卫他们的村社而进行的抵抗、

佩彻涅格人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以及匈牙利国
家内部的混乱，这一切成为马札尔部落在特兰西
瓦尼亚停留以及后来阿尔帕德王朝的马札尔国王
们深入特兰西瓦尼亚的障碍（特兰西瓦尼亚意为
森林那边的国家，拉丁语为trans—silva，马札尔
99 语为erdö—elü）。可能十世纪初入侵时有一部分
马札尔人留在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居民杂
居在一起。至于有组织的深入以及马札尔王朝对
这个地区统治的开始，那迟至十一世纪下半期才
能谈得上，那时匈牙利王国的内部斗争已告平息，
佩彻涅格人的反对也已减弱。这样，马札尔人才
得以逐步把统治扩展至特兰西瓦尼亚，并许诺：保
证一些罗马尼亚人公爵和总督统治部分村社以拉
拢他们进行合作。

塞凯伊人移居特兰西瓦尼亚

占领区的本土居民继续保持着古老的生活形式及固有的机构，为了巩固那里的统治，阿尔帕德王朝的国王们把塞凯伊人移居特兰西瓦尼亚。塞凯伊人是一些突厥血统的部落残余混合产生的一种居民，同马札尔人一起比较长期地居住在潘诺

尼亚之后，首先被迁至克里沙纳地区，然后在十二世纪中叶，随着马札尔人在特兰西瓦尼亚占领的深入，盖扎二世国王把总是充当先锋队的塞凯伊人迁至特尔纳瓦河地区，十三世纪初再由此迁至今天居住的东南地区。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认为塞凯伊人是面临被奴役的危险而离开潘诺尼亚的。随着马札尔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推进，塞凯伊人步步东撤。这样，退至山区，而山东面的摩尔多瓦由库曼人统治着，于是在马札尔人王朝和塞凯伊人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塞凯伊人被赋予保卫东喀尔巴阡山隘口、防止库曼人入侵的使命，作为报酬，则允许他们保存按家族和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生活方式。

萨克逊人移居特兰西瓦尼亚

出于保卫南喀尔巴阡山这种相同的动机以及开发特兰西瓦尼亚资源的经济方面的考虑，盖扎二世国王同时(十二世纪中叶)把以萨克逊人的名称闻于世的日耳曼族居民群移居至此。他们有的来自法兰德斯，有的来自摩塞尔河谷，还有的来自卢森堡，而以来自萨克逊的组织较好。萨克逊人

以自己的名称称呼所有日耳曼族移民群。日耳曼族移民所以离开旧居的本土，有的是因为封建剥削加重，有的害怕封建化。移民群住在锡比乌，比斯特里察，布拉索夫，特尔纳瓦河地区。绝大多数务农，但其中也有手工业者和商人。作为履行军事和赋税义务的酬答，萨克逊人被授予广泛的特权，能过自由的生活，在司法、行政和教会诸方面有自己的组织，从而促进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100 历代马札尔国王虽然屡次授予这些新居民特权，但一部分住在所谓"王基"之外，尤其是在特尔纳瓦河地区和雷京周围的萨克逊人，却沦为农奴，他们与罗马尼亚和马札尔农奴一起参加了反封建的斗争。

条顿骑士的殖民化

出于保卫特兰西瓦尼亚东南角这个军事上的原因，以及使罗马尼亚正教居民天主教化这个宗教原因，十字军时代住在巴勒斯坦的条顿骑士于1211年被迁移至伯尔萨国。安德烈二世国王授予骑士一僧侣用木材建筑砦堡、免缴赋税、自行

组织司法和教会等重要特权，以便于他们完成所赋予的使命。条顿骑士把萨克逊移民迁至伯尔萨国，后者在条顿人走后依然留在这一地区。由于条顿人背约，企图在特兰西瓦尼亚南部乃至在喀尔巴阡山南侧建立他们的自治统治，于1225年被赶出伯尔萨国，移居普鲁士，在那里推行同样的政策，侵占斯拉夫人居住地区。

在他们居住或殖民过程中，塞凯伊人，萨克逊人和条顿骑士在各自地区同原有的罗马尼亚居民相处一起，共同使用森林，从他们那里借用地名并征收赋税，一起参加军队。马札尔人、塞凯伊人和萨克逊人的生产者群众，同罗马尼亚本土居民一起通过他们的和平劳动及反对封建暴虐的斗争推进了特兰西瓦尼亚社会的发展。

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境内的状况

在库曼人的名义统治下，喀尔巴阡山南侧和东侧的社会仍然沿着其早已进入的轨道向前发展。无论是在摩尔多瓦或蒙特尼亚的领土上，罗

马尼亚居民均已在政治一军事上组织起来。当加利奇与基辅的罗斯公爵争权斗争之际，曾提到摩尔多瓦南部的一个政治形态，其中心为伯尔拉德，位于联结多瑙河诸城与加利奇城市的商路上。大约六千名伯尔拉德人军队于1161年抵达第聂伯河上的奥列希亚城，在返回时被基辅公爵的军队打败。

在此同时(1164年)，当捉拿阴谋反对拜占庭皇帝的逃亡者安德洛奈卡·康乃努之际，又提到了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人（瓦拉几亚人)。两年后(1166年)，下多瑙河的罗马尼亚人（据拜占庭史学家的说法，是以前从意大利迁来的移民后裔)在拜占庭人远征马札尔封建王国时与之合作。

至于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地区的社会发展阶段，亦可从多瑙河北岸的罗马尼亚人和库曼
101 人在彼得和阿桑兄弟以及后来的约尼查（卡洛扬1185—1204年）领导下反抗拜占庭的斗争中给予保加利亚人和巴尔干瓦拉几亚人的援助中清楚地推断出来。多瑙河北岸的罗马尼亚人就这样对十三至十四世纪在东南欧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保加利亚一瓦拉几亚王国的建立及其以后取得的独立

作出过贡献。

十三世纪上半叶封建关系的形成

罗马尼亚社会克服着内外阻力,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缓慢地、但不停顿地向前发展着。

经 济 状 况

文献证实，无论在特兰西瓦尼亚还是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境内，已利用水力推磨并有大量水磨和风磨，这说明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农民对政权、正在形成的统治阶级以及教会交纳的农产品代役租本身。

在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领土上发现的冶炼铁矿石炉，以及见诸于全国各地的铁匠作坊和铁器，乃是从事矿业和铁业的证据。而且，在所有手工业中以铁业为最发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铁器对农业和各种手工业均起重要作用。陶器、高速陶轮制陶技术及器

皿多彩上釉技术遍传各地，说明制陶工艺也有了进步。在全国都有所发现的青铜及银器装饰品是本地匠师的作品，证明银器手工艺的发展高度。不言而喻，满足居民日常需要的其他手工业也是不会缺少的。文献证实在特兰西瓦尼亚有很多这类行业（皮袄业，制鞋业、木器业等等），至于其他地区，根据历史逻辑推断，也不乏此业。

当地的生产有时供过于求。部分产品用来同其他产品（拜占庭的，罗斯的）尤其是细陶器和装饰品进行直接交换，或者以货币进行贸易。这就是在各地发现的外国古币（拜占庭的、日耳曼的、英格兰的）和在喀尔巴阡山南侧发现的用于零星贸易的分割成小块的古币的来由。

社会的等级分化

随着村社解体过程的深化，社会分化日甚一
102 日。封建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越来越轮廓分明。一方面是封建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依附农。除此而外，一大部分农民群众尚能长期保持社会一法律上的自由。

在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帕德王朝的占领进一步加速了社会分化过程。出现了王室、教会和贵族的领地，其占有的村落每每以数十计。为了使这些领地拥有法律上的名义，僧俗封建主们从王朝取得巩固其地产和免除这些地产上农民对国家的义务而向领主交租的证书(豁免证)。对于匈牙利王国（包括特兰西瓦尼亚）来说，1222 年的“黄金诏书”是规定贵族权利的基本文件。1227 年，一道类似的“诏书”赐给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地区的库曼人和土著人封建主，以酬劳他们对于匈牙利王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及天主教教会的支持。

统称为贵族(nobiles)或地主(maiores terrae)的统治阶级，根据领地的大小及其在封建等级制中所占有的等地分为许多阶层。

在这个时代，无论在特兰西瓦尼亚(特别是边界地区)还是在喀尔巴阡山南侧和东侧的领土上，大部分农民依然生活在村社中，保持着自由。1234 年的“教皇诏书”所说的就是这种农民。“诏书”谈到了摩尔多瓦南部地区和罗马尼亚国东部地区的罗马尼亚人(walati)不顺服天主教主教，而听信

他们的东正教主教，并且诱使为了逃避奴役而住在那里的匈牙利人和萨克逊人皈依他们的信仰。

依附农统称约巴格或舍尔布（iobagiones, servi），有一份只有占有权的土地，可以传给后代，但其所有权属于封建主，并对封建主负有交纳产品和服劳役的义务（封建地租）。同时，整个农民阶级，无论是农奴还是自由农，都对政权负有交纳产品、现金和服劳役的义务。

特兰西瓦尼亚此时仍然存在奴隶，有的来自战俘，有的沦为奴隶由于尽不了封建义务，或是因为做了一些被封建法认为是犯罪的事情。

政 治 状 况

在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提到的先国家形态的轮廓于十三世纪上半期日趋明显。

在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帕德家族的国王们于十二世纪初试图推行一种这个国家陌生的制度，设置凌驾于原有的诸罗马尼亚总督辖区和公爵领地之上的公国。罗马尼亚总督和公爵们的抵制挫败了马札尔王朝的尝试，这样，在十二世纪末，特

兰西瓦尼亚被承认为匈牙利王国范围内的一个享有广泛自治的总督辖区。

在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地区，较古的政
治形态于十三世纪初早已形成为某种政权，所以
在 1210 年能够抗击一支派来援助维丁王的特兰 103
西瓦尼亚军队。这就是 1241 年(鞑靼—蒙古人入
侵时)及 1247 年(“约翰骑士敕书”)所提到的那些
“国家”——总督辖区、公爵领地，可以肯定，其存
在当在更早。在摩尔多瓦南部和蒙特尼亚东部地
区，于十三世纪上半期曾提到河流浅滩地区和喀
尔巴阡山隘口地区居民的“布罗德尼克国”。

鞑靼—蒙古人的大举入侵

我国领土上社会的多方面发展，由于 1241 年鞑靼—蒙古人的大举入侵而毁之一炬。在远方的亚洲，蒙古部落联盟于十三世纪初形成一个在成吉思汗统辖下的强大帝国。在占领亚洲后，库曼人统治的罗斯南部地区陷入鞑靼—蒙古人的统治下，从而诞生了金帐汗国。

在 1241 年征服罗斯诸公国后，鞑靼—蒙古人

急流般地涌向波兰和匈牙利王国。鞑靼—蒙古纵队从四面八方向布达推进。一部分经过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其所过之处，无论是城市还是村庄(如罗德纳、比斯特里察、奥拉迪亚)均遭烧杀洗劫。另一部分穿越摩尔多瓦，烧淫虏掠，在罗马尼亚人和塞凯伊人均无力阻挡的情况下，终于深入特兰西瓦尼亚，横扫而过，途遇城乡(如布拉索夫、锡比乌、阿尔巴—尤利亚)，莫不大肆劫掠。有一个纵队抵达喀尔巴阡山南侧，那里的罗马尼亚人国家总督米斯切拉乌及奥尔特尼亚的贝泽雷姆班望风披靡，于是这一纵队也向布达挺进。

战斗于4月11日发生在萨伙河畔。据奥拉迪亚天主教大教堂神甫罗杰里乌斯叙述(《悲歌》)，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的军队被摧毁，国土遭洗劫，人民沦为奴隶。

但是，鞑靼人一方面由于被奴役各族人民的斗争，另一方面由于争夺帝位的倾轧，被迫退出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只保持其在喀尔巴阡山南侧和东侧的统治，其中蒙特尼亚所受控制较弱，而摩尔多瓦则较重且为时较久。这些地区的居民受到向鞑靼可汗们交纳贡税的剥削，但享有

一定的自治权，从而能缓慢地向前发展。由于鞑靼人对我国各地区统治的不平衡，这些地区在一定时期中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

封建国家——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形成

罗马尼亚诸封建国家的出现系前几个世纪的各种政治形态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原来的诸总督辖区、公爵领地和“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逐步得到巩固。最强者通过开拓其他无组织地区或者通过占领、联姻、迫使弱者承认其权威等手段，部分地或整个整个地兼并较不发达的毗邻地区来扩大其领地。

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的形成 104

九至十世纪的特兰西瓦尼亚诸总督辖区于十一世纪初均已占地广阔；巴纳特总督辖区自多瑙河至白克里什河，特兰西瓦尼亚高原的总督辖区则从梅塞什山口直达上穆列什河地区。一些边界

“国”，如弗格拉什、哈采格、奥瓦什、讷塞乌德和马拉穆列什等地的发展亦相类似，也占有很大地区。这些“国”以相当广袤的盆地为中心（这就是它们称为“国”——“扎拉”的由来），至少有一个方向为通道，因而有扩展的余地。奥尔特河两岸的弗格拉什国和罗马尼亚人国，以穆列什河廊和佩特罗香盆地为通道的哈采格国，以蒂萨河流域为广阔出口的马拉穆列什国，通向巴亚—马雷盆地的塞特马尔地区的奥瓦什国，同特兰西瓦尼亚高原毗邻的纳塞乌德国，莫不如此。

十一世纪下半期至十三世纪初，阿尔帕德王朝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后，这些形态没有消灭。罗马尼亚人的诸总督辖区、公爵领地和“国”直至中世纪晚期保持着自治，成为在当地总督和公爵统辖下、根据罗马尼亚古法（jus valachicum）治理的名副其实的诸侯国家。这些自治地区的残存成为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本身在匈牙利王国内实行自治的原因。

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的组织

十二世纪中叶以后，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

已牢固地组成。从此时起，历任总督前后相承，至十六世纪中叶从未间断。

为了保障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控制，匈牙利国王保留从大贵族中任命总督的大权，而副总督则由总督从其亲信中挑选。

临近十三世纪末，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利用匈牙利王国的混乱局面，进一步扩大自治，出现了与匈牙利国会并列的贵族议会或贵族评议会，从而进一步加强了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的自治。

特兰西瓦尼亚于十二世纪划分为郡，但除了郡以外，原有的罗马尼亚的州或区的政治一行政组织依然存在，而且其影响之深，可能最初也见诸于萨克逊人和塞凯伊人移民划分为区的建制。

罗马尼亚国国家的形成

罗马尼亚国封建国家的形成是先国家政治形态长期凝聚过程的结果，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居民对此也作出了贡献。

“约翰骑士敕书”是了解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

之间地区的社会政治实况的基本文献。“敕书”包
105 括了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与约翰骑士团团长雷姆巴尔德于1247年签订的关于约翰骑士移居这些地区，防御鞑靼人可能的再次人侵的约定，说明这里存在许多公爵领地、总督辖区和“国”。向西，是包括巴纳特南部和奥尔特尼亚西部的塞维林国。然后是两个公爵领地，一个属约翰骑士，原址尚未核实，可能在奥尔特尼亚南部，另一个则是奥尔特尼亚北部地区的弗尔卡什。在日乌河与奥尔特河之间是总督利托伏伊的“国”，这个“国”迄至当时一直是由罗马尼亚人统治的，所以仍划归罗马尼亚人。喀尔巴阡山北侧的哈采格国也属该国，因而其幅员包括喀尔巴阡山两脊。在奥尔特河东岸阿尔杰什地区还有一个国，归塞内斯拉乌总督统辖，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被确认为属于罗马尼亚人。可能象利托伏伊总督辖区对哈采格国的统治一样，塞内斯拉乌总督的国家也把其统治扩展至弗格拉什国。只有这样才足以较清楚地说明为什么弗格拉什国、哈采格国和罗马尼亚国之间在整个中世纪保持从不间断的持久联系，以及长期以来一些蒙特尼亚君主一再怀有对这些国家进行统

治，甚至施加有效统治的勃勃雄心。

在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地区的这些公爵领地和总督辖区中，存在着社会—法律地位相当于贵族的地主、封建主(maiores terrae)，同样也存在着依附于他们的农民。

罗马尼亚总督们拥有有组织的军队，宫廷里配备着征税和办事所需的大臣。

统一过程的第一阶段

约翰骑士从未住在敕封给他们的地区。没有任何文字或考古证据能证明他们曾在这些地区出没。但历代马札尔国王始终自认为是喀尔巴阡山南侧的公爵和总督们的宗主。这些公爵和总督则继续努力保障自己的完全自治，并将其统治扩展至其他地区。一旦时机有利，这种倾向就具体表现为军事性行动。十三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匈牙利王国正经历着危机时刻，这给奥尔特河右岸的总督们提供了这种有利时机。约在1272—1273年，利托伏伊总督认为自己已相当强大，拒绝承认马札尔国王库曼人拉第斯拉夫的宗主权，当然也拒绝交纳不久前归他统治的那些领土的贡金。通过谈

判使利托伏伊屈服的尝试毫无结果，终于在1277年酿成公开冲突，地点可能在哈采格国。利托伏伊在战斗中阵亡，他的兄弟伯尔巴特被俘，以巨款赎回。匈牙利国王的宗主权得到承认，但这个国家的领土和自治权仍完整无损，归伯尔巴特治理。

十三世纪末金帐汗国在罗马尼亚东部统治的削弱、匈牙利王国在阿尔帕德王朝复灭后的新政治危机，便利了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地区诸
106 政治组织的自治倾向，并为它们将统治扩展至东部领土开了方便之门。鉴于保证南喀尔巴阡山各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换利害攸关，当地的公爵、总督以及正在形成的地主阶级承认利托伏伊继承者伯尔巴特和蒂霍米尔的权威，从而使统一的罗马尼亚国朝廷的形成过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新阶段。

统一过程的完成

正如最近在阿尔杰什宫堡进行的考古研究所证明的那样，此时已存在一些较发达的居留地和集镇，如：征诸于1300年的肯普隆，征诸于1330年的阿尔杰什宫堡（当比保存于今的最早记载日期更古），都存在一些建筑文物，如：肯普隆的古教

堂、科特米亚纳修道院教堂、阿尔杰什宫堡的宫殿和宫廷教堂。凡此种种，无不说明喀尔巴阡山南侧诸总督辖区的发展，同时也是罗马尼亚国朝廷统一过程取得新的进展的时代的标志。

将喀尔巴阡山南侧这个总督辖区提高到更大声望的是被其他公爵和总督尊为大总督和君主的巴萨拉布。为了巩固其朝廷，巴萨拉布介入了匈牙利国王查理·罗伯特与某些封建主争夺巴纳特城堡的战争(1317年)；参加了保加利亚人与拜占庭人的战争(1323年)；与匈牙利国王就合作反对鞑靼人在多瑙河口的统治进行谈判。

罗马尼亚国赢得独立

但是，罗马尼亚国朝廷威望的增长，它的统治扩展至巴纳特—德—塞维林及其自治权的取得，引起一些马札尔大封建主和天主教高级僧侣的不满，因为他们眼看领土扩张计划和使罗马尼亚正教居民改信天主教的计划成了泡影。查理·罗伯特在一些封建主和僧侣的怂恿下，利用保罗同盟在同塞尔维亚人战争（1330年7月于维尔布日德）中失利的机会，发动了对巴萨拉布的战争

(1330年9月)。根据《维也纳图解编年史》和同时代的其他资料,再加上大量的案卷,我们可以相当精确地了解1330年秋天的战况。

查理·罗伯特国王的骑士部队兵临城下,巴萨拉布试图通过谈判途径求得和解,答应提供在当时来说数额十分可观的七千银马克赔偿费,放弃巴纳特—德—塞维林,交纳岁贡并送一个儿子去匈牙利王宫作人质。但是,罗马尼亚君主的建议遭到拒绝,于是便在都城阿尔杰什宫堡下爆发了战争。查理·罗伯特军队败北,退向特兰西瓦尼亚,但在喀尔巴阡山某处峡谷,可能是在洛维什塔国的一条隘道上,马札尔军队于1330年11月9—12日被农民组成的巴萨拉布军队摧毁。马札尔贵族之花——参加远征的僧侣均于此役毙命,国王本人不得不同一个贵族易服,乔装改扮才侥
107 幸得脱,贵族代他遭乱箭射死。这样,罗马尼亚国的独立和自由发展得到保障,从而在东南欧赢得了公认的威望。

摩尔多瓦国家的形成

致力于联合的喀尔巴阡山以东的罗马尼亚人的政治形态所经历的道路，与罗马尼亚国朝廷的道路十分相似。在摩尔多瓦事态的发展中，罗马尼亚公国的榜样和影响是毋庸低估的。

形成过程的第一阶段

早在1247年，即在描述喀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政治状况的“约翰骑士敕书”颁发之时，就提到了东北部有一个叫奥拉哈的公爵(总督)向金帐汗朝贡。这个公爵的名字可能是他所代表的居民，也就是史料中称为瓦拉几亚人、奥拉几亚人的罗马尼亚人的名祖。这样就可以证明，在鞑靼统治下存在着一个政治形态，即一个总督辖区。

三十年后，即1277年，当发生利托伏伊和伯尔巴特总督争取自治斗争的时候，又提到了摩尔多瓦北部的罗马尼亚人与毗邻的鲁特尼亚人发生冲突，这证明在这一地区也有一个罗马尼亚政治

形态存在。

象在罗马尼亚国一样，金帐汗国统治的削弱也在摩尔多瓦为统一过程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样在北部地区，于十四世纪初年又提到了一个以总督为首的“罗马尼亚人国家”（Wlachenlant）。联结欧洲北部和多瑙河口的沿塞列特河的商路在这些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摩尔多瓦的城镇也因此得到发展，其中有文献于1300年提到的巴亚（civitas Moldaviae）。为了控制摩尔多瓦的商路并统治摩尔多瓦领土，匈牙利国王安茹王朝的鲁道维克组织了一次征伐，参加者有马拉穆列什总督德拉戈什。在西部地区组成了一个马克，其统辖权委任给了受匈牙利国王统治的德拉戈什。

统一过程的完成和摩尔多瓦取得独立

但是，摩尔多瓦人对匈牙利国王的宗主权表示不满。马拉穆列什人在博格丹总督领导下对匈牙利王朝取消该国自治权的进攻所进行的抵抗斗争，更激励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在多年抵抗后，博格丹同马拉穆列什人于1359年转入摩尔多瓦，被

摩尔多瓦人尊为摩尔多瓦总督，代替被赶走的德拉戈什后裔。于是，在欧洲地图上出现了第三个 108
独立的罗马尼亚人国家。

喀尔巴阡山南侧与东侧事态的相似，以及罗马尼亚国对于摩尔多瓦的影响，也可从最后一幕的演变中看出。马札尔封建主和匈牙利王朝不甘心放弃对喀尔巴阡山东侧罗马尼亚人国家的统治。1330年在罗马尼亚国发生的事情于1364—1365年在摩尔多瓦重演。匈牙利国王安茹王朝的鲁道维克组织了一次旨在征服摩尔多瓦并取代博格丹的征伐。其结果同1330年如出一辙。经济上巩固、政治—军事上组织良好、人口日益发展的摩尔多瓦国战胜匈牙利军队而赢得了独立。

多布罗加国家的形成

这时多布罗加也形成了政治自治。下多瑙河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战略地位成为这个地区实行自治倾向的有利条件。多布罗加国家领袖巴利卡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介入了拜占庭帝国的内讧（1346年）。他派遣了一支一千人的军队，由多布罗提奇

统率，支持争夺帝位的巴列奥略朝的约翰五世。由于悍勇善战及姻亲关系，多布罗提奇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战略家。巴利卡死后，多布罗提奇继而当政，这个国家可能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后来命名为多布罗加的。

多布罗提奇热衷于拓殖其统治，同拜占庭人发生冲突，一度甚至曾生俘拜占庭皇帝。后来，关系得到改善，多布罗提奇被拜占庭人承认为"王"，并暂时集中力量肃清北部国界上的热那亚人。1366 年，他从热那亚人手里取得基利亚堡，并成为下多瑙河诸城市的保护者。1366 年后，多布罗提奇再次介入拜占庭帝位之争，这是他在国外强大地位的见证。在尚不清楚的背景下，他儿子伊凡科继他当政，同样拥有"王"的称号。热那亚人和土耳其人这两股敌对势力沆瀣一气，步步进逼，伊凡科不得不同热那亚人订立商约，并同土耳其人订立和约。但这只是暂时的和平，1388 年，土耳其人发动了对伊凡科的征伐，伊凡科可能就殁于此役。

十四世纪末，多布罗加处于老米尔恰的控制下。

罗马尼亚诸国形成的意义

罗马尼亚诸国的形成不但在我们祖国历史上，而且在欧洲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刻。这些国家在欧洲大陆地图上出现，是罗马尼亚社会在各方面获得发展的雄辩证据。在经济上，喀 109
尔巴阡山与多瑙河之间所有地区及喀尔巴阡山以东的所有地区间的联系业已建立；由于商路有了保障，生产扩大，罗马尼亚诸国可以与其周围的国家进行更活跃的产品交换。

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这两个独立的封建国家的形成，是其内在的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的结果，但特兰西瓦尼亚在人口和政治上的促进也是毋庸否认的。这就是说，由于马札尔封建王朝出兵征伐弗格拉什国、哈采格国和马拉穆列什国等罗马尼亚自治形态，在这些地区的总督率领下，一部分居民越过喀尔巴阡山，定居在正处于统一过程中的诸地区。马拉穆列什总督博格丹迁至摩尔多瓦是征诸于史料的确凿事实。这种迁移还发生在弗格拉什国，在传说称之为内格鲁—伏德①的

(1) 伏德系“vodă”一字之音译，意为大公，总督，督军。——译者

当地总督率领下，弗格拉什国的部分居民迁至罗马尼亚国。较早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者所说的罗马尼亚诸国的“迁来”[1]就是指此而言。

在建立于比较牢固的经济基础上的新国家中，社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社会各阶级和阶层愈益明显地形成。这样，新生的罗马尼亚诸国，作为对抗奥斯曼扩张倾向的欧洲保卫者，作为整个东正教的文化发祥地，在东南欧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喀尔巴阡山以南和以东的罗马尼亚国家取得独立，证明罗马尼亚人民早已具备的人员、经济、政治—军事潜力。这些独立国家的存在，后来为罗马尼亚社会蒸蒸日上的发展保证了优越条件。同时，罗马尼亚诸国通过其在抵御奥斯曼扩张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帮助欧洲其他各国人民取得了发展。

罗马尼亚诸国的巩固

取得独立后，罗马尼亚诸国在经济和政治上

① 一些编年史家和史学家的用语，指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这两个封建国家的建立而言。据传，这两个封建国是在弗格拉什的内格鲁—伏德和马拉穆列什的德拉戈什—伏德迁来这里后建立的。——译者

逐渐得到巩固。罗马尼亚国将其统治向西拓展至塞维林国,向东至多瑙河口。巴萨拉布(1352年)和博格丹(1365年)去世后,其继承者继续了他们的事业。贸易交往,1358年和1368年罗马尼亚国授予布拉索夫商人的特权,铸造首批钱币(罗马尼亚国于弗拉伊库时代,摩尔多瓦于彼得·穆沙特时代),外国钱币在这两个罗马尼亚国家的流通等等,无一不证明经济的发展。

塞维林国、阿姆拉什(锡比乌地区)、弗格拉什于弗拉伊库时代并入罗马尼亚国疆界,自喀尔巴阡山至黑海整个地区于十四世纪末罗曼时代并入摩尔多瓦疆界,罗马尼亚国历代君主与巴尔干各族人民结成对抗奥斯曼威胁的同盟,摩尔多瓦历代君主与匈牙利、波兰的联系等等,莫不证明罗马尼亚诸国的政治发展。

文 化 发 展

110

有关文字传布的信证日益增多,所以在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已传抄宗教典籍手稿,如《使徒行传》,《八重赞美诗》(摩尔多瓦)及《旧约》(特兰西瓦尼亚)。出现了教会学校(附设于特兰西瓦

尼亚的天主教各主教堂)和修道院寄宿学校(附设于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国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修道院)。

宗教和世俗大建筑物的出现，说明建筑艺术的发展。属于宗教的有阿尔杰什宫堡的森尼科瓦拉教堂，洪尼多阿拉和扎兰德国的石教堂（登苏什、古拉萨达、斯特雷伊、森特默里亚·奥尔列亚)。天主教的建筑主要是罗马式的(如阿尔巴一尤利亚大教堂，契斯纳迪耶和塞贝什的教堂)，但在十四世纪也建筑哥特式的教堂（在克鲁日、布拉索夫、锡比乌)。

世俗建筑艺术从阿尔杰什宫堡的故宫、费尔迪瓦拉和科德列亚等城堡即可窥见一斑。

我国社会在一切活动领域已臻于完全成熟，因此已超越初期封建主义阶段，而进入封建主义繁荣期(或发展期)的新阶段。

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中叶 罗马尼亚诸国的发展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罗马尼亚诸国无论在

经济、政治体制方面还是在文化方面均取得了进步。在象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划分为对抗阶级的社会中，这些进步的主要受益者是封建主和城市贵族等统治阶级，面农民、一般市民、盐场和矿山工人等生产者群众则受统治阶级的剥削。

经济发展

农业与畜牧业

由于使用较好的工具和更合理地耕种土地，农业这个主要经济部门获得显著进步，保证了生产的增长。犁具得到改进，铁器日益增多。用荆棘制的耙逐渐为木齿耙所代替。这样就能更细地耕耘土地。通过开垦荒地增加了新农田。采用了两年和三年的轮作制种植谷物。谷物种植比重转为以小麦、大麦为主。除了谷物以外，葡萄、果树、 111
甚至蔬菜的种植亦传播更广。

罗马尼亚诸国有大量大、小牲畜，究其原因首先是为了满足食用、穿着和耕地的需要，其次是由于拥有广阔的草场和森林，再次是因为具备加工畜产品的能力。猪、羊等小牲畜几乎每家农户不

缺；奶牛、牛和马等大牲畜也见于大多数农户。封建领地上的牲畜头数特别多，所以地主阶级能进行相当活跃的牲口或畜产品贸易。

至于多瑙河、黑海、封建主和教会领地上的人工池泽的丰富渔产，则从农民向庄园主缴纳的什一税及罗马尼亚诸国当时所保持的巨额渔业贸易中可推见。

采矿和手工业

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技术的发展，蕴藏于地下的资源，这一切都成为采矿和手工业发展的原因。特兰西瓦尼亚（图尔达、科日奥克纳、德日、锡比乌）的盐矿、蒙特尼亚（奥克纳—马雷）和摩尔多瓦（特罗图什）的盐矿都出产超过消费需要的大量盐，其中一大部分，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的产品，出口外销。铜矿、铁矿（特兰西瓦尼亚的罗德纳、洪尼多阿拉和里梅蒂亚，罗马尼亚国的布拉蒂洛伏）及金矿、银矿（特兰西瓦尼亚的阿布鲁德、兹拉特纳、巴亚—马雷、罗希亚）含矿量大，因而具有相当大的经济价值。

同时，地下资源还保证了铁匠、铸造、银器等

手工业的发展。确实，这些手工业极盛一时，特别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些较大的城市(锡比乌、布拉索夫、克鲁日、锡吉什瓦拉、比斯特里察等)。除此而外，在这些城市和其他城市(苏恰瓦、巴亚、基利亚、白堡、阿尔杰什宫堡、肯普隆、朱尔朱、奥拉迪亚、蒂米什瓦拉等)，木器、纺织、裁缝、皮货、制革、屠宰、面包等行业也有所发展。

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者人数的增长及他们间的竞争乃是十四世纪下半期特兰西瓦尼亚一些较大城市的手工业者组成行会的原因。行会由一个长老领导，长老在几个年老的匠师帮助下，解决关于生产、推销、雇用工匠和学徒等各种问题。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工匠的人数也得到增长，他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也于十五世纪中叶在特兰西瓦尼亚组织了同业会。

商　业

这样的经济发展使城乡之间以及较大城市之间能够进行产品交换、随着市场的发展，直接交
换逐渐为以货币为手段的间接交换所代替，生产 112
者作为销售产品的中间人的地位为商人取代。牲

畜、鱼类、矿产和手工业产品主要在罗马尼亚三个国家之间进行交换。联结罗马尼亚三国的商路网、罗马尼亚君主们授予阿尔迪亚尔商人的贸易特权、三国边境城市的发展，莫不证明三国间频繁的经济联系。我国产品也畅销于波兰、匈牙利、捷克、奥地利等外国市场。

社会状况

在这个时期，社会结构越来越泾渭分明。特权者（僧俗封建主和城市贵族）与物质财富生产者（自由农、依附农、一般市民、盐工和矿工）这两大社会范畴，在利害关系和生活理想上分歧愈益明显。但是，在象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中，社会各阶级不是划一的。根据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法律地位，这些阶级内部又分成不同阶层。

农民阶级

农民包括两大类：依附农和自由农。通过奴役自由农推广农奴制的倾向显而易见。甚至依附农内部也存在差别。其绝大部分——农奴拥有面

积不等的自己的土地——占有地、份地以及或多或少的家畜。农奴对土地有世袭占有权，对家畜和农具有完全所有权。

另一部分依附农通常无地，仅有少量家畜或根本没有，他们是佃农、贫农。还有一部分则完全缺乏生产资料，在封建主家里从事佣仆劳动，他们是奴仆。

最卑微的依附者阶层乃是奴隶。在特兰西瓦尼亚，通过转化为佃农和奴仆，奴隶日渐绝迹。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茨冈奴隶和鞑靼奴隶人数不断增长。茨冈奴隶来源自印度，于十四世纪上半期居住我国；鞑靼奴隶来源于战俘。茨冈奴隶主要在封建主家庭、寺院、宫廷充当工匠，鞑靼奴隶则栖身于地主庄园。两者均无任何权利，可以同其他动产和不动产一起出卖、交换和赠送。

在我国各地区，特别是边区，农民尚能保存自
己的村社和自由，共同占有土地和共同耕种田地。113
自由农自己选举本村官吏——法官和村长，职掌各村司法和行政事务。

在特兰西瓦尼亚，绝大部分塞凯伊农民也保持着自由，但是从社会—法律的观点来看，其内

部尚有骑兵和步兵两个阶层之分。基于屡次敕赐的特权，萨克逊农民能全部保持其社会一法律的自由。

封建主阶级

罗马尼亚诸国的封建主阶级具有其他欧洲国家封建主阶级的若干共同特征，这就是说，他们是庄园和村落的主子，享有广泛的社会政治特权，向依附于其所占有的庄园和村落的农民征取什一税和捐税，强迫其子民进行若干天无偿劳动，拥有自己的武装或旗等等。除这些共同特征外，还存在由罗马尼亚三国各自的特点所产生的若干差别。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上更接近中欧各国的封建主阶级，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地主则不太发展。与中央政权、朝廷相比，地主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尚不太稳固，其所占有的地产从范围来讲不广，从统治权来讲也较不巩固。地主统治所及的，大多是在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持村社时代若干特点的村落。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特权也较为有限。尽管地主阶级的倾向在于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成为中欧各国那样的贵

族，然而奥斯曼统治的建立将迫使他们将自己的情况去适应新的现实。

社会关系

由于产品能在市场上折价，封建主阶级、教会和国家力求占有尽量多的产品。实现他们这种愿望的途径有两条：其一是增加少量的封建保留地（庄园中未分为农民份地的部分）上的生产，其二则是增加农民的负担。后者是其主要门径。

农民的负担

全体农民，包括依附农和自由农，均向国家，
亦即宫廷或君主交纳部分农产品，罗马尼亚国称
为粮税或谷税，摩尔多瓦称为小麦税，特兰西瓦尼 114
亚称为什一税。在罗马尼亚国，酿造葡萄酒交纳葡萄酒税，摩尔多瓦称为葡萄酒什一捐，特兰西瓦尼亚则叫葡萄酒什一税。养羊、养猪和养蜂要交纳称之为卡税、什一捐、肥税、羊税和羊贡等的捐税。农民还有割草、修理磨坊、疏浚渠塘，特别是出车的劳役负担。也不乏根据农民地亩大小计算的货

币赋税。

只有依附农负有对土地和村落主人的义务，同对君主义务类似，有时甚至一样。实物地租占农产品、葡萄酒和小家畜的十分之一，亦即什一税。1351年，匈牙利王国把谷物和葡萄酒什一税改为九一税(九分之一)，但由于农民的反抗，直到十四世纪末才在特兰西瓦尼亚实施这个法令。

劳役地租，徭役或劳役此时不甚苛重，因为封建保留地数量少。在特兰西瓦尼亚，1437年规定每年服劳役一天，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徭役未有定规；其中主要一项就是出车。

货币捐税或地租在博伯尔纳起义(1437—1438年)前未作规定，其后，最初规定为每年十个银币，后改为根据农民的财产每年交纳十二至一百个银币。

为了能迫使农民顺服并交纳赋税，封建主阶级逐渐限制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

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开始仅是天主教农民，尔后也包括正教农民的肩上还压着天主教会的什一税，也就是说教会也从农产品、小家畜和家禽中十抽其一。

随着农民对三重势力负担的增加，他们的不满也愈益加深，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甚至从一国逃到另一国，充当绿林好汉，袭击贵族和教会的庄园、宅邸，大规模的起义盛行一时，如博格丹领导下的1342—1359年的马拉穆列什人起义，1366年的特兰西瓦尼亚总起义，1380年的特兰西瓦尼亚西北部起义及喀尔巴阡山南侧农民也参与的1382—1383年锡比乌周围的起义。这些暴动和起义以1437—1438年博伯尔纳起义为最高峰。

罗马尼亚诸国的内部组织

体制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精确地反映着罗马尼亚社会基础的发展阶段，同时又反过来促进基础的不断发展。

君主朝廷与御前会议 115

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君主朝廷以及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的机构职能已充分完备。公——国家与子民的主子——及大总督——和平时

期与战时的军队统帅——系国家君主所拥有的称号。君主家族的世袭继承制及由地主挑选这家族中一个成员的选举制通过君主生前通常选择他的一个儿子辅政而固定下来。

在行使其主子权力时，君主同时得到一个由地主组成的御前会议协助，该会议初时或设或不设专职大臣，后来则均设立职掌全国性事务或照管君主私人事务的大臣。前者有主管宫廷并统辖宫廷禁军和充任代君主的御前大臣；主管起草与加印颁发御前会议决议等文牍事务的掌玺大臣；职掌当时与君主收支混为一谈的国家收支的度支大臣等。君主私人的大臣有庆典时执掌作为军队统帅职权象征的御剑的监军；负责宫廷供应与君主膳食的御膳房总管和祝酒使；照料君主卧室的内廷总管，充任此职的系朝廷最亲信的近臣之一。除了两个罗马尼亚国家都有的这些大臣以外，还有若干各自特设的大臣：罗马尼亚国的巴恩在奥尔特尼亚代行君主职权，摩尔多瓦的苏恰瓦司阍则是这个国都的城防司令。

民众议会与国家议会

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权力及其在决定司法、赋税、行政、有时乃至立法等重大问题上的作用是通过民众议会(universitas nobilium)或贵族评议会行使的。这是贵族和高级僧侣专有的特权，罗马尼亚、马札尔、萨克逊和塞凯伊市民和自由农很少被准许与问。首次提到这种议会是在1288年，1437年的博伯尔纳起义后，民众议会改为评议会。评议会的阶级性越来越鲜明，参加者首先关心的是在面临农民斗争强化的情况下如何保护贵族利益。罗马尼亚族代表被从评议会内排挤出去。

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国家议会是一种与特兰西瓦尼亚评议会相类似的机构，用以决定重要问题：继位、赋税、社会问题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问题等等。参加国家议会的有大、小地主代表、僧侣代表、军队代表、市民代表及自由农代表。摩尔多瓦的国家议会于1441年首次见诸史料，罗马尼亚国的则于1522年。

116 **行政区划组织**

象政治组织一样，行政区划组织形式于十四世纪末亦臻于完备。罗马尼亚国的县、摩尔多瓦的府、特兰西瓦尼亚的州和区早在封建国家形成前就发端于那些坐落在河谷或自然地区的区域性公社。

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州：弗格拉什州（1222年）、哈采格州（1247年）、马拉穆列什州（1300年）及其他州，实际上系同名的古“国”。罗马尼亚人诸州中设有公爵和法官领导的审判庭，在中世纪一直保持很长时期。

这些机构也影响到塞凯伊人和萨克逊人的以区为建制的司法一行政组织。十四世纪上半期，萨克逊人组成了以锡比乌为首的七个区，后又增加两个。同时，塞凯伊人组成了另七个区，其中以奥多尔海为最重要。统辖萨克逊人和塞凯伊人区的是各区居民代表选举的区法官，加上君主的代表王国法官，在塞凯伊人区则还设有职掌重要军务的军事长官。

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县、府在设置与组织

上同特兰西瓦尼亚的州极相类似。主管拥有城堡的摩尔多瓦各府的知府，主管摩尔多瓦其他府及蒙特尼亚各县的县令均由君主任命，职能相同于阿尔迪亚尔的州或区的公爵和法官。

伴随阿尔帕德王朝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引进了新的行政一区划机构，有时与土著居民的原有机构重叠。十二世纪时屡次在文献中出现的郡，由总督任命的郡守管辖，由郡守任命的副郡守及贵族议会选举的法官协助。

城市组织

在地理和经济上处于有利地位的一些农村居留地以及在其地域内兴建起城堡或成为教会组织中心的另一些居留地逐步发展，于十四世纪变成城市或集镇。由于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城市集中了较多的财富，它们有的享有较大的自治权(特兰西瓦尼亚的王国城市)，有的自治权较小(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城市和集镇)。特兰西瓦尼亚的全部居民——罗马尼亚人、马札尔人和萨克逊人都对城市的组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大部分由萨克逊人居住的某些较大城市：布拉索夫、锡比乌、

比斯特里察、克鲁日、锡吉什瓦拉得到了一系列特权，因此繁荣一时。主管城市官吏的名称很多：摩尔多瓦称为伏伊特或绍尔图兹，罗马尼亚国称为茹德茨，特兰西瓦尼亚称为茹德，三个国家共同使用的称号则是茹拉特或珀尔加尔，他们掌管同样的行政、司法和赋税事务。

117 司法组织

司法组织起源于公爵、法官及“年高德昭”者都熟知并应用的、称为《本乡习惯》或《罗马尼亚法》(jus valachicum, voloski zakon)的不成文法律，它也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向前发展。《本乡习惯》逐步被正式诏令、法律及适合我国社会情况的拜占庭法律中包含的封建法权所代替。

法庭组织遵循等级制。最低的审判所是村法庭，由法官和“年高德昭”者一起审理本村居民间的小纠纷。村法庭之上是贵族或地主法庭，封建主在这里审判庄园上的子民。贵族法庭审理的案件可以向县、府或郡法庭上诉。特兰西瓦尼亚的最高审判所是总督和贵族评议会法庭，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则是君主和御前会议法庭，参加

这些法庭,对一般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军 事 组 织

象在欧洲其他地区一样，罗马尼亚诸国的军队组织清楚地说明了主子(君主)与封建主阶级之间的权力分配。君主和总督有自己的军队，由禁军或小地主及地方官吏(知府郡守)的旗组成。这种军队归君主(总督)或其大臣指挥。

僧、俗大封建主也有自己的军队,亦即由庄园上的农民组成的部曲或旗，利用这种军队来反抗朝廷并不罕见。

城市也树立由工匠和手工业者组成的自己的旗。

遇重大危险时,动员“大部队”,也就是能拿起武器的全体国民。

随着火枪的传布,打仗变成一种职业,除了国家的军队以外，还出现了雇佣军——出钱雇佣的外国部队(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雇佣军也可以被朝廷用来镇压叛乱的地主。

地主和贵族，象西方的骑士一样，参加骑兵，穿戴沉重的铠甲,以剑、矛和盾为武器。农民参加

步兵，装备很差，手持弓箭、长矛和剑。

霍廷、白堡、基利亚、布勒伊拉、朱尔朱、土尔努、塞维林、奥尔绍瓦等边境城堡，甚至尼亚姆茨、苏恰瓦、登博维察、波耶纳里—阿尔杰什、契切乌、巴尔特堡、基瓦尔、布兰、特尔马丘等内地城堡，在罗马尼亚各国的防御体系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防御外来危险，特兰西瓦尼亚一些城市于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筑起了城墙。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农村土堡（勒什诺夫、普雷日梅尔等等）和筑有围墙的萨克逊人教堂（普雷日梅尔、阿波尔德等等），也具有军事防御作用。

118 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中叶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政治状况

东欧和东南欧形势

十四世纪下半期和十五世纪上半期，欧洲大陆的有机组成部分罗马尼亚诸国这一地区的历史，是在匈牙利、同立陶宛公国联合的波兰封建主、国王以及奥斯曼帝国苏丹所表现出来的扩张

和兼并倾向笼罩下展开的。匈牙利和波兰把它们的统治扩张至罗马尼亚诸国边界，如果不是遇到罗马尼亚人民的顽强抵抗，它们当以进一步扩张为乐事。

波兰国王不得不满足于对摩尔多瓦形式上的宗主权，同这个国家的君主联姻，并同罗马尼亚国君主缔结平等的盟约。

马札尔国王在保持对两个罗马尼亚国家的宗主权的尝试破产后，只能苟安于同蒙特尼亚几代君主进行合作。

莫斯科公国在摆脱蒙古人统治后，正致力于自身的巩固，觅求邻国的合作，而巴尔干各国人民始终欢迎罗马尼亚国的合作，尤其是在1354年，也就是土耳其人插足欧洲以后。

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推进，逐一占领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领土，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政治生存的严重威胁。由于1389年后保加利亚王国和塞尔维亚王国相继灭亡，罗马尼亚诸国亦已危在眉睫。在上述时期，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整个中世纪，罗马尼亚诸国的历史是围绕着捍卫独立或者重新取得独立的斗争展开的。

老米尔恰朝时代的罗马尼亚国

1386年，即米尔恰登位的这一年，是威胁逼近的一年。1383年后，土耳其迅速地相继占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多布罗加。就在米尔恰登位这一年，塞尔维亚的重要城堡尼什失陷，多布罗加王伊凡科被迫接受土耳其人的城下之盟。

119 **最初的胜利和寻求盟友**

罗马尼亚国君主不能坐视这些具有严重后果的事变。必须及时防止危险。因此，可能出于多布罗加人的要求，也可能是个人因素的推动，米尔恰接受了对“多布罗提奇王的领土”和德尔斯托尔（锡利斯特拉）堡，即对多布罗加的监护，参加了以土耳其人为一方，以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为另一方的科索沃原野大战（1389年），击退了土耳其人的两次讨伐（1389—1390年）。由于1383—1390年冬季的这些胜利，米尔恰统治了多瑙河两岸。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国君主环顾周围，觅

求盟友和支持者。在巴尔干半岛上他已无对象可寻。匈牙利国王卢森堡朝的西吉斯孟不是寻求的对象，因为米尔恰成功地恢复了对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阿姆拉什和弗格拉什领地的统治，这些领土原由他伯父弗拉第斯拉夫一世·弗拉伊库统治，被匈牙利人从他父亲拉杜一世手里夺去。摩尔多瓦君主彼得·穆沙特是最自然的同盟者和朋友。在巩固与摩尔多瓦的联系后，通过摩尔多瓦君主，米尔恰接近了也与西吉斯孟竞相角逐的波兰国王弗拉第斯拉夫·雅盖洛。米尔恰和弗拉第斯拉夫于1390年在卢布林缔结了建立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盟约。它是针对匈牙利国王的防御性条约。科索沃原野之战的胜利者巴耶济德苏丹1393年占领了整个保加利亚后所造的形势，决定了米尔恰与西吉斯孟之间的接近，甚至决定他们缔结了反奥斯曼盟约。

罗 维 内

事实证明，米尔恰的政策是卓有远见的，就在1394年的秋天，闪电王巴耶济德苏丹派遣了一支四万人以上的军队，再加上塞尔维亚和阿尔巴

尼亚附庸军，进攻米尔恰。土耳其军队在土尔努附近渡过多瑙河后，向罗马尼亚国首都阿尔杰什推进。米尔恰的军队，包括由农民组成的朝廷的部队和地主武装团，总共约一万人，艰难地对付着局势。象以往一样，采用了在土耳其人前进道路上清野的战术。1394 年 10 月 10 日发生了罗维内大战（罗维内不是位于土尔努—塞维林与奥尔特河之间，就是在土尔努至阿尔杰什的路上），土耳其军队惨败，巴耶济德苏丹不得不仓惶退回多瑙河南岸。编年史家莫克萨写道："这是一场大战，乱箭遮天蔽日，多少鲜血随之横溢，多少沟谷为之腥秽，巴耶济德全军覆没"。大诗人埃米内斯库从这段描写中找到了叙述罗维内之战的灵感（《第三封信》）。

随着这个国家摆脱被占领的危险，一些大地主对米尔恰威望和权力的增长感到恐惧，于是拥立土耳其人所支持的、割据这个国家东部的一个
120 称为僭主弗拉德的僭权者为君主。为了预防土耳其人再犯并驱逐僭主，米尔恰与卢森堡朝的西吉斯孟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缔结了盟约（1395 年 3 月于布拉索夫）。同盟者告捷，光复多布罗加，赶

走僭主。僭主及支持他的地主求援于土耳其人，土耳其人随即出兵。1396年夏，在特兰西瓦尼亚总督斯蒂博尔援助下，米尔恰再次取胜，但由于1396年的“十字军”失败，米尔恰和斯蒂博尔的这次胜仗也半途而废。

尼科坡里

米尔恰的胜利促使西吉斯孟国王组织反奥斯曼“十字军”，参加者有法兰西、勃艮第、英格兰、日耳曼和匈牙利的骑士们。斯蒂博尔总督指挥下的阿尔迪亚尔军队和米尔恰指挥下的蒙特尼亚军队与“十字军”并肩作战。由于不听象米尔恰这样一个深知土耳其人战术的人在战术上的忠告，穿戴沉重铠甲的骑士终于一败涂地（1396年9月25日）。土耳其人将维丁王国改为巴夏辖区（以惩罚与十字军并肩作战的斯特拉齐米尔公），没收保加利亚地主庄园，此举使支持僭主弗拉德的蒙特尼亚地主大为惶恐。弗拉德终于遭到唾弃，被生擒后解往特兰西瓦尼亚，米尔恰被承认为全国君主。土耳其人对蒙特尼亚君主的再次讨伐（1397年）又以失败告终。

米尔恰政权的鼎盛时期，他的朝代的结束及其意义

在这些胜利后，米尔恰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回了土尔努堡，加固了多瑙河沿岸其他城堡，并兴建了新城堡（朱尔朱），军队也组织得更精良。这样做的结果，使米尔恰打败深入罗马尼亚国的又一支土耳其军（1401 年），介入巴耶济德被蒙古人领袖帖木儿俘虏后（1402 年于安卡拉）王子们的争权斗争并起了决定性作用，同塞尔维亚公爵什特凡·拉萨列维奇结成同盟，续修同弗拉第斯拉夫·雅盖洛的旧盟（1403 年），将统治拓展至多瑙河口、多布罗加、巴纳特和特兰西瓦尼亚。此时米尔恰的称号很可以说明当时的实况："朕米尔恰大总督和君主，仰赖上帝仁慈，统辖着匈牙利一瓦拉几亚全国和山彼侧伸向鞑靼人地区的唯一统治者，阿姆拉什和弗格拉什的公爵，塞维林一巴纳特及直达大海（黑海）的整个波杜纳维亚（多瑙河沿岸）两部分的君主，德尔斯托尔堡唯一的统治者"。

这样的统治者，无论对匈牙利国王，还是对苏

丹上位的形形色色的觊觎者，都是可贵的同盟者。其中，穆萨就是在成为巴尔干局势仲裁者的米尔恰帮助下登位的。

由于过去的盟友——宁愿同土耳其人停战的匈牙利和波兰国王的背弃，米尔恰不得不同苏丹 121
谈判，每年交纳三千金币贡金，以在丝毫无损国家独立的情况下赎取和平（1415年）。罗马尼亚国仍然被看作是反奥斯曼的抵抗中心。许多不满穆罕默德一世苏丹政策的人在这里找到了庇身和活动之地。其中，革新派教长别德拉丁就曾受米尔恰赞助，他关于共同占有物质财富和消除剥削的学说，曾在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煽起过一场名副其实的暴动。

米尔恰去世时(1418年1月31日）留下的是一个疆域辽阔、内外巩固、室宇耸立(科齐亚和科特米亚纳修道院)的国家，一个在欧洲享有高度威望的独立国家。

善人亚历山德鲁和平朝代时期的摩尔多瓦

国家的内部组织

摩尔多瓦短命的朝代更迭及对君位的争夺，不仅没有给罗马尼亚国带来好处，恰恰相反，使它受到损害。尤其是什特凡·穆沙特支持僭主弗拉德的政策构成一种危险。因此，米尔恰插手拥立罗曼一世的儿子善人亚历山德鲁为摩尔多瓦君主（1400年）是事出有因的。

亚历山德鲁当政不久，就通过由君士坦丁堡教长承认摩尔多瓦人约瑟夫为摩尔多瓦主教而解决了在摩尔多瓦主教一职及其任命问题上与君士坦丁堡教长的冲突。各个城堡得到修固和加强了防御，城堡的司令和知府们隶属御前大臣和苏恰瓦府尹，归根结底就是隶属君主本人统辖。随着御前会议这个中央组织的健全，各府的行政区划组织日臻完善。

对外政策

在亚历山德鲁朝时代，摩尔多瓦的对外政策是围绕着匈牙利和波兰的角逐展开的。亚历山德鲁继续奉行他伯父和父亲的老对外政策，同波兰国王联姻，选择波兰国王，而不是匈牙利国王，作为宗主。但是，1402年于卡门尼察所立的誓约，丝毫无损于摩尔多瓦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这样的关系为基础，摩尔多瓦军队参加了波兰人对抗条顿骑士的格吕瓦尔德之战(1410年)，为胜利作出了贡献。

但这种笃忠的表现没有能挡住波兰国王、立陶宛大公和匈牙利国王在卢布拉乌缔结的反奥斯曼条约(1412年)中包括进这样的条款：如果摩尔多瓦君主不参与其事，就由波兰和匈牙利瓜分摩尔多瓦。

这个计划使亚历山德鲁既愤懑又伤感，于是 122
就在摩尔多瓦庇护胡司党人，并象其前辈拉茨库在类似情况下所做过的那样，觅求教廷的保护。以格里戈雷·察姆布拉克主教为首的摩尔多瓦代表团、以地主德拉戈米尔为首的蒙特尼亚代表团

和以斯蒂博尔总督为首的特兰西瓦尼亚代表团参加了康斯坦萨会议（1415年），谋求把教会联合起来。

但是，康斯坦萨会议的计划未能实现。亚历山德鲁不得不把卢布拉乌条约置之脑后，而再次帮助波兰人进行对抗条顿骑士的马里安堡战争（1422年）。因此，当1429年西吉斯孟国王罗织罪状，非难摩尔多瓦君主时，波兰国王保护了亚历山德鲁。

但只要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宗主强国还能和解，亚历山德鲁的王朝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当波兰国王同希望从波兰王国分裂出去的、他的兄弟立陶宛大公的战争爆发时，亚历山德鲁与同样受到威胁的罗斯诸公爵一起，支持立陶宛大公。冲突以同盟国的失败告终。

在这种情况下，善人亚历山德鲁结束了自己的王朝（1431年12月30日），留下的是一个南至多瑙河和大海（以白堡和基利亚为界）、北到波库齐亚的辽阔的国家，一个受到谋求同它结盟的邻邦尊重的国家。

在米尔恰和亚历山德鲁后裔统治下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衰落

在两位杰出总督的光荣朝代后，充满动荡不安的两个罗马尼亚国家成为地主派系斗争和争位斗争的牺牲品，给毗邻三强提供了期待已久的干涉这两个国家内政、从中渔利的机会。自米尔恰逝世至弗拉德·采佩什登位的三十八年间，罗马尼亚国更迭了八个君主；在摩尔多瓦，自善人亚历山德鲁至大什特凡短短二十六年间，先后凡十一个君主。

在米尔恰的儿子和辅政米哈伊尔领导下，为保持这位伟大的君主的统治进行了两年战争，结果是罗马尼亚国丧失了塞维林和多布罗加，前者为匈牙利国王占领，后者被土耳其人夺去。由于苏丹二世(1422—1431年)的悍勇，暂时挽回了这个国家的衰落。他在对土耳其人斗争中赢得了几次胜利，挽回了国势衰落的过程，使国家的独立暂时获得承认。继后便是罗马尼亚国沿着衰落的坡道逐渐滑下去的时期。

由于亚历山德鲁的奋斗和筹划而稳固建立起来的摩尔多瓦国，经历着地主派系斗争的严峻考验，这种斗争的代表便是有才干的亚历山德鲁的两个昏庸无能的儿子伊利亚什和什特凡。内部斗争不仅便于外国干涉摩尔多瓦内政，而且导致这
123 个国家近乎分裂为兄弟分权的两半：伊利亚什虽然取得君位，他的兄弟却占有这个国家南部的大片封地，在那里行使着君主特权。

1437年博伯尔纳的罗马尼亚和马札尔农民起义

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强烈表现出封建割据危机的同时，特兰西瓦尼亚的社会矛盾日益深化。由争夺经济和政治地位而引起的统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大贵族与小贵族的矛盾、贵族与僧侣的矛盾虽不太深，且具有暂时性。但农奴与封建主这两个社会基本阶级之间的矛盾却是经常的、对抗性的。在十四世纪业已巩固的马札尔封建国家和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为封建国家利益服务的政治和司法机构、封建主阶级，总是以损

害全体农民尤其是依附农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和特权。

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生产者群众与统治阶级的对抗也趋于加深。生产者群众被迫对封建主、教会和国家担负日益苛重的什一税。与此同时，他们的自由，如自由迁移权、财产继承权等却越来越受限制。

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人们根据情况的许可，以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反抗这种不公平：从一个庄园逃到另一个庄园，或甚至逃出国境，充当绿林好汉，进行地方性的抵抗或暴动，不遵守法律等等。当压迫愈益普遍并超越限度时，当被剥削群众意识到他们的权利时，运动规模日趋扩大，转化为起义。

以十四世纪西欧一系列伟大的农民起义(1358年的法国农民战争，1381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为开始，至十五世纪初捷克的胡司战争(1419—1434年)，超过了迄止当时的一切起义。胡司主义通过到捷克城市贩货的商人，通过在布拉格上学的大学生，通过曾参加反胡司党人战争的士兵，影响着特兰西瓦尼亚不满者的精神。

博伯尔纳起义的爆发

在胡司战争进行期间，特兰西瓦尼亚自东南角（塞凯伊区、伯尔塞国、弗格拉什国和哈采格国）至西北角（马拉穆列什、萨土—马雷）发生了一连串同此有关的地方起义。这种骚动不安的情绪以1437年春爆发于索梅什河地区的博伯尔纳起义
124 为最高潮。人们抛开了活计和家园，在他们选举的领袖领导下，奔向德日附近的博伯尔纳山坡。

在海拔约七百公尺的博伯尔纳山坡上，起义者——罗马尼亚和马札尔农民、城市贫民、盐场和矿山工人、一些小贵族——以捷克胡司党人为榜样，安营扎寨，以车辆和壍壕为垒。

博伯尔纳战争与协定

经过领袖们的长时间讨论后，起义者派出一个使团前往贵族营垒，谈判农民的要求。但贵族们“捂住耳朵”，不接受农民的要求。相反，根据特兰西瓦尼亚总督拉第斯拉夫·恰基的命令，农民的使者“被抓起来，砍头并遭撕裂”。在这种野蛮暴行发生之后，便于六月末在博伯尔纳山坡脚下

发生了战斗。起义者获大胜，这是农民反对他们的压迫者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农民的胜利具有“驯服”贵族良心的效验，迫使他们同起义者议和。议和的条件明文规定在起义者与贵族的第一个协定中。对封建主的赋税降低为每户每年十个银币，每年割草或收割时服一天徭役，需修理磨坊、疏浚渠塘时做一定数量的工，每年三次贡礼；产品九一税(九抽其一)和家畜什一税取消；教会什一税规定为一个弗罗伦顶二十堆谷物。农民获得在交纳赋税后迁移到其他庄园的权利，在无后嗣时把所攒财产传给寡妇和亲属的权利。换言之，起义者目的在于“摆脱和消除不可忍受的苛役和负担，从农奴制的痛苦不堪的枷锁下伸出头来”。为了检查贵族执行协定规定的情况，每年5月9日每村、每个庄园和每镇各派两名老人同农民领袖们一起在博伯尔纳山坡会晤。这个协定在贵族代表和十一名农民领袖出席的7月6日的克鲁日—默讷什图尔会议上签署确认。

“三民族联盟”

贵族被迫接受农民要求后，就考虑如何背约。为此，他们于1437年进行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活动。他们把高级僧侣、萨克逊和塞凯伊头人、小贵族拉到自己方面。完成了这些勾当后，特兰西瓦尼亚副督列佩什、洛兰德兄弟和阿尔巴一尤利亚主教格奥尔基于9月16日在德日附近的克珀尔纳村召集了上述各方的代表会议。与会者在十字架前起誓绝不分离。贵族、塞凯伊人和萨克逊人
125 结成“兄弟联盟”，相互负有在反对内外敌人，必要时甚至反对国王时提供紧急援助的义务。三个“民族”，其实是三个特权阶层的这种联盟，在历史上称为“三民族联盟”（unio trium nationum），俗称三条腿的桌子，成为几个世纪中对全体农民特别是罗马尼亚农民进行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工具。

阿帕蒂乌之役与阿帕蒂乌协定

农民发觉了贵族策划的骗局及其背信弃义行为，于是在他们领袖的号召下重新集合起来。1437

年10月初，在同一个索梅什河地区的阿帕蒂乌终于爆发了起义者与特权者的又一次“总战役”。

战争结果，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因此，在阿帕蒂乌缔结了一个新的协定，调整农奴与贵族的关系。10月6日的阿帕蒂乌协定不再象博伯尔纳协定那样对农民那么有利。对庄园主的货币地租根据农民的财产状况规定为每年12—100银币，每年一天的农务徭役。不再提取消九一税和家畜什一税，对教会什一税也不再作规定，合理的假设是这两项又象博伯尔纳协定以前那样重蹈旧辙；在博伯尔纳山坡举行的年会也不再提及，将受禁止。

起义者的首领是两个革命家：克鲁日附近的布达伊·纳吉·安塔尔(安托尼乌斯·马格努斯)和维里亚格(比斯特里察附近，弗洛雷什蒂)的罗马尼亚人·米哈伊尔(瓦拉几亚人·米哈伊尔)。

起义的盛衰

农民不能坐视用重大牺牲取得的全部果实化为泡影。因此，1437年深秋，起义的烈火又极其猛烈地炽燃起来。起义军与贵族军的冲突越来越

激烈。同时代的编年史家们根据起义者的愤怒表现及其思想，把起义的这个阶段概括为要征服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和整个贵族、废除农奴制、建立新自由、取代国王的"农民战争，农奴和下层人民的战争"。

为了寻求冬季的落脚地，起义者涌向城市。12月初占领了阿尤德。12月中占领了克鲁日，也许还有德日和图尔达。在起义者占领这些城市期间，城市贵族的政权由民众的领导权所代替。

但是，起义军被贵族军包围在城里。约两个星期后，起义者丧失了阿尤德。1438年1月上半月，在克鲁日城下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贵族向匈牙利国王，向塞凯伊人，尤其是向丝毫不急于实
126 践克珀尔纳誓约的萨克逊人请求新的援助。在这些新援军的夹击下，农民于1月中旬失败。

起义的结束和意义

被俘的起义领袖被野蛮地杀害。布达伊·纳吉·安塔尔在克鲁日—默纳什图尔被剐死，其他九名领袖被绞死在图尔达城前面的山坡上。农民军的最后残余也被打败，一场血腥的报复扑向失

败者。上百成千的农民惨遭残害，被劓鼻、割耳、剁唇、砍手、剜眼。

为了防备农民军再次起事，克珀尔纳的“结拜兄弟们”于1438年2月2日在图尔达再次聚会，组成马札尔贵族、塞凯伊和萨克逊头人的评议会。此时，在起义扑灭后，特权者们赤裸裸地供认对于起义者的仇恨及其联盟的宗旨：“根除和消灭可诅咒的农民们的恶行与暴乱”。

在争取改善一切被压迫者——罗马尼亚人和马札尔人——生活的斗争史上，博伯尔纳起义是最重要的篇章之一。起义领袖中最先进的人物所追求的纲领和目的，打击了特兰西瓦尼亚当时存在的社会关系本身，而农民通过所取得的胜利，进一步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和贵族的虚弱。

罗马尼亚诸国的中央集权化时期

127 在洪尼多阿拉的扬库领导下罗马尼亚诸国结成反奥斯曼阵线

组织反奥斯曼攻势

在博伯尔纳起义强烈震撼特兰西瓦尼亚的同时，罗马尼亚国的魔鬼弗拉德（1436—1447年）试图挽回国家的衰败，以免沦于土耳其人统治之下。蒙特尼亚君主的胜利在基督教世界燃起新的希望，组织反奥斯曼同盟的新计划也应运而生。在铁门地区的多瑙河保卫战中，洪尼多阿拉的罗马尼亚公爵沃伊库的儿子——洪尼多阿拉的扬库和伊昂俩兄弟担任塞维林巴恩①，骁勇善战，脱颖

① 巴恩(ban)，在十二世纪时，为受命管理边境地区的马札尔官吏名称。塞维林划入罗马尼亚国版图后，巴恩成为该堡的地方长官名称（约在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后来，巴恩演变为罗马尼亚大公派驻奥尔特尼亚的全权代表的职名，相当于总督（省长）。——译者

而出。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1441—1456年)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和罗马尼亚国统帅

在保卫多瑙河渡口中的骁勇善战给洪尼多阿拉的扬库带来了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的头衔（1441年3月），当时国家正处于危亡关头。这一任命证明是必要的，因为不到一年，土耳其军队就出现在特兰西瓦尼亚。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的军队仓猝上阵，败于阿尔巴—尤利亚附近的森丁布鲁(1442年3月18日)。但在采取紧急措施——动员农民、市民、小贵族、罗马尼亚族公爵和总督们之后，仅过了六天就转败为胜。土耳其军被追赶至喀尔巴阡山南侧，大败于雅洛米察（1442年9月2日）。罗马尼亚国从变为土耳其巴夏辖区的危险中得到拯救。胜利的喜讯传遍欧洲，点燃起新的希望，产生了在特兰西瓦尼亚总督领导下结成同盟的新计划。

巴尔干诸役

扬库徒具希望，没有获得承诺的援助，只有魔鬼弗拉德的蒙特尼亚军队与之合作，在1443年9月渡过多瑙河，并由于当地居民的支持，先后攻克尼什、索非亚和其他地方（1443年）。冬季来临，给养困难，缺少贵族的支持，这一切使扬库不得不中止进攻，接受一项为期十年的和约。和约规定，只要罗马尼亚国按规定交纳贡金，土耳其人不得干涉其内政。

128 瓦尔纳战役及其后果

在教皇代表恺撒里尼和嫉妒扬库功迹的马札尔贵族坚持下，匈牙利国王弗拉第斯拉夫不顾要求从缓出兵的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的忠告，撕毁已签订的和约，发动了反奥斯曼进军。在尼科坡里同魔鬼弗拉德的蒙特尼亚军队汇合。魔鬼弗拉德看到匈牙利兵力不足，也主张停止进军。决定性的一仗发生于瓦尔纳（1444年11月）。扬库的军队虽然英勇奋战，但在土耳其优势兵力下终于败北。匈牙利国王在战斗中阵亡，使基督教军队士

气更是一蹶不振。

瓦尔纳战役的失败并未使这位雄心勃勃的战士放弃其保卫罗马尼亚诸国独立的念头和计划。在魔鬼弗拉德的援助下，他从土耳其人手里攻克了朱尔朱堡，从而燃起了胜利的新希望。

匈牙利摄政王，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国总督，摩尔多瓦的父王

扬库的英勇善战和他的军事、政治才能促使中、小贵族选举他为匈牙利摄政王（1446年）。此外，他还冠有“罗马尼亚国总督”的称号，而摩尔多瓦君主博格丹二世认他为“父王”。洪尼多阿拉的扬库确实不仅是匈牙利的统治者，而且是结成真正联盟的三个罗马尼亚国家的名副其实的领袖。

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威尼斯执政、法兰西国王、勃艮第大公、教皇、德意志皇帝等参加的新的反奥斯曼同盟的组织活动死灰复燃。但这个计划终于落空。除了扬库统率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军队以外，只有乔治·卡斯特里奥特·斯坎德培的阿尔巴尼亚人准备援助。尽管运用了战略，尽管军队奋战，但格奥尔基·布兰科维奇国王的

倒戈成为科索沃原野战役（1448 年 10 月）致败原因之一。

欧洲的重大事件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和崩溃，加上巴略奥王朝诸帝所犯下的错误，使土耳其人易于逐步扩大对拜占庭的亚、欧领土的占领。约于十五世纪中叶，这个从前名震于世的帝国只剩下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君士坦丁堡这个阴影。因此，野心勃勃的年青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二十五万大军和三百艘战船在包围了五十三天后，不甚费力地攻占了君
129 士坦丁堡（1453 年 5 月 29 日）。君士坦丁十一世德拉加塞斯皇帝求援的呼声如石沉大海，终于在此役身死。

在这次重要的占领后，土耳其的进攻越来越势不可挡，罗马尼亚诸国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但由于一些身经百战的战士领导下的下层人民的勇敢，终于在一段时间内挡住了进攻。

贝尔格莱德的胜利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斗争的结束及其意义

在对塞尔维亚多次攻略后，奥斯曼苏丹于1456年准备发动占领贝尔格莱德（“匈牙利的咽喉”）这个土耳其向中欧进军道路上主要障碍的大战。扬库再次得到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族公爵们、小贵族和市民的合作，争取到了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德国的人力支援，组成一支约三万勇士的军队，但其中几乎没有一个大贵族。他以这支军队勇敢迎击穆罕默德的约十万大军。

水陆诸战均很激烈。约经过三周，至1456年7月，扬库的胜利已成定局。苏丹部队败退，鼠窜溃逃。

在其光荣业绩的顶峰，被全欧赞颂为基督教英雄的洪尼多阿拉的扬库身染鼠疫，在贝尔格莱德附近的泽蒙永息了（1456年8月11日）。屡次赢得名震四方的胜利的二十年奋斗把扬库拥上了“基督教英雄”的台座。他历时二十年的军事生涯和政治活动拯救了罗马尼亚诸国的独立，保护了

中欧和西欧各国在七十五年内免遭危险。他的业迹成为榜样,是其他勇士和爱国者,弗拉德·采佩什和大什特凡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继承其遗志的有力鞭策。

弗拉德·采佩什继承扬库的事业

弗拉德·采佩什施政纲领

在准备贝尔格莱德大战时,洪尼多阿拉的扬库帮助一个他完全信任的人登上了罗马尼亚国君位;此人曾在他宫廷就学多年,完全赞同大总督的政策。弗拉德·采佩什(1456—1462 年)在登位时就拟订了其朝政纲领:巩固国内以保障独立。要实现这一纲领必须一方面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流血手段以挫败大地主的割据倾向,另一方面保护
130 给国家带来财富的蒙特尼亚商人,第三方面,打击地主的横行霸道,保护农民,以取得良好的兵员和纳税人。弗拉德相信这些措施足以实现他的信条:“君主强悍,则国家得治。君主闇弱,则受强者欺凌、摆布。”

弗拉德认为自己已相当强大,在征得他的保

护人和导师的儿子、与之联姻的年青的匈牙利国王马特伊·科尔文的同意后，组织了对弗格拉什国和阿姆拉什的征略。随之，惩处了不遵守关于限制在罗马尼亚国边境市镇进行商业活动法令的布拉索夫和锡比乌商人。这一措施保护了蒙特尼亚商人，使他们能不受约束地开展活动，转而支援朝廷。农民和奴仆也响应君主征兵的号召。

反奥斯曼战争

争取罗马尼亚国独立的战争

采佩什深信自己的权力已经巩固，内部治安已有保障，便在1459年果敢地拒交已经交纳了三年的对奥斯曼朝廷的贡金。这对君士坦丁堡占领者穆罕默德苏丹是一种侮辱。弗拉德·采佩什挫败了诱捕圈套，在1462年冬完成了一系列惊人的重大行动：解放朱尔朱，南渡多瑙河，对多瑙河右岸自河口至济姆尼恰实行清野，杀死约二万土耳其人，虏获丰富的战利品。

土耳其人的讨伐接踵而至。1462年4月，约二十万人的奥斯曼大军在苏丹亲自指挥下行动起

来。在同马特伊·科尔文商谈后，采佩什准备以一支由农民、市民和小地主组成的约两万人的军队自卫，大地主拒绝给予支援。

在骚扰和打垮先头深入罗马尼亚国领土的马赫穆德首相的军队后，向苏丹亲率的庞大土耳其军展开了勇猛的袭击，在特尔戈维什特附近的一次夜袭（1462年6月16日）使奥斯曼人惊恐万状，自相残杀。尖桩林里吊着去年谋图在朱尔朱捕捉采佩什的土耳其人，这阴森可怕的景象使带着败军撤退（1462年7月）的苏丹垂头丧气，心惊胆裂。

但一部分土耳其军队仍留在罗马尼亚国扶植土耳其人带来的新君主、弗拉德·采佩什的亲兄弟美男子拉杜。地主及其武装也转向拉杜。采佩什过份严厉的手段使曾对这位敌视地主的君主寄予很大希望的群众也逐渐疏远。

在这种形势下，希望寄托在马特伊·科尔文身上。采佩什带着一支小部队投奔科尔文，岂不知他从前的盟友已抛弃他而转向他的兄弟拉杜。同
131 时，一些萨克逊人领袖为了报复蒙特尼亚君主征略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和征罚布拉索夫商人所造成

的痛苦，伪造了采佩什曾允诺援助苏丹反对匈牙利的信件，这也是采佩什所未料到的。弗拉德·采佩什被马特伊逮捕，在布达的牢房里关了十四年。

弗拉德·采佩什王朝的意义

对弗拉德·采佩什复杂和矛盾的人格，有些人贬斥他性格暴戾和谋略不足。有些人则颂扬他的保卫国家的英雄主义和为治理群雄称霸的社会所作的努力。无疑，采佩什有着毋庸置辩和不可低估的功绩，因为他的行动使奥斯曼对罗马尼亚诸国统治的建立推迟了七十五年以上。

在大什特凡领导下的罗马尼亚英雄史诗

什特凡登位

与洪尼多阿拉的扬库准备保卫贝尔格莱德和弗拉德·采佩什登上罗马尼亚国君位的同时，摩尔多瓦君主彼得·阿隆及其周围的地主们把国家拱手献给了土耳其人，每年交纳两千金币贡金。

君主及其近臣们的这种行为和他的昏庸无道行为（彼得·阿隆在1451年于雷乌塞尼杀什特凡之父博格丹二世）引起普遍不满。除了几个大地主以外，全国上下待机而变。

在弗拉德·采佩什宫廷避难的什特凡一直窥伺着回国登位的有利时机。年迈的编年史家乌雷凯叙述道：在蒙特尼亚君主帮助下，“来自国家南部的约六千人和市民”以及中、小地主（但尤其是农民和市民）经多尔热什蒂一战告捷（4月12日），“使什特凡当上了总督并取得了摩尔多瓦的权杖”，在都城苏恰瓦堡附近、塞列特河上的迪雷普塔特原野，这位胜利者受到聚集起来的人群的欢呼，受到“全国”的欢呼，并接受特奥克蒂斯特主教的涂油祝福。

巩固王朝的措施

什特凡虽然很年轻，却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杰出的外交才干。由于具备这样的品质，他善
132 于以孜孜不倦的工作来巩固王朝和国家。他努力平息明争暗斗，吸引包括支持彼得·阿隆的地主

在内的一切社会力量的合作。他必须屈尊去满足被承认握有宗主权的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四世和他所朝贡的君士坦丁堡占领者穆罕默德苏丹的骄奢。

国家的组织

与此同时，保卫罗马尼亚诸国的独立这件大事，也在天天不息而又毫不声张地准备着。组织军队是什特凡首务之急。首先是组织在重大危急关头能投入战斗的君主卫队(约一千勇士)。其次是组织禁兵，由全国各地的中、小地主组成，但也有富裕农民参加(约三千人)。义勇部队，由骑马的自由农组成，用自费购置的弓箭、长矛、剑、马刀进行战斗(约三至四千人)。再就是由骑马农民组成的非正规部队，必要时在村长们率领下从各村集合起来，以棍棒、斧子、镰刀、弓、箭为武装(约三万人)。最后则是农民组成的步兵，用两头尖利的梭标作战(约一至两万人)。

这个伟大的君主屡次为其部队从里沃夫、比斯特里察、布拉索夫和锡比乌匠人那里购置弓箭、剑、矛、盔、马刀、锤矛和火枪。

由于大什特凡的战争大部分是自卫战，所以边境城堡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摩尔多瓦君主加固旧城堡，兴建新城堡，使这种自卫据点象一条腰带一样把国家围绕起来。东部，面向鞑靼人，有霍廷堡、奥尔海伊堡、索罗卡堡（均由什特凡兴建）和提吉纳堡。南部，面向土耳其人，有白堡、基利亚和克勒丘纳（均由什特凡攻克）。向西，则排列着较古的城堡尼亚姆茨和罗曼。

保卫摩尔多瓦的最初几仗

青年君主的卓有远见的政策立竿见影。由于在马特伊·科尔文国王庇护下的彼得·阿隆蠢蠢欲动，什特凡征略了特兰西瓦尼亚。继此之后，乘1462年弗拉德·采佩什与土耳其人交战之际，进行了占领基利亚的尝试，但未能成功。而沦于土耳其人占领的前景引起基利亚市民的不满，在他们的支援下，摩尔多瓦君主于1465年攻克该堡。苏丹对这个勇敢的举动暴跳如雷，但在派去进攻摩尔多瓦的土耳其军队遭到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只得在贡金从每年两千金币增至三千金币的条件下息怒罢战。

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国 133

马特伊·科尔文国王与大什特凡

此时，洪尼多阿拉的扬库的儿子、年轻有为的马特伊·科尔文国王（1458—1490年）的集权政策在特兰西瓦尼亚也产生了显著影响。在小贵族支持下当政的马特伊试图限制大贵族权力，保护下层反对大贵族横行无惮。不满他政策的人组织了一次旨在废黜国王，并宣布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德·森特焦尔吉为一个独立国家君主的暴乱。塞凯伊和萨克逊头人也参预了这次暴乱，大什特凡似乎亦未置身于外。但马特伊的强烈干涉把这次暴乱扼杀于襁褓之中。

由于什特凡攻克基利亚并插手特兰西瓦尼亚，但主要是由于马特伊的野心，促使他决心对摩尔多瓦进行征伐。1467年11月—12月间，他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劫掠和夷毁途遇的城镇：特罗图什、巴克乌、罗曼和尼亚姆茨，在到达巴亚后，准备拥立他带来的僭权者登位。

什特凡迅速挥师迂回包抄，不仅使拥立僭主的计划落空，而且大败马特伊。当时一位不偏不倚的黑袍（多米尼克派）僧侣彼得·兰扎努斯这样描写1467年冬的巴亚事件："此时一个强悍无敌的汉子统治着全国，他名叫什特凡。在从他的下层人民中集结起大量军队后，子午夜急速从四面八方放火烧镇，以把国王和他的睡意正酣、烂醉如泥的部下烧死。然后，他又出其不意地进攻国王军队，并取得了胜利"。负伤的马特伊国王仓惶脱逃，仅以身免。

什特凡努力在罗马尼亚国建树权威

为了实现其保卫国家独立这个首要目的，大什特凡需要其他罗马尼亚国家的可靠合作。另一方面必须摧毁造成重大损失的鞑靼人攻略。其次必须结束彼得·阿隆及其在大臣中的残余分子的威胁。

在1469—1474年间，这几方面的行动都取得了圆满结果。1470年夏于德涅斯特河上的利普尼克大败鞑靼人。同年又摧毁了彼得·阿隆的一次攻略，结果是阿隆和一些犯有"狡诈不轨"之罪的

大地主被杀。

也就在这一年，什特凡开始努力把罗马尼亚国纳入他的政治计划。在什特凡的军队于1470年袭击布勒伊拉和弗洛契镇后，蒙特尼亚君主美男子拉杜也对摩尔多瓦进行了征略，但未告成功。134
1473年什特凡再举努力，组织对罗马尼亚国的征略，此次，摩尔多瓦军队抵达登博维察堡(布加勒斯特)，拥立拉约特·巴萨拉布为君。什特凡象他的前辈洪尼多阿拉的扬库一样，准备以罗马尼亚三国的协同努力来建立一个反奥斯曼同盟，拉约特·巴萨拉布答应参加同盟。

反奥斯曼战争

社会群众基础的巩固

只有把君权扩展到全部国土上，只有消灭封建割据称霸，才能完全实现他十五年来日夜操心的加强战斗力的宏愿。逐步限制豁免特权，朝廷通过官吏干预封建庄园事务，削减地主领地以扩大君主领地，这些就是什特凡为此目的而采取的措施。

这个政策的背后就是反对地主阶级的无尚权力而保护农民和市民生产者群众。依附农减轻了负担，自由农、小农获得了朝廷的豁免权，在大地主的兼并倾向面前得到了保护。市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受到保护：一方面可以免受里沃夫、克拉科夫、布拉索夫、比斯特里察、锡比乌商人带来的小商品的竞争，另一方面通过商约便利了他们在国外的活动（如同弗拉德·采佩什所做过的那样）。

君主对小地主的关怀可从大量的赏赐、提拔为宫廷大臣、从其队伍中选择亲信等举动中窥见。

这些社会力量之所以同朝廷合作，其原因还在于保护国家、财产、家庭免遭毁灭性攻略是他们彼此共同利害所在。

瓦斯卢伊（高桥）之战

穆罕默德苏丹觉察到什特凡所追求的目的，决定在冬季进行一次紧急讨伐，这是一件十分不平常的事情。鲁米利亚总督苏里曼巴夏被委派统率一支十万多人的大军征讨大胆的君主。什特凡只能集结约四万士兵，几乎都是刚放下犁杖的农

民，此外还有约五千塞凯伊人和两千波兰人协作。他采用了救急的老战术：在入侵者道路上全面清野以使其遭受饥饿，并寻找庞大的军队无法展开的狭隘地带。什特凡选中了拉科瓦河与伯尔拉德河汇流处的一块沼泽地。这里在瓦斯卢伊的一座高桥那里，经过三天战斗，土耳其军于 **1475** 年 **1** 月 **10** 日败北，并被歼灭。与此同时代的阿尔迪亚尔的编年史写道："摩尔多瓦总督什特凡统率着仓 135
猝集合起来的我们的塞凯伊人、罗马尼亚人和鲁特尼亚人，勇敢地抗击深入他们国家腹地的土耳其人，作为他的祖国和人民的慈父，他随时准备为他们捐躯，同他们一起经历了三天三夜最激烈的战斗；靠上帝的慈悲，他战胜并全部歼灭了土耳其人。统率土耳其军的巴夏、副王和其他八名著名的总督当场就擒，被关进囚牢……多少俘虏，多少金银，多少财宝落入胜利者之手，任何人都可想而知"。

胜利者本人也以朴素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语言向世界宣告了他的胜利："我们狠狠收拾了我们的、也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敌人。我们粉碎了他们，并把他们踩在脚下"。失败者亲口承认，从来

没有一支土耳其军遭到这样的惨败。朋友们喜气洋洋地颂扬这个国家及其君主和勇士们。

但是，在当时那样艰难的环境下，这样的颂扬无济于事的。什特凡需要的是士兵和金钱的具体支援。出于这个主要动机，什特凡同马特伊·科尔文接近，并于1475年7月12日同他缔结了友好条约，并承认他的宗主权。于是，马特伊答应给予摩尔多瓦君主以政治和军事援助，而摩尔多瓦君主则保证反对匈牙利国王的一切敌人，但波兰国王除外。

白谷(战地村)之役

什特凡之所以不得不签订这一条约，因为他求援的要求杳无回音。相反，威尼斯与奥斯曼帝廷缔结的停战协定为土耳其人占领卡法和曼古普开了方便之门，而摩尔多瓦君主同黑海沿岸的这两个热那亚城堡有着友好和亲戚的关系。

在这种形势下，君士坦丁堡占领者、可怕的穆罕默德二世于1476年夏亲率十五至二十万人的大军向摩尔多瓦进发，以惩罚胆大妄为的摩尔多瓦君主。波兰国王卡西米尔仅限于斡旋于苏丹左

右，以促使他不再继续进军。马特伊国王迟迟不给予业已许诺的援助。

由于鞑靼人再次进犯，什特凡不得不把一部分人留在村里保卫家园，身边仅剩一万二千战士。在敌人前进道路上实行清野的战术再次证明具有救急的作用。土耳其编年史家西亚德丁写道："军队(土耳其)一连数天不知往何处行进，找不到粮秣，也无法安眠"。

在具有象征性名称的战地村附近的白溪(或白谷)一带的森林里，什特凡的战士们又一次表现出伟大的英雄气概。但是，从山下地区集结起来的、缺乏地主武装支持的农民，光靠勇敢是无法战胜十倍于己的敌人的。这样，根据什特凡亲自在这个战场上树立的碑文的记载，7月26日，"基督徒为异教徒所败，一大批摩尔多瓦战士在这里倒下"。

但是，四散掠夺的土耳其人到处遭到追袭。正 136
如乌雷凯所说的，在战地村一战后，什特凡又从"山上的牧羊人和雇农"中集结起一万六千名战士，并得到了马特伊国王派来的援军，追袭敌人，因此土耳其撤军遭惨败。国家的独立得到了挽

救，君主的声威大震。

把罗马尼亚国纳入罗马尼亚诸国同盟的新尝试

只要罗马尼亚国一天不纳入摩尔多瓦—特兰西瓦尼亚防御体系，胜利就不能完全取得成效。为此，摩尔多瓦和阿尔迪亚尔军队于1476年秋深入罗马尼亚国并拥立弗拉德·采佩什为君。但这个王朝寿命很短，弗拉德本人遭地主谋害。在五年的时间里，摩尔多瓦君主不断努力，以保证他在米尔科夫河以南的统治，但只有暂时的成效，因为拥立的君主们都不足以左右形势。

此时，一线希望出现于地平线上。1479年，土耳其对特兰西瓦尼亚的一次征略在奥勒什蒂耶附近的肯普尔—珀伊内原野被摧毁；由于这次胜利，消除了阿尔迪亚尔注定要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危险。蒂米什瓦拉郡守帕维尔·基内祖在这次战斗中的英勇事迹进入了传说。

基利亚和白堡的失陷，什特凡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

土耳其人越来越放肆干预罗马尼亚国事务，并定期反复攻略摩尔多瓦，造成了摩尔多瓦的沉重负担。土耳其人不敢再冒深入摩尔多瓦腹地的风险，而是企图通过占领多瑙河和黑海的两个城堡基利亚和白堡，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削弱摩尔多瓦。什特凡本人认为这两个城堡的重要性在于"具有这些地区的整个摩尔多瓦是匈牙利和波兰的屏障"；土耳其人也认为这两个城堡是基督教徒的最重要的支柱，穆罕默德苏丹声称："只要罗马尼亚人统治着基利亚和白堡，匈牙利人统治着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我们就无法制胜基督教徒"。因此，进攻的矛头必须指向这两个城堡。面对着土耳其大军，什特凡再次孤立无援，土耳其军终于在1484年占领基利亚和白堡。

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和军事上同样是重大损失。因为这两个港口城堡销售着给摩尔多瓦带来可观收入的贵重商品。由于这两个城堡的失陷，一方面国家失去了屏障，另一方面这里成

为土耳其人组织攻略的地方。因此，什特凡为收复它们作了多次努力，但均未成功。尽管马特伊赏赐了特兰西瓦尼亚的两处封地：小索梅什河上的拥有四十多个村落的契切乌堡和大特尔纳瓦河上的拥有七个村落的巴尔特堡，但得不偿失，因为摩尔
137 多瓦君主的影响早就超出了这些封地。费利亚克的罗马尼亚教堂是在什特凡帮助下建成的。通过由摩尔多瓦君主兴建的瓦德主教堂，宗教联系，也就是政治联系在特兰西瓦尼亚日益扩大。布拉索夫人于1479年“以极大的热忱和爱戴”向什特凡提出的“治理和保卫特兰西瓦尼亚”的呼吁得到了满足。

反对雅盖洛王朝的斗争

波兰雅盖洛王朝的占领计划

由于孤立无援，什特凡不得不向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四世宣誓效忠，这是后者期待已久的。1485年，摩尔多瓦君主怀着得到援助的希望，背着良心在科洛米亚履行了宣誓仪式。但波兰国王不仅不给予援助，反而同奥斯曼帝国缔结了和约。在这

种情况下，什特凡不得不于1487年接受向奥斯曼帝廷交纳四千金币年贡的条件，以保持摩尔多瓦的自由。

摩尔多瓦君主没有放弃收复两个城堡的念头，为此，他寻求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的友谊和同盟，并把自己的女儿埃列娜嫁给大公儿子，结成姻亲。

这种同盟是必要的，因为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在把他的一个儿子弗拉第斯拉夫拥上波希米亚王位后，拟定了统治匈牙利、立陶宛和摩尔多瓦的庞大计划。

马特伊·科尔文和卡西米尔死后(1490年)，弗拉第斯拉夫·雅盖洛也登上了匈牙利王位；波兰王位归约翰·阿尔贝特(扬·阿尔布勒喜特)，立陶宛大公的君位归他的兄弟亚历山大。卡西米尔第四个儿子西吉斯孟觊觎着摩尔多瓦的君位。为了使他登位，约翰·阿尔贝特于1497年出征摩尔多瓦。波兰军队到达苏恰瓦，但未能攻克。什特凡把军队集结在罗曼，抵抗入侵者，摩尔多瓦君主的亲戚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巴尔托洛迈乌·德拉格菲率领一万二千名军队前来助战。通过巴尔托

洛迈乌·德拉格非调停，以波兰军从原路撤退为条件达成协定。波兰军背协后，遭到袭击，于1497年10月26日在布科维纳的科斯明森林被击溃。翌年，什特凡劫掠波兰南部，战事又起。

国家的和平与建设年代

约翰·阿尔贝特国王和亚历山大大公不得不在十分有利于摩尔多瓦君主的条件下与之议和，
138 这见诸1499年签订的赫尔勒乌条约。条约只字未提摩尔多瓦的藩臣关系；它还包括了两国间的积极贸易关系，是建立在绝对平等基础上的同盟条约。

这样，作为“祖国的慈父”的什特凡就可以着手巩固君权，更好地兴造雅西、瓦斯卢伊和赫尔勒乌的宫廷，加固首都城堡，修缮一些具有巨大价值的宗教艺术文物，如兴建于1466年的普特纳修道院等，保证他儿子博格丹嗣位。

什特凡的人格

经过四十七年余的光荣朝政后，1504年7月2日，什特凡的生命永息了，伟大的戏剧家巴尔

布·什特弗内斯库一德拉弗兰恰把他比作一轮光辉灿烂的“夕阳”，全国和整个基督教世界为之恸哭。这个永息的君主，正如他自己在弥留之际所表白的：身经三十六战，其中三十四战获胜。他的一生战斗都是为了保卫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据波兰编年史家扬·德卢戈斯描述，他的同时代人正确地评价他为“一个值得钦佩的好汉，丝毫不逊色于我们如此赞美的英雄原则”，认为他是“可以委以领导和统治世界重任的最杰出人材”。俄罗斯编年史评论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第二个亚历山大（马其顿)”。阿尔迪亚尔的巴尔托洛迈乌·德拉格菲宫廷史官则认为，他是“他的国家和人民的优秀卫士……，准备为他的人民捐躯”。

十五世纪的文化发展

这个时期在各个领域内出现的新的创作题材和新的作品，大大地丰富了整个罗马尼亚文化。

民间文化十分善于接受那些表现争取人民自由斗争的社会性主题。民间史诗把争取独立斗争的重要时刻和这一斗争的先驱们，如洪尼多阿拉

的扬库、大什特凡、帕维尔·基内祖等人的英勇业迹的重要篇章记载了下来。罗马尼亚诸国的民间诗人和吟游诗人代代传颂着这样的篇章。

主要是宗教性的木结构建筑（当然也还有世俗的）反映着与实用结合的对美的爱好。以塔楼的挺拔秀丽给人深刻印象的木结构教堂、由和谐地嵌入建筑体本身的圆柱组成的环廊、雕刻精美的大门，莫不成为杰出的艺术作品。壁毯、衣服和器皿上的以描花图案为主（当然还有直线和几何图案）的古朴构图赏心悦目，不禁引人赞叹民间艺术家的手艺。

139

学　　校

在一切时代和所有国家，学校在传布文化方面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此时，在罗马尼亚诸国存在简陋的乡村学校，教人识字和歌唱圣诗。这些学校和正教的修道院学校（在特兰西瓦尼亚则还有天主教的学校），为城市或一些较大教堂附设的高一等的学校培养学生。在此类学校中，马拉穆列什的佩里修道院附设的学校，尤其是布拉

索夫—斯凯伊的圣尼古拉教堂附设的学校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在这些学校里，用斯拉夫语教课。萨克逊人由于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有可能为组织得较好的教育奠定基础。在主教堂附设的天主教学校里，授课的语言是拉丁语，其组织同当时欧洲其他国家的学校一样，课程分两期：三学科(文法、修辞、辩证法)和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样的学校可能在苏恰瓦也设立过，史料曾提到那里有一个来自维森丁诺的意大利人巴蒂斯塔，是各种艺术的教师。

宗教文化

统治阶级的文化此时带有教会影响的烙印。在罗马尼亚诸国流传着斯拉夫文的宗教课本，诸如当过米尔恰掌玺大臣的费洛斯所作的宗教颂歌，度支大臣西米翁·德杜洛维奇献给锡纳达的圣米哈伊的赞美诗等。1401年定居在摩尔多瓦的修道士格里戈雷·察姆布拉克开展了卓越的文化活动，他是圣徒传性质的作品《使徒新约翰生平》的作者。

历史编纂学

历史编纂学几乎同时发轫于三个罗马尼亚国家，即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这时是我国致力于中央集权的时代和大规模地进行争取国家独立斗争的时代。将这些事件联系起来和进行历史研究是完全理所当然的。

围绕弗拉德·采佩什朝，出现了两部在观点和对这位英勇君主的业迹的理解上迥异的历史性著作。一部是用德文撰写的《恶魔总督的故事》，反映敌视蒙特尼亚总督的萨克逊人集团的舆论；另一部是用斯拉夫文撰写的《弗拉德·采佩什的故事》，可能出自一个阿尔迪亚尔的罗马尼亚人之手，褒扬这个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君主。

140 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间，巴尔托洛迈乌·德拉格菲总督的一个宫廷史官在《杜布尼克编年史》中单辟了一个章节，记述十五世纪下半叶罗马尼亚诸国的事件。这个史官和他的主子一样，也是罗马尼亚人。

这个时期的摩尔多瓦史学著作内容较为丰富。在大什特凡宫廷里曾编纂过一部斯拉夫文的

官方编年史,原本已失传,但其内容脱化为五种改写本:《无名氏纪事》,《普特纳纪事》,《摩尔多瓦一德意志编年史》,《摩尔多瓦一罗斯编年史》和《摩尔多瓦一波兰编年史》。所有这些改写本象原本一样，均以摩尔多瓦“建国”(1359年)为开始，所叙述的事实和事件都以大什特凡朝为主要背景，反映了原本的主要内容。同时，每个改写本包含某些不同之处,传抄者或改写者的增补等。

在中世纪，法律被用来作为强制和奴役生产者群众的工具。为此，除了本乡习惯这种不成文的法律以外，罗马尼亚诸国还使用十五世纪译成斯拉夫文的某些拜占庭法典，如在罗马尼亚国有《法人》，在摩尔多瓦则有马特伊·弗拉斯塔雷斯的《法意》。

本民族语言的著作

同这个历史阶段相应，产生了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即在文字作品中使用本民族语言。在胡司主义的影响下,1430年在摩尔多瓦的特罗图什由流亡于此的马札尔胡司党人翻译了《圣经》。作为罗马尼亚小贵族和市民登上文化舞

台的结果，在胡司主义的影响下，于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交替之初出现了从斯拉夫文译成罗马尼亚文的最早的著作，如《沃罗内茨法典》，《斯凯伊赞美诗集》，《胡尔穆扎基赞美诗集》等教会用读本。

艺　术

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始见于罗马尼亚诸国的建筑艺术(如：阿尔杰什的科齐亚教堂、圣尼科瓦拉教堂、勒德乌茨的科特米亚纳教堂和圣尼古拉教堂)，至十五世纪得到了卓越的发展，出现了大什特凡时代的"摩尔多瓦风格"，以瓦斯卢伊、雅西、赫尔勒乌、多罗霍伊、皮亚特拉—尼亚姆茨的规模宏大的宫廷教堂，尤其是宏伟的修道院为代表，其中尤以大什特凡的作品普特纳修道院(1466年)为最出色，在罗马尼亚国则有十五世纪末大拉度的作品迪亚卢修道院。

在特兰西瓦尼亚，以十五世纪初建于扎兰德国的克里什契奥尔和里比察石教堂，十五世纪下半期由大什特凡建造(或在他资助下建造)的费利亚克和瓦德石教堂最为杰出。

十五世纪的世俗建筑艺术与上一世纪一样，

主要在新建的石城堡(霍廷、提吉纳、克勒丘纳、布 141
兰等),扩建的旧城堡(苏恰瓦、尼亚姆茨、罗曼),哥特式的宫堡(洪尼多阿拉)以及城墙(克鲁日、锡比乌、锡吉什瓦拉、布拉索夫、奥拉迪亚、蒂米什瓦拉)等建筑中得到充分表现。

萨克逊人公社兴建了著名的城堡式教堂,如普雷日梅尔、比耶尔坦、赫尔曼、阿波尔德等。

雕塑作为一些教堂的窗户、壁面、祭坛、墓碑及一些世俗建筑大门上的、附属于建筑艺术的装饰品,随着建筑艺术的发展而得到发展。

那个时代的绘画主要是装饰教堂内部的壁画。同时,把手稿、边框和页边装饰得光彩夺目的精细画是一种独特的装饰艺术和绘画艺术。

罗马尼亚诸国银匠制作的镀金银器或金器,如祭具(祭杯、香炉),世俗器皿(酒杯、高脚杯)和装饰品(耳环、戒指、扣环、腰带)等,显示出高超技艺。

十六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

十五世纪带有中央集权倾向的诸强权朝代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弗拉德·采佩什、马特伊·科尔文、大什特凡，挽回了该世纪上半期罗马尼亚诸国每况愈下的衰运。在很大程度上肃清了一些封建主集团的割据倾向。但一旦气候合适，这种倾向又附着使当时匈牙利动荡不安的伟大群众运动，卷土重来。十六世纪的特点恰恰在于中欧社会斗争的加剧。

1514年的农民战争

农民战争的原因

受到马特伊·科尔文集权王朝制约的匈牙利王国的社会矛盾，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十年强烈地表现出来。大贵族和高级僧侣侵吞国家世袭领地的财产，尤其是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的中小贵族和低级僧侣的财产；富裕市民（城市贵族）对一般市民也如法炮制。另一方面，贵族和整个市民阶层之间存在着矛盾，其根源在于市民发展生产和地方市场的利益与贵族在这种发展道路上所设置的障碍，如通过贵族和教会庄园时的层层关卡，掠夺商品，阻止农民带产品入

城等等，发生冲突。

但此时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封建主阶级与农民 142
的矛盾。由于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的伟大地理发现，整个欧洲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在这样的时代，希望扩大收入的封建主阶级和高级僧侣加强了对生产者群众的剥削，产品什一税提高了，无偿劳动(徭役)的天数显著增多，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越来越受限制，直至几乎完全被剥夺，地主及其官吏横暴无边。

1514年的十字军及其转变为人民起义

内部的普遍不满加上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的土耳其攻略，引起了真正的混乱状态。为了阻止这种攻略，当然，如果可能，也是为了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教皇列昂十世在匈牙利大主教托马·尼科莪一再要求下，于1514年4月16日发布组织反奥斯曼"十字军"的诏书。期望挣脱农奴制的马札尔和罗马尼亚农民、想要摆脱富人压迫的城市贫民、绿林好汉、牧羊人麇集于布达附近的兵营。因军功被封为贵族的塞凯伊农民格奥尔基·多扎被任命为十字军首领。聚集在这里的四

万多人所追求的目的，从一开始就给十字军印上了与其说是反奥斯曼的，毋宁说是反封建的色彩。

贵族对聚集在一起的人群感到恐惧，同时对他们的庄园无人耕种感到不满，于是企图以野蛮的手段阻止其他农民离开庄园，并强迫已经离开的归家。结果是组织十字军的想法逐渐被抛弃，而已有的十字军部队，如恩格斯所说，转变为一支“革命军队”①。官方的命令遭到抗拒。格奥尔基·多扎发表讲话，表达了先进的革命观点。5月中旬，十字军转变为人民大起义。

起义的组织和纲领

人群——罗马尼亚人、马札尔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分为强悍的小部队向四面八方进发。在格奥尔基和格里戈里·多扎兄弟领导下到达蔡格莱德的起义军主力在军事上组织较好，并具有较明确的目的：必须较公平地分配土地和其他物质财富，消灭贵族，取消什一税、徭役、现金赋税以及封建领地上的关卡，废除教会领地。一言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页。

以蔽之，如匈牙利国王弗拉第斯拉夫本人所说，起义者期望挣脱奴役，取得自由和伸张正义。运动具有“全面的农民战争”① 的性质。

起义蔓延至特兰西瓦尼亚 143

贵族对被捕者的野蛮暴行进一步激怒了起义者。起义迅速蔓延至各地。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起义由穷神甫劳伦齐乌·梅萨罗斯领导，在南部，则由多扎兄弟领导。在穆列什河地区，起义者与贵族军展开激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切纳德一战，起义者大胜蒂米什瓦拉郡守什特凡·巴托里和切纳德主教尼古拉·恰基所率的贵族军。尼古拉·恰基于此役丧命。起义军在克里沙纳地区还打了其他胜仗。

在短时间内，起义席卷了自克里沙纳和马拉穆列什至伯尔萨国，自巴纳特至塞凯伊人地区的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和城市平民利益的共同性在此时再次表现出来。在格奥尔基·多扎领导下，除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族和匈牙利族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3页。

农奴以外，克鲁日和图尔达的市民，特拉斯克乌和罗德纳的矿工也起来反对贵族。比斯特里察和锡吉什瓦拉的萨克逊居民也同起义者进行了一定的合作。在一些总督〔如丘契(扎兰德)的总督〕、盐矿工人(如图尔达的阿尔贝特)、贫苦市民(如德日的约翰·纳吉)、穷手工业者〔如维齐亚(讷塞乌德)的皮匠〕、农民(如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约翰·塞凯伊)的领导下，强悍的小部队勇敢地进行着活动。

贵族岌岌可危。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利亚、臭名昭彰的法学家什特凡·韦尔伯齐、特兰西瓦尼亚主教弗兰西斯·瓦尔达伊疲于拼凑贵族军。

起义的衰落和被扼杀

正当起义达到鼎盛时，其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削弱了它的力量。一些具有远见的领导人竭力主张扩大起义，而起义群众倾向于把行动局限于当地，从而正当封建武装力量日益加强组织，迫切需要起义军统一的关头，导致了起义力量的分散。

主要的战斗发生于进攻集结着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军的蒂米什瓦拉一役。起义者对该城的长期围困使贵族军几乎投降。但国王和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的军队挽救了他们。在国王和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军队的帮助下，贵族取得了1514年7月15日的胜利。

但是，蒂米什瓦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起义的失败。战斗仍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各地继续进行。此时，在蒂米什瓦拉被捕的以多扎为首的起义军领袖遭受了骇人听闻的酷刑。7月20日他们惨遭残害。格奥尔基·多扎被安放在一张烧红的铁制王座上，头上戴着同样是烧红的铁王冠，然后四马分尸。其他被捕领袖被斩首。

最后几仗发生于起义者在城市贫民帮助下一度占领的克鲁日，然后又辗转于奥拉迪亚周围。分
散的小股起义军直至1515年春仍在特兰西瓦尼 144
亚各地继续活动，引起贵族的惶恐不安。

农民战争的后果

起义失败后，贵族对农民发动了无情的恐怖活动，不问他们是否参加过起义。数万名农民成

为这种残酷暴怒的牺牲品。同起义稍有牵连的市民和小贵族也概莫能免。

对人民群众的压迫日深。1514年10—11月的"野蛮国会"决定了残酷的措施，然后由法学家什特凡·韦尔伯齐写进称为《三部法》的著名法典。这些法律明目张胆地宣称：如果贵族能不要农民的劳动力，可以把农民斩尽杀绝。规定起义军指挥、百人长、十人长、煽动者和杀死贵族者一律判处死刑。徭役增为每周一天；产品什一税规定为九抽其一(九一税)；小家畜和家禽贡礼也用法律条文规定；货币赋税固定为每户一百银币；缴纳王国国库的捐税根据农民的财产状况上涨为每年一至二弗洛伦；教会什一税扩大至农户的所有产品。整个农民阶级被惩罚服从于"完全的和永久的农奴制"(mera et perpetua servitute)，世世代代被固定在份地上(glebae adstricti)；居民在法律上被划分为两大类：少数特权阶层称为人民(populus)，绝大多数缺乏权利的真正的人民则称为平民(plebs)。

但是，特权阶级的反农民措施很快使他们自食其果。继起义之后的血腥镇压，削弱了抵抗奥

斯曼威胁的力量。匈牙利的封建军队在摩哈兹大败(1526年),接踵而来的便是匈牙利的肢解。

罗马尼亚人、马札尔人、塞凯伊人、萨克逊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等兄弟民族的人民群众参加的1514年人民大起义,是一切被剥削者团结斗争史上光荣的一页。它成为被压迫者争取正义和自由斗争的榜样和鼓舞。

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国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内部斗争

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历史充满着想要确立政治权力的王朝与企图称霸一方的地主割据间的斗争。为了保障其阶级利益,地主毫不犹豫地求助于外国势力,给它们提供干涉罗马尼亚诸国内政的机会。

博格丹三世和什特弗尼策朝时代的摩尔多瓦 145

大什特凡之子博格丹三世(1504—1517年)力求实现他高尚的父亲关于保持摩尔多瓦独立的

政治遗嘱。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土耳其人还没有放弃其统治计划，而大地主又企图使摩尔多瓦向波兰王国叩首称臣。年贡从四千增至八千金币，此举暂时满足了奥斯曼帝廷的贪欲，但同波兰的关系连续五年仍处于紧张状态，彼此不断攻略。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也恶化了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国的关系，由于蒙特尼亚主教马克西姆·布兰科维奇提出双方都是“同种的基督教徒”，对抗才获得调停。

在德拉弗兰恰三部曲之一《暴风雪》中所描写的博格丹的储于——什特弗尼策朝时代（1517—1527年），内部继续动荡不安。以卢卡·阿尔博雷为首的大地主利用君主的年幼无知，扩大了自己的庄园和政治权力。什特弗尼策亲政后，试图巩固君权和国家的独立。君主和地主的冲突以许多大地主人头落地为始，而以君主本人被害告终。

大拉杜、涅戈埃·巴萨拉布、阿富马茨的拉杜诸朝时代的罗马尼亚国

罗马尼亚国的形势也同摩尔多瓦十分相似。以克拉约维斯库家族为首的大地主成为国家的真

正主宰。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左右朝廷。甚至连大拉杜(1495—1508年)也不得不承认这种霸权，并且不得不把对奥斯曼帝廷的年贡从八千增至一万二千杜卡特。由于同匈牙利国王的联系，拉杜取得了特兰西瓦尼亚的乔瓦朱封地。

拉杜死后，出现了对国家十分有害的四年内讧。最后，克拉约维斯库家族把他们的一个成员涅戈埃拥上王位，为了使继位合法化，他更姓巴萨拉布(1512—1521年)。涅戈埃拥有强大的奥尔特尼亚地主家族的支持，得以保持较大的君权，索心致力于文化生活，兴建了阿尔杰什宫堡的精美的主教堂，主持了《涅戈埃训于(特奥多西)篇》一书的写作。涅戈埃的死再度引起内讧，罗马尼亚国走到了变为土耳其巴夏辖区的边缘。爱国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和同他们联合的部分地主挽救了国家。他们拥立阿富马茨的拉杜(1525—1529年)登基。拉杜依靠了广泛的人民运动，成功地渡过了危急关头。他的朝代尤为动荡不安，同土耳其人接连打了十九仗，互有胜负。阿尔杰什宫堡教堂里的拉杜墓碑——一部石刻的真正编年史，纪念着这个君主的英勇业绩。

146 争夺特兰西瓦尼亚统治权的斗争

此时，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也发生了重大事件。尽管阿富马茨的拉杜同匈牙利国王合作，苏里曼一世苏丹在摩哈兹一战（1526年）打败了马札尔军，这一事件成了匈牙利王国肢解的开端。有两派人争夺着匈牙利王位：一派支持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利亚，另一派支持哈布斯堡的斐迪南。同时，由约万·内纳达（黑王）领导的由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马札尔农民参加的反奥斯曼性质的社会起义更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经过两年的斗争，受苏丹和摩尔多瓦君主彼得·拉雷什支持的约翰·扎波利亚取得胜利，加冕为奥斯曼帝廷的藩臣匈牙利国王。

但是，安宁并未因此找到合适的土壤，因为不满再度强烈爆发出来。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弗格拉什的罗马尼亚贵族什特凡·马伊拉特和埃梅里克·巴拉萨组织了争取国家自治的斗争；然后又以珍贵的贡品和一万二千金币岁贡从土耳其人手里换得了把特兰西瓦尼亚升格为自治总督辖区的许可（1540年）。同时，哈布斯堡的斐迪南仍试图

夺取匈牙利王位。但苏里曼占领了布达（1541年），把匈牙利中部和南部划为土耳其的巴夏辖区，北部仍然处在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和帕尔蒂乌姆（特兰西瓦尼亚西北地区）组成一个在奥斯曼帝廷宗主权保护下的自治公国。这种宗主权没有取消特兰西瓦尼亚的自治权，它享有的政治地位比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匈牙利要有利得多。

彼得·拉雷什朝

在争夺特兰西瓦尼亚统治权的斗争中，摩尔多瓦君主、德拉弗兰恰三部曲中的《金星》彼得·拉雷什(1527—1538年)起了重要作用。

正当东南欧处于大动荡的时代，摩尔多瓦的封建割据显著地削弱了这个国家。依靠爱国力量(小地主、农民和市民)当政的彼得·拉雷什又靠他们成功地挽回了摩尔多瓦的衰运，拯救了国家的独立。

彼得·拉雷什为了保护君权，介人了特兰西瓦尼亚的斗争，支持约翰·扎波利亚。摩尔多瓦

军队在布拉索夫附近的费尔迪瓦拉一战的胜利(1529年)，增强了他的权力，并使摩尔多瓦君主取得了对契切乌、巴尔特堡、乌古拉什、罗德纳等领地及比斯特里察城的统治权，从而成为特兰西瓦尼亚很大一部分领土的主宰。

自信自己力量的摩尔多瓦君主派兵出征波库提亚(波兰南部)，提出原有的主权要求。经过几
147 次互有胜负的交锋后，彼得·拉雷什大败于奥贝尔丁(1531年)。惟恐摩尔多瓦君主权力增大的奥斯曼帝廷方面对其行动采取了否定态度，强制把岁贡从八千金币增至一万金币，这助长了波兰封建主的气焰。

新的形势促使彼得·拉雷什接近哈布斯堡。当奥斯曼帝廷支持的威尼斯冒险家阿洛伊西奥·格里蒂谋图充当匈牙利国王，而他的几个儿子君临罗马尼亚诸国时，这种动向具体地表现了出来，事态促使摩尔多瓦君主再度出兵特兰西瓦尼亚，并抓住了格里蒂。拉雷什和哈布斯堡的斐迪南的盟约(1535年)对摩尔多瓦君主毫无用处，因为其后不久斐迪南与扎波利亚在奥拉迪亚又缔结了另一个条约(1538年)。

苏里曼苏丹为了反对这些条约，决定进行干涉以挽救奥斯曼帝廷的利益。彼得·拉雷什首先遭到进攻。1538年夏，一支二十万人的土耳其军深人摩尔多瓦，与此同时波兰封建主从北部，鞑靼人从东部进袭。拉雷什毅然抵抗。但由于地主的叛卖，他不得不弃国出奔。在塞凯伊人帮助下，他抵达他的封地契切乌堡。

摩尔多瓦、蒙特尼亚的地主和特兰西瓦尼亚贵族选择了同土耳其人合作的道路，从而为土耳其人在罗马尼亚三国建立统治大开方便之门。

十六世纪前半期罗马尼亚诸国的文化

十六世纪上半叶的文化包罗了最重要的文艺体裁，尽管有着由动荡的政治形势造成的缺陷，但有价值的新作品丰富了几乎一切文化领域。这个时期传布于罗马尼亚诸国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不仅带来了文化高涨，而且以宝贵的新思想大大地丰富了文化的内容。

印刷活动和教育

为了满足教会的需要，罗马尼亚诸国引进了印刷术。首先是在罗马尼亚国，得力于逃避土耳其人的黑山国修道士马伽利。在可能是设于特尔戈维什特的这家印刷所的印刷机下，印出了三部书：《祈祷书》、《八重赞美诗》和《福音全书》（1508—1512年）。过了约二十五年，印刷术在锡比乌找到了活动场地，1530年，这里出版了一部关于鼠疫的专著。五年后，约翰·洪特鲁斯在布拉索夫创办了一个新印刷所，至这个世纪中叶，在
148 这里的印刷机下印出了三十七本不同内容的书籍。在这期间，锡比乌出版了第一部罗马尼亚文书籍《罗马尼亚教理问答》（1544年），两年后又出版了《斯拉夫—罗马尼亚福音全书》，两者都是菲利普·摩尔多维亚努的作品。

这个时期，教育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上述文化—精神现象的影响。原有的学校组织得更好，如布拉索夫的罗马尼亚学校，奥拉迪亚和阿尔巴—尤利亚的神甫会学校。此时又创办了其他学校，如约翰·洪特鲁斯建于布拉索夫的中学。通

过1525—1526年建立的锡比乌“大学”，这个时期开始了高等教育。

宗教改革与人文主义

各个改革教派通过布拉格、维也纳尤其是维滕堡大学的特兰西瓦尼亚学生和辗转中欧诸国的商人，作为反天主教的一种反应，传人特兰西瓦尼亚。首先，在十六世纪前半期，主要通过约翰·洪特鲁斯的活动引进了萨克逊人信崇的路德学说。在这个世纪中叶，出现了日内瓦改革家让·加尔文的学说，加尔文主义主要为马札尔人所信奉，先是在城市，然后蔓延至乡村。在这个世纪的下半期又出现了弗兰西斯·大卫所传布的一神教。宗教改革促进了本国语言文化的传布。

西欧具有资产阶级化倾向的市民阶层关注的中心是需要并渴望进步的人，他们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也在罗马尼亚诸国找到了合适的土壤。人文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罗马尼亚国王室的后裔尼古拉·奥拉胡斯（1493—1568年)。“人文主义亲王”鹿特丹的爱拉斯谟的朋友——尼古拉·奥拉胡斯是墓志铭、诗歌、历史、人种志性质著

作的作家，他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匈牙利》一书。他的同时代人、布拉索夫人约翰·洪特鲁斯（1498—1549年）创办学校，著有多种宗教、历史、地理和法律性著作。印刷所创办者、宗教书籍翻译者和历史性著作的作家、克鲁日的马札尔人文主义者加什帕尔·赫尔泰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十六世纪前半期，锡比乌火药制造家康拉德·哈斯所进行的关于焰火和三节爆竹发射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著作比其他欧洲发明家的著作要早得多，是现代火箭的先驱。

历史编纂学

无论就观点还是就其服务的目的而言，十六世纪上半叶的历史编纂学是上一世纪的继续。它是为朝廷利益服务的官方的编年史。罗曼主教马
149 伽里的《纪事》就具有这种性质。该书奉彼得·拉雷什之命编写，效法拜占庭编年史家康斯坦丁·马纳塞斯的笔法，展示始自大什特凡逝世至1551年的摩尔多瓦的事件。

某修道士秉承涅戈埃·巴萨拉布旨意写成的、讲述治国方法的《训于(特奥多西)篇》是一部

具有历史、政治和道德的多种内容的著作。

艺　术

无论在建筑还是在雕刻和绘画方面，都继承了上一世纪的传统。大拉杜兴建的迪亚尔的圣尼古拉教堂，特别是涅戈埃·巴萨拉布兴建的阿尔杰什宫堡的主教堂，是这个时代罗马尼亚国的建筑艺术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在摩尔多瓦，彼得·拉雷什兴建的普罗博塔和胡莫尔教堂继承了大什特凡时代的“摩尔多瓦风格”。

摩尔多瓦画师们的精湛技艺见于胡莫尔·沃罗内茨和摩尔多维察修道院的壁画，引起人们的赞美。

十六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对罗马尼亚诸国的统治

奥斯曼统治下的经济制度

奥斯曼统治的建立对于罗马尼亚诸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国家的大部分财富

流向君士坦丁堡，而内部自治却显著削弱。

岁贡或哈拉吉　礼品或佩什凯什

奥斯曼统治的经济制度的特点在于缴纳岁贡（哈拉吉）、礼品（佩什凯什）和征发实物、徭役的义务。

奥斯曼帝廷的所有藩国，当然也包括罗马尼亚诸国的主要义务是岁贡，或称哈拉吉。从藩属国方面来说，岁贡被认为是赎买和平的手段，从土耳其人方面来说，则看作藩属国全部土地的赋税。这种义务直接根据罗马尼亚诸国对奥斯曼帝廷的依附程度而变化。罗马尼亚国的岁贡在1415年为三千金币，至十五世纪中叶达一万金币，在以后一个世纪中又增至五万金币，而至十六世纪最后十年竟超过十五万金币。摩尔多瓦的岁贡自1456年的两千金币达到十五世纪下半期的六千金币，至十六世纪中叶增至三万金币，而在十六世纪最
150 后十年为六万五千金币。特兰西瓦尼亚的岁贡由1541年的一万金币增至1575年的一万五千金币，同其他两个罗马尼亚国家相比，始终数目较低，因为奥斯曼对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较弱。

佩什凯什义务分两类。第一类是每年一次的佩什凯什，起初作为岁贡的附加，后来改为拜兰节的贡礼。作为岁贡的附加，佩什凯什的价值约相当于岁贡。第二类是临时性的佩什凯什：为了取得和保持君位，或者逢奥斯曼帝廷发生某些事件。奥斯曼帝廷越来越明显地插手继位问题是这类佩什凯什增加的原因。关于用金钱买取君位的最早的记载是在彼得·拉雷什第二次当政时（1541年），他交纳的数目达十五万金币。佩什凯什直线上升，至十六世纪末达数百万金币的惊人巨额。

实物税　商业垄断

实物税具体表现为定期供给的大量谷物和牲畜。另外尚有在战时征发的临时性的供给：马匹、谷物和木材。这种义务紧随着其他义务的变化而变化，至十六世纪末已达巨大数量。

为了满足帝国的粮食和畜类需要，土耳其人禁止向其他国家出口这些产品。它们由国家征购，并以帝国规定的价格送往奥斯曼帝廷，或者由土耳其商人同样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而国家组织并保障其运输。罗马尼亚诸国从此时起就被视

为“帝国的粮仓”，奥斯曼帝廷的供应库。

国内剥削与奥斯曼剥削相交织

奥斯曼统治的经济制度对于罗马尼亚诸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无疑都产生了消极结果。但与之合作或趁这种形势渔利的地主和君主们也罪恶不在其下。

赋税的增加

罗马尼亚诸国的君主和大公们深知他们的统治朝不保夕，在征敛缴纳奥斯曼帝廷的岁贡和其他义务的同时，通过剥削生产者群众搜刮了大量的个人财产。赋税的名目增多，而且税额也由于把赋税扩大到迄止当时免税的其他居民阶层而增
151 长。当时有人说：“土耳其人从君主手里榨取金钱，君主从可怜的百姓身上榨取金钱，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极度贫困，无一能免。”

同时，向多瑙河南岸出口粮食和畜类的可能性促使地主和寺院觅求增加这些产品的新手段。虽然由于农户产品匮乏，实物地租仍保持十抽其

一(什一税)，但封建主阶级不择手段地提高什一税总量，如扩大领地，买进或强占自由农土地，从而也就增加了履行什一税义务的农民人数。提高什一税的另一个方式就是增加封建保留地（未分成农民份地的那部分庄园）上的劳役(徭役)义务。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劳役未作明确规定，农民有义务做“主人的一切事情”，“主人命令做的事情”。在特兰西瓦尼亚，徭役在1514年规定为每周一天，整个十六世纪沿袭未变。

为了保障其什一税和徭役，封建主阶级在朝廷支持下，逐步取消了农民的自由迁移权，直至把他们固定在份地上，特兰西瓦尼亚早在1514年就这样做了，罗马尼亚国在1595—1596年间也继而效尤。

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

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现他们对于压迫加深的反抗。个人和集体从一个庄园逃至国内的另一庄园和逃亡国外，就象拒绝履行对庄园主和朝廷的义务一样，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结伙落草，在喀

尔巴阡山两侧均规模日大。一旦环境合适，反压迫斗争转化为起义。

这种大规模的起义在1562年爆发于塞凯伊人地区。塞凯伊农民被迫交纳农奴式的赋税，甚至面临沦为农奴的威胁，于1562年春揭竿而起。在初期的几次胜利后，约翰·西吉斯孟亲王的军队终于打垮了分散的起义者。起义的结果是塞凯伊头人取得贵族地位，而农民沦为农奴。

摩尔多瓦君主亚科布·赫拉克利德，即暴君一伏德，看来并未置身塞凯伊人起义之外，而是想利用这种混乱来建立其对摩尔多瓦历代君主拥有的阿尔迪亚尔封地的统治。但他没有想到摩尔多瓦农民本身酝酿着骚动。他们十分不满于每户增加一列伊国税的措施，于1563年爆发了反对暴君一伏德和他的大臣的起义。暴君一伏德使用了封官许愿和两面手段始得身免，但有几名地主终于丧命。

这些起义刚刚平息，又在国内的不同地区爆发了其他起义。1566年，摩尔多瓦农民在阿尔迪亚尔农民帮助下再举起事，而在格奥尔基·克勒丘翁领导下的具有反封建和反奥斯曼性质的1569

年起义，席卷了特兰西瓦尼亚西北部。史料还多 152
次提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摩尔多瓦的其他运动。

奥斯曼统治下的政治制度

与变成巴夏辖区的巴尔干诸国和匈牙利中部不同，罗马尼亚诸国被承认拥有内部自治权，虽然受某些限制。这一事实一方面由于与奥斯曼帝廷的利害相关，另一方面应归功于罗马尼亚人。土耳其人的经济利益通过承认自治在更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因为除了缴给他们的岁贡、礼品、实物税有所保障而外，他们还拥有商业垄断。土耳其人屡次企图征服这些国家的尝试均遭失败，使他们对此视为畏途。

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自治权

土耳其人有义务尊重罗马尼亚诸国的疆界，尊重国家对君主的选择，苏丹保留批准权；保证不干涉这些保存着自己的古法和习惯的国家的内政，保证它们有权保护自己免受可能的侵略。而

罗马尼亚诸国则承认奥斯曼帝廷的宗主权，必须履行所承担的物质和军事义务（支援土耳其人），不得同其他国家缔约，因为罗马尼亚诸国已被包括在帝国缔结的诸条约中。

在政治问题上，奥斯曼帝廷的干涉日见明显，尤其是在君主的任命和更迭上，只有表现出极大忠诚和各方面都奴颜婢膝的争位者才能得到支持。为了控制历朝君主，土耳其人强迫他们建立由土耳其新军和骑兵组成的私人卫队。御前会议也效法苏丹宫廷的例子，改为国政会议，土耳其人通过其亲信大臣予以控制。两国首都分别迁至布加勒斯特和雅西这两个不设防的城市，以便监视。为了使这两个罗马尼亚国家不再成为威胁，它们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隶属于帝廷。出于同样目的，堡垒被夷毁。虽然遭到了这些损失，但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毕竟继续实行着自治。

土耳其的拉亚、桑札克和巴夏辖区

为了巩固对罗马尼亚诸国的统治，土耳其人

在其周围建立据点：拉亚[1]、桑札克[2]和巴夏辖区。这些据点自十五世纪始，至十七世纪逐步形成。

在占领保加利亚和多布罗加后（十四世纪末 153
至十五世纪初），土耳其人觅求将统治伸展至多瑙河左岸诸堡。多布罗加组成一个桑札克，以锡利斯特拉为首府，是鲁米利亚巴夏辖区的组成部分。约于1417年，朱尔朱和土尔努被占领，变成拉亚。基利亚和白堡于1484年后，布勒伊拉和提吉纳于十六世纪上半叶，均遭同样命运。周围的城堡和村落都被置于土耳其管理之下。这些拉亚划归邻近的桑札克：土尔努和朱尔朱划归尼科坡里桑札克，布勒伊拉、基利亚和白堡归锡利斯特拉桑札克，而提吉纳则单独构成一个叫作本德尔的桑札克。

自1552年始，土耳其人逐步将统治扩展至巴纳特和克里沙纳部分地区，组成一个以蒂米什瓦拉为中心的巴夏辖区，划分为多个桑札克。

被占领的领土以军事原则进行组织，由巴夏和别伊统辖。全部领土被宣布归国有或苏丹财

① 土耳其军事行政单位，相当于要塞、堡。——译者

② 土耳其巴夏辖区以下的行政区划。——译者

产，其中一大部分保留为国税领地，称米里，其余部分，赏赐给教会的称瓦库夫，赏给土耳其大臣和将领的称哈斯、齐阿密特、提玛尔。土地的真正主宰是以骑兵部队（斯巴休）为后盾的巴夏、别伊、别尔别伊。他们可以任意开发其所取得的封地并剥削这些封地上的居民。

十六世纪下半叶罗马尼亚诸国的政治状况

一方面由于土耳其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地主派别之间夺权斗争，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这个新历史阶段是一个衰落的时代，尤其是在政治上。但这种走下坡路的衰势终于为勇士米哈伊的勇敢的利剑和敏捷的智慧所挽转。

罗马尼亚国的政治史

自牧羊人米尔恰至勇士米哈伊，罗马尼亚国的政治史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争位斗争，以及土耳其人所拥立的大公与期望僭权的地主之间的斗

争。为了取得君位，形形色色的争位者向苏丹、巴夏、维齐尔献纳巨额陋规。一朝登位，他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捞取钱财以偿还债主，赢得帝廷保护，保证废黜后的生活。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崽米赫涅及其母亲叶卡特琳娜郡主。地主也迎合土耳其人和争位者，以保障自己的统治。很少有象彼得·切尔切尔(1583—1585年)那样的明主，能倡导一些旨在从文化和军事上振兴国家的措施，考虑实施某些改革或考虑从奥斯曼统治下解放国家。

摩尔多瓦的政治史 154

摩尔多瓦的情况极为相似。彼得·拉雷什的儿子们是一些不肖子孙。亚历山德鲁·勒普什涅努(1552—1561年，1564—1568年)曾试图活跃经济生活，并保障一定的君权，终于同地主发生冲突。地主拥立了冒险家暴君—伏德(1561—1563年)。此人赞同德意志皇帝们的欧洲政策，试图驱除奥斯曼统治。

伊昂一伏德

继几代微不足道的君主之后，勇敢的伊昂一伏德取得了摩尔多瓦君位(1572—1574年)。彼得·拉雷什这个儿子的全部政策是争取国家独立。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伊昂一伏德采取了若干对内措施。他依靠农民、市民和小地主，把大地主排除于政权之外。因此，大地主称他为"雷帝"伊昂一伏德，但事实上如他所铸造的钱币上的铭文自称的那样，毋宁是"摩尔多瓦之父"。他与大地主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斗争。

由于他拒绝增加岁贡并表现出不愿俯首贴耳，奥斯曼帝廷对他宣战。伊昂一伏德征得"各阶层会议"，也就是说中下阶层人民的赞同，在查波罗什哥萨克人的援助下，抗击土耳其军。在福克夏尼附近日利什特一战(1574年4月)的胜利使伊昂一伏德大受鼓舞，准备象他的先辈大什特凡一样，建立由两个罗马尼亚国家组成的反奥斯曼同盟。在布扎克平原，土耳其人再次败北(1574年5月)。一支异常庞大的土耳其援军深入摩尔多瓦，地主也引狼入室。土耳其人数量上的优势、鞑靼

诸帐的攻袭和地主部曲的投敌倒戈，造成了摩尔多瓦军及其盟友哥萨克人在1574年6月罗什卡尼之战中的失败，勇敢的君主也以身殉国。

在跛子彼得及其后裔诸朝时代，摩尔多瓦也日益衰落，每况愈下，直至勇士米哈伊时代。

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公国的形成

十六世纪中叶是罗马尼亚诸国在政治和体制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在土耳其—奥地利统治倾向犬牙交错的形势下，罗马尼亚诸国尚能保持内部自治和自己的机构，即使这些机构由于奥斯曼帝廷的干涉在权力上受到限制；奥斯曼帝廷经过长期努力终于取得了控制更严的宗主权，但所
采取的形式却是政治统治，而不是象早已在巴尔 155
干半岛诸国实行的并将在匈牙利大部分领土上发生的那样的直接统治。

罗马尼亚诸国得以保持自治是由政治和经济上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罗马尼亚人民的丰功伟绩，他们在一些无畏的勇士、天才的政治家和将领的领导下，屡次大败怀着争霸之心深

入罗马尼亚国土的土耳其军。在洪尼多阿拉的扬库、弗拉德·采佩什、大什特凡、帕维尔·基内祖、阿富马茨的拉杜等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胜利，是那些曾怀有争霸之心并可能制定占领计划的人所不能抹煞的。在特兰西瓦尼亚，则还有土耳其—哈布斯堡争霸这个国家的明争暗斗。土耳其直接统治特兰西瓦尼亚势必引起居民的极大不满，从而可能为早就伺机实现其旧梦的维也纳宫廷所利用。再则，三个罗马尼亚国家的某些经济利益也使土耳人权衡得失：尊重罗马尼亚三国的自治较之帝廷直接治理和经营，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土耳其人对农产品、牲畜和畜产品供应的贪欲。

特兰西瓦尼亚的自治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保持一个通向中欧、通向哈布斯堡帝国的桥头堡，野心勃勃的苏里曼一世苏丹占领了匈牙利首都布达（1541年8月29日），把匈牙利中部和南部变成一个土耳其巴夏辖区，统治长达一个半世纪。被哈布斯堡占领的匈牙利北部纳入奥地利帝国版图。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巴纳特以及归入“帕尔蒂乌姆”的西部诸郡（克

里沙纳和马拉穆列什)组成一个自治公国。

具有新组织体制形式的特兰西瓦尼亚始终保持了内部自治及其政治、法律、军事和宗教机构。奥斯曼的统治以及岁贡(哈拉吉)、礼品(佩什凯什)、谷物、牲畜、军援等一连串义务,无疑是特兰西瓦尼亚自由发展中的消极因素。但是,由于其经济、地理位置,也就是说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由于居民的反抗,土耳其人被迫承认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公国较诸其他藩国拥有较优惠的待遇、较多的自由、较少的义务、较轻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因此,特兰西瓦尼亚能够组织自己的自治机构,在更大程度上发展了与喀尔巴阡山以南和以东的两个罗马尼亚国家的多方面的关系,在欧洲政治中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参加各种各样的同盟,其中有些甚至是直接针对奥斯曼帝廷的。这种情况,对从特兰西瓦尼亚以及与特兰西瓦尼亚往往互为支援的其他两个罗马尼亚国家的历史发展前景来看,毫无疑问是一个积极因素。

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组织 156

约翰·扎波利亚总督死后(1540年),土耳

其一哈布斯堡争霸特兰西瓦尼亚的斗争以土耳其人获胜而告终。土耳其人承认约翰·扎波利亚的幼子约翰·西吉斯孟的统治，由他母亲伊莎贝拉摄政。1541年秋和翌年冬、春的国会决议奠定了公国的政治一行政组织基础。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包括原总督辖区的诸郡、州和区（萨克逊人和塞凯伊人的），包括"帕尔蒂乌姆"杜卡特及其诸郡(萨土一马雷、克拉斯纳、外萨尔诺克、中萨尔诺克、比霍尔、扎兰德、阿拉德和马拉穆列什)。

公国首脑是由国会选举，并经奥斯曼帝廷以国事诏(阿特纳美)批准的大公。奥斯曼帝廷如不中意国会选举出来的人，就拒绝予以批准，并对另行改选施加影响。大公在理论上被授予内政、外交、行政、法律、赋税、军事和宗教等主权。实际上，大公的主权往往因奥斯曼帝廷的干涉而被削弱。

大公从由十二名大臣组成的内阁会议（consilium）的大贵族中挑选亲密合作者。据1437年秋的规定，该会议的十二名大臣中，每个"民族"，亦即贵族、萨克逊人和塞凯伊人各四人。

国会无非是总督辖区后期的贵族评议会的发展，决定普遍性的重大问题。这个"代议制"议会

由上述三“民族”的代表，“被接受的”(被承认的)四种教派——天主教、路德派、加尔文派和一神教派的代表，一些重要城堡和城市的代表，公室私人代表(以“尊王学说”聚合起来的保皇派)组成。因此，国会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的议会，其组成者仅仅是各郡的贵族代表(郡守和两名贵族)、塞凯伊人区和萨克逊人区代表(每区各两人)、城市贵族代表(九个城市和十四个镇)、城堡的代表(十个王室城堡的司令)和若干大臣。总数约计一百五十人，通常每年集会一次，必要时次数可增多。这个“代议制”议会的阶级性还表现为，构成居民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一名代表，也没有任何一名被排除在特兰西瓦尼亚“制宪民族”之外的罗马尼亚族代表。

除了其他两个罗马尼亚国家固有的特点以外，特兰西瓦尼亚的政治史还有一个特点，亦即奥斯曼帝廷和哈布斯堡争霸特兰西瓦尼亚。亲土耳其派和亲日耳曼派两派之间的斗争充斥约翰·西吉斯孟大公和他母亲伊莎贝拉的整个朝代。特兰西瓦尼亚的真正统治者、僧侣首相格奥尔基·马尔蒂努齐故意把水搅混。在他的帮助下，特兰西

瓦尼亚于1551年也沦于哈布斯堡的统治之下，为时五年之久。大公及其母亲被迫流亡波兰。马尔蒂努齐由于搞其他阴谋被哈布斯堡废黜。在罗马尼亚国的善人珀特拉什库和摩尔多瓦的亚历山德鲁·勒普什涅努这两个罗马尼亚君主的帮助下，
157 出奔的大公复登特兰西瓦尼亚君位。但是混乱仍在继续，终于迫使他不得不把称为“帕尔蒂乌姆”的西北部领土割让给哈布斯堡人。

巴托里家族

为了结束这种局势，苏丹于1571年决定选择什特凡·巴托里为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巴托里在较大程度上恢复了中央政权的权力。尤其是在他也被选为波兰国王(1575年)后，更是大权在握。作为同土耳其人合作政策的信徒，巴托里把岁贡增至一万五千金币，而他的反俄战争给下层人民带来了严重后果。

他的侄子和继承人西吉斯孟·巴托里继承了伯父的政策。当以“基督教同盟”的名称闻世的反奥斯曼同盟形成时，西吉斯孟·巴托里倾向于这个同盟，但仍未放弃与奥斯曼帝廷的联系。

勇士米哈伊朝的罗马尼亚诸国

十六世纪末的国际局势

此时的国际舞台由奥斯曼、哈布斯堡和波兰三强的扩张主义倾向控制着。奥斯曼帝国虽然在苏里曼一世死后(1566年)经历了某种危机,但仍拥有保持其在东南欧的统治乃至试图进行新的征服的实力。哈布斯堡人由于向西扩张受到法国的阻碍,向东扩张受到波兰的阻碍,越来越贪婪地把目光投向东南部,但这里又同土耳其人发生冲突。波兰也对罗马尼亚诸国,特别是对被它占领了大量领土的乌克兰推行同样的扩张主义政策,尤其是在波兰—立陶宛统一王国建立后(1561年)。

“基督教同盟”。为了实现其扩张主义的目的,并阻挡土耳其人的扩张,哈布斯堡人充当了有西班牙、威尼斯和教廷参加的反奥斯曼同盟的发起人。勒庞托一战(1571年)胜利后,同盟大受鼓舞。在“基督教同盟”的名称下,原来的同盟扩大了成员,又有托斯卡纳、曼都亚、菲拉拉等意

大利公国参加。罗马尼亚诸国当然被看作十分珍贵的伙伴，所以“基督教同盟”要竭力拉它们入盟。

勇士米哈伊朝的开始

欧洲的局势有利于罗马尼亚诸国争取独立的斗争。特兰西瓦尼亚大公西吉斯孟·巴托里虽然期望独立，但因软弱无能和优柔寡断而无力实现。摩尔多瓦君主阿隆—伏德也期望独立，但地主阻碍他采取行动。罗马尼亚国君主——恶棍亚历山德鲁甘当奴才，对奥斯曼帝廷俯首贴耳。部分地主起而反对这种奴性政策，准备拥立善人珀特拉什库的私生子，当时已饱经宦途，官居宰辅（克拉约瓦巴恩）的米哈伊为君。君士坦丁堡的米哈伊·康塔库齐诺领导的一个反奥斯曼的重要政治团体以及提诺佛教长狄奥尼西·拉利支持米哈伊登位。为了取得多瑙河地区的平静和保障给养，奥斯曼帝廷任命米哈伊为罗马尼亚国君主（1593年）。

反奥斯曼战争与罗马尼亚国赢得独立

战争的开始

在反奥斯曼的地主支持下，在奔走于罗马尼亚诸国的“基督教同盟”密使的鼓动下，米哈伊于1594年11月举起了斗争大旗。首先杀死了布加勒斯特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土耳其的以及东方的放债者，接着击溃了驻在首都的一支土耳其部队，然后进攻土耳其人占领的多瑙河两岸诸城堡。摩尔多瓦君主效法米哈伊的榜样，攻克了黑海和多瑙河沿岸其他城堡。

阿尔巴—尤利亚条约

面临着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总起义的威胁，并失去了罗马尼亚诸国提供的给养的奥斯曼帝廷，决定对造反者进行强烈的干涉。为了避免临时措手不及，米哈伊谋求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的支援。一个由这个国家的大主教、主教和地主集团的代表组成的蒙特尼亚使团派往阿尔巴—尤利亚签订盟约。但地主们违背了大公的训令，缔结了一个使

米哈伊屈辱的条约（1595年5月10日，旧历20日）。根据这个条约，罗马尼亚国君主变成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的一名普通代理人，治国大权落到十二名大地主手里，地主的特权扩大了。

西吉斯孟·巴托里自封为“达契亚”的领袖，废黜阿隆—伏德，以什特凡·勒兹万取而代之，并与之缔结了一个同蒙特尼亚地主签订的5月条约相似的条约。

159 克卢格雷尼之役

处于危急境地的米哈伊被迫承认阿尔巴—尤利亚条约，但决定永不践约。这是在当时险恶环境下的唯一办法。此刻，一支强大的土耳其军正准备渡过多瑙河，但他所能举以抵抗的只有约一万五千人和由阿尔贝特·基拉伊指挥的一支阿尔迪亚尔援军。罗马尼亚君主率这些人马在克尔尼什特河流入涅日洛夫河处——克卢格雷尼迎击由著名的辛南—巴夏指挥的土耳其大队人马。1595年8月13日（23日）在这里发生了值得纪念的战役，取得了罗马尼亚人民历史上的辉煌胜利。大批敌人葬身于涅日洛夫河的沼泽中。

驰援而至的土耳其新军迫使米哈伊退至山区，等待西吉斯孟·巴托里的进一步援助。辛南占领了布加勒斯特，企图把这个国家变为巴夏辖区。他任命了布加勒斯特、特尔戈维什特的土耳其人执政官以及各村村长。

米哈伊重整旗鼓，并得到西吉斯孟·巴托里和什特凡·勒兹万的援助，进军解放祖国。在解放特尔戈维什特后，又跟踪追击土耳其人至朱尔朱。奥斯曼军在渡多瑙河时大部分葬身巨浪。米哈伊攻克朱尔朱堡〔1595年10月20日、(30日)〕。

罗马尼亚国独立的巩固

辉煌的胜利使凯旋者誉满全欧，被推崇为“当今最勇敢、最强大、最英明的大公之一”。这次胜利同时也带来了国家的独立。米哈伊还被视为整个巴尔干半岛反奥斯曼力量的代表和领袖。在他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除罗马尼亚人以外，还有塞凯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罗马尼亚国赢得东南欧所有反土耳其党派的支持和赞赏。

业已取得的独立必须巩固。1596年，土耳其人派遣鞑靼人部落屡犯罗马尼亚国，均被击退。罗马尼亚君主渡过多瑙河，支援南岸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斗争。

由于哈布斯堡人和阿尔迪亚尔人的背弃，而在摩尔多瓦当政的又是波兰人拥立、得到奥斯曼帝廷同意的耶雷米亚·莫维勒，米哈伊不得不同土耳其人言和。土耳其人迫不及待授与权杖，稍后进而又缔结了和约（1598年）。

米哈伊深知地主武装的不堪信任，并意识到以近代枪械进行战争的新方法的重要意义，极力设法筹建一支自己的军队，出钱招募哥萨克人、塞凯伊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等。同时还组织了骑兵部队、“紫衣军”部队以及由勇敢的巴巴·诺瓦克指挥的“步兵”部队（“德勒班茨”）和多瑙河南岸志愿的雇佣兵部队。

160 同时，一方面为了促使支持加强君权措施的地主进一步效忠，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地主和朝廷的农民什一税收入，并通过农民进一步的固定状态获得必要的兵员，米哈伊取消了农民自由迁移的权利，颁布命令把他们固定在份地上（1595—

1596年)。米哈伊的"固定令"把根据契约住在地主庄园上的农民和在"固定令"颁布时住在地主庄园上的农民与"固定的农奴(鲁门)"等同起来,把他们转化为农奴,从而可以任地主随意赠送、交换、出卖。这一措施规定农民"住在哪里,就在那里住下,当一辈子农奴",结果使农民受到严重打击。由于"固定令"而引起的运动削弱了米哈伊的统治。

同时为了增加土耳其人的困难,米哈伊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巴尔干各族人民保持着联系,鼓动他们起义。巴尔干各族人民也在罗马尼亚君主的胜利鼓舞下,加强了反奥斯曼活动,象期待解放者一样期待着米哈伊。君士坦丁堡教长,提诺佛主教狄奥尼西·拉里—巴略奥把他引为知己。这样,米哈伊就成了巴尔干各族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代表和领袖。通过巴尔干人民,米哈伊也同哈布斯堡人实现了接近,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得维持军队开支的财政援助。

罗马尼亚诸国的政治统一

米哈伊和哈布斯堡人于特尔戈维什特缔约

（1598年6月）是势在必然，因为波兰首相约翰·扎莫伊斯基和耶雷米亚·莫维勒对米哈伊虎视眈眈，至于对那个两度逊位、自身难保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公，不堪信任。尤其不能信任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的继承人、红衣主教安德烈·巴托里，因为他在波兰首相支持下，谋图把米哈伊赶下台，让摩尔多瓦君主的兄弟西蒙·莫维勒取而代之。

统一特兰西瓦尼亚及巩固统一的措施

要摆脱这种包围，仅仅保障罗马尼亚国的独立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征服罗马尼亚三国，以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体系。米哈伊将此计划通知了鲁道尔夫二世皇帝，但未等其答复，便开始了行动。

军队在普洛耶什蒂兵营宣誓效忠后，米哈伊便下令一部分军队在布泽斯库家族指挥下沿布泽乌河谷进入特兰西瓦尼亚，另一部分则由君主亲
161 自统率，越过奥尔特河谷。在锡比乌附近的特尔马契，总数约两万人的两支军队会师。

1599年10月18日（28日），在锡比乌附近的舍林伯尔发生战斗。同米哈伊一伏德并肩作战的，

还有约两千名塞凯伊人,由莫伊舍·赛凯伊统率。这一仗的胜利使蒙特尼亚君主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主宰，这是农民尤其是对自己本族人的朝廷抱信任态度的罗马尼亚农民殷切期望的，他们普遍动员起来给予间接支援。沿途节节胜利，米哈伊于11月1日在特兰西瓦尼亚首都阿尔巴—尤利亚举行了盛大的人城式。

在贵族宣誓后,米哈伊召开国会,迫使贵族承认新局面并拿出国家所必需的金钱。为了取得贵族的合作，这个统治两个罗马尼亚国家的君主保留了原来的政体。他保留了国会，但其成员除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外,加进了蒙特尼亚地主,由特奥多西·鲁迪亚努兼任两国的掌玺大臣。这些措施说明米哈伊在政治上进行了统一并把罗马尼亚的行政体制逐步引入特兰西瓦尼亚的计划。蒙特尼亚地主出席11月末于阿尔巴—尤利亚召开的承认米哈伊为大公的国会；米哈伊把特兰西瓦尼亚的庄园赏赐给某些蒙特尼亚地主；任命他的亲信(也是蒙特尼亚人)为主要城堡的司令和一些城市的首席法官；以罗马尼亚语发布命令，等等，莫不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统一摩尔多瓦

诚如所料，这一伟大事业的实现引起了扎莫伊斯基和耶雷米亚·莫维勒的敌视，惹起眼见自己统治特兰西瓦尼亚计划成为泡影的维也纳宫廷的嫉妒。扎莫伊斯基、耶雷米亚、鲁道尔夫及其驻特兰西瓦尼亚的将军格奥尔基·巴斯塔的种种阴谋，迫使米哈伊以比敌人预料更快的速度实施其攻占第三国摩尔多瓦并使之同其他两国统一的大胆计划。

1600年5月初，两支军队越过喀尔巴阡山，一支由米哈伊亲自统率，出奥伊图兹隘口，另一支由塞尔维亚勇士巴巴·诺瓦克指挥，经罗德纳。两个星期后，苏恰瓦归顺，又过一个星期，整个摩尔多瓦降服。“如果说在世界上曾经有一个因其英雄业绩而值得赞美的大公，那么他就是罗马尼亚国大公米哈伊殿下”，他的同时代人这样评述罗马尼亚君主在当时环境下的业绩。

三个罗马尼亚国家首次统一在同一政权下。米哈伊在发往雅西的诏书中当之无愧地冠以“罗马尼亚国、阿尔迪亚尔和摩尔多瓦君主”的称号，

他的宝玺也概括了统一的三个罗马尼亚国家国徽。米哈伊以铿锵有力的词句表达的想法业已实现:"朕所梦寐以求者乃阿尔迪亚尔的疆界、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巩固统一的措施也在摩尔多瓦提出,但由于四面受敌而未能付诸实现。

米哈伊统治的危机 162

罗马尼亚三国的统一和米哈伊权力的加强,无论对特兰西瓦尼亚贵族还是对摩尔多瓦地主都是不合心意的,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特权和在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竭力破坏这位伟大的君主的事业。对于觊觎着罗马尼亚三国统治权的哈布斯堡人和波兰封建主,对于眼见其统治罗马尼亚诸国的计划落空的奥斯曼帝廷来说,一个强盛的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和建立也是不合他们心愿的。所有这些人都联合起来反对罗马尼亚君主。

阿尔迪亚尔贵族趁米哈伊不在特兰西瓦尼亚而在摩尔多瓦之机,准备叛乱。米哈伊匆忙赶回特兰西瓦尼亚,发觉了紧张局势。贵族抗拒原定

于1600年9月1日在塞贝什召开国会的诏令，而在什特凡·恰基领导下聚会于图尔达，并与巴斯塔取得协议，向奥地利皇帝宣誓效忠，尽管他们对他毫无好感。

米哈伊集结军队，准备扑灭贵族叛乱。1600年9月18日，在阿尤德附近的米勒斯勒乌爆发了同巴斯塔结盟的贵族与米哈伊之间的战斗。米哈伊被诱入埋伏，战斗失利。他退向弗格拉什，以期重整旗鼓，与特兰西瓦尼亚叛乱者再度较量。

危亡关头

与阿尔迪亚尔贵族叛乱同时，波兰人同耶雷米亚·莫维勒深入摩尔多瓦。由此继续向罗马尼亚国进军，以拥立西蒙·莫维勒。米哈伊急速越过喀尔巴阡山，以阻挡波兰人的行动。但他的数量微小的军队首败于布科夫，再败于阿尔杰什宫堡（1600年11月末）。

在其亲随伴同下，米哈伊出奔维也纳，希望得到鲁道尔夫皇帝的援助。当时在布拉格的鲁道尔夫皇帝起初表现出可疑的冷漠态度。但当从特兰西瓦尼亚传来关于贵族叛乱反对皇帝的代表，并

对米哈伊的部下加以镇压（其中巴巴·诺瓦克在克鲁日受火刑）的消息时，鲁道尔夫改变了态度。

再度为罗马尼亚三国的独立和统一而奋斗

正当米哈伊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等待已经许诺的援助时，在罗马尼亚国，以布泽斯库家族为首的忠于他的地主于1601年夏终于赶走了西蒙·莫维勒和波兰军队。在通知米哈伊后，他们建立了王室摄政府，组织国防事务。

在罗马尼亚国事件的鼓舞下，米哈伊违心地 163
接受了鲁道尔夫皇帝提出的与巴斯塔合作，征服特兰西瓦尼亚的要求。战事发生于1601年8月3日(13日)，在泽拉乌附近的古鲁斯勒乌。西吉斯孟·巴托里的军队败北，米哈伊再度成为罗马尼亚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君主。

罗马尼亚君主的英勇善战再度得到证明，为其在欧洲赢得了新的声誉，但越来越勾起巴斯塔的仇恨。米哈伊重新统一罗马尼亚诸国的计划也

惹起了奥地利皇帝的猜嫉。在皇帝的默许下，巴斯塔准备对米哈伊进行卑鄙的暗杀，1601年8月9日（公历19日）早晨，他的部下终于在图尔达附近下了毒手。

米哈伊朝的意义

勇士米哈伊朝虽然只有短短八年，但从其所完成的全部业绩来看，无论对于当时还是以后几个世纪，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罗马尼亚人民的两大愿望正在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罗马尼亚人居住的全部领土的政治统一。两者均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赢得独立，除一般的政治意义外，对十七世纪罗马尼亚诸国与奥斯曼帝廷的关系产生了有利的后果。政治统一也成为以后三个多世纪里统一倾向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支柱。勇士米哈伊与东南欧各族人民在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结成了共同阵线，这个阵线不同于追随扩张主义目的的西方的“基督教同盟”。勇士米哈伊的业绩最终成了进行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斗争的爱国力量的榜样和激励。

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文化

十六世纪下半期，罗马尼亚诸国经历了重大变革，无暇大力倡导文化创作。但在宗教改革和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各种潮流的推动下，罗马尼亚诸国的文化创作毕竟克服了这些障碍，在体裁上趋于完备。

学　校

在急于传布自己学说的各种改革潮流的推动下，以十六世纪前半期布拉索夫的学校为榜样，十六世纪后半期创建了各教派的城市学校，如锡比 164
乌、比斯特里察和锡吉什瓦拉的路德派学校，克鲁日、特尔古—穆列什、阿尔巴—尤利亚、奥拉迪亚等城的新教学校，卡兰塞贝什、哈采格和卢戈日的罗马尼亚学校。

在摩尔多瓦，暴君—伏德怀着同样目的，于1562年在科特纳里创建了一所相当于古典中学的拉丁语学校，聘请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就教。

反之，反改革运动也试图通过学校摈斥改革，

传播天主教。为此，于1581年在克鲁日创立了一所包括神学、哲学和法学三个系的耶稣会大学，开办了二十年。

印　　刷

除了学校以外，印刷的书籍被赋予同样的使命。除特尔戈维什特、锡比乌和布拉索夫原有的印刷所外，十六世纪中叶在克鲁日又创办了一个印刷所，至该世纪下半期，在阿尔巴—尤利亚、奥拉迪亚、奥勒什蒂耶也纷纷创建。正教助祭科雷西先后在特尔戈维什特和布拉索夫两地从事的印刷活动，对于在罗马尼亚人中间传播书籍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编纂学

十六世纪前半期的编年史家马伽里的门徒埃夫蒂米和阿扎里完全继承师道。奉亚历山德鲁·勒普什涅努之命，埃夫蒂米编写了一部摩尔多瓦的《记事》，叙述1541—1554年间的事件，阿扎里又将该书续至1574年。

在罗马尼亚国，出现了地主门阀编年纪，以

《康塔库齐诺家族纪事》为名辑录成册。勇士米哈伊朝引起那个时代学者们的兴趣，撰写巨册编年史，是完全理所当然的。掌玺大臣特奥多西·鲁迪亚努编写了一部官方编年史，而布泽斯库家族的一个家臣则撰写了另一部门阀编年史。这个罗马尼亚君主的两个亲信，希腊人斯塔弗里诺斯和帕拉梅德则是希腊文的韵文编年史的作者。

写于特兰西瓦尼亚的许多历史性著作具有人文主义色彩，如记述多扎起义时期各种事件的塞巴斯蒂安·蒂诺迪的《编年史》。曾经当过科特纳里学校校长的约翰·索梅尔在定居布拉索夫后，在两部著作中叙述了暴君一伏德生平。此时，以加斯帕尔·赫尔泰、扬·赛凯伊、塞巴斯蒂安·博尔索斯的编年史为开始，产生了城市历史编纂学。萨克逊人的历史编纂学也在这时出现，诸如耶罗尼姆·奥斯特尔马耶尔的《历史》和米哈伊尔·西格勒尔的《年表》。

科学著作 165

出现了彼得·梅利乌斯·尤哈斯的植物标本集，格奥尔基·伦切斯的医学教科书，约翰·西尔

韦斯特尔和瓦伦廷·瓦格纳的语法，洪特鲁斯和赖歇尔斯道弗尔的地理学和地志学。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罗马尼亚诸国

东欧和东南欧形势

这一个世纪，整个欧洲社会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变革。但这些变革不是千篇一律和同时发生的。当西欧和中欧诸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确实艰难但又不停顿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时，在东欧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以农奴的强制劳动为基础的封建领地。当大陆西部通过剥夺农民的份地来发展资本主义关系时，其东部却为了强迫农民服苛重的徭役或劳役，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当在欧洲西部国家中央集权过程和民族形成过程普遍发生之时，在东欧作为贵族制度表现的分散状态和封建割据则是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当西欧形成民族国家之时，在东欧却仍保持着各族人民受奴役的多民族帝国。

十七世纪前半期，欧洲政治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这次战争披着宗教的外衣（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间的斗争），却追求明显的政治目的，在东欧，包括参加这次战争的特兰西瓦尼亚在内，同样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三十年战争事实上是法国统率下的各族人民的广泛的反哈布斯堡同盟。

与此同时，在包括罗马尼亚三国在内的欧洲东部，土波战争和波俄战争留下了显而易见的后果。

由于向西欧扩张受挫，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政体在以威斯特法里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后，把目光转向东南欧，挑起了同奥斯曼帝国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奥波同盟把土耳其人逐出维也纳（1683年），这意味着奥地利占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开始，这种占领由卡洛维兹和约（1699年）确认。

就在缔结威斯特发利亚和约的当年，在东欧开始了从波兰统治下解放乌克兰的战争。战争以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告终。十七世纪下半期，俄罗斯的崛起改变了东欧的均势。十七世纪六十年代

166 开始的、以1700年的君士坦丁堡和约结束的俄国解放西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反奥斯曼帝国战争，燃起了奥斯曼帝廷奴役下的各族人民——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解放的希望。他们越来越倾向蒸蒸日上的俄罗斯。

奥斯曼对罗马尼亚诸国的统治制度

经 济 制 度

十七世纪，奥斯曼对罗马尼亚诸国的统治较诸勇士米哈伊在位期间的情况略有减轻，这乍看似乎是奇谈怪论，但实际是事出有因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奥斯曼帝廷不希望十六世纪最后十年间的事件重演，何况奥斯曼帝国的境况也大不如前稳固。

岁贡　礼品

勇士米哈伊朝后，罗马尼亚国的岁贡（哈拉吉）规定为三万二千金币，也就是说等于米哈伊登位时所纳数目的20％。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哈

拉吉只上升了一万金币。在摩尔多瓦，情况相似，变化比罗马尼亚国更微。在特兰西瓦尼亚，哈拉吉甚至一度暂免，直至十七世纪中叶仍保持最初数目，即一万金币。

从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起，哈拉吉在罗马尼亚三国均猛增，但在以后整个世纪中又保持相对稳定。

礼品(佩什凯什)也保持低水平，在罗马尼亚国约为哈拉吉价值的25—30%，在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略高。但君士坦丁堡当权者借各种机会巧立名目的礼品(佩什凯什)或朝贺愈益苛重，而且均无定额。

为取得君位而进献的贡金就更大，其数目多寡取决于争位者和帝廷某些大官僚的贪财程度。从十六世纪下半期始，又设每年或每三年一次的君主续位的贡金，称为穆卡雷尔，每年一次的数目较小，三年一次则较大。

穷兵黩武要求越来越大量的农产品，这类供应工作在十七世纪日益增长，此时奥斯曼帝国在亚洲和欧洲发动了一系列不断的战争。出于同样原因，保障帝国农产品给养的商业垄断也日趋

加强。

167 政治制度

虽然罗马尼亚诸国仍保持着内部自治，但土耳其人对政治生活的干涉越来越层出不穷。君主和大公直接由帝廷任命，很少例外。君主更迭十分频繁，其目的是不让朝廷巩固。在十七世纪，摩尔多瓦每朝的平均寿命仅约两年半，在罗马尼亚国是四年半，在特兰西瓦尼亚则稍长，约为六年。

君主和大公受到定期派来的奥斯曼官吏的经常性监视，或者被召至帝廷，往往给予屈辱性的待遇。帝廷还通过国政会议对罗马尼亚诸国的君主和内政、外交进行控制，越来越多的帝廷亲信——希腊人和东方人打进这一机构。

罗马尼亚诸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奥斯曼统治象不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实行的任何外国统治一样，对罗马尼亚诸国的正常发展，无疑是一种障碍。从经济观点看，土耳其人

所关心的是罗马尼亚诸国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因为大部分国家财富流向君士坦丁堡。但在地主和土耳其统治加强的条件下，居民不会有加紧生产的积极性。有时，出于同样的原因，地下资源也得不到开发。

农业和畜牧业

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主要由于土壤肥沃而取得一定的发展。十七世纪，除原有作物外，还种植了新的作物，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玉米。文献提到首先种植玉米的是特兰西瓦尼亚，于十七世纪初，至该世纪下半期传至其他两个罗马尼亚国家。葡萄栽培获得了可观的发展，因为葡萄产品不在土耳其人垄断之列，《可兰经》禁止他们饮酒(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人不喝酒)。果树栽培和蔬菜种植由于可以免征什一税和逃避土耳其人的勒索，也有所发展。无论在封建领地或者农民份地上，新耕地都种上了葡萄和果树。象前几个世纪一样，从数量、品种和在国内外市场销路来看，牲畜此时仍然是国家的最重要的财富之一。公牛、奶牛、马、绵羊和猪，几乎每户不缺。封建主阶级

成员的家庭拥有的牲畜头数较多，质量也好，但农户，特别是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自耕农户也不乏其有。

168 采矿，手工业和手工工场

对于原料的需要须住了土耳其人掌握矿石的危险。因此十七世纪在罗马尼亚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存在着铁矿开采业，前者主要在巴亚—德—菲耶尔，后者则在洪尼多阿拉和巴纳特的许多地区，在图尔达附近的里米蒂亚、丘克的伯兰等地。赤铜矿的开采在罗马尼亚国有巴亚—德—阿拉默，在特兰西瓦尼亚则以西山开采贵金属的相同地点为主，另外还有巴亚—马雷、罗德纳等地。同样在这些地方还开采水银。

矿石开采分两类，一种是民营的，用原始工具在地面坑道开采，一种是国家或朝廷官办的，用较先进的技术在深层坑道采掘。同采矿相联系，在巴亚—德—菲耶尔、巴亚—德—阿拉默、洪尼多阿拉和巴纳特还发展了熔炼作坊。

盐矿是我国一大资源。除原有盐矿（奥克内列—马里和奥克纳—米克）外，在罗马尼亚国此时又

开发了斯勒尼克盐矿，在摩尔多瓦开采了特尔古—特罗图什(或称特尔古—奥克纳)盐矿，在特兰西瓦尼亚，除已开采了几个世纪的老矿(图尔达，德日，锡比乌，科日奥克纳)外，马拉穆列什的盐矿得到很大发展。罗马尼亚诸国的食盐生产远远超过了国内需要，大量向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出口。

在矿山、熔炼作坊和盐矿中工作的有享受某些豁免权的本地居民，也有雇佣的外国工人。

一则由于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增长而增长的需要，再则由于有所需的原料，手工业也有相当发展。当时的生产总量、越来越细的专业化、手工业者人数的增长、手工业者组成行会及其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当时所使用的技术等等，均是这种发展的证明。

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些手工业产品（毛料、武器、奢侈品等）外销至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国和匈牙利。例如，加工皮革的匠人分成许多行业或分支，有硝皮匠、靴匠、皮鞋匠、鞋匠或皮匠、鞋底匠、皮袄匠、皮毛匠、皮带匠、皮手套匠、皮背囊匠、拖鞋匠等。十七世纪初特兰西瓦尼亚调整手工业产品价格的措施中，列人了五十一种皮带匠产品，三

十八种车匠产品，二十六种裁缝产品。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匠人组成以长老(或总管)为首的行会(或同业工会)，不仅在大城市中，而且在小城市乃至集镇中也是如此。较富裕的匠人在城市领导中起重要作用，充任法官、陪审员、市长。

社会需要和技术进步使人们，除以老板为主、工匠和学徒为辅的普通手工业作坊之外，还有可能组织一些具有初期手工业工场性质的较发达的作坊。这些作坊是朝廷或大公的财产，诸如特尔戈维什特附近和波鲁姆巴库—德—苏斯(弗格拉什)的玻璃作坊、奥克内列—马里附近的造纸磨坊、阿尔巴—尤利亚的铸炮作坊。

169 商业与城市的发展

大量的生产和城乡居民的需要推动着活跃的国内商业、转口和对外贸易，大力促进了市场的发展。本地的或外地乃至外国的产品供应着常年经营的商店、星期集市和每年一度的庙会。产品交换已几乎完全不经生产者之手，而由商人独营，从而为这个阶层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

保护自己的利益，商人仿照匠人的例子组织“商会”(锡比乌、布拉索夫、阿尔巴—尤利亚、克鲁日等地)。象以往和以后几个世纪一样，罗马尼亚三个国家间的商业交往最为活跃。产品和商人往返于三国之间，络绎不绝。

商品生产及其交换、行政管理和文化的需要导致城市发展，特别是在人口方面。首先是两个首都——布加勒斯特和雅西。根据十分矛盾的材料平衡估计，两城的人口大约相等，可能至十七世纪下半期发展到约五至六万居民。故都——特尔戈维什特和苏恰瓦在人口上仍保持着自己的重要性，估计约有两万居民。其他城市则居民人数较寡，有些与其说是城市，毋宁说是集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社会结构

封建领地是十七世纪存在于东欧十分广阔的地理—政治领域中的一种现实。它通过强占自由农的土地而发展，正如通过侵吞农奴份地扩大封建保留地一样。

土地所有制结构中的这些改变对社会结构产生显著的后果。一小部分地主或贵族越来越富，独占着中央和地方的官职，而其绝大部分则停滞不前乃至日趋衰落。

自由农——小农、自耕农、村社农、客户——不仅在数量上下降，而且在社会经济地位上也遭削弱。由于无力应付日益繁重的苛捐杂税，自由农被迫出卖祖传土地，从而队伍日减。同时，依附农——农奴、佃农、贫农，由于一大部分自由农的受奴役，队伍日趋庞大，一方面根据经济地位的不同，分化为不同阶层，另一方面则由于份地的缩小，愈益贫困。

罗马尼亚诸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与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描绘的德国东部的情况十
170 分相似。贵族购买奢侈商品，“就要有钱。钱却只有农民能供给。于是就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更高的租额和力役，日益迫切地热心于再度将自由农民变成隶农，将隶农变成农奴，并且把共有的马克土地变做领主的土地。”①

①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0页。

农民的义务

上述社会经济变革也标志着农民义务演变的方向：农民对封建主和国家的义务不断加重。在三个罗马尼亚国家中，徭役或劳役普遍化并趋于加重的倾向是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不论徭役定额有否明确规定。在特兰西瓦尼亚，徭役由多扎起义扑灭后所固定的每周一天增至十七世纪的每周两天。在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对这种义务未作正式规定，而是要求农民去做主人要他做的事，而且要他做多少就得做多少。这是迪米特里·康特米尔在他那个时代就承认了的。他在《摩尔多瓦写实》中写道：农民"被迫为其主人无止境地服杂役；他们的劳动没有任何限度；它取决于主人的意愿"。作出定规的情况殊为罕见，而且也仅限局部地区。尤为甚者，徭役或劳役全部集中在一年的若干月份，主要是春季和夏季，这样，农奴的土地就无人耕作。

徭役或无偿劳动的增加并不导致其他义务的减少。相反，农民仍需交纳日益提高的全部农产品和小家畜什一税。

封建义务的第三个重要项目是货币地租或货币代役租。这在特兰西瓦尼亚较为普遍，其他两个罗马尼亚国家也有。

从各种产品中抽的礼品(贡品)以及所谓封建垄断(屠宰业、磨坊业、酒店业)是压在农奴肩上的其他负担。

自然,农民还对国家负有义务,这与农民对地主所负的义务相比,比重有所改变:劳役义务较少而货币税较多。在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在一个世纪中这类义务约由十八至二十种赋役增至六十种，其中四十多种是货币税。同一产品（如葡萄、大牲畜)需在不同名目下交纳三至四种捐税。

为了使地租有所保障,在国家的支持下,地主和贵族十分严酷地实施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国于上世纪颁布的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的法令。摩尔多瓦也在本世纪作出了这类决定（1612—1628 年)。

农民的反抗形式

奥斯曼统治及其镇压工具同朝廷和封建主阶级的镇压工具密切合作，是没有发生象十五至十

六世纪那样大规模运动的原因。但是,逃亡、越境避难、拒缴捐税等斗争形式日趋增多和加强。农民 171
的不满还十分频繁地在地主派系斗争以及地主与朝廷斗争时表现出来，农民幻想他们也会从这类冲突中得到好处。1655年爆发了大规模人民起义,其起因是马特伊·巴萨拉布朝末期(1654年)和康斯坦丁·舍尔班朝初年的政治动荡。

内部组织

十七世纪罗马尼亚诸国的内部组织具有贵族统治——大地主和官僚左右一切及其与奥斯曼帝廷的合作——的明显痕迹。这两股势力控制着国家的内政、外交、收支、君主的废立、行政、司法和军队的组织等等。

君主朝廷与公室

贵族和奥斯曼帝廷这两股势力为了便于统治,费尽心机使朝廷和公室不能稳固。因此,世袭继承制为帝廷任命或者“全国议会”(或国会)选举、帝廷批准制所代替。因而，君主更迭异常频

繁，能终位者仅少数例外（罗马尼亚国二十四名君主中仅二人，摩尔多瓦四十八人中仅五人，特兰西瓦尼亚十四人中仅四人）。

国政会议、内阁会议、全国议会与国会

大地主和贵族还通过国政会议（御前会议）和内阁会议来实行其对于君主或大公的控制。两者均由八至十二名大臣组成。有时，朝廷或公室权力较强（如马特伊·巴萨拉布和瓦西里·卢普或者加布里耶尔·贝特兰和格奥尔基一世·拉科齐时代），国政会议和内阁会议的作用就减弱。

体现特权阶层参政的另一种形式，则是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全国议会”，特兰西瓦尼亚的国会。它们是同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议制议会——各阶层会议，法国议会，德国议会，匈牙利国会，俄国重臣会议，波兰国民会议，西班牙和葡萄牙国会——相类似的机构。两者职能均是行政、立法、司法、税收并兼。参加“全国议会”的有僧侣、大地主、小地主和军队代表，参加国会的是僧侣、贵族、萨克逊人和塞凯伊人代表。

政治——行政组织 172

罗马尼亚诸国的行政区划仍保持前几个世纪的原样，即划为州、县、郡、府和区。特兰西瓦尼亚行政单位的首脑同样也维持原状。但州和县的首脑有所变动，他们不再称为知事或法官，而叫作州长和县长，两者皆拥有行政、税收和司法职权。

司法组织

在罗马尼亚三国占统治地位的贵族制亦日益强烈地反映于司法组织中。除农村法庭仍保持着“年高德望者”的判决外，其他一切司法机构均由贵族把持。僧俗地主的司法事务在贵族(或地主)和寺院领地内进行。州和县的朝廷法官、地方长官、边区总管、郡的贵族法官、区的塞凯伊人和萨克逊人法官的人数和权力日趋扩大。

在整个中世纪，比较突出地保持着固有的自治痕迹的弗格拉什国的罗马尼亚族各阶层居民都设有自己的低级法庭，由此可向弗格拉什的高等法庭申诉。司法准则见诸成文的有十六世纪的《弗格拉什国法令》和十七世纪中叶的《弗格拉什

国律令》。

在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最高司法机构是国政会议，在特兰西瓦尼亚则是内阁会议和国会。这些机构通常审理重大案件，下层人民很难企及。

此时仍然保留着古司法准则，但它们日益为汇集成法典的成文的准则所取代：诸如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训谕》，罗马尼亚国的《法律规范》，特兰西瓦尼亚的《律令审编》和《律令大全》。

中世纪的各种机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司法也不例外，甚至更加特出，统治阶级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袒护。

税收组织

国税的指线作为封建生产关系和奥斯曼统治关系的反映，不断上升，但偶尔也有所减轻，虽然这只是暂时现象。朝廷所关心的头等大事是觅求必要手段首先装满君主私库。为了不致使任何一个纳税人逃脱赋税，税吏越来越多，税收组织日臻完善。制订定期统计册（塞米）；零星税款合并成
173 总税款（鲁普托瓦雷），可以一次付清，也可分期付款。这种税制在十七世纪中叶试行，至该世纪末

和十八世纪初年臻于完善。

军队组织

军队直接反映作为奥斯曼帝廷藩臣的罗马尼亚诸国的法律地位。它的作用局限于镇压农民运动和保障课税等内部职能。外部职能微乎其微,主要限于参加奥斯曼所进行的战争。参加其他战事必须征得帝廷同意,否则以暴乱论处,将受严惩。

全军分为多支部队。禁军(在罗马尼亚国也称紫衣军,在特兰西瓦尼亚则称紫衣步兵)由农村小贵族或豁免国税义务的农民组成。也从自由农队伍中征募扈从队,有时给予薪金。雇佣军或职业军人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为谁能给予优越的待遇或者能保证他们获取较大收益(战利品),他们就为谁服务。

政治生活

贵族制的称霸

十七世纪在罗马尼亚三国是名副其实地结"党"营私的某些地主和贵族阶层称霸的时代。他

们侵吞庄园，兼并村落，废立君主。

勇士米哈伊被暗杀之后，罗马尼亚三国的政治生活呈现出尖锐的危机。在摩尔多瓦，莫维勒家族无非是贵族意志的执行者，他们本身是同古老的君主家族毫无联系的地主。在特兰西瓦尼亚，哈布斯堡人和当地贵族的斗争造成四分五裂的严重局面。在罗马尼亚国，真正的主宰是布泽斯库家族的地主们。三强的干涉也是这种政治上不稳定状态的原因。奥斯曼帝国对罗马尼亚三国均予插手；哈布斯堡帝国直接干预特兰西瓦尼亚，间接涉足罗马尼亚国；波兰则干预摩尔多瓦。

十七世纪头十年的诸朝

在罗马尼亚国，在有志继承勇士米哈伊政策的地主的帮助下，拉杜·舍尔班（1602—1611 年）终于取得朝廷的一定程度的稳定。在特兰西瓦尼亚，土耳其人支持的豪强贵族和其敌手哈布斯堡人之间的斗争延续了三年多，双方互有胜负。这种事态造成了紧张局势，甚至引起了特兰西瓦尼
174 亚和罗马尼亚国的战争。效忠于哈布斯堡皇帝政策的罗马尼亚国君主出兵特兰西瓦尼亚，在布拉

索夫附近一战告捷，从而促使哈布斯堡人在短期内暂时控制了这个国家。

在什特凡·博奇凯朝的短时期内，特兰西瓦尼亚局势得到某种程度的稳定，同罗马尼亚国的关系和睦，因为正如这个国家的编年史所描写的，拉杜·舍尔班“不喜争吵，也不喜愤怒，愿意同一切人和平相处”。

急功近利的加布里尔·巴托里执掌特兰西瓦尼亚朝政后（1606—1613年），和平再次遭到破坏。在大肆掠夺锡比乌和布拉索夫城的财富后（1610年），巴托里梦想先后再兼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大公，虽然在他登位时国会曾上言“与其他两个罗马尼亚国家保持睦邻关系”，但野心使他不自量力。他于1611年突然进攻罗马尼亚国，大肆洗劫，迫使舍尔班出奔摩尔多瓦。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准备向摩尔多瓦进军。但拉杜·舍尔班统率集结起来的军队在布拉索夫附近进袭巴托里，取得辉煌胜利(1611年)。

加布里尔·贝特兰及其同时代人

巴托里下台后，1601年的事件再度部分重

演。拉杜·舍尔班尽管曾效忠于哈布斯堡人，但没有得到他们的援助，而土耳其人则乘机将拉杜·米赫涅拥立为罗马尼亚国君主（1611年），什特凡·托姆沙为摩尔多瓦国君（1611年），两年后又把加布里尔·贝特兰拥上特兰西瓦尼亚君位。三个君主缔结了联盟条约，宣称臣服帝廷，立誓彼此“象兄弟一样相处，并至死互不相弃”。

在三个君主中，加布里尔·贝特兰无论在政治品质还是在经济才干和文化修养上都高出一筹。收回丧失的国库领地，实行有利于采矿、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建立一些国家垄断组织，——这一些措施不仅增加了国家收入，而且提高了这个得到一支组织较精的军队和从下层上来的新兴贵族支持的大公的权威。

在土耳其人支持下，贝特兰同参加反对哈布斯堡人战争的诸国新教君主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使特兰西瓦尼亚在欧洲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促使他站在反哈布斯堡阵营一边参加三十年战争的原因，不仅是他的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而且是他谋图成为匈牙利或波希米亚国王的野心。但他未能实现其计划，只得满足于对同哈布斯堡缔结的

和约所承认的西部七郡(帕尔蒂乌姆)的统治。

在二十年代同罗马尼亚国君主们恢复联系，燃起了贝特兰试图把罗马尼亚诸国统一在他辖治下的"达契亚王国"中的野心。尤其是因为当时的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君主是一些听任本地地主或居住在罗马尼亚诸国的希腊—东方人摆布的无能之辈。

贝特兰的计划未能成功，两国的朝廷也未能巩固。地主暴乱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接二连三，对沉重的苛捐杂税负担不满的人民群众也被吸引了进去。在摩尔多瓦，米隆·巴尔诺夫斯基 175
(1626—1629年)实施了若干有利于大地主和小地主的法令。其中就有1628年的固定令，规定1621年后从地主庄园逃跑的农民都强制押回原地，这就等于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

朝廷的不稳定加剧了生产者群众状况的恶化，而希腊人的深入，在政治生活中与本地地主竞相角逐。希腊僧侣和修道士剥削修道院产业肥私，希腊放债人侵吞最肥美的财源，希腊地主占据着高官显爵。因此，形成了一股由地主领导、得到所有不满者支持的广泛的反希腊人潮流。

在二十年代，尤其是三十年代初，在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爆发了一连串的反希腊人运动。居于这些运动前列的是大地主，如最初的卢普·梅赫丁齐亚努以及后来的马特伊将军(阿加)。为了平息不满，列昂—伏德于1631年颁布了一份内容含糊的诏书，使希腊人可以取得公民权并使他们强占的庄园合法化。运动一直延续至罗马尼亚国的马特伊·巴萨拉布将军(阿加)(1632—1654年)和摩尔多瓦的御前大臣瓦西里·卢普（1634—1653年）登上君位。

君权的巩固

马特伊·巴萨拉布、瓦西里·卢普和格奥尔基·拉科齐一世三朝

三个国君以不同方式登位：拉科齐（1630—1648年)由国会选举，马特伊·巴萨拉布由全国选举，瓦西里·卢普则由苏丹任命，他们都成功地巩固了朝廷。他们的支柱是封建主阶级，即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罗马尼亚国的本地地主和摩尔多瓦

的部分本地地主和希腊人。三人同时也都是靠加重赋税得到的巨产而建立自己的政权的。他们都期望加强自己的权力，扩大罗马尼亚三国的自治。为此，马特伊·巴萨拉布和格奥尔基·拉科齐试图在罗马尼亚三国间组织一个联邦性质的同盟，而瓦西里·卢普则依靠在君士坦丁堡有影响的希腊人撑腰。

这一政策始于1635年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国的联盟，盟约规定两个国君之间相互援助，力争哈布斯堡的支持。瓦西里·卢普则计划在奥斯曼帝廷支持下把他的统治扩展到其他两个国家，但野心超过了实力。

瓦西里·卢普征得土耳其人赞同，于1637年连续发动几仗，以拥立他儿子为罗马尼亚国君，但均无功而返。拉科齐也想从这些冲突中渔利，把自己的权力伸展至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但瓦西里·卢普终于赢得奥斯曼帝廷支持，被任命为罗马尼亚国君，他的儿子伊昂被任命为摩尔多瓦国君。实际上，瓦西里·卢普统辖了两国，因此他
甚至给自己冠以“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君主”的 176
称号。但马特伊·巴萨拉布在奥若杰尼和内尼肖

里之间的普拉霍瓦河上一战告捷(1639 年)，使这些计划的具体实践化为泡影。

由于双方都自知没有什么希望能实施这类计划，马特伊·巴萨拉布和瓦西里·卢普终于在1644 年达成和议。但当时正忙于三十年战争的拉科齐没有参加。

波兰国王弗拉第斯拉夫四世想利用这种形势，发起成立有罗马尼亚三国、威尼斯、甚至哈布斯堡人参加的反奥斯曼同盟。被称为“整个东方的将军”的马特伊·巴萨拉布将在其中扮演主角。这个计划未能具体实现是由于这样一些外部情况：波兰国会拒绝支持计划，哈布斯堡人和拉科齐正忙于签订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和约，而在乌克兰爆发了由哥萨克首领(盖特曼)博格丹·赫米尔尼茨基领导的挣脱波兰统治的解放战争——所有这些事件均发生于 1648 年。

这些事件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形势。乌克兰人在他们斗争中需要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支援。通过 1650 年谈判结成的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联盟，成为后来有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参加的反奥斯曼同盟的基础。但

这一计划也未能付诸实现，因为瓦西里·卢普于1653年被摩尔多瓦的地主暴乱推翻。这次暴乱由掌玺大臣格奥尔基·什特凡领导，得到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格奥尔基·拉科齐二世和罗马尼亚国的援助。瓦西里·卢普在博格丹·赫米尔尼茨基将军(盖特曼)的儿子、他的女婿蒂穆什帮助下，一度复位，于是认为实现他二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占领罗马尼亚国计划的时机已到。但马特伊·巴萨拉布在雅洛米察河上芬塔之战的胜利（1653年5月），不仅使瓦西里·卢普的这一新的尝试化为乌有，而且使他失去了君位。格奥尔基·什特凡再度登位(1653—1658年)。

1655年的人民运动

人民群众利用了这个时机，以便缓和横征暴敛造成的严重恶化的处境。同样，雇佣军和士兵也滋长着不满情绪。

栖息于各个庄园的、称为庄丁（塞伊曼）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雇佣兵，迄止当时豁免对庄园主的义务。此时他们面临转化为农奴的威胁。为

了摆脱这种危险，他们在芬塔之战后揭竿而起，并吸收国军参加运动。马特伊·巴萨拉布作出重大许诺后才使他们平息了下来。

为了保障他们的豁免权和薪饷，庄丁和国军拥立许诺实现他们要求的康斯坦丁·舍尔班为国君（1654—1658年）。由于他食言，1655年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同时再度爆发起义。在摩尔多瓦，运动较弱，被格奥尔基·什特凡不甚费力地扑灭了。但在罗马尼亚国，起义转化为具有反封建性质的人民运动，规模日大。

运动席卷了庄丁、国军和农民。这是一次“人
177 民和士兵”反对地主、教会和土耳其人的起义。因此，这三重势力结成同盟，并得到格奥尔基·拉科齐二世和格奥尔基·什特凡的援助。起义者则觅求哥萨克的支援。在这种群情激愤的局势面前，康斯坦丁·舍尔班向锡利斯特拉巴夏求救，而起义者推举大将军赫里齐亚为国君。

拉科齐出动了约三万人的军队，经多次战斗，于肖普利亚击败起义者。但小股起义队伍仍在全国各地继续斗争，直至1655年秋。起义被扑灭后，接踵而至的便是残酷的镇压。赫里齐亚被俘，

并被押解至特尔戈维什特，许多农民被杀害，或受酷刑而成残废。为了防止起义再起，三国君主加强了他们的联盟，发誓在任何情况下互相支援。

罗马尼亚诸国的反奥斯曼同盟

此后，罗马尼亚三国的这个镇压起义的联盟继续保持着，但主要是一个反奥斯曼同盟，这个同盟由于俄国的参加而趋于完整。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摩尔多瓦君主格奥尔基·什特凡和俄国沙皇阿列克塞在尊重摩尔多瓦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上缔结了盟约（1656年）。这个政治条约附有一个商约，摩尔多瓦商人从而获得了在俄国经商的权利。

为了巩固反奥斯曼阵线，但也为了达到个人野心，觊觎着波兰王位的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格奥尔基·拉科齐在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国君主的军队及哥萨克首领的支援下，于1657年对波兰发动征略。获初胜后，由于丧失瑞典人和哥萨克人的支援，联军败北。波兰之征的失败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特兰西瓦尼亚大公被迫支付巨额赔款，罗马尼亚三国遭洗劫，三国君主被废，土耳其人任命

被视为忠于他们的人代替，岁贡提高，土耳其人又占领了巴纳特的其他城堡：伊内乌、卡兰塞贝什和卢戈日。

在土耳其人任命的三个君主——罗马尼亚国的拉杜·米赫涅三世，摩尔多瓦的格奥尔基·吉卡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阿卡齐乌·巴尔柴之中，拉杜·米赫涅三世渴望解放罗马尼亚诸国。他改名为米哈伊——争取独立和统一斗争的象征，诛杀反对他的计划的地主，从农民—士兵中选拔近臣，依靠1655年起义的社会力量，举起了暴动的义旗。因此，士兵们说："象这样明智和能干的君主在罗马尼亚国还没有过"。蒙特尼亚君主会见了起义者拉科齐，以协调彼此的行动，并派使者前往威尼斯，通告他已树起斗争的旗帜。好象是米哈伊时代重新来到了。此时，1659年，就象在米哈伊时代一样，国内的土耳其人被诛，土耳其的几支部队被击败，多瑙河沿岸诸堡得到解放，接着是多布罗加诸堡。但是，这时的环境较诸米哈伊时代尤为险恶，何况米赫涅—米哈伊也不具备勇士米哈伊的才能。起义终于被土耳其军队和鞑靼部落挫败。

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深入特兰西瓦尼亚，挫败 178
了拉科齐的最后抵抗，接着进袭奥拉迪亚。奥拉迪亚被土耳其人占领，与克里沙纳州一起组成奥拉迪亚巴夏辖区(1660年)。前蒙特尼亚君主康斯坦丁·舍尔班与特兰西瓦尼亚新选大公约翰·凯门尼在没有哈布斯堡人业已许诺的援助的情况下，孤军奋斗，未能改变局势。

罗马尼亚诸国的地主“党派”的形成

在政治动荡之中，一些地主门阀从中渔利，用兼并自由农土地的办法积累起大量庄园，充任名副其实的“党派”首领，左右着朝廷和政治生活。罗马尼亚国有两个此类“党派”：康塔库齐诺门阀和伯兰门阀，摩尔多瓦也有两党，即科斯丁门阀和鲁塞特门阀。

这个时代的君主完全受这些“党派”所左右，而这些“党派”凭借其在奥斯曼帝廷的影响，经常更朝换代。从1658年至建立法纳里奥特王朝止(1711—1716年)，摩尔多瓦每朝的平均寿命不满两年，在罗马尼亚国则不满六年。这样的环境就

是一些希腊人家族或希腊化的家族，如吉卡、杜卡、马弗罗科尔达特家族所以能当政的原因。这些家族的君主同两个国家毫无牵连，此往彼来，朝夕更换，其唯一原由就是奥斯曼帝廷的好恶。

同君主合作的大地主可以掠夺国家，鱼肉人民群众和小地主，积累起巨额财产。所有不满者屡次起而反对这种掠夺。1671—1672 年发生于摩尔多瓦的、由亨库和杜拉克领导的驱逐杜卡—伏德的斗争是反对大地主和君主的最大规模的运动之一。杜卡—伏德被赶下台，但土耳其军队又把他带了回来。接着，土耳其军队从波兰人手里占领了卡曼尼察（1672 年），并把摩尔多瓦北部的部分领土与霍廷堡一起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这迫使摩尔多瓦君主什特凡·佩特里切伊库倒向波兰人，但无济于事。

此时，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处在米哈伊尔·阿帕菲统治之下（1661—1690 年）。此人缺乏一个政治统治者所必需的才能，大权实际落入狡猾而无耻的米哈伊尔·泰莱基代表的大贵族手里。泰莱基对奥斯曼帝廷表现得唯命是从，在土耳其人怂恿下，他怀着扩张的野心与法国结成反哈布斯

堡联盟。但征伐的结果没有给特兰西瓦尼亚带来任何好处。

舍尔班·康塔库齐诺朝

罗马尼亚国的舍尔班·康塔库齐诺在他在位的十年间（1678—1688 年）终于挽回了这种混乱局面。他通过联姻与伯兰门阀和解，并渴望赢得 179
国家的独立。其时，一个称为“神圣同盟”（奥地利、威尼斯、波兰和俄国）的反奥斯曼同盟业已形成，蒙特尼亚君主也秘密倾向于同盟。

舍尔班·康塔库齐诺被迫与摩尔多瓦君主格奥尔基·杜卡一起参与 1683 年土耳其人在大臣（维齐尔）卡拉·穆斯塔法统率下对维也纳的围困，但他暗助奥地利人。由于波兰国王约翰·索比耶斯基出兵救援，维也纳解围，蒙特尼亚君主倒向哈布斯堡帝国的倾向从此日益明显，尽管此时谈判仍保持秘密性质。为了避免奥地利承袭奥斯曼的统治地位，舍尔班也同波兰和俄国保持着联系。

哈布斯堡人于 1686—1688 年的胜利促使康塔库齐诺公开宣布站在维也纳宫廷一边，但以奥

地利承认这个国家的独立、世袭朝廷、宗教自由、风俗习惯和归还被土耳其人占领的城堡(拉亚)为条件。康塔库齐诺甚至还有更大的抱负，想让他的家族同时统治摩尔多瓦和巴纳特。另一方面，哈布斯堡人则仍然企图直接统治罗马尼亚三国。但在谈判结束前，舍尔班去世了，给他的继承人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留下了在风暴汹涌的大海上驾驶罗马尼亚国这叶扁舟驶向彼岸的重任。

摩尔多瓦在康斯坦丁·康特米尔朝（1685—1693年）时代也处于同样境况，亲土耳其的鲁塞特门阀和亲波兰的科斯丁门阀这两党在无权的君主眼皮下展开着争权斗争。

东欧的政治角逐

作为哈布斯堡帝国，奥斯曼帝国，波兰王国和俄国四强角逐的结果，东欧发生的各种事件造成了同样的局势。军事上的胜利使奥地利先后占领了匈牙利(1686年)和特兰西瓦尼亚(1688年)，并胃口大开，企图把占领扩展至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与此同时，波兰人也酝酿着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多瓦的计划。土耳其人则力求保持对

罗马尼亚诸国和巴纳特的统治。俄国解放了西乌克兰,并攻占了曾并入克里米亚汗国的亚速夫堡。

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和迪米特里·康特米尔两朝

大地主的代表布伦科维亚努

在哈布斯堡于特兰西瓦尼亚建立统治的那一年,在地主阶级、实际上是在康塔库齐诺门阀的要求下,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登上了罗马尼亚国君位(1688—1714年)。这个新王朝在侵吞土
地和掠夺农民方面与大地主合作。因此,赋税是 180
十八世纪最苛重的一朝,而且为了保障课纳,各种捐税合一,分四次交付。

布伦科维亚努希望继承他的前辈对维也纳宫廷的政策,但要求得到关于国家独立的某些保证,哈布斯堡人对这种态度不能容忍,由海斯列尔将军统率的帝国军队深入罗马尼亚国(1689年),但被逐出,并遭到追击,大败于布拉索夫附近的泽尔内什蒂(1690年)。

在康塔库齐诺门阀，尤其是御膳房总管康斯坦丁的推动下，罗马尼亚国倒向俄国，特别是在卡洛维兹和约(1699 年)以后，当时哈布斯堡的扩张政策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使团频繁往返于布伦科维亚努和彼得一世之间，其中较有成效的则是布拉索夫人达维德·科尔比亚率领的使团，结果缔结了罗马尼亚国和俄国之间的盟约。

布伦科维亚努的个人威望在摩尔多瓦也日益显著。这一方面要归功于在布加勒斯特宫廷影响下登上摩尔多瓦君位的几任君主，另一方面则由于摩尔多瓦地主和蒙特尼亚地主之间的关系。两度成为摩尔多瓦君主的康斯坦丁·杜卡是布伦科维亚努的女婿，而米哈伊·拉科维策在其第一朝，乃至第二朝的部分时间都托庇于蒙特尼亚君主。

因此，摩尔多瓦效法蒙特尼亚人，先倾向哈布斯堡人，后又转向俄国，是可以理解的。这在十七世纪最后十年和十八世纪最初十年成为摩尔多瓦政策的一贯倾向。

迪米特里·康特米尔朝

迪米特里·康特米尔对于自己在君士坦丁堡

逗留期间业已得出的关于奥斯曼权力正在衰落的看法深信不疑，在他当政的短短七个月（1710—1711年）中为赢得摩尔多瓦的独立作了各方面准备。首先,他试图依靠青年地主和人民群众,用朝廷集权来代替地主统治。并且采取了一些减轻赋税和限制地主暴虐的、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措施。

俄国人在波尔塔瓦之役（1709年）战胜瑞典人，这对罗马尼亚诸国的对外政策倾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罗马尼亚国早就同俄国缔结了反奥斯曼同盟条约。迪米特里·康特米尔在摩尔多瓦当政后，也于1711年4月在卢克缔结了类似的条约。条约规定摩尔多瓦—俄国在反奥斯曼战争中进行合作,保证摩尔多瓦的主权和完整,保证康特米尔家族世袭王朝。

根据条约，俄国军队开进摩尔多瓦。摩尔多瓦君主发表致全国文告,号召人民参加战斗,得到广泛响应。

此时，罗马尼亚国的军队在普洛耶什蒂附近的乌尔拉茨集结，布伦科维亚努敦促俄国人撤出摩尔多瓦，表示愿意为俄国同土耳其人媾和进行斡旋。但康塔库齐诺门阀的行动僭越了这位君主

的意志。托马·康塔库齐诺率骑兵倒向俄国人。

181 布伦科维亚努的姿态本来就无济于事，因为庞大的土耳其军决定了普鲁特河上的斯特尼列什蒂之役（1711 年 7 月）的结局，奥斯曼帝廷取胜。康特米尔被黜，不得不终生居住在俄国沙皇宫廷和沙皇所赏赐的庄园里，从事主要是文化方面的有价值的活动。随着迪米特里·康特米尔的被废黜，摩尔多瓦的本土人王朝中断，由法纳里奥特统治达一百一十年之久。

布伦科维亚努的模棱两可的平衡政策早已在奥斯曼帝廷引起越来越大的猜疑。康塔库齐诺门阀一旦叛离，蒙特尼亚君主的命运便已注定。布伦科维亚努被押往君士坦丁堡，同他的几个儿子一起被杀（1714 年），土耳其人没收了他的大宗财产。布伦科维亚努的君位由御膳房总管康斯坦丁·康塔库齐诺的儿子什特凡·康塔库齐诺取代（1714—1715 年）。但这一朝寿命既短而又无所作为。什特凡和他的父亲御膳房总管被指控与准备进袭土耳其人的奥地利串通，成为奥斯曼帝廷大臣们猜疑的牺牲品。这样，在罗马尼亚国也开始了一个多世纪的法纳里奥特统治。

文 化 发 展

文化的主要特征

十七世纪的罗马尼亚诸国的文化沿着若干共同的主轴向前发展。首先人民的口头语言，即罗马尼亚语在罗马尼亚三国成为文化的主要语言，此外，在特兰西瓦尼亚还有马札尔语和德语。其次，世俗文化不仅在拥有极其宝贵的著作的历史编纂学方面，而且在其他领域，诸如法律、地理、语言学、人种志学、哲学、诗歌乃至宗教性质的书藉序文等著述方面，都超过了教会文化。

罗马尼亚文化超越了那个时代的人为的政治疆界，日趋统一。包括僧俗内容的著作面向全体罗马尼亚人，还有同样为全体罗马尼亚人编写的词典和语法，史书记载着罗马尼亚三国的事件，一国的学者在另一国从事活动，等等。

罗马尼亚诸国的文化是在同欧洲的各种伟大文化潮流接触中发展的。但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模仿或抄袭某些时髦东西，而是吸收社会所需的那

些思想和创作，加以融会贯通，诸如波兰的人文主义，俄国和希腊的正教，英国的清教主义和法国的笛卡儿主义。

借鉴是相互的：我们借鉴于外人，外人借鉴于我们。例如，俄罗斯文化和欧洲文化也从彼得·莫维勒、尼古拉·米列斯库、迪米特里·康特米尔等人那里得到很大裨益。

182

文化设施

教育

十七世纪罗马尼亚诸国教育的特点是主要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城市学校的发展。在瓦西里·卢普时代，仅雅西一地就有将近二十所学校。罗马尼亚国的布加勒斯特和肯普隆都有中等学校，而特兰西瓦尼亚各城市普遍设有中学。

为了与耶苏会教士所把持的教育相抗衡，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加布里尔·贝特兰大公于1622年在阿尔巴—尤利亚创办了一所大学院，设哲学、文学和神学三系。这位创始人以重金为学院延聘高士名流为师，诸如德国哲学家阿尔斯特迪乌斯，

语言学家和诗人马丁·奥普提兹，自然科学家比斯特尔费尔德等。此外，还有笛卡儿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宣传家阿帕蔡·柴雷·亚诺什。要求用本国语言进行理性教育的伟大的捷克教育家扬·考门斯基(夸美纽斯)的思想，对学院的教学大纲具有明显影响

在这个时代，其他两个罗马尼亚国家也创办了高等教育机构。在摩尔多瓦，瓦西里·卢普在基辅大主教彼得·莫维勒支持下，于1640年创办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院。瓦西里学院在组织上仿照基辅学院，讲授拉丁语、斯拉夫语、希腊语、修辞学、哲学和作诗法。

在马特伊·巴萨拉布的支持下，通过地主学者乌德里什特·纳斯杜雷尔和御膳房总管康斯坦丁·康塔库齐诺的努力，在特尔戈维什特也创立了一所类似的学校——希腊语和拉丁语学校，拥有从君士坦丁堡请来的博学的教授。

中世纪思想在这些学校里逐步为较近代的思想所代替。这种人文主义和笛卡儿主义相结合的思想也出现在奥勒什蒂耶学校，该校由罗马尼亚学者米哈伊尔·哈利奇创建，讲授修辞学、

语法、逻辑、心理学、形而上学、历史、代数等课程。

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在博学的御膳房总管康·康塔库齐诺的帮助下，在1694年创办了圣萨瓦学院，这里革新的倾向更加鲜明。这个学校很快就成为罗马尼亚三国的罗马尼亚人和巴尔干半岛的青年们的最重要的教育机构，成为古典文化和进步学说的中心。

印　刷

在较老的印刷所，例如1660年停办的布拉索夫和克鲁日印刷所，以及整个世纪没有中断过活动的锡比乌印刷所，尤其是在新建的印刷所，例如拥有印刷罗马尼亚文书籍的一个专门车间的阿尔巴—尤利亚印刷所和奥拉迪亚、肯普隆、特尔戈维
183 什特、雅西的印刷所印出的书籍，在传播文化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腊文、拉丁文和斯拉夫文这些古老文字的书籍，以及罗马尼亚文、马札尔文和德文书籍从这些印刷所的机器下印刷出来，其中虽然有宗教内容的著作，但各个领域的世俗内容的作品数量日大，地位越来越重要。

图书馆

当时人们学习的愿望不仅通过私人藏书，而且通过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的书籍得到满足，例如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一些修道院的图书馆，圣萨瓦学院、特兰西瓦尼亚各地的中学和布拉索夫斯凯伊罗马尼亚学校等中、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以及当时一些学者——乌德里什特·纳斯杜雷尔、康斯坦丁·康塔库齐诺、米哈伊尔·哈利奇、萨穆埃尔·克莱舍里和瓦连丁·法兰克、冯·法兰肯斯坦因等人的图书馆。

世俗文学

民间故事

历史——形象的文学始终在广大读者阶层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以手抄形式流传于世的这种文学，在十八世纪初披上了传播能力要大得无限多的印刷的外衣。取材于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和«特洛伊战争»，民间长篇小说«瓦尔拉姆与约瑟夫»和由尼古拉·科斯丁在摩尔

多瓦，安德烈·普拉盖在特兰西瓦尼亚从西班牙文翻译过来的历史长篇小说《诸侯的钟》，瓦尔拉姆主教从意大利文翻译过来的劝善书《天赐之花》，风靡一时。《康斯坦丁一伏德之歌》也可列入这类性质的作品，这是一个清寒的教会唱诗手描写布伦科维亚努满门抄斩的诗作。

罗马尼亚诸国的历史编纂学

拥有最宝贵的创作和成绩最大的文学体裁——历史编纂学，通过大型编年史达到鼎盛。这个时代的历史编纂学不再是宫廷的官方编年史，也不再由僧侣撰写，而是由当时最有学问的学者执笔的地主门阀或市民编年史。尤为重要的是，几乎都用口头语言写作。

摩尔多瓦的历史编纂学

在那些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和爱国感情的创作中，以格里戈雷·乌雷凯的作品《摩尔多瓦国纪事》为最早。乌雷凯这位就学于渗透着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的波兰学校的学生，所学到的不仅是拉丁

文和波兰文，而且有关于罗马尼亚人民的起源和 184
历史的许多有用知识。以摩尔多瓦“建国”(1359年)开始的《纪事》的主要部分是大什特凡朝，这个朝代在乌雷凯写作的当时也具有特殊意义。叙述以阿隆—伏德登上摩尔多瓦君位（1595年）为结束。

其续篇出自米隆·科斯丁之手。他也是波兰学校的学生，当时最饱学的摩尔多瓦学者。他在另一部《摩尔多瓦国纪事》中把叙述延续至达比扎—伏德(1661年)。文彩、爱国主义和绚丽多彩的叙述在这部著作中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在他用波兰文写作的关于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历史的其他两部作品——一部诗作和一部散文中，也表现出这样的特色。

罗马尼亚人民的起源问题在米隆·科斯丁的上述所有著作中均有述及。但对这个在当时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位罗马尼亚编年史家另有专著:《摩尔多瓦人的祖先》,这是一部在资料和解释上在当时都具有很大价值的科学著作。

米隆·科斯丁的儿子尼古拉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立志要写一部自开天辟地至他那个时代的

通史。但是力不从心，他经过一生努力留下了广泛的资料辑录，其中有创见的只有关于十八世纪头十年的部分。

蒙特尼亚的历史编纂学

在罗马尼亚国的历史编纂学中出现了两部浩瀚的文辑:《康塔库齐诺纪事》和《罗马尼亚国诸君主史》。前者可能出自斯托伊卡·卢德斯库之手，是供康塔库齐诺门阀使用的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蒙特尼亚各种编年史的大部头资料汇编集。

另一党——伯兰门阀也有自己的文辑，比康塔库齐诺门阀涉猎更广，材料更多，可能由拉杜·波佩斯库撰述。象康塔库齐诺门阀的文辑一样，伯兰门阀的文辑包括自内格鲁—伏德“建国”至舍尔班·康塔库齐诺朝末的各种事件。

关于布伦科维亚努朝，在这位君主本人及其政敌的授意下，分别出现了两部历史性著作。其一是拉杜·格雷恰努撰述的《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生平》，是一部有倾向性的宫廷编年史，但材料颇详。其二是伯兰门阀的编年史家拉杜·波佩斯库的作品，具有同前者相反的倾向性。

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编纂学

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编纂学较为复杂，因为它是三个民族的文人的创作。其次，人文主义给予书面语言以很大影响，拉丁文一直保存至当时。再次，由于城市较发达，城市贵族的代表也参与这 185
个国家的文化活动，尤其是编史活动。

在十七世纪的为数颇多的拉丁语编史家中，值得首先提到的是什特凡·萨莫什克齐，这是一位研究古钱学、金石学和史学的渊博学者，尤以史学见长，在这方面著有三部作品——《文录》、《五日录》和《七日录》，合成特兰西瓦尼亚上自1566年下至十七世纪初期的多卷本历史；两个贝特兰也撰有巨著：约翰·贝特兰的《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四篇文辑》和《特兰西瓦尼亚史》叙述1629—1673年的事件，沃尔夫冈·贝特兰的《特兰西瓦尼亚人的历史》叙述1526—1609年的事件。十七世纪末还出现了大部头的萨克逊人文辑，称为《樱花—狼—奥尔特尼亚编年史》，记载990—1699年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

本民族文字的历史编纂学以罗马尼亚文的这

种体裁的作品为代表，诸如布拉索夫斯凯伊教堂的正教大司祭瓦西里的《编年史》。该书包括1392—1633年的事件。临近十七世纪末，又有格·布兰科维奇的《编年史》，叙述上自罗马尼亚人起源、下至十七世纪末的罗马尼亚人的历史。

这个世纪的马札尔文史学著作主要是回忆录性质的作品，例如两个特尔古—穆列什人托马·博尔索斯和编年史家弗兰西斯·纳吉·萨博的《回忆录》，叙述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中叶的大事。约翰·凯门尼和尼古拉·贝特兰的《自传》是在体例上类似编年史、在判断事物上有独到之处的作品，其价值在于它们记载了整个十七世纪的史实，但带有倾向性和派阀性。最有代表性的马札尔语编年史作品是叙述1661—1711年间大事的米哈伊尔·柴雷伊的《历史》。这部著作较有独创性，并较真实。

十七世纪还出现了萨克逊人的历史编纂学，其著述篇幅浩大并颇有价值，超过了地方志的范围，如锡吉什瓦拉文书乔治·克劳斯的《特兰西瓦尼亚编年史》，展示了十七世纪上半期罗马尼亚三国的大事。马蒂亚斯·米勒斯的著作《特兰西瓦

尼亚守护神》具有上述同样视界和价值，而且是当时的流行作品。

近代历史编纂学的发端

御膳房总管康斯坦丁·康塔库齐诺

御膳房总管康斯坦丁·康塔库齐诺由于先后在阿德里安堡、君士坦丁堡和帕多瓦高等学府所得到的学识，超过了罗马尼亚三国迄至当时的所有编年史学者。他是准确而且材料丰富的第一张罗马尼亚国地图和《罗马尼亚国史》的作者。该书 186
原计划颇为庞大，虽然仅完成了自罗马尼亚人起源至匈奴人居留潘诺尼亚这一部分，但无论在资料上和事件的展开上都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作者利用了当时所能知道的一切较有价值的史料。此外，近年来经过修整并作了说明的他的藏书室拥有流传于当时的最珍贵的书籍。

迪米特里·康特米尔

从他的多方面的研究活动，从他的学识、观点及治学方法来看，康特米尔超越了中世纪编年史

家们，在音乐、哲学、历史、地理、人种志学乃至文学等各个领域里打开了近代罗马尼亚文化的大门。继哲理性作品《国政会议或智者与世界的争论》之后，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象形文字史》，以讽喻的形式描写两个罗马尼亚国家的政治斗争。

康特米尔的活动无疑在史学领域内最为丰富和卓著。《奥斯曼帝国史》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是关于这个帝国的首屈一指的著作，被译成广泛流通的诸种文字。《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人古代编年史》在许多方面较诸《帝国史》更胜一筹，原计划是关于全体罗马尼亚人自起源至当时的历史，但只写到了十三世纪，亦即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形成之时。他的另一著作《摩尔多瓦写实》是一部历史、地理和人种志学的综合性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这本书是在他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时应该院之约撰写的。康特米尔绘制的摩尔多瓦地图充实了《写实》的地理部分。

康特米尔的著述被译成法文、俄文、英文和德文，从而使他进入了享有盛名的世界学者之列。因此，他的名字同其他学者的名字一起并列于巴

黎圣热内维埃芙图书馆的正面壁上。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国内历史编纂学不仅在数量上十分丰富，而且从各方面来说是中世纪编年史作品和近代早期编年史作品中最有价值的。

法　　学

历史编纂学的特点也十分适用于法学。本世纪是大部头法典编纂、印刷出版和付诸实施的时代，如1646年雅西出版的《罗马尼亚训谕》和1652年特尔戈维什特出版的《法律规范》，两者内容十分相似，包括刑法、民法、关税法、赋税法和教会律令的条文。在特兰西瓦尼亚，国会的决议被系统整理、编纂成两部关于各阶级关系和审判程序的教会、行政和国家法令汇编：《律令审编》 187
(1653年)和《律令大全》(1669年)。

所有这一切法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条文最终目的在于保护特权阶级的利益，确保生产者群众顺服。

语言学、哲学和地理—人种志学著作

除史学外，语言是十七世纪许多学者偏爱的学科。已经有各类词典编辑出版，如科齐亚修道院的马尔达里的《罗马尼亚—斯拉夫语词典》、特奥多尔·科尔比亚的《拉丁—罗马尼亚语词典》等。

在我国流传较广的哲学流派是法国哲学家勒奈·笛卡儿的学说——笛卡儿主义，尤其得到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家阿帕蔡·柴雷·亚诺什在《匈牙利百科全书》(1653年)中宣传。加弗里尔·伊武尔是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哲学教科书《逻辑》和《哲学》的最早的罗马尼亚作家。

十七世纪的罗马尼亚科学著述也丰富起来，有太尉尼古拉·米列斯库—斯珀塔鲁的地理—人种志学著作《亚洲写实》,《中国游记》,迪·康特米尔的《摩尔多瓦写实》和摩尔多瓦地图，御膳房总管康·康塔库齐诺的罗马尼亚国地图，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于世界科学宝库的贡献。

宗教著述

翻译。翻译教会书籍至少有三重意义：以罗马尼亚语代替斯拉夫语；罗马尼亚语进而成为书面语言；通过印刷品越过当时的政治疆界，从一国流传至另一国，加强了罗马尼亚人的文化统一性。在发挥了这三重作用的宗教书籍中，应该提到的有：瓦尔拉姆的《布道书》，布加勒斯特的《圣经》，多索夫特伊的《韵文赞美诗》，伯尔格拉德(阿尔巴—尤利亚)的《新约》等。

序文。宗教书籍的序文同翻译本身同样重要，有时甚至更为重要。当时的僧俗学者通过序文陈述他们关于所译书籍的作用的想法，其中一个根本问题就是罗马尼亚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统一性。瓦尔拉姆的《布道书》是给“整个罗马尼亚种族”读的，布加勒斯特的《圣经》是“赠给罗马尼亚族”的，伯尔格拉德的《新约》译成“人人能懂”，而《知识之钥》则是献给“一切通晓我们罗马尼亚语的东正教基督徒”的。

象在史学著述中一样，对语言和人种统一性 188

的意识在宗教著述中获得了同等地位，两者的根源均在于对民族统一性的意识。

艺　术

文化上的这种多样性在艺术中也得到相应表现，而且如在文学中反映出来的一样，三国的艺术创作也是相互渗透的。

十七世纪的僧俗建筑艺术是十五和十六世纪的继续，虽然在规模上有所扩大，水平上有所提高。此外，当然还有若干借鉴：建筑和石雕大师们的作品，以及一些享有盛誉的流派，诸如文艺复兴派的流行作品。最杰出的建筑有：瓦西里·卢普兴建的雅西三圣教堂（1639年）和该城的戈利亚教堂，舍尔班·康塔库齐诺兴建的科特罗切尼修道院及康·布伦科维亚努兴建的、具有独特的“布伦科维亚努”风格的胡雷兹修道院教堂。

世俗建筑在十七世纪前半期宏伟的较少（瓦西里·卢普的雅西宫廷，巴尔特堡的宫堡），至该世纪下半期取得了具有卓越艺术价值的成就。波特洛吉和莫戈索瓦亚的布伦科维亚努宫建有敞廊

和外廊，是浸透着东方因素的文艺复兴形式和巴乐歌建筑形式的混合。意大利敞廊式的凉台也见诸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些宫堡，如崩齐达(克鲁日附近)与耶尔努特(特尔古—穆列什附近)宫堡。

迄至十八世纪下半叶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哈布斯堡政体和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国的法纳里奥特政体

哈布斯堡统治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建立

奥地利人占领特兰西瓦尼亚

在中欧、东欧和南欧的列强角逐中，奥地利得益最大。它占领了匈牙利，觊觎着特兰西瓦尼亚。耶稣会牧师安蒂·杜诺德所领导的外交使团通过谈判未能取得的东西，将用武力来付诸实现。奥地利军队于1686年深入特兰西瓦尼亚，强迫懦夫米哈伊尔·阿帕菲签订了布拉日条约(1687年)，根据条约，奥地利军队被邀来“过冬”。通过武力威逼的方式，帝国将军卡拉法取得了宣称特 189

兰西瓦尼亚“自愿”废弃奥斯曼帝廷宗主权，接受奥地利皇帝“保护”的1688年声明。任何反抗的尝试都遭到血腥镇压，例如1688年布拉索夫的行会匠人和贫民反对城市贵族把该城拱手交给奥地利帝国军队的起义。特兰西瓦尼亚成为哈布斯堡帝国的一个省。

利奥波德敕令。1691年12月4日的利奥波德敕令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半世纪时间里的“宪法”，规定了它的政治一法律制度。敕令首先保障四种“被接受的”宗教（天主教、改革派、路德派和一神教派）的权利，并保留了《律令审编》和《律令大全》的各种法令、萨克逊人和塞凯伊人的特权、国会和其他行政和司法机构；大小公职由本地人、匈牙利人、萨克逊人和塞凯伊人充任；但军队指挥官是德国人；对维也纳宫廷的贡税规定和平时期为十一万两千弗罗伦，战时为四十万弗罗伦。大公的称号由皇帝兼有，特兰西瓦尼亚统治者被赋予省长的称号。关键问题听命于皇帝或者1694年在维也纳设立的特兰西瓦尼亚枢密院；帝国军队司令拥有军政最高权力。尽管如此，特兰西瓦尼亚公国毕竟保持了内部自治，具有自己的

政府和国会，并于1768年升格为大公国。

部分罗马尼亚人与天主教会的联合

天主教会代表着第二种强大势力。除军队外，教会是新统治的主要支柱。因此，必须把构成特兰西瓦尼亚人口绝大多数的罗马尼亚正教居民拉到天主教方面来。发动这个运动的维也纳当权者和耶稣会牧师们许诺给予处在近乎农奴地位的罗马尼亚神甫同天主教僧侣平等的地位，给予“被容纳的”正教教会同“被接受的”各个教派平等的权利，以为这样一来运动会轻易成功。特别是因为联合派可以保持他们的教仪、教规和历法，只要求他们承认教皇的权力。

联合问题首先由特奥菲尔大主教在1697年的阿尔巴—尤利亚的宗教会议上提出，在新任大主教阿塔纳西·安盖尔的坚持下，于1698年10月7日被通过，当时在联合文件上签字的有三十八名教区主教；1699年的一个利奥波德敕令批准了这个文件。

但是联合无法推行，因为惟恐丧失劳动力的贵族反对，尤其是罗马尼亚人民，特别是布拉索

夫、锡比乌、弗格拉什、洪尼多阿拉地区的罗马尼亚人民也群起反抗。在这种形势下，阿塔纳西·安盖尔被召往维也纳，敕封为“罗马尼亚民族”的大主教，此后于1701年又颁发一个新的利奥波德敕令，不仅把联合的优惠给予神甫，而且扩大至归附联合派的信众，把他们从农奴地位提升至可以享受自由和文化的地位。这个敕令不仅在宗教上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且在社会和政治上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虽然由于“三民族”和“四教”的反对，从未付诸实施。但是，它引起了强烈的骚动，使哈布斯堡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本身陷入深刻危机之中。

190 弗兰西斯·拉科齐二世领导下的反哈布斯堡战争

在这种骚动不安的气氛中，一个大贵族弗兰西斯·拉科齐二世于1703年树起了起义的旗帜，许诺追随者以他们所希望的权利：给予贵族以广泛特权，给予农民以豁免赋税和徭役的权利。他的行动受到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和俄国沙皇彼得大帝的鼓励。当时称拉科齐

的拥护者为“库路茨”①。“库路茨”战争迅速席卷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在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各地区，勇士平蒂亚的绿林好汉们成功地支援了起义。

特兰西瓦尼亚的战事发展迅猛，接连几仗，互有胜负，许多城市和州几经易手。拉科齐被推举为特兰西瓦尼亚大公(1704年)，并接受了保证这个国家自治的条件。

在取得若干新的胜利之后，起义于1708年趋于衰落。许诺农民的豁免赋税的权利没有兑现，军队难于维持，拉科齐阵营中贵族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加深，路易十四国王和彼得大帝的援助中止。贵族准备与帝国议和，并终于签订了萨土—马雷和约(1711年)。哈布斯堡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及其与贵族的合作得到巩固。

喀尔巴阡山以东和以南的两个罗马尼亚国家怀着摆脱奥斯曼帝廷统治的希望，越来越明显地倾向俄国；哈布斯堡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及其

① 库路茨(Curuţi)，始为参加格·多扎领导的1514年农民战争的罗马尼亚农民和马札尔农民的称号，意为十字军战士。后来，在十七至十八世纪用来称呼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参加反哈布斯堡斗争的起义者。——译者

向巴纳特、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扩张的趋势；土耳其人对地主统治的不信任；——所有这一切成为土耳其人用君士坦丁堡法纳尔区的希腊人君主代替本地人君主（摩尔多瓦在1711—1821年；罗马尼亚国在1715—1821年）的原因。法纳里奥特君主实际上是一些单纯的执行人，负担着双重使命，即保持罗马尼亚诸国在奥斯曼统治之下，尽量把它们纳入土耳其的经济体系，以保障帝国和新军所需的给养。但是，我们的国家毕竟继续保持了内部自治；它们没有象巴尔干半岛各国和匈牙利那样被土耳其人占领并变成巴夏辖区。

罗马尼亚诸国的政治组织

在法纳里奥特统治时代，罗马尼亚诸国自治权的局限性也反映在它们的政治一行政机构中。

君主类同于两旄节巴夏。他们是奥斯曼帝廷命令的忠实执行者。

君主在行使权力时通常由御前会议或国政会议襄助，有时由一个称为民众会议的扩大机构协

助，参加者包括教会和地主的领袖以及其他自由
社会阶层的代表。在讨论某些重大议案时，咨询 191
有“全体教众和全国所有地主”参加并邀军队代表
出席的全国议会。

为了满足土耳其人和朝廷的贪欲，并保障奥斯曼帝廷的统治，这个时期实行了旨在使各种机构近代化和集中化的若干政治一行政性质的改革。在大、中地主中任命两名行政长官，职掌县和州的行政、赋税和司法事务，以代替原来的县令和太守。行政官由地主村庄中的村长、文书、总管协助。为了杜绝贿赂和其他非法收入的舞弊积习，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实行了县和州行政官的官俸制，但封建陋规仍未能革除。

这些官吏是决断他们辖区内居民间诉讼案的司法机关。他们越来越多地根据成文法律，诸如十七世纪的那些法规断案。此外，十八世纪中叶又出现了一些“法律手册”。

除了作为法纳里奥特基本支柱的这些政治、行政和司法机构以外，还有君主的宫廷军队、狱卒，火枪兵以及外国雇佣军。

罗马尼亚诸国对奥斯曼帝廷的义务

奥斯曼的经济统治在法纳里奥特时代无疑更为苛重，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个苏丹帝国的危机深化：各个农业省人口锐减，达到荒芜的境地，而奥斯曼帝廷不断穷兵黩武，需要大量耗费。

岁贡礼品

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奥斯曼帝廷增加了罗马尼亚诸国的义务。如果我们考虑到法纳里奥特王朝建立时的情况，那末可以看到，在各种义务中，岁贡在罗马尼亚国变化不太急剧，在摩尔多瓦却迅速暴涨。摩尔多瓦的岁贡从六万五千银币（塔列尔）上升至二十六万，罗马尼亚国从二十六万银币（塔列尔）上升至三十万（法纳里奥特统治开始时两国岁贡的巨额差距是由于布伦科维亚努向奥斯曼帝廷进献了大量贺扎[1]——蓬格）。

每年一度的礼品也有相当大的跃增，几乎保

[1] 贺扎（Pungă）为以小口袋所装之纳献。每袋装五百银币。——译者

持与岁贡同等价值。但买取君位的贡礼或现金献纳则尤为苛重，形成名副其实的大拍卖。尤其是十八世纪后半期，君主取得君位或者从一国调任另一国，完全取决于进献给土耳其当权者贺扎的多寡。

续位金(穆卡雷尔) 192

每年一度或者三年一度的续位金(穆卡雷尔)根本没有定规。由苏丹、维齐尔、巴夏以及其他奥斯曼高级官僚随意决定。

在四十年代，一种称为“札伊札”的新贡赋加在罗马尼亚诸国头上，以肥苏丹和首相（大维齐尔)的私囊，其金额多于岁贡的两倍。

因此，据大约估计，在1772年前后，罗马尼亚国对奥斯曼帝廷的义务每年高达约两百万列伊，亦即六十五万银币(塔列尔)。

实物贡赋和劳役贡赋

除此而外，还有随奥斯曼帝廷需要而增减的实物贡赋：数万袋谷物或者面粉，成群成群的公羊、马匹，大量的黄油和蜂蜜。

这些供给品还需运输，这就意味着数千人力和畜力的劳役，在战时又需数千人补充军队的需要。文献还提到在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廷要求罗马尼亚两国君主提供数千收割手收割多布罗加的谷物，而这些要求几乎总是给予满足的。

利用官吏、法纳里奥特君主进行掠夺的奥斯曼统治的性质，说明它对法纳里奥特制度和全体人民争取以本土人君主代替法纳里奥特的斗争所作的歪曲的、往往是夸大其词的评价的动机。

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哈布斯堡统治制度

就在尼古拉·马弗罗科尔达特取代迪米特里·康特米尔，摩尔多瓦开始建立法纳里奥特制度那一年（1711 年），“库路茨”和哈布斯堡帝国签订了萨土—马雷和约，这意味着哈布斯堡对特兰西瓦尼亚统治的巩固。

行 政 组 织

奥地利的军事司令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国会、省长、政府被降低到维也纳宫廷通过也是设在维也纳的特兰西瓦尼亚枢密院发布的命令的执行机关的角色。

根据1716年爆发的奥土战争结束时签订的帕萨罗维茨和约，哈布斯堡于1718年占领了巴纳特，将它作为皇室领地进行组织。直至1751年，统辖巴纳特的是兼任总督之职的军事司令。在这一年，巴纳特设置了文职行政机关，由一名州长统辖。

货币贡赋和实物贡赋 193

在哈布斯堡制度建立之时，便把军税和帝国军队的维持费用强加于特兰西瓦尼亚。由于奥地利弗罗伦(盾)贬值和奥地利人连年作战，军税不断上增：由1714年的六十万莱茵弗罗伦增至1763年的一百二十五万莱茵弗罗伦。与此同时，巴纳特的国税总额超过了每年一百一十二万莱茵弗罗伦。

除此而外，还需缴纳数万桶小麦、大麦以及数万车干草。

对于驻军的负担也十分苛重。除了免费供给消费品外，士兵们还漫不经心地或恶意地毁坏驻

在村落居民的财产。

最后，在巴纳特，哈布斯堡以统称为士瓦本人的、在出身和社会经济状况上非常驳杂的居民进行殖民的政策，给本地人造成了许多困苦和不公平，他们最好的土地被强行划归移民所有，以便巩固哈布斯堡的统治。尽管存在着种种困难，但在几世纪的过程中，建立了正常的共居关系。

两个统治强国——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之所以热衷于统治罗马尼亚诸国，因为它们是两个帝国分别霸占的粮仓、原料供应者、由于战争而经常超支的国库的支撑者、帝王军队的兵员供应者及产品的销售地。

社会经济状况

农业和土地关系

在这个新时期，罗马尼亚诸国经济生活中令人注目的一点是通过开垦荒地扩大农田。这是增加国内外市场上需求日增的粮食产量的手段之一。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是大规模推广了玉蜀黍的种植，这种作物，据一个当时

人的描写，是“国家的巨大帮助，既可供百姓口粮……又可作牲口饲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这个世纪中叶引种土豆，并在巴纳特的皇室领地上引种水稻。

增加粮食生产的第二个门径是通过兼并自由农土地和依附农份地来扩大庄园（贵族和地主领地）。

地主获利最大的增加谷物生产的第三种手段是加重农奴以及根据契约附着在庄园上的农民的劳役或徭役义务。如1775年的一份诏书在谈到十八世纪上半期情况时所说，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徭役没有法律规定，地主可随心所欲，强迫农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作任何必须作的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劳役于1714年规定为农奴每周四天，佃农每周三天，或是出牲口，或是出劳力，因 194
此农奴每年劳役超过二百天，佃农则超过一百五十天。贵族的横行不法促使玛丽亚·铁列西亚女王出面调停农奴和贵族的关系，在1769年的一个称为《若干指令》的文件中规定每周徭役义务为出牲口三天，出人力四天。在特兰西瓦尼亚，徭役是最重要和最苛重的农奴义务；在罗马尼亚国和摩

尔多瓦则农产品什一税在这方面居于首位。

徭役或劳役的加重，加之哈布斯堡人要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皈依天主教的尝试，引起了一连串的农民运动，诸如逃跑、避难、结伙落草乃至起义。在这一整个时期，逃跑和避难是罗马尼亚三国内部以及彼此间的不断现象。罗马尼亚三国的不满者还充当绿林好汉，结伙斗争。

采矿与矿山劳力

除了原有矿产以外，这个时期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较大规模地开采重油。在特兰西瓦尼亚，热衷于增加矿产的哈布斯堡人着手对开采地下资源进行较完善的组织。在巴纳特设立了四个矿务局，并在西山地区创建了矿业学校。这样，铁和黄金的产量以及铅和铜的产量都有显著增长。

在依然十分兴旺的盐矿里，既使用自由农，也使用农奴。大多数农奴和茨冈奴隶充当锤子手，也就是说作凿盐工，而自由农则大都当背盐工，也就是说把盐运到地面并码成堆的工人。工人得到低微的工资，农奴和奴隶将其中一部分交给主人，顶替赋税。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矿山里，比较先进的新技术以雇佣工人从事较熟练的劳动作为基础。这种工人，有些是本地人，有些则是从国外具有较悠久的采矿传统的地区招来的。

艰苦的劳动条件和低微的工资成为屡次矿工运动的原因，例如巴亚—斯普里耶的矿工运动(1726年)和巴纳特的矿工运动(1733年)，那时矿工们拒绝下井。对这种运动的惩罚是残酷无情的：有些人被判处苦役，有些人则被处死。

手工业与手工工场

在手工业领域内，在两个方面发生变革。首先，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随着法纳里奥特时代的生活方式东方化，一些老的手工业消失了，另一些新的出现了。最重要的变革发生在生产组织方面。手工业式的生产已不能满足与日俱增的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需要，手工业作坊的地位逐步为工人人数较多、劳动分工较细的工场作坊所代替。

这种工场作坊在十八世纪上半期见诸于各主 195
要活动领域。当然，其范围局限于两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利益所在。市场的

发展和羊毛的有利可图对部分贵族也是一种刺激，促使他们也在自己领地上建立工场。在罗马尼亚国创办了制呢工场，如康塔库齐诺家族庄园上的阿富马茨工场、地主斯勒蒂尼亚努庄园上的波乔瓦利什特工场和布加勒斯特附近的丰德尼造纸作坊等。在特兰西瓦尼亚，同样也出现了这样的工场，例如锡比乌、弗格拉什和德瓦附近的凯曼尼、泰莱基和哈勒尔诸家族的造纸工场。国家或朝廷官办工场比贵族和地主的工场作坊发达，组织也较好。属于这一类的，在特兰西瓦尼亚以博克沙、雷希察的铁矿冶炼工场作坊，多格尼恰和契克洛瓦的铜矿冶炼工场作坊(四地均在巴纳特)为最发达。象这类国家官办工场，还有蒂米什瓦拉、卡兰塞贝什的制呢和丝绸工场以及朱尔朱和弗格拉什的造纸工场。

在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也有一些工场作坊属于朝廷，诸如日伊日亚河上的基佩雷什蒂的制呢工场、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印刷所、特尔戈维什特的玻璃工场。

在一些城市，除了属于国家的工场以外，还建立了城市工场作坊，例如蒂米什瓦拉的制革工场；

在另一些城市，只有城市工场，其所有者主要是商人，如盖尔拉的制革工场、锡吉什瓦拉的织纱工场以及布拉索夫和锡比乌的纺织工场，这些工场也利用附近牧羊农民的家庭劳动。

在国家和朝廷的工场里，农奴或奴仆以劳动顶替劳役义务，他们得到极其微薄的工资。在贵族和地主的工场里，农奴和奴隶以劳动顶替徭役或者劳役。在商人的工场里，劳动力(来自穷苦手工业者)被付予工资。于是，在手工工场里出现了雇佣劳动，这是这些企业要走的道路的一个标志。

列宁概括说：工场手工业"……是手艺和带有资本原始形式的小商品生产同大机器工业(工厂)之间的中间环节"。①象在全世界一样，工场手工业通过其日益扩大的社会生产，通过其对于雇佣劳动的使用，在罗马尼亚诸国也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曙光。

商业和市场

充足的商品以及对这些商品的需求这两个根

① 《列宁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44页。

本条件在罗马尼亚诸国已比较充分，这就是存在相当繁荣的商业的原因。在许多城市，各有两个商业中心，每周有两个集日，定期集市和庙会越来
196 越多，客店和商路数目也随之增加，地主和教会在各城市买进店铺。

对外贸易额猛增。数万吨谷物、数十万头牲畜自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运往君士坦丁堡。此外还有大量的谷物和牲口在西里西亚、奥地利、波兰、德国和威尼斯等市场上出售。在这个时期，仍然以罗马尼亚三国间的贸易最为活跃。三个国家之间不断交换着农产品、矿产品、手工业和手工工场产品。

为了组织商业活动，在蒂米什瓦拉和锡比乌成立了商会。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许多城市还出现了“希腊”商人同业会。

迄至十八世纪下半叶的罗马尼亚诸国的政治状况

在法纳里奥特当政的一个世纪中，有十一个家族相继登上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君位，这些家族的成员按照奥斯曼帝廷的意愿，从这一国调

至另一国。总共有七十四任君主，这就是说平均每任在罗马尼亚国为两年七个月，在摩尔多瓦为三年。马弗罗科尔达特家族、古卡家族、伊普西兰蒂家族应该被认为是在罗马尼亚诸国历史上也建树了某些功绩的法纳里奥特家族。

在特兰西瓦尼亚，这期间同样有十四名从帝国军队指挥官中任命的省长或政府首脑先后登台。

罗马尼亚三国的历史还受到这个时期的俄、奥、土三国间频繁战争的很大影响，因为这些战争是在罗马尼亚诸国附近，乃至在它们领土上进行的，而且留下了后果。

法纳里奥特制度在摩尔多瓦的建立是1711年在普鲁特河上进行的俄土战争的结果，而在罗马尼亚国，这种制度则作为1716—1718年奥土战争前夜的一种预防措施。

十八世纪前半期的罗马尼亚诸国

1716—1718年的奥土战争及其后果

卡洛维茨和约（1699年）结束了奥地利和土

耳其之间的长期战争，前者虽然取胜，但并未摧毁土军。1711年土耳其人在普鲁特河上的斯特尼列什蒂取得的胜利及在此之后对威尼斯作战的胜利便是证明。这种形势威胁奥地利取得的新战果，并可能成为哈布斯堡实现新的扩张倾向的障碍。这就是奥土再次开战的原因，结果是奥地利再次获胜。

197 奥地利的胜利鼓舞了反法纳里奥特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是以人民运动和地主暴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首先，亲奥地利的奥尔特尼亚地主组成一个委员会，吁请出现在奥尔特尼亚的奥军。

在摩尔多瓦也形成一个亲奥地利派，同样吁请正在深入这个国家的奥地利人。在鞑靼人援助下，摩尔多瓦君主米哈伊·拉科维策赶走了奥军，并跟踪追袭至特兰西瓦尼亚。

奥地利人占领了奥尔特尼亚，俘获尼古拉·马弗罗科尔达特，并宣布舍尔班的儿子格奥尔基·康塔库齐诺为君主。但土耳其人任命伊昂·马弗罗科尔达特为罗马尼亚国君主。

此时，奥地利同土耳其在帕萨罗维茨签订了

和约（1718年）。和约对奥地利十分有利：巴纳特、奥尔特尼亚和塞尔维亚北部被割让给奥地利。

奥尔特尼亚的哈布斯堡统治

巴纳特陷入哈布斯堡占领下，并如上所述，组成皇室的一块领地。哈布斯堡对奥尔特尼亚的占领延续了二十一年，直至另一次反奥斯曼战争结束，在贝尔格莱德签订和约为止。在二十年占领期间，哈布斯堡人实施了若干旨在巩固其统治的措施。政治一行政权委任给一个听命于特兰西瓦尼亚和奥尔特尼亚帝国军队司令的委员会，由一个省长（巴恩），亦即格奥尔基·康塔库齐诺其人领导。每县任命一个军政官和一个行政官主管。税制规定为诸税合并为一。徭役义务规定为每年五十二天（也就是每周一天）。赋税加上维持奥军的费用，这两者是农民反抗和住在巴纳特的大量农民外流的原因。

1735—1739年奥、俄、土战争及其后果

对喀尔巴阡山南侧的扩张开了哈布斯堡人进一步向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拓疆的胃口。奥地利

同占领了亚速夫的俄国达成协议，发动了一次新的反奥斯曼战争。罗马尼亚诸国人民抱着取得独立的希望，支持这次战争，同俄军站在一起。

在穆列什河下游地区和巴纳特，人民利用这个时机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情绪。1735年，在首领彼得·塞盖丁纳茨领导下，阿拉德地区首先起义。起义者攻袭国家领地和城堡。对起义的镇压及对其领袖处以车磔酷刑没有吓倒不满者。他们于1737—1738年再次起义，攻袭帝国当局和军队。镇压是残酷的。许多村庄被夷毁，大批人遭屠杀。

198 但是，俄奥同盟显得过于脆弱。在连连败北后，同盟国接受了和平谈判，并于贝尔格莱德签订和约（1739年）。奥地利人失去了奥尔特尼亚，它重新统一于罗马尼亚国。奥地利人还放弃了塞尔维亚的领土，俄国人放弃了亚速夫。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的改革

在1735—1739年的奥、俄、土战争期间，在罗马尼亚国当政的是已两度充任这个国家君主、一度充任摩尔多瓦君主的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

特。由于横征暴敛和连年战争造成的罗马尼亚诸国的涣散状态，是这个法纳里奥特君主在一些地主赞同下致力于实施某些调整措施，进行行政、社会、政治和税制改革的主要原因。自然，马弗罗科尔达特这位比大多数同时代人显得进步和有教养的开明君主，也不乏革新的思想。

1741—1742 年"宪法"

在马弗罗科尔达特的改革中，主要有两项具有确实无疑的重要意义。首先是刊印在 1742 年《法兰西使者》上的 1741 年"宪法"，这是对地主和僧侣有利的法令，豁免了他们对朝廷的赋税；名目繁多的农民赋税合并为单独的一种，分四份以现金交纳。劳役仍然保持，并扩大至根据"契约"附着在一些庄园上的农民，他们劳役量同隶农所服的相等，从而把这些农民逐渐同农奴等同起来。

地主变成一种官僚贵族，其称号同以往和当时担任的官职相适应。官吏，包括中央官吏、地方官吏和州、县行政长官，首次发给俸银。司法职务同行政职务分离，即使不是完全分开。

废除人身奴役及这一措施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马弗罗科尔达特于1746年8月5日和1749年4月6日先后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颁行的改革。这项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鲁门尼耶、维钦尼耶），也就是说废除把农奴附着在土地上的法令，并调整了隶农对庄园主的义务。由于庄园主不同意无偿解放农奴（鲁门），因此他们要交十个银币（塔列尔）赎买人身，但不包括份地，从而获得有限的迁移权。对他们所经营的份地，农民负担着为地主和寺院服十二天徭役的义务，但这个数目不是经常被遵守的。摩尔多瓦的农奴（维钦）不能再被出卖或者赠送，但也不能按自已意愿迁移，因为他们每年担负着二十四天的徭役义务。

199 通过康·马弗罗科尔达特为防止农民从庄园逃亡和防止人民运动而实施的这项改革，过去的农奴从法律上说变成了自由人。

但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由于农户依然栖息于属于地主的土地上，从而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受地主摆布，因此根本谈不到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

瓦农民得到名副其实的解放。

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地主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奥斯曼的需求以及他们那种千方百计增加收入的贪欲，在法纳里奥特君主的支持下，于五十至六十年代，把康·马弗罗科尔达特的规定扔在一边，通过施行劳动定额制(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完成的每日劳动定额)迫使农民服更大量的徭役。其结果是加深了农民和市民的不满和动荡：他们逃亡至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群集于朝廷前上诉，不出工和拒绝履行其他义务；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贫民在近郊农民支持下举行暴动。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争取政治解放的斗争

社会近代化的标志也表现为罗马尼亚民族权利意识的日益清晰形成。特兰西瓦尼亚的社会压迫因民族压迫而加倍沉重，因而作为对绝大部分是马札尔人的统治阶级加在罗马尼亚人头上的不公正情况的一种反应，在这个国家首先出现了民族意识。

伊诺钱齐乌·米库主教的活动

哈布斯堡人企图利用教会联合来巩固其统治，罗马尼亚人则利用它来达到争取社会政治权利的目的。首先提出罗马尼亚人政治解放纲领的是伊诺钱齐乌·米库主教。在十六年的时间中（1728—1744年），这位刚强的主教勇敢无畏地向政府、国会和维也纳宫廷递呈请愿书、备忘录，提出不分教派的全体罗马尼亚人民的权利。米库坚持要求：罗马尼亚人应同特兰西瓦尼亚其他“民族”权利平等，应在国会、政府中有他们的代表，应能取得大大小小的公职；罗马尼亚平民应与其他“民族”平民一样；萨克逊人地区的农奴制应予废除，并给予农奴以自由迁移、上学、学习手艺的权利。换言之，要求废除加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头上的社会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否则，伊诺钱齐乌·米库扬言就要抛弃联合，发动农民。他的论据是建立在罗马尼亚人在达契亚的起源、古老性和连续性等历史状况，以及罗马尼亚人占
200 绝大多数、他们同样履行公共义务和服兵役等自然状况的基础上的。1744年致玛丽亚·铁列西亚

女王的一份《请愿书》总括了以往多份备忘录里提出的全部要求和观点。

反动势力——贵族和维也纳宫廷的勾结使这场斗争落空。无畏的主教奉召前往维也纳，并被迫去罗马求援，但一去不复返，于1768年在那里结束了残生。

斗争的继续

把伊诺钱齐乌从罗马尼亚人民中间逼走并未使特兰西瓦尼亚得到平静。就在米库以起义告诫当局之时，塞尔维亚修道士维萨里昂出现在特兰西瓦尼亚，在他途经之处，煽起了一次社会和宗教(正教)性质的真正的人民运动。

玛丽亚·铁列西亚授予正教教会的宽容令(1759年)也未产生女王预期的效果。相反，引起了一场在另一个修道士乔瓦拉(洪尼多阿拉的一个村)的索弗罗尼领导下的更大起义(1759—1761年)，这次起义具有反封建、反天主教和反哈布斯堡的三重性质。集合在起义旗帜下的人群，他们提出的改善农奴命运和一视同仁地改善正教教会这样一些带有社会性质的要求，威胁着哈布斯堡

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统治。帝国将军阿道尔夫·布科夫率领下的一场血腥镇压扑向这个国家。

然而，这样的手段解决不了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要消除后果，必先杜绝原因。

边防团的建立

哈布斯堡人以为在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和东部建立若干支边防军至少可以部分地实现杜绝起义根源的希望，因为农奴加入边防团，即可获得解放。但边防团主要使维也纳宫廷有利可图，它既扩大了军队，又可利用边防军来对付不驯服的贵族。

这样，在1762—1763年间，建立了两个罗马尼亚人边防团，一个在讷塞乌德地区，另一个在弗格拉什、锡比乌和洪尼多阿拉地区；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地区，建立了三个塞凯伊人团。此外，在巴纳特还有两个团，一个罗马尼亚—伊利里亚人团，另一个日耳曼人团。

由于从本地人中间任命军官、使用本族语言和给予边防军自由的诺言未能兑现，在1763年爆发了边防军的暴动。讷塞乌德的罗马尼亚人边防军首先发难，塞凯伊人随后响应，声势更为壮

大。暴动遭到血腥镇压，其首领被车磔。在此之后，不得不于1766年重新颁布关于边防团的新条令，解决了引起争执的若干问题，保证为边防军地区提供比较优越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条件。

奥斯曼对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统治的削弱 201

与此同时，东欧的事态促使罗马尼亚诸国的奥斯曼统治和法纳里奥特制度日趋削弱。

俄国出兵干涉波兰，暴露了沙皇称霸东欧、挤走奥斯曼帝国的意图。

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

奥斯曼帝廷察觉了危险，于1768年对俄宣战。俄军得到罗马尼亚诸国人民的支持，推进至多瑙河。俄国舰队的其他胜利给不希望俄国扩张的欧洲列强敲响了警钟。它们对土军提供援助，并出面调停，以期停止战争。为了“挽回”均势，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就瓜分波兰达成协议（1772年）。

对于此举，三国均感满意，于是开始了和平谈判，先在福克夏尼，尔后在布加勒斯特。值这些谈判之机，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地主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期望在三强保护下取得罗马尼亚诸国的独立。

由于未能达成和约，战争重开，俄军再胜，迫使奥斯曼帝廷接受在多布罗加签订的库楚克—凯纳吉和约（1774 年）。和约对俄国十分有利，使它取得了在奥斯曼帝国的内河、黑海和地中海航行和通商的自由。奥斯曼帝廷被迫保障罗马尼亚诸国原有特权，并部分放弃对我国产品的垄断。

同时，奥地利的贪婪使它真相毕露，它攫取了摩尔多瓦北部——布科维纳。这里有着摩尔多瓦的故都苏恰瓦，有着大量的罗马尼亚居民，有着古老的勒德乌茨和普特纳寺院，有着金碧辉煌的苏切维察、摩尔多维察和沃罗内茨修道院。

迄至十八世纪下半叶的罗马尼亚诸国的文化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罗马尼亚诸国在文

化上取得了一些特别重要的成就——罗马尼亚文学语言的胜利，由于重要的书籍从一国流传到另一国而产生的文化统一性，高等教育的普及，关于罗马尼亚人民起源和人种统一性思想的确立。同时，法纳里奥特时代便利了希腊文化的传布，
这种文化得到近缘的统治阶级的扶植，并受到希 202
腊——东方因素的影响，而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的统治，支持着拉丁文化和拉丁语，从而加深了它同其他社会阶层在文化上的分裂。

文 化 设 施

教 育

努力战胜封建制的障碍来实现近代化的社会需要以及法纳里奥特和哈布斯堡统治制度的利益，是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许多县城和州首府的皇家学校、特兰西瓦尼亚城市中的天主教中学、边防团地区的小学和矿区的矿业学校兴办的原因。

高等教育打上了同样的社会、政治利益的烙印。在1698年由耶稣会牧师主持改组的克鲁日

大学中，神学和修辞学占据主要地位，而自然科学被用来摈斥进步思想。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罗马尼亚、马札尔和萨克逊文化人士起而抗议耶稣会教育。

皇家学院早在十七世纪末业已组成，从十八世纪初起，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皇家学院继续扩大活动。尼古拉·马弗罗科尔达特、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格里戈里·吉卡和格里戈里·亚历山德鲁·吉卡所实行的改组这些高等学府的措施，其宗旨固然在于使教育近代化，但同时也为了在教学语言和内容上推行希腊化。

从皇家学校或城市学校毕业的青年，在里沃夫、君士坦丁堡、罗马、维也纳等地的外国高等学校完成自己的学业。

历史编纂学

象前一世纪一样，在这个时期，历史性的著作在价值和独创性上依然保持首位，尽管不能同迪米特里·康特米尔和御膳房总管康塔库齐诺的作品并驾齐驱。事实上，十八世纪二十至六十年代的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历史编纂学，从其地主

阶级的历史编纂学的特性来说，继承了由乌雷凯、科斯丁、伪卢德斯库、拉杜·波佩斯库所开创的十七世纪的编年史传统。

譬如说，眼界相当开阔、语言优美的无名氏著作《自1688年10月至1717年3月的罗马尼亚国历史》和拉杜·波佩斯库的作品《罗马尼亚国诸朝君主史》第二部就是如此。后者既是一部门阀编年史，又是第一任法纳里奥特君主尼古拉·马弗罗科尔达特的宫廷编年史。 203

《自1661年至1743年的摩尔多瓦国纪事》，从各方面来说都具有高度价值。这是伊昂·内尼库尔切的作品，无论从广博的知识还是从极其优美的语言来说，这位作家可称为十八世纪的伟大的罗马尼亚编年史家。在摩尔多瓦写作的其他历史性著作有：描写尼古拉·马弗罗科尔达特朝的阿克森特·乌里卡里乌的编年史；《拉科维策家族编年史》和可能是尼古拉·穆斯特的作品《吉卡家族编年史》等等，其价值较低。

特兰西瓦尼亚的历史编纂学出现了超越编年史的分析性的综合著作，尤其是以约翰·费尔斯蒂赫为代表的萨克逊历史编纂学。约翰·费尔斯

蒂赫著有多种著作，其中包括一部史纲性质的《罗马尼亚国史》。马札尔历史编纂学则以彼得·博德这个罗马尼亚人简史的作者为代表。在这个时代的罗马尼亚人编史家中，以拉杜·特姆尼亚及其作品《布拉索夫斯凯伊教堂史》为最重要。

科学著述

在这个时期的科学著作中，语言学著作，尤其是语法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首推迪米特里·欧斯塔蒂耶维奇的作品《罗马尼亚语法》。萨米尔·克莱舍里关于采矿的著作《罗马—达契亚金矿》，写于罗马尼亚国的《宇宙志》以及博德的作品、类似百科全书的《马札尔雅典神殿》均具有殊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艺术

无论就文物的分布或者兴建来说，艺术创作越来越转移到城市。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市民上升到比较富裕的地位以及越来越多的地主定居于城市。

在罗马尼亚国，依然残存着布伦科维亚努风格（安蒂姆教堂），但在蒙特尼亚，巴乐歌风格也占据了地位（佛克雷什蒂修道院）。

巴乐歌[1]风格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宗教建筑（克鲁日耶稣会教堂、蒂米什瓦拉和奥拉迪亚的罗马—天主教大教堂、布拉日和卢戈日的罗马尼亚大教堂）、世俗建筑（崩齐达的班菲宫堡）和军事建筑（克鲁日和阿尔巴—尤利亚的奥地利城堡）中，均占优势。

这个时期的艺术发展也是三个罗马尼亚国家间密切的文化联系的例证。同时，它为下一时期的更有价值的世俗艺术的发展勾画出了轮廓和准备了土壤。

① 巴乐歌（baroc）是十六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中叶西欧和中欧建筑和造型艺术的一种风格。巴乐歌式建筑，以豪华见称，多用弓形线条，外形以曲线圆形为主。——译者

关于中世纪的问题、资料、参考书目

204 关于中世纪(或早期封建主义)时期，我们拥有文字资料(叙述性的和文献性的)以及考古资料。在叙述性资料中，拜占庭作家凯德雷诺斯、斯基利采斯、凯考门诺斯、康斯坦丁·波尔菲罗杰奈杜尔、安娜·科姆奈娜和尼切塔斯·科尼亚特斯，从其著作所包含的记载来说，最为重要。此外，还有名为《往年故事》的俄国编年史以及《使徒杰拉尔德生平》和《匈牙利人业绩》(Gesta Hungarorum)。后者是匈牙利国王贝拉三世的史官称为无名氏的所写。

关于《匈牙利人业绩》这本著作的作者和价值曾展开过长期争论。有的认为其作者是贝拉二世国王的史官，有的说是贝拉四世国王的史官。有的否定这部著述的历史价值，以为只有文学价值，有的则认为连最小的细节也是可信的。

最优秀的专家们认为无名氏系贝拉三世国王的史官，但最近考证他为贝拉二世国王史官的呼声再度高涨。这部著作写于十二世纪末，但以十一世纪的某些史料为基础，并述及九世纪末和十世纪初发生的事件，是完全可信的。

在文献资料中，以有关特兰西瓦尼亚的文献，尤其是《奥拉迪亚审案录》较为重要。这本审案录包括1208—1235年间在奥拉迪亚州会堂前审理的三百八十九起案件记录。文献资料已汇

集于《罗马尼亚史文献——十一至十三世纪》(布加勒斯特，1952—1953年版)，比较重要的文献和叙述性资料已由什特凡·帕斯库和弗·汉加辑录于《研究国家和法历史资料选辑》第2卷(布加勒斯特，1958年版)。

考古资料包括一些农村居留地和设防居留地的发掘，诸如多布罗加的加尔文、太阳城珀库尤等地的发掘，罗马尼亚国的布科夫、德里杜、丘雷尔、特尔格绍尔等地的发掘，摩尔多瓦的赫林恰、勒杜克内尼、沃伊内什蒂等地的发掘，特兰西瓦尼亚的德伯卡、莫雷什蒂、比哈里亚等地的发掘。

关于这个时期，尚无一部囊括一切问题的基础著作。专门著述主要是语言学方面的，如N.德勒冈的《从地名与专有名词考察九至十四世纪的罗马尼亚人》(布加勒斯特，1933年版)以及埃·彼得罗维奇的《达契亚斯拉夫语》(见《达契罗马尼亚》(Dacoromania)学报第10卷，第2辑，1943年版)。考古著述实际上是发掘成果整理。专题论文集有格·什特凡教授主编的《迪诺杰齐亚》(1967年版)。

在真正的历史研究著述中，可以举出阿·萨切尔多齐亚努的著作《鞑靼人大入侵与东南欧》(布加勒斯特，1933年版)以及克·霍雷特的著作《四至十三世纪特兰西瓦尼亚史论丛》(布加勒斯特，1958年版)。

吉·奈迈特和吉·杰尔非关于塞凯伊人的研究并未完全阐明这个争论纷纭的问题。中世纪编年史家相信塞凯伊人起源于匈奴人。十八世纪的历史编纂学者们认为他们是佩彻涅格人和库曼人的残余，至于十九世纪的历史编纂学者们，有的认为他们是马札尔人，有的认为是匈奴人，有的说是阿瓦尔人，等等。新 205

近的研究断定塞凯伊人是某些操突厥语的部落融合、同化而产生的一种居民，他们早在马札尔人部落联盟居留于潘诺尼亚之前就归附马札尔人。

格·谬勒尔和克·许奈曼的研究仅仅部分阐明了特兰西瓦尼亚日耳曼居民的来历以及当时的背景。根据语言的特点以及一些文献记载，今天可以认为，称为法兰德斯人的移民团来自法兰德斯，称为条顿人的移民团来自莱茵河和摩塞尔河河谷，称为萨克逊人的移民团来自萨克逊。至于日耳曼人离开原居留地的原因，自然灾害（旱灾、洪水）说已被一种较可赞同的解释取代：他们有的是恐怕沦为农奴，有的则不堪农奴制的重负。

* * *

罗马尼亚诸封建国家形成问题，已由文献资料和叙述性资料说明。在文献资料中，最重要的是1247年的《约翰骑士敕书》。叙述性资料，国内的有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的诸种纪事，国外的则有《维也纳绘图编年史》(«Chronicon pictum Vindobonense»)以及奥托卡尔·德·斯蒂里亚的《奥地利韵文编年史》(«Österreichische Reimchronik»)。

对这些资料的仔细研究主要见诸于迪·昂丘尔的著作《罗马尼亚诸公国起源》(布加勒斯特，1899年版)，新近的则有布·肯皮纳的著作《罗马尼亚诸封建国家的出现问题》(布加勒斯特，1955年版)。

关于罗马尼亚诸国的形成，长期以来流行着内格鲁一伏德自弗格拉什国和德拉戈什自马拉穆列什"迁来"之说。大什特凡时代的诸种《纪事》肯定了此说，尔后又有摩尔多瓦的格里戈里·乌雷凯，罗马尼亚国的《康塔库齐诺纪事》和《罗马尼亚国诸朝

君主史》也作了肯定。康特米尔在其《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人古代编年史》中和欣卡伊在《罗马尼亚人及其他诸族编年史》中虽赞成迁来说，但有一定的保留，至于伯尔切斯库和科格尔尼恰努，则持怀疑态度。不同意见的争论几乎继续至我们时代。有的赞同编年史传统所展示的迁来说（如克塞诺波尔、格·布勒蒂亚努），有的则由于找不到完全正确的解释而提出修正(如昂丘尔、约尔加、拉佩达图、帕纳伊特斯库)。

拙见认为"迁来"问题应该这样理解：无论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地区还是在喀尔巴阡山以东，都存在着发展的、正处于统一和结合成一个单一国家过程中的政治形态。在这个过程展开期间，于十三世纪最后十年自弗格拉什，于十四世纪四十年代自马拉穆列什迁来了在某些总督（内格鲁、德拉戈什）统率下的大移民团，以逃避农奴化。他们成为喀尔巴阡山以南和以东的正处于变革中的社会的组成部分，作出了人口和政治上的贡献，加速了罗马尼亚诸国的形成过程(参见什·帕斯库：《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起义》，克鲁日，1947年版)。

*　　*　　*

关于发展的封建主义，考证和研究颇详。文献资料繁多，已汇集成多种汇编，其中值得了解的至少有胡尔穆扎基的汇编：《关于罗马尼亚人历史的文献》，此编发表的主要是原文的外国文献，另外还有M. 科斯特凯斯库发表的两卷集：《大什特凡以前的摩尔多瓦文献》以及彼·彼·帕纳伊特斯库所编的《罗马尼亚国文献》，其中发表了原件并附有译文。在《罗马尼亚史文献》：甲：摩尔多瓦；乙：罗马尼亚国；丙：特兰西瓦尼亚诸辑中，只刊载译文。(已经重新开始编订既有原件、又附译文的汇编，题为 206

《罗马尼亚史文献》——《Documenta Romaniae Historica》)。

叙述性资料同样也较丰富。大什特凡时代的五种纪事包括了以前时代的许多记载,乌雷凯的《纪事》(摩尔多瓦)、《康塔库齐诺记事》和《罗马尼亚国诸朝君主史》(罗马尼亚国)也是如此。最重要的文献和叙述性资料已收集于什·帕斯库和弗·汉加发表的《选辑》第2和第3卷(布加勒斯特,1958—1963年版)。

在这样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出现了研究各个领域的著述。在许多著作中,展示了社会经济状况,其中内容较为丰富的有:彼·彼·帕纳伊特斯库的《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农民村社》(布加勒斯特,1964年版),D.米奥克、H.基尔克和什·什特弗内斯库的《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封建地租的演变》(布加勒斯特,1960年版),什·帕斯库的《迄至十六世纪特兰西瓦尼亚的手工业》(布加勒斯特,1954年版),C.C.朱雷斯库的《十至十六世纪中叶的摩尔多瓦的集镇(城市)和城堡》(布加勒斯特,1967年版)。

研究工作者更重视政治史。已发表的有价值的著作有伊·米涅的《罗马尼亚诸公国与西吉斯孟皇帝的东方政策》(布加勒斯特,1919年版),彼·彼·帕纳伊特斯库的《老米尔恰》(布加勒斯特,1944年版),什·帕斯库的《十三至十四世纪罗马尼亚人历史资料考订》(锡比乌,1944年版)等。

博伯尔纳起义得到了应有的注意,农民和贵族间的两个协议原件业已发表,另有两部专门著述:什·帕斯库的《博伯尔纳》(布加勒斯特,1964年版)和L.德迈尼的《1437—1438年的博伯尔纳人民起义》(《Az 1437—38-as, bábolnai népi felkelés》,布加勒斯特,1960年版)。

在这些论著的基础上，写出了«罗马尼亚史»第 2 卷(布加勒斯特，1962 年版)和«特兰西瓦尼亚史论丛»第 1 卷(布加勒斯特，1963 年版)等综合性著作的有关章节以及 V. 科斯特凯尔、彼·彼·帕纳伊特斯库和瓦·格雷库的著作《十四至十七世纪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封建生活》(布加勒斯特，1957 年版)和什·帕斯库主编、集体撰写的教科书«罗马尼亚中世纪史»(布加勒斯特，1966 年版)。

*　　　*　　　*

保卫罗马尼亚诸国独立的斗争的胜利时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关于大什特凡朝的文献集业已发表，如扬·博格丹的«大什特凡文献»两卷集(布加勒斯特，1913 年版)。还有一些专门的编年史是写有关诸朝的，写洪尼多阿拉的扬库的，如：加斯帕尔·赫尔泰的«约翰·洪尼亚德的两部辉煌历史»(«Két szép historia……az Hunyadi Jánosról», 1580 年)，写弗拉德·采佩什的，如：同他敌对的萨克逊人集团的编年史«恶魔一伏德的故事»，以及他的近臣所写的褒扬的编年史«弗拉德·采佩什的故事»，写大什特凡的，如保存着五种改写本的宫廷官方编年史(«无名氏纪事»,«普特纳纪事»,«摩尔多瓦一日耳曼编年史»，«摩尔多瓦一波兰编年史»和«摩尔多瓦一罗斯编年史»)，乌雷凯的«纪事»的主要部分，波兰人扬·德卢戈斯的编年史的大部分，等等。

这些勇敢的将领的英雄业绩使得以伯尔切斯库为始直至今天的史学家们缅怀不已。在有关这个时代的较早和晚近的著作中，可以列举的有：伊·米涅：«魔鬼弗拉德及其时代»(雅西，1928 年版)，L. 埃列克什：«洪尼亚德»(«Hunyadi»，布达佩斯，1952 年版)，C. 穆雷山：«洪尼多阿拉的伊昂及其时代»(布

207 加勒斯特，1968 年版），什·帕斯库：《特兰西瓦尼亚诸公爵在洪尼多阿拉的扬库的反奥斯曼斗争中的作用》（克鲁日，1957 年版）。

弗拉德·采佩什朝及其人格成为一些意见矛盾的长期争论的对象。外国以及罗马尼亚的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从具有倾向性的德文的叙述出发，认为这是一个心理学问题，甚至是一种病理状态。另一些人只考虑他在 1462 年战争中的英勇行为，把他当作毫不逊色的英雄。弗拉德·采佩什无疑是一个热爱祖国并为祖国的自由而斗争的勇士和忠诚的爱国者。但同时他又性格暴戾，并由于这个原因有时使用血腥残暴的手段。关于这位君主的活动，B. 肯皮纳最近写了一部著作：《采佩什军队战胜穆罕默德二世苏丹》（布加勒斯特，1962 年版）。

大什特凡朝及其人格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和探讨的题目。从尼古拉·约尔加的考研详密、文字优美的专题著作《大什特凡史》（布加勒斯特，1904 年初版，1966 年再版）至今，史学家们揭示了新的材料和事实，提出了新的观点。伊·乌尔苏的专题著作《大什特凡》（布加勒斯特，1925 年版），虽未否定约尔加的著作，但标志着对这位伟大人物的研究工作进入了另一个重要时期。费·巴宾格尔的著作《占领者穆罕默德二世及其时代》（«Mahomat II le Conquérant et son femps»，巴黎，1954 年版）颇有价值，在这部著作中，摩尔多瓦的历史纳入了东南欧历史。新观点见诸于 B. 肯皮纳的著作《论大什特凡朝的社会基础》（布加勒斯特，1956 年版）和伊·库普沙的著作《十五世纪下半期（大什特凡）摩尔多瓦人的军事艺术》（布加勒斯特，1959 年版）。关于大什特凡时代的艺术和文化见诸下列著述：《大什特

凡时代的文物和艺术品集»（布加勒斯特，1958 年版）以及«大什特凡时代的摩尔多瓦文化»(布加勒斯特，1964 年版)。

* * *

十六世纪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见诸特兰西瓦尼亚国会决议汇编：«特兰西瓦尼亚王国议会文献»(«Monumenta comitialia regni Transylvaniae»第 1 卷，布达佩斯，1875 年版)、阿·维雷斯所编«阿尔迪亚尔、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历史文献»(布加勒斯特，1929—1935 年版)以及什·帕斯库和弗·汉加所刊辑的«选辑»第 2 卷(布加勒斯特，1958 年版)。

在较早的社会史著述中，可为今用的有 C. 米雷斯库的著作«社会史论文集»(第 2 版，布加勒斯特，1943 年版)，伊·阿恰迪的«马札尔农奴制史»(«Magyar jobbágyság története»，布达佩斯，1906 年版)，S. 马尔基的«格奥尔基·多札»（布达佩斯，1913 年版)。在近著中，有什·帕斯库的论著«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起义»（克鲁日，1947 年版)，伊·萨博的«马札尔农民史论文集»（«Tanulmányok a magyar parasztság történetéből»，布达佩斯，1948 年版)，格·赛凯伊的«马札尔农民起义文学»(«A magyar parasztháboruk irodalma, 1437—1514»，布达佩斯，1950 年版)，什·帕斯库的«特兰西瓦尼亚的手工业»（布加勒斯特，1954 年版）和«格奥尔基·多札领导下的 1514 年农民战争»(布加勒斯特，1959 年版)，R. 马诺列斯库的«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与布拉索夫的贸易»（布加勒斯特，1965 年版)和 D. 普罗丹的两卷本«十六世纪特兰西瓦尼亚的农奴制»(布加勒斯特，1967 年版)。

* * *

阐述奥斯曼对罗马尼亚诸国统治建立后罗马尼亚诸国与奥
208 斯曼帝廷关系的著述有：什·帕斯库的«彼得·切尔切尔与十六
世纪末的罗马尼亚国»（锡比乌，1944年版）和«公国时代的特兰
西瓦尼亚，1541—1699年»（克鲁日，1948年版），M. 贝尔札的
«十五至十九世纪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哈拉吉»（布加勒斯
特，1957年版），迪努·朱雷斯库的«勇敢的伊昂—伏德»（布加
勒斯特，1963年版）。对一些机构的研究见诸什·帕斯库的著
作«封建时代罗马尼亚诸国的中央机构»(«Les institutions cen-
trales des Pays Romains à l'époque féodale» 斯特拉斯堡，1967
年版），什·什特弗内斯库的«罗马尼亚国的巴恩职守»（布加勒
斯特，1965年版）和N. 斯托伊切斯库的«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
瓦的御前会议与大臣»（布加勒斯特，1968年版），等等。

甚被忽视的文化问题近来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较早的著作中，可作参考的有N. 约尔加的«罗马尼亚文学史»（第1卷，布加勒斯特，1925年版），N. 德勒冈的«自起源至十八世纪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文学史»（布加勒斯特，1938年版），N.卡尔托让的«罗马尼亚古代文学史»（布加勒斯特，1942—1945年版），N. 阿尔布的«1800年前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教育史»（布拉日，1944年版），亚·皮鲁的«罗马尼亚古代文学»（布加勒斯特，1961年版），格·伊瓦什库的«罗马尼亚文学史»第1卷（布加勒斯特，1966年版），等等。对出现罗马尼亚书面语这个重要时刻的研究见诸彼·彼·帕纳伊特斯库的«罗马尼亚书面语的发端及其胜利»（布加勒斯特，1964年版）。

关于艺术问题，V. 佛特希亚努的«罗马尼亚诸国的封建艺术史»第1卷（布加勒斯特，1958年版），格·约内斯库的«罗马

尼亚建筑史》第1卷(布加勒斯特,1963年版)以及格·奥普雷斯库主编的《罗马尼亚美术史》(布加勒斯特,1968年版)等综合性著述颇有实用价值。

* * *

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成就——罗马尼亚诸国的独立和统一的另一个光荣时代,即勇士米哈伊时代,越来越受到史学家的重视。除上述诸种巨卷文献汇编外,关于这个时代另有一些专集,诸如N.约尔加编辑的《关于罗马尼亚人历史的论文和文献集》以及胡尔穆扎基丛书第12卷、由约尔加所刊辑的题为《关于勇士米哈伊的战争和战果的文件》的文献集(布加勒斯特,1903年版),彼·彼·帕纳伊特斯库刊辑的《勇士米哈伊历史文献》(布加勒斯特,1936年版)及其他。

国内和国外的叙述性资料同样也十分繁多和丰富。首先是本国的纪事,包括在蒙特尼亚的两部大型编年史文辑《康塔库齐诺纪事》和《罗马尼亚国诸朝君主史》中的记载,这两部著作,前者由一个地主撰写,后者出自掌玺大臣特奥多西·鲁迪亚努之手,并有巴尔塔萨尔·瓦尔特尔翻译的拉丁文本。两个希腊人斯塔弗里诺斯和帕拉梅德给这位勇敢的君主各献一首长诗。在特兰西瓦尼亚编年史家中,较广泛地研究这个时代的是什特凡·萨莫斯克齐,他著有《历史著述》,其次是W.贝特兰,他著有《特兰西瓦尼亚起义史》。勇士米哈伊送给托斯卡纳公爵的十分广博的回忆录可看作一部真正的自传体编年史。

关于这个时代的史学著述,尤为丰富。自尼·伯尔切斯库的古典著作《勇士米哈伊一伏德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人》开始,各种著述接连不断。我们列举那些有新贡献的最重要的作品:L.萨德茨

基:«特兰西瓦尼亚史和勇士米哈伊史»(«Erdély és Mihály Vajda története»,蒂米什瓦拉, 1899 年版),伊·塞尔布:«勇士米哈伊史»(两卷集,布加勒斯特,1904—1907 年版); N·约尔加:«勇士米哈伊»(两卷集,布加勒斯特,1935 年初版,1968 年再版),彼·彼·帕纳伊特斯库:«勇士米哈伊»(布加勒斯特,1936 年版),埃·德拉戈米雷斯库—布兹内和伊·库普沙:«勇士米哈伊的主要军事行动述评»(蒂米什瓦拉,1936 年版),等等。

209 晚近的研究揭示了勇士米哈伊朝的研究得较少的一些侧面,有什·帕斯库的«勇士米哈伊进入特兰西瓦尼亚时的农民运动»(布加勒斯特,1956 年版);彼·彼·帕纳伊特斯库的«罗马尼亚诸国农民的迁移权»(布加勒斯特,1956 年版);伊·多纳特的«勇士米哈伊的农村»(布加勒斯特,1960 年版);伊·约纳什库的«勇士米哈伊和阿尔巴—尤利亚条约的制定者»(克鲁日,1962 年版),等等。

* * *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无论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文献记载均较翔实。其中大都收集于前面诸节所提到的胡尔穆札基、约尔加、维雷斯、«议会文献»、«罗马尼亚史文献»等巨册资料汇编中。此外,还有伊·卢帕什刊辑的文献集«特兰西瓦尼亚历史文献»(克鲁日,1940 年版)。叙述性资料极多:米隆·科斯丁的«纪事»、«康塔库齐诺纪事»、«罗马尼亚国诸朝君主史»、内库尔切的«纪事»、迪·康特米尔的«摩尔多瓦写实»、格·克劳斯和M.米勒斯的«编年史»等等。司法资料是关于这个时代的一种新的珍贵资料:«罗马尼亚训谕»、«法律规范»、«律令审编»和«律令大全»。主要的外交资料和叙述性资料已收集于什·帕斯库和弗·

汉加的«选辑»第3卷(布加勒斯特，1963年版)。

关于这个世纪虽然文献记载较为丰富，但对之作较详的研究却是近来刚刚开始。城市手工业者的状况受到较大关注，出版了多种有价值的著述：埃·帕夫列斯库的«摩尔多瓦的行会经济»(布加勒斯特，1939年版)；什·奥尔特亚努和克·舍尔班的«中世纪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手工业»(布加勒斯特，1969年版)。研究铁业生产的有D.普罗丹的«十七世纪洪尼多阿拉领地上的铁业生产»(克鲁日，1958年版)。D.米奥克还研究了«马特伊·巴萨拉布朝时代的税制改革»(布加勒斯特，1959年版)。

奥斯曼统治制度在什·帕斯库和M.贝尔札的下述著作：«公国时代的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哈拉吉»中得到了反映。

研究马特伊·巴萨拉布和瓦西里·卢普两朝的著作有V.莫托格纳的«马特伊·巴萨拉布和瓦西里·卢普时代»(雅西，1940年版)，而P.切尔诺沃德亚努的著作«1655年布加勒斯特的御林军和步兵起义»则是研究1655年起义的。

研究迪·康特米尔的有两部有价值的著述：伊·米涅的«论迪米特里·康特米尔——人、作家、思想家»(雅西，1926年版)和彼·彼·帕纳伊特斯库的«迪米特里·康特米尔生平与作品»(布加勒斯特，1959年版)。研究康·布伦科维亚努朝的著作有尼·约尔加的«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伏德生平及其朝代»(布加勒斯特，1914年版)，研究特兰西瓦尼亚的弗·拉科齐起义的著作则有阿·瓦尔科尼的«拉科齐的解放斗争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开展»(«A Rákóczi szabadságharc kibontakozása Erdélyben»，布达佩斯，1954年版)。

在文化史著述中，除关于十六世纪一节所提到的诸种外，还值得提出的有：尼·约尔加的《罗马尼亚教育史》(布加勒斯特，1928 年版)，埃·斯特内斯库的《蒙特尼亚编年史家导论》第 1 卷(布加勒斯特，1961 年版)，伊·基齐米亚和 D. 西蒙内斯库的《罗马尼亚文学中的民间书籍导论》第 1 卷（布加勒斯特，1963 年版）以及伊·克勒琼和阿·伊利耶希乌的《十五至十八世纪关于罗马尼亚史的国内编年史手稿索引》(布加勒斯特，1963 年版)。

* * *

关于法纳里奥特王朝和哈布斯堡统治，自十八世纪至今评
述各异。有些人认为法纳里奥特诸朝是罗马尼亚人民历史上最
黑暗的一页，因为国家的自治更加削弱，对奥斯曼帝廷的义务增
210 加，赋税达到了最高限度。同样，有些编史家认为哈布斯堡统治
贪得无厌和专暴无比，奥地利统治制度是一种殖民地或半殖民
地制度。无疑，这些重大的缺陷是实际存在的，但这些编史家也
将它们描写得过分漆黑一团了。我们列举几项事实：在法纳里奥
特和哈布斯堡人时代开始了机构的近代化，废除了农奴的人身
奴役，传播了启蒙主义的文化和思想。的确，这些革新并不仅仅
是法纳里奥特和哈布斯堡人的功绩，而首先是社会内部变革的
结果，社会按照规律发展的结果，但主持其事者也有一定的功绩。

关于十八世纪，除上述诸种文献汇编外，可用的还有 D. 斯图尔扎—斯凯亚努刊辑的文献集《关于农民问题的文件和法令》第 1 卷(布加勒斯特，1907 年版)以及尼·约尔加刊辑的《外国外交通讯有关我们诸国十八世纪的记载》(布加勒斯特，1909—1910 年版)。在叙述性资料中，与其说编年史不如说一些同时代人的笔记颇为珍贵，诸如 F. G. 鲍威尔的《关于瓦拉几亚的历

史和地理札记»(Mémoires historiques et géographiques sur la Valachie»,法兰克福,1778年版),什·赖凯维希的«关于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历史、自然和政治见闻»(Osservazioni storiche, naturali e politiche intorno la valachia e Moldavia»,那不勒斯,1778年版),伊·本克的«特兰西瓦尼亚或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两卷集(«Transsilvania sive magnus principatus Transsilvaniae»,维也纳,1778年版),而最珍贵的是格·欣卡伊的著作«罗马尼亚人及其他诸族的编年史»(布加勒斯特,1886年初版,1967年新版,由弗·富加鲁校订)。主要的外交资料和叙述性资料收集于什·帕斯库和弗·汉加的«选辑»第3卷(布加勒斯特,1963年版)。

论述法纳里奥特时代的最早的著作是 A. D. 克塞诺波尔的«法纳里奥特诸朝»(雅西,1893年版),属于夸大法纳里奥特弊害的作品之列;但这种论断在其综合性巨著«图拉真达契亚的罗马尼亚人史»第8至9卷的第3版中(布加勒斯特,1929年版)有所减弱。

关于特兰西瓦尼亚各个方面的历史,格·巴里齐乌所著«特兰西瓦尼亚历史各个侧面»(锡比乌,1889年版)仍然保持其充分的价值。

在十八世纪问题中,研究得最认真的是农民问题。这个问题的论著涉及面颇广,有些考证颇翔实,立论也相当正确,诸如 R. 罗塞蒂的«摩尔多瓦的土地、村民和主人»(布加勒斯特,1907年版),但另一些在这两方面均颇粗疏,如 I. C. 菲利蒂的«1864年前罗马尼亚诸公国的土地所有制»(布加勒斯特,1935年版)。

对土地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如今仍受人重视,最近出版的一

些有价值的论著有：Z. 托特的《1848年前西山地区的农民运动》(布加勒斯特，1955年版),S.帕帕科斯蒂亚的《论十八世纪前半期罗马尼亚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布加勒斯特，1959年版)和B. 苏尔杜的《十八世纪至霍里亚起义时期特兰西瓦尼亚社会经济发展路线》(克鲁日，1960年版)。

在关于经济发展的著述中，由于资料丰富依然保持着价值的有：尼·约尔加的《罗马尼亚人工业史》(布加勒斯特，1927年版)，格·扎内的《罗马尼亚诸公国的贸易经济》(布加勒斯特，1930年版)和埃·帕夫列斯库的《摩尔多瓦的行会经济》(布加勒斯特，1939年版),近著则有什·奥尔特亚努和C.金尔班的《中世纪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手工业》(布加勒斯特，1969年版)。

关于奥地利在奥尔特尼亚的统治的著述有亚·瓦西里斯库的《奥地利人统治下的奥尔特尼亚,1716—1739年》(布加勒斯特，1929年版)和S. 帕帕科斯蒂亚的近著《奥地利统治下的奥尔特
211 尼亚(1718—1739年)》(布加勒斯特，1971年版)，关于康·马弗罗科尔达特改革的著作有伊·米涅《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伏德的"改革"》(雅西，1927年版)。

有关正教问题的著述有S. 德拉戈米尔的两卷集《十八世纪阿尔迪亚尔罗马尼亚人的宗教解放史》(锡比乌，1920—1930年版)，而论述希腊—天主教问题的著作则有阿·布涅《伊诺钱齐乌·米库·克莱因大主教》(布拉日，1900年版)。关于伊诺钱齐乌·米库的活动,见阿·德切伊新发表的论文:《伊诺钱齐乌·米库·克莱因1744年致玛丽亚·铁列西亚女王的备忘录(《请愿书》,见《克鲁日历史研究所年鉴》,第10卷，1967年版)。

近　　代

罗马尼亚诸公国

资本主义关系的出现

在世界史上，近代的特征在于生产力的巨大高涨、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科学和文学的迅速发展以及深刻的政治变化。

在荷、英、法、意等国，这一时代是随着一个新的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采矿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运输业的扩展以及一些效率和生产率都较高的新工艺、机器和设备的发明而开始的。

这是一个在精神上与黑暗和宗教迷信进行光辉斗争的时代，文化繁荣的时代，建立以启蒙主义为形式的新人道主义的时代。

旧的倒退势力——大封建领主、贵族、反动王朝、保守的教会（特别是罗马一天主教），都起来反对一切领域内的革新倾向。

新生力量对旧势力的这一斗争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继续扩展，席卷西方和东方愈来愈多的国家，从而广泛地打开了近代的大门。

在罗马尼亚诸公国，奥斯曼帝国倒行逆施的统治长期阻碍了这种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尽管存在着客观的可能性，尽管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真正的力量和才能，尽管象迪米特里·康特米尔、康塔库齐诺—斯托尔尼库和伊昂·伊诺钱齐乌·米库等伟大的科学家和政治家进行了辉煌的活动，但是由于外国的压迫，罗马尼亚的复兴没有得到迅猛的开展。然而，由于土耳其统治的削弱，由于内部斗争（尤其是以罗马尼亚人为首 214
的东南欧人民的斗争）和邻国从外部的打击，新的力量和关系的幼苗也开始在罗马尼亚诸公国冲破旧关系的缺口而得到成长。

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十八世纪下半叶，手工业工场在特兰西瓦尼亚、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都开始建立起来。这种手工业工场，除了使用奴隶们的劳动之外，还使用雇佣劳动。在巴纳特兴建了高炉和铸造作坊；在西山地区，采矿业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在奥尔特尼亚、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纺织、玻璃、造纸等工场手工业得到了发展。在克服重重困难后，开始修建新的道路，其中有些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在农业劳动中，人身奴役——农奴制度已不能保证生产和必要的收人。因此，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在十八世纪中期废除了这种制度。

在这个时期，特别在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和约后，国内和国际贸易都得到了发展。这样就出现了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因素。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震撼了特兰西瓦尼亚。这种起义从1735年(彼得·塞盖丁纳茨)到1784—1785年(霍里亚、克洛什卡、克里山)，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在喀尔巴阡山两麓，罗马尼亚民族愈来愈有机地形成着，1791年的瓦拉几亚人请愿书是它的第一个政治纲领。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的斗争日益高涨，终于导致1821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民族，民族解放斗争，民族统一，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多瑙河诸公国的统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无产阶级

——由于新的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新的阶级——的组成及其斗争，所有这些都是近代的特征。

最后，文化领域也出现了崭新的事物，世俗的、民主的新文化代替了与教会和封建阶级相连的旧文化。“阿尔迪亚尔学派”奠定了近代罗马尼亚语言学和历史编纂学的基础，这两门科学的一些代表人物还是新文学的奠基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交替时，罗马尼亚诸国的新的文学、戏剧和艺术明显地形成起来了。

封建关系的崩溃

早在十八世纪中期和下半期，罗马尼亚诸国各部门出现的革新日益明显起来。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地主或贵族庄园中显现出来，表现为：改进庄园的经营管理；扩大自由地（由庄园主直接经营的田庄部分）；集中大领地；限制农民的份地和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增加劳役和什一税，并把它们转变为货币地租。在采矿和手工业工场中也出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这时，手工业工场的数 215
目和种类也有明显的增加（制呢、头巾、玻璃、造

纸、陶器、印刷等工场，其中有地主和寺院经营的，也有国家和市民经营的），技术日益先进，雇佣工人日益增多，劳动分工也日益精细。在商业中也不乏资本的原始积累，贸易业务扩大，高利贷有所发展，国内和国外市场本身也因而发展起来。这一切现象都对经济领域内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起着破坏作用。以霍里亚领导的1784年的大起义和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1821年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为高潮的人民运动（逃跑、逃难、各种形式的反抗、农民和市民起义），破坏着社会关系；民族运动——如1791年的请愿书破坏着政治关系，而启蒙思想则破坏着意识形态关系。

奥斯曼帝国对罗马尼亚诸公国统治的削弱

在库楚克-凯纳吉和约签订后，奥斯曼帝廷通过同年颁布的一项诏令（特许令）以及其他补充诏令，确定它同罗马尼亚诸公国的关系：土耳其官吏和商贾只有拥有许可证才能进入公国；土耳其人

不能再在公国领土上居住，也无权占有庄园；产品必须按市价支付；没有正当理由，未经保护国——俄国的赞同，不得废黜国君。

废除向苏丹和土耳其大臣的某些贡礼，但仍保留岁贡、礼品、国君登基的贡金和每年或每三年一次的君主续位金。岁贡规定罗马尼亚国缴纳三十万零九千五百皮亚斯特尔①，摩尔多瓦交纳六万七千九百四十五皮亚斯特尔。拜兰节贡金规定两个公国均缴纳九万皮亚斯特尔。新年贡金规定罗马尼亚国缴纳四万皮亚斯特尔，摩尔多瓦缴纳二万五千皮亚斯特尔。取得王位和得到重新确认所需的费用则由奥斯曼帝廷随意规定，可以根据王位竞争的情况无限增加。

奥斯曼的统治受到节制，从而有所减弱，同时对奥斯曼帝廷所需产品的垄断也受到了限制。

国际环境

由社会内部发展所引起的这些变革，同时也

① 土耳其银币，于十七、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在罗马尼亚诸公国流通。——译者

受到离我国领土或近或远的外国事态的影响。

首先是四强——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角逐。奥斯曼帝国竭
216 力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其余三大强国则各自力图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是排挤土耳其人，就是相互排挤。为此目的，它们结盟或拆盟，组织易分也易合的虚伪的联盟。

其中，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为了瓜分奥斯曼帝国于1782年达成协议，企图让奥地利占领塞尔维亚，重新建立"拜占庭帝国"，并企图通过合并罗马尼亚两公国来建立一个由俄国大公统治的达契亚国。这些方案未能实现，但俄国并吞了克里米亚，并把格鲁吉亚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1787—1792年的俄、奥、土战争

英国、普鲁士和波兰都不希望俄国强大，它们敦促奥斯曼帝廷对俄宣战；战争于1787年爆发。俄军在俄国南部和罗马尼亚诸公国获胜。罗马尼亚义勇军协同作战，给予俄军以很大的支援。初战受挫后的奥军，重整旗鼓，攻克了塞尔维亚的一

些重要城堡，占领了罗马尼亚国以及喀尔巴阡山和塞列特河之间的摩尔多瓦，而塞列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地区则被俄国人占领（1789年）。奥地利人在占领区设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企图把这些领土并入帝国。但是，尼得兰和匈牙利的反哈布斯堡运动以及法国革命的爆发，迫使维也纳宫廷根据战前的状态同土耳其人签订了西斯托夫和约（1791年）。

俄国单独继续进行战争，在摩尔多瓦、多布罗加和亚细亚又获胜。但是，波兰的运动和法国革命的成功，迫使俄国人签订了雅西和约（1792年），俄国获得了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一些地方。

法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法国革命的爆发和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法国革命家所传布的关于自由和民族主权的思想，促使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人民——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加强他们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就在西斯托夫和会上，蒙特尼亚的地主阶级向参加和会的列强递

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国家独立。摩尔多瓦人和蒙特尼亚人在二十年里曾向法国、奥地利和俄国递交了类似的其他备忘录。摩尔多瓦地主在1802年致拿破仑的一份备忘录中，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贵族民主”共和国。

拿破仑由于需要同普鲁士结盟以反对奥地利和俄国，不愿肢解奥斯曼帝国，因此不支持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各国人民的独立斗争。

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

俄国企图利用当时的局势，自封为这些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支持者。1806年，俄军渡过德涅斯特河，占领了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授予梦想充当达契亚国王的康斯坦丁·伊普西兰蒂
217 以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大公的头衔。拿破仑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07年在提尔西特签订的同盟条约，一度影响了事态发展的方向，因为这两个皇帝达成协议要瓜分欧洲。可是没有一个是真诚的，两人都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撕毁协议。

因此，当法奥战争爆发时，俄国人又对土耳其重新开战，又一次得到罗马尼亚人，尤其是奥尔特

尼亚潘杜尔军[1]的支持，取得了可观的胜利。罗马尼亚人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这些胜利，迫使奥斯曼帝廷开始和谈，俄国也接受了和谈，因为拿破仑已发动对它的远征。布加勒斯特和约(1812年)规定，罗马尼亚诸公国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廷统治之下，被并入沙俄的介于普鲁特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领土——比萨拉比亚除外。

欧洲各国的君主利用拿破仑先在俄国、后在滑铁卢的失败，召开维也纳会议并建立"神圣同盟"(1815年)，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准许对领土作任何变更，人民的任何民主和独立运动都遭到血腥镇压。

罗马尼亚诸公国的内部组织

从1768—1774年战争到1821年间的半个世纪中，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地主阶级曾屡次尝试使两个罗马尼亚公国摆脱奥斯曼的统治，并把它们组成两个独立的国家或联合成单一的国家，

①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由奥尔特尼亚农民组成的非正规军。——译者

但都没有取得所希望的结果。欧洲列强的利益同罗马尼亚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罗马尼亚诸公国仍然从属于土耳其并处于俄国的保护之下，这两个帝国根据各自的利益在国际政治赌博中利用着它们。

罗马尼亚诸公国的中央和地方机构

在内部变革破坏着封建关系、新的资本主义关系逐渐代替封建关系、宗主国和保护国这两个强国的利益强烈地影响罗马尼亚诸公国的这种新的情况下，罗马尼亚诸公国的内部组织必然发生与新的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的变化。

朝　廷

218 在地主阶级早在1768—1774年战争时期就要求拥立本国人当国君的愿望未被理睬的情况下，法纳里奥特国君又被扶植上台，并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君的稳定性和在位的年限作了调整。1783—1784年，奥斯曼帝廷保证，除非发生反叛，不再废黜国君，但这一决定没有得到尊重。1802年，奥

斯曼帝廷被迫接受得到俄国支持的地主阶级的要求，保证国君任期七年；1819年，又把可以充当罗马尼亚诸公国国君候选人的法纳里奥特家族的数目减少为四家。争取朝廷稳定性的这些努力，表达了罗马尼亚诸公国要求自治并进而要求独立的愿望。

司法组织

国君形式上保持着原有特权，其中包括最高司法权：主持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国政会议，进行司法改革，制订法律。

在旨在使司法组织更加完善并使之近代化的改革中，亚历山德鲁·伊普西兰蒂进行的1775年改革颇为重要。为刑事、民事和商事诉讼分别设立了四个称为“部”的法庭。伊普西兰蒂使司法近代化时，还试图把司法同行政分开，他通过1780年的法典建立了县法院，确定了审判程序。1818年的卡拉佳法在这条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它受法国民法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契约和继承权的条款。

行 政 组 织

行政组织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罗马尼亚公国的县归属三个地域更广的单位：奥尔特尼亚（五个县），由地方长官管辖；上国（蒙特尼亚西部）和下国（东部），各由一名司法长官和行政长官管辖。摩尔多瓦各州也划分为两个大区，即上国（北部）和下国（南部），各由两名长官管辖。县由两个行政官管理，下设乡，由乡长管理；州由两个行政官管理；州下设区，由区长管理。

这是旧的组织形式和具有近代性质的革新的混合物，官吏的报酬制度中也表现出这两个方面的共存：既有献纳（从课收赋税和贡品中得到的收入），也有俸银（固定的货币薪金）。

特兰西瓦尼亚和约瑟夫二世皇帝的改革

与两公国实行新政改革的同时，约瑟夫二世皇帝也在哈布斯堡帝国推行具有启蒙精神的改
219 革，这些改革也对特兰西瓦尼亚有所影响。首先

是把书刊检查从高级僧侣控制下解脱出来，授权给较自由的世俗的书籍审查委员会；取缔一系列修士团，并赎买其财产；发布宽容令，授予一切教派以自由修行权（1781年）；进行行政改组，把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国划分成十一个郡，由领取薪俸的官吏管辖；通过设立皇家院（上诉法院），把司法和行政分开，克鲁日和特尔古一穆列什的法院隶属皇家院；用日耳曼语代替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废除农奴的人身奴役，给予他们自由迁移、婚配、学手艺和拥有财产的权利。

在倒退势力的压力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约瑟夫不得不在临终时（1790年）亲自取消这些改革，给贵族恢复原有权利。

霍里亚领导下的1784年农民起义

起义的原因

霍里亚起义是整个十八世纪以各种形式在特兰西瓦尼亚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社会和民族运动的高峰。所有这些运动都是由于罗马尼亚人民遭受社会和民族压迫而产生的，这种压迫在六十年代

和七十年代更加苛重。

徭役，规定自带耕畜者每周服三天，徒手者每周服四天，但这一规定往往被无理篡改为每周服七天。向地主和国家缴纳的货币地租以及供养官吏和维持军队的捐税也有增无已。莫茨人①的义务尤为沉重，采矿、修建炼铁炉、采伐和搬运木材、烧炭、运输矿石等劳役没有穷尽。此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专横的措施：掠夺草场和森林，禁止开酒店。

开酒店权租给了一些亚美尼亚人，他们的敲诈勒索引起了许多不满，1782 年 5 月 24 日在肯佩尼集市上，这种不满情绪酿成一次真正的暴动。二十三名被认为是暴动首领的莫茨人被监禁，其中五名被判处死刑，莫茨人被迫支付超过实际损失二十四倍的赔偿。

莫茨人忍无可忍，以霍里亚为首的代表第四次前往维也纳，要求皇帝主持正义，因为地方当局曾屡次拒绝他们的正义要求。

当时，奥俄两国皇帝已达成瓜分奥斯曼帝国
220 的协议。这一计划意味着战争，而战争需要士兵。

① 西山地区的罗马尼亚人。——译者

为了拥有尽可能多的士兵，约瑟夫二世于1784年1月31日颁布一道法令，把边境附近的其他村庄也招募入边防团。渴望摆脱农奴制的农民把这道法令解释为适用于整个特兰西瓦尼亚。招兵处被挤得水泄不通，尤其是阿尔巴—尤利亚招兵处，整村整村的人报名应征。被自由的狂热所支配的农民不再听从当局和贵族的命令。当局和贵族获准取消征募后，采取他们惯用的蛮横手段强迫农民服从，这种措施引起了新的不满浪潮。

起义的爆发和开展

霍里亚率领的莫茨人代表团从维也纳回来时，这种精神状态笼罩着特兰西瓦尼亚；皇帝在皇宫召见时所持的态度使代表团受到了鼓舞。

1784年10月28日，正逢扎兰德地区布拉德集市，大批莫茨人云集而来，格奥尔基·克里山以霍里亚的名义号召每村派四、五名男子于10月31日到梅斯蒂亚肯集会。扎兰德、洪尼多阿拉和阿布鲁德山区的约五、六百人响应号召。在克里山的率领下，集会的群众向阿尔巴—尤利亚进发，

以便领取武器和摆脱农奴制。在布拉德附近的库雷丘村，农民们遭到扎兰德当局代表的袭击。11月1日的库雷丘事件就是点燃了熊熊烈火的星星之火。

起义迅速席卷了整个扎兰德，并由此蔓延到洪尼多阿拉和阿布鲁德山区。11月4日，在布勒任尼乡边界，霍里亚当着克洛什卡、克里山和他儿子伊昂的面，向聚会的群众宣誓。起义者在矿工的支援下，占领了山区的市镇：肯佩尼、阿布鲁德、罗希亚、兹拉特纳。洪尼多阿拉的贵族已逃进德瓦城堡，起义者两次攻打，但未予攻克。

11月8日，当局在一些村长的协助下，企图在布丘姆捉住霍里亚，但由于莫茨人的干预而未得逞。此后，起义更趋高涨，蔓延越来越广，西南直至阿尔迪亚尔和巴纳特地区，北至马拉穆列什地区，东南扩至锡比乌和弗格拉什地区。

罗马尼亚农民参加了起义，当起义扩展到马札尔人居住地区和萨克逊人居住地区时，马札尔农奴（图尔达一带）和萨克逊农民（特尔纳瓦河一带）也揭竿而起。

起义纲领在领袖们的头脑里更加明确起来，

正如1784年11月11日起义者以霍里亚的名义给逃进德瓦城堡的贵族发出的最后通牒中所阐明的：今后不应再有贵族，人人靠自己承担的职务生活；贵族永远放弃庄园，把庄园土地分给农民；贵族也要象平民一样缴纳赋税。这是当时在特兰西瓦尼亚提出的最进步的纲领，这一纲领一旦实施，意味着摧毁封建关系基础本身。

面对着向纵深发展的起义，当局和贵族惊恐 221
万状。他们采取了一个又一个措施以平息起义：任命一名专员来调查起因，委派主教和发布特许令以笼络人心，决定惩处"煽动者"，开始停战谈判，等等。

11月12日，克洛什卡和舒尔茨中校在蒂布鲁按起义者提出的条件，达成第一个停战协定：起义者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起义者军事化，释放被关押的农民。11月16日，克里山和眼科医生伊昂·莫尔纳尔·皮乌阿里乌在布拉德河谷以同样的条件签订了第二个停战协定。同一天，克鲁日和图尔达一带的起义者同军队代表在塞尔丘阿无条件地签订了第三个停战协定。第四个停战协定可能是按第一个协定的条件在阿尔巴—尤利亚附

近签订的。

起义的复燃及其失败

停战协定的缔结使农民的善良愿望受到愚弄，于是起义更加猛烈地复燃起来，波及到另外一些地区。起义领袖向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派出使者求援，他们知道人为的政治疆界阻挡不住罗马尼亚农民之间的相互声援。但是，这时情况日益恶化：贵族武装起来了，并在当局的纵容下，为非作歹；不胜恐慌的维也纳宫廷命令军队干涉。

11月底，在山口进行了浴血奋战，起义者得胜。但是在不断得到增援的帝国军队的强大攻势面前，装备很差的农民抵挡不住，12月7日终于在米赫伊列尼遭到失败。

最后的斗争。首领被捕和惨遭杀害

装备精良、为数众多的帝国军队挫败了各地起义队伍的抵抗尝试，这促使霍里亚于12月14日决定停止战斗。霍里亚在克洛什卡和其他几个亲信的陪同下，退人山区，计划开春时重新发动莫

茨人起义。

贵族和帝国军队在全国开始“绥靖”。成百成百的农民不经审判就被判处死刑。首领被追踪至他们的藏身处。霍里亚和克洛什卡于1784年12月27日被捕，克里山于1785年1月31日被逮。这三位首领都被关在阿尔巴—尤利亚堡，受到以帝国专员安东·扬科维奇为首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长时间的审讯。克里山受不住折磨，自杀而死。霍里亚和克洛什卡于1785年2月28日在阿尔巴—尤利亚的“拉富尔奇”高地上，惨遭车磔。

胆战心惊的贵族策划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防止 222
农民再度起义，维也纳宫廷则比较深谋远虑，决定把数百家莫茨人移居巴纳特，并给山区居民一些小恩小惠：自由放牧，免除某些运输徭役。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农奴和庄园主之间的关系问题。1785年8月22日的特许令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废除了人身奴役和农奴不得离开庄园的规定。此外，还给予农奴以婚姻自由、念书和学手艺以及拥有财产的权利。

起义的意义

特兰西瓦尼亚事件在整个欧洲（报刊、政论、文学作品等）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证明社会各阶层所赋予起义的重要意义。有些阶层赞同并支持它，另一些则否定并破坏它。产生这种不同态度的原因，在于起义者的纲领本身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推翻不适时宜的制度，代之以对被压迫人民来说比较公正的制度。因此，进步分子宣布赞同起义，反动分子则反对。这个纲领是在法国革命爆发前五年制订的，这也说明为什么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发生的事件引起了欧洲的反响。

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

霍里亚起义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民族性，这一事实表明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过程正趋完成，与此同时，部族意识正在转变为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约瑟夫取消改革和“恢复”贵族全部权利而引起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瓦拉几亚人请愿书

这些措施是在法国革命思想得到传播并赢得被压迫人民的热烈拥护、意识到罗马尼亚人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性的知识分子在特兰西瓦尼亚业已形成的时候采取的。为了取得这些权利，一份又一份的备忘录（当时称之为请愿书）递给特兰西瓦尼亚政府和维也纳宫廷。其中有的是集体创作
的，如边防团军官的备忘录；有的是个人的，如语 223
言、历史学家彼得·马约尔和讷塞乌德的副主教伊昂·帕拉等人的备忘录。

根据封建法律选出的、在停止活动十年后复会的国会，通过其成份本身（85%是贵族，90%是马札尔人，10%是萨克逊人），就毋庸置疑地表明它将讨论什么问题并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1790年12月21日至1791年8月9日在克鲁日召开的国会，讨论了贵族的自由和特权、马札尔语和文化以及反对任何新政改革等问题。

近半个世纪来罗马尼亚人争取同特兰西瓦尼亚其他“民族”平等权利的要求，综合地反映在称

为瓦拉几亚人请愿书的这份内容无所不包的备忘录中。这是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一篇集体创作，综合了伊诺钱齐乌·米库和其他较晚的请愿书里提出的要求。新备忘录是由下列诸人合作拟写的：史学家萨穆伊尔·米库、博物学家伊昂·莫尔纳尔·皮乌阿里乌和伊昂·布达伊-德列亚努、枢密院参事约瑟夫·梅赫西、奥拉迪亚主教伊格纳蒂·达拉班特、讷塞乌德副主教伊昂·帕拉、史学家彼得·马约尔和格奥尔基·欣卡伊。

请愿书由锡比乌主教盖拉西姆·阿达莫维奇和布拉日主教伊昂·博布于1791年3月呈交利奥波德二世皇帝。5月份，皇帝把请愿书批送克鲁日国会，从而决定了它的命运。

请愿书以“特兰西瓦尼亚全体罗马尼亚族僧侣、贵族、军人和公民”的名义，要求恢复罗马尼亚民族被剥夺的全部民权和政治权利；要求取消“被收容者、被宽容者”等对罗马尼亚人带有侮辱性的称呼；罗马尼亚族的僧侣、贵族和平民应象其他“民族”的相应阶层一样享受同样的权利；罗马尼亚人应按其人口比例参加国会和担任公职；全国居民都应根据各自的社会地位和情况享受同样

的权利并履行同样的义务；给予罗马尼亚人召开“民族会议”的权利，以选举在任何需要的场合代表他们的议员。

贵族国会接到备忘录，尤其在得知其内容后，非常“恼怒”和“震惊”。请愿书提交一个委员会研究后遭到拒绝，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拒绝的理由是，罗马尼亚民族的要求会推翻公国的立宪制度，这倒是说对了。可是，贵族们没有想一想，整整一个民族没有政治权利和人权是多么不公正！当时，全人类都在为争取这些权利而流血牺牲，而且一大部分人民已经获得了这些权利。

国会的态度并没有削弱罗马尼亚族的代表的信念，他们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正义性。他们呈递了内容类似的其他备忘录。到处都成立了文化—政治性质的协会和社团。“雅各宾”运动成功地深入到人民群众中间。在这除旧布新的变革年代里，政治运动同时也是社会运动。这就说明为什么当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起义的时候，不安和骚动笼罩着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 224
族农民。

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声援罗马尼亚国的运动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事业，正如他们具有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共同愿望一样。

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下的1821年革命

这一运动的起因，一方面在于被奴役的农民和地主的对抗性矛盾，这是名目繁多的、苛重的地租义务（劳役、什一税、各种赋税）和使这些义务更加沉重的横征暴敛所造成的结果；另一方面在于新的生产力以及与旧的交换和生产关系相冲突的新的交换和生产关系的出现。

劳役和什一税增加。捐税苛重

在起义发生以前，地主加紧侵犯隶农的权利，强迫他们增加法定以外的劳役日，强求他们用劳役代替货币赋税，限制他们使用森林、草场和池塘以及开垦新田地的权利。这个时期正在普及中的佃租制度构成压在农民群众肩上的又一灾难，因为佃主除收租外，还从农民身上榨取什一税和苛重的捐税。

如果权衡一下农民对地主和对国家负担的两类义务，那末后者比前者更沉重。这个时期国税格外苛重的原因，就在于法纳里奥特君主们需要购买王位，支付岁赋、朝贡和续位金，偿还债务并在短时期内发财致富。此外，还需要向靠压榨农民来支付买官费用和中饱私囊的大小官吏缴纳其他捐税和礼品。

社会各阶层的不满

自由农也深感国税苛重。奥尔特尼亚的自由农和潘杜尔也被迫缴纳难以支付的货币赋税，并且有沦为隶农的危险。

奥斯曼对商业的垄断，尽管有所限制，但并没有废除；国内的重重关卡限制着商品的流通；这给商贾造成重大损失并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由于过度增多的希腊人（东方人）竞争官职，连受排挤的地主也有理由感到不满。

十九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和二十年代初期，强 225
烈地显示出人民群众的不满增长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加深了。绝大多数人民对法纳里奥特社会政治制度和仍然保持着旧的封建性质的社会生

产关系深感不满。不仅是农民，而且城镇居民也深切地希望改变旧的制度，在新的轨道上发展商品交换和生产。

这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大规模地参加1821年革命运动和这一运动具有民族民主性和进步性的原因。

塞尔维亚起义和希梯里亚党人运动的影响

塞尔维亚人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1804—1816年），在巴尔干和中欧一切被压迫人民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多瑙河两岸的各国人民，特别是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塞尔维亚人起义首领有些渡过多瑙河，藏身于他们奥尔特尼亚的朋友家中。后来，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先进分子也参加了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的部队。

从1814年开始就组成了起义的领导核心，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开始进行准备，收集武器，组织克洛沙尼山区（梅赫丁茨县）的潘杜尔队伍。

整个希腊资产阶级，尤其是侨居欧洲各地的希腊资产阶级，对他们曾寄予解放希望的拿破仑的政策大失所望，在维也纳会议后，他们看到现在要获得解放，除举行反奥斯曼总起义外，没有其他可能。为此，他们建立了秘密团体"希梯里亚"（博爱同盟），总部设在君士坦丁堡，并在其他国家设立了分社（分部）。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两个公国都设有这样的分部，由拥有优越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人领导，这说明为什么希梯里亚运动不关心农民问题。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被推选为希梯里亚的首领，他是前法纳里奥特君主康斯坦丁的儿子，是沙皇的侍卫官。1820 年秋，他致函各分社首领，宣布在沙皇支持下起义。

在这个反奥斯曼的总运动中，前潘杜尔指挥官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担负重要使命，即唤起罗马尼亚"民众"。1821 年 1 月中，亚历山德鲁·苏楚大公去世时组成的"摄政委员会"也委托给他同样的使命，这由图多尔同希梯里亚的两位领导人——约尔达凯和法尔马凯于同一时期立的誓约加以确认。这个誓约实际上是一项协议，标志着罗马尼亚革命者和希腊革命者已结成政治联盟。

仅仅在数日之后，图多尔就前往奥尔特尼亚去执行唤起民众暴动的计划。设防的蒂斯曼纳修
226 道院将成为进行抵抗的基地之一。到达帕德什后，他即派出亲信去号召潘杜尔和边防民团揭竿而起。

帕德什宣言；“民众会议”

在组成了一支数量相当可观的军队后，图多尔于1821年1月底从帕德什向罗马尼亚国“不论哪个民族”的全体“民众”发出纲领性宣言，号召他们举行起义，反抗一切压迫者。宣言的社会内容有：剥夺地主和寺院的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废除地主的特权；正义和自由。因此运动获得人民的热烈拥护。

在帕德什建立的“民众会议”是人民群众的唯一权力机构。图多尔在“民众会议”上再次阐述起义纲领：取消捐税，给国民以正义和自由，恢复丧失的权利，把财产分给受凌辱、受欺压者。在帕德什所发生的事件的推动和鼓舞下，农民在全奥尔特尼亚境内开始攻打地主、寺院的邸宅和庄园。起义从这里迅速扩展到蒙特尼亚，甚至波及摩尔

多瓦的某些地区。

在短时间里，起义者控制了整个奥尔特尼亚。几乎整个2月份，起义部队驻扎在岑策雷尼进行整编，对革命岁月来说这段时间是太长了。3月初，部队出发向布加勒斯特进军。大部分地主因为害怕起义，逃离乡土，住进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些城市（布拉索夫、锡比乌、卢戈什），特别是在图多尔那次坚定的回答中再次明确重申他的立场："祖国即人民，非掠夺者"之后。因此，3月4日至21日，起义部队从斯拉蒂纳到布加勒斯特，一路上旗开得胜。

以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为首的革命的民族运动的领导得到巩固和壮大。3月中，在博林廷发出了第一个致布加勒斯特人宣言。

图多尔把他的部队驻扎在科特罗切尼，而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也率领希梯里亚部队穿过摩尔多瓦到达布加勒斯特附近，驻扎在科伦蒂纳。

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当政

控制首都将近两个月的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是全国服从的唯一权威。他的当务之急是争

取两个公国的“正义”。因此，他要求“同摩尔多瓦同心同德”，就象“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人，有着同一条法律”一样。同样，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他加强军队，号召农民参军，发给他们火枪和手枪，对他们进行训练，挖掘战壕。

早在2月份，他就具体制订了一项题为“罗马尼亚民众的要求”的改革计划。其中包括：取消国
227 内关卡，撤销非本土人担任的公职和宗教职务，建立一支由六千名免纳赋税者组成的军队。

3月底，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发出第二个致布加勒斯特人宣言，要求首都居民同他所领导的爱国革命力量联合起来，支援他们进行的“争取正义”的斗争。后来，获悉沙皇对巴尔干地区运动的诽谤，也就是说失去了俄国的支持后，他不得不同留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一部分地主达成协议。

的确，在这个时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赞同并公开指责希腊和罗马尼亚的民族民主运动。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掌握国家的领导权后，发表了引起巨大反响的致国民宣言。

运动在特兰西瓦尼亚引起的反响

帕德什宣言发表不到两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族农民便获悉了它的全部内容，并且几乎能背诵，如同这个运动的领袖的名字——托多拉什，托多鲁茨①已经家喻户晓一样。洪尼多阿拉、阿拉德以及北部地区克拉斯纳的农民在各种场合都声称他们读过帕德什宣言。他们准备迎接图多尔，也要象奥尔特尼亚的农民对待他们那里的地主一样对待贵族。心惊胆战的当局采取了措施，以防止爆发象霍里亚起义那样的另一次起义。

图多尔被捕并惨遭杀害

希梯里亚党人不急于按原来的要求渡过多瑙河，从侧面阻击已经跨进国土的土耳其军。图多尔同希特里亚人发生了冲突。这时亟于保卫自己祖国利益的图多尔，一面试图说服土耳其人怜惜他的祖国，同时挖战壕，筑土垒，加固军营。

希梯里亚党人不满图多尔对他们的态度，阴谋反对他。当图多尔率领军队从布加勒斯特撤退

① 人民对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的爱称。——译者

以便在奥尔特尼亚抵御奥斯曼入侵时，5月15日，希梯里亚党人切断了他的去路，要挟他停止前进。图多尔和伊普西兰蒂的代表约尔达凯·奥林皮奥图尔在戈列什蒂会见，达成一项瞬息即逝的协议。该协议只维持了几天，因为伊普西兰蒂及其一伙早已发誓要谋害图多尔。希梯里亚党人还拉了一些潘杜尔首领参与阴谋，于是图多尔被捕，并被押往特尔戈维什特去见伊普西兰蒂。伊普西兰蒂把他交给自己手下最残忍之徒，这些家伙在5月27日用刀剑斫死了图多尔。但是潘杜尔部队并没有溃散，而是撤退到德勒格沙尼，5月29—30日在奥尔特河右岸的葡萄园里同土耳其人打了第一个胜仗。

这次战役的重大意义在于罗马尼亚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在同入侵军队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中获胜的民族军队的萌芽。6月7日，在德勒格沙尼进行的第二次战役中，希梯里亚党人军败北。

228 潘杜尔的最后一次抵抗是1821年7月20日在蒂斯曼纳修道院进行的。

希梯里亚党人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但在罗马尼亚国的德勒格沙尼、斯洛博齐亚和摩尔多瓦

的斯库列尼、塞库却节节败退。

革命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革命运动不能被看作是一次农民起义，尽管参加这次斗争的主要群众是农民，即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严重损害罗马尼亚诸国自治权的法纳里奥特制度下受剥削和掠夺最甚的群众。

这场革命把罗马尼亚国的全体人民以及一部分早期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地主都卷了进去。因此，它具有非常广泛的性质，所有关心推翻封建主义、要求摆脱土耳其—法纳里奥特桎梏、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社会阶层和阶级都参加了斗争。

十八世纪中期，特别是十九世纪初期，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参加1821年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各种力量，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倾向于建立资产阶级形式的、新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因此，可以把这次革命运动看成是罗马尼亚诸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

1821年革命的独特的特征是值得着重指出的：

（1）它是由以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为首的领导核心作了长期准备的。

（2）运动拥有经过训练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潘杜尔和边防民团。

（3）具有政治战略和策略，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注意尽可能广泛地吸收人民群众和社会各阶级都参加这一革命行动。

（4）具有军事战略和策略，使革命的武装力量能胜利地从克洛沙尼山区抵达国家的首都，并占领布加勒斯特。

（5）革命力量掌握国家政权达两月之久。

（6）运动有一个政治纲领，见诸帕德什宣言、布加勒斯特宣言和其他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图多尔第一次在一个公开文件中提出民族统一和必须密切罗马尼亚国与摩尔多瓦两地区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联系的思想："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人，有着同一条法律，接受同一个领导并受同一个政权的保护。因此，我们应当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以求同摩尔多瓦

同心同德，相互支持，共同赢得这两个公国的正义”(1821 年 4 月 5 日)。

考虑到这一系列毋庸置疑的事实，可以断言，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运动远远超过了 229
以往的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的水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阶段。

尼古拉·伯尔切斯库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两次革命(1821 年和 1848—1849 年)之间的联系，并着重指出了它们之间的连续性。

民族文化的发展

启蒙主义——时代的主导思想

象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这一时期罗马尼亚诸国的文化也属于启蒙主义的文化、思想潮流。反映时代变革的新的意识形态，表达着同旧制度和维护旧制度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社会进步力量的愿望。

早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就通过青年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叛逆态度所表现出来的启蒙思想，

征服着其他国家和其他人民。

十八世纪下半期的启蒙主义质量上胜过上半期的启蒙主义，并日益激进。社会遭到无情的批判，唯物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的信徒增多。由作家、教授、法学家、医生合编的、按照狄德罗的批判精神加以组织的法国百科全书，全面地综合了新思想。

在西方国家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启蒙主义思想，在不同国家是根据各自社会的特殊条件加以接受和采纳的。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起来反对耶稣会士，努力使文化和行政机构近代化。在波兰、俄国和巴尔干各国，正在进行争取农民解放和反对专制政治的斗争。在德国和奥地利，带有伏尔夫和约瑟夫色彩的启蒙主义较为温和，改革被看作是君主的专有权。

十八世纪上半期，伊诺钱齐乌·米库在我国社会、政治领域提倡的启蒙思想，到下半期扩展到各个活动部门：各级学校、教科书、语法书、字典、当代最进步的思想家著作的翻译和改编。从罗马尼亚人民所处的社会、政治条件看，罗马尼亚诸国的启蒙思想首先具有社会性和民族性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

文化机构

文化机构、学校、图书馆、文化协会无论在组织原则还是在内容上，都反映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个时期所固有的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热衷于维护垂死的封建主义的力量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企图利用这些机构，但是代表新生事物的进步力量更强大，因此，障碍被逐步克服。

教　育 230

十八世纪下半期，采取了许多措施改组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皇家学校"或"学院"。革新精神显而易见，增设了科学课程：算术、几何、自然科学、工程学等；重视历史和"历史地理"、古典和近代语言以及罗马尼亚语。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哲学仍占主要地位，那末，也出现了采用瑞士教育学家佩斯塔洛齐思想的倾向。

罗马尼亚语的胜利发生在1814—1818年间。在摩尔多瓦是由于格奥尔基·阿萨基的努力，他

在雅西皇家学院开设了工程学专修班，后来又扩大到三圣教堂的瓦西里学校；在罗马尼亚国是由于格奥尔基·拉泽尔的努力，他来自特兰西瓦尼亚，开办了圣·萨瓦皇家学校。

特兰西瓦尼亚的教育从属于国家的政治利益，因为根据“开明的专制主义”的观点，学校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规范性法令——教育法（1777年）和皇家典章（1781年）是组织教育的基础。这两项法令规定学校由国家监督，教学大纲重视自然科学。遵照这两项法令，1780年在奥拉迪亚创办了一所学院，从1788年起该院也开设了法律系；为了培养法学家，在锡比乌和克鲁日也创办了法学院；为了培养外科医生，1775年在克鲁日建立了外科学院，罗马尼亚眼科学家伊昂·莫尔纳尔·皮乌阿里乌在这里任教。

为了教化和培养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公民的需要，开办了大量的乡村学校，特别在巴纳特——皇家领地和边防地区。在这方面，罗马尼亚学校的校长格奥尔基·欣卡伊和迪米特里·欧斯塔蒂耶维奇也建树了不朽的功绩。为了采矿的需要，开办了一些矿业学校。在布拉日和贝尤什设立了

罗马尼亚教会中学；在阿拉德创办了师范学校。在锡比乌开设了一所培养神甫的正教神学校，此后不久，在布拉日也设立了一所类似的学校。

至于萨克逊人的学校，1722年福音会议决定在所有村庄实行男、女儿童义务教育，这项决定直到十八世纪末才逐渐得到实施。

文化协会

受当局监视和检查较少的文化协会是启蒙主
义文化良好的表现场所。在十八世纪最后十年
里，罗马尼亚人、马札尔人和萨克逊人都分别组织
了这种协会，还成立了各族文化人士不分民族差
别都可参加的协会，例如，伊昂·莫尔纳尔·皮乌
阿里乌倡办的阿尔迪亚尔大公国罗马尼亚人哲学
协会，阿兰卡·乔治创办的特兰西瓦尼亚普及马
札尔语研究协会和约瑟夫·卡尔·埃德尔领导的 231
特兰西瓦尼亚史学爱好者协会。在萨克逊人研究
特兰西瓦尼亚协会的成员中，也有罗马尼亚族和
马札尔族学者。

报　　刊

如果说上述各种协会主要从事文化、科学活动，其次才从事政治活动的话，那末，报刊首先是政治论坛，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文化、科学论坛，因为当时尚无各种专业刊物。对于以1821年革命运动为结尾的时期来说，编印报刊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尝试和开端。首先出版的是德文报纸：1771年蒂米什瓦拉出版的《知识报》(Intelligenzblatt)和1784—1792年布拉索夫出版的《特兰西瓦尼亚报》(Siebenbürger Zeitung)；其次是马札尔文报，如1789—1790年克鲁日出版的《特兰西瓦尼亚马札尔先驱报》(Ergèlyi Magyaör Hirviv)在出版马札尔文报的同一年，想出版一份名为《农村报》的罗文报的尝试没有成功；出版每周出两期的《哲学和伦理学通讯》的尝试也归于失败。成功地排除障碍得以首先问世的罗文报纸是特奥多尔·拉科切于1820年在切尔讷乌茨出版的《罗马尼亚文选》和一年后由于扎哈里亚·卡尔卡列基的努力在布达出版的《罗马尼亚文库》。道路已经打开，障碍已经排除，报刊的作用就有了

保障。

科学和文学活动

哲学思想

启蒙思想作为一种哲学观念，自然先在哲学领域找到有利的表现场所。萨穆伊尔·米库和后来的埃利亚德·勒杜列斯库的逻辑学教科书都是渗透着唯理论精神的课本，格·欣卡伊改编的《破除人民迷信箴言》试图解释自然现象。西米翁·伯尔努齐乌和萨米尔·克特列斯都是进步哲学思想(克鲁格、康德)的卓越的忠实信徒。

历史编纂学和语言学

在仍然保持着外国统治、社会和民族剥削的国家里，启蒙主义扬弃世界主义，变成为各国人民解放服务的民族思想。罗马尼亚人民的罗马血统，它的语言的拉丁语源，它在自己民族领土上没有间断过的连续性，人种和语言学的统一性，社会和民族权利等，构成当时史学和语言学活动的主要方面。这些论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究其原

因是由于当时的学者都具有史学和语言学的双重
232 活动。萨穆伊尔·米库和格奥尔基·欣卡伊是《达契亚—罗马或瓦拉几亚语基础》的作者，他们也是一些重要史学著作的作者：萨穆伊尔·米库著有《达契亚—罗马民族起源和进步简史》、《罗马尼亚人历史简介》、《罗马尼亚人历史、事件和轶事》等；格·欣卡伊著有《罗马尼亚人和其他民族编年史》。彼得·马约尔在《达契亚的罗马尼亚人起源史》和《叔侄对话》里谈到了语言的起源，并且编了一部称为《布达辞源》的四种语言词典。伊昂·布达伊-德列亚努同时是《罗马语或瓦拉几亚语语法基础》和历史著作《特兰西瓦尼亚人民的起源》的作者。

特兰西瓦尼亚人拉杜·特姆佩亚和保尔·约尔戈维奇以及蒙特尼亚人耶纳基策·佛克雷斯库都先后写了一本又一本的语言学著作。历史编纂学著作同样极为丰富，尤其是由于蒙特尼亚人的活动，如米哈伊·康塔库齐诺的《康塔库齐诺家谱》和《罗马尼亚国历史》；丹尼尔·菲利皮德的《罗马尼亚史》和《罗马尼亚地理》(1816年)，他第一个在著作里使用了罗马尼亚（România）这个

名称；迪奥尼西·福蒂诺在1818—1819年著有《古达契亚史》，标题也颇有意义，包括了罗马尼亚各省。

马札尔人也从事语言研究。例如，萨米尔·贾尔马蒂著有《语法》（对匈牙利语和芬兰-乌古尔各种语言作了比较）和《词汇》（辞源学著作）。从约翰·舍伊韦尔特的文学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出对语言问题的研究。

马札尔历史编纂学以本克·约瑟夫（《特兰西瓦尼亚》）、格奥尔基·普拉伊（《匈牙利帝国史》）的卓越活动为代表。萨克逊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人物有约瑟夫·卡尔·埃德尔（《特兰西瓦尼亚历史述评》）和安德烈亚斯·沃尔夫（《摩尔多瓦公国历史和统计学纪实》）等。

文　学

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也始于这个时期。最流行的文学体裁是抒情诗、叙事诗、情诗、浪漫诗和爱国诗。

佛克雷斯库父子被认为是最早的罗马尼亚诗人：耶纳基策的诗句幼稚而又优美（正如埃米内

斯库所描写的："美妙地歌唱爱情的春天"），他的儿子阿列库和尼古拉继承了父业。

布达伊—德列亚努的英雄—喜剧长诗《茨冈人之歌》和《三勇士》，贯穿了较激进的启蒙主义观点，这是我国文学中同类体裁的最优秀作品，巴尔布·帕里斯·穆穆列亚努的主要诗作也充满着较激进的启蒙主义思想。格奥尔基·阿萨基和扬库·佛克雷斯库的诗歌以及被埃米内斯库称之为"金口"的迪米特里·齐金迪亚尔的寓言，都反映了人民的解放斗争。

美术和建筑艺术

233 新的文化、思想观点和境界也在艺术上打下了烙印，它在当时几乎是纯粹为世俗利益服务的：宫殿、庭院、地主肖像或历史画。

地主和市民的房宇、阁楼反映了带有时代色彩的传统建筑艺术的发展。王宫（雅西王宫，布加勒斯特—特伊的吉卡宫）表现出俄罗斯古典主义或西方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在特兰西瓦尼亚，巴乐歌仍是最受欢迎的风格（克鲁日班菲宫，锡比乌

的布伦肯塔尔宫)。

绘画，尤其是圣像画，更明显地保持着传统形式，但最有价值的作品还是那些世俗的作品：大公肖像（格里戈里·祖格拉武画的尼古拉·马弗罗盖尼肖像）、自画像及其家族像(尼古拉·波尔科夫尼库绘)。

在特兰西瓦尼亚，可以比较强烈地感觉到维也纳学派的影响，这是前往哈布斯堡帝国首都深造的青年人带来的。由于弗兰茨·诺伊豪泽尔父子和约翰·马丁·施托克的活动，锡比乌成为最重要的艺术中心，他们不仅是家族像的作者，而且也塑造了霍里亚、克洛什卡和克里山等战士形象。

234 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

民族的定义和主要特征

民族的形成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因素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是在向资本主义过渡和资产阶级形成时期同时或几乎同时具备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形成一个新的历史范畴：民族。

民族的定义是：一个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特有的心理特征、共同的传统、共同的人种意识和共同为民族和社会解放进行斗争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

民族特别是在人类史的近代时期产生的。

民族是一种历史范畴。它是随着语言学、经济和文化的一些主要特征的发展和成熟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是与封建主义崩溃时期和资本主义开始时期相适应的。

共同的语言和文化

罗马尼亚语自形成以来一直是统一的。经过不断发展和丰富，到十六世纪下半期，罗马尼亚国北部方言和特兰西瓦尼亚南部方言融合而成罗马尼亚文学语言。基于人种起源的语言的共同性，已经深深地扎根于罗马尼亚人民意识之中，尤其是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它已经明显地见诸历史和法律性的、宗教的和世俗的著作。

因此，罗马尼亚人具有共同的文化是很自然的，它表现在民间创作（叙事诗、歌谣、传奇）和史学著作（编年史、法典、传道书）在喀尔巴阡山两侧的不断传播中。蒙特尼亚和摩尔多瓦学者、御膳房总管康·康塔库齐诺和迪·康特米尔大公，都科学地论证了这种人种、语言学和文化上的共同性，“阿尔迪亚尔学派”的代表和蒙特尼亚、摩尔多瓦的其他启蒙主义者还把这种共同性提高到具有学说价值这一高度。

地域和经济上的共同性

地理因素对罗马尼亚人民的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祖国的地形是一个多样化的统一体：中间是脊柱——喀尔巴阡山脉；南喀尔巴阡山象几座扶壁向四周延伸；周围是连绵不断的丘陵、高原和平原。其实，喀尔巴阡山从来也没有成为居住在它两侧的人们之间的一堵隔墙，因为许多开阔的山口使两侧的居民和货物畅行无阻。

235 三个罗马尼亚公国的生产力不断发展，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换，牲畜的饲养(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牧场之间，由于养马和牧羊的需要，进行着季节性的和一年一度的往返放牧)，手艺的进步，商业的发达和扩展，作为彼此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工商业生活的真正中心——城镇的建立——这一切都促使各地区间建立密切的联系。这种在同一地域上不停的运动，促使特兰西瓦尼亚人、摩尔多瓦人、蒙特尼亚人和多布罗加人加深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在地区生产的多样化和生产的某种区域性分工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经济生活逐步创造了条件。

罗马尼亚人民的精神面貌

语言、文化、地域、经济这些不断发展的因素

的共同作用，使罗马尼亚人民的精神面貌得到形成：共同的风俗习惯，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心理的共同性在中世纪表现在罗马尼亚人的部族意识中，同一的血统、人种和语言的意识又增强了这种部族意识；到近代初期，这种意识又转变为民族意识，转变为罗马血统、拉丁血统的思想和罗马尼亚人在达契亚的连续性的思想。民族意识深人人民群众，这时他们为罗马尼亚人的达契亚血统和罗马血统而感到自豪，这一事实又进一步加强了民族意识。

争取社会和民族自由的团结斗争

部族意识和后来的民族意识同其他共同特征一起，构成了历史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也表现在罗马尼亚人民长期以来为争取社会和民族自由而进行的相互声援、团结一致的斗争中。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种相互声援、团结一致在封建主义崩溃时期，在霍里亚和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的伟大革命运动期间表现得更为强烈。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强调指出："民族共同性思想振奋了人民，使他们在保卫祖国和繁荣祖国的斗争中

力量倍增”。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极大地激励了争取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统一、建立近代罗马尼亚国家和赢得国家独立的斗争，而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形成（1859—1862年），又加速和扩大了为最后形成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而进行的斗争。

民族概念的近代含义

中世纪的“民族”概念逐渐转变，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启蒙主义者的概念里获得了新
236 的含义。近代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过程接近完结就是证明。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这样，当十八世纪跨入十九世纪、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候，罗马尼亚民族的主要特征相当清晰地显示出来了。这些特征将继续发展，而民族本身也将随之而得到发展。民族一旦形成后，又反过来不但对整个十九世纪，而且也对我们这个世纪的社会进步和罗马尼亚人民的历史发展产生强烈的影响。

1848年革命前的罗马尼亚诸公国

1821—1827年期间的罗马尼亚诸公国

从1821年5月起，罗马尼亚诸公国——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被奥斯曼占领达一年之久。维持军队所需的种种义务（两万多名土耳其士兵的粮饷、喂养马匹、各种运输杂差），绝大部分都由下层负担，而土军进行的掠夺和破坏又加重了这种种义务。此外，逃亡归来的地主也为非作歹，企图倚仗占领军来恢复他们对农民的原有特权。

由于耕畜头数显著减少，大量土地荒芜。在这种情况下，饥荒和疾病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例如，1822—1823年冬，弗拉什卡、特列奥尔曼和奥尔特等县居民因为缺粮，只好靠啃树皮度日。

在俄、英、奥诸列强的压力下，奥斯曼军队被迫撤离，留下了一笔空前的国债。

同时，奥斯曼帝廷同意恢复本土君主，任命约尼策·桑杜·斯图尔扎为摩尔多瓦大公，格里戈里·迪米特里·吉卡为罗马尼亚国大公。同时，前往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尼亚代表团所提出的其他

要求也被接受，其中最重要的是限制希腊人继续担任世俗的和教会的职务。

1827年，土耳其同俄国签订了阿克尔曼协定。协定中较重要的条款有：由国政会议选本地人做君主，任期七年，并经俄国和土耳其批准；公国两年免缴贡税；贸易自由，但要承担供给奥斯曼帝廷粮食的义务；保障1821年革命运动时期逃亡的地主的权利，等等。

1829年俄土战争后签订的阿德里安堡条约重申了上述规定。

237 **阿德里安堡和约(1829年)**

阿德里安堡和约，除了对巴尔干各国人民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条款之外，还包括一项关于摩尔多瓦公国和罗马尼亚公国的特别条款，这一条是和约第五条的引申，事实上构成和约的组成部分。根据这一条款规定，多瑙河左岸的城堡——土尔努、朱尔朱和布勒伊拉及其附属岛屿归还罗马尼亚国。同时，奥斯曼帝廷保证尊重和保护诸公国通过以前的条约所获得的权利。这一条的其他款项规定：诸公国行政自治；大公终身任职，并

有权依靠国政会议处理国家事务；免去诸公国向君士坦丁堡和多瑙河右岸土耳其城堡提供给养的义务；贸易自由等。

在付清战争赔款之前，两公国将处在俄国占领之下。

通过有关贸易自由和归还多瑙河主要港口的规定，阿德里安堡条约使两公国有可能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关系。在对外方面，条约限制奥斯曼帝廷对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内政的干涉。

组 织 规 程

组织规程是旨在实施阿德里安堡条约条款的法律，条款规定建立近代机构，以利于诸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组织规程首先规定，立法权归民众议会，它把国家的要求和愿望提交大公。大公是执行机关首脑，有权批准和颁布法令或抵制议会通过的法案。大公是国民军的最高统帅，监督维护公共秩序。大公下设多名大臣协助工作（内务大臣、财政大臣、国务秘书处、司法大臣、宗教大臣和军务大臣）。这样，两公国就建立了近代式的政府。

按照写进组织规程的分权原则，司法脱离行政而分立，建立一套单独的体制。每个县都设有初级法院，在布加勒斯特、克拉约瓦和雅西分别设立上诉法院；此外，还设立一个最高法院——高等法院。为了适应日益活跃和多样化的商业活动的需要，在雅西、布加勒斯特和克拉约瓦分别设立了专门的商事法庭。

组织规程还就财政近代化作了一系列规定。取消了原来的间接税：酒税、羊税、什一税；各种劳役和实物征购以及妨碍商业发展的国内关卡也取消了。组织规程规定了一种单一税，代替名目繁多
238 的封建实物赋税。农民付的单一税叫人头税，商人和工匠付专利税。在财政组织方面，组织规程也保留了一些过时的做法，如地主免税、人头税的缴纳由全村联保等。于是，象封建主义全盛时期一样，农民被禁止离开村庄，被迫彼此担保对方缴纳人头税。在财政方面，组织规程还规定设立国民银行，采取国家预算的近代原则，这是公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国家预算建立在公共支出同税收平衡、经民众议会批准、并由一个专门机构监督收支的基础上。

组织规程还包含一些旨在鼓励工业的规定：

保护民族工业的制度，鼓励企业家的奖金，庄园主在自己庄园上采矿的权利。

为了处理与公民的私人生活有关的各种问题，建立了附属于法院的公证所；设立了民政处；根据近代地籍测量原则测定了地主庄园的地界。同时，还提出一系列有关教育和卫生组织等方面的措施。

最后，组织规程规定建立国民军，其任务是保卫边境，在传染病流行时期组织检疫所，维持内部秩序和强制公民纳税。

组织规程对农业作了重要规定。农业是两公国经济的主要部门。规定庄园主对其庄园的三分之一拥有完全权利，这项措施有助于把封建领地转变成资产阶级式的田庄，有利于资本主义关系在农业中的发展。至于徭役——农民主要的义务，组织规程采用工作定额，但很高，使法定为十二天的徭役实际上在罗马尼亚国要服五十六天，在摩尔多瓦要服八十四天。因此，卡尔·马克思十分正确地说组织规程是“徭役劳动法”①，“对剩余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6页。

动的贪欲"的"积极表现"①。

组织规程时期的诸公国

组织规程在罗马尼亚国是1831年实施的，在摩尔多瓦是1832年实施的，对罗马尼亚两公国实行几乎相同的原则。根据组织规程，到1848年为止，作为大公当政的在罗马尼亚国是亚历山德鲁·吉卡（1834—1842年）和格奥尔基·比贝斯库（1842—1848年）；在摩尔多瓦是米哈伊尔·斯图尔扎（1834—1849年）。

在这段时间里，罗马尼亚诸公国得到了不断发展。

就农业来说，组织规程时期的特点是资本主义成分的更加广泛的渗入；就在这个时候，成立了旨在采用先进农艺技术的农业协会，开始使用了农业机械，创办了农业技术专科学校，并且尝试改良粮食作物和畜种。

工业发展的特点是新工艺的采用和一些资本
239 主义生产形式的具体化。这时，一些重要的机器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7页。

设备投入了生产，并在国内自行试制。机器设备主要被用来加工轻工业原料（羊毛、黄麻、亚麻、谷物、牲畜、木材）。这样，1841年在雅西建成了第一座机器磨坊；同年，格·阿萨基的造纸厂在皮亚特拉—尼亚姆茨开工了；1843年，在布加勒斯特的图纳里建立了一所用从奥地利进口的机器装备起来的制呢厂；在巴克乌的格罗泽什蒂建成了一所使用蒸汽动力的玻璃厂；在布科维纳的亚科本尼建立了一所用维也纳制造的机器装备起来的机制砖厂。

在组织规程时期，国内外贸易都有了很大的发展。1848年1月1日生效的1846年关税协定，取消了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之间的关税，两个公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这一重要因素将对1859年实现政治统一具有头等意义。

两个公国有力地开始了同欧洲的贸易，使对外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为了便利商品运输，在1830—1848年期间，采取了一系列关于修筑桥梁和公路、疏通普鲁特河、塞列特河、雅洛米察河、阿尔杰什河和奥尔特河等大河航道的措施。

1848 年以前的革命运动

1821 年后，两个罗马尼亚公国几乎连绵不断地继续发生具有革命内容的运动。其中有些是愤愤不平的农民起来反抗压迫者，有的是从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试图实施一些旨在保护本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改良方案。

在第一类中，最激烈的是 1826 年由参加过 1821 年革命运动的西米翁·梅赫丁齐亚努和吉策·库楚伊领导的奥尔特尼亚暴动。但他们发起的行动遭到了镇压，两个领导人被捕，并被处绞刑。

在摩尔多瓦，图多尔领导的运动之后不久，大地主和小地主之间就开始发生矛盾，具体表现在以约尼策·特乌图为首的一群小地主起草的一份“烧炭党人”备忘录问题上。这份备忘录的条款并不想改变现存的封建关系，而只是要求为小地主创造一些有利条件：地主阶级各阶层权利平等，尊重产权，排除贸易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法律面前平等，等等。大地主阶层对这些要求立即作出了强烈

的反应。特别是以未来的大公米哈伊尔·斯图尔扎为首的流亡地主，起来反对国君，怀疑他同情新倾向。俄国领事明齐亚基的调解，多少缓和了国君同流亡地主之间的冲突，这使后者有可能返回祖国。

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特奥多尔·迪亚曼特于1835年在斯克耶尼—普拉霍瓦倡建了我国第一个法伦斯特，称为“农艺和手工艺社”，但次年就由于当局干涉而取消了。240

1839年，在御马房总管列昂特·拉杜领导下组织了一个所谓“联邦谋叛会”，决心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国和塞尔维亚组成一个德意志联邦式的、受欧洲列强保护的联邦。列·拉杜领导的运动遭到镇压，运动领导人被捕。

亚历山德鲁·吉卡朝屡次遭到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猛烈攻击。以扬·肯皮内亚努为首的民族派是反对派的领导。1838年，民族派起草了一个宣言，认为亚·吉卡的任命是非法的，主张在两个公国选举一个新国君，并通过一部宪法。由扬·肯皮内亚努和前法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馆专员费利克斯·科尔松草拟的宪法草案，规定普选

和解放隶农，但不能触动大庄园所有制，只是免除了任何封建奴役。扬·肯皮内亚努在周游欧洲列国回国后被捕，并被流放。

1840年，在米蒂克·菲利佩斯库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秘密协会。它的宗旨是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新制度。会员有：正在准备入伍的尼·伯尔切斯库、参加过图·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运动的德·马切东斯基、埃夫蒂米·穆尔古、让·亚·瓦扬、克·特列杰斯库和米·塞尔吉斯库。“协会”决心达到以下多项赋予它革命性的社会、政治目标：国家独立，有偿地解放隶农和分给他们土地，废除一切封建特权，法律面前自由、平等，建立民主共和国和一支革命军。他们准备当国外条件有利的时候，就举行武装起义来实现这些目标。由于与群众缺乏足够的联系，国外条件不利和协会中混入了叛徒，这个纲领未能付诸实现。会员被指控搞危害国家的“罪恶阴谋”，遭到逮捕，并被判处长期苦役。尼·伯尔切斯库当时尚未成年，被关进默尔纪内尼修道院，其余的人被关在斯纳戈夫修道院。

三年后，即于1843年，尼·伯尔切斯库出狱，

又同扬·吉卡和克·特尔组织了一个新的秘密协会，称为兄弟会。该会既面向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也面向小资产阶级、劳工和隶农。

在摩尔多瓦，米哈伊尔·斯图尔扎大公的反对派，成功地把特·勒什卡努、弗·默林内斯库、亚·伊·库扎等大批摩尔多瓦进步知识分子代表组织在爱国协会周围。协会的总部设在瓦斯卢伊，分会遍布摩尔多瓦各城市。协会会员决心为争取法律上的平等、为解放地主的茨冈奴隶、为确定庄园赋税等项目标而进行斗争。实现这个纲领的办法是由一支军事部队发动武装政变。大公获悉协会的目标后，在协会尚未采取任何行动之前 241
就把它消灭了。一部分会员被捕，其余人逃亡国外。1847 年，当摩尔多瓦民众议会举行选举的时候，也发生了类似的风潮。

在 1848 年革命以前的岁月里，三个罗马尼亚公国的爱国青年之间加强了联系。扬·吉卡前往雅西，在加拉茨附近的科·内格里的庄园孟目纳的会晤，尼·伯尔切斯库的特兰西瓦尼亚之行和格·巴里齐乌的罗马尼亚国之行，这些仅仅是证明这种联系得到加强的几个事例而已。

1848—1849 年革命爆发前夕特兰西瓦尼亚的形势

前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在特兰西瓦尼亚导致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资产阶级的队伍及其重要性得到增长，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得到发展。由于新的阶级在取得政权的道路上遇到阻碍而引起的矛盾，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加以解决。在社会生活方面，农业中的封建关系和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贵族强占土地，苛重的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等等），构成了即将到来的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废除过时的行会制度也提上了日程。从民族角度来看，当时的统计尽管带有倾向性，但也证明罗马尼亚人占特兰西瓦尼亚居民的绝大多数。为了了解这些罗马尼亚人是如何遭受社会剥削和民族压迫双重奴役的，我们应当记得：在特兰西瓦尼亚，社会剥削本身就比在匈牙利、奥地利沉重。大多数农奴和佃户是罗马尼亚族人，而大多数贵族是马札尔族人。军队、警察、哈布斯堡官僚机构的使命是不择手段地维护旧制度。当时的自由派舆论认为，得到官方承认的特

兰西瓦尼亚的三个特权民族和四个教派（罗马尼亚人仍被贬称为“被收容的人”），是这个具有七座城堡（Siebenbürgen）的公国的七害。日益强烈的民族思想成为一股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关于罗马尼亚人民和语言的起源及其统一性的思想，加强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是在以前整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人口和政治状况基础上形成的。学习民族历史和语言，在人民中间传布文化，发展罗马尼亚语学校、报刊和文学，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和另外两个公国的罗马亚尼人之间联系的日益加强，这些都最强烈地促进了民族运动的兴起。罗马尼亚知识分子阶层（教师、记者、大学生）——尽管数量不大，但特别活跃——在这个运动中负有重要的使命。其中的著名人士有：格·巴里齐乌、阿弗拉姆·扬库、西米翁·伯尔努齐乌、蒂莫特伊·契帕里乌、埃夫蒂米·穆尔古等。罗马尼亚人民在文化上的统一性也表现在喀尔巴阡山那边最卓越的学者也在特兰西瓦尼亚发表自己的著作，他们是文学家瓦·阿列克山德里、格·亚历山德雷斯库、博利亚克、博林蒂尼亚努、内格鲁齐、东尼奇以及史学家

242 伯尔切斯库、科格尔尼恰努等人。特兰西瓦尼亚学者是当时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最高学府的创始人和受尊敬的教师。活跃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也对民族统一性的某些因素的发现作出了贡献。巴里齐乌在布拉索夫出版的罗文报纸《特兰西瓦尼亚报》和《思想、心灵与文学》，是刊登有关三个罗马尼亚公国的文章、消息和评论的最早的罗文报纸。民族运动的根源存在于农民之中。马札尔族和萨克逊族的人民群众也受到当时的革新潮流、民族意识和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的深刻影响。象亚卡布·埃列克、博利埃·亚诺什等马札尔族进步人士或象斯梯芬·卢德维希·罗特、安东·库尔茨等萨克逊进步人士，都表达了这些倾向，他们理解罗马尼亚问题，主张必须给予绝大多数居民以民族权利，从而站到了先进立场。当时最先进的观点，主张在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有必要使各被压迫人民相互接近、亲如手足。可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间的分歧、帝国的民族分裂政策以及马札尔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错误，革命爆发时，哈布斯堡帝国的各民族是分裂的。实际上领导马札尔革命运动的马札尔中、小贵族想维护

马札尔族的至高无上权，以科苏特·拉约什为首的马札尔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也持这种态度，这就加深了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矛盾。马札尔化措施、对其他民族所采取的沙文主义态度都只能导致民族问题继续恶化。

革命以前时期的反封建运动给剥削者复现着霍里亚起义的恶梦。许多协会和行动，表面上是文化性的，实际上都是政治性的。在巴纳特(1830年)和锡比乌（1834年）都建立了秘密社团，设有许多分会，并且同罗马尼亚国的革命运动有联系。在西山爆发了莫茨人的长期动乱（1841—1847年），最初是反对税务所对他们的残酷剥削（该地区的矿业属国家所有）。一个出身于马札尔小贵族的妇女埃卡特琳娜·瓦尔加起草了农民请愿书，并递交维也纳宫廷。但这些请愿书毫无结果。农民拒不缴纳强加给他们的捐税，后来甚至开始自行使用过去曾归他们公用的森林。西山的威胁性骚动遭到镇压，埃·瓦尔加被捕并受监禁。

克鲁日的特兰西瓦尼亚国会通过了1847年的土地登记法。这个土地登记法显著地恶化了农民的处境，特别是由于它允许掠夺农奴的土地。

格·巴里齐乌认为这项反动法令会引起新的"霍里亚运动"的爆发。在国会上，贵族们公开承认，废除农奴制会导致马札尔人丧失统治地位。在辩论中，阿弗拉姆·扬库对一个发言者表达了义愤，
243 他说："用哲学和人道的论据你是无法说服那些暴君的，应该象霍里亚那样用长矛。"

在1848年人民大起义前夕，上述这一切动乱为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形势作了准备。

* * *

在1848年以前的这段时期里，罗马尼亚诸公国发生的具有革命性质的运动，都是罗马尼亚人民争取完成国家统一、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要求的斗争的表现形式。从那些年起，各阶级和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矛盾就开始在罗马尼亚社会中表现出来：一方面是为维护其全部阶级特权而斗争的倒行逆施的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则是渴望分享大地主的部分特权的中、小地主的联合力量，同大地主争夺经济和政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以及希望摆脱地主压迫的农民阶级。这些就是在以后斗争岁月里将进行较量的社会力量。

关于近代的问题、资料和参考书目 244

从理论和事实角度来研究封建主义崩溃进程，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一项成就。旧历史学家沒有十分重视这一过程的存在、发生及共后果。

《关于十八世纪土地关系的史料》(两卷，布加勒斯特，1961—1966年版)，论证了封建土地关系的解体。

格·杰奥尔杰斯库一布泽乌的《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封建主义的崩溃及资本主义的发端》(布加勒斯特，1950年版)，斯·维亚努的《论罗马尼亚诸国封建主义的解体问题》(布加勒斯特,1954年版)，尤其是安·奥采蒂亚的《略论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布加勒斯特，1960年版)，都通过对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的研究，同时阐明了封建关系的解体过程。

1784年霍里亚领导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大起义，是被优先重视的一个研究课题。曾发表过数百篇文章和论著，有些提供了新资料，有些提出了新观点。在这些浩瀚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有：尼·登苏希亚努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霍里亚革命和匈牙利》(布加勒斯特，1884年版)，这篇文章是纪念起义一百周年时写的；伊·卢帕什的《1784年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起义》(克鲁日,1934年版)；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的《霍里亚起义的社会

根源»(布加勒斯特，1938 年版). 是用历史唯物主义作解释的首次尝试；德·普罗丹的«克鲁日和图尔达郡的霍里亚起义»(布加勒斯特，1938 年版)；什特凡·帕斯库的«关于霍里亚起义的新资料»(锡比乌，1943 年版)；伊·弗鲁马的«霍里亚，他的审讯和殉难»(锡比乌，1947 年版)；格·杰奥尔杰斯库—布泽乌的«霍里亚、克洛什卡和克里山领导的 1784 年特兰西瓦尼亚农奴起义»(布加勒斯特，1961 年版)。

德·普罗丹的«瓦拉几亚人请愿书»(布加勒斯特，1967 年版)和特罗恰尼·日的«1790—1848 年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史»(布达佩斯，1956 年版)，研究了霍里亚起义的社会、政治后果。

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 1821 年的伟大革命运动也受到了同样的重视。康·阿里切斯库(1874 年)、尼·约尔加(1921 年)和埃米尔·佛尔托苏(1927—1932 年)等先后发表过许多资料。安·奥采蒂亚院士主编的五卷本«史料»(布加勒斯特，1959—1962 年版)，为 1821 年起义树立了一座壮观的纪念碑。

关于 1821 年事件的研究也很多，有安·奥采蒂亚的«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和罗马尼亚诸公国的希梯里亚运动»(布加勒斯特，1945 年版)；伊·内亚克舒的«1821 年起义中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领导的潘杜尔部队»(布加勒斯特，1954 年版)；德·贝林德伊和特·穆塔什库的«1821 年人民起义的军事问题»(布加勒斯特，1962 年版)。

* * *

研究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的民族文化的较早著作有：尼·约尔加的«罗马尼亚文学史»和«罗马尼亚教育史»，此后有尼·

阿尔布的«1800年前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教育史»。德·波波维奇的«启蒙时期的罗马尼亚文学»(锡比乌，1945年版)是一部研究启蒙思想的重要著作。下述著作揭示了一些特殊的方面：什·伯尔塞内斯库的«1714—1821年的雅西皇家学院»(布加勒斯特，1962年版)；拉·普罗托波佩斯库的«1774—1805年特兰西瓦尼亚教育史论丛»(布加勒斯特，1966年版)；尔·蒙特亚努的«阿尔迪亚尔学派对教育群众的贡献»(布加勒斯特，1962年版)；康·肯皮亚努和萨·米库的«罗马尼亚人历史简介»(布加勒斯特，1963年版)；德·吉舍和普·特奥多鲁的«格·欣卡伊，破除人民迷信箴言»(布加勒斯特，1964年版)；以及综合性著作«罗马尼亚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史»(布加勒斯特，1964年版)。

最后，近代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什·帕斯库的论文«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开端，后来同一作者又在«阿尔巴—尤利亚大国民议会»(克鲁日，1968年版)中加以阐发。

245

资本主义制度

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48年革命的总原因和总目标

十九世纪中期，罗马尼亚诸国处在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反封建运动和民族运动把社会上绝大部分人都卷了进去。蒸蒸日上的新的资产阶级制度将代替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衰落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就在于使罗马尼亚社会发生这种根本变化，1821年革命运动也曾试图这样做。在提出社会性要求的同时，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把全体罗马尼亚人的统一和政治独立的愿望载人史册。

获得政权和完全的经济自由对资产阶级利害攸关，因而它将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农民和市民群众的要求被列人纲领，群众提出他们自己的

要求并参加保卫革命，这些都使得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民主性。

罗马尼亚国、摩尔多瓦和特兰西瓦尼亚这三个罗马尼亚公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具有统一性。反封建的、民族的总原因和主要目标是这种统一性的基础。同时，罗马尼亚诸国的革命也是欧洲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主义，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因此，在近代罗马尼亚的历史发展中，1848 年标志着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过程中的决定性的高潮时刻之一。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制度，将在以后几十年内，特别是由于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朝时期所实行的重大改革而得到确立。

封建制度的严重危机；社会力量的反封建的和民族的目标

1848 年革命前夕的罗马尼亚社会结构本质上是封建的。建立在大土地所有制及由此而产生的地主或贵族特权基础上的生产关系，早已陈旧

过时，不再适应新的社会和经济现实。

246 罗马尼亚诸国的生产力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建立在蒸汽力和近代技术基础上的工厂生产，开始显示出对于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优越性。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首批蒸汽机开始运转，安装了一些经过改进的机器，并动工修筑了第一条铁路——奥拉维察—布齐亚什线。这些生产力和交通工具远远超越了封建制度的范围。

在发展了的生产力和过时的封建关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于是就产生了通过革命途径消灭束缚社会普遍发展的封建制度的迫切需要。

资产阶级——发展中的新阶级，无法在封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狭隘范围中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使地主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独家销售农产品和工场手工业产品的封建特权的存在，地主在自己庄园上开设工业性企业和经商时免交“营业税”等赋税特权，都妨碍着资产阶级，并引起他们不满。

同时，农民对于封建主的依附状况，严重地阻碍着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雇佣工人队

伍的形成。在原料供给、运输和商品销售方面，资产阶级也遇到种种困难。

在1848年革命以前时期，三个罗马尼亚国家中的封建所有制占据了绝大部分土地，隶农和农奴占农民总数的80%以上。罗马尼亚国约有四十万户农民，其中三十三万多户处于受封建主奴役的地位。在特兰西瓦尼亚，佃农的数目大大增加，这些农民完全无地或只有不足以养家糊口的一小块土地。

封建制度的基本矛盾——在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是隶农和地主的矛盾，在特兰西瓦尼亚是农奴和贵族的矛盾——急剧深化。正因为如此，消灭封建剥削和把土地分给农民成为1848年革命的主要社会目标，而农民则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也将利用要求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城镇居民——工匠、小商人、小职员、工厂和作坊的劳工。

资产阶级的利益遭到现存经济制度和封建政治制度的打击。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遇到比其他两个罗马尼

亚国家的资产阶级更大的障碍，因为它还遭受着特权阶级——马札尔贵族和萨克逊城市贵族的民族压迫。

在1848年革命以前的岁月里，资产阶级争取
247 扩大自己经济实力的有利条件、争取参加政治领导的权利的行动，日益频繁。资产阶级并不满足于自己的斗争果实，尽管地主已通过组织法承认它是“社会的最重要阶级之一”。而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地主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又不会自愿放弃特权。因此，愈来愈明显，资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实现自己的要求。

有些地主和贵族表现出自由倾向，对人民的伟大的社会愿望和民族愿望有一定的了解，这种情况在革命时期也可以看到。可是，这些人很难放弃阶级特权，这一事实说明他们为什么持动摇不定或同保守的封建领主同流合污的态度。

十九世纪中期，反封建斗争的高涨是在罗马尼亚人民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总斗争的背景下发生的。随着罗马尼亚民族的形成过程和民族意识的发展，三个罗马尼亚国家争取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

发展。

实现这些伟大的社会目标和民族目标是非常艰巨的，因为不但要挫败国内的罗马尼亚和马札尔(在特兰西瓦尼亚)封建领主的反抗，而且还要对付统治着中欧和东南欧的专制大帝国的反对。这种十分艰巨而复杂的历史条件，要求罗马尼亚革命力量同立志粉碎中欧和东欧的封建奴役和反动的君主制度的其他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结成联合阵线。

在当时一般原因的推动下和国内的特殊条件下，罗马尼亚诸国的革命于1848年爆发了，它是欧洲革命的组成部分。

罗马尼亚人的民主革命——欧洲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

1848年革命的烈火燃遍了大部分欧洲。在巴黎和巴勒摩，维也纳和柏林，佩斯和布拉格，克拉科夫和布加勒斯特，革新思想日益赢得阵地。

各国革命的原因及其进行的形式虽然有相似之处，但国与国之间也有很大差别。例如，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区，早在十八世纪末或

十九世纪初就已经消灭了封建关系，机器工业正在发展，资产阶级的实力正在加强。在欧洲的其他地区（奥地利、波希米亚、普鲁士），封建的生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那里正在逐步推广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发展资本主义关系。东欧和东南欧尚处于从手工工场向工厂生产过渡的开始阶段。压在千百万农民头上的封建关系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248 新的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以及当时的阶级关系，决定各种社会政治力量采取什么态度，有多大的战斗力。例如，法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推翻大银行家制度的政权，劳动阶层则希望获得民主权利，并进行社会改革；在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和市民群众为反对封建压迫、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罗马尼亚人、波兰人、意大利人、马札尔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除承受外国统治的重担外，还遭受封建压迫。

革命是他们能够实现社会、政治、民族等各种目标的唯一途径。这些目标是：把农民从封建奴役下解放出来并分给他们土地，争取资产阶级民

主自由，使处在外国统治下的各国人民获得民族解放，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正如尼古拉·伯尔切斯库所写的，罗马尼亚诸国的革命是由“扎根于人民在十八个世纪里所遭受的苦难和痛苦”这种内部原因所决定的，它是欧洲革命事件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欧洲革命事件只是罗马尼亚革命的“诱因”。

摩尔多瓦的革命运动

内部条件

摩尔多瓦的封建制度和主要依靠一部分保守派大地主的米哈伊尔·斯图尔扎大公的暴政，在人民中间引起了普遍不满和骚动。1846—1847年间，革命危机的信号愈来愈明显，表现在农民的局部反抗的加强和资产阶级反对派行动的加剧。1846年的“爱国协会”——同罗马尼亚国的“兄弟会”相似的秘密团体，以及同年冬天的农民起义强烈地表达了人民的反抗情绪。

资产阶级虽然数量不大，经济实力也有限，但还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切不满现状者的前列。但

它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

忍受着地主日益沉重的压迫的摩尔多瓦农民，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起义时期，显示了自己的革命力量，等待着新的斗争时刻的到来。

自由派地主和一些敌视大公并准备同资产阶级妥协以废黜大公的保守派大地主支持运动，但他们害怕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斗争。

摩尔多瓦革命运动的领导中明显地出现了两个政治派别：一派带有自由民主倾向，其中有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科斯塔凯·内格里、亚历山德
249 鲁·伊昂·库扎、扎哈里亚·莫尔多万努等，他们主张立即用资产阶级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第二派主张通过改良途径逐步改变社会。在这两个政治派别之间未能实现领导和行动的统一。

运动的开始　革命的纲领和策略

在摩尔多瓦，反封建运动的爆发已经迫在眉睫。其中也有科斯塔凯·内格里、瓦西里·默林内斯库、扬库·阿列克山德里、特奥多尔·勒什卡努等人参加的巴黎罗马尼亚革命者小组，决定在一项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使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

革命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但他们对如何进行革命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尼·伯尔切斯库建议大家先到蒙特尼亚集中，等革命爆发后再去摩尔多瓦；摩尔多瓦革命者则认为两个罗马尼亚国家的“运动应齐头并进”。这种观点的不同使得雅西的自由民主派未等国外的革命者回国，就在没有切实的准备的情况下发动了运动。

早在三月运动爆发以前，摩尔多瓦的反对派就组织过集会，但政府未敢加以禁止。1848年3月27日，在雅西彼得堡旅馆举行了一次这样的集会，约有一千名资产阶级、自由派地主、城郊市民以及部分旅居摩尔多瓦首都的波兰侨民参加了集会。通过运动的几个领导人——拉斯克尔·罗塞蒂、亚·伊·库扎、弗·吉卡的发言，会议参加者强烈地抨击了米哈伊尔·斯图尔扎的统治制度，尽管当时内务大臣和警察局长也在场。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致国君的请愿书。初稿起草后，委员会委托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定稿。以宣言形式出现的请愿书是一个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纲领，内有三十五条：释放全部政治犯，人身自由，内阁责任制，教育改革，取消粮食的

出口税，成立国民银行，取消书刊检查制，成立公民卫队，解散民众议会，建立新的议会作为"民族的真正代表机关"。同时，请愿书还要求"迅速改善农村居民的状况"。为了迷惑国君和避免沙皇立即干涉，运动领导人从策略考虑，把"神圣地遵循"组织规程作为纲领的第一条。

米哈伊尔·斯图尔扎假装接受部分要求后，即着手镇压运动。进行了大逮捕，有些革命者被流放。但其中有几个人得以摆脱看守，逃到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在那里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亚·伊·库扎、瓦·阿列克山德里、阿列库·
250 鲁索）。

摩尔多瓦革命运动的第一阶段就这样结束了。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而且缺乏切实的准备，运动没有成功。运动之所以失败，也因为国内的摩尔多瓦革命者未同国外的革命者采取联合行动。国外的革命者来不及在3月底以前回到雅西。甚至国内的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未能参加雅西事件，例如，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他当时被大公流放在索维扎。在争取使社会适应时代要求的斗争中，摩尔多瓦革命者力图不超越合法主义

的范围，避免使用暴力，并企图通过与地主，甚至与保守派地主取得谅解来实现纲领。同大地主的合作不排除要求进步的现实愿望，但是害怕唤起群众会引起革命暴力，害怕给国外反动势力以干涉的借口。最后，摩尔多瓦的运动同罗马尼亚国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缺乏配合，这大大减轻了反革命分子的担子，使他们能在短时间内把国内的一切反抗活动都镇压下去。

然而，3 月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摩尔多瓦革命斗争的结束。它将以农民起义的形式，以逃亡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的领导人发表纲领的形式继续下去。摩尔多瓦人将十分密切地注视罗马尼亚国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事态，其中有些人还将加人那里的革命行列。

1848 年 5 月和 8 月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

逗留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摩尔多瓦革命者参加了 5 月 3 日的布拉日大会，随后他们在布拉索夫（1848 年 5 月 12 日）拟定了一个题为《我们改革祖国的原则》的纲领。聚集在自由原野上的农民人数及其坚韧不拔的精神，使摩尔多瓦革命者深

为感动，他们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的影响下，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村居民当作一项基本要求写进纲领。这是一项彻底解决农民问题的措施。

同时，布拉索夫纲领第一次具体提出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思想，纲领中写着：“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统一成单一的独立的罗马尼亚国家”。这里考虑到的是，不利的国外条件当时还不允许同时也同特兰西瓦尼亚统一。这个最进步的摩尔多瓦革命纲领，具有深刻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但是没有在群众中广为传播。在纲领上签字的有：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科斯塔凯·内格里、格·西翁、扎
251 哈里亚·摩尔多万努、阿·鲁索。

4月—6月，摩尔多瓦发生了许多起地方性的农民运动，特别是在巴克乌、尼亚姆茨、图托瓦、罗曼、多罗霍伊和苏恰瓦等县。摩尔多瓦农民受到罗马尼亚国和特兰西瓦尼亚革命胜利的鼓舞，采取了更为勇敢的行动，也更加相信自己的力量。直到1848年6月俄国军队渡过普鲁特河以后，起义的声势才大为减弱。

在这种国内条件下，在革命继续在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国领土上进行的情况下，切尔讷

乌茨的摩尔多瓦革命委员会决定让米·科格尔尼恰努起草一份题为《摩尔多瓦民族派的愿望》的新的革命纲领。1848年8月制订的这份纲领，——它的实施意味着取消组织法，——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使隶农通过赎买分得土地，等等。纲领认为，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统一应当是未来民族大厦的“擎天柱”；社会各阶级都应派代表参加民众议会。纲领还规定废除奴役，把寺院财产有偿地收归国有和全体公民都享受平等的免费教育。米·科格尔尼恰努还把这个纲领中的改革发展成为一部宪法草案。

摩尔多瓦人在布拉索夫和切尔纳乌茨提出的两个纲领都未能付诸实现。但是，摩尔多瓦的运动表明，封建制度已不能长久地抵挡进步力量的冲击。罗马尼亚国和特兰西瓦尼亚的革命将更有力地说明这一点。

资产阶级政治上不够成熟，运动缺少统一的领导，自由派地主的温和态度，以及俄国的外交干涉和军事干涉，这些都对摩尔多瓦的事态发展起了消极的影响。

罗马尼亚国的革命

革命力量 革命的准备

1848年春，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地区革命危机的因素已酝酿成熟；1846—1847年的旱灾加剧了封建社会的矛盾，不满和骚动普遍发生。革命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

资产阶级尽管还比较软弱，但正处在上升时期；它比摩尔多瓦的资产阶级更加活跃，在革命中应起领导作用。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相接近的自由派地主，构成运动领导中的一个独特的政治派别。

农民、城镇居民（商人、工匠、职员、教员和教师、军官、神甫等）是参加革命的主力，将对维护革命起决定性作用。劳工（制革工、印刷工、屠宰工）由于其社会地位性质本身，是斗争中最富有战斗性、决心最大的阶层；青年是一支可观的革命力量。在伟大的社会理想和民族理想的鼓舞下，
252 充满热情和激情的、富有牺牲精神的青年，将站在革命力量前列，以便建立一个较为美好、公正的罗

马尼亚社会。许多领导人正血气方刚。

通过组织良好的联合行动，所有这些社会力量是能够推翻地主阶级的倒行逆施的统治的。革命领导人肩负着准备这场反封建斗争的使命。

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革命家尼古拉·伯尔切斯库写道：1848年革命的思想准备，事实上是随着1821年运动的开始而开始的。在革命前几年和在进行革命日子里，政治、艺术和文学团体制订的纲领作出过重要贡献。

革命前五年，在尼·伯尔切斯库倡议下建立的秘密政治团体"兄弟会"后来起了特殊作用。由于它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兄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聚集了许多拥护者。主要的革命领导人都是1848年初组成的十三人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尼古拉和康斯坦丁·伯尔切斯库兄弟、尼古拉和什特凡·戈列斯库兄弟、杜米特鲁和扬·布勒蒂亚努兄弟、亚历山德鲁·格·戈列斯库（绰号叫黑脸，以区别于他的堂兄弟、绰号叫白脸的亚历山德鲁·克·戈列斯库）、康·阿·罗塞蒂、扬·吉卡、格奥尔基·马格鲁、扬·沃伊内斯库二世、克里斯蒂安·特尔和扬·埃利亚德（后来又自称勒杜列斯

库)。5月，这个革命委员会又选出了由尼·伯尔切斯库、亚·格·戈列斯库和扬·古卡组成的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将在组织和准备革命中起积极作用。在国外的罗马尼亚革命者（尼·伯尔切斯库和亚·格·戈列斯库等人)于1848年4月回国,同国内的革命者联合在一起。

5月间，尤其是特兰西瓦尼亚的布拉日事件后,人民的情绪如此激昂,以致随时都可能爆发大规模的革命行动。

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几次秘密集会上，制订了革命的政治军事计划。根据这一计划，运动应于1848年6月9日在全国各地——布加勒斯特、伊兹拉兹、奥克内列—马里和特列加(普拉霍瓦）开始。在确定地点时，既考虑到革命的力量，也考虑到驻防军的有利态度。特列加和奥克内列—马里的盐矿工人可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尼·伯尔切斯库对他们进行了有力的宣传工作。多瑙河沿岸、奥尔特河两岸和伊兹拉兹附近驻扎着克里斯蒂安·特尔少校和尼古拉·普列绍亚努上尉指挥下的部队，他们是革命的积极拥护者。伊兹拉兹位于罗曼纳茨县境内，县长格奥尔基·马格

鲁是一位热情的爱国者。

给将于6月9日发动运动的每个中心分配了一名或数名领导人：尼·伯尔切斯库在普拉霍瓦县（特列加）；他的兄弟康斯坦丁·伯尔切斯库在佛耳恰县（奥克内列一马里）；扬·埃利亚德一勒杜列斯库同什特凡·戈列斯库和克里斯蒂安·特尔一起在罗曼纳茨县的伊兹拉兹；康·亚·罗塞蒂和扬·康·布勒蒂亚努在布加勒斯特。

扬·马约雷斯库、阿隆·弗洛里安、康斯坦 253
丁·罗曼、阿克森特·塞韦尔等逃亡在罗马尼亚国的特兰西瓦尼亚学者，也参加了这里的革命准备工作。

革命纲领

1848年5月，革命委员会制订了纲领，把革命的目标和任务归纳为二十二条。通过取消外国保护制度和加强国家自治来达到“行政和立法”的独立这一条列于首位。

由于国际环境不利，暂时没有提出完全独立和政治上统一的思想。其他的政治要求有：取消地主的阶级特权和改革国家的中央机构；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即享受同样的政治权利和人人按财产纳税；有社会各阶层参加的民众议会；由同样的选举机构五年选一次国君；内阁和职员责任制；出版完全自由；建立保卫革命成果的国民卫队。

就革命的社会内容来看，纲领第十三条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一条规定解放隶农和通过给地主赔偿分给隶农土地。实现纲领的这一条，意味着消灭封建生产关系，意味着社会面貌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根本改观。

革命纲领还规定教会摆脱对东正教大主教的依附，并将其财产有偿地收归国有；通过赎买，解放私人庄园上的茨冈人；全体公民享受平等教育；废除毒打和死刑；解放犹太人，给予信奉异教的任何同胞以政治权利。纲领最后一条规定由立宪会议起草和通过以本纲领为基础的宪法。

因此，纲领既包括了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感兴趣的改革，人民群众的社会政治要求，也体现了全体人民的民族愿望。所以，它具有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性和民族性。

纲领的制订是革命领导人之间进行激烈的思想交锋的结果。根据对把一些社会要求写进纲领

所采取的立场和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所持的态度，革命领导内部的主要派别有：

以尼·伯尔切斯库为首的革命民主派，代表革命中最先进的观点。革命民主主义者们忠实地表达了大众的愿望，对土地改革给予应有的重视。尼·伯尔切斯库后来写道："整个1848年革命包含在第十三条中"。他懂得，只有自由的、拥有自己耕种的土地的农民，才能确保国家的前途。

以康·亚·罗塞蒂为首的激进自由派，首先 254
代表中间阶层的利益。它支持在纲领中写进广泛的民主改革，但对实施这些改革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

以扬·埃利亚德为首的温和自由派，既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自由派地主的利益。其代表人物对在纲领中写进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持保留态度，并在革命时期拖延执行这些条款。后两个政治派别将在未来的临时政府中占优势地位，而这将影响革命的进程。

为了向群众解释纲领所包含的革命目标和任务以使他们接受，曾起草了一篇宣言，准备在运动波及的各地宣读。

革命开始　资产阶级制度的建立

由于格·比贝斯库大公采取了措施，革命未能按预定日期在既定地点同时发动。在伊兹拉兹，革命是于1848年6月9日开始的，在布加勒斯特于6月11日开始，随后扩展到全国。

在农民群众中享有高度声望的切列伊的拉杜·沙普克神甫，以及扬·埃利亚德等其他革命领导人的号召下，数百名农民和市民集合到伊兹拉兹附近的“复兴原野”，举行人民大会。与会者当中也有普列绍亚努上尉指挥下的军人，他们站到了人民一边。扬·埃利亚德对决心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热情的群众阐述了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后来以《伊兹拉兹宣言》的名称载入史册。扬·埃利亚德向大会说：“罗马尼亚兄弟们，……我们的祖先抛头颅、洒热血，给我们留下这面光荣的三色旗。我们的祖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给我们留下一个在敌人面前从不屈膝的祖国。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子女留下一笔伟大的遗产”。群众欢欣鼓舞地拥护革命纲领，并且发誓保证为实现这一纲领而奋斗。

在伊兹拉兹宣告成立的临时政府，由扬·埃利亚德、什特凡·戈列斯库、克里斯蒂安·特尔少校、尼·普列绍亚努上尉和沙普克神甫组成。这个政府一直存在到布加勒斯特临时政府成立为止，后来于6月14日同它合并。

在宣读宣言并组成革命政府之后，伊兹拉兹大会的参加者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克拉约瓦行进。到达卡拉卡尔时，格·马格鲁也率领一支步兵部队参加了这一队伍。

奥尔特尼亚的胜利也加速了首都的事态发展。聚集在多布罗蒂亚萨贫民区的阿克森特·塞维尔家里的一部分革命领导人，决定于6月11日开始行动。在鼓动者的召唤下，以制革工人和近郊农民为首的大群大群的布加勒斯特人，在大教堂的钟声中，高举三色旗帜，佩戴着三色胸章和彩带涌向皇宫。军校学生伊·马格鲁在利普斯卡尼宣读了革命的信息——宣言；另一名青年诗人伊· 255
卡丁纳在圣格奥尔基广场宣读了宣言。在群众的压力下和在没有军队支持的情况下，格·比贝斯库被迫签署了宪法，承认了新政府。后来，尼古拉·伯尔切斯库写道："6月11日的革命是一个民族

所进行过的最美好的革命”。

6月13—14日废黜国君以后，临时政府接管了国家政权，直到选出新“大公”为止。由大主教内奥菲特（很快就证明他是地主反动派的支持者）主持的“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最高机构，由扬·埃利亚德、什特凡·戈列斯库、克里斯蒂安·特尔、格·马格鲁和商人格·斯库尔图组成。尼·伯尔切斯库、亚·格·戈列斯库（黑脸）、康·亚·罗塞蒂和伊·康·布勒蒂亚努被任命为秘书。从6月11日起在内阁（临时政府）中任职的有：尼·戈列斯库（内务部长）、扬·埃利亚德（宗教部长）和伊·奥多贝斯库上校（军事长官）。新任命的内阁成员有：扬·肯皮内亚努（司法部长）、卡·尼·菲利佩斯库（财政部长）和扬·沃伊内斯库第二（国务秘书）。

6月15日在菲拉雷特原野（从此以后叫做自由原野）举行的人民大会，欢呼政府的成立，承认宪法，表示完全拥护革命事业。

人民保卫革命

通过革命建立的新政权成为企图复辟封建主

义的国内外反动派的眼中钉。在长达三个月的搏斗中，人民群众在支持革命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这场搏斗的第一阶段，反动派主要是依靠国内封建势力施展阴谋来使年青的政权面临严重考验的。在格·比贝斯库弃位后，反动分子趁政府无所作为之机，同军队司令伊·奥多贝斯库上校和布加勒斯特卫戍团团长伊·索洛蒙上校狼狈为奸，策划了一个反革命阴谋。

6月19日，以伊·奥多贝斯库上校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借口到莫戈什瓦亚桥政府所在地（迪尼库·戈列斯库的住宅）向政府“致意”，实施了反动计划。他们逮捕了扬·埃利亚德、尼·戈列斯库、克·特尔等人。革命处于严重关头；如果不是人民群众立即进行有力的干预，革命便从那时起就不复存在了。

听到政府成员被捕的消息后，布加勒斯特群众急速涌向市中心，包围了皇宫。伊·索洛蒙上校命令向群众开枪，死亡八人，受伤者更多。这一事件进一步激怒了群众，使他们势不可当地投身于战斗。挺身而出的安娜·伊珀黛斯库和托马·乔治乌鼓舞了群众的斗争意志和决心。周围街道

上筑起了街垒。布加勒斯特人粉碎了反动派的阴谋，并释放了政府成员。与人民群众的坚决态度相反，政府对搞阴谋的军事头目们表现了不能容
256 忍的宽容态度。在那些日子里，尼·伯尔切斯库建议政府采取有力的行动，严惩阴谋分子以儆效尤。伯尔切斯库说：“在困难的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非常措施”。

不到十天的时间，反动派又利用政府的软弱无能策划了另一个反革命行动。这次，在大主教内奥菲特的支持下，反动地主散布谣言说，沙皇军队正向布加勒斯特挺进。惊恐万状的政府成员于6月28—29日夜错误地离开首都，逃往特尔戈维什特。革命的敌人就这样得以重新执政两天。人民又一次进行了有力的干预，结果使政府重新获得它的权力。人民群众写下了勇敢和英雄主义的新篇章，又一次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决定性力量。

《罗马尼亚婴儿报》和《自主的人民报》，以及积极地解释和宣讲革命思想、增强人民对自己力量的信心的宣传员们，对保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发挥了重要作用。尼·伯尔切斯库要求宣传员“使人民感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并把这种力量以“强

烈而坚韧不拔的”意志表现出来。

革命措施

从革命最初几天起，政府就开始实施纲领中的一些规定。通过一组法令决定：国旗为兰、黄、红三色，上面写上座右铭：“正义、博爱”；取消国民的等级；释放全部政治犯；废除奴役和书刊检查制度，等等。因为保卫革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便采取措施组织国民卫队、步兵部队和潘杜尔义勇军，由被任命为总司令的格·马格鲁指挥。

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关于立宪会议的问题。在召开这一会议的问题上，革命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尼·伯尔切斯库支持普遍的、直接的选举权，而扬·埃利亚德和其他温和派则主张采用以财产为基础的资格选举法。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未得解决，同时也是由于外国的军事干涉。

土地问题是革命急需解决的基本问题。农民要求立即实施纲领第十三条的规定，即通过分配土地废除封建奴役。政府却推迟解决这一迫切问题，要求隶农继续对地主履行原来的义务，直到召

开立宪会议为止。

农村中存在着强烈的革命情绪，农民甚至采取了反对地主和佃主的行动。因此，在尼·伯尔切斯库的坚持下，政府决定成立一个“产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数目相等的代表组成：每个县有地主代表和农民代表各一名。委员会应草拟一项
257 土地法案，提交未来的立宪会议批准。主张分土地给农民的摩尔多瓦农艺师、布拉德的扬·约内斯库被任命为委员会的副主席。在“产权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农民代表以感人肺腑的言词表达了农村群众的迫切愿望。其中有一位疾呼道：“我们流血流汗，作出这些牺牲反而一无所有，我们不是我们土地上的主人，这难道不罪过吗？而且我们连一小块借以糊口的土地也得不到。”

经过多天的辩论（8月9—19日），因为地主的反对，产权委员会未能达成最后的一致决议。扬·埃利亚德解散委员会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已经开始出现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这样，1848年土地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害怕大地主和外国的军事干涉，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不敢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土地改革。

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是革命者的一个共同目标。诸公国联合的思想，虽然为了避免引起土耳其和俄国的抗议而未在纲领中具体表达出来，但一直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之中和革命者的思想里。7月13日，《罗马尼亚婴儿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致我们的摩尔多瓦兄弟们》的宣言文章，鼓励摩尔多瓦人起来推翻专制统治，以便“使整个罗马尼亚民族获得自由，使整个罗马尼亚民族组成一个国家、一个单一的亲如兄弟的民族”。革命的《自主的人民报》在1848年7月19日创刊号上发表的纲领里宣称，只有把罗马尼亚各地区统一起来，才能使罗马尼亚走上繁荣和真正幸福的道路。1848年8月，瓦·阿列克山德里写信给尼·伯尔切斯库和蒙特尼亚的其他罗马尼亚革命者说：“……摩尔多瓦多数人的最殷切的希望”是把摩尔多瓦“在同一个政府和同一部宪法下同瓦拉几亚”统一起来。

外国反动派的干涉，革命的失败

革命者知道，国内的革命事件会引起奥斯曼帝廷和沙皇政府的敌视。他们曾经试图通过紧张

的外交活动阻止外国军队的反革命干涉。向欧洲许多国家的首都派遣了外交代表，并为实现罗马尼亚革命和欧洲其他国家革命之间的相互声援作了巨大努力。为了防止俄土联合行动，扬·吉卡在君士坦丁堡对奥斯曼政府保证：革命不想断绝同宗主国的联系。

但是，外国反革命力量的行动未能被制止。地主的反复呼吁和沙皇的外交压力加速了奥斯曼的干涉。7月19日，土耳其军队开始在朱尔朱横渡多瑙河。苏丹的特使苏利曼—巴夏宣称，此行的
258 使命在于保护"国家的原有权利和机构"。同时，沙皇内阁也通过外交照会，企图为它以保护国身份作出的为"恢复秩序"而干预诸公国的决定进行辩解。罗马尼亚国的革命者也被指控为企图推翻摩尔多瓦的"合法秩序"，以把这两个姊妹公国统一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武装干涉的威胁下，苏利曼—巴夏强行以摄政府代替临时政府，由扬·埃利亚德、尼·戈列斯库和克·特尔组成。这些人同意新机构一旦获得苏丹批准，立即生效，这在革命进程中是明显的倒退。

有尼·伯尔切斯库参加的一个代表团前去向奥斯曼帝廷呈递宪法修正稿，争取苏丹批准和承认新政权。代表团决心坚定不移地捍卫罗马尼亚人的权利。可是，由于国内反动派和沙皇的外交阴谋，代表团未被接见，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后不得不回国。

人民群众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在9月6日举行的一次葬礼上，焚烧了旧制度的象征——《组织规程》和《贵族谱》（地主等级册）的正式文本。

在苏丹的新特使傅阿德—埃芬迪的陪同下，土耳其军队向布加勒斯特进发。这样一种严重局势要求紧急组织军队抵抗，但没有这样做。提倡和坚持这一思想的尼·伯尔切斯库，把希望寄托在格·马格鲁驻扎在“图拉真原野”（佛耳恰县的勒乌雷尼）的义勇军和潘杜尔军身上，还希望得到埃夫蒂米·穆尔古统率的巴纳特的罗马尼亚部队的军事合作。

9月13日晨，傅阿德—埃芬迪在科特罗切尼军营里接见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通知代表团恢复组织规程制度和任命康·康塔库齐诺为代君上。尼·伯尔切斯库和另一些代表强烈抗议，遭

到逮捕。扬·埃利亚德和克·特尔逃进英国领事馆。

尽管既无武器，又无领导人，布加勒斯特群众仍竭力阻止侵略军入城，但土耳其骑兵竟越过手无寸铁的群众组成的人墙。帕维尔·泽格内斯库上尉指挥的消防连，在第三团营房内的士兵的协助下，同人数相当于他们二十倍的土耳其军搏斗，在人民和军队的战斗传统中写下了英勇不屈的光荣篇章。在评价罗马尼亚人的坚贞不屈和牺牲精神时，卡尔·马克思把斯皮里坡的战斗称为“布加勒斯特的血浴”。

9月15日，沙皇军队也开始跨越米尔科夫河①。在英国领事和已逃往特兰西瓦尼亚的扬·埃利亚德和克·特尔的干预下，马格鲁将军于9月28日解散勒乌雷尼军营，“以免把祖国置于同两个强国交战的困境”。

在占领军刺刀支持下恢复的组织规程制度，采取了镇压措施。许多积极参加革命的人被投进监牢，而另一些人则被流放。

① 在两公国统一以前，此河是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之间的界河。——译者

在谈到我们祖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时，259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说："1848年革命之所以失败，其中原因之一是遭到外国势力的干涉，它们不甘心罗马尼亚人民获得解放，建立一个强大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它们将此视为对世界这一地区的封建制度的威胁。"

1848年罗马尼亚公国的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新的资产阶级政权取代封建政权整整三个月，并赋予国家以宪法纲领。在革命期间，强烈地表现出人民向往民主自由、独立和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的愿望。

1848—1849年特兰西瓦尼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48—1849年革命把特兰西瓦尼亚的社会和民族的基本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废除农奴制，保障资本主义关系自由发展，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解放。这是一次反封建、反专制主义的革命，无论从革命的纲领还是从参加革命的社会力量来看，它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

1848 年 3—4 月的革命动荡

巴黎(2 月 22 日)、维也纳(3 月 13 日)和佩斯(3 月 15 日)爆发革命的回声，促使特兰西瓦尼亚的阿拉德、蒂米什瓦拉、奥拉迪亚、克鲁日、特尔古—穆列什、阿尔巴—尤利亚等城市发生示威游行。3 月 18 日通过的匈牙利革命法令，在匈牙利实行了一系列的民主自由和结构改革，但在社会和民族问题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徭役和什一税取消了，旧日的农奴获得了自由，但是广大的佃农群众仍受贵族的任意盘剥。这是因为 1848 年匈牙利革命的社会领导力量主要是中、小贵族，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太弱。特兰西瓦尼亚的绝大多数居民虽然是罗马尼亚人，但马札尔自由派贵族却竭力维护"神圣的匈牙利皇家领土的国家统一"。匈牙利革命法令不承认匈牙利的少数民族(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等)，强迫他们在公众生活中使用马札尔语。更为甚者，上述法律违反绝大多数居民的意志，规定把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这一"联合"将由克鲁日的国会表决通过。国会是由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札尔贵族代表组成的，他们

认为把公国并入匈牙利是革命的主要问题，因此急不可待地强行这样做。结果只能使罗马尼亚的和马札尔的革命力量在共同的敌人——哈布斯堡 260
专制主义面前四分五裂。在特兰西瓦尼亚拖延实施3月革命法令的某些规定，维持贵族的旧国家机器，同样使马札尔革命丧失特兰西瓦尼亚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格·巴里齐乌在布拉索夫出版的报纸和蒂莫特伊·契帕里乌在布拉日出版的《启蒙报》(布拉日大会后改名为《国民报》)，都欢迎革命，希望它能解决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开始时，罗马尼亚一马札尔共同斗争的思想是很活跃的，但马札尔革命领导对民族问题的态度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了它。所有罗马尼亚人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的思想非常强烈，这种思想是由以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整个发展所决定的。定居在两公国的一些特兰西瓦尼亚学者潜回特兰西瓦尼亚，动员人民起来为争取被人剥夺的权利而斗争。3月24日，西米翁·伯尔努齐乌教授发表宣言，要求承认罗马尼亚人是一个政治民族，主张废除农奴制。3月25日，在特尔古一穆列什举行的罗马尼亚—马札尔大会上，以阿弗拉姆·扬库和亚·

帕皮乌—伊拉里安为首的罗马尼亚革命者，提出无偿解放农奴的问题。在克鲁日举行的另一次集会上(3月28日)，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再次为本民族要求权利。社会和民族动荡尤其发生在西山、巴纳特、布拉索夫和其他地区。马札尔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代表之间对革命的意见和利益分歧，同社会和政治改革应达到的限度有关；在民族问题上，他们绝大多数都主张维护马札尔民族的政治统治地位。日耳曼族居民的态度按社会阶层不同而有所区别：萨克逊城市贵族希望维护原有特权，维持拥有这些特权的“萨克逊学府”(即以锡比乌为中心的“皇村”这种特殊组织的名称)，反对马札尔革命脱离奥地利的独立倾向。资产阶级分子、锡比乌和布拉索夫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巴纳特的士瓦本人的这些阶层的代表参加了革命；其中有些人认识到解决民族问题的必要性，表示同情罗马尼亚人。

萨克逊领导人(斯·卢·罗特、克·戈斯、格·德·托伊施、阿·库尔茨、姆·莫尔特克等)提出的多数要求，较少涉及农奴解放问题，尽管约有四万名萨克逊农奴生活在贵族领地上，而较多地涉

及决定他们民族自身生存的民族、文化和经济问题。由于这一原因,他们脱离了马札尔革命,因为这个革命的领导人不愿意给予非马札尔族人以民族权利。

但是联合所有受哈布斯堡专制主义压迫的民
族的革命力量的客观任务,决不能同把特兰西瓦
尼亚强行并入匈牙利混为一谈。可惜,以马札尔
革命领袖科苏特为首的马札尔革命领导人不理解
这一基本真理。这些领导人为了唤起马札尔人
民,以堪后代和各民族一切进步人士称颂的毅力
和牺牲精神进行了斗争,但是他们犯了严重错误, 261
即不认识马札尔人民为之奋起斗争的自由愿望自
然地同时也是哈布斯堡帝国其他各族人民的愿
望。这对革命的命运来说是致命性的错误。坦契
奇·米哈伊、诗人裴多菲·山多尔、特列基·拉斯
洛等匈牙利革命战士所表明的立场较为先进。

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札尔贵族开始组织国民卫队,其使命是保护财产,维持安宁,防止下面的革命运动,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们不让穷人参加国民卫队。对统治集团来说,最危险的事莫过于武装人民。国民卫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防止罗马尼

亚民族运动，并在必要时予以镇压。

在西部地区（巴纳特、克卫沙纳、马拉穆列什），农民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这就使一大部分罗马尼亚族和马札尔族农民行动了起来。但这里的佃农继续处于贫困境地，因此在比霍尔、阿拉德、卡拉什和塞特马尔等郡都发生了农民运动——占领庄园、草场和森林等。

在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徭役尚未废除。革命爆发数月后才颁布了有关法令，而把它们付诸实现又拖延了更长的时间。在克鲁日和特尔纳瓦河周围以及在阿尔巴的塞凯伊人中间都发生了大规模运动，而在扬库、帕皮乌和布特亚努等大无畏的革命者从事活动的西山地区（维德拉、肯佩尼），运动的声势更大。当局进行镇压，实行“特别戒严”，设立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特别法庭。罗马尼亚革命者不是被逮捕，便是受到严密监视。

布拉日人民大会（1848 年 5 月 3—5 日）

召开民族大会的思想，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在人民中间得到了传播。每个村庄都宣读了号召罗马尼亚人民派出自己的代表于 4 月 30 日到

布拉日开会的宣言。以罗马尼亚革命知识分子为首的约四千名农民，不顾当局的恐怖措施，前来参加大会。这次会议标志着特兰西瓦尼亚革命的首次大规模行动。会上的演讲提出了废除农奴制和争取民族权利的问题。在1848年5月3—5日布拉日大会召开前的几天里，特兰西瓦尼亚发生了社会和民族的大动荡。被这些动乱吓破胆的当局树起绞刑架，正如巴里齐乌在他以后的著作《特兰西瓦尼亚史选编》中所说，“这是那个时代在欧洲任何地方都再也看不到的”。马札尔族农民同罗
马尼亚族农民一起参加斗争，反对大地主。马札 262
尔报刊猛烈地抨击农民运动，特别是罗马尼亚农民运动。特兰西瓦尼亚保留着书刊检查制度，这首先是针对罗马尼亚报纸的。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的问题以及这方面的压力和威胁，促使群众接受西米翁·伯尔努齐乌的思想，他要求首先从政治上承认罗马尼亚民族。阿弗拉姆·扬库及其战友在动员和领导人民方面是最激进的分子，他们可被认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其他罗马尼亚领导人，如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格·巴里齐乌和蒂莫特伊·契帕里乌等，也站在先进的立场上。在革

命的基本问题——民族和社会问题上，这些领导人的观点是一致或非常接近的；只是在一些细节问题和革命进行过程中某些时刻的策略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不幸的是，在罗马尼亚人中间还存在幻想，希望维也纳宫廷大发慈悲，锡比乌正教主教安德烈·沙古纳是这种幻想的倡导者。他是温和派，有时甚至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处于特殊地位，它正在开始形成，人数少，是从比较接近人民的中、上层农民中间成长起来的。因此，它支持人民的要求，得到城乡群众的支持。城乡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力量。革命的领导落在资产阶级身上。

巴纳特、克里沙纳和马拉穆列什的情况在历史上同特兰西瓦尼亚有所不同，因为这些西部地区的革命较为先进一些。1848—1849年巴纳特革命的领导人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埃夫蒂米·穆尔古。他是1840年罗马尼亚国革命活动的参加者，是为三个省的罗马尼亚人的政治统一而斗争的战士，是罗马尼亚一马札尔革命友爱的拥护者。他主张成立一个巴纳特的罗马尼亚“专署”作为过渡的形态，权力属于人民，由一支革命军队来保卫。巴

纳特的马札尔贵族和马札尔革命领导人激烈反对穆尔古的目标,甚至阻挠他去参加布拉日大会,尽管大会要他去当主席。站在这些西部地区的罗马尼亚人民群众前列进行斗争的,还有其他许多领导人,如阿洛伊西乌·弗拉德、伊昂·德拉戈什、埃曼诺伊尔·戈日杜等等。在革命最初几天的示威以后,在4月的民族运动和农民运动之后,奥拉迪亚的罗马尼亚人呼吁书(5月9日)也要求保障罗马尼亚民族权利。

1848年5月3—5日布拉日大会是革命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它实际上制订了革命的纲领。成千上万的农民不顾克鲁日当局下的禁令,早在预定开会的日子之前就来到了布拉日,他们希望废除农奴制和求得民族解放。值得一提的是,马札尔族农民也前来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也希望摆脱农奴制的锁链,因此同罗马尼亚农民站在一起。由伯尔努齐乌拟订和宣读的大会纲领,强调罗马尼亚民族的政治权利,抗议一意孤行地同匈牙利"联合"。许多学者和革命者从两个公国专程赶来参加大会,如阿列库·鲁索、格·西翁、瓦·阿列克山德里、迪·布勒蒂亚努、科斯塔凯·内格里

263 (似乎还有亚·伊·库扎)，他们同奥古斯特·特雷博尼乌·拉乌里安、阿克森特·塞韦尔、阿隆·弗洛里安等特兰西瓦尼亚人站在一起。尼·伯尔切斯库和扬·吉卡转达了想同马札尔革命运动接近的愿望，同时有力地坚持罗马尼亚人的权利。

5月2日(公历14日)，西米翁·伯尔努齐乌在布拉日大教堂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有力地申述了一国人民的自由首先是民族自由的思想。他问道："联合迫在眉睫，我们怎么办?"他还用下列语言表达了时代要求："罗马尼亚民族要宣布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它庄严地声明，从此以后有责任只服从它内部选出来的官吏；…… 它告知各共居民族，它要求按民族原则建立和组织起来，对其他民族没有敌意，承认大家享有同样权利，并愿意诚恳地尊重这种权利。"伯尔努齐乌几乎是慷慨激昂地、同时又是十分确切地对特兰西瓦尼亚成千上万的农奴所忍受的牛马般的苦难生活作了扣人心弦的描写。次日〔5月3日(公历15日)〕，四万多名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和工匠聚集在由大会决议从那时起就称为自由原野的地方开会。通过提出"复兴罗马美德"这一格言和许多演说者的热情

洋溢的讲话，回顾祖先的荣光，以增强人民的自信心，并用继承这些不朽的传统精神进行思想动员。一些目睹者（有些是国家当局的官方代表），包括马札尔族、日耳曼族和罗马尼亚族的参加者和领导人，都描写了布拉日大会，告诉我们这一事件对当时所有人所产生的强烈印象以及大会的秩序和完全团结的气氛。人民挫败了当局使两个教派分别开会或在大教堂里组织小型会议的企图。伯尔努齐乌提出了会议的四点纲领：宣布罗马尼亚民族独立，忠于皇帝，决定采纳自由原野的名称和向大会宣誓。誓词除确定民族自由外，还包含着废除农奴制和工商业自由的思想；“维护正义，促进人类幸福”，不仅意味着罗马尼亚人民拥护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且意味着本着各国人民之间合作和相互尊重精神，积极参加争取普遍进步的事业。次日（5月4日），奥·特·拉乌里安在自由原野大会上具体阐述了以国民请愿书形式出现的十六点纲领。其中规定：罗马尼亚民族的权利，罗马尼亚族代表参加国会、司法、行政、军队，建立罗马尼亚国民卫队，每年举行民族大会；无偿地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工商业自由，取消关卡（这在加强同

两个公国经济联系的可能性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保障罗马尼亚语教育，包括用国家基金开办一所罗马尼亚语大学；公民权利和自由（结社权，言论和出版自由，废除书刊检查制度等)；强制富人根据纳税者的财产状况按比例合理分摊国
264 民负担；公国的新宪法；拒绝剥削阶级在既违背
大多数居民意志而又不同他们的代表商量的情况下策划的联合。决议警告说，否则，“罗马尼亚民族庄严地抗议”。这些要点还使罗马尼亚—马札尔达成协议成为可能。于是布拉日大会就选派一个代表团向维也纳提出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民的这些要求，派另一个代表团向克鲁日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同时，还选出一个常设委员会，设会址于锡比乌，其任务是：接受维也纳和克鲁日的答复，将答复通知下一届民族大会，代表罗马尼亚民族利益和领导这方面的一切活动。

布拉日大会大大加强了罗马尼亚民族意识和建立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思想。人民中的许多呼声表达了统一的思想：“我们要同祖国联合起来！”“现在阿尔迪亚尔就是罗马尼亚！”警察的报告谈到许多乡里的农民公开申述特兰西瓦尼亚与

罗马尼亚国联合的愿望。《统一霍拉舞》歌词的最初几稿是那些日子里激昂情绪的不朽的表现。也在那时问世的、诗人安德烈·穆雷沙努创作的著名颂歌：《觉醒吧，罗马尼亚人！》，是全体罗马尼亚人民族解放运动的赞美歌。布拉日大会使第一次以这样的规模聚会一堂的数以万计的罗马尼亚人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力量，激励了他们进行正义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斗争所必需的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卢戈什大会〔5月3日（公历15日）〕和蒂米什瓦拉举行的教会会议上，巴纳特的罗马尼亚人代表也提出了类似布拉日大会提的要求，以争取提高罗马尼亚人的社会地位并使他们参与公众生活。三个罗马尼亚国家的革命者之间经常性合作的目的，在于协调喀尔巴阡山两侧的革命行动并使之结合起来。布拉日选出的两个代表团执行使命时遇到阻挠，常设委员会被解散。克鲁日反动国会，不顾在自由原野上集会的人数最多、最古老民族的代表所作的决议，于1848年5月29日同意把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数日之后，皇帝也批准了“联合”。

革命的开展（1848 年 6 月—1849 年 7 月），革命力量进行联合的努力

克鲁日国会表决通过把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后，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冲突和社会冲突急剧尖锐化。马札尔文激进报《三月十五日报》对于无视“意味着整个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的意志，强行“联合”所产生的危险提出了警告。

克鲁日国会和特兰西瓦尼亚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加深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废除农奴制曾受到罗马尼亚革命者的热情欢迎，但在实际执行中遭到马札尔贵族的顽固抵制。这引起了剧烈的农民运动，贵族付诸武力加以镇压。马札尔化
265 措施和其他沙文主义的反动迫害手段，加深了作为特兰西瓦尼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性质。维护旧秩序和贵族的特权，旧政权人员保留原职，无不激起罗马尼亚、马札尔和日耳曼族人民群众的深深不满。马札尔族农民拒绝参加革命政府为了对付即将来临的战斗而组织的军队。马札尔贵族和资产阶级集团在特兰西瓦尼亚推行的政策，严重地危害着革命事业，造成罗马尼亚族和马

札尔族革命力量的分裂。

在尼·伯尔切斯库的推动下，奥·特·拉乌里安倡议同佩斯政府代表进行谈判，但由于马札尔革命领导集团的阻挠，谈判毫无结果。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日益广泛地利用马札尔国民卫队来反对农民和民族解放运动，对扬库·帕皮乌、布特亚努等革命领导人施出恐怖手段。日益紧张的形势促使在自由原野上召开第三次布拉日大会（9月15日）。这一次，农民都带上长矛和钢叉来开会了，要求停止恐怖行动，调整土地问题，取消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建立罗马尼亚国民卫队，成立若干有代表性的混合司法委员会，按民族比例组成特兰西瓦尼亚临时政府。农民开始加紧武装。尽管与马札尔革命的关系已遭破坏，一些罗马尼亚革命者为防止正在扩大成流血事件（在西山地区）的冲突仍进行了反复尝试（致首相备忘录，致马札尔民族宣言等），但均未被理睬；马札尔革命政府表现出利己主义，不给予其他民族以权利，唯恐因而危及马札尔人的霸权，特别是不希望革命力量得到加强的贵族的霸权。

在这种情况下，维也纳宫廷利用民族矛盾来

延长自己的统治。1848年秋，哈布斯堡反革命派在镇压了帝国其他几省的革命后，先后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采取了行动，并于1848年11月占领了特兰西瓦尼亚。在加博尔·阿隆领导下，三专区地区的塞凯伊人进行了非常顽强的抵抗。1848年12月16日（公历28日），罗马尼亚领导人在锡比乌集会，再次抗议“联合”。在波兰革命者约瑟夫·贝姆将军指挥下，马札尔革命军队阻止了帝国军队的推进，到1849年3月，逐步解放了特兰西瓦尼亚。在贝姆的革命军队伍中约有二千名比霍尔的罗马尼亚人，而在罗马尼亚公国革命失败后逃至此地的切扎尔·博利亚克也在这支部队的司令部工作。由千人批罗马尼亚人起来参加斗争，他们的领导人要求改组特兰西瓦尼亚某些地区的行政机构，从那里的罗马尼亚人中间提拔人材，尤其是在西山、弗格拉什、阿尔巴、洪尼多阿拉等地区。

罗马尼亚—马札尔接近的尝试在继续进行，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首推罗马尼亚革命民主主义者尼·伯尔切斯库。1848年秋，伯尔切斯库也逃
266 出罗马尼亚国，历尽千难万险到达锡比乌，努力使

马札尔革命和罗马尼亚革命联合起来，并为此着重做马札尔领导人的说服工作。他在这个时期的书信证明他当时万分忧虑，在不倦地关心着保证革命取得完全胜利，他是从更广的、欧洲的范围来理解革命的，认为革命是针对日益危险的国际反动派的。贝姆将军呼吁罗马尼亚人和马札尔人联合起来，结成反哈布斯堡专制制度奴役的各被压迫民族共同斗争的一股革命洪流。对帝国宫廷慈悲心的幻想破灭后，阿弗拉姆·扬库于 1849 年春试图接近科苏特。为此，通过佩斯议会中的比霍尔议员伊昂·德拉戈什，在西山地区进行了谈判。马札尔政府不同意在谈判期间停止敌对行动。悲剧性的斗争、贵族挑起的事端使冲突达到白热化：阿布鲁德受到冒险分子哈特瓦尼指挥的一支马札尔部队的攻击；罗马尼亚革命者扬·布特亚努被捉，并被绞死。马札尔贵族的残酷无与伦比。伊昂·德拉戈什、马札尔革命者瓦什瓦里·帕尔和其他领导人也丧失了生命。特兰西瓦尼亚受欺压最深的地区——莫茨人地区，作为罗马尼亚人地区，被顽强地保卫住了，但蒙受很大牺牲。莫茨人——农民、矿工、伐木工又一次证明是整个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族人的最强悍的战斗队。以拉·科苏特为首的马札尔革命领导继续保护自由派贵族的利益，拒绝给予民族权利。民主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革命命运本身是生死攸关的。1849年春，伯尔切斯库再次来到特兰西瓦尼亚，同贝姆将军取得联系，然后同样前往匈牙利；在德布勒森与以科苏特为首的马札尔革命领导人进行了接触。罗马尼亚报刊正在为联合斗争这一共同目的而奋斗。1849年7月阿弗拉姆·扬库致函马札尔领导人，坚持和解，他用富有说服力的言词说："马札尔兄弟们，……采取别的办法同我们谈判吧"。为了使两种政治立场接近，阿弗拉姆·扬库停止了反对马札尔革命军的军事行动。从他的全部活动来看，阿弗拉姆·扬库是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当中的一个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他把马札尔族人民群众和专横的、反动的、沙文主义的贵族作了必要的区别。他对马札尔族人民群众的民主愿望，象对本民族人民的民主愿望一样给予同样有力的支持；对贵族则集中其全部力量予以打击。从而动员了巨大的人民力量。

热烈支持罗马尼亚人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战士斯·卢·罗特，由于他的民主信念和反对马札尔化的坚决态度，被臭名昭著的马札尔贵族法庭判处死刑，于1849年5月11日在克鲁日被枪决。

经过由于马札尔领导人的拖延而旷日持久的艰巨谈判，伯尔切斯库、博利亚克和科苏特于1849年7月14日在塞格德签署罗匈媾和草案，这是双方妥协的结果。达成这一协议的历史功绩归于伯尔切斯库。草案共有十八条，包括一项关于保障罗马尼亚人最起码的民族权利和罗马尼亚—马札尔进行革命的政治合作的原则声明，以及有 267
关组织罗马尼亚革命军的规定，这支罗马尼亚革命军将同马札尔部队一起反对帝国的和沙皇的反革命军队。在罗马尼亚革命者的坚持下，草案还包含有关农民问题的规定。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这个文件中出现了“罗马尼亚”这个名词。当几乎一切都濒于破灭的时候，经过最后的绝望的努力，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权利于7月28日得到承认。后来，革命失败以后，大多数马札尔领导人证明，他们于1849年7月在民族间

题上采取的积极行动是在反革命压力下逼出来的，他们后来又回到了他们以前的、众所周知的对待其他民族的立场上，给各族人民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总斗争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以尼·伯尔切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革命者是主张各族人民在反对暴君的斗争中亲如手足的主要倡导者。

革命的失败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呼吁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支援，以取得镇压革命所需的武装力量。哈布斯堡和沙皇的军队开进特兰西瓦尼亚。贝姆将军指挥的革命军在锡吉什瓦拉附近的阿尔贝什蒂战败，伟大的马札尔革命诗人裴多菲·山多尔和日耳曼政论家安东·库尔茨在这里阵亡。一些将领投降后，由于反革命武装干涉力量的军事优势，在阿拉德附近的希里亚签订停战协定（1849年8月13日），这标志了革命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在于罗马尼亚和马札尔力量的分裂，同时也在于哈布斯堡和沙皇联合进行的反革命外来干涉。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注视着欧洲革命的进展，强调指出匈牙利的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行动

的必要性，并提醒人们注意，分裂只能有利于专制主义集团。马克思和恩格斯热烈主张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马札尔革命的领导人绝大部分出身于自由派贵族，他们不理解这一要求，而同组成居民大多数的各族人民的愿望发生冲突。可惜，正象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事实上马札尔革命也因此遭到破坏。在群众的社会解放问题上存在的很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也促使革命力量分裂。民族解放斗争是同摆脱农奴制枷锁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阿弗拉姆·扬库为首的罗马尼亚领导人认为革命过程中的罗马尼亚—马札尔合作是必要的，指出这种合作取决于尊重他们人民的民族权利和社会权利。在巴纳特，罗马尼亚—马札尔的革命合作搞得较好，这是由于这个省的社会政治条件和革命者埃夫蒂米·穆尔古的英明。但是马札尔领导人的同样的有害态度也在巴纳特妨 268
碍了这种合作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哈布斯堡分裂各族人民的政策才取得了某些效果。

1848—1849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解决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农奴制的废除——尽管在宣布时带有种种局限性——

已不能再拖延了，后来颁布的帝国特许状批准了废除农奴制。

尼·伯尔切斯库、阿弗拉姆·扬库、西米翁·伯尔努齐乌和埃·穆尔古等领导人对革命是有特殊功劳的。革命失败后，许多领导人流亡国外，而阿弗拉姆·扬库隐居深山，直至生命终止(1872年)。

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为进步和资本主义关系开辟了道路。它唤起人民群众参加斗争，并大大增强了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意识。

罗马尼亚三国1848—1849年革命的历史意义

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罗马尼亚三国提出了相似的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废除农奴制，发展新的社会力量，保障民族自由、独立和统一。革命又一次表明，在国际上，罗马尼亚人民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奥斯曼和哈布斯堡桎梏以及沙皇制度给予它们的反革命支援。罗马尼亚各省革

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革命事件在这些省相互引起的强烈反响，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在革命行动中罗马尼亚人民强烈地表现出来的民族团结的意识，所有这些都是罗马尼亚诸国革命统一性的明证。同时，罗马尼亚诸国1848—1849年革命是欧洲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尼古拉·伯尔切斯库、格奥尔基·马格鲁、扬·吉卡、切扎尔·博利亚克、扬·伯勒恰努等人曾试图实现整个多瑙河流域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合作。

罗马尼亚国是具有吸引力的革命中心，是体现统一性的共同倡议和协调行动的策源地。革命的复杂性十分广泛而充分地、政治上非常尖锐地在特兰西瓦尼亚显示出来。早在1848年6月，格·巴里齐乌在《特兰西瓦尼亚报》上正确地指出："罗马尼亚民族的命运将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决定，而不是在克鲁日，也不是在布达"。伯尔切斯库认为，要彻底完成革命，必须继续唤起群众进行斗争，"由人民来治理人民"，推翻一切暴君，并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但是，国内反对这一方针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

由于国内反动派和毗邻帝国的干涉，革命遭

到失败。因此，1848年的革命纲领将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

269

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联合
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开始

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统一是我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是奠定近代罗马尼亚基础的政治事件。1859年1月24日实现的统一是长期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这个进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开始和罗马尼亚民族形成的条件下成熟的。

历史条件不允许摩尔多瓦、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国这三个罗马尼亚国家以及其他罗马尼亚省同时统一。罗马尼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的，1859年的统一是决定性的第一步，这个历史过程将于1918年完结。那时，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将以胜利而告终。

革命后的罗马尼亚诸公国

在扑灭了1848年革命后，国内反动派和外来的武装干涉力量采取了措施来恢复业已复辟的

组织规程。在特兰西瓦尼亚革命失败前五个月，即1849年4月，宗主国土耳其和保护国俄国在巴尔塔—利曼尼亚签订了一个协议，决定两国军队留在公国以“镇压任何起义运动”。对罗马尼亚诸公国的军事占领将延长到1851年。1853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又招致了新的外国军事占领，开始是俄国军队，后来是奥地利军队，直至1856年才撤离。

根据巴尔塔—利曼尼亚协定，在两个公国都另任命了国君，任期七年：摩尔多瓦是格里戈里·亚历山德鲁·吉卡；蒙特尼亚是巴尔布·什蒂尔贝伊。在这几年，两个公国的行政管理有了某些改进，特别是在摩尔多瓦，大公奉行一种带有自由倾向的政策。新大公们不能不考虑1848年事件所造成的现实。格·亚·吉卡容许革命领导人回国，甚至还任命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要职，但巴·什蒂尔贝伊禁止大部分蒙特尼亚流亡者返回祖国。

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促进了社会发展，并带来了重要的变革。革命后的头几年的特点是资产阶级的作用日益增长，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

治生活中赢得了新阵地。在手工业作坊和工场增多的同时，使用蒸汽力和车床新技术的工业企业的数目也增加了；采掘工业，特别是盐和石油开采工业得到了发展。

商品生产和交换在发展，水陆交通运输在扩大，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在加强。其结果缩小了
270 地方特殊性，扩大了罗马尼亚诸公国间的贸易往来，使之逐步转变成一个经济统一体。于是，地方的、省的市场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从1848年1月1日起取消了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公国之间的关卡，这是一个重要阶段。同时，多瑙河两公国同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联系也扩大了，从而为通过罗马尼亚人民所居住的全部领土的统一而最终建立民族市场，准备了条件。

农业中的封建剥削形式直到1864年仍在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占统治地位，国家的分散状态和外国的统治，这些都阻碍了罗马尼亚诸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加速罗马尼亚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

罗马尼亚诸公国的统一
——规律的必然性

由于国内外的不利条件，罗马尼亚人民几个世纪一直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省的单位中，这些国家和省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生活。但无论是国家的分裂还是外国统治，都不能阻止罗马尼亚人民在它形成的地域上的统一发展和连续性。罗马尼亚人民完整无缺地保存了自己的民族语言、穿着、传统、风俗和民族生存。

喀尔巴阡山两侧的罗马尼亚人经常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血统和语言。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编年史家和学者曾有力地阐明过摩尔多瓦人、蒙特尼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的罗马血统、地域的统一性和罗马尼亚人民的共同性等思想。

米尔科夫河两岸地区以及它们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经常联系，是罗马尼亚诸国发展的一个特征。

在封建主义解体和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在罗马尼亚民族形成的情况下，在共同的经济生活基础上，当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业已成为迫切需要

的时候，作为人民的民族意识表现的血统和语言的统一性思想，也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来。

实现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统一和独立，已经成为罗马尼亚人民革命斗争的代表人物经常关心的事情。与罗马尼亚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罗马尼亚人联合的思想成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首要问题。在革命以前的十年里，罗马尼亚诸公国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之间进行了愈来愈广泛的直接接触，这便于相互了解罗马尼亚各省的现实，增强了联系，并促成了联合行动计划。

要求统一的意志在1848年革命期间得到了明确而有力的表达。但是，在受到反动国家包围的情况下，国内的爱国力量自身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在革命期间实现统一的程度。

271 1850年，尼古拉·伯尔切斯库洞察到并富有权威性地指出了今后整整一个时代罗马尼亚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本质。他写道，在1848年革命后，“我们还需要进行另外两次革命”。伯尔切斯库在这里显而易见指的是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统一和进而获得民族独立，以便这样使“民族享有其全部天然权利”。

1848年革命后，“统一”成为罗马尼亚政治生活中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调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联合派的力量，争取联合的斗争

联合是全体人民的事业。但是罗马尼亚各社会力量根据各自的阶级利益，对联合的内容和性质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

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是联合运动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努力实现联合的毅力和决心最大。他们把实现自己的社会愿望同完成这一伟大的民族事业联系在一起。农民首先希望通过统一摆脱劳役并取得土地，而市民则认为联合将带来有利于广泛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环境。

正在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认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将为它获得经济繁荣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创造有利的条件。

实现1859年统一这个伟大理想并曾进行过1848年革命的这一代人，有热忱的爱国者作为领导，如：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科斯塔凯·内格里、亚历山德鲁·伊

昂·库扎、瓦西里·默林内斯库、康斯坦丁·亚·罗塞蒂、扬和迪姆·布勒蒂亚努兄弟、迪米特里·博林蒂尼亚努、切扎尔·博利亚克、尼古拉·奥勒沙努等。受到进步思想鼓舞的著名学者和政治家对国家的普遍进步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至于地主，他们的一大部分，由于其经济和政治利益接近资产阶级，站到了强大的民族统一派力量这一边。有些大地主，确实人数不多，由于害怕统一会危及他们的阶级特权，结成了反统一派。

原1848年革命的领导人不顾在国内或流亡国外的情况困难，继续进行爱国活动。他们通过出版物、报告会、备忘录和外交交涉，为联合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分布在欧洲各中心（维也纳、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君士坦丁堡）的爱国者，为造成支持罗马尼亚事业的强大舆论潮流勤奋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1852年前站在流亡者前列的是尼·伯尔切斯库，继之有：康·亚·罗塞蒂、戈列斯库兄弟、布勒蒂亚努兄弟、瓦西里·默林内斯库、科斯塔凯·内格里等。他们同参加欧洲民主中央委员会的欧洲各国人民的一些代表有联系。该委员会是在意

大利人朱塞佩·马志尼倡议下于1850年在伦敦 272
成立的。他们大家都希望：欧洲将爆发一场新的革命。

1852年11月29日，伟大的爱国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古拉·伯尔切斯库在意大利的巴勒莫逝世。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和欧洲进步团体为此深感痛切。

1851年底，路易·拿破仑政变以后，在革命活动道路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困难。法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认识到事态的发展，指出不存在爆发欧洲总革命的有利条件。

1853年夏，发生了一个对统一派活动的进展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事件：列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了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俄国发动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在这种气氛下，1848年革命流亡者谋求利用有利时机来实现他们民族统一的理想。在国内，他们试图在奥尔特尼亚建立一个革命基地并组织义勇军。

由于流亡者进行的宣传运动和外交活动，统一诸公国的正义事业得到欧洲公众生活的一系列

知名人士如朱尔·米什莱、埃德加·基内、让·于比西尼、让·亚·瓦扬、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越来越多的支持。同罗马尼亚公众舆论所进行的活动一起，这些人士的立场将对1856年巴黎和会关于多瑙河两公国命运问题的决议发生积极影响。

罗马尼亚两公国的联合——欧洲问题

国内的统一运动和国外流亡者的紧张活动使罗马尼亚人的基本愿望受到欧洲外交界的注意。同时，自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列强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利益的矛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利于把东方问题，包括多瑙河两公国的形势问题提到首位，因而多瑙河两公国的联合是1856年巴黎会议的重要问题之一。

会议参加国的代表对罗马尼亚两公国未来的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法、俄、撒丁和普鲁士支持联合；土、奥坚决反对；在会议期间支持联合的英国，后来倒向它支持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立场。

各国对两公国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是由它们的某些利益决定的。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想在东南欧

保证自己拥有一个经济销售市场和政治势力的走卒；俄国把联合看做是削弱奥斯曼帝国的手段；撒丁和普鲁士支持罗马尼亚人的事业，也就是间接地为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辩护；英国所关心的是维护作为反俄力量的奥斯曼帝国；宗主国土耳其唯恐摩尔多瓦和蒙特尼亚联合后将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这在不到二十年后就将发生。奥地利认为，273
罗马尼亚民族国家会加强期望同喀尔巴阡山彼侧的兄弟站到一起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解放斗争。

由于立场分歧，1856年会议未能就两公国联合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创造了罗马尼亚人民自己决定他们的未来的可能性。和约规定两公国居民通过临时（专为联合召集的）议会（国政会议）自行协商。同时，确定两公国仍然是宗主国土耳其的属国，同时受巴黎和约签字国的集体保护；这样，就取消了一国保护制。

会议决定，比萨拉比亚南部（卡胡尔、伊兹梅尔和博耳格勒三县）重新划归摩尔多瓦。同时，会议还订立了一些经济和法律措施；规定多瑙河航行自由和黑海中立；批准成立多瑙河欧洲委员会，

会址设在加拉茨。

根据临时议会提出的要求和会议设立的欧洲专门情报委员会在诸公国所作的调查，准备在巴黎召开欧洲国家会议，以制订一项法律代替《组织法》。

从1856年春天起，争取联合的斗争规模日益扩大：《多瑙河之星报》、1857年的《协和报》和随后的《罗马尼亚人报》先后成为联合派的主要宣传阵地；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写了《统一霍拉舞》的歌词；成立了中央联合委员会和县、地区委员会；散发宣传材料，举行许多集会。1857年夏，流亡者们回国，这给联合运动以新的推动。

临时议会（1857年）
巴黎协定（1858年）

临时议会的召开是联合以前所发生的事件的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两公国，临时议会的准备工作和选举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巴黎会议决定在筹备和召开临时议会期间，两公国分别由奥斯曼帝廷任命的一名代君主管理。在罗马尼亚国，原大公亚历

山德鲁·吉卡对联合派采取了谅解态度，希望从中得到好处。在摩尔多瓦，尼·沃戈里德代君主是土耳其和奥地利的代理人，推行名副其实的恐怖制度以破坏联合。例如，禁止宣传联合的报纸和政治集会；进行大规模的撤职和逮捕；伪造选民名册和1857年7月选举结果。

这种胡作非为引起了一场强大的抗议运动。亚历山德鲁·库扎少校对制订选民名册时的弄虚作假行为很气愤，辞去了科沃尔卢伊地方长官的职务，这一行动使他深得民心。布加勒斯特情报委员会接到了许多电报、备忘录和呼吁书。面对 274
这种局势，土耳其被迫取消伪造的选举。联合派的候选人在新的选举中获得了绝对多数的胜利，在各地除两人外都当选了。在蒙特尼亚也取得了类似的结果。

所有联合派领袖、1848年革命者都被选进临时议会。在摩尔多瓦有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科斯塔凯·内格里、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瓦西里·默林内斯库、阿纳斯塔塞·潘努。在蒙特尼亚有康·亚·罗塞蒂、什特凡和尼古拉·戈列斯库兄弟、亚·

格·戈列斯库、扬和杜米特鲁·布勒蒂亚努兄弟、克·特尔、格·马格鲁。农民第一次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国家的代议制议会。农民代表有扬·罗阿特、特纳塞·康斯坦丁、格奥尔基·卢佩斯库、米尔恰·默勒耶鲁等。

1857年9月，临时议会分别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开幕。会议的讨论强烈地表现出统一运动的团结和力量，也激动人心地表现出罗马尼亚人民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意志。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用令人难忘的语言指出："……最伟大、最普遍的愿望是把公国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这种联合是自然的、合法的和必要的。这是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我们这一代的心愿，实现这一愿望必将造福于子孙后代……"。

在爱国主义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两公国的临时议会于1857年10月通过了本质上相似的决议，坚决要求把公国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取名"罗马尼亚"，要求尊重这个国家的权利、自治和中立，并要求成立代表"民族的全部利益"的民众议会。

在两个临时议会上，代表们在讨论中都提到

土地问题。农民有机会通过自己的代表，就这个对他们的前途和国家今后的发展都十分重要的问题，直截了当地申述自己的立场。由普特纳地区的扬·罗阿特首先签名的摩尔多瓦贫农代表的请愿书，用感人肺腑的语言描写了农民的状况和他们提出要求的根据。请愿书以一百二十万摩尔多瓦隶农的名义向国家和欧洲列强指出，多少世纪以来，农民一直承受着“一切最沉重的负担”，要求“把农民当人看待”，禁止殴打，废除劳役(徭役)、羊税和人头税，要求“农村有……从自己人中选出来的官吏”。代表特纳塞·康斯坦丁回顾了“一连串无穷尽的、悲惨的令人窒息的苦难”，在布加勒斯特临时议会上宣告“农民有无容置疑的权利……，参加将来制订国家宪法和内部法令的议会”。

因为地主阶级的代表，甚至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借口维护统一运动的团结，反对分配土地的思想，或者要求推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未能就土地问题通过一项决议。

临时议会的决议提交专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报告，提交1858年5月于巴黎举行的七国代表会议。会后，于1858年8月7日签定

的协议规定：把这两个公国命名为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联合公国；每个公国有自己的国君、政府和立法议会；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制订共同关心
275 的法律；成立一个两公国共有的最高法院，设于福克夏尼。协议还包含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规定：取消地主的特权和等级（也就是说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责任内阁制等。同时，建议制订一项法律重新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作为协议附件的"选举条例"，规定了建立在十分苛刻的资格选举基础上的议会成员选举办法。作为国际文件的新协议同时也是公国的根本大法，实际上意味着《组织规程》失去了它的法律效力。协议的有效期至1864年。

因为欧洲列强没有实现罗马尼亚人在临时议会上所表达的根本愿望，所以需要全体人民在国内采取行动以实现统一，使欧洲面临既成事实。

通过选举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为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大公实现联合

巴黎会议不公正的决定促使争取统一的斗争尖锐化，罗马尼亚人民在彻底实现自己正当愿望

的道路上坚定地向前迈进。

“大选议会”的议员选举是在民族统一派力量和反对统一的反动派力量进行激烈较量中进行的。康·亚·罗塞蒂在那些日子里写道：“当今的斗争主要是守旧者和主张社会变革者之间的斗争。”

协议规定的选举制度有利于反统一派，它把两公国的选民人数缩小到几千人。在罗马尼亚国，反统一派还受到由三人组成的新摄政府中的两人的支持。在摩尔多瓦，情况相反，新摄政府中有两人赞成民族派。

摩尔多瓦的选举使民族派在“大选议会”中占多数，而在罗马尼亚国，反动派取得了多数。但是，在先进分子的领导下，人民群众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这将保证进步力量获得胜利。先进的议员将巧妙地利用反联合派内部的矛盾。

1859年1月5日，雅西“大选议会”选举民族派候选人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为摩尔多瓦大公，他是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和联合事业的热情战士。亚·伊·库扎的当选是联合和民主思想的胜利，是罗马尼亚人民数世纪以来的愿望的胜利。

在整个摩尔多瓦，在罗马尼亚国，在特兰西瓦尼亚，到处都热烈欢呼宣布库扎当选为摩尔多瓦大公的消息。瓦·阿列克山德鲁写道：“如此真诚、如此巨大的快乐，以致使雅西居民整整三天沉
276 浸在真正的狂热之中。人民群众高举火炬和彩牌标语，兴高彩烈地走上大街，高呼‘大公万岁！’。”

在就职宣誓典礼上，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对库扎说：“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选举你，我们要向世界表明全国的希望：新人，执行新法……。愿你跟上时代……，愿你使法律严明，而殿下你，作为国君，要善良，要慈祥，要善良，特别是对那些过去几乎所有的国君都漠不关心或加以虐待的人……。莫忘记，五十名议员选你当国君，但你要统治的是二百多万人。愿你使你朝十分太平、正义。”

摩尔多瓦选举后，全体罗马尼亚人民的视线转向布加勒斯特。这里的大选议会于1859年1月22日开幕。从会议的第一天起，统一派青年动员的成千上万的人就聚集在举行会议的大楼前。他们当中有制革工、屠宰工、工匠、商人、伊尔福夫和登博维察县各村的农民、高年级中学生和专科

学校的学生。群众激烈反对主张选举格·比贝斯库的反动派。一位目睹者叙述说:"人民不象是在集会,而象波涛滚动的活的海洋,它那方兴未艾的浪涛随时会涌过门窗,冲进议会,以支持自己的权利和原则。"

在这种气氛下,民族派议员于1月23日至24日深夜在协和旅馆召开会议,决定同样推选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为罗马尼亚国大公。

1月24日上午11点,民族派议员建议举行秘密会议提名候选人。瓦西里·博埃雷斯库提名亚·伊·库扎,得到一致同意。保守派议员不得不屈从于人民的意愿。举行投票时,六十四张选票上写的全是1月5日在摩尔多瓦当选者的名字。

宣布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为两个公国的大公,使人们心花怒放。广大群众衷心地向国君欢呼,他们把改善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到处都举行欢乐的游行。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气氛中,人们尽情歌唱和欢跳《联合霍拉舞》。千万人欢呼着:"联合万岁!""库扎大公万岁!""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罗马尼亚万岁!"

两公国的联合在罗马尼亚各省人民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现在更是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同“祖国”统一的有利时机。

联合的实现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民主阶层中，也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各国的进步报刊赞扬罗马尼亚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他们为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所作出的努力，并鼓励有类似问题要解决的各国人民学习罗马尼亚人的榜样。

*　　*　　*

罗马尼亚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了联合，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1862年，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说：“联合是由全民族实现的”。1月24
277 日作为“民族复兴节”永远载入祖国的史册。1859年的联合奠定了近代罗马尼亚的基础，标志着罗马尼亚统一国家形成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完全统一将于1918年实现。

1月24日事件在罗马尼亚人民的历史发展中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因为接着就进行了一系列促使我国进步的结构改革。联合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前提。

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王朝时期实行的改革

通过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国的罗马尼亚人民力量的结合而建立的民族国家，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进行深刻的变革开辟了道路。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当政期间（1859—1866年），奠定了与十九世纪中期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近代罗马尼亚的基础。

新政变革是按照1848年革命的要求和统一派纲领的路线进行的。

1859—1862年间的联合公国；统一的巩固

1859年1月24日以后，库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取得各保护国承认他当选为两国大公的事实和完成年青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的统一。

1859年3月，法国、俄国、撒丁、普鲁士和英国的代表正式承认库扎是两个公国的唯一国君。

经过长期的谈判和奥地利在对法国和撒丁的战争中于意大利北部失败后，土耳其和奥地利才在同年9月表示同意。

在整整两年多的时间里，巩固统一是新的民族国家总政策中的首要问题。巴黎协议规定的行政体系——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分别设立政府和立法议会——带来特别大的困难。

经过艰巨的谈判，1861年11月，土耳其在诸保护国的同意下，才承认全面统一，但只限于库扎当政时期。1861年12月11日宣言把罗马尼亚国家的这个新胜利通知了两个公国的居民。

库扎王朝的最初几年，国内政治局势的特点是政府的极不稳定：三年内更换了二十届内阁，改选了五次立法议会。这种不稳定性的原因首先在于1858年协议的选举规定限制极严，每次选举都把权力交给了反动派占多数的议会。这些人往往
278 反对民主性质的改革，并投不信任票，迫使政府向国君提出辞呈。只有改革选举制度才能解决这种政治僵局，这将于1864年实现。

1859—1861年，在两个公国组成的历届政府，一般来说奉行温和的政治方针，既代表资产阶

级的利益，也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的政治集团在新国家中争夺政权，但结成后来的联盟的趋势日益明显。关于解决土地问题，两个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资产阶级派别主张把土地分给业已摆脱徭役的农民，而保守派地主力求维护自己的全部财产和在国家领导中的统治地位。整个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将支持库扎王朝时代的改革政策,反对地主反动派。

在库扎的协调下，两个公国的政府将齐心协力地为巩固统一、实现改革纲领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而努力。这样,在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和尼古拉·戈列斯库领导的进步政府时期，统一了关税制度和电讯管理，禁止了农村中发生的殴打,设立了农村法院,创办了雅西大学,等等。

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及其最亲密的同事非常重视军事统一。1859年春夏两季，把部队集中到弗洛雷什蒂(普洛耶什蒂附近)的统一兵营，是在这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这个行动之所以十分必要，特别是因为土耳其和奥地利还没有承认库扎当选为两国大公，而法国正在同奥地利作战。这支统一的军队的崇高责任，是保卫国

家的自治，反对可能的外来干涉，并随时准备争取民族独立。

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1859年1月24日后，同土耳其的关系实际上发生了真正的转折，虽然联合公国仍处于依附奥斯曼帝国的状态，但是日益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1860年标志着第一个罗马尼亚外交机构（在巴黎）的建立，并同俄国签订了直接的电讯协定，这是两公国的第一个国际协定。

库扎王朝时期，同马札尔、波兰的革命流亡组织和巴尔干半岛的解放运动保持了密切联系。联合公国对外政策的远景是实现罗马尼亚人民的国家完全统一和获得国家独立。逐步实现这些伟大愿望的历史过程，是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1862—1864年的罗马尼亚；1864年5月2日政变；选举改革的实现

1862年初，完成政治和行政统一的过程正在
279 全面开展。库扎发表了1861年12月11日宣言后，两个议会都停止了活动，以便1862年1月24

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国民议会。布加勒斯特成为国都。两个政府都宣布辞职，以便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罗马尼亚——国内开始这样称呼联合公国——第一届政府是由反对分给农民土地的巴尔布·卡塔尔基乌为首的保守派代表组成的。

政府的反动成份引起了许多不满。以米尔恰·默勒耶鲁和其他领导人为首的伊尔福夫和普拉霍瓦县的农民，于1862年1月成群结队地涌往布加勒斯特，要求"摆脱骑在他们头上的地主"。政府求助于军队以驱散农民，许多农民被捕。

统治阶级，包括保守派地主，懂得土地问题的任何拖延解决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由于这个原因，尤其是为了避免进行更激进的改革，保守派政府提出了一项农村法草案，规定把农民从封建奴役中解放出来，但剥夺他们原来使用的土地。尽管议会中的反动的多数派投票通过了这项草案，但库扎拒绝予以批准。

保守派地主对国君用分配土地的办法来实现土地改革计划的敌视，以及扬·康·布勒蒂亚努和康·亚·罗塞蒂为首的激进自由派同大公之间出现的分歧，导致这两派于1862年底和1863年

初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当代人称之为“怪诞联盟”。由保守派和自由派，包括激进自由派组成的这个联盟，激烈反对国君，并阴谋推翻他，把一个外国亲王拥上罗马尼亚王位。米·科格尔尼恰努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促使联盟内部暂时产生一些裂痕，但不久就弥合了。

1863年10月组成的这届政府所实行的第一项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民族意义的行动，是把寺院财产有偿地收归国有（1863年），这是1848年革命纲领和临时议会早已提出过的要求。值得提到的是，收归国有的庄园占当时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随着农村法的执行，五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六公顷土地将归原来的隶农所有。

1864年4月，科格尔尼恰努政府向议会执行局提出了农村法草案，其中也规定分给农民土地。但是，反动的多数派予以拒绝，并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决心在国内实行两项根本大法——选举法和土地法的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于1864年5月2日发起政变。在他最亲密的顾问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的支持下，他解散了议会，把一项命名为章程的巴黎协议“引伸条款”通过公民投票提

交人民批准。各保护国后来也接受了这一条款。由于选举资格比巴黎协议的规定大为放宽，所以绝大多数男公民都获得了选举权。选民根据纳税额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纳税少的，特别是农民和一些市民阶层，通过代表(一百人选一名)参加选举。城市无产者和乡村贫农被剥夺了选举权。尽管如此，新选举法同过去只让五千名选民享受国 280
家政治生活相比较，是一大进步。

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大、中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手里。同统治阶级相比，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上处于劣势。众议院的主要职权划归大公和新设立的国家中央机构：国务委员会和参议院。

1864年的农村法，解放隶农并分给他们土地

根据新宪法，国君于1864年8月14日颁布农村法。宣布"永远"废除徭役，农民成为"依照法律占有的土地和自己劳动力"的自由的所有者。因此，封建义务从法律上被废除了，而隶农分得了土地。库扎引导农民管理好村庄，这些村庄成为"独

立的乡”，到处都设立学校，以便儿童“获得必要的知识，成为好庄稼汉和好公民”。

隶农居民按所拥有的牲畜头数和居住的地区分成好几类。法律为蒙特尼亚的农民确定了下列的土地数量：拥有四头耕牛和一头奶牛者（上等户）分地十一波贡①；拥有两头耕牛和一头奶牛者（中等户）分地七波贡十九杆②；拥有一头奶牛或没有耕畜者（贫苦户）分地四波贡十六杆。在摩尔多瓦（包括比萨拉比亚南部），同类农民分得的土地要稍多一些。根据法律规定，农民有权拥有庄园面积的三分之二，森林不计在内。分十五年还清的现金赎款被当作是劳役和其他杂役的赎金。实际上，赎金很高，一波贡的代价高达一百六十五列伊（五块金币）。

赎金成了农民生活的长年负担。1864年的农村法使四十六万七千零八十户农民分得土地，其中七万二千七百五十一户上等户，二十万零一百三十二户中等户，十三万三千五百四十六户贫

① 一波贡相当于半公顷。——译者

② 一杆在蒙特尼亚等于35.39平方米，在摩尔多瓦等于26.76平方米。——译者

苦户，而六万零六百五十一户只分到了房基地和菜园地。总计，从私人和国家庄园中分出去的土地达一百六十五万四千九百六十九公顷。后来（1878—1879年）又根据同一法律给四万八千三百四十二户青年家庭（新婚者）分了土地。

1864年农村法从颁布时起，在农村中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农民给库扎大公和政府寄感谢信，因为他们“提高了苦难深重的人民的地位”。同时，地主和佃主反对土改，用各种手段进行破坏。在某些当局的公开支持下，许多地主把离村往往很远的产量最低的土地分给农民；在有些地方，分地工作被拖延了好多年。地主和一些官吏的胡作 281
非为和不公正激起多次抗议和诉讼。通过形形色色的欺诈行为，大批隶农被排除于分地名单之外，或被降低等级，得到的土地往往比应得的要少。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在国君的同意下采取的措施，只是部分地制止或减少了地主的违法行为。

在米·科格尔尼恰努以后的历届政府执政时期，违法行为大大增加。因此，到1865年4月农村法的实施应结束时，将近50%的农民尚未得到土地。

尽管有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1864年的土地改革是罗马尼亚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社会发展所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的这项要求，起了废除已延续多少世纪的封建奴役制度和为近代罗马尼亚国家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

1864年土地改革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式的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在农业中占了统治地位。

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次土地改革的主要结果，增加了农业产量，加速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觉悟。由于赎买土地而产生的部分资本积累被用于投资（商业、工业、银行），另一部分却被地主阶级在国内外用于非生产性开支，白白挥霍掉了。

1864年的土地改革没有全部消灭农业中的封建制度，也没有废除大土地所有制。通过法律摆脱了人身依附的大多数农民，由于没有足够的土地，重新沦入地主和佃主的统治之下，因而不得不在保持封建关系某些重要残余（什一税、劳役等）的情况下，在地主和佃主的土地上劳动。

这样，农民解放斗争的前景和土地问题的彻

底解决日益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工人运动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象罗马尼亚国家统一问题一样，土地问题仍然是罗马尼亚社会政治生活的中心问题。它将在人民革命年代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的过程中得到彻底的解决。

1864—1865 年间实行的其他改革，亚·伊·库扎朝的终结

库扎王朝年间还实施了其他一系列政治、行政和文化改革，这些都是罗马尼亚社会的进步和年青的近代国家所要求的。

组织教育事业是一项重要成就。1864 年 11 月 25 日颁布的国民教育法，奠定了以后三十多年罗马尼亚教育的基础，确立了三级教育制，即：初级、中级和高级教育。法令宣布"初级教育是义务的免费教育"。但是还要过好几十年，免费的初级 282
义务教育才真正成为现实。"四年制学校"，即五至八年级中等学校，和师范学校(培养小学教师)的数目显著增加。

1864 年颁布了行政组织法。农村法规定村

和屯组成乡，几个乡组成一个区，几个区组成一个县。按资格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管理县和乡的行政事务。县设县长，区设区长（后称行政长官），乡设乡长。

司法改组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建立了下列司法机构：区司法所，县法庭，上诉法院，陪审法院和最高法院。后者同时也是上诉法院。刑法、民法和商事法于1865年生效。同年还取消了领事裁判制；这样，外国公民也受罗马尼亚法律的制裁，从而加强了国家的内部自治。

亚·伊·库扎特别关心建立国民军。在1860年—1864年间，部队数目增加了，授给军队三色旗，改组了军事教育，建立了兵工厂。

亚·伊·库扎王朝时期的改革导致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机构得以建立和发展，导致两个公国的统一为之奠定了基础的罗马尼亚国家近代化。这些改革促使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获得普遍进步。无论从它的基础还是从其机构来说，罗马尼亚民族国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此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正成为罗马尼亚人民的根本问题。

亚·伊·库扎大公、他的首席顾问和最亲密的同事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以及其他杰出的政治家，对建立近代罗马尼亚国家起了重要作用。库扎和科格尔尼恰努所实施的改革，尤其是1864年的分配土地，使他们同国家的利益，在许多方面也是同人民的愿望相一致。他们谋求实现1848年革命纲领，并大大促进了这个纲领的一些主要项目的实现。

亚·伊·库扎的政策促使他和“怪诞联盟”的关系恶化。国君的敌手利用了财政困难所引起的不满和这一朝主要在后期所犯的一些错误，如1865年1月撤换米·科格尔尼恰努政府和表示要逊位的想法等。

1865年8月，当库扎在德国埃姆斯治病的时候，发生了一次推翻他的未遂政变。此后，结成联盟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终于把在首都部队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的高级军官德·克雷楚列斯库上校、尼·哈拉兰比上校和德·列卡少校拉拢到他们一边。1866年2月10日至11日夜间，亚·伊·库扎被废黜，并被驱逐出国。他留居国外，直到他的生命终止。1873年5月15日，祖国最伟大的儿

子之一、对祖国发展和巩固、对唤起和启发罗马尼亚人民作出了如此重大贡献的库扎，在远离祖国的德国海得尔堡逝世。他的遗体被运回国，安葬
283 在鲁金诺瓦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遗骸被移置于雅西的“三圣教堂”。

“怪诞联盟”组织了由拉斯克尔·卡塔尔久、尼古拉·戈列斯库和尼·哈拉兰比上校三人组成的摄政府代替库扎。他们准备建立一个以外国血统的亲王为首的政权。

1866—1877年间罗马尼亚的发展

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亚·伊·库扎朝期间所实施的具有资产阶级内容的法律，为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地主阶级一起成了国家的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将为巩固已取得的果实和在国家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取得新阵地而不断进行活动。

与资产阶级发展的同时，工人阶级也开始日甚一日地登上历史舞台。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果实——无产阶级是在罗马尼亚人民面临争取和保

卫国家独立、争取和保卫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形成和民主革命的各项目标等根本问题的解决的时候开始显露锋芒的。工人阶级是社会最先进的力量，它接过争取民主和进步、争取彻底革新社会的斗争大旗。

1866—1877 年间的政治形势，外国王朝的建立

1866 年春，由于推翻库扎而引起的政治危机在我国日益严重。各在野派之间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了大风波。扬·埃利亚德·勒杜列斯库、西米翁·伯尔努齐乌等政治家采取激烈反对拥立外国亲王当国家元首的态度。某些欧洲强国企图利用这一局势肢解年青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一位外国亲王被拉来代替库扎的职位，以充当调解两个统治阶级集团各派之间纷争的调解人的角色，并保护它们的利益。1866 年 4 月初组织了一次公民投票，要求人民就拥立普鲁士的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卡罗尔亲王为国君发表意见。到处都发出了反对库扎的这个可能继承人的呼声。例如，克尤茨乡（普特纳县）的农民所表达的

态度，实际上是全国人民的态度。他们宣布："他们毫无理由抱怨库扎，他给了他们土地，使他们摆脱了徭役……，他们不愿意选举……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德意志人！"但是，由于当局的压力和弄虚作假，公民投票的结果是赞成。在伊·康·布勒蒂亚努的陪同下，卡罗尔来到了我国，并于1866年5月10日被拥立为大公。

284 1866年6月宪法对巩固统治阶级起了重要作用。这部把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意志提高到法律高度的宪法，是建立在保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则和两个统治阶级分享政权的基础上的。宪法里虽然写进了全体公民都享有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但真正能享有这些自由的是拥有巨产者。例如，选举法规定众议院由四类选民产生，参议院由两类选民产生，选民都按财产分类，这样来确保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在议会中永远占绝大多数，事实上他们垄断着国家政权。收入至少达八百金币的公民才有被选为议员的权利。占国家人口80%以上的农民被划为第四类选民，只能按五十名选民推举一名代表进行间接选举。宪法正式使用罗马尼亚这个国名，没有提到它对

奥斯曼帝国的依附地位。

1866—1876年期间，国家政治生活的特点在于政府极不稳定；五年里(1866—1871年)更换了十三届政府，并进行了多次政府改组。原因在于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于资产阶级内部和地主阶级内部都存在着分歧。这种复杂的形势一度妨碍了全国集中的、有组织的、有明确纲领的政党的形成过程，并导致一些经常动荡不定的政治派别为了当政而组合和苟延。象扬·吉卡、康·亚·克雷楚列斯库、什特凡和尼古拉·戈列斯库等政治家领导的具有自由派色彩的政府(1867—1868年)执过政；后来几年(1868—1871年)组成过由迪·吉卡(贝扎迪亚·米蒂克)、亚·格·戈列斯库、康·埃普雷亚努、伊·吉卡等人领导的中间派色彩的政府；以拉斯克尔·卡塔尔久为首的保守政府执政了五年(1871—1876年)；接着是由伊·康·布勒蒂亚努领导的自由派政府。

在1870年法—普战争的国际条件下，由于卡罗尔大公的政策不得民心，进行了一场广泛的反王朝的共和运动。准备于1870年8月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动的起义，在康迪亚诺·波佩斯库领导下

过早地只在普洛耶什蒂开始，很快就被军队镇压了下去。1871年3月，当法国人民英勇抗击普鲁士人侵，巴黎建立起工人政权的时候，布加勒斯特爆发了一次新的共和运动。因为罗马尼亚人民真挚地坚决站在战争中被普鲁士战败的法国一边，所以许多布加勒斯特人成群结队，高举"共和万岁"的标语，强烈抵制在斯勒蒂内亚努大厅(卡普沙)举行的、也有德国领事参加的宴会。这是一次自发的、缺乏领导的运动——尽管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卷入其间——结果被军队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下去。显然，如果共和法兰西在同德国的战争中获胜，那就会对罗马尼亚的反王朝运动起积极影响。同样，巴黎公社革命的爆发迫使资产阶级退却，而它的失败使得保守派地主集团又嚣张起来。

285 虽然罗马尼亚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但1866—1876年期间的历届政府却奉行了积极的对外政策：曾举行过旨在使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各国人民结成可能的同盟的谈判，还作过通过外交途径取得民族独立的尝试，并同一些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

社会经济发展

1859—1865 年的资产阶级改革付诸实施后，罗马尼亚的经济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在土地改革后的十年期间，农业产量增加了一倍，工业生产增长了两倍。使用蒸汽力的企业显著增多。1875—1876 年间，在萨斯库特和基蒂拉建立了最早的制糖厂。采掘工业急剧发展；1877 年的石油产量为一万五千吨，有二十个炼油厂进行提炼。1878 年，冶金企业增加到二十四个。但是，由于缺乏资本和没有一项保护性的关税制度以防止外国工业品的竞争，工业没有得到更迅猛的发展。例如，1875 年的罗—奥—匈通商协定，尽管对加强关税自主有某种政治价值，但对从奥—匈进口的商品大量削减关税，因而在协定的十年有效期里，给本国工业和手工业带来了很大危害。罗马尼亚工业只有在一个独立的，掌握了本国关税政策因而能坚决采取保护性措施的国家里，才能在有利的情况下得到发展。早已不合时宜的行会制度于 1873 年被废除。

资本主义关系和机器的使用也在农业中得到

了推广。1874年，共有九百八十九台蒸汽脱粒机，三百六十二台畜力脱谷机，四百六十九台收割机。但是，大庄园仍由农民用自己的农具耕作。虽然农民通过1864年的农村法早已从法律上获得自由，但大多数农民在经济上仍然依附于地主和佃主，由于自己的土地不够，不得不从他们那里租地。1866年通过了农业契约法，调整了土地关系，规定可以强制农民到地主庄园上去干活。根据这项法律（1872年的保守政府使它变得更为苛刻），地主（佃主）和农民之间所缔结的契约为期最多五年，并由乡当局进行登记。给乡当局以对农民行使判决的权力，这实际上是在新的条件下恢复了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同大土地所有制和旧的生产关系残余联系在一起的地主阶级决定采用农业契约法，这又一次证明它是罗马尼亚社会中最反动的阶级。

农民群众经常抵制和反抗地主和佃主日益加重的剥削及其政策。在独立战争以前的年代里，农村中发生了许多起骚动和起义，尤其是在梅赫丁茨、多尔日、普拉霍瓦和罗曼等县。在这些年里，最大的起义是1866年5月边防军和农民的起

义，波及从土尔努—塞维林到加拉茨的整个多瑙 286
河沿岸。这次运动也是人民反对拥立卡罗尔为大公的一种表现。

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也表现在交通事业方面。公路、电讯、铁路迅速扩展。自1869年第一条铁路布加勒斯特——朱尔朱线通车以来，到1877年，已建成将近一千三百公里长的铁路网。在这几年里修建了一条穿越摩尔多瓦的线路，即从伊茨卡尼经过罗曼到加拉茨，然后又从这里经过布加勒斯特和皮特什蒂横贯蒙特尼亚和奥尔特尼亚，直到佛尔乔罗瓦。铁路是由几家外国公司（英、奥、普）承包修建的，它们获得了大量利润。铁路工地雇佣了许多工人。随着公路和铁路网的扩大，商品流通加强了，国内市场扩大了，城乡交流增强了，城市也得到了发展。同时，国家的军事实力也增强了。

在财政方面也同样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根据1867年的法律，建立了国家货币制度。同时，成立了信贷金融机构。

工业经济、交通运输和财政的发展，增强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及其在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

中的作用。可是，直到独立战争以前，资产阶级的地位还是不够巩固的。地主阶级继续占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阵地，构成社会上最反动的阶级。与此同时，人数在不断增加的工业无产阶级在物质生产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开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显露锋芒。

初期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代罗马尼亚工人阶级是十九世纪中期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自1848年革命到1877年获得民族独立的三十年间，和工厂相联的近代无产阶级开始显示出自己的存在，而且年年不断地更加活跃起来。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罗马尼亚人民最先进的斗争传统、进步的理想、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理想的体现者在成长，在发挥着作用。

工业无产阶级主要来自贫困化的农民和已经破产的工匠。工人的工作条件很差。厂主为了用最低的成本榨取最大的利润，让工人挤在狭窄而又不卫生的工场里劳动。工作日不少于十五—十六小时，甚至每天达十八小时。低微的工资，罚款

制度，没有星期日休息，没有任何卫生保健和劳动保护措施，简陋的不卫生的住房，没有政治权利，也不识字，所有这些构成一幅完整的工人阶级状况的图画。

最初，无产阶级不了解他们生活贫困的原因，也看不到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因此，那时它是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一个“自为”阶级。由于 287
这一点，劳工斗争的最初形式是自发的，孤立的。然后逐步开始增加新的、较为有效的斗争形式，居首位的是罢工。

在我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这一阶段，即十九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当工人和厂主的矛盾还是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开始了无产阶级逐渐组织起来的过程。第一个组织形式是互助会。这种组织一般是按工场和工厂建立起来的，其宗旨是当会员失去工作（失业）、生病、年老或死亡时，从会员会费、厂主或其他人士的自愿捐款凑集的基金中给予资助。

由于其工作性质，印刷工人比其他工人先了解到十九世纪下叶传播的先进思想。因此，他们是最先组织起来的工人。例如，1858 年，布加勒

斯特的印刷工人组织了“印刷劳工救济和保险之家”，先由康·亚·罗塞蒂（印刷厂厂主）领导，后由布拉德的扬·约内斯库领导。互助会的主要报刊有：《罗马尼亚印刷工人》（1865年），《印刷年鑑》（1869年），《工人报》（1872年）。《工人报》创刊词强调指出："全体劳工的团结友爱"是"能粉碎长期以来蹂躏劳工阶级的邪恶和不公正"的手段。这表明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同年，即1872年，工人通过成立职业协会，又朝组织起来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布加勒斯特建立了“罗马尼亚劳工总协会”，其机关报叫《罗马尼亚劳工报》。

拉斯克尔·卡塔尔久的保守政府把工人协会看作是“革命者的巢穴”，因而当局采取了严厉措施反对工人协会，以破坏它们的活动。但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过程是阻挡不住的。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基于阶级斗争原则的工人组织将建立起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同工人运动平行或分别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罗马尼亚革命思想的进步的先进传统中产生出来的一个自然的、必

然的和合乎规律的过程的结果。社会主义于十九世纪初第一次以空想的形式传入罗马尼亚（这是由于特奥多尔·迪亚曼特进行的活动）。同尼·伯尔切斯库、切·博利亚克、米·科格尔尼恰努、康·亚·罗塞蒂等进步战士和革命家的活动和先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民主传统，为在罗马尼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造成了有利环境。

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巴黎公社宣告成立，有利于具有先进思想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更好地了解社会主义思想。其中许多人当时在法国、瑞士、英国、比利时，他们曾以各支部成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国际的活动。其中有瓦西里·康塔、格·潘努、扎姆菲尔·阿尔博雷、米尔恰·罗塞蒂等人。有九百多名罗马尼亚人参加了保卫法兰西共和国抗
击普鲁士军队的战斗，其中一些人（德·多布雷斯 288
库、克·哈拉兰比、伊·切尔讷特斯库）还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战斗队。公社失败后，他们回到国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有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满现状，特别不满农民群众的艰难处境，他们寻求保障国家进步的新途径。为此目的，早在1871年，在我国人民斗争

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具有革命观点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雅西、布加勒斯特、加拉茨和普洛耶什蒂组织社会主义小组。站在他们前列的战士有欧金·卢普、弗·格·马林库等；1874—1875年又增加了尼古拉·科德雷亚努、康·多布罗加努—盖里亚；在独立战争后又有索菲亚、伊昂和约瑟夫·讷德日德、康斯坦丁·米列等。

从活动一开始，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但他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还未能使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上来。为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布加勒斯特的社会主义小组于1877年5月出版了罗马尼亚第一份社会主义期刊《社会主义者》。宣布独立，同解放战争相联系的事件，这些都是我国先进分子传播革命思想、动员爱国力量的良好机会。

罗马尼亚民族独立战争

1877年赢得民族独立是罗马尼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1877—1878年正义的解放战争的成果是取得独立，也是罗马尼亚人民为摆脱奥

斯曼帝廷的沉重枷锁而进行的数百年之久的英勇斗争的胜利。获得独立标志着近代罗马尼亚的形成过程和完成罗马尼亚人民的国家统一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个时刻。

罗马尼亚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巴尔干半岛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总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运动的结果是同 1877 年春产生的有利环境相连的，当时爆发了俄土战争，罗马尼亚作为俄国的盟国参加了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1877 年 5 月 9 日罗马尼亚宣布国家独立，国内的先决条件和国际形势

1859 年公国的联合和此后实施的改革，促进
了内部自治的加强，为实现多少世纪以来的独立
理想准备了条件和使尚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罗马
尼亚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创造了重要前提。
亚·伊·库扎大公在同土耳其和其他欧洲列强关
系中所奉行的尊严的外交政策，提高了国家的威
望，创造了一些便于取得独立的前提条件。1859 289
年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取得的进步已
变得同罗马尼亚依附于土耳其的状况不相容了。

争取民族独立已成为迫切的需要。独立的理想鼓舞着全体人民，成为前进的强大动力。农民、工业工人、市民、资产阶级各阶层都表现出要竭尽全力争取独立的愿望。城乡人民群众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愿望同争取民主自由和改善生活的要求结合起来。地主阶级集团和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认为，可以用经济让步换取欧洲列强的善意而取得独立；保守派地主害怕把几乎组成整个军队的农民武装起来会危及他们的财产。事实上，农民希望在战争胜利后得到土地。

1875—1876年间，巴尔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保加利亚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在我国领土上组织起来的保加利亚革命者小组回到了多瑙河南岸；塞尔维亚和黑山在俄国的鼓舞下，开始对奥斯曼帝国作战。沙皇帝国想用武力排除奥斯曼在巴尔干的统治，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它的行动客观上有利于巴尔干各国人民，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进行一场胜利的战争。

在这种有利的国外环境中，罗马尼亚政府倾向于同俄国结盟。经过在克里米亚的利瓦住谈判，

于1877年4月4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一项罗俄协定，给予俄国军队经过罗马尼亚领土开赴巴尔干的权利。但未就俄国军队和罗马尼亚军队在多瑙河南岸如何进行军事合作达成协议。作为交换条件，俄国政府保证维护并保卫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尊重罗马尼亚国家的政治权利。4月11日，俄国军队越过罗马尼亚边界，4月12日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早在4月6日就动员起来了的罗马尼亚军队，准备在多瑙河北岸击退土耳其袭击。罗马尼亚军队热切地等待着开始行动的时刻。4月29日，即在多瑙河沿岸的罗马尼亚炮台回击土耳其挑衅后的第四天，众议院宣布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帝国进入战争状态；4月30日，参议院也通过了一项类似的动议。罗马尼亚公众舆论坚持要求宣布国家独立和对奥斯曼帝国开战。1877年5月9日，当成千上万的首都公民聚集在议会大厦周围的时候，众议院宣布国家独立。在难忘的5月9日，外交大臣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向众议院宣布："我们独立了，我们成了自主的民族；我们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民族"。在表决通过的动议上记载着："罗马尼亚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同

奥斯曼帝廷断绝关系和罗马尼亚的完全独立已得
290 到正式确认”。正式宣布独立的消息在人民中间
激起了自联合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的热情。

5月9日宣布的独立必须在战场上得到确认、巩固和捍卫。

1877—1878 年独立战争中的罗马尼亚军队

罗马尼亚军队对击败土耳其和解放巴尔干各国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多瑙河南岸保加利亚领土上进行的几次大战役使它充满了荣光。4月上半月动员起来的“作战部队”包括四个师，八个战列步兵团，四个山地营，十六个多罗班茨步兵团，十个骑兵团，四个炮兵团以及其他小分队和单编队，总兵力为五万八千七百人。此外还动员了年龄较大的人组成三十一个营、四个骑兵连和八个炮兵连的民军，以及国民卫队来守卫国土。主要是由于群众的捐献、征集、议会批准的贷款和借款，战列部队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就作好了战争准备。在军队的装备和供应方面克服了巨大困难。全体人民决心作出最大的牺牲去争取独立。

5月14日的《罗马尼亚人报》写道："我们最强烈的愿望是要看到我们的军队渡过多瑙河，前去为消灭全世界所憎恶的统治作出贡献。我们希望罗马尼亚人把祖国的完全独立归功于他们自己。我们希望独立，因为我们相信它有助于祖国的强大和繁荣。"

1877年6月，俄国军队在济姆尼恰强渡多瑙河。已经进人多瑙河沿线防御工事的罗马尼亚军队用炮火掩护了俄军的强渡。俄军然后向南挺进，同保加利亚义勇军一起到达了中巴尔干一线。但占领普列文及其周围高地的强大土耳其军团挡住了俄军的挺进，并从右翼威胁俄军主力部队。7月8日和18日两次战役失利，促使俄国政府通过尼古拉大公请求罗马尼亚军队协助。大公坚决要求罗马尼亚全军给予紧急支援；其实，罗马尼亚政府早在1877年春就表示过罗马尼亚军队愿意同俄军并肩作战，但沙皇和首相科察柯夫拒绝军事合作。

应俄军司令部的请求，罗马尼亚军队渡过多瑙河，同俄军并肩作战。根据达成的协议，在普列文的联合军团的最高指挥权归卡罗尔亲王，他的

参谋长是俄国将军佐托夫。

罗俄联合部队司令部决定于8月30日向普列文发动总攻。在攻占普列文的第三次战役中，罗马尼亚军队的使命是首先攻占格里维察村北的碉堡这个普列文的真正咽喉。罗军第三师的多罗班茨步兵和炮兵为攻占格里维察碉堡进行了顽强的战斗。

291 乔治·雄楚少校和瓦尔特尔·默勒契内亚努上尉指挥的两个营突破了碉堡前沿阵地，但由于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后撤。这两位营指挥官冲在战士前面，英勇地倒下了。同时，罗军第四师向格里维察一号碉堡发起攻击。经过四次异常顽强的浴血冲锋，多罗班茨勇士们尽管遇到激烈抵抗，终于攻克了碉堡。在碉堡的胸墙上插上了三色旗，半月旗被士兵格里戈里·扬缴获。格里维察战役作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篇章载入了我国人民的史册。同俄军并肩作战的罗马尼亚士兵和军官，所表现出来的勇敢、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引起了全世界的钦佩。8月30日的进攻表明，只有围攻才能迫使奥斯曼—巴夏投降。为了完全切断普列文集团和维了集团之间的联系，必须攻克拉霍瓦，

这个行动于11月9日完成。拉霍瓦战役以后，尼古拉大公致函罗军司令说："我一直很荣幸地承认罗军的英勇和坚实的军事素质。拉霍瓦的胜利完全属于罗马尼亚军队。"

11月28日晨，土耳其军队企图向索非亚方向突围。在俄罗军队的合击下，土耳其人被迫缴械。负了伤的奥斯曼一巴夏向罗马尼亚上校格里戈里·切尔凯兹投降，对他说："我率领我的军队向年青勇敢的罗马尼亚军队投降。"联合部队俘获四万多俘虏。指挥普列文封锁战的俄国将军托德列本赞扬罗马尼亚军队说："罗军的行动，从将军到士兵不论哪一级，都是赞不胜赞的。"

攻克普列文后，战争最艰巨的阶段结束了。俄军和保加利亚义勇军一起，越过巴尔干山脉重新朝君士坦丁堡方向进攻，罗马尼亚师团向维丁挺进。这里的古堡是土耳其人在多瑙河中游的主要立足点。经过十分顽强的战斗，罗军从土耳其人手里夺取了维丁的前沿阵地。在维丁地区的战役中，著名的斯默尔丹攻坚战尤其突出。尼·格里戈雷斯库在他的同名杰作里赞颂了这一战绩。维丁堡顶住了炮火的轰击直到俄土签订停战协定

（1878年1月19日）为止。

在独立战争中，罗军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战斗意志和勇敢精神。多罗班茨步兵和骑兵的英雄主义可以同在罗维内、瓦斯卢伊和克卢格雷尼等地战斗过的祖先们的高尚军事素质媲美。在攻克敌人阵地的战斗中，有成千上万人伤亡。我们全国人民怀着激动和感激的心情缅念着独立战争的英雄们，如：乔治·雄楚、瓦尔特尔·默勒契内亚努、迪米特里·米雷斯库、康斯坦丁·埃内、格里戈里·扬、康斯坦丁·楚尔卡努（诗人瓦·阿列克山德里所歌唱的著名的佩内什·库尔卡努）和其他许多人。罗马尼亚官兵传奇式的英雄主义的精神力量源泉，在于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
292 他们希望看到祖国自由、独立的炽热愿望。尼古拉·格里戈雷斯库、萨瓦·亨齐亚和波普·德·扎特马里等画家的油画以及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乔治·科什布克和亚历山德鲁·马其顿斯基等诗人的诗作，都以巨大的创造力和历史回忆力表现了激动人心的战争情景，这些作品是我国人民崇高的精神美德的明证。

民族独立——全体罗马尼亚人民的崇高事业

因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所以它激起全体人民的真正的热情。

受到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鼓舞的城乡群众，在支援前线部队方面表现了卓越的牺牲精神。千千万万的农民、工人、工匠、知识分子志愿要求参军。民众通过征发和运输、让部队宿营、募捐军械费、捐献大量现金和物品（食品和衣服等），对胜利作出了有效的贡献。工人阶级，虽然人数还不多而且刚开始组织起来，但也投身于人民斗争的洪流之中。农民群众肩负了战争重担，在人力和物力上作出了巨大牺牲，在前线和后方都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数以千计的中学教师、小学教员、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继承爱国学者的光荣传统，志愿奔赴前线，或在整个战争时期献出一部分薪金支援军队。祖国解放战争在罗马尼亚各省的居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兰西瓦尼亚的罗文报纸表示声援民族独立战争。在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省里，遵照古老的罗马尼亚爱国者的榜样，成立了许多委

员会以支援罗马尼亚战士。特兰西瓦尼亚人、巴纳特人和布科维纳人，不顾奥匈当局的禁令和迫害，秘密越境来同他们的兄弟并肩作战（莫伊塞·格罗齐亚、巴迪亚·克尔仓等）。处在外国占领下的地区的人民志愿参军并向罗军提供物质援助，这对加速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的理想的共同斗争具有深刻的意义。罗军和保加利亚爱国者的战功同时也对解放保加利亚作出了贡献。在普列文和格里维察为纪念在保加利亚土地上牺牲的罗马尼亚战士建立的纪念碑，是两国兄弟友谊的象征。

承认独立 圣斯特法诺和约和柏林条约

1878年3月的圣斯特法诺和约承认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为独立国，而保加利亚则成为自治国。1878年夏，参加柏林会议的列强代表也确认了1877年5月9日罗马尼亚人民所完成的事业。罗马尼亚代表伊·康·布勒蒂亚努和米·科格尔尼恰努有力地维护了独立和尊重国家领土完整的事业。柏林和约恢复了罗马尼亚国家对多
293 布罗加——罗马尼亚的古老领土的权力。同时，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三个县（卡胡尔、伊兹梅尔、博

耳格勒)重新并入了俄国。

同时,奥—匈和英国也满足了各自的并吞欲望,前者接管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后者接管了塞浦路斯岛。

* * *

1877年5月9日宣布的独立完成了1859年实现联合的历史事业,把近代的民族国家从自治国家转变成独立国家,这是罗马尼亚人民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结果。各社会阶级,首先是农民和工人阶级,为实现独立进行过战斗。

同俄国军队并肩作战、参加巴尔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的罗马尼亚军队,在战场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伤亡人数约达一万人之多。此外,城乡广大群众还在物质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罗马尼亚人民以自己的英勇牺牲,向全世界表明它有权享受自由。这样,罗马尼亚获得了主权和同其他国家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从而可以奉行自己的对外政策。

罗马尼亚历史上的英雄篇章——独立,同时也是东南欧动荡不安的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和新的篇章。

尽管罗马尼亚人民未能充分感受到取得独立的积极成果，因为统治阶级阻碍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列强经常干涉罗马尼亚的内政，但独立确保了促使民族工业得到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促进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罗马尼亚获得国家独立，推动了处于外国占领下的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独立后半个世纪，罗马尼亚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建成了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

1878—1900年间罗马尼亚的发展

经济发展

罗马尼亚赢得民族独立，从而排除了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对奥斯曼帝国的从属。罗马尼亚能够自由地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和关税协定，这使它有可能奉行有利于国家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这是近代罗马尼亚国家获得繁荣的基本条件。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又对其他经济部门——农业、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国

内外贸易、交通运输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上一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尽管工业发 294
展直线上升，但农业仍在罗马尼亚经济中占主要比重。农业，尽管遇到所有制结构和欧洲市场上外国粮食的竞争所造成的巨大障碍，但也获得了不断的发展。

上一世纪末，罗马尼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外国资本渗入工业，攫取了主要工业部门。外国托拉斯造成了经济的片面发展，它们企图把我国变成它们的廉价原料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并且干涉罗马尼亚的内政，严重损害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在德国，特别是在奥一匈的经济压力下，罗马尼亚必须应付非常巨大的困难。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在获得独立后的最初几年里，我国在经济方面深受1875年同奥一匈签订的贸易协定的危害。奥一匈帝国商品的激烈竞争，使得罗马尼亚许多工厂和作坊倒闭。手工业处于类似的境地，生产每下愈况。

罗马尼亚社会知名人士起来反对同奥一匈签

订的贸易协定，其中首推以“保护性关税政策”而著称的学派的代表：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亚·迪·克塞诺波尔和普·斯·奥雷利安，他们为创立本国的工业而奋斗。经济学家普·斯·奥雷利安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说：“建立民族工业是我们国家生存的条件”，主张采取措施阻止外国竞争，促进开发本国资源。

在为保护和鼓励工业而采取的措施中可以列举：1886年的关税率，它确定对大批重要外国产品的税率；名为扶助民族工业总措施的1887年鼓励工业法，它规定向拥有五万列伊资本或不少于二十五名工人的工业企业的创办者提供一系列的优惠：免税、降低铁路运费、免费提供建厂地皮等。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本国工业的发展速度迅速增长。

食品业（磨坊、酒精、啤酒、罐头、食糖）、木材（伐木和木材加工）和采掘业（特别是石油工业）发
295 展尤为迅速。特别是石油工业，十九世纪末，随着喀尔巴阡山东侧和南侧丰富的石油矿藏的发现，开始成为德国、英国和美国（1900年以后）资本的国际大托拉斯的争夺对象。纺织工业虽然发展速

度越来越快，但只能保障国内部分消费。

制革、造纸和建筑材料工业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

冶金工业仍然局限于制造铁钉、铁丝和农业机械的修配零件，这使得这个如此重要的经济部门继续保留着工场手工业性质。

因此，罗马尼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平衡的，发展最快的是那些利用本国原料的部门，特别是那些投资少、收益快的部门。这个特征主要是越来越多地被吸引进罗马尼亚市场的外国资本所造成的。同时，也可以说，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在地理分布上带有严重的不平衡和无政府状态。从这个时期起，地区差别越来越大，有些地区没有工业，局限于从事农业；一些原料丰富的地区开始得到工业的开发。大型机械工业同手工作坊同时出现和发展，是罗马尼亚工业发展的一个特点。

在上一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工业尽管比前一个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但与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要求相比，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是相当缓慢的。这一进程既受到外国产品竞争的

阻碍，也受到本国资本不足的影响。

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工业发展缓慢的情况下，农业仍然是罗马尼亚的主要经济部门。工业部门中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业。越来越大规模地使用雇佣劳动、日益广泛地应用农业工具和机械以及商业性的农业发展，这些都反映这一重要经济部门已经开始发生的变革。

大地主所有制占统治地位仍然是农村土地分配的特点。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尽管国家庄园的约八十万公顷土地已转为农民所有，但绝大多数农民仍然缺乏保证全家口粮需要的土地。农民缺少土地，地主把苛刻的劳动条件强加于农民，在农村中经常听得到反对地主的呼声。所以，在这个时期，农民的夺地行动日益频繁，有时还发展到象1888年起义那样的高级斗争形式。

296 面对不断增长的农民压力，地主采取种种手段保护私有大地产。为此，颁布了关于出售国家庄园的部分土地的法令，以部分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

农民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土地。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租佃价格不断提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主日益广泛地采用把庄园租给大佃主的办法，而佃主又用特别苛刻的条件再出租给缺少土地的农民。作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的佃主的日益增长，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状况。

为了调整地主或佃主和农民的关系，地主于1872年修改了为双方规定契约条件的农业契约法。后来，1882年和1893年又两次修改了农业契约法。这些修改虽然规定农民状况应有所改善，但农业契约法仍然是地主和大佃主进行压迫的工具。

欧洲市场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促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已经改进的农业机器的更为广泛的使用，导致单位面积平均产量增加。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所取得的进步，与此同时，对农民群众的剥削也加强了。

运输和交通

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发展日益要求扩大铁路

网。1880年开始从外国资本的私人公司手里赎买独立以前修建的铁路，铁路全部归罗马尼亚国家所有。到十九世纪末，铁路总长度已超过三千公里，其中约一千八百公里是由国家修建的。机车和车厢的数目比赎买时也有了增加，并且进行了一系列扩建铁路的工程。在这一方面有1895年建成的切尔纳伏德大桥，这项工程是由罗马尼亚工程师安盖尔·萨利尼设计的。尽管如此，不断增加的运输需要仍使人日益感到铁路和车辆（车厢、机车等)的不足。

在采取措施扩充陆路运输工具的同时，十九世纪末也开始筹建内河和海洋船队。为此设立了多瑙河运输公司，从而为以后发展内河船队奠定了基础。同时，开始改建主要的多瑙河港口：朱尔朱、土尔努一塞维林、布勒伊拉和加拉茨。同时也为发展海运事业奠定了基础；随着海洋船队的建
297 立，康斯坦萨港开始近代化，这一港口后来对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全国的、县和乡的公路网也有所扩大。同时，继续改进邮电事业，建立电讯网和电话事业。

近代的运输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发展，扩大了我国的对外联系。

银 行

我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日益需要改进信贷体系。1880年罗马尼亚国民银行的建立是这方面的第一个步骤。在短时间里，它又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了分行，从而成为我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

国民银行的设立有力地促进了其他同类信贷机构的成立。这样，到十九世纪末，在国民银行的帮助下开办了二十四家新银行，其中有农业银行（1894年），贴现[①]银行（1898年），克拉约瓦商业银行（1898年）等。在罗资银行成立的同时，还建立了许多外资银行（德、法、奥—匈），其中最重要的是罗马尼亚总银行（1897年）。

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信贷体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高利贷资本的消失，在小手工业者和农民中间，高利贷活动还继续存在很长时间。

工业和农业以及同工农业相联的经济生活的

① 贴现：是一种银行业务，即预支期票票面价值，扣取一定百分比作为期票到期以前的利息。

其他重要部门——运输业和金融体系，尽管尚处于初期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在这个时期不断上升、是同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的。

罗马尼亚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内　政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我国的政治生活仍然受两个主要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代表的控制。由于我国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与地主相比，得到了加强，这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不断增长。为了抵消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地主往往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比较得民心的中等资产阶级分子，希望靠他们去对付自己的主要政敌。同时，自由党还拉拢了一批地主阶级的代表，尤其是那些热中于做粮食买卖的地主代表。但是，还可以说，自由党大体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保守党则致力于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首先是维护大土地所有制。

虽然两个执政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但还是采用了轮流执政制，根据这种制度，几乎定期地由国王轮流委托两党执政。

除执政党外，其他一些党派也参与了国家政治生活，但从未执过政。例如，激进党，是1884年由自由党左翼战士、自由激进派康·亚·罗塞蒂建立，由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分子（知识分子、工匠、小商人等）组成的。由康·亚·罗塞蒂——他去世后由格·潘努——领导的这个党的代表，宣布他们拥护进行民主改革，诸如：把国营庄园的土地分给农民，分完后再分私有庄园；制定新的农业契约法；实行普选制等等。从它所提出的要求和所采取的保护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利益的立场来看，激进党与两个执政党相比，立场最先进。

在这个时期，发生了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崛起的过程。无产阶级，虽然在1893年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成立以前，没有自己的政党，但从其初级阶段起就在政治上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对罗马尼亚社会最迫切的主要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我国的政治生活在这个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动

荡。在两党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发生了许多事件，进行了一些明显的重要改革。无论在自由党内部还是在保守党内部都出现了许多集团和派别，这实际上表明，在同一个政治组织内部也存在着并表现出深刻的矛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1876—1888年自由党执政期间，反对派内部，除了保守党分子以外，还有一批立场相似的自由党领导人。在以后的年代里，保守党最强大的反对派是由“青春”派组成的；保守党内部的斗争使得它在不到三年的执政期间更换了五届政府。

国家的议会生活是在两个立法机构内进行的：众议院和参议院。1884年以前，立法机构的选举是在四个选举委员会内进行的，此后，由于修改了宪法，选举委员会减少到三个。选举委员会数目减少的结果，削弱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因为它的选票是由头两个委员会保证的，但新宪法把
299 它们合并成了一个。

当时的政治弊病使得宪法的规定经常遭到执政党代表的破坏。选举都是在两党中的这一党或那一党执政后才举行，这是他们取得议会多数的保证，也是他们在台上维持较长时期的保证。

对外政策

列强承认我国独立使我国在欧洲获得了新的地位。我国的资源及其战略地位增加了欧洲列强对罗马尼亚的兴趣，尤其是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相对抗的两大营垒开始日趋形成之后。普鲁士血统的霍亨索伦家族的卡罗尔一世国王登上罗马尼亚王位，罗马尼亚公众生活的一些领袖所执行的亲德方针，再加上中欧列强不断增加的压力，使我国于1883年加入三国同盟（由德、奥一匈和意组成）。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奉行支持中欧列强的方针，而这些国家不论在经济、政治和外交上都利用我国的盟国地位。尽管我国参加了三国同盟，但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发生过许多情况，使我国同中欧列强，特别是同奥一匈帝国的关系产生过激烈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方面的（1884—1886年的关税战），同时也是由于罗马尼亚人居住的一大片领土——特兰西瓦尼亚尚处于奥一匈帝国统治之下这一情况。

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出现一些转向西方国家，

特别是转向法国的倾向，这些倾向在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表现较为强烈。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过程的，自然是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的增加。近代产业无产阶级的出现，增加了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可能性，促使它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在独立战争期间和以后的时期里，社会主义小组加强了活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宣传方面。在雅西和布加勒斯特，为数越来越多的青年转向社会主义小组，加入了这些小组。在社会主义小组内进行宣传的同时，象《未来的罗马尼亚》(1880年)、《前进》和《罗马尼亚妇女》等这样一些具有进步倾向的报刊，以及诸如《社会主义者的信念》（实际上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之页》和《精神病学研究》等一些具有革命内容的小册子，也都传布了当时的先进思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报纸和小册
300 子，通过直接活动，开始在比较发达的工业中心的工人中间进行宣传。

1880年以后，社会主义小组开始日益要求掌

握科学社会主义。《同时代人》杂志(1881年)对这个过程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杂志在十年时间内一直是我国整个进步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注意中心。后来又创办了其他刊物:《未来的达契亚》、《解放》、《社会评论》和《人权》,它们也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出了贡献。在这些杂志的专栏里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译文片断。

康·多布罗加努—盖里亚在《社会评论》上发表的题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要求什么》的论文,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在论文结尾还发表了1886年社会主义小组的纲领,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一些政治和经济要求:普选、集会自由、妇女平等、免费教育、赎买大地产并使之归乡所有,等等。

1866年社会主义小组的纲领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从它所提出的要求来看,却是当时我国最先进、最无所不包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纲领。

康·多布罗加努—盖里亚无论从他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还是在我国文化生活中的活动来看,都不愧是我国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工作方面最卓越的人物。

在工人中间进行的宣传和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使得他们在布加勒斯特（1887年）、雅西、加拉茨和其他工人中心建立了高级组织形式，即工人小组。在工人小组内部，开始愈来愈感到有必要建立罗马尼亚的无产阶级政党。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行动采取越来越有组织的形式，超越了自发罢工阶段，提出了明确的经济和政治要求。

布勒伊拉港口工人的罢工（1884年）、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印刷工人的罢工以及加拉茨和布加勒斯特铁路工人的罢工（1888年），都是工人阶级觉悟提高和全国工人相互声援的表现。

国家机关发动的反对工人的行动，使1890年工人小组的活动有所减弱。在新的基础上改组这些工人小组就愈益显得迫切了。

1890年，布加勒斯特工人小组改为工人俱乐部，其目的之一就是使它成为未来的工人政党的核心。在1890年后的两年里，全国大多数工人小组都转成了俱乐部（雅西、博托沙尼、罗曼、加拉茨、普洛耶什蒂、克拉约瓦）。

在这段时间内出版了一系列报刊——社会主

义的机关刊物，其中有：《前进报》（罗曼）、《工人报》（雅西）、《社会民主报》（普洛耶什蒂）、《劳工报》（加拉茨）和布加勒斯特工人俱乐部的机关报《劳动报》。

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的成立（1893 年） 301

1893 年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第一个政党的建立，是我国政治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包括一系列带有一般民主性质的要求），使工人阶级的政党站到了争取社会进步斗争的前列。这些要求是：普选，免费教育，男女在政治和法律上平等，保障集会、结社、罢工和星期日休息的权利，等等。除了经济、社会和政治要求之外，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通过的纲领，还包括了一种不正确的论点，即罗马尼亚的革命变革是以较先进的国家的同类变革为条件的。这个论点还把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局限于只进行宣传和组织无产阶级，从而削弱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的建立，标志着无产阶级终于登上了

国家的政治舞台。

尽管新政党的一些领导人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分子持机会主义态度，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仍领导我国工人阶级为经济、政治和社会要求进行斗争达六年之久。在进行组织无产阶级的工作的同时，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也注意到农民——我国人数最众多的阶级，在他们中间建立了社会主义俱乐部——农村中最早的社会主义组织。

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与日俱增的影响，无产阶级开始在罗马尼亚社会中起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党领导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分子忧虑重重，由于他们的活动，使党于1899年暂时解散。

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的解体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党领导内部，以伊·切·弗里穆和亚·约内斯库为首的一批忠诚的领导人进行着彻底的革命活动，并指出了党领导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给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的前途带来的危险。

党的解散，还由于自由党的一些领导人，打着必须革新党的旗号，把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

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拉了过去。

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在她存在的整个时期，同第二国际建立了经常不断的密切联系。在第二国际于苏黎世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作了报告，强调指出了建立罗马尼亚工人阶级政党的重要性。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罗马尼亚代表，对有关土地问题的讨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主张把无政府主义者开除出国际代表大会。

1888 年农民起义 302

农民缺乏土地和封建关系的残余，使得独立战争后在农村中发生了一系列动乱，这些动乱常常发展成为起义。

1888 年春的农民起义是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最重要的农民起义。3 月 20 日在乌尔齐切尼(雅洛米察)爆发的起义，很快便扩展到邻近的县：伊尔福夫、普拉霍瓦、登博维察和弗拉什卡。4 月中旬，当这个地区的起义快被镇压下去的时候，新的起义先在布泽乌、勒姆尼库—塞拉特、穆斯切尔、布勒伊拉、特列奥尔曼、奥尔特、罗曼纳茨

和多尔日等县爆发，接着蔓延到摩尔多瓦的普特纳和特库契县、雅西、尼亚姆茨、科武尔卢伊和苏恰瓦，5月份进一步扩展到瓦斯卢伊、罗曼和博托沙尼。

起义农民的斗争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从攻击地主的庄园，赶走地主和佃主，直到袭击乡当局。农民往往销毁农业契约登记册。起义的农民以为，当局掌握着他们能据以得到土地的法令，可是当局拒不执行。因此，分土地是起义农民的主要要求。所以，农民往往占领庄园，不论是地主的还是国家的，然后把它们平分掉。

在1888年起义农民的斗争表现形式中，还有起义农民涌进县城，甚至涌进首都的趋势。但是，强行涌进城市的尝试遭到了被紧急调来守卫城防的军队的阻挡。尽管有军队的阻拦，大股小股的农民队伍还是涌进了布加勒斯特、加拉茨和博托沙尼，在那里他们和平地要求当局满足他们的要求。

与前一时期发生的农民动荡不同的是，1888年的起义组织得比较良好，特别是在首都周围各县。起义者组成大队，一般由参加过独立战争的

农民率领，起义者还表现出团结精神，尤其是在当局实行逮捕时。这显示出农民的斗争决心和他们对土地的渴望。

对起义者的镇压是残酷的：军队向起义者开枪，数以千计的农民——青年、老人和妇女遭到虐待，一千多名起义者被杀害或打伤，还有好几千人被逮捕，受审讯。在镇压期间，发生了士兵同起义者联欢的事。被指控犯了这种“罪”的士兵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和判刑。

1888年的起义农民还得到了工人和知识界的一些团体的同情和支持。在起义的日子里，布加勒斯特工人小组的刊物《解放》发表的宣言说：“工人们，只有你们才知道什么是苦难和贫穷，只有你们才知道什么是劳役，只有你们才能理解那些被贫穷和不公正逼得绝望了的起义者。”

1888年春天的农民斗争并不是毫无结果的。303
起义爆发后几个月，保守派政府就被迫把国有庄园部分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提交立法机构审议并就此颁布法令。尽管1889年的法令把五十多万公顷的耕地卖给了农民，但农民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农民群众的动乱直到十九世纪末几乎连绵

不断，并终于发展到1907年春的大起义。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特兰西瓦尼亚（1850—1894年）

二元政体以前的特兰西瓦尼亚（1849—1867年）

1848—1849年革命遭到镇压以后，在特兰西瓦尼亚恢复了哈布斯堡的专制制度，其反动性有增无已。处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人仍然被分而治之，他们所居住的省份被分成几个行政区（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巴纳特、“匈牙利地区”——即克里沙纳、马拉穆列什和布科维纳）。特兰西瓦尼亚的社会矛盾有时表现为民族斗争，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罗马尼亚人受着主要以马札尔族地主为代表的少数人的压迫。罗马尼亚群众遭受双重奴役——社会剥削和民族压迫。罗马尼亚群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恶化，地主阶级试图恢复革命前的剥削条件，这些都促使农民的反抗加强，特别是在西山地区，在这里，阿弗拉姆·扬库所享有的盛名，继续不断地使贵族和地方当局

心惊肉跳。在有些地方，农民直接攻打庄园，反抗征收日益苛重的捐税的税吏。帝国的统治集团不得不颁发1853年的特许证（适用于巴纳特、克里沙纳、马拉穆列什和帝国的其他省份）和1854年特许证（适用于特兰西瓦尼亚）。与1848年的法令相比，这些特许证使雇农（无地农民）也摆脱了封建的依附关系，并且设立了专门法庭审理过去的农奴和农奴主之间的案件，等等。上述特许证促进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增加了供应市场的农产品；它们没有规定分给农民新的土地，而是允许农民赎买自由。但绝大多数农民无力赎买，因而继续在新的形式下依附于庄园主。特兰西瓦尼亚的社会和民族动荡在很大程度上受喀尔巴阡山彼侧的事态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受争取统一诸公国的斗争的影响，人民群众把这一斗争直接与实现深刻的社会改革，首先是土地改革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时期，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得到了一 304
定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由于还存在对奥地利的依附关系和农业中的封建残余而受到阻碍。采矿业，特别是煤的开采得到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铁路出现以后。冶金工业在巴纳特、洪尼多阿拉、布

拉索夫等地发展起来，而轻工业(磨坊、酒精厂、纺织、造纸等)则在奥拉迪亚、阿拉德、蒂米什瓦拉、克鲁日、锡比乌等地得到了发展。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进步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总过程中取得的；这种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要小得多，因为它是受哈布斯堡帝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支配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两公国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象布拉索夫和锡比乌等这样一些商业中心的重要性也日益增长。显然，特兰西瓦尼亚和罗马尼亚两公国是一个和谐的经济统一体，特兰西瓦尼亚在经济上倾向于老罗马尼亚，它们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利于加强两者的经济地位，有利于稳定市场和积累资本。

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业发展必然导致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出现和成长。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状况的特点在于工资低，工作日长，女工和童工的广泛使用，恶劣的劳动条件，贫苦的生活，厂主的种种盘剥，失业，大量严重的工伤事故，警察般的监视，等等。

社会和民族动乱

由于特兰西瓦尼亚在哈布斯堡帝国范围内所处的依附地位，特兰西瓦尼亚的资产阶级也是在种种困难条件下形成的。与马札尔的和日耳曼的资产阶级相比，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人数少，而且在经济上也弱得多：商业是它主要的活动领域，因为它从事工业是受到阻止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状况的特点是，它作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被推到次等地位，其社会经济发展本身也受到阻碍。

反哈布斯堡的民族运动愈来愈表现出实现"达契亚一罗马尼亚"的愿望，实现各地的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联合的愿望，革命的失败只是暂时压制了这种愿望。此时处在流亡中的革命领导人恢复了关于建立各国人民反对哈布斯堡和沙皇专制主义的同盟的谈判。以伯尔切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革命者热烈地支持进行共同斗争的思想。罗马尼亚两公国的统一进一步推动了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奥地利在法一意一奥战争中的失败(1859 年)，从政治上削弱了哈布斯堡帝国，使

它丧失一些意大利省份（托斯卡纳、摩德纳、伦巴底），从而开始走向它的解体。国内外的事件迫使
305 维也纳统治集团改变态度，于1860年正式宣布采取一种多少较为自由的政治体制，从恢复帝国各省革命以前的权利入手，开始实施一些宪政改革。

1861年，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过渡到给予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在内的帝国各省以自治权，但罗马尼亚人继续按他们各自所居住的行政地区被相互隔离着。新的体制有利于同样压迫着一系列民族——其中也包括罗马尼亚族人民——的马札尔地主和资产阶级。以文钱齐乌·巴贝什为首的佩斯国会中的罗马尼亚人代表，有力地抨击民族压迫和把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的主张。哈布斯堡为了能继续推行其压迫政策，选择使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剥削阶级结成政治联盟的办法。历史上称这个联盟为奥—匈二元政体（1867年）。

奥地利在对普鲁士战争中的失败（1866年），也促进了这一联盟的实现，因为失败促使奥地利资产阶级去寻求马札尔贵族的支持。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就这样变成了奥—匈帝国。特兰西瓦尼亚传统的自治被取消了，强制实行了最反动的政治

措施——把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格奥尔基·巴里齐乌、伊昂·拉齐乌和其他罗马尼亚人领袖，强烈抗议这种专横的决定。在布加勒斯特、雅西和克拉约瓦等地举行了声援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活动。

奥—匈二元政体建立后的特兰西瓦尼亚(1867—1894年)

从1867年开始的特兰西瓦尼亚政治历史上的新阶段，主要是马札尔地主和资产阶级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民族压迫和社会剥削，致使人民群众的状况进一步恶化。

经济状况

特兰西瓦尼亚在新时期的特点是工农业的继续发展和资源的得到开发。采掘工业(日乌河谷)和冶金工业(雷希察、洪尼多阿拉等)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在逐步现代化的技术的基础上继续开采西山的贵金属、奥克纳—穆列什等地的盐和有色金属；但投资最多的部门仍然是轻工业，因为它为

资本家带来最快的利润。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业发展受到奥地利商品竞争的阻碍。外国资本大量渗入。农业越来越多地为市场生产。资本主义关系（雇佣劳动）在特兰西瓦尼亚西部平原和巴纳特的庄园上得到较大的扩展。机器也在这里的农业劳
306 动中得到较多的使用。十九世纪下半期，农田面积、粮食和牲畜产量也在特兰西瓦尼亚得到了增长。但是大土地所有制得到土地合并法的保护和鼓励。在要求巨额投资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金融活动获得了特殊的重要性，设立了许多新银行，信贷业务额也增加了。特兰西瓦尼亚最大的罗马尼亚银行是《蜜蜂银行》。马札尔和日耳曼银行的竞争以及匈牙利国家采取的歧视措施，使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在金融方面的情况更加困难。

特兰西瓦尼亚的商业反映生产的普遍增长，尤其是同罗马尼亚的传统联系的日益扩大，这种联系是罗马尼亚人居住的地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1886—1891年间，奥—匈向罗马尼亚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关税战”，禁止进口牲畜，阻止其他罗马尼亚商品进入奥—匈市场；由此

出现的困难再次表明，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与老罗马尼亚经济是自然地相互补充的，割断这种联系的任何企图会在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中引起混乱。在东欧国家修建铁路的普遍高潮中，特兰西瓦尼亚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紧张的工作。经济和贸易的普遍发展要求修建铁路，而铁路反过来又促进经济和贸易的发展(例如，在巴纳特，这里的铁路网比较稠密)。同时，铁路是加强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联系的新手段，尽管奥—匈企图阻止这种联系。

奥—匈二元政体时期，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遭受了几次经济危机的打击(1873年，1900年)，劳动群众负担了危机带来的困难。尽管经济有了相对的增长，但特兰西瓦尼亚被强行并入奥—匈帝国阻碍了它的正常发展和潜力的充分发挥。

社会政治生活，民族解放斗争

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奥—匈二元政体时期的特兰西瓦尼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是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彻底完成这一事实决定

的。罗马尼亚人越来越强烈地反对民族压迫，使民族问题在政治生活中日益突出。罗马尼亚居民代表发表了“布拉日宣言”(1868年)，公开抗议把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在奥—匈二元政体宣布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里，颁布了几项加深民族压迫的法令(民族法、选举法、关于教育和出版的法令等)。从政治上组织民族解放斗争，由于第一批
307 民族政党的建立表明这一运动进入了高级的成熟阶段。最初(1869年)，在巴纳特和历史上的特兰西瓦尼亚(前自治公国)建立了独立的罗马尼亚民族政党。这些政党制订了不同的策略和活动方式。巴纳特人主张采取“合作”的策略，参加政治生活并在这一意义上利用各种活动的机会。特兰西瓦尼亚本土上大多数的罗马尼亚领导人主张不参与国家生活，表示抗议民族压迫：这种策略在历史上被称为“不合作主义的策略”。这一策略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消极态度，而是一种不接受二元政体、抗议把特兰西瓦尼亚并入匈牙利、通过不参加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以示抵制的声明。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报刊也用这种观点支持罗马尼亚民族的权利。象《蜜蜂》和《联邦》等报纸(分

别由文钱齐乌·巴贝什和亚历山德鲁·罗曼领导），还有布拉索夫的老《特兰西瓦尼亚报》，约西夫·武尔坎创办的《家庭》杂志以及《拉丁东方》等报刊，都对民族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各族人民之间的谅解进行了斗争。值得提出的是，在上述一些报刊（《家庭》、《蜜蜂》等）中，当代的世界大事：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巴黎公社，都得到了生动的反映和积极的评价。罗马尼亚于1877年赢得国家独立，对特兰西瓦尼亚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独立战争在喀尔巴阡山彼侧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它没有辜负人民群众要求建立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期望：通过报刊和其他行动予以道义上的支持，给罗马尼亚军队捐款，特兰西瓦尼亚的许多义勇军奔赴保加利亚前线参战，从战场上传来罗马尼亚胜利的捷报时的欢乐景象，等等，无不表现人民群众的感情。

匈牙利政府发动的民族迫害新浪潮，促使民族运动从组织上得到加强。这样，1881年，由于单一的政党——罗马尼亚民族党的建立，实现了

运动的政治上的统一。新政党的纲领要求恢复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有权自由使用罗马尼亚语，任命罗马尼亚人担任官吏；保障教育使用本民族语言，修改民族法，扩大选举权等。为了实现这些权利，罗马尼亚民族党采用向维也纳宫廷递交备忘录的方式。最重要的这类行动是1892年的备忘录，这是十九世纪末特兰西瓦尼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但是备忘录的道路并不能产生任何有利于罗马尼亚人民的结果，1892年的备忘录事件后来证明了这一点。罗马尼亚参加三国同盟（1883年），给民族解放运动造成重大困难，但没有能阻止它最终实现全体罗马尼亚人联合起来这一崇高目标。《论坛报》于1884年在锡比乌问世，给予了民族斗争以新的推动，因为它是罗马尼亚民族党的“青年派”这个态度较为
308 激进的新派别的喉舌。新机关报的编辑是作家伊昂·斯拉维奇。《论坛报》成了特兰西瓦尼亚最重要的罗马尼亚文的政治报纸，主张同罗马尼亚建立密切的联系。由于它的战斗性，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问题也引起了外国公众舆论的注意。

早在政治上的统一以前就存在的罗马尼亚人

民在文化上的统一，大大促进了民族运动的进程。

老罗马尼亚支持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学校、报刊和其他文化机构，而特兰西瓦尼亚最重要的罗马尼亚作家（科什布克、斯拉维奇等）都迁移到自由的祖国来，在这里他们的才能得到了有力的表现。喀尔巴阡山两侧的罗马尼亚文化科学机构（古老祖国的文化同盟和罗马尼亚科学院，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文学和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协会）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备 忘 录》

早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党成立大会上（1881 年），就决定起草一份致维也纳帝国宫廷的备忘录，申述罗马尼亚族人民的苦难及其基本要求。在选择“合适时机”的借口下，这一计划被拖延数年后才得以实现。

《备忘录》准备时期的特点在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和老王国的罗马尼亚人各方面的联系增强了，特兰西瓦尼亚民族运动内部的动荡表现为寻求政治斗争中应遵循的道路。会址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争取全体罗马尼亚人文化统一协

会”，于1891年发表了罗马尼亚大学生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状况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之后，以匈牙利大学生名义发表了对这个文件的答复，而奥—匈帝国的罗马尼亚大学生又对这个答复作了《反驳》。民族压迫政策的加强促使《备忘录》于1892年3月定稿，并于1892年5月底由一个近三百人组成的堂皇的代表团递交维也纳的帝国内阁。《备忘录》揭露了奥—匈二元政体和匈牙利统治阶级在这一政体下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歧视，选举舞弊，苛政，审讯，通过学校搞非民族化，剥夺农民土地，对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进行限制等)。《备忘录》并没有充分理解一些社会问题，首先是土地问题的实质，它是作为一种上层行动设想出来的，虽然期望群众支持，但并不号召他们积极参加斗争，而把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仁慈上。罗马尼亚民族党的一些领导人预料到皇帝会拒绝接受《备忘录》，主张借此机会在国内外掀起广泛的宣传运动，另外一些人，为数更少，仍犹豫不决，不是借口等待“有利时机”，就是认为如果行动失败，将会严重地危害整个运动，危害民族解放斗争的总事业。

领导备忘录运动的是：伊昂·拉齐乌、伯塞什 309
蒂的格奥尔基·波普、瓦西里·卢卡丘、尤利乌·科罗亚努、欧金·布罗特等人。

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拒绝接见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民代表团，把《备忘录》原件原封不动地送到布达佩斯，以示帝国统治阶级之间的团结。因为《备忘录》已经印发，所以匈牙利政府于1894年5月在克鲁日举行大审讯，结果是罗马尼亚民族党的领导人被判处重刑。审讯开始后，甚至连那些一直还在犹豫不决的领导人也开始积极地行动起来，特别是在审讯期间。被告人在审讯中宣布，他们的行动表达了全体罗马尼亚人民的决心，因此任何法庭都没有资格审判他们。审讯成了整个备忘录运动的高潮，在特兰西瓦尼亚、自由的罗马尼亚和其他罗马尼亚省份以及国外都掀起了抗议和声援被告者的巨浪。克鲁日的街道上挤满了从整个特兰西瓦尼亚派来的代表团，莫茨人还暗中带了武器，一些备忘录运动者进行了必要的干预，才避免了流血事件。大多数郡的地方当局一再告急：出现了重演1848年革命的危险。在布加勒斯特、雅西、普洛耶什蒂、克拉约瓦等地

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老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声明反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压迫。萨克逊族报刊也抗议审讯备忘录运动者。在备忘录运动的岁月里，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民族问题成了欧洲进步舆论注意的中心。弗·阿·乌雷基亚领导的文化联盟在这方面进行了突出活动。克里芒梭在法国《正义报》上写道："从各地奔向克鲁日去声援被告者的一万五千名罗马尼亚农民将带着什么样的感情回去呢？谁又能阻止他们把视线转向布加勒斯特呢？"

备忘录运动所掀起的人民运动表明，争取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的群众性有了可观的扩大。1892—1894 年的备忘录运动是一个非凡的历史时刻，是从 1848—1849 年革命到 1918 年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为止的整个时期的特兰西瓦尼亚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备忘录运动的直接和间接的后果，大大促进了特兰西瓦尼亚解放斗争的质量的提高。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农民的动荡

上一世纪下半期，一个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在特兰西瓦尼亚，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是同争取社会正义，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交织在一起的。随着工人阶级，特别是大工业无产阶级数量的增加，它的阶级觉悟也有了提高。

继互助会之后开始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职业协会，随后又建立了政治组织（地方性的社会主义小组和俱乐部，社会民主党）。在国际社会主 310
义运动的重要事件——第一国际的活动和巴黎公社（1871年）以前的时期里，特兰西瓦尼亚工人运动的表现形式是罢工斗争，尤其是铁路建筑工地上的罢工，以及把无产阶级组织进"工人总联合会"（最重要的分会设在蒂米什瓦拉）；该会提出了一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要求。蒂米什瓦拉成立了第一国际支部，由卡罗尔·法尔卡什和格奥尔基·翁古里亚努领导。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较早地开始传入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地排除危害运动的思潮（无政府主义、拉萨尔和蒲鲁东等人的理论）。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民主报刊（《蜜蜂》、《家庭》、《特兰西瓦尼亚报》等），都积极地广泛报道了第一国际

的活动、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活动和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被摧毁以后，在国际上，反动派暂时得势；这种现象也在特兰西瓦尼亚发生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各民族的工人（罗马尼亚、马札尔、日耳曼等）一起进行着活动。社会主义运动也反对民族压迫，把民族问题看作是消灭剥削、摆脱压在特兰西瓦尼亚人民群众头上的社会和民族双重桎梏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所介绍的这个时期里，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都在相似的程度上得到了重大的发展，这一事实也说明这两个运动之间的自然接近，这种接近将发展成为罗马尼亚民族党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合行动，尽管这些力量间存在着阶级差别，尽管双方都表达过错误的分离主义观点。民族解放是整个罗马尼亚民族、一切社会阶级的事业，这个事实要求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结合起来。罗马尼亚人民队伍里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是促进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人运动是在一些重要的罢工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如日乌河谷的罢工(1875年),1880—1890年间的克鲁日、阿拉德、雷希察等地的罢工。采矿工人、冶金工人和印刷工人是特兰西瓦尼亚人数最多和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队伍。工人阶级为了争取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获得星期日休息,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获得政治权利(普选、民主自由等)而进行斗争。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宣传活动往往都是在文化协会的掩护下进行的。

1880年成立了全国工人党,它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地方组织叫做"工人联合会"。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人运动和老罗马尼亚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有了显著的发展,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罗马尼亚各省无产阶级的阶级问题和解决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问题的必要性。工人运动的相互联系是喀 311
尔巴阡山两麓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联系的一个方面。老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报刊发表了许多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社会动乱和民族动乱的文章,特兰西瓦尼亚的罗文报刊也赞助古老祖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出版的《人权》、《同时代人》、《社会评论》、《劳动》等报刊都在特兰西瓦尼亚广泛流传,

当时那里的罗马尼亚工人还没有自己的罗文报刊。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决定每年5月1日庆祝国际劳动节，这促进了特兰西瓦尼亚工人运动的发展。从1890年起，特兰西瓦尼亚每年都庆祝“五一”节，有许多年都是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旗帜下进行庆祝的。1890年举行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阿拉德、蒂米什瓦拉、雷希察、克鲁日和布拉索夫等地的工人代表参加了大会。特兰西瓦尼亚的党组织开展了坚持不懈的活动，为反对剥削和压迫而奋斗。佩特罗香发生了大罢工（1892年），数百名罢工者逃往罗马尼亚；布拉索夫和巴纳特等地也发生了大罢工，上一世纪末的阿尼纳和雷希察大罢工是最高潮。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日益发展成为政治斗争。特兰西瓦尼亚最早的社会主义报刊是用匈文（1891年）和德文出版的。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开始广泛地组织工会，农业无产者也开始组织起来。

农民运动带有地方性，主要反对胡作非为和不公正的强行并地。1888年的罗马尼亚农民起义在特兰西瓦尼亚产生了特殊的反响。特兰西瓦尼亚农民贫困化的加剧，引起西山、比霍尔、哈采

格、巴纳特等地的农民多次起义；林业工人和农业无产者参加了这些运动。罗马尼亚报刊采取了维护起义农民的立场。社会主义宣传也开始深入农村。上述动乱表明，由于工人斗争开始与农民斗争联合，农民斗争的规模在扩大。

在1850—1892年期间，由于社会和民族矛盾深化，人民群众日益众多地参加争取正义和自由的斗争，特兰西瓦尼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准备工作的重要部分。

二十世纪初期的罗马尼亚

经济状况

二十世纪初期，罗马尼亚处于蓬勃发展中。工业的重大增长，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运输工具的发展，内外贸易的扩大，以及由此而来的与 312
这种发展相适应的新机构的建立，这些都证明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巩固。

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发展

制定前一时期采取的具有保护关税政策性质的措施的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据1901—1902年的工业调查与前一时期相比，工业发展出现了大跃进。1904年，制订了新的关税率，这一关税率生效两年后，尽管当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几乎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时期，仍然给蓬勃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工业带来了新的益处。1904—1906年关税率实施仅仅数年后，1912年又颁布了一项新的扶助工业法。这项新法令不仅照顾到资本主义大工业，而且也考虑到不少于四名工人或学徒的手工业作坊。新法令对利用本国原料的企业和利用外国原料的企业作了若干区别，无论是在运输工具和税收还是在优惠期限方面，都给予前者以更多的方便。

由于采取了保护关税的政策，加工工业企业的数目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从六百二十五家增加到八百四十七家。同时，用于工业的动力和工人的人数也增加了。

在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仍然是食品

工业。但是，石油工业和同它有关的化学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石油开采量由1900年的二十五万吨左右，增加到1914年的一百八十万吨以上。1913年，罗马尼亚生产的石油占世界产量的3.20%左右。我国丰富的石油蕴藏对外国资本是一种经常的吸引力，国际上的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开始日益激烈地争夺优先权。

如果说1900年以前，英国资本在石油工业中占据优势，那末，在此之后，德国财阀跃居首位。国际大垄断组织联盟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尤其是在第三个重要的竞争者——美国资本出现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业中80%以上的投资是属于外国资本家的。

木材工业在罗马尼亚工业中继续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原材料丰富，它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可观的发展。

与上述部门相比，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比较缓慢，这使我国仍然依赖于外国市场。处于这种状态的工业有纺织工业、机械-冶金工业等。

农业状况

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罗马尼亚经济发生的变革也在农业发展上打上了烙印。与工业部门不同之处在于，在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冲破当时存在的重重困难日益加速，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则速度比较缓慢，并且是在保持着一些重要的封建残余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两种现象在我国农业发展中的同时存在，加深了对农民的剥削，尽管在群众日益增长的压力下，统治阶级不得不采取一些把部分土地转归农民所有或调整农村中
313 的劳动关系的措施。

二十世纪初期，从土地所有制的分配方面来看，罗马尼亚农业的特点是大地主所有制占优势。例如，在1905年，拥有一百公顷土地以上的约四千一百七十户地主，占耕地超过三百八十一万公顷（占全国农林面积的57.4%），而占地十公顷以下的约九十二万一千户农民，仅拥有约三百一十五万三千公顷土地（34.2%），其余的土地属于农村里拥有土地十至五十公顷的富裕农户。

在占地不足十公顷的农民中，只有十七万六

千三百七十五户拥有五至十公顷土地，其余大多占地不足五公顷。除此之外，另有约三十万户完全无地。

二十世纪初期，农业仍然是我国经济的主要部门，占人口的80%以上。同时，粮食生产占社会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占罗马尼亚出口总值的83%。

在商品生产日益发展、粮食的内外贸易扩大的情况下，从农民不断分化的社会关系来看，雇佣劳动开始在农业经济中占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也反映在地主拥有的农具的增加上，例如，1905年，地主拥有近四万五千台犁和同样多的耙，四十五台蒸汽犁，一万一千五百台播种机，七千五百多台收割机等。尽管如此，地主和佃主只拥有所需农具的一小部分。

同前个时期一样，本世纪初，我国农业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佃租。

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的特点是大佃租的飞速增长，在我国的条件下，大佃租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封建剥削制度的结合。一方面，为了能获取较有利的出租条件，另一方面，为了强制农民接受他

们提出的条件，大佃主互相联合，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托拉斯（例如，非舍尔托拉斯，1904年在十个县拥有近二十三万七千公顷土地）。

314 在可耕地集中于少数地主和佃主手里、农业商品生产扩大和农民群众破产的情况下，农民开始采用公开的斗争形式，首先是1907年春季的大暴动，它是罗马尼亚近代史上反对社会不公正的最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

金融体系

在我国，资本主义金融体系形成的过程主要是在国民银行成立后开始的，并延续至1900年以后。1900—1914年间，成立了约一百七十家银行，拥有资本一亿二千七百多万列伊。1900年后成立的最重要的银行有：贴现银行（罗—奥混合资本、前者占的比例非常小）、罗马尼亚商业银行（罗—法—比资本）、罗马尼亚银行（罗马尼亚资本）和法—罗银行（罗—法资本）。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罗马尼亚金融和信贷体系得到了可观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大财阀，由于它在世界上占据着强大的地位，继续怀着控

制罗马尼亚金融和信贷体系的明显用心，对它进行强烈的打击。

交 通 运 输

经济需求的日益增多，内外贸易的扩大，总而言之，由近代罗马尼亚国家的不断发展产生的需要，促使运输工具得到显著的增加。

主要的注意力仍然集中于铁路，其长度超过了三千五百公里。公路网也扩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石子路的长度已经超过二万七千公里。在这个时期，由于石油产品贸易的需要日益增长，开始修建肯皮纳—普洛耶什蒂—康斯坦萨油管。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内河船和远洋轮的数目也增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还制造了第一批飞机，这使罗马尼亚的科学家跨进了欧洲飞机制造者的前列：1906年，特拉扬·武亚在法国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架飞机，它靠自身的飞行器飞上了天；1910年，亨利·科万德同样在法国制造的喷气机进行了首次飞行；同年，阿乌雷尔·弗拉伊库制成了我国第一架飞机。

* * *

315 对二十世纪前十年和上半期的罗马尼亚经济结构的分析，表明我国正处在资本主义成熟阶段。资本的积累和集中过程远远不能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财政资本尚处在萌芽形态，而在金融和信贷体系中则存在着被国际大财阀操纵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不仅没有参加瓜分世界市场，而且它本身就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之中，成为这种瓜分的对象。外国垄断集团在罗马尼亚市场上相互竞争，而国家领土的一大部分仍然处在外国占领之下。

自二十世纪初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生活

二十世纪初期，罗马尼亚的政治生活继续由两个主要的执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统治着。此外，先后登上国家政治舞台的有：由保守党的资产阶级派代表组成的、以塔凯·约内斯库为首的保守民主党(1908年)；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1910年)，这个党在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于1899年解散后，经过十多年的功夫才恢复了起来；亚·康·

库扎和尼·约尔加领导的民族主义党。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政治活动本身的特点依然如故，即由统治阶级两党轮流执政，那末，本世纪最初十年发生的事件则使执政的两党内部激烈动荡，发生结构上的变革。就自由党而言，这些变革是以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发生的某些事件为背景的。例如，把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前领导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拉进自由党内，使党内的资产阶级派别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引起该党领导内部发生重大变化，而1907年春的事件又愈发加速了这种变化。1909年，资产阶级自由派中具有较先进观点的青年分子代表约·伊·康·布勒蒂亚努被选为自由党的领导人。

同时，保守党也经历了重大动荡。在拉斯克尔·卡塔尔久时期已开始的夺权斗争，在保守党的新党魁格·格·康塔库齐诺和“青春”派领袖普·普·卡尔普之间旗鼓重开。1907年春的事态发展促使这两个保守党头目之间早先就开始的谈判加快结束，结果普·普·卡尔普被选为党的领袖。可是，保守党内的动荡在塔凯·约内斯库领导的派别分裂出去以后才告结束。

我国政党组织结构变化的原因在于1907年农民大起义所造成的形势。面对农民群众的坚决
316 斗争，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首先是采取一些较为激进的措施，以在某种程度上迎合群众日益增长的要求。如果说，保守党直到它自动解散时为止都不曾放弃保护大地主所有制的斗争，那末，自由党则被迫接受了土地改革和选举改革的思想。1913年党纲里写上了土地改革，这是本世纪初的罗马尼亚社会发展，尤其是1907年春全体罗马尼亚农民奋起参加的大起义所促成的。由于在纲领中写进了这些重大项目，自由党成功地接近了农民群众，以便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利用他们。

在这一时期里，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变化是如此深刻，以致可以说从这时起就勾画出了下个时期罗马尼亚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

1900—1907年间的罗马尼亚工人运动

1899年春，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的暂时解散，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组织活动

同时都停止了。职业协会继续存在，经过伊·切·弗里穆和亚·约内斯库改组的布加勒斯特工人俱乐部，仍然是布加勒斯特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核心。

1900—1904年间，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继续进行反剥削斗争，在国家的主要城市——布加勒斯特、布勒伊拉、康斯坦萨和雅西组织了多次罢工。由于无产阶级缺乏组织，罢工运动虽然次数很多，但都未能超出经济要求的水平。

1902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小组《工人罗马尼亚》，并出版同名周刊。在它短短的出版期间（23期），这个社会主义刊物的第一辑在工人中间成功地开展了持续的宣传活动，尽管有时围绕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所发表的文章在他们中间造成了混乱。譬如，对于建立同业公会的职业法（工人和厂主都可以参加的职业组织，其目的是阻止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罗马尼亚》表示赞成，认为它是保护工人当前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

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工人阶级和青年知识分子队伍中人材的涌现作出了贡献，前者如：伊·切·弗里穆、亚·康斯坦丁内斯库、杜米特鲁·马

林内斯库、什特凡·乔治乌，后者如：米·格·布若尔、特·内库卢策、奥托伊·克林、马克斯·韦克斯勒等。其中大多数无论是在1905—1907年
317 的轰轰烈烈的斗争高潮年代，还是在此以后，都站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前列。

1905—1907年间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是通过组织工人行动和罢工、成立第一批工会组织和声援俄国的革命运动而展开的。

这个时期可以提到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行动有1905年的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勒姆尼库—佛耳恰和博托沙尼的制革工人罢工，土尔努—塞维林造船厂工人的罢工，次年的加拉茨工人罢工等。这几年进行的罢工，得到1905年出版的第二辑《工人罗马尼亚》报的支持。罢工仍然主要局限于经济方面的要求。罢工斗争加速了日益不景气的同业公会的垮台。

在革命者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的影响下，工人阶级开始按照职业组织起来，建立起第一批工会。1905年3月，布加勒斯特木匠工会成立，领导人是伊·切·弗里穆。后来，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过程加快了，工业中的大多数劳动部门都

成立了工会。

同时，应强调指出1906年庆祝国王登基时无产阶级所开展的行动。当时，《工人罗马尼亚》小组发表了题为《贫困、奴役和耻辱的四十年》的宣言（克·拉科夫斯基起草），这是一份控诉罗马尼亚统治制度的有力的檄文，同时也是党解散后工人运动的第一个纲领。

同样在这个庆祝年里，举行了第一次工人会议，会上成立了罗马尼亚工会总委员会，其宗旨是促使工会运动集中化。

1905年1月24日，举行了声援俄国无产阶级反剥削斗争的行动。当时，布加勒斯特工人抗议彼得堡大街上的屠杀和逮捕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数日以后，出版了临时性刊物《打倒专制！》，强烈抗议俄国的血腥镇压。

罗马尼亚工人对"波将金号"铁甲舰水手的国际主义态度是声援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有力表现。举行起义反对沙皇制度的俄国"波将金号"铁甲舰水手们，最后不得不要求在我国政治避难，得到罗马尼亚政府允许。

1905—1907年间无产阶级的高昂情绪，一

方面表明1899年工人运动的解体只是在短期内阻碍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显示出我国工人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及其为了达到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的而要求组织起来的坚定愿望。

318 1907年的农民大起义

1907年春季的大起义，就其行动的规模、持续的时间和强度及其波及的范围来说，是罗马尼亚近代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农民斗争。1907年起义是1888年以来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的顶点，是多少世纪来农民争取土地和自由、反抗社会压迫和不公正的运动的必然结果。有着深刻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的起义，是以十九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罗马尼亚的总发展为背景的。

起义的原因

起义以前，尤其是两个世纪交替时期的特点是，我国土地制度的矛盾继续尖锐化。维持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尤其是大量封建残余，促使农村世界中的主要矛盾——地

主和农民的矛盾以最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农民占有的土地不够，迫使广大农民群众向大庄园租地，并缴纳什一税。货币什一税、实物什一税和“劳役”什一税是地租的主要形式。什一税因庄园分布的地区（丘陵或平原）、申请租地的农民数量和订立农业契约的环境而异。契约是载有订约各方义务的基本文件（如果这些契约是在旱灾年或在冬末时期订立的）。一般来说，除契约本身规定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义务，这就是所谓的“陋规”（进献）和正式文件未记录的附加义务。

劳役地租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苛刻，而作为大地主和农民的中间人的佃主的作用则与日俱增，更是火上加油。佃租制度在一些地区几乎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在另一些地区也相当常见，这进一步加深了大地主和农民的矛盾。

除农业契约的苛重条件外，还要加上农民必须缴纳的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及高利贷者利用放债攫取的高额利息。这样的劳动条件，自然使种种疾病——尤其是糙皮病和结核病找到合适的土壤，吞噬成千上万户农民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1907 年农民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被地主和

佃主掠夺去的土地。

319 ## 农民斗争的爆发、开展和形式

1907年2月8日在弗勒门齐村（博托沙尼）爆发的1907年起义，短时间内便扩展到全国各地，从摩尔多瓦北部直到奥尔特尼亚最边远的村庄。

1907年起义有好几个阶段，这是由起义爆发的时刻，或者农民行动的表现形式决定的。

第一阶段：几乎包括整个2月份，其特点是农民骚动日益频繁，尤其是在摩尔多瓦北部各县。在这个时期，农民表面上态度和平，但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却预示着作为1907年3月事件的特点的激烈搏斗的时日。

第二阶段：包括2月末和3月上旬的最后几天，开始进行反对地主和佃主的公开斗争。在这个阶段，农民斗争毫无例外地席卷了摩尔多瓦各县。摩尔多瓦的农民起义虽然未达到我国其他地区所具有的那种强度，但在3月5—10日之间也达到了高度紧张的时刻。3月6日以前，起义保持在摩尔多瓦北部各县境内，此后，农民斗争的汹

涌浪潮一县一县地蔓延开来，席卷了喀尔巴阡山和普鲁特河之间的整个省份。

自3月上旬的最后几天，尤其是从中旬开始，起义中心移到蒙特尼亚和奥尔特尼亚。于是，农民斗争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农民的大规模行动阶段，一直持续到起义被完全镇压下去为止。在这个时期，运动在许多县和同一县的许多乡同时爆发，不再象米尔科夫河北部那样按次序连续开展。例如，在特列奥尔曼、弗拉什卡和奥尔特各县——蒙特尼亚起义声势最大的地区——的起义爆发的同时，勒姆尼库—塞拉特和布泽乌等县的农民也奋起斗争，然后扩展到奥尔特尼亚平原地区和奥尔特河两岸丘陵地区的各县。除后面这个地区的各县外，还有蒙特尼亚东南部的布勒伊拉县和雅洛米察县以及多布罗加的某些地方。

起义的爆发和开展存在不同的阶段，使当局便于把农民斗争处于低潮时期的那些县的军队调往革命最蓬勃发展的地区。

农民群众的斗争在其整个过程中，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形式。写请愿书，在农民大会上讨论请愿书的内容，把它递交国家当局，有时甚至由农民

代表呈递请愿书，这是农民行动的最初形式之一，尤其是在摩尔多瓦北部各县。渐渐地，农民斗争获得日益清晰的轮廓，宣告进入反对剥削者的直接行动。最常见的起义者的斗争形式有袭击和火烧地主、佃主的庄园。袭击庄园，一般是袭击地主
320 或佃主的宅邸和庄园管理处；袭击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要求比较人道的劳动条件；另一方面，破坏他们剥削农民所得的一些财富。后一种目的几乎所有的农民运动都有，是渴望土地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来说，袭击庄园之后，便开仓分粮，分配地主占有的生产工具；在另一些情况下，甚至提出与农业契约所规定的根本不同的劳动条件。大批农民参加行动，有时达数百人，由好几个村庄的起义者组成。

在反抗地主和佃主斗争的同时，出现了起义者袭击乡公所的多次尝试。这里通常存放着契约合同的副本。

凡是发生起义的地方，几乎到处都伴有农民涌进城市的尝试，其目的不是向逃到那里的地主和佃主提出新的契约条件，就是通过这种途径向当局提出有关土地的要求。这种行动发生在摩尔

多瓦的多数城市（博托沙尼、多罗霍伊、雅西、罗曼、巴克乌、皮亚特拉—尼亚姆茨、瓦斯卢伊、胡希、加拉茨），发生在勒姆尼库—塞拉特和布泽乌以及喀尔巴阡山和普鲁特河之间各县的许多市镇（内格雷什蒂—瓦斯卢伊、布胡希—尼亚姆茨、潘丘—普特纳等）。但随着起义席卷蒙特尼亚和奥尔特尼亚各县，城市的安全防御措施开始显效，从3月中旬起，不再有起义的农民群众出现于县城和市镇。

特别是在3月上旬获得成功的涌进城市的尝试以前，农民往往先组成浩浩荡荡的起义者队伍。这些队伍向国家首都挺进——如特列奥尔曼和弗拉什卡的数千名起义者的大军——，向县城或较为重要的市镇（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布勒伊拉、罗肖里—德—维德、伯伊列什蒂、科拉比亚、德勒格沙尼、土尔努—默古雷列）进发，这种行动证明存在着农民的最初组织形式。3月13日以后，由于比较迅速、比较有效的军队干涉，农民更广泛地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受到了阻碍。例如，单单为了守卫首都就集中了一万五千余名士兵，长期守卫的警察还不计在内。

除多数地方的起义者所采用的斗争形式外，还有一些新的形式，如包围、破坏车站和铁路的尝试，这不仅是为了阻止把军队调往其他的起义地区（亚历山德里亚—特列奥尔曼、伯伊列什蒂—多尔日），而且也是为了给将开往暴动地点（阿富马茨和科措芬尼—多尔日）的军队制造障碍。

为了阻止当局了解起义进展情况和推迟派遣军队，农民经常切断电话线（加利恰—马雷、皮耶列什蒂、斯克耶什蒂—多尔日、森杰鲁—普拉霍瓦、布特库列什蒂—特列奥尔曼等）。

321 起义的强度是由种种原因决定的。譬如，起义声势最大的县有弗拉什卡、特列奥尔曼和奥尔特县，这些县在上一世纪末稍早一些时候就成立了第一批农村社会主义俱乐部。

工人站在支援1907年农民起义的前列。工人直接参加起义（帕什卡尼、布胡希和普拉霍瓦河谷的石油区），无产阶级对农业工人的正当要求的声援，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中的先进分子在起义期间的态度，致农民和士兵的宣言，组织抗议镇压的群众大会和集会——这些都证明无产阶级是支持起义的唯一的社会阶级。社会主义运

动对起义的正式方针，是在《工人罗马尼亚》小组在农民遭受镇压时期所制定的题为《致劳工和农民，致大学生》的文告里提出来的。

同起义农民并肩战斗的还有其他阶级和社会阶层的代表人物。例如，在许多情况下，教师，有时甚至神甫也出现在起义农民的队伍中间，这成为促使农民起来斗争的一种推动力。同样，同农民有这样或那样联系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同农民斗争站在一起，公开谴责对起义者犯下的暴行。

起义遭到镇压

当局对起义农民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镇压手段，从利诱招降到成千上万的起义者被残暴地血腥杀害。随着起义日益波澜壮阔，国家当局越来越多地动用军队，这些军队大都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分子指挥，因而不遗余力地野蛮镇压起义者。当军队和起义者发生直接冲突时，后者遭到罕见的残暴杀害，这种情景数不胜数。对近二十个村庄的起义者使用了大炮。发生了斯特内什蒂和特尔纳瓦—弗拉什卡、伯伊列什蒂—多尔日、克勒姆

波瓦亚—奥尔特等地的事件，在这些地方，只是在动用炮兵后才恢复了“平静”。在起义期间和起义被扼杀之后，数千名农民遭逮捕，受审判。起义结束后，还乡地主和佃主对农民犯下许多暴行，他们亲手毒打或杀害参加过起义的人。

对起义的镇压采取了有组织的形式，尤其是在自由党执政以后，全国被划分成军事区，负有明确的镇压使命。

322 起义的反响和意义

起义一爆发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把古老祖国的农民起义事业视为自己事业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民群众，被强烈的动荡卷了进去。位于喀尔巴阡山一带的诸郡当局经常告急说，起义业已开始或正在准备中。

邻近国家的政府（奥—匈、俄国、塞尔维亚）为了防止起义的思想渗入他们国家的农民中去，采取了加强边防的措施。但在这些国家和大多数欧洲国家里，罗马尼亚的农民起义得到了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和公众舆论的一些重要团体的同情。在谈到1907年起义时，弗·伊·列宁写道：“1907

年(春天)的罗马尼亚农民起义,对于改善农民状况所起的作用,同 1905—1907 年俄国的革命一样。"①

1907 年春的罗马尼亚农民起义与我国人民数世纪以来争取民族自由和社会正义的斗争一起,以金光闪闪的大字载入了罗马尼亚人民的伟大史册。起义是罗马尼亚农民生活中的一个特殊时刻,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影响。同时,起义证明,没有一个久经考验的领导人来引导这股巨大的革命力量,农民是经受不住统治阶级对它施加的有组织的压力的。

在 1907 年春季的大搏斗中,农民提供了为争取土地和改善生活而献身于斗争的令人信服的榜样,它们再次表明农民对社会正义的渴望及其斗争的决心和牺牲精神,这是罗马尼亚人民的基本特征。

起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

1907 年春的伟大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真正混乱。害怕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39 卷,第 84 页。

农村群众重新起来，特别是害怕工人阶级同农民联合起来的前景，促使自由党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令，旨在给农村世界带来那怕是暂时的安宁。

具有经济内容的最重要的法律有：农业合同法，目的是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暂时限制一下对农民的剥削；农村基金法，目的在于收购地主自行出卖的私人庄园，并把它们分块出售给农民；反对租佃托拉斯法，禁止租佃四千公顷耕地以上的大庄园。

在起义压力下制订的法律，远远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只要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手里，采用这些
323 法律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缓和农村存在的矛盾和防止发生新的农民运动。对新的“1907年”的害怕愈是厉害，从全国各个角落发出的不满呼声也愈增长。农民的主导思想是拒绝同地主缔结农业合同，或者拒绝从事旧协议上规定的劳动，这很能说明急于制订这些新法令的原因。

1907年农民大起义以后，国家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许多变化。保守党民主派从保守党中分裂出来；自由党更换了领导——党的旧头目德·阿·斯

图尔扎被约内尔·伊·康·布勒蒂亚努所代替；改名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阶级政党重建了，——这些都说明了紧接起义之后的数年里罗马尼亚政治生活的趋向：大地主阶级的政党逐渐削弱，并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自行解散；资产阶级在自由党领导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工人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1907年的大搏斗尽管没能给罗马尼亚的社会发展带来新的进展，但是可以说，下一个时期发生的许多变化都可在英勇的1907年春天发生的事件中找到根源。在起义进行期间，工人阶级认识到了农民的革命潜力，这对无产阶级组织和领导未来的斗争行动是一个重要的经验。

1908—1910年间的工人运动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重建

自1907年下半年开始，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开展了坚持不懈的组织工作。工会数目的增加、《工人罗马尼亚》小组的扩大和巩固，证明无产阶级日益积极地出现于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庆

祝“五一节”的工人集会和游行示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而罢工运动则迫使厂主向工人作出新的让步。

1907年6月底和7月初，在加拉茨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工会和社会主义小组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加强斗争的必要性。根据大会所作的建议，1907年秋成立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联盟，它把我国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直到党重建为止。数月之后，1908年1月举行了第三次全国工会和社会主义小组代表会议，会上通过了社会主义联盟章程和罗马尼亚工会总章程。

324 工人进行了一次反对奥尔列亚努法（1909年）的持久运动，该法令禁止国家职工结社和罢工的权利。

在反对这项法令的一次盛大的抗议集会上，与会者于1909年12月19日决定重建罗马尼亚工人阶级的阶级政党。

为此目的，1910年1月31日重新建立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同工会代表大会一起召开。

大会日程上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通过党纲。这次通过的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要求，就其内容而言，是当时最全面、最先进的政治纲领。纲领的政治要求有：授予年满20岁的全体公民，不分性别、宗教和民族，以普遍的、平等的秘密选举权；民主自由；妇女权利平等；免费教育；直接税和按比例纳税等。比较重要的经济要求有：集体合同，八小时工作制，保护童工和女工，星期日休息（不扣工资）等。同时还讨论了一个纲领草案，包括农民的一系列要求：取消农业中的一切封建残余，赎买大地主的部分庄园，等等。

1912年夏，举行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罗马尼亚代表外，还有巴尔干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其中有格·季米特洛夫。大会主要讨论了党的策略问题。

重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对我国工人运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有助于组织工人阶级的斗争。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自称是“社会主义老根上的新芽”，它领导了工人活动，并对作为罗马尼亚最先进的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的日益壮大作出

了贡献。

巴尔干战争

1912年，直至当时还没能从奥斯曼帝国获得独立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黑山人的民族解放斗争，促成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彻底消除土耳其在欧洲这个地区的统治。巴尔干各国人民的团结战斗，在短时间内打败了土耳其，迫使它求和。

战争停止以后，在反奥斯曼战争中结盟的巴尔干各国政府之间出现了一系列领土方面的争执。这一次，以保加利亚为一方，其他国家为另一方，爆发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就其目的而言，这次战争对所有参战国来说都是一次非正义的战争。

325 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罗马尼亚保守党政府同反保加利亚同盟国站在一起。1913年6月，罗马尼亚军队跨过多瑙河，但没有进行真正的军事行动。

保加利亚军队在同巴尔干其他国家的战斗中孤军作战，被迫投降。按照1913年缔结的布加勒

斯特和约，马其顿一部分地区从保加利亚划归塞尔维亚，而土耳其得到了阿德里安堡。称为四边形地区（卡德里拉特尔）的多布罗加南部地区，划入罗马尼亚国家版图。

对外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具有若干特点。如果说在对外政策总方针方面，罗马尼亚与三国同盟的关系遵循既存的秘密协定继续发展，那末，随着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的临近，接近协约国的倾向越来越露形。在伊·伊·康·布勒蒂亚努当上民族自由党首脑以后，这种倾向日益明显，这主要是由罗马尼亚人民要求实现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愿望所决定的。这一愿望席卷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并使公众舆论的呼声日益被听取。

就地区范围而言，罗马尼亚为维护巴尔干半岛的均势而斗争。为此，罗马尼亚的当权者们奉行一种灵活政策，而奥斯曼帝国的不断削弱，加上热中于在欧洲这个地区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扩大势力的欧洲两强——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既存

分歧，给这种政策造成了很大方便。

特兰西瓦尼亚从备忘录运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发展（1894—1914年）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发展

除了1900年前后的经济危机外（其严重影响在特兰西瓦尼亚表现为：生产下降、失业等），从上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段时期的特点是经济普遍发展，大工业和一些轻工业部门的发展较为显著。这样，1910年的煤产量已经达到二百五十万吨以上；1900年洪尼多阿拉生产了约七万吨钢；1900年平均拥有一百名职工的轻工业企业有三百七十九家。铁路线长达四千公里。

326 1900—1914年间，工业企业的数目增加了将近66％。拥有大量工人的企业有：国营铁路公司（奥—匈国营铁路公司），尤其是雷希察的一些企业；其次是日乌河谷煤矿、阿拉德车辆厂、洪尼多

阿拉和克兰等地的工厂,等等。在特兰西瓦尼亚,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是在特殊条件下进行的。由于奥—匈帝国的统治、对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依附和农业中还保存的封建残余,特兰西瓦尼亚的经济落后于奥—匈帝国西部各省的水平,但与巴尔干国家相比则较为发达。奥—匈统治阶级赋予特兰西瓦尼亚以次要地位,把它的经济从属于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结果造成各经济部门的片面的、不平衡的发展,而就整体来说,造成了落后。在这个时期,除奥、匈资本面外,外国垄断资本(德、法、比)大量渗入特兰西瓦尼亚经济,本地资本被挤到了第二位。当在国际上,也包括奥—匈帝国,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时候,处于落后经济状况中的罗马尼亚人地区(包括特兰西瓦尼亚在内),就成了帝国主义垄断组织之间瓜分和争夺的对象。垄断组织剥削劳动群众面攫取来的利润,不是用来投资于特兰西瓦尼亚,面是用来扩大奥、匈、德等国资本家的积累。

由于广泛使用雇佣劳动,推广农业机器,农民日益急剧分化,因此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在继

续进行。在特兰西瓦尼亚西部(自塞特马尔、克里沙纳西部直到阿拉德的蒂萨平原部分地区),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二十世纪初,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农业中还保留着强大的封建残余(地主占有40%的土地,实行劳役等等)。农民严重缺少土地。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增长的速度,这对整个经济和人民群众状况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特兰西瓦尼亚比奥—匈帝国的其他省份落后,也表现在从事农业的人口和从事工业、商业、运输等行业的人口的比例上面。

二十世纪初,金融部门得到很大发展。它的主要活动是在农业中发放贷款,利用农民破产所造成的状况来买卖土地。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札尔银行同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大银行之间的利益休戚相关,罗马尼亚金融资本受到损害,并受国家措施的限制。1899年,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六百八十八家银行中,仅有七十二家是罗马尼亚的。主要的罗马尼亚银行是《蜜蜂》银行。

327 尽管奥—匈统治阶级设置重重障碍,但特兰西瓦尼亚同老罗马尼亚的经济联系得到了不断的发展。这种自然的联系表明罗马尼亚人民的经济

生活的统一性，并成为促使它发展的动力。

社会和民族结构

工业发展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无产阶级——就其成分而言，则是大工业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增加。阿拉德、布拉索夫、蒂米什瓦拉、奥拉迪亚、克鲁日等城市成为工人运动的强大中心。无论是从工资还是从工作日和其他劳动条件来说，工人的处境是困难的。在这一时期，失业和工伤事故日益增多。各族工人一齐起来反抗社会剥削和民族压迫。

特兰西瓦尼亚三分之二以上的居民是农民，而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农，是罗马尼亚族人。由于缺少土地和农具，由于封建残余，由于地主和富农的剥削以及苛重的税收政策，农民濒于破产，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从而壮大了农业无产阶级的队伍。二十世纪初，特兰西瓦尼亚农民大量移居老罗马尼亚，特别是移居美洲的现象日趋严重（在十五年内共移居约二十七万人）。这种现象说明对群众剥削的程度。占特兰西瓦亚尼人口绝大多数的罗马尼亚人遭受社会和民族压迫的双重奴

役（工资比较低、工作日比较长、罗马尼亚语学校被关闭等）。特兰西瓦尼亚的大多数地主和资产阶级是马札尔族人，他们坚持维护奥—匈二元帝国的利益。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虽然受到限制，但也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在金融方面。根据1910年匈牙利的人口统计数字——尽管它也掩盖事实——特兰西瓦尼亚居民总计五百二十五万人，其中罗马尼亚族人占53.8%，马札尔族人占28.6%，日耳曼族人占10.8%，等等。

在备忘录运动以后的时期里，民族压迫加剧了。从历史角度来看，民族解放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目标，是整个罗马尼亚民族的事业，一切社会阶级的事业，同时也是一项民主事业，各族人民谅解的事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正处在蓬勃兴起中，正在依靠人民群众为夺取政权而斗争。

328

工人运动

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社会力量，它为了消灭

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民族压迫而奋斗。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特兰西瓦尼亚组织，不论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发展。它们领导了雷希察(1897，1899—1901年)、阿尼纳(1897年)、克鲁日、布拉索夫、阿拉德(1904年)、奥拉迪亚、蒂米什瓦拉、卢戈什(1905年)、斐迪南(现称红钢)和佩特罗香(1906年)等地的矿工、冶金工人、印刷工人、铁路工人、建筑工人的大罢工斗争。军事当局进行的粗暴干涉，有时发展到屠杀，结果是数十名工人被杀害，数以百计的人被打伤(阿尼纳、斐迪南、佩特罗香)。在为争取普选和支持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5年)等运动中，在“五一”节的时候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工人报刊和社会主义报刊得到显著的发展。早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在阿拉德和蒂米什瓦拉就分别出版了匈文和德文刊物；此外，在1903年，特兰西瓦尼亚又出版了第一批罗文的社会主义报刊，其中最重要的是《眞理报》。此时，另一些社会主义报刊用匈文在克鲁日、奥拉迪亚和特尔古—穆列什等地出版。但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及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组织和

工会思想上受机会主义观点控制，这是第二国际各党所特有的现象，尤其是在恩格斯逝世后（1895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独特表现是接受奥托·鲍尔和卡·伦纳等人炮制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思想限制并在事实上阻挠被压迫民族通过自决解决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具体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尚未在社会主义政党的纲领里得到彻底的澄清。

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工人斗争的觉悟和组织水平的提高，决定了1905年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支部的成立，该支部的领导人有阿乌雷尔·克里斯蒂亚、伊·克雷楚等先进分子。《真理报》成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支部的机关刊物。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人运动同老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不仅对提高阶级觉悟，而且对深刻理解整个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在争取建立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应负的使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些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所持的先进立场，促进了特兰西瓦尼亚工人运动的发展。这种联系在罗马尼亚支部成立后更为加强。工人罗马尼亚小组的领导人

伊·切·弗里穆、米·格·布若尔等人出席了该支部的历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了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相结合的必要性，对加强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统一性作出了贡献，并且显示了指导罗马尼亚无产阶级斗争的团结精神。总的来说，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革命高潮，1905—1907年是它的顶峰，接着而来的低潮持续到1910—1911年。

以无产阶级为首的特兰西瓦尼亚劳动群众反对奥—匈统治阶级准备战争的斗争，在1911— 329
1914年间获得特别大的规模。罢工运动的政治性增强了，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总罢工愈来愈被用作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仅在蒂米什瓦拉，1912年5月总罢工时就有一万八千多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统治集团实施针对人民群众的非常法令。随着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的逼近，工人阶级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斗争精神。1913—1914年间，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人斗争几乎日复一日地连绵不断。镇压措施和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的态度暂时挫伤了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

农民运动

农村矛盾的尖锐化激起农民，首先是农业无产阶级和贫农斗争。这些动乱和斗争形式是各式各样的：抗税，收割期罢工和其他农业劳动罢工，地方性的起义。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有巴纳特和马拉穆列什的1899年的森塔纳（阿拉德）起义、1903年的比霍尔和阿拉德起义、阿列什德大运动（1904年）。在森塔纳、阿列什德等地，军队向起义者开枪，打死数十名农民。

早在上个世纪末（当“农村社会主义”运动兴起时），社会主义思想就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贫农中间得到传播，这促进了农民斗争的激化。

1907年罗马尼亚农民大起义在特兰西瓦尼亚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反响。这不仅表现在当时具有各种倾向的报刊和出版物上，而且还表现在特兰西瓦尼亚农民运动的加强上。

政治生活

二十世纪初，由于备忘录运动以后的工人和农民运动水平的提高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二

元政体的危机加深了。

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民族党经历着从政治上得到巩固的过程，它比前一时期较多地依靠群众。它是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政党。同时，鉴于在上述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罗马尼亚民族党是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组织。

罗马尼亚民族党，因“合作”策略和“不合作”策略之间的老分歧而动荡不定，但由于伊昂·拉齐乌、瓦西里·戈尔迪什、阿乌雷尔·弗拉德、扬·鲁苏—西里亚努等领导人的活动，朝着采取“新合作”策略的方向发展，1905年在锡比乌举行的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纲领批准了这种策略。根据这 330
一纲领，罗马尼亚民族党重新投入选举斗争，并取得一些成绩，但没过几年，反动派便采取了严厉措施阻止各民族进入布达佩斯议会。这就是罗马尼亚民族党参加争取普选的政治运动，提出一些有利于农民的有限措施，或者甚至一度接近过社会主义运动，并与它在同一纲领上携手合作的原因。渐渐地，罗马尼亚民族党内部自称“老练青

年”的一个派别，日益激烈地反对该党领导的无能。这种纠纷损害了民族运动，它们既出自个人野心又常常表现出不坚持原则，造成罗马尼亚的地主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的缝隙。这些动荡的高峰是 1910 年阿拉德的《论坛报》和《罗马尼亚人报》之间的冲突；冲突以两家报纸合并为《罗马尼亚人报》而告终（经理瓦·戈尔迪什的机智有助于平息冲突）。1911—1914 年间，罗马尼亚民族党同意与匈牙利政府进行谈判，但由于极端反动分子蒂萨·伊斯特万伯爵所代表的马札尔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集团的态度，谈判未能达成一项妥协。谈判涉及到选举、修改 1907 年阿波尼教育法等问题。参加谈判本身就是罗马尼亚民族党的一个政治错误，受到特兰西瓦尼亚和老罗马尼亚激进派的许多代表人物的批评。同时，罗马尼亚民族党领导中的少数人，以阿乌雷尔·康·波波维奇和亚历山德鲁·瓦伊达为首，倾向维也纳宫廷，把希望寄托在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炮制的哈布斯堡王朝的联邦制改革计划上面。

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民群众和大多数中小资产阶级都向往罗马尼亚，这一派的代表

人物有瓦西里·戈尔迪什、扬·鲁苏一西里亚努、奥·戈加、瓦·卢卡丘、埃米尔·伊萨克等人，其中有些人后来越过喀尔巴阡山，在布加勒斯特献身于民族事业。

二十世纪初的特兰西瓦尼亚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为人民群众争取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的斗争的胜利结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罗马尼亚

国际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性质

1914年7月15日，由于奥一匈进攻塞尔维亚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侵略者制造的借口是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即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夫妇被一名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奥—匈—塞冲突一发生，列强就各自根据当时在欧洲已存在的联盟体系所确定的利益，认为已进入战争状态。俄国下令动员其全部军队；德国对俄宣战，入侵比利时，331
进攻法国；英国宣布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仅仅

在几天的时间里，二十八个国家被拖入了冲突，不是站在两大交战集团的这一方就是站在那一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帝国主义性质，这是由交战列强争霸世界的野心所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它们为了重新瓜分世界、攫取新的市场和殖民地、掠夺附属国而进行争夺的结果。这种争夺是如此激烈，以致战争的爆发早已成为不可避免，当时直接的政治形势只不过决定了宣战的时机而已。

对两个阵营内部进行的战争准备，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党的领袖们站到了不同的立场上。如果说从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举行的斯图加特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来看，大多数社会党还谴责了帝国主义战争，那末，随着冲突的爆发，一些社会党的领袖就背叛了大会确定的原则，站到了虚伪的爱国主义立场上，投票赞成了战争拨款。这些党所采取的立场，实际上意味着第二国际开始破产。

弗·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站在彻底反战的立场上。根据列宁的倡议，1915年和1916年于齐美瓦尔得和肯塔尔召开了代表会议，会上

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真实目的，并且谴责了第二国际所属各国社会党领导人所采取的态度。

武装中立时期的罗马尼亚工人阶级的反战斗争

战争的爆发使我国各政治集团感到有些意外，它们虽然认为大规模的战火不可避免，但不认为事态发展会如此神速。我国在政治上，尤其是在战略上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交战双方从战争爆发时起就竞相给罗马尼亚许下种种诺言，有时甚至施加压力，进行威胁。

面临列强竭力拉罗马尼亚站在军事集团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我国执政集团不顾国王卡罗尔一世和普·普·卡尔普领导的保守派的明显的亲德态度，决定采取和维持中立态度。这个时期使我国公众生活的领袖们有可能在复杂的外交谈判中周旋于两个集团之间，以便取得尽可能大的利益。

我国的战略地位和政治形势说明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因为我国处于两个战争营垒之间，而它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

在外交谈判同时，国内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 332

游行，目的在于强调把特兰西瓦尼亚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民族事业的正义性。文化同盟在动员群众参加建立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团结了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但都受建立完整的罗马尼亚这个伟大理想鼓舞的）公众生活的领袖。其中有康·伊·伊斯特拉蒂、伊·康塔库齐诺博士、尼·约尔加、尼·蒂图列斯库、巴·什·德拉弗兰恰、奥克塔维扬·戈加、瓦西里·卢卡丘等人。

在一些激动人心的群众大会上，主张为解放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而参战的呼声愈来愈强烈，促成了作出最后决定。此外，推动作出这一决定的还有：同协约国的秘密谈判——谈判就满足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的愿望作出了承诺；意大利参战反对中欧列强；由于以尼古拉·菲利佩斯库和扬·拉霍瓦里为首的协约派的组成而在保守党内产生的分裂；最后则是俄军在东部战线上取得的军事胜利。

同列强进行的外交谈判从1916年起开始获得日益明显的轮廓，表明罗马尼亚倾向协约国。1916年8月4日（公历17日），在布加勒斯特签

订了以罗马尼亚为一方，俄、法、英、意为另一方的同盟条约和军事协定。

条约的主要条文涉及罗马尼亚的未来边界线和保证我国与盟国一起参加和会的权利。军事协定确定1916年8月15日（公历28日）为罗马尼亚参战的日期，并规定盟国在军事方面应承担的一系列义务。

中立年代对罗马尼亚工人运动来说，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上显露锋芒的年代。社会民主党站在第二国际左翼，同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的党站在一起，对组织齐美瓦尔得会议起了重要作用。党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日益增长，这使它能在1914—1916年间组织许多反战行动、示威游行和罢工，这些斗争超越了经济范围，转变成为真正的政治斗争。全国各个工人中心都展开了这种斗争。这几年的工人行动的高峰是1916年6月13日在加拉茨举行的可志纪念的斗争。在这次斗争中，以斯皮里东·弗伦恰努和帕斯卡尔·扎哈里亚为首的九名工人惨遭杀害。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的同时，主张解决中心问题——建立统

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表达了喀尔巴阡山两侧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他们为了实现罗马尼亚人民的国家统一而奋斗，并认识到这种统一要通过革命途径来实现。1918年秋季，在中欧列强失败和革命普遍高涨的条件下，这将是可能的。

333

罗马尼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根据同协约国签订的协定规定，1916年8月14日，罗马尼亚对奥—匈宣战。从那时起，不言而喻，它也同奥—匈的盟国——德国、比利时和土耳其处于战争状态。

虽然罗马尼亚站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两个营垒中的一边，但它不是为了争夺外国领土和重新瓜分世界，而是为了实现罗马尼亚人民多少世纪以来的愿望——把罗马尼亚的全部领土统一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而参战。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指出："罗马尼亚社会各阶级和人民群众深切关心的问题，是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罗马尼亚人民多少世纪以来的愿望，罗马尼亚社会发展

的合乎规律的需要。”

罗马尼亚通过她参加战争，通过她的军事努力，通过她数十万最优秀儿女的牺牲，对打败中欧列强，对摧毁奥—匈帝国，也就是说对解放处于它占领下的各国人民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罗马尼亚战线上的第一次战役

根据罗马尼亚指挥部制订的作战方案，并经与盟国商定，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大多数——约四分之三——在喀尔巴阡山全线发动进攻，以解放特兰西瓦尼亚，其余兵力是掩护同保加利亚接壤的边境，直到俄国一个军抵达多布罗加为止，然后在鲁斯丘克—瓦尔纳一线发动进攻。罗军在两线作战，加上装备不足，使罗马尼亚指挥部的任务异常艰巨。

1916年8月14—15日夜间，罗军沿着从摩尔多瓦北部起到多瑙河为止的喀尔巴阡山一线发起攻势。仅在几天时间内，罗军就深入特兰西瓦尼亚，解放了布拉索夫、圣格奥尔基、格奥尔基尼、梅库里亚—丘克和奥尔绍瓦。解放者的部队所到之处，都受到特兰西瓦尼亚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

但由于多布罗加战场上发生的事件，罗马尼亚指挥部被迫中断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进攻。

在南部战线上，罗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与敌人相比处于无可比拟的劣势。由于根据军事协定规定要占领多布罗加阵地的俄军行动迟缓，军事形势越发困难。此外，协约国曾一度放弃过在巴尔干发动进攻的打算，因为这种进攻会导致在欧洲这一地区开辟一个新战场，会调动敌人的部分力量。在这种情况下，罗军未能挡住图尔图卡亚的德、保、土军的连续攻击，因而不得不退却。

334 这时，新的部队从欧洲各条战线上调至特兰西瓦尼亚，其意图是想使罗马尼亚尽快地退出战争。德国第九军团——德国指挥部授予它这项任务——，在特兰西瓦尼亚战场上发动了强大攻势，罗军在敌人不断施加的压力下，被迫沿山区一线撤退。在沿中喀尔巴阡山和南喀尔巴阡山一带的山区进行了激战，达维德·普拉波尔杰斯库和扬·德拉加利纳两位将军在战役中英勇牺牲。敌人想通过奥伊图兹山口深入摩尔多瓦的企图，由于埃雷米亚·格里戈雷斯库将军指挥的部队勇敢抵抗而遭到失败。但是，敌人在日乌河谷成功地强行

越过喀尔巴阡山，这使它可以组织向东南方向的进攻，以便占领首都和使罗马尼亚退出战争。这一攻势是与奥尔特河谷和多瑙河上的济姆尼恰城地区的两次强大的攻势同时进行的，这后两次攻势具有同样的目的。尽管在特尔古一日乌和尼亚日洛夫河谷的可志纪念的战役中，罗马尼亚士兵勇敢抵抗，但首都及约三分之二的国土于1916年底同时被侵略军占领。

造成这种形势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欧列强经过两年战争之后经济枯竭，它们集中全部力量来占领我们这个盛产粮食和石油的国家，另一方面是由于盟国没有全部遵守他们在我们参战前夕缔结的协定中所承担的军事义务。

除了敌人的推进所造成的危险外，一部分平民、绝大部分民政当局和全部兵力都撤到了摩尔多瓦。向国家这个地区的撤退，造成许多物质损失。烧毁油库，破坏不能运往摩尔多瓦的工业设施和装备，破坏铁路和粮库，这些都促使国家的经济状况恶化。

对自然财富的有计划的掠夺，人民被迫担负名目繁多的义务，形形色色的差役和征发，加上维

持将近五十万敌兵的义务，使国家经济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摩尔多瓦，情况同样困难。从被占领区逃来的难民以及本来集结于前线或内地的罗军和俄军都集中到了这一小块领土上；夺走成千上万人生命的传染病，都加速了国家经济状况的恶化。

战争的全部重担落在城乡劳动群众的肩上。工业企业的军事化，工作日延长，稍有差错就招来常见的惩罚，与日俱增的通货膨胀，缺少衣服鞋袜，缺乏劳动力的农户的不断破产，所有这些都增加和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

335 与绝大多数人民的痛苦相反，统治阶级利用一切机会大发横财，从商业、金融投机事业、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中攫取巨额利润。这些加深了资产阶级、地主同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

罗马尼亚战线上的第二次战役，默勒什蒂、默勒谢什蒂和奥伊图兹战役

1917 年冬季和春季的几个月被充分用于改编军队和恢复军队的战斗力。用盟国按照同盟条约规定所提供的作战物资装备军队，根据现代战

争的要求训练部队，增强了不久即奉召去驱逐敌人和解放被侵占的土地的我军战斗力。早在1916年秋季就来我国的法国军事代表团，也对改编军队作出了贡献。

当罗马尼亚进行这些准备时，敌人阵营也采取了重要措施，以便发动攻势，给罗—俄军队造成强大压力，从而能同加里西亚的奥—德部队汇合。

1917年7—8月在默勒什蒂、默勒谢什蒂和奥伊图兹进行的战役，在罗马尼亚人民为保卫自由和独立而长期奋斗的历程中占据光荣的地位。1917年夏天，我军同俄军合作所取得的胜利远远超出地区性胜利的意义，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中欧列强作出了重要贡献。对祖国的热爱、解放被侵占土地的深切愿望和罗—俄军队在指挥上优于敌军，是激发罗马尼亚士兵的英雄主义和无可估量的战斗力的主要因素。在这些战斗的枪林弹雨中，上尉格里戈里·伊格纳特、日乌的女英雄埃卡特琳娜·特奥多罗尤、下士穆沙特同我国人民的千万名英勇的儿子一起英勇牺牲了。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全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罗马尼亚的反响

以伟大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的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把它运用于俄国的具体情况，领导地球上六分之一的劳动群众对旧社会制度发动了胜利的进攻，破天荒第一次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可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光辉事件唤醒了亿万劳动人民，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纪元。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首先在于它创立了一
337 个新制度，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对抗本身的必然产物。

象在世界各地一样，促使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事件在我国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我国最边远的角落，人们举行大规模的声援游行迎接革命的胜利。在一份恰如其分地反映我国革命情绪的宣言里这样写道："统治阶级滚开"……"我们要求全民选举的制宪会议决定社会共和政体，把

庄园分给农民，没收财产、工厂和一切生产资料”。

在伟大的十月的日子里，许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战士同奥—匈军队里的罗马尼亚士兵——俄国集中营的战俘一起，为无产阶级取得最伟大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战争尽管有其不幸的后果，但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以致伟大十月的革命思想将找到能萌芽的合适土壤。在各地，列宁签署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引起了舆论的广泛拥护。

1917 年底和第二年的特点是在城市和乡村都进行了许多革命行动。工人的经济要求常常同政治要求结合起来，这就给予它们更深刻的革命内容。矿工、石油工人、铁路工人和印刷工人从全国各个角落里起来争取比较人道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值得提出的是 1918 年 3 月和 8 月的铁路工人总罢工、同年 4 月的科默内什蒂矿工罢工、7 月的雅西印刷工人罢工等。在罢工斗争的同时，还进行了改组工会的活动。工会的活动在战争年代，或者说在国家当局采取镇压措施之后曾受到很大的阻碍。

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时，农村也发生了轰轰烈烈的、连续不断的运动，这些运动大都是由于缺少土地或者农民被迫应付的义务劳役制而引起的。农民采用各种形式：从拒绝耕种地主的土地到占领和分配地主庄园，表示他们对社会正义的渴望和坚定不移的斗争决心。

1917 年底和1918年的罗马尼亚

1917 年底，罗马尼亚的军事形势变得非常困难。国内的困难——各种物品缺乏，弹药和粮食储备减少，这一年夏季的战斗和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的疾病致使兵员减少——，加上盟国阵营中新出现的情况：苏联政府同中欧列强签署停战协定的意向，协约国的新成员国——美国由于政
337 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对罗马尼亚所表示的保留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各政治集团开始越来越多地考虑签订停战协定。

罗马尼亚不顾主张罗马尼亚军队和政府撤到俄国南部以继续进行战争的盟国的反对，于 1917 年 11 月底同中欧列强开始进行停战谈判。1917 年 12 月在福克夏尼签订了停战协定。

继福克夏尼停战协定之后，缔结了同中欧列强单独媾和的和约。尽管单独媾和在我国统治集团内部遭到强烈反对，但是亚·阿维雷斯库考虑到当时的条件，经过数月的谈判，缔结了布弗蒂亚和平预备条约。按照该条约的规定，罗马尼亚必须把多布罗加割让给中欧列强，承认变更奥—匈边界上的一系列领土的主权，复员大部分军队，辞退参加罗军整编的盟国军事代表团全体人员。1918年4月24日，亚·马尔吉洛曼领导的新政府于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和平条约，当代人称之为“无耻和约”，它留给罗马尼亚的仅是形式上的独立。总的来说，布加勒斯特条约保留了布弗蒂亚预备条约早已确定的条件，只是关于多布罗加的占领条例有若干不同，并加重了经济条款，这些条款实际上把罗马尼亚置于中欧列强的直接控制之下。

比萨拉比亚——1812年被并入沙皇俄国的领土，于1918年初进入罗马尼亚版图。

我国处于布加勒斯特和约体制的控制之下，直到1918年秋，那时，随着德国的战败，和约被废除，罗马尼亚才重新加入协约国行列，并同它们一

起战斗到战争结束。

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联合，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完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特兰西瓦尼亚形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奥—匈统治阶级对此也负有严重的责任——，使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社会和政治矛盾恶化到顶点。工农业生产下降，征发运输工具、食品等前线必需品，日用品价格飞涨，企业军事化，实施战时非常法令，这些都促使人民群众的状况显著恶化。

战争爆发时采取的一些措施，在罗马尼亚参战以后更是变本加厉，例如，限制罗马尼亚农民购
338 买土地的权利，限制选举权，通过文化途径加紧非民族化活动，等等，无不明显地打击占人口多数的罗马尼亚人。战争发生后，以瓦西里·卢卡丘和奥克塔维扬·戈加为首的一批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领袖迁移到罗马尼亚，在这里，为了统一事业，为了加强自由的祖国的罗马尼亚人和仍处

于外国统治枷锁下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兄弟联系而奋斗。

在战争的头两年里，作为对罗马尼亚中立立场的反应，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统治集团竭力争取罗马尼亚在军事冲突中站到他们一边，但并不采取任何措施改善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的处境。相反，政党（罗马尼亚民族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支部）的活动及其机关刊物被停止。随着战争的延长，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每天夺去越来越多的人的生命，破坏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而那些在这场大屠杀中发财的军火厂主、地主、商人等的利润则有增无已。所有这些都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不满。

1916年8月，罗马尼亚参战，站在协约国一边。紧接着，罗军越过喀尔巴阡山各隘口，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民中间激起巨大的热潮；对于罗军的节日般欢乐的欢迎，表达了人们在面临从长期压迫下获得解放时的兴奋心情。但这一时刻的真正到来被不利于罗马尼亚的军事行动推迟了。蒂萨伯爵领导的匈牙利政府利用罗马尼亚参战加紧了对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

压迫。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叛变”和“煽动”反对匈牙利国家的指控下被逮捕、审讯和关进集中营。罗军撤退之后，迫害和恐怖手段的恶浪扑向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迫使许多人逃过喀尔巴阡山。

人民群众对战争的抗议采取日益激烈的形式。1916年5—6月的日乌河谷矿工的声势浩大的罢工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时刻之一；其重要性就在于它大多发生在专门供应前线的工业生产部门，和它的特殊的规模：除无产阶级的行动外，还有农民的骚动，小资产阶级和城市群众的不满等。所有这些表现，在1917年，即奥—匈帝国衰弱和崩溃的征候变得日益明显的时候，显著加强了，并发展成为争取和平、面包、普选、民族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群众性的政治示威游行。1917年2月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反响；特兰西瓦尼亚的“五一节”庆祝活动；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都促进了进步力量争取社会正义和民族自由斗争的发展。在十月革命——它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社会主义时代——中获得胜利的列宁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在

特兰西瓦尼亚找到良好的活动场所，其原因就在 339
于首先由这里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事实决定的特殊的国内形势。

1917年12月，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谈判中，苏联代表团提出必须废除奥—匈帝国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吞并。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传入特兰西瓦尼亚的途径之一就是在俄战俘的遣返。

1918年，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民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民族自决的时刻——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的临近。奥—匈帝国无论从外部——战场上的军事失败——还是从国内愈来愈广泛的革命运动来说，都遭到日益猛烈的打击。1918年1月和6月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总罢工，也席卷了特兰西瓦尼亚。工会运动迅速恢复起来，把各民族的工人团结在共同的组织中。继党的活动于1917年夏季恢复和《真理报》于1917年10月1日复刊之后，1918年5月举行了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支部代表大会。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工人和农民运动，军队的瓦解和前

线的失败，这些因素决定了腐朽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民族自决原则在欧洲这一地区的胜利。

1918 年秋季的事件

争取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的长期斗争的胜利结局的临近，要求罗马尼亚人民的一切社会和政治力量团结起来，并要求国内与国外的行动协调一致。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倡议同罗马尼亚民族党一起成立民族委员会后，1918 年 10 月 18 日，把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民实行自决的决定通知了布达佩斯议会。早在 10 月 13 日，由集中在布达佩斯军火工业里的数千名罗马尼亚工人以及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参加的群众大会，就有力地宣布了罗马尼亚人有同其他被压迫民族一样的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要求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和布科维纳脱离奥一匈帝国。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统治集团绝望挣扎，妄图采取种种邦联计划挽救帝国的领土完整，但由于各国人民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意志坚定不移，它们的计划未能得逞。一大批罗马尼亚侨民在自己的民族委员会的指导下，以巴黎为中心，在法、意、英、美和瑞典等国从

事活动；这批侨民由罗马尼亚各省——自由的或被奴役的——代表人物组成，这样就象征着完成民族国家统一的时刻的临近。在俄国的许多战俘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和布科维纳人，他们也在国外申述要求民族统一的愿望，并且成立支队，其中有些在默勒谢什蒂战场上同中欧列强进行过战斗。1918年10月和11月间，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 340
愿望的正义性得到法、美、英、意等国政府的正式承认。10月底，在布达佩斯成立了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由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六名代表——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该委员会是在他们倡议下成立的——和罗马尼亚民族党的六名代表组成。委员会立即发表了告罗马尼亚人民书。几天之后，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在阿拉德设立了本部，取名罗马尼亚中央民族委员会——民族解放斗争最高领导机关，这是全体罗马尼亚人民、一切社会阶级的切身利益所在。每个阶级或社会阶层，每个政治集团都希望通过与罗马尼亚联合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没能阻止全体人民的统一意志的强烈表现。

10月31日，布达佩斯发生了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迁到阿拉德，加紧组织地方的民族委员会和国民卫队。1918年11月初，罗马尼亚民族党的机关刊物《罗马尼亚人》在阿拉德复刊，它和社会主义报纸《真理报》和卢戈什的《旗帜报》都是罗马尼亚中央民族委员会的官方机关报。人民群众的革命动荡表现为：大量的罢工行动，政治示威游行，成立工人委员会，农民运动；这些行动遍及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在巴纳特、穆列什河谷、日乌河谷、西山、布拉索夫、锡比乌、特尔古—穆列什等地尤为强烈。这场斗争旨在推翻国家政权和军事当局，废除封建残余和大地主所有制，实现民主自由，首先是普选；通过特兰西瓦尼亚脱离奥—匈帝国而获得自决权，并同罗马尼亚统一；建立和平。旧的匈牙利国家——社会剥削和民族压迫的主要工具，于1918年11月初被摧毁。1918年11月13—15日，罗马尼亚中央民族委员会的代表团同民族部长亚西·奥斯卡尔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在阿拉德进行了谈判。匈牙利方面实际上希望把特兰西瓦尼亚置于布达佩斯政府的权力之下，因此谈判破裂。罗马尼亚中央民族委员会发表告世界人民书，把这次破裂

的原因公诸于公众舆论，并开始接管罗马尼亚人居住地区的行政权。在漫长的历史上，马札尔族和日耳曼族的工人和农民，同罗马尼亚族的人民群众一起，遭受剥削并进行反抗剥削者的斗争；他们没有被反动的沙文主义分子煽动纷争的尝试所迷惑。例如，在特尔古—穆列什，安塔尔菲教授主持的马札尔民族委员会一开始就同罗马尼亚当局取得了联系，并沿着合作和历史所迫切要求的谅解的现实主义轨道前进。

阿尔巴—尤利亚大国民议会的历史性决定

11月15日宣布，1918年12月1日在阿尔巴—尤利亚召开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议会由一千二百二十八名代表组成，其中六百名待选。阿尔巴—尤利亚议会显示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全体罗 341
马尼亚人民不可动摇的意志，代表了一切阶级、团体和不同职业、信仰的人们，团结起来实现许多世纪以来的愿望。在会议前夕，社会主义报纸《真理报》这样描写了人们的愿望：“罗马尼亚民族……现在希望成为完全自由的民族，并联合成一个单

一的民族国家。特兰西瓦尼亚和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不分阶级，希望同山彼侧的兄弟们联合……，阿尔巴一尤利亚对我们来说将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让我们大家一起奔向那里吧！”。自11月29日起，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从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克里沙纳和马拉穆列什的各个角落开始云集到阿尔巴一尤利亚，其中许多人是步行来的；除了一千二百二十八名代表外，共计有十万多人同时来阿尔巴一尤利亚参加人民大会；这个蔚为壮观的大会加强了代表们的历史性决议的力量。同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农村和城市里，罗马尼亚人民在许多地方性的集会上也表现出同样的普遍热情。在起草国民议会的文件过程中，以社会主义者为首的人民群众的最先进的代表，主张必须把一些民主原则：土地改革、劳动保护、普选、政治自由、保障各共居民族的权利，实行共和政体，写进即将付诸表决的决议中。瓦西里·戈尔迪什作了决议草案报告，他在报告中回忆了前辈们的斗争，即1848年在自由原野上作出的决议，并且指出："皇帝欺骗了我们，国家（奥一匈）束缚了我们；但我们觉醒了：只有相信我

们自己，相信我们罗马尼亚民族，才能拯救我们。我们发誓，从今以后只效忠于罗马尼亚民族，但同时也发誓忠于人类文明。”1918年12月1日阿尔巴－尤利亚国民议会决议包含九点：宣告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联合，宣布罗马尼亚人民的先进代表为之奋斗的联合的基本民主原则：土地改革、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尊重共居民族的权利、保障劳动等等。

接着，决议要求未来的和平会议通过决议，保证维护和平，保证大小国家权利平等，消除它们之间的战争；祝贺布科维纳与罗马尼亚联合；祝贺罗马尼亚士兵的英雄主义；祝贺其他被压迫民族从过去的奥一匈帝国下解放出来以及协约国的军事胜利。阿尔巴一尤利亚议会决定设立大国民议会作为具有议会职权的机关，接着从这个议会内部任命了指导委员会，其使命限于在自治和行政合并时期保持同布加勒斯特的国家政府的密切联系。在梅迪亚什举行的萨克逊人大会（1919年），怀着声援罗马尼亚人民的激情，承认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联合。同时，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的联合也得到了1918年8月在蒂米什瓦拉

举行的士瓦本人代表大会的承认。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些马札尔人公众舆论团体，如特尔古一穆列什的安塔尔菲·恩德雷和克鲁日的凯尔泰斯·耶讷等人的团体，都理解罗马尼亚人争取统一的斗争及其历史必然性。

接着，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的联合得到
342 了法令与和会决议的追认，它们肯定了罗马尼亚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实现它许多世纪以来的愿望。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札尔族和日耳曼族居民也加入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他们拥护阿尔巴一尤利亚的历史性决议，继续与罗马尼亚人民一起实现进步力量的共同愿望，为我国整个社会生活的物质和精神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联合是1918年秋天特兰西瓦尼亚革命事件的最重大的成果。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得到他们的兄弟——老罗马尼亚的广大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道义上的有力支持。一些知名人士，如：瓦西里·戈尔迪什、什特凡·契乔一波普、尼古拉·约尔加、塔凯·约内斯库、伊昂·康塔库齐诺博士、尼古拉·蒂图列斯库、阿乌雷尔·拉泽

尔、伊昂·苏丘、扬·米胡茨、约·茹曼卡、扬·弗卢埃拉什、埃尼亚·格拉皮尼、蒂隆·阿尔巴尼、尤利乌·曼纽、奥克塔维扬·戈加、瓦西里·卢卡丘、特拉扬·武亚、埃米尔·伊萨克等人对实现统一起了首要作用。

特兰西瓦尼亚同老罗马尼亚联合的历史意义

1918年的统一是罗马尼亚民族史上的一大胜利，它是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事业，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所要求的，它再一次确认各族人民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权利。

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的联合标志着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统一的完成，排除了阻碍社会前进的一个障碍，符合历史的、合乎规律的迫切需要，解放了新的人民力量，从而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联合事业结束了一个历史时期——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同时在我国人民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完成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统一，为在新的条件下大大地发展生产力，为更有力地建立罗马尼亚的统一市场，创造了条件。

在1918年统一后的时期里，罗马尼亚人民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蒸蒸日上，这是由于统一创造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又有利于罗马尼亚社会的革命力量的成长。

1848—1918年间的文化发展

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我们人民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的进步，自然要用丰富的精神生活内容来加以充实。这个时期的文化反映社会和政治变革，反过来又促进了我国社会的
343 发展。在以尼·伯尔切斯库、米·科格尔尼恰努、西·伯尔努齐乌、阿·扬库、布拉德的扬·约内斯库、切·博利亚克等人为首的爱国者的著作和活动中所提出的1848年的革命思想就是它的出发点。

革命失败以后，一部分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资产阶级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罗马尼亚社会在这条困难重重的特殊道路上发展，这也反映到文化领域。统治阶级的文化方针和人民文化之间质的区别是与社会动荡和政治斗争的成熟阶段相适应的。这时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进一步传播了时代最先进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观点、唯物主义理论的逐渐传入和日益广泛的传播，加速了这一过程。外国，尤其是西方的进步思想能对罗马尼亚产生影响，是由于罗马尼亚社会发展本身从整体上来说已经达到了可能接受这种影响的水平。

在近代罗马尼亚文化中反映出民族统一尚未完成。特兰西瓦尼亚的文化状况多少有些不同；因它受这样一个事实的影响，即特兰西瓦尼亚的资产阶级不同于老罗马尼亚的，它属于被压迫民族，比较接近人民。在特兰西瓦尼亚，社会分化较小，而文化的思想内容虽然不是清一色，但矛盾方面比较少。民族解放运动在文化领域内特别高涨。特兰西瓦尼亚同老王国的多方面联系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的文化人士对罗马尼亚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在这方面具有重大意义。早从以往的历史时代起，罗马尼亚文化已经作为统一

的文化形成、发展和成长起来，它属于全体罗马尼亚人民，超越了把它分离开来并束缚在——全部或部分地——几个毗邻帝国的统治枷锁之下的不公正的疆界。罗马尼亚民族文化的统一，出现在实现和完成政治上的统一之前，它对增强民族意识和动员群众作出了贡献。近代史的另一条基本轴线，即这个时期每个方面的阶级内容也在罗马尼亚文化领域里呈现出来。我国文化的发展应归功于那些最先进的思想家、学者、文化人士和艺术家孜孜不倦的活动，他们常常是在同力图维护旧制度的、陈旧保守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进行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在它的历史的近代时期，罗马尼亚人民也在文化领域内跟上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步伐，并作出了独创的贡献，这是它具有高度爱国主义自豪感的一个理由。这个时代是教育、科学、文学和艺术特别高涨的时代，我国人民文化的最伟大人物埃米内斯库、巴贝什、埃奈斯库、约尔加和其他人的名字至今仍闪烁着光辉，并进人了世界文化宝库。

教　育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是许多先进教师和知识分子所极力主张的，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参加了1848年事件的准备和发动。1848年以后出现了 344
改组教育的广泛运动；这个运动的基础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企业和机构有可能招收熟练劳动力而给人民群众以知识。因此，发展教育是为正处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学生和学校的数目逐步增加，教学水平逐渐提高，以便减轻大多数居民处于文盲状态的严重状况。两公国的统一把统一两省的教育问题提上了日程，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曾对此予以热情提倡。使用拉丁字母是一个进步因素。

1864年的国民教育法规定义务和免费的四年制初级教育，这是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学校和师资的缺乏，农民生活条件的困难以及社会一般状况本身，都使得这项法令只能在很小程度上得到实施。受中等教育的大都是出身于富裕的和中等的社会阶层的青年。几所传统的中学设在布加勒斯特、雅西和克拉约瓦。从1848年革命时

起，就在教育界自己的刊物上讨论教育问题。开始编写罗马尼亚的新教科书和其他专业书，其中有一些是当时受称赞的作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成立专科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和艺术学校网，组织起了实用教育。高等教育受到特别重视，成立了雅西大学（1860年）和布加勒斯特大学（1864年），在这里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学、科学和实践活动。布加勒斯特医学院（是先前已有的分科学校的继续）、公路和桥梁高等学校（未来的工学院）、赫勒斯特勒乌农业学校、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的音乐学院，充实了这些教育机构。在国家获得独立以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提出了使教育继续近代化的问题。在塔凯·约内斯库、普·蓬尼等部长，特别是在斯皮鲁·哈雷特部长主持教育时期，接连制定了几项教育法，为整个教育过程奠定了新的基础。加速兴建学校，加紧培养师资，设立学校图书馆，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放宽女孩子入学的条件，尤其是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实用教育上面，——通过所有这些办法，罗马尼亚的教育水平和质量堪与先进国家相媲美。私立学校和教会

学校的保留，宗教课的保留，是一种保守因素，阻碍了罗马尼亚教育的发展。学龄儿童不能完全入学的数字和文盲的数字，综合地说明了必要的物质手段的不充分和教育发展的困难条件。在1899—1909年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跃进，总人口中的识字人数由22%增加到40%。社会主义报刊（尤其是《同时代人》）和民主、进步刊物揭露了教 345
育制度的缺陷和局限，它们特别抨击了各个执政党的以政客的利害关系为转移的对待学校的态度。

高等教育通过建立具有应用科学性质的新教研室（数学、力学、电机、化学、植物和生理学等），设立科学研究和专业化中心，通过成立一些新的高等学校（兽医、林业、建筑等等）而获得了发展。其中有些教研室和研究所不久便开始在国外享有声誉。

文化界的一批伟大人物，象米哈伊·埃米内斯库（当过督学）、扬·克良格（教课书编写者）、亚·奥多贝斯库、蒂图·马约雷斯库、斯皮鲁·哈雷特，以及过去绝大多数科学家——他们的创造性活动与教研室有直接联系——都对罗马尼亚的教

育作出了重要贡献。罗马尼亚学校培养了许多代爱国者、民主主义者、进步学者和专业工作中的著名专家。在我国人民历史动荡的伟大时刻——1848年革命、统一、独立，以1907年农民起义为高潮的农民起义、争取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的斗争，——教师同他们的学生一起，与人民同呼吸，投身于人民运动中，甚至站在群众斗争前列，而其中有些人常常公开抨击暴政，以忠诚和忘我的精神献身于祖国的社会、物质和精神的进步事业。

由于奥-匈压迫，由于压在构成人口大多数的罗马尼亚人头上的社会的和民族的双重枷锁，特兰西瓦尼亚的教育状况更要困难得多。1848—1849年革命关于教育使用民族语言的要求被置之不理。更有甚者，学校成了实行非民族化、阻碍使用民族语言和推行马札尔化措施的主要场所之一。面对这一政策，罗马尼亚人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不属于国家的少数学校和教会学校里进行抵制。尽管如此，可以看到，例如，在1877年，一万三千七百所教会学校中仅有二千七百所是罗马尼亚语学校。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民渴望学文化，学校日益增多，以致必须采取特别措

施增加由“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师资数量。罗马尼亚具有古老的进步传统的中等学校，设在布拉日、贝尤什、布拉索夫、讷塞乌德和布拉德，造就了一届又一届的著名学者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当时这里的历史和文学课讲授罗马尼亚诸国的一般情况。图书馆、读书会和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了民族精神的发展，对青年一代的民主教育作出了贡献。成立了第一批女子学校和应用学校（手艺、商业等等）。在奥一匈二元政体建立以后（1867 年），由于民族压迫的加强，情况恶化了。在教育方面，本着民族压迫方针施行了特别法令：马札尔语成为必修课，在教会学校设立国家监督，甚至试图借助幼儿园来推行马札尔化，等等。罗马尼亚人代表的抗议也无济于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阿波尼法（1907 年）则使这一政策达到极 346
点，罗马尼亚参战后，为了在同罗马尼亚交界的地区建立一个“文化区”，开始大量取缔罗马尼亚语学校。

1848—1849 年革命者的宿愿——建立罗马尼亚语的高等教育，——未能在特兰西瓦尼亚实现。仅在布达佩斯大学和维也纳大学设立了罗马

尼亚语言文学教研室（亚历山德鲁·罗曼是第一位教授），这样，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大学生由于没有一所自己的大学，不得不到布达佩斯、维也纳、雅西或布加勒斯特求学；其中有许多人定居于罗马尼亚，他们的活动对巩固罗马尼亚人民在文化领域内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科　学

国家经济发展本身构成十九世纪下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罗马尼亚科学的物质基础。近代技术特别是在工业以及在农业中的应用，使加强科学研究，尤其是同生产有关的科学研究成为必要。罗马尼亚科学的发展条件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国家的支持（资金、干部、仪器和设备等）很少。研究和实验主要是在大学教研室里进行的，随着研究工作的加强，才逐渐分门别类。在数学和物理学领域内，埃米尔·巴卡洛格卢、斯皮鲁·哈雷特、达维德·埃曼努尔等人作出了显著贡献；1900年之后，著名的学者有：格·齐采伊卡、迪·庞贝伊、特·拉列斯库。格里戈里·科伯尔切斯库和鲁道维克·姆拉泽克等科学家的名字给地质学增添了光

彩，他们对罗马尼亚石油的结构、起源和分布进行了研究；格·蒙特亚努—穆尔戈奇在矿物学、土壤学和地层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科学成果。罗马尼亚地质研究所的成立（1906年）给这些研究带来新的推动。罗马尼亚地理学由于格·弗尔桑和西·梅赫丁齐的活动和对其他一些大陆的考察而赢得声誉。在化学方面，学者彼得·波尼、康·伊斯特拉蒂博士和格·格·隆吉内斯库的著作博得普遍的好评；为了更好地符合实用要求，化学研究走向专门化和深化，因而产生了工业化学。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从而使相近的科学进行日益密切的合作。由于农业和医学科学的发展，生物学也取得了重大进步。尤利乌·巴拉什博士作为博物学家的活动被德·布伦扎（植物学家）、迪·沃伊诺夫、格里戈里·安蒂帕、埃米尔·拉科维策（洞穴生物学奠基人）和其他人继承下来。开始创办自然科学博物馆，如今天以格·安蒂帕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在特兰西瓦尼亚，著名的人物有弗里德里希·伊茨凯利、米勒斯·勒梅尔、奥罗斯海吉·约萨医生等人。生物学和自然科学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激烈斗争的场

所，特别是因为进化论的观点在那个时代的思想界有力地崛起。农业科学由于同实用要求密切联系——推广具有高效率的方法、罗马尼亚整个农
347 业的近代化、为加速实现这些目标而创办的学校——而得到很大发展。站在这些革新前列的有：布拉德的扬·约内斯库、普·斯·奥雷利安、乔治·马约尔等。组织保健、发展高等教育和进行专业研究是医学科学的主要课题，象医生卡罗尔·达维拉、尼古拉·克雷楚列斯库和后来的维克托尔·巴贝什和扬·康塔库齐诺（细菌学）、格·马林内斯库（神经学）、托玛·约内斯库（外科学）等著名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作品的基础是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生命现象。新的部门——社会医学，随着工人运动而发展起来，这是什特凡·斯滕克医生等社会主义者的功劳。社会主义报刊，一般来说，开展了传播科学知识、研究成果和进步观点的坚持不懈的活动。

社会科学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推动着反对经济、社会和思想领域里的封建残余的斗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人确立了无产阶级的自然观和社会生活观。经济科学反映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

级之间的矛盾。布拉德的扬·约内斯库、格·巴里齐乌、扬·吉卡、迪奥尼西·波普·马尔齐安、普·斯·奥雷利安制订的最先进的经济理论，主张必须发展本国工业和保障经济独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奠立我国进步思想的科学基础作出了贡献。在特兰西瓦尼亚著名的有卡尔·沃尔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支配着罗马尼亚哲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理论结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巩固了思想家什特凡·康·米赫伊列斯库、瓦西里·康塔和这个时期以康·多布罗加努—盖里亚、拉伊库·约内斯库—里昂为首的一大批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所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潮。社会学、教育学（同发展教育和制订新的教学法联系在一起）和法学（作为立法的必要性和罗马尼亚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表现）取得了值得提出的成果。

历史编纂学得到象尼古拉·伯尔切斯库、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亚·帕皮乌-伊拉里安、奥古斯特·特雷博尼乌·拉乌里安、格·巴里齐乌、博格丹·佩特里切伊库—哈斯德乌、亚历山德鲁·迪·克塞诺波尔、尼古拉·约尔加、瓦西里·

珀尔万、弗里德里希·托伊施、克瓦里·拉斯洛、马尔基·山陀尔等爱国主义学者的特别重视。1848年，一代人为了使历史教训对广大群众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具有现实意义而奋斗过，并接近了科学的历史观。伯尔切斯库的著作(《勇士米哈伊君主统治下的罗马尼亚人历史》和《多瑙河诸公国的经济问题》等)是历史之作为斗争武器的生动例证。为了建立历史研究的牢固基础，米·科格尔尼恰努、帕皮乌-伊拉里安(《历史文物的宝库》)、拉乌里安(《达契亚历史文汇》，同伯尔切斯库一起创办)、蒂·契帕里乌(《语言学和历史文献》)、博·佩·哈斯德乌(《罗马尼亚历史文献》)、埃·胡尔穆扎基、德·斯图尔扎和尼·约尔加等开始发表一些重要的资料汇编。发表了旧编年史和康特米尔、欣卡伊的历史著作，开始进行考古挖掘，建立国家古代博物馆等。在这样汇集起来的
348 丰富的物质资料基础上，产生了第一批综合性著作，其中亚·迪·克塞诺波尔的《图拉真达契亚的罗马尼亚人历史》具有特殊价值。克塞诺波尔还发表了历史理论著作，探讨了罗马尼亚人民的连续性问题。在伊昂·讷德日德、拉杜·罗塞蒂、伊

昂·博格丹和康·朱雷斯库的作品里，也出现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的刊物上得到介绍和运用。

亚历山德鲁·奥多贝斯库和格里戈里·托奇列斯库的名字给初期的罗马尼亚考古学增添了荣誉。迪米特里·翁丘、弗·阿·乌雷基亚等人的著作研究了中世纪史。成立国家档案馆（1908年），出版专业杂志，注意研究和保管历史文物，发表具有历史性质的全部回忆录著作，发展历史的辅助科学，编纂浩瀚的历史参考书目——所有这些都大大扩大了眼界和从事考究的可能性。瓦西里·珀尔万（在考古学和古代史方面）、尼古拉·约尔加（在历史科学的各个部门）把二十世纪初期的罗马尼亚的历史研究提到了高级水平，将罗马尼亚历史纳人了世界历史。尼古拉·约尔加是罗马尼亚人民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具有世界名望的学者、人道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他发表了大量著作——综合论述、专题论文、资料选集、论文等，以给人深刻印象的创造力探讨了最广泛多样的文化领域。

最初，语言学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关于语言拉

丁性的讨论；阿尔迪亚尔学派的最后一批拥护者中有些人的夸张说法，引起罗马尼亚文学语言大师们（阿列克山德里、鲁索、奥多贝斯库）的反驳。确立关于罗马尼亚语言和人民的拉丁起源的思想，是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进步因素，一种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刷采用拉丁字母乃是文化进步的一个因素。语言被当作人民的整个历史发展的成果来加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着手编写了一些辞典和专门论著。这个领域里的巨著属于博·佩·哈斯德乌（《罗马尼亚大语源》）。语法、语音、语源、方言、民间文学、古文、正字法、语言结构等等论著出自亚·菲利皮德、阿隆·登苏侚努、扬·讷德日德、格·巴里齐乌等人之手。

这个时期出版的一些辞典与百科全书的特点相近。

特兰西瓦尼亚的科学由于帕维尔·瓦西奇、德·波波维奇—巴尔契亚努、弗洛里安·波尔契乌斯等人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贡献而发展起来。在这里，最重要的学者接受了唯物主义观点和进化论思想。在化学方面，尼古拉·特克卢的活动尤为出色。博利埃·亚诺什通过得到国际好评的独特

贡献而闻名于数学领域。马札尔族和日耳曼族的其他研究工作者，如哲学家门托维赫·费伦茨、医生弗里德里希·克拉塞尔等，丰富了科学珍品和进步思想的宝库。特兰西瓦尼亚的政治和民族状况，给同论证民族解放斗争有关的社会科学问题，尤其是历史和语言问题，造成特殊的困难。除了伯尔努齐乌、巴里齐乌、拉乌里安、帕皮乌、契帕里乌的享有声望的名字而外，上世纪末和本世纪最 349
初几十年又出现了象伊昂·博格丹、扬·鲁苏一希里亚努、格·波帕一利塞亚努、伊昂·卢帕什（在史学方面）和阿·马林内斯库、扬·比亚努、康·迪亚康诺维奇（在语言学方面）等人的名字。罗马尼亚的社会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以瓦西里·戈尔迪什、阿·康·波波维奇、奥雷尔·拉泽尔等人为代表。以维克托尔·巴贝什博士为首的特兰西瓦尼亚的许多罗马尼亚科学家在自由祖国进行的创造性活动，不仅完成了重大的科学著作，而且还铸造了罗马尼亚文化统一的因素。

罗马尼亚科学作出了许多受到全世界好评的贡献。就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里，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史学、语言学方

面产生了名副其实的民族科学学派。罗马尼亚的科学家创立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洞穴生物学，并且是自然科学、医学、空气动力学等一些领域的先驱。

技　术

我国人民的创造天才也通过一些技术成果光辉地显示出来，尤其在建筑和航空方面。工程师安盖尔·萨利尼以建造港口和铁路，特别是以建造切尔纳伏德的多瑙河大桥而闻名。在公路建筑和公共设施工程方面，工程师埃利耶·拉杜最为出色。二十世纪初期发明的航空，记载着具有世界意义的罗马尼亚的成就：特拉扬·武亚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引擎飞机，用自身的工具独立地从地面上升起（1905年）。武亚对直升飞机的发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发明了蒸汽发生器等。奥雷尔·弗拉伊库用自己制造的零件制成了许多飞机，在国际上倍受赞扬；他还参加了一些比赛，以荣获冠军而取得伟大胜利。弗拉伊库于1913年试图飞越喀尔巴阡山时，机翼被撞坏，飞机坠毁，壮烈牺牲。弗拉伊库的飞行，他的生平和成就是

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工程师亨利·科万德的发明奠定了喷气飞行术的基础；我们还要提到格·康斯坦丁內斯库在传声学方面的发现。

近代时期的罗马尼亚科学技术成就——为取得其中某些成就曾付出了很大牺牲——给我国学者带来了名声，同时也提高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威望。卡尔·齐格勒也是一位航空的先驱。

文化—科学协会

文化的普遍发展——科学、文学、学者之间联系的发展，以及他们对自己人民物质、精神繁荣应起的作用的认识——，导致一些重要的文化协会的成立。

在特兰西瓦尼亚，有许多"休息场所"（读书会，逐渐变成一种具有政治内容的俱乐部），各种职业 350
团体，妇女、青年、教师等联合会，以及学校的、民间的图书馆网，私人的珍藏书等等——同古老的、著名的阿尔巴一尤利亚、锡比乌、阿尤德、特尔古一穆列什等图书馆并列。1861年，格·巴里齐乌和其他罗马尼亚领导人创建了阿斯特拉（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协会）。阿斯特拉在特兰西

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民中间进行了重要的群众文化活动，并一贯促进同老罗马尼亚的文化联系，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本着他们所追求的沙文主义目的，马札尔统治阶级在特兰西瓦尼亚成立了一个马札尔文化协会——埃姆凯，企图通过文化途径推行罗马尼亚人的非民族化。

最重要的文化科学协会是1867年创建时取名为罗马尼亚科学协会的罗马尼亚科学院，它集合了罗马尼亚人居住的各省的（包括自由的和被奴役的）罗马尼亚科学力量，并因此成为文化统一的论坛。科学院的著名院士中有许多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其中格·巴里齐乌还当过院长。文化科学的这种方向和活动的政治含意十分明显。1890年，布加勒斯特成立了全体罗马尼亚人文化统一同盟，不久，它就由尼古拉·约尔加长期担任领导。文化同盟的活动对加强民族意识作出了贡献，支持了山彼侧的罗马尼亚人的解放斗争，并在国外进行了宣传罗马尼亚事业的坚持不懈的活动。1870年创立的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戏剧基金协会，对传播文化和动员群众起了重要作用。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按照各种标准

（职业的、地区的等）成立了许多协会，其中有些特别对在人民群众中普及文化作出了有效的贡献。

报　刊

标志我们祖国近代历史转折点和变革的每个主要时刻，都有自己的报刊。1848年革命创办了《罗马尼亚婴儿》、《自主的人民》等报刊，还有流亡的革命者出版的刊物。两公国的联合运动得到了一些刊物的强有力的支持，如：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领导的《野牛》、《罗马尼亚文学》（雅西、1855年），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主编的《多瑙河之星》，康·亚·罗塞蒂的《罗马尼亚人》等。后来，紧随着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报纸日益分化；各党派的刊物随着党派的增多而增多。民主的、进步的刊物始终如一地肯定人民群众的社会信念和精神价值。当时罗马尼亚公众生活的知名人士，从埃米内斯库、卡拉迦列直到图多尔·阿尔盖齐和社会主义者，都为这些刊物撰稿。保守党通过《时报》和《时代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罗马尼亚人报》和《民族意志报》则是自由党的喉舌。此外，还有一连串"独立的"刊物、地方性报纸、耸人听闻的

351 小报、法文杂志等等。最先进的作家(象扬·卢·卡拉迦列)和政论家用他们的笔痛斥当时一部分报刊的颓废主义风气、愚昧无知、一知半解、精神上的狭隘性、不诚实、蛊惑人心、政治讹诈、阴谋、沽名钓誉、迎合小市民、对贫民窟和咖啡馆的猎奇。广大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从十九世纪末就得到象《斗争报》(格·潘努领导的激进报)、《真理报》、《晨报》和《宇宙报》等报纸的有力支持，其中有些报纸发行量很大。尼古拉·约尔加于1906年创办了《罗马尼亚民族报》。

工人报刊和社会主义报刊早在1869年便开始发行，先有《印刷年鉴》，继之有《罗马尼亚劳工》(1872年)、《社会主义者》(1877年)、《同时代人》(1881年)、《未来的达契亚》、《社会评论》、《人权》、《劳动》、《新世界》等报刊。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出版了《罗马尼亚工人》(1902年)，接着问世的有内容丰富的工会刊物：《社会未来》杂志，等等。这些报刊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肯定了最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观点，这个阶级从1893年起就由其自己的政党来领导。

除了上述报刊以外，还有一系列专业杂志和

刊物(文学的、科学的和各种协会的等等),其中有《伊西丝》(《自然》)、《文学漫谈》、《罗马尼亚科学院年鉴》、《科学评论》、《现代评论》及其他许多刊物。

记者也成立了自己的职业协会。大多数报刊都有效地投入了与争取社会正义和民族自由的人民愿望相连的运动(民族独立,1907年起义,反君主专制运动,世界大战,争取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的斗争等);在这方面,一种雄辩的刊物是尼·德·科恰领导的《火炬》,图·阿尔盖齐、加拉·加拉克蒂翁和其他进步知识分子都为它撰稿。有一组站在前哨的、无情的讽刺刊物,它们自成一格,是罗马尼亚报刊独特的传统之一。通过它们所提供的一切比较优秀的东西,这个时期的罗马尼亚报刊表现了对人民命运的责任感,表现了公民的勇气、先进思想和为这种思想服务的记者们的经常受到激励的天才;由于这些品格,罗马尼亚报刊树立了自己独具的特点,这种特点得到不断培育和发展。

特兰西瓦尼亚的报刊也受到老罗马尼亚的政治形势的重大影响。早在革命以前(1838年)由

格·巴里齐乌创办的布拉索夫的报纸——《特兰西瓦尼亚报》、《思想、心灵和文学》报，就同布拉日的《民族报》一起，成为1848—1849年革命的喉舌。《特兰西瓦尼亚报》继续出版了好几十年。约瑟夫·武尔坎创办的杂志《家庭》和其他进步刊物都特别重视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卡尔·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钦齐乌·巴贝什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阿斯特拉协会的机关刊物《特兰西瓦尼亚》起了重要作用，发表过许多研究文章和论文，探讨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学问题。特兰西瓦尼亚出版界的
352 一个独特之处是继续出版日历——向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工具。

在这个时期，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札尔文报和德文报也得到重大发展。在这些刊物的专栏里，可以看到对民族问题的现实主义的估价和呼声，对罗马尼亚人的同情。譬如，布拉索夫的萨克逊族文人就出版了《喀尔巴阡》杂志。

随着扬·斯拉维奇主办的《论坛报》——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最重要的政治刊物，同时也是一些新文学倾向的倡导者——在1848年于

锡比乌出版，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文报刊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时出版的还有《罗马尼亚电讯》(锡比乌)、《正义报》(蒂米什瓦拉)、《旗帜报》(卢戈什,1900年)；二十世纪初,有著名的《金星报》(由奥克塔维扬·戈加等人主办),《罗马尼亚人报》(阿拉德),这是罗马尼亚民族党的机关刊物,它特别是在1918年秋争取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政治报刊经常遭到来自奥—匈帝国方面的迫害。

最早的社会主义报刊是用马札尔文(阿拉德,1891年)和德文(蒂米什瓦拉)在特兰西瓦尼亚出版的,而1903年创刊的《真理报》则是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支部的机关报。社会主义报刊表达最先进的社会政治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人民群众切身问题的观点。

应当指出，在报刊方面——无论是文化和政治刊物还是社会主义刊物——，喀尔巴阡山两侧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不仅互相传送新闻或时代精神，而且还互相交流先进思想（其中有统一罗马尼亚国家的思想），

加强了群众要求完成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愿望。

报刊是一支重要力量，它参与了近代的社会和政治大变革，从思想上教育人民群众认识他们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

文　学

十九世纪中期和下半期，罗马尼亚文学极为繁荣，这应归功于一些有才华的作家，如：格·亚历山德雷斯库、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尼·伯尔切斯库、迪·博林蒂尼亚努、切扎尔·博利亚克、尼·菲利蒙、扬·吉卡、博·佩·哈斯德乌、扬·埃利亚德-勒杜列斯库、米·科格尔尼恰努、科·内格里、康·内格鲁齐。这些作家的作品渊源于他们对人民的深深的爱，渊源于他们先进的社会和艺术观点。上述作家中最杰出的瓦·阿列克山德里——“米尔切什蒂的抒情诗人”——写了抒情诗、取材于民间文学的诗歌、历史剧、歌颂独立战争中的人民英雄主义的歌剧。同这些诗人和作家并列的还有亚·奥多贝斯库。

在重大的历史时刻和变革时期——诸如

1848年革命、统一等等，作家站在争取人民民族
权利、社会权利斗争的前列。《达契亚文学》杂志 353
的1840年纲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成为我国文学
活动的基础。越来越多的刊物发表文学创作。我
们人民最伟大的诗人米哈伊·埃米内斯库在《家
庭》杂志上初露锋芒（1866年）。1874年，伟大的
埃米内斯库写了《皇帝与无产者》，1876年写了
《格林》，1878年以后，作为创作高峰出现了他的
杰作《信》、《金星》及其他诗作。由于感情深刻、语
言优美，埃米内斯库的诗歌不仅属于罗马尼亚文
学，同时也属于世界浪漫主义文学遗产。埃米内
斯库不仅是大自然、爱情和人的心灵美的歌手，而
且还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剥削社会的抨击者，在
他那些用国语写作的迄今最美的诗句中，倾诉了
全体人民的痛苦、欢乐和理想，而人民在埃米内斯
库的诗歌里又看到了自己的特征。在诗人逝世
（1869年）以后，这些扣人心弦的诗歌之所以能形
成为一个流派，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的历史条
件，即促使埃米内斯库的悲观主义得以延续和扩
展的那种普遍的社会风气和精神气氛，另一方面
则是因为罗马尼亚诗歌的这颗明星的作品的新颖

和无与伦比的美。

人民的智慧在扬·克良格的故事、童话和回忆录中得到天才的艺术表现；我国文学的另一位古典作家扬·卢卡·卡拉迦列是罗马尼亚最伟大的剧作家，他创作了不朽的剧本《暴风雨之夜》、《一封遗失的信》、《灾难》、《狂欢节》和散文作品(《杂文和小品文》等)，无情地批判了当时要政客手腕的陋习。同时，卡拉迦列坚决反对对1907年农民起义的野蛮镇压。

罗马尼亚的文化思想运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围绕着蒂图·马约雷斯库和康·多布罗加努-盖里亚之间进行的著名的社会和美学争论。那时，美学是思想斗争的一个主要领域，因此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把马克思主义观点首次运用于美学的时间早于在这方面具有悠久传统的其他国家。

蒂图·马约雷斯库在罗马尼亚文化史中不失为一个重要人物，他既是哲学家、社会学家、演说家和教授，又是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并且是文学大师，其中首先是米·埃米内斯库的支持者。他为发展近代语、提倡其纯洁性和文学语言的美而

斗争，他支持民间文学，并象其他人一样把它看做创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所有这些品格使他成为重要的文学团体“青春社”的导师和理论家；“青春社”1863年成立于雅西，孚有众望的罗马尼亚文学论坛——《文学漫谈》杂志是它的喉舌。作为哲学家，马约雷斯库是唯心主义者，这决定了在“为艺术而艺术”这个命题中集中表现出来的他的美学观的性质。马约雷斯库进入政界，成了保守党的代表，这增强了他的活动的消极方面；随着他献身于政治，在美学方面的活动本身变得越来越断断续续。许多文化人士，象哈斯德乌、巴里齐乌、博利亚克，哲学家什·康·米赫伊列斯库等人都曾起来反对过上述观点。《同时代人》杂志和康·多布罗加努—盖里亚的著作是马约雷斯库主义的最严峻的对立面，它们表达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盖里亚批判青春派追求不问政治的 354
纯艺术的思想倾向，为具有倾向性的、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的艺术而斗争，肯定艺术家同社会环境、同本国人民的愿望的密切联系，尽管他在分析艺术现象时有时也简单化、有局限性。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罗马尼亚文学中表现出批判

现实主义的思潮。

就广度和深度而言，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罗马尼亚文学，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原因是罗马尼亚各省，即自由祖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布科维纳的最有才能的作家都促进了这一高潮的到来；因此，文学为实现罗马尼亚人民在文化上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特兰西瓦尼亚最重要的作家在老罗马尼亚定居下来，并在这里找到了发挥他们才能的有利条件。扬·斯拉维奇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作品反映资本主义渗入时期风云变幻的阿尔迪亚尔农村生活；许多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玛拉》、在锡比乌主办《论坛报》的工作、对他所处时代的回忆，构成斯拉维奇作品的主要方面。

埃米内斯库最有代表性的继承者是亚历山德鲁·弗拉胡策。悲观的沉思是埃米内斯库流派的特点之一，盖里亚曾对这一流派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埃米内斯库主义”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形式。“我们什么也不相信”，不仅表达了《不肖子孙》，面且也表达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1848年革命失败所产生的后果的深深失望。巴·什特弗内斯库

—德拉弗兰恰和亚·杜伊利乌—扎姆菲雷斯库对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戏剧和散文)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同时代人》杂志和社会主义报刊周围成长起来的几位诗人和作家是：特·内库卢策、特拉扬·德梅特雷斯库、扬·珀温-平契奥、索菲亚·讷德日德以及文学批评方面的拉伊库·约内斯库-里昂。

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中，最常见的题材之一是农村生活。这表现出我们伟大的作家们相信这个世界的丰富多彩和永恒不灭的精神力量，以及他们对以1907年悲剧为高峰的十分广泛的农民运动所持的声援态度。乔治·科什布克是一位真正的"农民诗人"(盖里亚语)，是大自然美景的歌手，他相信人民无穷无尽的力量，为农民反抗压迫者的声势浩大的暴动疾呼(《我们要土地》)。他的诗歌是乐观主义的，有明朗的古典色彩和从我国民间文学的深深的源泉里迸发出来的诗歌形式。由于这一切，科什布克可被认为是继埃米内斯库之后最著名的诗人。科什布克的主要诗集的题目是：《叙事诗和田园诗》、《纺纱》等。

在这个时期，罗马尼亚文学中也出现了近代的一些倾向和思潮(象征主义等等)，这主要以亚历山德鲁·马其顿斯基的诗歌为代表。

随着作家越来越多地以农民生活为题材和我国文学民族特色的日益形成，本世纪初期出现了新的流派，如，民粹派和播种派。前者主要表现在
355 重要的杂志《罗马尼亚生活》(1906年)上；康斯坦丁·斯特雷是该刊的政治领导，加·伊布勒伊利亚努是该刊的一位接近社会主义运动的、享有声望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罗马尼亚生活》在罗马尼亚文学中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论坛。播种派的代表人物是优秀作家弗拉胡策、科什布克和作为导师的尼古拉·约尔加。播种派还带有一些民族主义的特色，属于一些次要作家和作品。

我国伟大散文家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的非凡生涯始于本世纪初，人民的生活、摩尔多瓦山河的美景和祖国的光荣历史是他创作的主题。他在这个时期写作的短篇小说和历史长篇小说有：《被抑制的痛苦》(1904年)，《肖伊马鲁一家》(1915年)，等等。

在诗歌方面大显身手的有奥克塔维扬·戈加

——歌颂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进行的民族和社会斗争的诗人，以及什·奥·约瑟夫、帕纳伊特·切尔纳、迪米特里·安盖尔；在散文方面最著名者有：德·德·珀特勒什卡努、扬·阿格尔比恰努、让·巴尔特、埃米尔·格尔利亚努、克·阿·布勒特斯库-沃伊內什蒂、伊·阿·巴萨拉贝斯库等。在文学批评方面，由于奥维德·登苏希亚努和欧金·洛维內斯库面出现了革新趋势。在世界文学的翻译方面，有科什布克译的但丁的《神曲》，乔治·穆尔努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得赛》，它们都丰富了我国文学生活的活动和内容。

在特兰西瓦尼亚，值得提出的名字有：安德烈·穆雷沙努——著有1848年颂歌（《反响》，又名《觉醒吧，罗马尼亚人》）；散文家伊·科德鲁—德勒古沙努、伊·波普—雷特加努、伊拉里·肯迪和作为文化倡导者、鼓励者的约瑟夫·武尔坎；民间文学的搜集家阿·马林內斯库、米隆·庞皮利乌、安德烈·伯尔西亚努；以及弗里德里希·克拉塞尔、米哈伊尔·阿尔贝特、让·马林、弗·弗罗尼乌斯等。《家庭》、《论坛》、《金星》等刊物、出版物在发掘和支持新的人材方面起了特殊作用。不仅

应当提到特兰西瓦尼亚各民族的文学创作，同时还应提到继承了最优秀的传统的罗马尼亚--马札尔文学友谊，对此，伟大的马札尔诗人阿迪·恩德雷和戈加、埃米尔·伊萨克等人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札尔文学以诗人阿兰尼·亚诺什、萨斯·卡罗伊，散文家凯梅尼·日格芒德、约希卡·米克洛什，民间文学工作者阿奇·卡罗伊和戏剧家西格利盖蒂·埃特等人的名字为代表。

特兰西瓦尼亚对整个罗马尼亚民族的文学宝库的重大贡献，从一些第一流的作家和诗人，如：斯拉维奇、科什布克、雷布里亚努、戈加、什·奥·约瑟夫、阿格尔比恰努、埃米尔·伊萨克等人的名字即可窥见。

近代罗马尼亚文学通过那些以高度的艺术形式写成的、具有深刻的思想情感内容的作品，得到了蓬勃的、统一的发展。

艺　术

戏剧、建筑艺术、美术和音乐的发展促进了近代罗马尼亚文化的普遍繁荣。

建筑艺术：与城市的发展——近代社会特有 356
的一个方面——相联系，公共设施和城市规划化问题也提出来了，建筑艺术的任务就在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它本身也得到显著的发展。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建筑学家是亚·奥勒斯库和扬·明库；特别是后者，他努力建立建筑艺术上的民族风格。几位外国建筑学家对我国建筑艺术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布加勒斯特高等建筑艺术学校的创办促进了这个领域里的罗马尼亚学派的确立。突出的成就有：布加勒斯特大学、雅西文化宫、布加勒斯特法院、邮政大楼、储蓄银行、罗马尼亚音乐厅、中央军人之家、今日的大国民议会大厦、北火车站、切尔纳伏德大桥、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1944年8月24日被希特勒飞机炸毁），等等。雅西、克鲁日和奥拉迪亚剧院同布加勒斯特民族剧院的建筑风格一样；马特伊·科尔文纪念碑、克鲁日大学、锡纳亚的佩列什皇宫、阿拉德文化宫，蒂米什瓦拉、阿拉德、奥拉迪亚、普洛耶什蒂、克鲁日、特尔古-穆列什和布拉索夫的其他建筑物，以及一些公园充实了这个时期的建筑成就。

戏剧：戏剧艺术克服了许多困难，在与那个时

代的社会变革和民族理想密切联系中形成起来。阿列克山德里和哈斯德乌的作品丰富了罗马尼亚剧目，后来出现了扬·卢·卡拉迦列的不朽的喜剧和德拉弗兰恰、亚历山德鲁·达维拉、维克多·埃夫蒂米乌的作品。各种各样的戏剧体裁，从通俗趣剧、说唱到讽刺喜剧、历史剧或社会剧，都得到繁荣，它们把民间的形象搬上了舞台。剧院成了受广大观众欢迎的文化教育机构。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大大促进了戏剧的发展，他们把表演艺术提到了意想不到的高度，其中特别是康·阿里斯蒂亚、康·卡拉迦列和马特伊·米洛；其次有米·帕斯卡利、阿里斯蒂扎·罗曼内斯库、格里戈里·马诺列斯库、扬·布雷齐亚努，而康·伊·诺塔拉的造诣最高。著名的导演有：保尔·古斯蒂和亚·达维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些名演员，如扬·马诺列斯库、托尼·布兰德拉、卢奇亚·斯图尔扎、格·斯托林开始了他们的艺术生涯。批判现实主义通过所有这些创作家的艺术在罗马尼亚戏剧中崭露出来。当局的态度一般说来是敌视戏剧的，因为戏剧是先进思想和公开地批判社会的讲坛，并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吸引力。一些著名

人士充任民族剧院的经理（卡拉迦列、达维拉、萨多维亚努），大大地鼓舞了整个舞台创作。演员组织了戏剧协会，以便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戏剧巡回演出（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在表现民族意识和我国人民的文化统一中起了特殊作用。在特兰西瓦尼亚，格·巴里齐乌和约瑟夫·武尔坎（后者属于罗马尼亚戏剧基金协会）的活动尤为突出，他们是罗马尼亚戏剧爱好者和巡回演出的鼓励者。卢戈日、布拉索夫等文化中心和其他城市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大热情。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戏剧艺术在扎哈里亚·伯尔桑的创作和活动中得到了高度的体现。

无论是在古老的祖国还是在特兰西瓦尼亚， 357
都已经有了工人剧团和工人合唱队，它们不仅带来了新颖的表演艺术，而且主要是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内容。

绘画：绘画极为兴盛。1848年革命的画家——事件的参加者——有：扬·内古利奇、康·德·罗森塔尔（《革命的罗马尼亚》）和巴尔布·伊斯科维斯库（主要是肖像画）。此后期间，格奥多

尔·阿曼以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肖像画、克拉约瓦的统一霍拉舞等创作显示了才能。格奥尔基·塔塔雷斯库画了伯尔切斯库和马格鲁的肖像。诸公国统一在阿曼、扎特马里的卡罗尔·波普等人的造型艺术中获得了强烈反映。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动荡直接相联系的漫画，作为一种独特的体裁得到了发展。布加勒斯特和雅西美术学校，绘画陈列馆和展览会等大大鼓励了整个造型艺术的发展。独立战争在艺术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尼古拉·格里戈雷斯库画了富有感染力的、激动人心的图画和场面，如《斯默尔丹之战》、《号兵》等。另一位独立战争的画家是萨瓦·亨齐亚。

我国人民的最伟大画家是尼古拉·格里戈雷斯库，在他的作品里可以看到民众的乐观主义和内心奥密、罗马尼亚大自然的美丽、我国士兵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他的妩媚多姿的肖像画、优美的风景画和牛拉大车的画都是他最成功的作品。

扬·安德雷斯库以他那批判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洞察力而出名；这一点被什特凡·卢基安继承了下来，他取材于人民生活（《分玉米》）和大自然，并十分敏感面深思熟虑地处理这些题材。

绘1907年起义的画家是奥克塔夫·本契勒，他的画扣人心弦地再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和事件的悲剧性。本契勒是我国最著名的战斗艺术家之一。让·亚·斯特里亚德、特·帕拉迪、尼·托尼扎、卡米尔·雷苏、尼·维尔蒙特、阿·维罗纳等艺术家的作品，进一步发扬了我国古典的现实主义绘画最优秀的传统。工人和工业题材的出现，表明艺术家们善于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表明他们拥护这种社会现实需要所表现的和必然包含的变革。讽刺画和战斗性的漫画以日格维迪、伊塞尔和希拉托等人为代表；他们的作品刊登在社会主义报刊上。在特兰西瓦尼亚还有一批杰出的画家，象米舒·波普、康·列卡、奥克·斯米盖尔斯基。民间的玻璃画和木器画是特兰西瓦尼亚所特有的。本世纪初，有个著名的美术家小组，主要是画家，在巴亚—马雷从事创作活动。阿尔图尔·库林是这个时期的著名画家之一。

雕塑：雕塑也在类似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但规模较小（尤其是纪念碑雕塑）。艺术家扬·杰奥尔杰斯库（格·拉泽尔的塑像）、卡尔和弗·斯托尔克、什·约内斯库—瓦尔布迪亚、弗·赫格尔（斯

皮里坡纪念碑、康·亚·罗塞蒂塑像等)、德·帕丘雷亚的作品是具有代表性的。雕塑作品往往是政客和文化人士的塑像,以及历史构图。

我国伟大的雕塑家康斯坦丁·布伦库希以非凡的才华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享有盛名，他那创造
358 性的概括力通过今天闻名于全世界的作品，使世界近代艺术大为发展。

音乐：音乐在1848年革命前夕是一种世俗的、民族的艺术。此时,诗人、作曲家、民间艺术家安东·潘恩已进入晚年，而尼·菲利蒙正在开展音乐评论家的活动。罗马尼亚音乐是紧随着戏剧的发展而发展的。作为近代艺术机构的音乐学院(1864年)和交响乐团(1866年)的成立,推动了创作和演奏。亚·弗勒希滕马歇尔、乔治·什特弗内斯库、康·迪米特雷斯库的名字在这个时期崭露头角。民间音乐的发掘工作有所开展。音乐欣赏力提高，出现了罗马尼亚音乐节目——在罗马尼亚音乐厅举行的抒情剧和交响音乐会。在这次革新中，乔治·什特弗内斯库和埃德瓦尔德·卡乌德拉起了特殊作用，而在特兰西瓦亚尼则有保尔·里希特。特·布拉达是作为民俗学家和人种

志学家出名的。契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作品(轻歌剧《新君主》、《叙事诗》等)受到广大听众的热情欢迎。在特兰西瓦尼亚,音乐(特别是合唱)是民族解放斗争的真正武器,这应归功于卢戈日的扬·维杜合唱团和布拉索夫的格·迪马合唱团的活动。此外,还有罗马尼亚的合唱团——加·穆西切斯库的雅西合唱队和杜·基里亚克领导的布加勒斯特合唱团(著名的《卡门合唱团》)。除社会主义俱乐部外,还有工人合唱队。歌剧和轻歌剧演员尼·列昂纳尔德、赫·达尔克列、让·阿塔纳西乌、乔治·福列斯库、尼古列斯库-巴苏等人使罗马尼亚艺术誉满全球。蒂贝里乌·布雷迪恰努从本世纪初开始从事作曲家和民间音乐家的卓越活动。就在这个时候,乔治·埃奈斯库的光辉灿烂的艺术生涯开始了,他是我国人民为世界音乐文化培育的音乐天才:钢琴家、小提琴家、作曲家、指挥和教育家。埃奈斯库在这个时期创作了狂想曲、交响乐、奏鸣曲等等。在特兰西瓦尼亚的音乐文化中,还可以看到巴尔托克·贝拉和科达伊·佐尔坦等作曲家对马札尔和罗马尼亚民间音乐创作的特别关心,这是人民之间友谊精神的反

映。

罗马尼亚电影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种艺术很快便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获得最广泛的传布。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资料和参考书目

1848 年革命是罗马尼亚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出版了大量回忆录、资料汇编、专题研究和论文。纪念革命五十周年时，编纂了一部庞大的资料汇编:《1848 年在罗马尼亚诸公国》，1—6 卷(1898—1910 年)，以及许多专题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康·科列斯库-瓦尔蒂克写的《1848 年，革命的岁月》(1898年)。

乔治·巴里齐乌在他的两卷集《特兰西瓦尼亚两百年历史选编》中，提供了关于特兰西瓦尼亚 1848 年革命的丰富资料。尼古拉·约尔加在《阿尔迪亚尔和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历史》(1915 年)一书里，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要因素。关于这次革命的大量资料，还见诸西尔维乌·德拉戈米尔的《关于 1848—1849 年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革命的研究和资料》，4 卷集，(1944—1946 年)。

从纪念革命一百周年时起(1948 年)，出现了科学地研究 1848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浓厚兴趣。

新历史编纂学明确并强调指出了革命的原因、纲领和性质、在革命各个阶段群众参加的意义、主要革命领导人所进行的活动的作用和意义。同时，较近的研究还分析和指出了罗马尼亚

三国革命的共同斗争目标和特点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新的资料汇编:《革命的1848年》第1卷,《在摩尔多瓦》(1950年版)、《关于摩尔多瓦1848年革命的资料》(1960年版)和《关于罗马尼亚国革命的资料》(1963年版)丰富了已出版的历史资料。在《罗马尼亚史论》第4卷和《特兰西瓦尼亚历史论丛》第2卷中关于1848年革命的章节,是对这些大事件进行大规模科学综合的第一批作品。

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巨著中,应提到下列有价值的专题研究:《阿弗拉姆·扬库》(西尔维乌·德拉戈米尔著)、《布拉日国民议会》(瓦·克雷斯特西乌著)、《乔治·巴里齐乌,他的生平和活动》(瓦西里·内蒂亚著)和《巴纳特的1848—1849年革命》(伊·德·苏丘著)。一部以国内、外已发表的而尤其是未发表过的丰富资料为基础编写的大部头著作,是科尔内利亚·博德亚著的《罗马尼亚人争取民族统一的斗争,(1834—1849年)》(1967年版)。最近几年编写和发表在专业刊物上的其他许多论文和研究对阐明1848年革命最重要的阶段、时刻和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编写一部论述这个伟大事件的专题巨著受到我国历史编纂学的注意。

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历史编纂学都把1859年的统一和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王朝时期的变革看作是罗马尼亚历史的基本问题,因而给予特别的重视。过去的一些历史著作给科学和教育界带来了丰富的史料和一系列正确的、证据确凿和经过分析的论点。但是,另一些历史著作则由于片面和缺乏科学观点,一般来说,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缺乏说服力。在这类作品里,1859年的统一不是被描写成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狭隘集

团的事业，就被看作是某些有利的国外环境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新的历史编纂学必须注意研究并扎扎实实地阐明这个伟大事件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根源、统一因素的发展和关系、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立场、欧洲列强的态度、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实现统一中的作用、继它之后的社会政治变革及其意义的原因。

关于这个时期的主要资料汇编之一是德·阿·斯图尔扎的 360
《关于罗马尼亚复兴史的文件和资料》(1889—1909年，1—10卷)。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尼古拉·约尔加"历史研究所新编纂的《关于诸公国统一的文献》，1—3卷，(1959—1963年版)，对扩大知识来源十分重要。

重要的历史学家亚·迪·克塞诺波尔和尼·约尔加在他们浩瀚的历史著作里给予统一以特殊的地位，见：亚·迪·克塞诺波尔的《罗马尼亚政党史》第1卷，第2部分(1910年版)和《库扎大公朝》1—2卷(1903年版)，尼·约尔加所著的《罗马尼亚人历史》第9卷(1938年版)。

历史研究战线大为扩大，纪念统一一百周年(1959年)时成就特多。祖国历史上这个决定性时刻的许多方面，在许多论文中得到论述和澄清，其中有些刊载在专业杂志上，或者见于纪念文集《关于诸公国统一的研究》(1960年版)。同时，《罗马尼亚史》第4卷(1964年版)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描写了近代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形成的总貌。

建立在可观的资料基础上的关于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时期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是康·康·米雷斯库的关于《库扎的生平和事业》的著作(1960年版)。

雅西历史学家们著的《1848—1864年间摩尔多瓦的经济发

展»的出版，是对经济史方面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

尼·阿德尼洛瓦耶和德·贝林德伊的专题研究«1864年的农村法»（1967年版），扎实和全面地分析了亚·伊·库扎王朝期间所实行的主要改革。

1877年赢得国家独立——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必要阶段，理所当然地促使人们去编写大量历史著作。

获得独立前的罗马尼亚独立问题，东方危机的爆发和罗马尼亚的立场，采取保证绝对中立的措施以取得独立的尝试，罗俄协定的签订，罗马尼亚宣告独立前的罗马尼亚政治和军事行动，多瑙河南岸的军事战役，承认罗马尼亚独立——，这么多方面的问题促使罗马尼亚研究工作者写了一系列论文、资料、专题研究和综合性作品，所有这些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历史编纂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

旧历史编纂学总的来说真实地描写了事件，但在许多作品里对人民群众和军队在夺取胜利中的主导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言过其实地强调一些政治人物的功绩。同时，对资产阶级在赢得独立中所起的作用也写得不够。

关于祖国历史的一些综合性著作，从各个方面论述了1877—1878年的事件。尼·约尔加在«罗马尼亚人历史»第10卷«大功告成者»（1939年版）中，第一次把独立战争纳入了欧洲总的背景中去。

在军事史学家的著作中，从资料角度来看，特别有用的有：由一些军官集体编写的«1877—1878年战争史，罗马尼亚的参战»（3卷，1897—1898年版），以及特·克·佛克雷斯库著的«在1877—1878年战争中罗马尼亚人的战斗»（2卷，1886—1887年

版)。

在纪念罗马尼亚获得国家独立五十周年时，发表了一组学术报告，辑于《独立战争》(1927年版)一书。也是在同一时间，尼·约尔加的专题研究《罗马尼亚独立战争，外交行动和精神状态》问世了，这是旧历史编纂学中描写独立战争的最庞大、最客观的著作。

在人民政权的年代里，罗马尼亚历史编纂学开始全面研究独立战争的史料，并加以发表。这项工作是由许多史学家集体进行的，其成果是汇编出版了《罗马尼亚历史文献，独立战争》，10卷，(1952—1955年版)。丰富的情报资料使研究工作者有可能深入研究与宣告独立、战争进程和罗马尼亚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发展有关的各个方面。

最近出版的关于1877年的著作中有集体编写的《罗马尼亚 361
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资料选》(资料和社会政治文选)(1967年版)；尼·阿德尼洛瓦耶和伊·格·库普沙的史论《罗马尼亚民族独立战争》(1967年版)。上述资料和社会政治文选，包括罗马尼亚和外国的政治领导人的讲话、著作、外交照会，军事指挥官的报告，书报摘录，前线战士的回忆录。读一读这些资料就可清楚地看出各个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态度，罗马尼亚士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以及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的主要结局。

对1878—1918年期间罗马尼亚近代史的主要方面和时刻的研究，再次证实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重要性。过去的历史编纂学除了若干例外，长期没有给予这种研究以必要的重视，因而当进行研究时，就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其原因在于政治

和阶级利益从客观上和主观上阻碍他们这样做。我国人民历尽千难万险，不顾敌人气势汹汹，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所取得的卓越进步，是爱国主义自豪感的源泉。对描写我国无产阶级产生和成长的过程——我国近代史上的最重要现象，给予了特别重视。

深入研究所有这些问题的光辉指南是党和国家的文件，首先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在题为《罗马尼亚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的4卷集里所包含的指示。总书记在庆祝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时所作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人民革命和民主斗争的继承者，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传统的继承者》这个讲话，提醒人们注意历史编纂学中存在的一些主观主义错误观点，这些观点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历史实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坚决主张尊重历史真实，批判了一些经济学家和史学家的说法，根据这种说法，罗马尼亚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就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成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其实正相反，研究我国的实际便可得出结论：罗马尼亚是世界帝国主义瓜分和掠夺的对象，而它的一大片领土——特兰西瓦尼亚当时正处在外国占领下。同时，要求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完成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统一的过程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等问题进行更为切实的研究。

这个时期的主要史料，首先是在中央和地方档案馆保存的资料，在已经发表的文献汇编（1888年起义，1907年，工人运动，各种重要法令等）以及当时的报刊和名人回忆录（蒂图·马约雷斯库、塔凯·约内斯库、尼古拉·约尔加、扬·斯拉维奇、亚·马尔吉洛曼、伊昂·拉齐乌、瓦列里乌·布拉尼什特等——

后者正在印刷中)里面保存的资料。研究经济史所需的较为全面的统计史料，有1901—1902年的《工业调查》，而研究政治生活所需的史料则有议会辩论集。在各种类型的史料（直接和间接的，发表的和未经发表的等)基础上了解历史，可得到解释性的作品——具有综合性的一般著作，或论述某个问题或某一事件的专门著作作为补充。

较为重要的历史刊物有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的《研究》和《罗马尼亚历史评论》以及历史科学协会主办的《历史文汇》。我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方面，得到许多专题论著和发表在《历史年鉴》杂志上的文章的阐述。

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增强，把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水平提高到了一个高级阶段。同时，由于土地问题在当时罗马尼亚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以1907年大起义为高潮的农民运动也成了注意的中心。

关于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发轫，有一部著作相当成功地阐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工人阶级发展的主要阶段（尼·尼·康斯坦丁内斯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罗马尼亚工人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史论》，1959年版)。最早的社会主义俱乐部和后来的工人小组的诞生，第一批互助会的成立，初期的罢工运动，无不在这部著作里得到综合的阐述。随着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罗 362
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工人阶级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广泛活动，这说明它在数量上有了增加并积极出现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关于1893年(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成立的那一年)至十九世纪末该党暂时解散时的这段时期，在一部论文集（《1893—1900年间的罗马尼亚工人运动》，1965年版）中得到

了恰如其分的阐述，就其内容来看，这部论文集毋宁说具有专题研究的性质。从编年史的角度看，继这部著作之后有一部关于工人运动改组和1910年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①]成立的专著（尼·科波尤：《1900—1910年间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恢复》，1966年版）。

对喀尔巴阡山彼侧的罗马尼亚领土——奥一匈帝国统治下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受到研究工作者伊·契卡勒、阿·埃杰德、拉·瓦伊达和阿·迪亚克等人的特别重视。

在工人运动史研究方面，研究工作者已经着手编写进行称职的科学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二十多年前出版的文献选集《1872—1916年工人运动文献》（1947年版），包括迄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的工人运动初期的有关史料。此外，最近几年在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所的研究工作者们的关怀下，还编写了满足当前研究需要的其他新书（《罗马尼亚工人报刊和社会主义报刊》，3卷，1964—1968年；《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史文献》，1893—1900年；1910—1915年；1916—1921年；1965—1969年）。

有一系列几乎是不间断的论著探讨了土地问题。1957年出版了《关于1907年农民起义的论文和报告集》，此后又出版了一批篇幅和价值都较小的关于起义在国家各个地区进行情况的史料。十年之后，经过勤奋和细致地研究档案，"尼·约尔加"历史研究所、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所的史学家集体完成了一部关于罗马尼亚农民争取土地斗争最悲惨事件的专题研究巨著（《1907年农民大起义》，1967年版）。有关二十世纪初期的土

① 此处似应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译者

地问题，还应当提及德·胡雷齐亚努的著作《1904—1906 年间罗马尼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斗争》(1960 年版)。值得提出的还有关于 1921 年(这一年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规定把土地分给罗马尼亚的绝大多数农民）以前土地关系和农民争取土地斗争的发展的专题研究〔瓦·利维亚努、尼·鲁塞内斯库、特·伦古、米·约萨、伊·科瓦奇、瓦·博兹加:《罗马尼亚的土地关系和农民运动，1908—1921 年》(1967 年版)〕。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有些文集可以用来研究近代时期的特兰西瓦尼亚历史，如特·珀克齐安发表的文集(《珍书》)，还有用马札尔文和德文发表的选集；从较新的专业参考书目的角度来看，有《特兰西瓦尼亚历史论丛》，第 2 卷;《奥—匈帝国的瓦解》。

在庆祝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五十周年这个民族节日时出版的论著，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标志着我们祖国整个近代史的结束的这一伟大事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指出："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国家全部领土上的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成果，符合罗马尼亚人民发展的历史迫切要求，是民族和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巨大重要意义的时刻。它为造成我们国家和人民的经济、文化发展所必需的环境作出了贡献。"

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解放斗争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斗争随着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统一的完成而告终。为了纪念罗马尼亚人民最优秀的儿女为实现这个宿愿而进行的斗争，罗马尼亚史学家出版了在广泛的文献基础上编写出来的许多著作〔康·达伊科维丘院士和米·康斯坦丁内斯库教授主编的《奥—匈帝国的瓦解，1900—1918 年》，

(1964年版)〕。特兰西瓦尼亚同罗马尼亚统一五十周年时，还出版了其他许多著作，其中有：《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统一的完成，
363 特兰西瓦尼亚同老罗马尼亚的统一》(由米·康斯坦丁内斯库教授和什·帕斯库教授主编，作者有：米·康斯坦丁内斯库、什·帕斯库、拉·巴涅、瓦·库尔蒂克皮亚努、伊·乔治乌、卡·格尔纳、伊·科瓦奇、康·努楚、扬·奥普略、弗·波佩安格、亚·波尔采亚努，1968年版)；《罗马尼亚人民历史上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德·贝尔丘教授主编，1968年版)；《阿尔巴—尤利亚大会》(什·帕斯库著)。

政治生活是直至不久前罗马尼亚的新史学较少研究的章节。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促成一些论著的编写，有些已于最近几年问世〔特·伦古的《十九世纪末的罗马尼亚政治生活(1888—1899年)》，1967年版〕，有些正在刊印中。同时，应当指出瓦·库尔蒂克皮亚努对近代文化和文化机构史所给予的重视。在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进行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资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及其在罗马尼亚近代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了解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增长以及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内部各种分裂的派别和集团之间发生的动荡。

最后，为了结束关于罗马尼亚近代史研究的介绍，我们要指出罗马尼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的研究是不够的。罗马尼亚史学家有责任去分析决定和允许罗马尼亚王国从一个联盟体系转入另一个联盟体系的国内外环境，有责任证明罗马尼亚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协约国的胜利所作出的贡献"以及罗马尼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特兰西瓦尼亚的

罗马尼亚人的民族解放斗争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由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诞生，罗马尼亚人民争取社会正义和民族自由的斗争的光荣传统将被提高到新的高峰，并将在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编纂学中得到相应的阐述。

现　代

365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

战后初期的罗马尼亚

国际形势(1918—1921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中欧列强向胜利的协约国无条件投降和1918年11月11日德国同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而告终。战争犹如漫天大火，在四年时间内耗尽了三十三个参战国的主要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后，宣告结束。这些国家的绝大部分工业遭到破坏，运输、商业和财政紊乱，农业荒废，科学和文化生活几乎完全停滞。

在巨大的物质财富遭到破坏——其中仅军需品的价值就高达两千零八十亿美元——的同时，战争还夺去了两千多万人的生命，其中一千万人丧身于前线，而一千多万人则死于传染病和饥荒。

在战争造成的巨大牺牲的总数字中，罗马尼

亚人民牺牲的人数高达三十多万。为了医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的深重创伤，需要作出长期的巨大努力。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交战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没有能完全进入正常轨道。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道路上造成巨大困难，并使国际形势复杂化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的罪恶的反革命干涉。资本主义大国的反动集团害怕本国的工人阶级效法俄国工农的榜样，急忙勾结起来，发动了反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果的疯狂进攻。

帝国主义势力侵略苏维埃俄国的计划，早在 366
1918年春天，通过英、法、美等国军队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敖德萨等地登陆，通过它们后来同远东的日本干涉军进行的协作而付诸实现了。

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把小国也拉入反苏维埃的干涉。为此，它们趁从1920年春天到秋天使欧洲人民深感不安的俄波战争之机，大肆活动。罗马尼亚政府以及其他小国政府，其中有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拒绝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企图，宣布坚决不介入俄波冲突。

资本主义国家推翻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初次努力于1920年底以可悲的惨败而告终。这些军事进攻以及1920年的波兰军队的入侵，遭到了苏联人民的英勇抵抗，他们在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干涉军，粉碎了国内的白匪势力，保卫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

俄国工人和农民打败国内外反革命的英勇斗争，得到了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积极支持。支持俄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强大的行动发生在欧洲和亚洲。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广大工人群众参加了声援俄国无产阶级的群众大会、示威游行和罢工，为停止反苏维埃干涉而对帝国主义集团施加了强大的压力。1918年间，与日本的所谓米骚动同时发生的芬兰、德国和奥地利的革命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反响。次年，革命运动席卷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并且达到了最大强度，以致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并在短时期内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当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一系列国家里诞生之后，尤其是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以后，革命斗争席卷了日益广大的工人群众。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在担心革命的烈火

可能蔓延到本国的恐惧心理支配下，对工人运动发动了残酷镇压。它们首先把镇压的枪口对准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于1919年夏天摧毁了这个政权。

人民群众的深刻动荡，协约国联盟打败中欧列强，这些都促使战后时期欧洲的政治结构和领土配置发生变化。摆在欧洲各国面前的经济、财政、领土和民族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在1919年1月18日于巴黎开幕的和会上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会议于1920年11月闭幕。

会议讨论的结果在和平条约里确定了下来。
这样，1919年6月28日，协约国在凡尔赛同德国 367
签订了和约，1919年9月10日又在圣日耳曼同奥地利签署了和约。结果，往日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将其老殖民地的一大部分丧失给英国和法国，同时退出列强的行列。在奥匈帝国肢解后，出现并重新成立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波兰和南斯拉夫。接着，于1919年11月27日在纳伊签订了对保加利亚的和约，于1920年6月4日在特里亚农签订了对匈牙利的和约，于1920年8月10日在色佛尔签

订了对土耳其的和约。

协约国中的列强利用其战胜国的地位，保证自己从战败国那里攫取大量领土和财物。更有甚者，它们甚至触犯了小盟国的权利，仅允许它们作为所谓“特惠”国参加会议。尽管如此，它们不得不承认以哈布斯堡帝国的崩溃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主要标志的现实。

从德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总额中，协约国列强只拨出微不足道的百分数分给小盟国。例如，拨给罗马尼亚的不超过这些赔偿价值的1%，这当然同敌军给罗马尼亚人民造成的物质损失远不相称。和约的一些规定和条款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性质，它们允许强占殖民地，规定损害小盟国的战争赔款额的分配，承认列强有干涉小国内政的权利；而另一些条款则确认奥匈帝国的肢解、新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其他一些国家的统一的实现，它们自然都具有符合各国人民要求经济和民族进步的愿望的、先进的现实主义性质。

经济和社会生活，1921 年土地改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里，罗马尼亚的社会经济生活经历了多方面的重大变革。在这个时期，主要的经济部门处于不稳定和紊乱状态，其根源在于德国占领者的有计划的掠夺、战争的破坏和大大小小投机商人肆无忌惮的投机倒把所带来的恶果。

许多工业企业由于没有必要的设备和缺少原料，陷于停工。开工的企业只利用它们一小部分生产能力，新建企业为数微乎其微，因为资金不足或把资金投入更为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使投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由于这种困难的境况，工业生产量尽管不断增长，但在这几年里未能达到战前水平。

在农业发展道路上也出现了一系列困难，阻 368
碍着生产和播种面积的增加。由于缺乏劳动力，农业工具不足和工具的原始性，以及牵引工具的能力小，使粮食产量、播种面积和牲畜头数低于战前水平。事实上，可以看到，1921 年年底以前，没有一个工作部门的生产达到 1913 年的产量。

产量下降一般地也反映在商业活动中，但特别反映在对外贸易中，这个时期的对外贸易一直维持在低于1913年的水平上。

尽管有这些巨大的困难，但罗马尼亚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仍然得到了恢复。经济恢复的需要在那些关心建立民族市场和国家经济繁荣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内部得到了广泛的讨论。这些地主资产阶级集团提出各种活跃经济的途径，但试图把这些变革的全部负担加在劳动人民身上。渐渐地，国家的经济力量通过开发地面和地下资源而增强起来。

为了开发这些资源，大量资本投入各个生产部门。这样，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相结合的同时，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趋于加速。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的相结合成了罗马尼亚经济生活的一个主要特点。资本积聚和集中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银行和工业公司的资本增长速度要比这些公司数目的增长速度快得多。这样，在1919—1922年间，工业股份公司数目增加将近一倍，而这些公司的资本则增长了六倍。同一时期，银行资本增长约四倍，而银行数目仅增加了4.5%。战后，罗马

尼亚的银行和工业公司，也通过接管那些离开罗马尼亚选择了他国国籍的日耳曼、马札尔和奥地利富翁们占主要股份的资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法国、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垄断组织广泛利用中欧列强投入罗马尼亚市场上的资本的削弱，渗入罗马尼亚经济，并占据日益牢固的地位。老王国的资本同罗马尼亚各新省份的大资本的融合如同罗马尼亚资本同外国资本，特别是同英、法、比资本的合作一样，是在为争夺和控制经济活动主要部门的关键地位而剧烈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

罗马尼亚尽管经济实力有所增强，但战后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列强。

但是，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罗马尼亚资产阶级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经济和政治力量不断衰弱的地主阶级则遭到损害。尤其是由于1921年土地改革的实现，地主阶级在罗马尼亚经济和政治中的力量深受打击。

没收地主的部分土地以分配给缺少必要的生 369
活资料、过着朝不保夕的艰苦生活的农民这个问题，从1913年起就在统治集团中讨论开了。这一年，出于种种原因，而特别是出于阻止土地危机加

深的苦心，出于建立尚存在着强大的半封建残余的土地所有制和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工业所有制之间的协调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害怕爆发可能摧毁地主资产阶级国家基础的新的农民起义，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被迫答应分给农民土地。在这些因素压力下，而尤其是由于害怕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统治集团于1918年12月16日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没收地主的一部分土地。但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直到1921年才全部制定。经过这次改革，六百多万公顷土地从地主和国家手里转为农民所有。延宕日久才分配的土地，不是无偿给予农民的，相反地，新的所有者必须支付重金去赎买，而国家只给他们以微不足道的补助。

此外，改革是不彻底的，既没有把地主作为社会阶级加以消灭，也没有为劳动农民创造摆脱地主剥削的牢固的经济基础。尽管具有上述不足之处，土地改革还是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加速了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过程，改善了大部分农民的处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初几年里进行的经济恢复过程，给城乡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创造了从劳

动人民身上榨取更多利润的新的可能。劳动人民的状况，由于失业、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缺少食品，早已变得极度困难。工厂和工场的工人艰难地忍受着剥削的重担。工作日——虽然法定为八小时——延长到十小时，甚至十二小时，而失业的灾难又严重地伤害着工人阶级。

由大批企业停滞所造成的失业大军由于职工在种种借口下遭到解雇而扩大。就业工人不得不接受苛刻的工作条件：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厂房不卫生，任意罚款，老板和工头的凌辱，警察的恐吓等等。职工们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极度劳动，只得到十分微薄的工资。工资虽由于职工的艰苦斗争而获得某些增加，但赶不上消费品和工业品价格的猛涨。

劳动农民遭受的痛苦也并不少。他们被迫忍受地主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剥削，为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家园而辛苦地劳动；他们不得不忍受饥饿和传染病的折磨，担起捐税的重负，同时还要同猖獗的投机倒把这种不堪忍受的灾害作斗争。

在战后年代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如小职 370
员、教师和小手工业者等也身受这些苦楚中的一

大部分。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也反映到国内政治生活中。

内政 选举改革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深刻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罗马尼亚政治生活的深刻危机。这次危机持续了从1918年到1921年的整个时期。

促使这一危机加深从而削弱统治阶级地位的主要因素，是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大大小小的政党内部的动荡和冲突是政治危机的表现形式之一。

有些资产阶级政党不再能适应时代精神和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在这些年里，保守党从罗马尼亚政治生活舞台上消失了。

另一些政治组织和派别由于同战后成立的各种政党合并而消失了。这个时期出现的党派有：人民同盟（后来改为人民党），农民党和劳动党。战后准备成立的有：马札尔党、日耳曼党和犹太党。

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企图通过成立新的政党，把人民置于它们的影响之下，取代旧政党的

已遭破坏的势力，抗拒日益高涨的民主潮流，以便阻挡工人阶级的革命洪流。

新成立的政党和旧政党并肩活动。在旧政党中作用最大的有：民族自由党和特兰西瓦尼亚民族党。

无论是旧政党，还是战后出现的新政党，虽然都冠有最动听的名称，但却更加具有欺骗性，它们的纲领实质上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的，它们都以保证富有阶级的统治为宗旨。

新政党的改组、分化和产生仅仅是国内政治危机的一个方面。这一危机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政府的严重不稳定。在1918—1922年间，由扬·伊·康·布勒蒂亚努、阿尔特胡尔·佛伊托亚努将军、亚·瓦伊达—伏耶伏德、亚·阿维雷斯库和塔凯·约内斯库主持的七届政府相继执政，并且每届内阁几经改组。所有这些政府的政策都是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反对劳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这些内阁由于不能单靠铁腕，即恐怖手段、戒严状态和书刊检查来进行统治，因而不得不对工人群众作某些让步。它们答应，甚至给予了 371
群众某些民主权利，其中首先是在1918年12月

法令基础上进行的选举改革。虽然法律条文强调今后实行义务的、平等的、直接的秘密选举，但事实上这些规定仅在十分狭小的意义上得到了贯彻。选举权的这种限制也反映在排除妇女、军人、青年和法官参加选举，并表现在通过各种手段强制公民投不是他们所希望上台的那些政党的票。可是，不管法令实施情况如何，新选举法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实行的资格选举法前进了一步。

对外政策

在这个时期，罗马尼亚对外政策的中心问题是，通过巴黎和会对特兰西瓦尼亚并入罗马尼亚的承认来巩固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

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的实现是1918年人民群众斗争的结果，加上巴黎和会对它的承认，就实现了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多少世纪以来的愿望。为了在巴黎和会上取得对罗马尼亚人居住的各省的统一的承认，我国执政集团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

由于罗马尼亚政府的活动，在和会上具有决定性发言权的、由法、英、美、意、日等国代表组成

的列强委员会，经过一连串的犹豫和谈判之后，在凡尔赛和约里确认了罗马尼亚国家民族统一的完成。1919年6月28日，罗马尼亚成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该组织是作为一个旨在保卫其成员国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际机构建立起来的。虽然国联宣布全体成员国权利平等，但事实上，在这个会址设在日内瓦的国际机构里面，法国和英国是起主导作用的。

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始终沿着法、英的总方针路线演变着。罗马尼亚虽然在经济和政治上同这两个强国联系在一起，但它并不赞同法、英领导集团的一切外交行动。同时，我国奉行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结盟的政策，这两个国家的总利益是和罗马尼亚一致的。在外交政策中执行这一方针的罗马尼亚，1921年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缔结了双边同盟条约，共同组成了一个以小协约国的名称载入史册的国际政治机构。小协约国的主要目的是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并用联合力量保卫成员国的民族独立和边界。

1921年，罗马尼亚同波兰缔结了以防御为目的的同盟条约。无论是在十月革命期间还是在国

内战争年代里，我国是没有干涉过苏维埃政权的
372 内政的少数国家之一。弗·伊·列宁在1921年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了这一事实，他说："但是还有这样一些国家，那就是尚未同俄国作过战的罗马尼亚……。"① 如果说罗马尼亚政府对俄国的苏维埃政权采取了非战的立场，那末对匈牙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抱敌视态度，于1919年参加了西方列强组织的扼杀这次革命而进行的武装干涉。罗马尼亚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剥削阶级的政策，为保卫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而积极斗争。

1921年底和1922年初，当国际事态逐渐进入其正常发展的轨道时，罗马尼亚政府继续致力于巩固已缔结的同盟，并参加欧洲的政治生活，以维护现状和保卫普遍和平。

1918—1920年的工人运动

引起罗马尼亚人民群众强大的革命高涨的，一方面是国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另一方面是国际局势的影响。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106页。

工业无产阶级站在这场广泛的群众运动的前列，并吸引一系列非无产阶级社会阶层参加了斗争。无论是无产阶级工人群众还是非无产阶级群众都起来斗争，向统治阶级提出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要求，争取新的民主自由。工人们的经济要求是：增加工资，禁止解雇，改善工作条件，采取劳动保护措施，遵守八小时工作制；在政治方面，工人们要求：民主自由，承认工会，承认工人委员会，企业非军事化，国家机关民主化，建立共和国，罗马尼亚政府对俄国革命保持中立等等。工人争取这些要求的斗争是以组织罢工、示威游行、群众大会、街头游行、向厂主、当局、甚至政府递交备忘录的形式进行的。工人最普遍的斗争形式是罢工和示威游行。

在德国军队撤离罗马尼亚后，即1918年11月以后，发展和加强工人斗争有了更大的可能。工人充分利用占领者撤离国家领土以后的时机，在他们内部成立了能对若干生产部门和部分居民的供应进行监督的机构。在这些十分有利的条件下，一系列罢工、群众大会和街头游行开始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工人动荡尤为剧烈。在这里，争取

373 经济要求和建立民主秩序的群众斗争同争取这块罗马尼亚领土与祖国统一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在1918年最后几个月里进行的所有工人斗争中，布加勒斯特印刷工人罢工具有最深远的影响。首都各工厂的职工声援12月初爆发的印刷工人罢工。1918年12月13日，当工人队伍在胜利大街示威游行，要求面包、和平和民主自由的时候，地主资产阶级的军警对他们开了枪。在民族剧院前面进行的这场屠杀中，有数十人被打死，数百人被打伤。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工人领袖，以及一般来说对社会党进行的残酷镇压。就在此时，伊·切·弗里穆被逮捕，遭受毒刑。数月后，1919年2月5日，他为保卫无产阶级事业英勇就义了。

12月13日的镇压灭不了工人的革命锐气。争取经济和政治要求的罢工斗争、示威运动和示威游行在后来的岁月里继续席卷愈来愈广泛的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群众以及特别是对拖延土地改革不满的农民群众。只须举出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社会党党内和党外的革命分子所领导的这些斗争的规模：单只1920年2月29日这一天，三万劳动人民参加了布加勒斯特群众大会，同时在全

国其他二十二个城市里还组织了群众大会。罢工进展的速度如此迅猛，以致从1920年3月1日到10月20日全国举行了三百四十五次罢工，其中仅在布加勒斯特就有一百一十二次。

在工人行动的次数增加的同时，组织包括整个生产部门的工人或整个城市的企业工人的罢工的趋势也日益明显。这些都是预示全国即将爆发总罢工的主要信号。

1920年10月的总罢工

1920年下半年，革命精神支配着越来越广泛的工人和农民群众。铁路工人不顾国家镇压机关的迫害，于1920年7月开始准备由全国铁路职工参加的罢工。同月爆发了邮电职工的罢工，罢工具有总行动的性质。在邮电职工罢工的同时，布加勒斯特电车公司工人以及锡比乌、雅西、克拉约瓦、克鲁日、蒂米什瓦拉和布拉索夫等地各企业的职工也举行了罢工。

1920年9月初，一次示威性罢工席卷了特兰西瓦尼亚大部分城市的企业和机关的工人群众。在工人行动的浪潮汹涌澎湃的情况下，社会主义

组织和工会组织要求社会党总委员会采取措施，
374 准备全国总罢工。1920年10月11日，社会党总委员会向政府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陈述了工人的愿望。这份备忘录要求：尊重劳动人民的组织权利，承认工人代表和工人委员会，从工厂撤走军队，停止实施反罢工法，取消戒严状态和书刊检查，增加工资，遵守八小时工作制，等等。

政府拒绝满足工人的要求，这自然导致总罢工的爆发。在社会党和工会总委员会发表致群众的呼吁书后，席卷全国工人、职员和知识分子的这次罢工于1920年10月20日爆发了。尽管当局采取了十分残暴的镇压措施，罢工一般都持续到10月28日，而在某些企业和城市则延长到1920年11月中旬。

罢工之所以停止，不仅由于政府的镇压措施，更重要的是因为社会党领导中的机会主义者采取了合法主义的策略。他们要求罢工参加者呆在家里，从而剥夺了他们为争取实现要求而积极行动的可能。

总罢工是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在全国统一开展的首次行动。总罢工的规模和革命战斗性使它成

为罗马尼亚阶级斗争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总罢工显示了我国工人的力量、勇敢和团结精神，显示了支配着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及其政治上的成熟程度。它强烈地动摇了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本身，表明了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气魄及其掌握全国人民命运的能力——后来历史已经充分证实了这种能力。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在总罢工时显示出来的这些特性，博得了各国劳动人民的同情和钦佩。

总罢工给我国工人阶级提供了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教训，其中最宝贵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政党来组织无产阶级、农民和中等社会阶层的力量以推翻剥削阶级政权。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诞生

为建立罗马尼亚共产党而进行的思想斗争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社会主义思想得到了广阔的传布场所，它在劳动人民的各个阶层，而尤其是在工业无产阶级中间传播开来。在 375
1918—1921 年期间，这些思想的传播者是社会党

党员、工人的工会组织的会员以及虽然人数不多、却在党内外进行活动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德国占领军从我国领土上撤离后，工人组织的活动日益波澜壮阔。

1918年11月，原社会民主党改名为罗马尼亚社会党，这当然对它未来的政治方向具有深刻意义。从这时起，党员的人数不断增加，1920年达到十万人。这个事实促使工会会员人数急剧增长。

社会党通过一系列宣传工具，尤其是通过它的中央机关报《社会主义报》和1920年7月创刊的杂志《阶级斗争》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思想。

社会党的思想是不统一的。在这个党内部存在着三种思潮。最强大的、正处在蓬勃发展中的思潮是左派思潮，它包括一切革命分子，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这一思潮有大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其中有格·克里斯特斯库、亚·多布罗加努—盖里亚、伊·切·弗里穆、达维德·法比安、潘德列·贝克亚努、康斯坦丁·伊佛努什和格·米·瓦西列斯库—瓦西亚。左派的杰出战士们虽以一种革命观点作为指导，但错误地认为罗马尼亚面临无

产阶级革命，并对摆在工人运动面前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问题提出了不现实的解决办法。

在社会党内，除了左派以外，还出现了以扬·西翁为首的改良主义者的右派以及以伊利耶·莫斯科维奇为代表的中间派，这一派设法调和当时党内存在的各派。从这个时期之初，左派代表就在党内占主导地位。1918年12月9日发表的社会党《原则声明》实质上体现了他们的思想。这个声明的规定，指导了社会主义者的活动，直到1919年5月社会主义运动代表会议通过党纲为止。党纲包含了由于左派分子的努力而写人的一系列革命的原则和论点，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为争取民主自由而进行斗争，罗马尼亚社会党声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等。此外，党纲还含有在右派和中间派的要求和压力下接受的机会主义思想。

左派分子严厉谴责党纲背弃了1918年12月社会党《声明》所包含的原则，许多具有革命精神的工会干部和社会党党外的工人同他们站在一起。

这种态度是工人运动而首先是社会党多数党

员思想成熟的表现，他们越来越坚决地要求同机
376 会主义派别划清界限，以便尽早着手建立无产阶
级的革命政党。

澄清思想的斗争从1919年起就蓬蓬勃勃地展开了，社会党的许多支部，首先是布加勒斯特、加拉茨、布勒伊拉和伯尔拉德等地支部日益坚定地号召它们的党员坚持共产主义原则，宣传建立共产党的思想，宣传党加入第二国际。① 次年，社会党的大多数支部通过动议，越来越坚决和断然地提出工人阶级的这些首要的政治愿望。

左派的压力变得如此强大，以致总委员会决定于1920年4月召开总代表大会，以便把社会党改成共产党并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但由于右派拥护者的阻挠，这项决定未得实现。执行委员会准备在1920年8月和后来准备在9月召开代表大会的尝试，同样也由于右派分子的激烈反对而告失败。

1920年秋天，由格·克里斯特斯库、亚·多布罗加努一盖里亚、达·法比安、埃·罗兹万、

① 第二国际于1914年破产，第三国际于1919年成立，此处应为第三国际。——译者

康·波波维奇和扬·弗卢埃拉什组成的罗马尼亚社会党人代表团在莫斯科同第三国际代表进行的直接接触，也是建立共产党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罗马尼亚社会党人代表团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就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罗马尼亚社会党人的工作和社会党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罗马尼亚社会党人代表团宣布同意共产国际的基本原则，但同时拒绝第三国际代表们对罗马尼亚形势的某些方面所作的错误估计，认为这些代表所坚持的意见——罗马尼亚社会党人赞助缔造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斗争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是不正确的，并抗议共产国际所采取的确定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成员的措施。在代表团从莫斯科返回以后的时期里，在1921年1月30日—2月3日举行党和工会总委员会会议时，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形式以加速思想澄清的过程。经过一场思想性质的激烈争论之后，社会党内各派在组织上也严格划清了界限。在这次会议上，以扬库·奥尔蒂亚努、潘·贝克亚努、格·克里斯特斯库、伊昂·埃列纳和达维德·法比安等为代表的左派坚决主张建立共产党，主张

加入第三国际。以特奥多尔·约尔德凯斯库、杜米特鲁·波普和达米安·伯勒内斯库等为代表的中间派保持在右派和左派之间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的旧立场。以扬·弗卢埃拉什和约·茹曼卡等人为首的右派反对建立共产党。右派分子处于少数，
377 他们脱离了党；而中间派分子虽留在党内，但没有进入执行委员会。同时，左派分子使自己的观点取得了胜利，决定召开社会党总代表大会。

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大会

党员十分满意地迎接左派的胜利，他们通过自己的支部着手直接进行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根据1921年1—2月总委员会会议的决定，社会党代表大会于1921年5月8日在布加勒斯特开幕。二十九个党支部的代表出席了大会，计有五百四十名代表，其中三百八十名主张党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七十八名主张有保留地参加，而八十二名则在讨论过程中视情况确定自己的立场。

列入大会日程的有对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具有极大重要意义的问题。

社会党书记格·克里斯特斯库在大会上作的主要报告，对党的活动作了批判性的回顾，但没有全面地谈到党的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大会十分认真地讨论了未来的党的纲领和它参加第三国际的问题。关于党纲的报告着重指出采取共产国际的原则和策略的必要性，建议党取名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产党”并无条件地加入第三国际。它明确指出，新的政党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在1921年5月11日会议上，大会投票赞成成立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全部选票中，四百二十八票赞成党无条件加入共产国际，而一百一十一票主张有保留地参加。

从投保留票者的态度来说，他们表示赞成加入第三国际，但不全部接受所提出的条件，更确切地说，不同意党完全从属于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因此可以说，1921年5月代表大会一致决定把社会党改为罗马尼亚共产党。

大会还讨论了以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组织和思想原则为基础的党章。

讨论章程以后，大会代表们仔细分析了土地

问题。在分析中，除了一系列正确的论点和思想之外，还发表了一些错误的意见，如关于全部土地必须国有化的看法，这种意见来源于对罗马尼亚土地现状的认识不够。

大会未能彻底讨论土地问题，而且也未能就青年、民族和合作社问题进行讨论，正如未能通过关于党纲和党章的最后决议一样，因为，5月12
378 日晚，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机关解散了大会，逮捕了那些无保留地投票赞成党加入共产国际的代表。接着，对他们提出了诉讼，这就是著名的斯皮里坡案件。

共产党的创建是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确保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提高到一个高级阶段。罗马尼亚共产党屹立于政治生活舞台上，组织反抗剥削阶级的社会斗争，把无数英雄主义和革命牺牲精神的篇章载入了祖国史册。

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稳定时期的罗马尼亚(1922—1928年)

国际形势

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巨大努力，渡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萧条和紊乱阶段，转入了暂时繁荣时期，这在历史上称之为资本主义暂时和局部稳定时期。

在国际上，这个时期始于1923年前后，当时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出现了恢复的迹象。但资本主义的稳定首先反映在经济的暂时高涨上。资产阶级通过资本主义的合理化，通过采用新工艺和广泛使用近代化设备，而尤其是通过剥削工人阶级，终于活跃了工业，并使世界生产获得了增长。早在1925年，世界生产就比1913年增加了20%。在世界工业生产增加的同时，贸易交换额也扩大了，货币和信贷制度巩固了，资本的输出额大大增加了，从而创造了有利于建立大垄断组织的必要条件，例如：德国的托拉斯

“伊·格·法本工业公司”和“联合钢铁公司”、英国的托拉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和瑞典的托拉斯“克鲁耶尔公司”等等。

随着经济的活跃，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了日益广泛的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的增长是不平衡的，这反映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小国，仍然依赖资本主义列强，而特别是依赖在这个时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银行家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一事实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的资本主义列强，还通过从开始时就按照所谓《道威斯方案》调整的
379 战败国的战争债务中捞取巨款，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这项也旨在恢复德国的军事工业力量的方案，是于1924年初由英、法、美财政专家们制订的，其有效期至1929年。

随着经济的稳定，资产阶级的政权巩固了，这是在扑灭了全世界人民群众的革命高潮之后取得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是在深刻的矛盾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除了经济方面的矛盾加深以外，还有国际上的政治分歧，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

国和战胜国之间的矛盾。

和约规定的维持领土现状是这些矛盾的主题，战败国力图通过各种途径破坏和约，以准备复仇。土耳其的深刻动荡和希土冲突成为欧洲不安的一个根源。希土冲突爆发于1920年，是由于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丘尔克组织的抵抗运动反对剥夺土耳其的一些合法权利的色佛尔条约规定而引起的。1922年，默达尼停战协定平息了冲突，接着举行了洛桑会议（1922年11月）。会议调整了土耳其的海峡问题和领土问题。

1925年以前，和约的实施未遇到多大困难，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受到复仇主义者行动的干扰。1925年10月，英、法、意、比和德等国签订了洛卡诺公约。公约保证德国的西部边界和法、比的东部边界，但是把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边界安全置于这些保证之外。这样，战胜国通过洛卡诺公约向德国作出了隐蔽的让步，而使巩固东部边界问题悬而不决。

洛卡诺公约的精神逐渐支配了一大部分欧洲外交官，减少了维护和约的可能，因而也就减少了保卫和平的可能。

法国政府由于担心德国的侵略性并为了挫败修改领土现状的任何图谋，于1927年照会美国政府，号召它一起向所有国家提议缔结一项不侵略的总公约。1928年8月27日，由一系列国家间签订的这个条约，以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这个名称载入史册，它要求缔约国承担放弃战争和只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的义务。

在苏联政府的建议下，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于1929年2月在莫斯科签署一项议定书，使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提前生效。

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苏联在国际上的政治威望不断增长。这种威望的增长基于苏维埃制度
380 在各方面得到的巩固。但是，与具有持久性的苏维埃制度的长期稳定不同，资本主义的稳定逐渐明显地暴露出其基础的全部脆弱性。在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各国内部的矛盾、革命浪潮的高涨和殖民制度危机加剧的冲击下，资本主义的稳定于1928年底就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可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经济和社会状况

1922—1928年间，民族工业的力量大为增长。煤炭的产量由1922年的二百万吨左右增加到1928年的三百万吨以上，而原油的产量在同期由一百二十万吨提高到四百多万吨。天然气的开采量、铁矿、金、银和盐等矿的开采量也以类似的速度得到了增长。获得重大发展的有：加工、冶金、化学、电力等工业部门。

一般来说，罗马尼亚的工业生产从1923年到1928年增长了56%。由于工业的发展，原有的垄断组织得到了巩固，并且产生了新的垄断组织。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操纵着一大部分罗马尼亚工业的最强大的垄断组织是："蒂坦—纳德拉格—卡兰"冶金托拉斯，"索科梅特"冶金辛迪加，"食糖销售公司"辛迪加，"造纸工业"辛迪加，"佩特罗香"和"米卡"矿业康采恩，"罗马尼亚阿斯特拉"、"罗—美"和"协和"石油公司，"布胡希"制呢工业康采恩等。

尽管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成绩，但罗马尼亚继续处于经济不发达国家之列。

在国家整个经济中，占优势地位的部门同以往一样，仍然是农业。农业在这个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具体表现在播种面积大为扩大、粮食产量增加、比前个时期更广泛地使用已经改进的农具和资本主义关系加紧渗透等方面，面这是实行土地改革——虽然是不彻底的——的结果。

工业的恢复和经济的高涨也在其他活动方面显露出来，象公路运输、水运和空运，国内外贸易，货币流通，信贷，金融，财政等等。除1928年外，国家预算在稳定时期是平衡的。这种平衡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得到保持的，因为有大量外债牵制着预算，其中仅1923—1928年就向国外支付了一百八十五亿多列伊。

金融体系迅速发展。经营各种业务的银行数目由1922年的六百八十三家增加到1928年的一
381 千一百二十二家。银行资本日益雄厚，以股份形式渗入工业领域，并通过它同工业资本的相互渗透，扩大了财政资本总额，从而促进了财政寡头经济实力的增长。

在资本主义稳定年代，经济的普遍发展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即由于采用了新工艺，使用了

效率较高的机器和工具，采用了合理化生产的方法等等。同时，还由于实施了一些保护民族工业，也就是增强罗马尼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法律。但是1922—1928年间生产和资本家利润的增长的主要来源却是对于城乡劳动者的剥削。

为了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工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们通过不断斗争力求维护或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工人的压力促使统治集团于1925年制订了一项特别法律，规定厂主和国家必须尊重星期日休息制，但这项法律经常以种种理由遭到破坏。同样由于工人斗争的结果，采取了一项法律，规定通过调整工作日的时间、社会保险和现金报酬的途径来保护未成年者和妇女。但实践证明，这一法律的执行情况也没有符合工人的期望。虽然经济活动的扩展使失业人数显著下降，特别是在这个时期的最初几年里，但是一部分工人仍然遭受着失业的痛苦。

各个经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要自然促使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比战争刚结束后几年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在稳定时期的最后一年由于消费品价格上涨而部分抵消了。苛捐杂税的重担、形形色

色的罚款和通货膨胀的毁灭性恶果，沉重地压在城乡劳动群众肩上。

农民群众因赎买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而负债累累。这些债务，加上苛重的土地税、用于精耕细作的农具的不足以及各种债款的重利盘剥，这些都破坏着小农所有制，并造成劳动农户破产。

许多农户陷入破产状态之中，不得不把他们仅有的小块土地出售给富农和地主，从而扩大了农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在这种形式下，农民分化成无产者和富农的过程也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不断加深。除工人和劳动农民外，小手工业者、小职员、教师和其他阶层的劳动人民也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382 国内政治生活

伴随着1922—1928年罗马尼亚经济活跃的是统治阶级政治地位的显著巩固。

在这几年里，政治形势稳定的最有说服力的标志是民族自由党连续执政多年。自由党于1922年1月上台，直接掌管国家事务直到1926年4月。此时，它为了挽回自己狼藉不堪的声名而隐

退，并通过一系列手腕先后把阿维雷斯库将军和巴尔布·什蒂尔贝伊主持的政府推上台，以便于1927年6月22日推倒这个屏风内阁，并重新执政，直到1928年11月。

自由党人在他们执政初期，在斐迪南国王去世前不久，起来反对其继承人卡罗尔亲王，因为他们怀疑他登基以后将为其他财政和政治集团的利益效劳。1925年底，在自由党人的逼迫和他自己的私事的引诱下，卡罗尔亲王出国，并定居于法国。斐迪南国王去世后（1927年），设立了摄政，直到1930年6月卡罗尔从法国归来。

无论是自由党组织的政府还是1926—1927年间也是奉该党之命执政的其他政府，都是通过恐怖手段、书刊检查、戒严状态和资产阶级统治方式所特有的其他手段来维持统治的。它们力图使法制和统治方法适应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生的变化。自由党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实施1923年3月议会通过的新宪法。实质上，新宪法仍然是资产阶级据以保证自己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的主要法律基础。新宪法除了保证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和宣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

的条款以外，还包含了在形式上具有民主性质的规定：“工作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选举权”等等。事实证明，城乡劳动群众要享有这些自由和权利，必须进行长期斗争和经受统治阶级实行的无数苛刻法律的限制。其他法令，如1925年的行政管理法，则有助于调整国家在某些领域的活动。

自由党政府一贯推行反工人和扼杀公民权利与自由的政策。这一政策反映在施行《镇压危害公安法》中。这项法令无非是包含针对工人，尤其是针对共产党人的行动的规定。自由党政府的反工人的法令通过禁止罗马尼亚共产党合法活动而达到其反动顶峰（1924年）。政府由于害怕工人的激增的不满会引起巨大的群众行动，通过了一项特别法令，建立劳动监察处。这个机构尽管工作有缺陷，但对调整劳动以利于工厂的职工作出了一定贡献。至于自由党政府的土地法令，它只
383 不过是为了保护地主、富农和佃主，把愈来愈沉重的捐税和日益苛刻的限制压在劳动农民身上。

在1922—1928年间，政府的稳定和一般说来资产阶级政治地位的巩固，都没有排除罗马尼

亚政治力量的动荡和改组。资产阶级政治组织的一次重大改组是以尤利乌·曼纽和亚历山德鲁·瓦伊达—伏耶伏德为主要头目的特兰西瓦尼亚民族党同以扬·米哈拉凯为首的农民党合并，从而组成了自由党政府最大的反对党——民族农民党（1926年10月）。这种对抗当然不会具有什么原则斗争的形式，因为两个党都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它只不过是为了上台以保证自己拥有剥削劳动人民而发财致富的更大可能而玩弄的一种政客手腕。在民主资产阶级各政党合并和分散的同时，这几年在罗马尼亚的政治生活中还出现了极右组织，例如，具有民族沙文主义倾向的“全国基督教保卫同盟”和靠国内反动上层和外国法西斯集团支持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法西斯组织“天使长米哈伊尔军团”。但是，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能在1922—1928年间建立起群众基础，因为它们的纲领在于压迫人民和扼杀民主权利与自由。

对外政策

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年代，相继在我国执政

的各届政府，象前一个时期一样，继续奉行倾向于维护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对外政策。为了实现这些愿望，历届政府谋求加强同那些和罗马尼亚有着共同利益的国家，首先是小协约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以及法国、英国的联系。

1924年，罗马尼亚政府参加了旨在使罗苏关系正常化的维也纳会议，但会议未能圆满结束。罗马尼亚由于切望通过保卫和约规定的领土现状来维护和平，关切地注视着1925年在洛卡诺进行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罗马尼亚政府反对法、英、德、比、意等国政府只给予某些国家而不给予另一些国家以保证的倾向，要求找到保障所有国家安全的手段。列强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使罗马尼亚最后采取了有利于洛卡诺公约的立场。

1926年3月，罗马尼亚本着巩固同支持战后现状的国家的联系的倾向，修订了1921年与波兰缔结的政治同盟条约，同时用一项新的协定代替了附属这一条约的旧的军事协定。在修订了与波
384 兰的条约后不久，即于1926年6月下半月，罗马
尼亚同法国缔结了同盟条约，这巩固了它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同时调整了同意大利的关系，同它

缔结了一个友好条约，但这一条约在我国对外政策中只起次要作用。

为了和平利益而缔结的任何同盟、友好条约和国际协定，都受到罗马尼亚政府的欢迎，或者甚至成为它迅速加入的对象。罗马尼亚按照这一行动准则，于1928年9月参加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公约宣布战争为非法，并谴责一切侵略行动，虽然没有规定实现各国人民这一愿望的必要措施。签署这项公约后不久，罗马尼亚政府参加了苏联倡议的莫斯科议定书。罗马尼亚参加这项旨在使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提前生效的议定书，是它对外靠拢苏联并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政治中与其携手前进倾向的新的表现。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活动和工人运动

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年代，国际工人运动的特征是进展缓慢，而且明显地走向革命低潮。但是在这种低潮的背景下，发生了一系列工人反抗剥削、反抗资产阶级企图侵犯革命高涨岁月里所争得的权利和自由的行动。这样，1922—1925年间，由于共产党和工会的努力，组织了一系列罢工，其

中突出的是阿拉德的阿斯特拉工厂、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铁路工厂“格里维察”以及布拉索夫、奥拉迪亚、加拉茨、蒂米什瓦拉、克鲁日、萨土—马雷和康斯坦萨等地其他工厂的罢工。这个时期的最后几年，当厂主对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进攻更为激烈，生活费用显著增加和许多厂主拒绝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的时候，无产阶级斗争的规模有所扩大。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里，以各种形式，但主要是以罢工的形式爆发了许多劳资冲突。但最常见的罢工发生在冶金、采矿和食品工业企业中。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在1922—1928年间，全国发生了三千三百二十九起集体的劳资冲突，约有五十万名职工参加。这些斗争并不是徒劳的。一般来说，它们给参加者带来的是使先前他们所获得的一些权利受到尊重，而在有些地方甚至使工资有显著增加。

产业工人的斗争精神也感染了一部分农民，他们对拖延实施土地改革法不满，他们受地主的剥削，被苛重的捐税和银行债务压得透不过气。这些原因决定了农民的某些动乱，在勒姆尼克—塞拉特、特列奥尔曼、苏恰瓦、雅西和伊尔福夫等县

的村庄里，动乱采取了抗议和地方性激烈行动的形式。

无论是工人斗争或是农民的一系列行动都是 385
在共产党和工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进行的。

工会不顾形形色色的禁令和自己正处在组织过程中这个事实，对这几年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1921年5月通过的特兰库—雅西法组织起来的一系列工会，力求抗拒这项法律的规定而按阶级斗争原则来开展活动。

1922年6月以前，各工会由两个中央机构领导，其中一个设在布加勒斯特，另一个设在克鲁日。从锡比乌举行工会代表大会这时开始，工会运动统一起来了，这不论在影响方面或会员人数增长方面都加强了工会组织。统计数字表明，至1923年底，工会会员人数已经达到七万五千名。罗马尼亚工会运动的统一发展仅仅持续到1923年9月，那时在克鲁日举行了工会总代表大会，会上右翼社会民主党头目在警察的帮助下开除了反对工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工联的大多数代表。被克鲁日大会开除的那些代表，是工会运动的革命派，他们于1923年10月汇聚于布加勒斯特，

成立了由自己的中央机构领导的统一工会。统一工会依照阶级斗争原则开展了活动，始终不渝地为恢复工会的统一而奋斗。共产党在组织工会活动和工人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

罗马尼亚共产党从1921年5月成立到1924年4月进行了合法活动。但在这几年里，共产党必须克服在巩固自己队伍中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同时还必须抵制国家镇压革命运动的措施。1921年12月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全国加紧组织自己的支部。

这使共产党得以参加1922年春天的议会大选。这一年年底，在普洛耶什蒂召开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估计了目前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发展阶段，确定了巩固工会和组织无产阶级力量来保卫自身权利并争取新要求的斗争的必要性，提出没收土地以供农民使用的口号，向党员提出了为争取罗马尼亚各民族权利平等而斗争的义务，通过了党章，选举了以格奥尔基·克里斯特斯库为总书记的中央委员会。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的时期里，组织和巩固党的队伍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使共产党员扩

大了在城乡劳动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的阵地。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内部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民族方面的各种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的 386
意见。1924年最初几个月，党内的争执加剧了，那时党的领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机械地采纳了让绝大部分是罗马尼亚人居住的领土“实行自决，直至脱离罗马尼亚国家”的口号。1924年春天，政府以此为借口，下令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由于党内政治和策略问题的分歧逐渐加深，产生了一些真正相反的思潮，地下工作的条件越发受到损害。共产党员的活动在非法的基础上进行改组后，于1924年8月在维也纳召开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虽然对一些经济、政治和组织问题作了一系列积极的现实主义的估计，但它谴责了中央委员会，并拒绝了它的工作报告。这种做法不但没有根据，而且给党后来的活动带来了危害。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加紧从事巩固党的队伍的工作，批判了取消主义和宗派主义分子的危险倾向。1925年7月举行的中央全会特别着重地进行了这项工作，同时还就合法活动与地下活动相结合以及采

取有效方法使全党在思想上受到锻炼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为了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1925年7月全会后，在共产党员的倡议下建立了合法组织，如："人权同盟"和"工农同盟"。这些组织利用各种政治时机，特别是议会选举运动，在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和纲领中起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虽然取得了这些成绩，但由于遭到地主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残暴镇压，由于内部分歧而力量显然削弱，所以它尚无足够准备来解决摆在它面前的所有问题。为了讨论罗马尼亚共产党队伍的状况，共产国际于1928年6月在哈尔科夫召开会议。尽管出席会议的罗共中央委员寥寥无几，尽管没有仔细研究社会现实，尽管既没有准备一份全面的工作报告，也没有组织讨论，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把会议改成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会上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他们不顾统一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批评前中央委员会在前一时期没有广泛宣传民族自决直至脱离罗马尼亚的口号。

这些措施不但远远不能平息党内的争执，反而使之更加激化，以致在后来的几年里爆发了毫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共产党在为组织工人运动和组织自身而进行斗争的同时，还大力引导和领导了革命的青年运动。

青年组织在建立起自己活动的思想和组织基 387
础以后，于 1922 年 3 月组成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 4 月它取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这几年，除了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和统一工会之外，罗马尼亚各地区社会党联盟也对我国工人运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该党成立于 1921 年 6 月，并于 1927 年 5 月组成社会民主党。该党一般来说提倡改良主义思想，并且长期反对在革命基础上统一工人运动。

1929—1933 年的经济危机时期

国际形势

1929 年，一场深刻的生产过剩危机笼罩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场危机一直持续到 1933 年。所有的经济部门都深深地感受到

危机的后果，工业、商业、农业、运输、金融和信贷体系等都受到猛烈地打击。

经济危机的后果触及一切社会阶层，虽然程度有所不同。广大劳动群众受到的打击特别沉重。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失业的灾难危及约三百五十万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除此而外，工人还要忍受工资的屡次削减、劳动强度的加强、工作日的延长等等。而农民群众则忍受着捐税和债务的重累以及由于地租保持高价、由于无力购买农业机器和肥料等原因而产生的重重困难。其他社会阶层也相当深刻地感受到危机的后果，如：小职员、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和经不起大资本的竞争而多数陷入破产境地的小商人。

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危机的困境中挣扎的年代，正是苏联城乡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高涨时期。这几年，苏联工农业的发展使得总生产量显著增长，这种增长的影响在各方面都可以感觉出来，而且也反映在人民的生活水平上。

苏维埃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巩固遇到了帝国主义集团的一系列敌视行动。

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体系和第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也加剧了。这个时期，美国和日本之间，法国和意大利之间，英国和法国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也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388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和以德国为首的战败国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后者为了有利于自己，千方百计地试图重新划分经济势力范围。在这种政治气氛中，到处都在加速军备竞赛。

资本主义大国中的帝国主义集团，如美、英、法，除了武装自己外，还积极支持德国和日本的武装。

这样一来，受到纵容的日本首先走上侵略道路。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了满洲。由于日本进行了旨在征服全中国的侵略，在远东就产生了危险的战争策源地。

日本入侵满洲以后，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起来。1933年1月，希特勒分子的上台标志着这种紧张关系的最严重的时刻。希特勒分子利用英、法、美帝国主义集团给予的贷款和国内的反动势力，开始为在非洲扩大自己的殖民帝国

作准备，并在需要争得尽量多的“生存空间”的借口下为在欧洲东部取得行动自由作准备。希特勒主义在德国上台及其为通过侵略进行复仇所作的准备，成为世界上产生第二个战争策源地的最显著的信号。全世界为了挫败复仇主义国家的侵略准备不断进行斗争。一些反对修订主义[①]的国家的外交，在这一意义上展开了十分紧张的活动。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对这一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无产阶级反对侵略的行动，同时也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企图把危机的重担强加给劳动人民的表现。

这些革命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抗击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经济攻势，并抑制了国际法西斯力量的上升。

罗马尼亚的经济危机

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漩涡把地主资产阶级的罗马尼亚也卷了进去。

危机表现为：生产下降，工农业产品价格下

① 这里的反修订主义专指反对修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下同)。——译者

跌，银行和信贷业务紧缩，多数商业活动停顿，破产的数目增加。从1929年开始到1933年出现了工业生产大量缩减的过程。从价值上看，大工业的全部生产从1928年到1932年缩减约48%。特别是生铁、钢、煤、铜等产品的产量大为缩减。在金属加工工业部门中，所有部门的产量都有一定的下降。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生产的消费品工业，受到危机的强烈冲击，在危机年代，广 389
大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不断下降。在整个生产部门中，只有石油工业、纺织工业和制革工业没有被危机卷进去。

在罗马尼亚，象在其他国家一样，工业危机也是同农业危机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我国农业危机最尖锐的表现形式之一，反映在农产品价格的猛跌上。从1929年到1933年，农产品价格指数由100下降到40，而畜产品价格指数在同期从100下降到38.1。总的来说，罗马尼亚的农业产值由1929年的一千零五百三十亿列伊降低到1931年的四百六十四亿列伊。如果说经济危机对农产品的价格水平有严重影响，那末它对播种面积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却没有这样大的影响。由于一系列的

原因，播种面积仅在1930—1932年比1929年略有减少，在其他几年甚至还有一定增加。虽然从数量上看农业总产量增加了，但从价值上看，农业生产由1928年的六百三十亿列伊下降到1933年的二百二十亿列伊。随着物质生产和流通从根本上受到冲击，财政金融体系也出现了极度混乱。由于罗马尼亚在财政上紧紧依赖于西方资本，所以这种混乱就更为严重。我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现象是：外国的信贷大量停止，公众提取存款由自己贮存和收益。银行应付不了外国资本和信贷回抽所造成的财政困难，并只能满足存款人的极小部分要求，于是就开始相继倒闭。从1929年到1933年，银行的数目由一千零四十八家减少到七百九十四家。

在经济危机时期，尽管罗马尼亚的金融财政体系受到强烈震动，但尚有一定数目的金融机构继续营业。它们经受住了竞争，甚至大都利用较弱的机构的破产扩大了自己的利润和资本。这表明在经济危机年代里出现了银行资本极度积聚和集中的过程，这种过程其实也以一定的强度发生于工业领域。国家的工业、商业和财政命脉逐渐落

入财政资本手里，从而有害于劳动人民群众。

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伙同外国资本对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发动了名副其实的进攻。由于生产紧缩和企业破产，大量的长期失业空前增加。在危机年代里，完全失业和部分失业的人数超过三十万。

伴随着企业和机关的职工人数减少而来的是延长工作日。在石油工业、采煤和其他生产部门，工作日长达十四小时。此外，美其名为“牺牲曲 390
线”的工资的连续不断的降低，捐税的苛重，房租的上涨和工作条件的恶劣，都大大恶化了工人群众的景况。

同时，在危机期间，许多阶层职工和知识分子的工资和退休金不能按月发给，当然进一步加深了贫困。危机的后果也沉重地压在劳动农民、职员、教师、津贴领取者、残废者、小商人和小工业者的头上，对他们政府在这些年里没有表现出最微小的关心。

国内政治生活

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也深刻地搅乱了国家的

政治生活。生产过剩的危机使罗马尼亚国家面临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严重问题，无论在各政治党派之间还是在其内部都引起一系列矛盾。许多党员，甚至整个派别脱离主要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然后组成独立的政党。

通过各种途径，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政治党派的数目由 1928 年的七个增加到 1932 年的十七个。这些新政党的名称虽然五花八门，政治色彩却是一样。它们的出现，如果用资产阶级当权者的贪财或者他们想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倾向来解释，只能得到部分的说明。

导致这些新政党成立的主要原因在于统治阶级需要维持自己对群众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危机期间业已削弱，因为各大政党逐渐地名誉扫地。1930 年 6 月回国的国王卡罗尔二世也在这方面推波助澜，他力图拆散和取消各政党，以便建立他个人的独裁。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的分裂、统治集团无力阻挡工人运动高涨以及政府的不稳定，表明 1929—1933 年间笼罩着统治阶级的深刻的政治危机。

在这个时期，除了有一年（1931年 4 月—1932

年5月）是由尼古拉·约尔加领导的政派“民族联盟”执政外，均由民族农民党执掌国政。该党于1928年11月上台，截至经济危机结束时从它内部组成了八届政府。无论是民族农民党政府还是约尔加—阿尔杰托亚努内阁，都一贯采取旨在把危机的重担转嫁给劳动人民、并尽可能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措施。这些政府通过了一系列反工人
的法令，设立了新的军事法庭审讯和判决革命分 391
子，发动了一场解散统一工会和压制工人的任何表示的名副其实的进攻。为了破坏革命宣传，统治集团禁止一些民主报纸出版，禁止一些民主组织进行活动。

恐怖手段、戒严和书刊检查一直是它们真正的统治手法。为了拥有一支反对革命运动的突击力量，民族农民党的一些头目在1929年支持法西斯组织铁卫团的成立和活动。

除了政治方面的措施以外，危机时期执政的历届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经济法令。民族农民党分子一上台，就开始实施他们在野时声嘶力竭地加以宣传的对外国资本的“门户开放”政策。

这样，通过信贷和工业投资的途径，但主要是

通过国债的途径，大量的西方资本被引进我国。

外国贷款人向罗马尼亚提出十分苛刻的借款条件。他们要求以物质担保借款，要求把这些款项用于对他们有利的方面，要求有权对罗马尼亚国家财政进行监督并要求得到我国国内政治稳定的保证。尤·曼纽主持的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于1929年初从美、法、英、德等国一系列银行那里获得一亿零一百万美元的借款，用来稳定货币。作为借款的担保，民族农民党政府把火柴的生产和销售专利权租让给瑞典托拉斯“瑞典火柴股份公司”。1930年初，罗马尼亚政府同美国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签订了一项借款八百万美元的合同，把“罗马尼亚电话公司”租让给这个新债主，期限为十年。

作为这项借款的代价，政府以对我国不利的条件把罗马尼亚最重要的公路的修筑和使之近代化的工作租让给瑞典的“瑞典公路建筑公司”。在经济危机结束前，罗马尼亚政府还签订了其他借款合同。这些借款对罗马尼亚国家非常有害。国际信贷托拉斯通过使用特许开采权，牟利达一百多亿列伊。同时，国家预算不断出现赤字，赤字于1930

年高达五十八亿列伊，而于1932年增至约一百亿列伊。签订的借款没有而且也阻挡不了经济危机的泛滥。相反地，它们更沉重地打击了罗马尼亚的脆弱的经济基础，并增加了罗马尼亚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依赖性。根据所承担的义务，罗马尼亚政府必须接受外国对国家财政的监督。每次借款以后，接踵而来的便是外国资本的专家们，他们坐镇国民银行、财政部和罗马尼亚铁路企业等。这些外国检查员很快便超越监督和指导国家财政的权限，开始干涉我国经济的内部事务。他们竟擅自下达有关货币稳定的强制性指示，依照他们提出的“劝告”，劳动人民的工资被降低，数以千计的工人被解雇，目的是省下钱来支付年息，即罗马尼亚
的外债年率。更有甚者，1933年1月，民族农民 392
党政府接受了所谓“日内瓦计划”，上面写着罗马尼亚政府应承担把国家的财政全部置于外国贷款人监督之下的义务。该计划侵犯了罗马尼亚民族主权本身。

由于危机时期所奉行的经济政策，罗马尼亚统治集团使国民收人从1928年的二千九百三十亿列伊减少到1923年的一千七百一十亿列伊。为

了对付这些困难，它们把绝大部分由劳动群众负担的各种税额增加了一倍。同时，政府还采取措施，打击了处境本来就困难的农业和农民。1929年8月，实施了“调整可耕地流通法”。在“耕种者的自然选择”的借口下通过的这项法律，使得农村资产阶级和地主有可能侵占贫农和中农的土地——这些土地根据1921年土地改革法，曾被宣布为不可剥夺的。民族农民党政府力图平息劳动农民的骚动，于1932年颁布了所谓农业债务减息法。按照这项法令，农业债务削减一半，农民的一部分债务由国家承担，另一部分由债务人分多年偿还。如果说在政治上这项法令遏制了工农联盟的形成过程，那末它在经济上则有助于挽救许多农户免于彻底破产。但该法令主要是支持了银行，国家把一部分农业债务付给银行，从而帮助银行避免了它们所濒临的破产状况。

对外政策

在经济危机年代里，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方针仍然是维护和平、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本着这一方针，我国参加了反修订主义列强所采取的

许多外交行动，同时它自己也提出了一些有助于巩固领土现状的措施。罗马尼亚于1929年2月9日加入使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提前生效的莫斯科议定书之后，为中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接近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1929年5月，罗马尼亚政府同捷克和南斯拉夫一起，参加了贝尔格莱德会议，在这里，小协约国的成员国规定了自动延长它们之间现存的协定的办法。次年6月，罗马尼亚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签订了它们的友好同盟条约的补充协定。根据我国忠于巩固东南欧和平的思想，我们在1930年10月于萨洛尼卡举行的会议上，坚持有必要成立一个由巴尔干半岛各国组成的组织。

罗马尼亚政府除参加这些外交活动外，还对 393
彻底调整战争赔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罗马尼亚政府在先后于1929年8月和1930年1月在海牙召开的会议上，参加了关于新的赔偿计划——扬格计划的讨论。这项计划同样有利于德国恢复军事潜力。会上，罗马尼亚政府成功地削减了对法、意的战争债务，并且完全保住了罗马尼亚国家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赔偿中应得的部分。

罗马尼亚在外交上为召开普遍裁军会议而积极奋斗。尤其是1930年和1931年在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主持下进行的国联全体大会上，围绕召开裁军会议进行的讨论获得了显著的成绩。在1932—1934年的裁军会议期间，罗马尼亚代表团一次又一次地支持提交讨论的裁减军备计划草案，但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由于希特勒德国的侵略立场，草案均未获通过。

裁军会议为罗马尼亚代表加强同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代表的联系以巩固小协约国，创造了良好的机会。在罗马尼亚政府的倡议下，1933年2月16日在日内瓦签订了一项改组小协约国的公约，规定这一国际机构的成员国将来只能共同决定它们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革命高潮 1933年1—2月的英勇斗争

经济危机最初几年的革命斗争高潮

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以及为废止民主权

利和自由而采取的日益严厉的措施，在工业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小职员和其他社会阶层中间引起了抗议的浪潮。

早在经济危机的第一年，在一系列企业、机关和农村中，工人们就广泛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停止解雇、改善生活条件和组织起来的权利等等活动。1929 年，在日乌河谷和阿尼纳的矿井，布加勒斯特、锡比乌和图尔达平原的一些冶金企业，日乌河谷的木材企业中发生了深刻的骚动和罢工。

共产党人为组织这些请愿行动作了很大努力。他们还号召统一工会会员参加他们组织无产阶级斗争的工作。

为此，他们采取了某些巩固工会的措施，组织1929 年 4 月的工会代表大会即是其中之一。在蒂 394
米什瓦拉举行的统一工会代表大会，汇集了有组织的工人、没有组织的工人、青年、妇女、各种文化组织和劳动农民的代表。蒂米什瓦拉大会，以下列问题为讨论的基本内容：组织工会，反对失业的斗争，合作社的作用，八小时工作制，争取增加工资的斗争，社会保险，集会和出版自由等等。

代表大会确定了工会组织和统一工会总委员

会的职责，主张成立旨在劳资纠纷中代表工人的工厂委员会，并指出有必要建立工会和合作社之间的联系。

大会进行期间，地方当局对代表们进行了镇压。会后，对统一工会的镇压措施有增无已，日益猖狂，政府下令解散按照阶级斗争原则进行活动的工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统一工会努力在合法基础上进行活动，而另一些则决定让它们的大部分会员加入改良主义工会，以便加强那里的革命派。

在危机时期的无产阶级斗争的第一阶段，矿工的动乱和行动波澜壮阔，对工人阶级的其他队伍产生了巨大影响。日乌河谷的矿工从1928年底就开始准备大规模的请愿行动。尤其是在佩特罗香、卢佩尼、武尔坎、佩特里拉和洛内亚举行的群众集会上，矿工们讨论了他们受到的深重苦难——长期失业、工资下降、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组织反对资产阶级把危机转嫁给劳动人民的措施的斗争的必要性。

1929年8月，在卢佩尼矿井爆发了矿工们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在8月的最初几天，由于矿主

拒绝签订规定矿工最切身的要求，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停止解雇、恢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取消罚款和保障劳动保护等的新集体合同，工人的义愤达到了顶点。为了组织起来通过罢工争取实现这些要求，1929 年 8 月 3 日召开了矿工代表会议，大多数代表是共产党员。会上决定日乌河谷煤矿区全体工人举行总罢工。

由于警察的镇压措施，只是在卢佩尼发动了罢工。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罢工于 1929 年 8 月 5 日开始。斗争的关键时刻是罢工者占领发电厂。这样，在五百名左右工人守卫下，发电厂从 8 月 5 日夜到 6 日凌晨控制在罢工者手里。

矿工的英勇斗争遭到血腥镇压。遵照洪尼多阿拉县长的命令，镇压机关枪杀了三十名工人，打伤了一百多人。这一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暴露出民族农民党政府对待工人的需要和工人想通过斗争实现其要求的尝试的真实立场。卢佩尼矿工不顾恐怖措施，继续罢工，直到 1929 年 8 月 395
9 日，他们在饥饿的逼迫下，在与外地隔绝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复工。国内外的许多工人和各个国际组织声援了矿工罢工。

卢佩尼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表明工人斗争开始日益具有进攻性。它证明工人巨大的斗争潜力，显示了他们建立统一阵线的倾向。

1929年8月矿工斗争之后，工人运动获得了新的高涨。在一系列工业中心都爆发了罢工并组织了抗议示威。据统计，1929—1932年间发生了由几十万职工参加的三百七十七次罢工和约八百五十次隐蔽的劳动纠纷。除了产业工人的斗争以外，还发生了一系列农民反抗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的剥削的行动。在全国各县的许多乡里，反抗税务机关对不缴纳捐税施加种种强制手段的行动，也屡见不鲜。

有些工人和农民的行动是共产党人组织的，有些则带有自发性。共产党员在铁路工人、石油工人和矿工中为组织革命行动进行了最紧张的工作。1931年3月，组织了罗马尼亚无产阶级这三支大军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决定了今后组织和开展对厂主的斗争的方式。由于共产党员在工人中的影响的增长，群众组织"工农同盟"在1931年夏季大选中取得了重大成绩，根据获得的选票，它可以选派五名议员出席议会，但这些议员的资格

证书被统治集团撤销了。

虽然共产党为组织和领导无产阶级斗争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在1929—1931年间却未能圆满地完成它所负的使命。这种情况是由1929年爆发的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所造成的，这种派别斗争严重损害共产党的力量达两年之久。这些派别斗争是多年前业已在共产党内发生的潜在分歧的公开化。共产国际对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爆发负有一大部分责任，因为它干涉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把许多不适当的分子安插在党的领导岗位上。

1930年底，任命了党的临时领导，恢复了党的团结，并开始为准备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进行活跃的宣传工作，1931年8月出版的《火花报》在这一准备工作中起了主要作用。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396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在罗马尼亚经济和政治生活正处于生产过剩危机的困境的情况下，在一些主要问题提上了蓬勃高涨的工人运动的日程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于1931年

12月在莫斯科举行。经济、社会、政治、民族、组织等方面错综复杂的问题成为代表们关注的中心。

大会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是巩固党的队伍，一般来说，也就是活跃党内生活。为此，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党的纪律、关于严格遵守秘密工作规定、关于加强党员的政治和思想训练以及关于采用多种组织和领导工人斗争的形式和方法的决议。这些决议完全符合越来越广泛的工人群众投人革命斗争的这个阶段。大会经过认真分析后，注意到铁路工人、冶金工人、矿工和码头工人投人斗争能为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开辟新的前景。在掌握关于国内现实的大量材料和情况的基础上，大会揭示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深刻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农民和地主间的矛盾，全体人民和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为了提高革命斗争水平，大会决定成立各种机构，以保证工人行动的胜利，并在这些行动中实现下层的统一阵线。在这样一些斗争机构中，大会提到的有：罢工委员会、失业者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罢工纠察队、自卫队等等。这

些机构都由工人——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选举产生。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以工厂的支部为基础加紧党的扎实的改组，并指出有必要把无产阶级分子提拔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因为党和农民群众之间业已建立的联系缺乏经常性，大会指示，一方面现有的农村党支部要进行活动，另一方面要加强在农村中建立新党支部的工作。

大会的一项首要指示是："党在争取建立工农政府的斗争中，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是建立以无产阶级为主导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和各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的斗争联盟。"①

为了完成党的战略任务，必须阐明罗马尼亚革命的前景和动力。大会驳斥了认为我国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观点，以及认为罗马尼亚直接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左倾意见。为了澄清已经产生的混乱，第五次代表大会分析了国内形势以后得出结论，即：罗马尼亚处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其主要任务是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建立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① 《罗马尼亚共产党历史文献（1929—1933年）》，第3卷，布加勒斯特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5年版，第292页。

397 进行这一革命的社会经济条件、我国革命动力的特点和国际形势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可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由于这些指示和决议，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工人运动成熟和党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巩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但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决议除了一系列符合国内外事态发展的观点和估计以外，还包含了一些错误论点。这些论点的贯彻损害了党后来的工作和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发展。例如，大会虽然提出必须缔造工农联盟的正确口号，但没有认识到应当发动全体农民群众参加这个联盟，即不仅是发动贫苦阶层，而且还应发动最重要的中农阶层。因此，由于大会通过发出反对发动富裕农民参加建立工农联盟的指示，就使党失去了壮大反对地主的阵线的可能性。

大会对各种社会主义派别所作的不加区别的评价，也基于同一方针。这样，第五次代表大会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认为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党是社会法西斯团体，事实上，它们不过是提倡改良主义思想和策略的工人政党。这种错误评价

在建立工人统一阵线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大会继续沿着这种左倾观点走，把民族农民党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法西斯组织相提并论，结果给共产党定下了拒绝同这些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任何合作的方针，而这就妨碍了吸引这些派别参加反对反动上层的斗争。在讨论民族问题时，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的提议下，进一步指示党宣传为争取民族自决直到脱离罗马尼亚而斗争的思想。

但是，大家知道，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共产党员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顺应现实的历史进程，对写进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绝大多数错误论点作了必要的修改。

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决议中那些被证明是正确的论点则成为巩固党的队伍，并把工人斗争提高到一个高级阶段的宝贵的指南。

在选举产生了以亚历山大·什特凡斯基（戈尔恩）——波兰共产党的杰出战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后，大会闭幕。

398 革命斗争的加强

1932年，统治阶级向工人群众的进攻大为加剧。这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的有力回击。共产党人为了组织这一回击，在工人群众，而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最富有战斗性的队伍——铁路工人、石油工人和矿工中加强革命活动。这样，他们巩固了原来的党支部，并在一系列企业里，特别是在雅西、帕什卡尼和土尔努—塞维林等地的铁路工厂里建立了新的支部。除了对自己的队伍进行政治训练和组织上的巩固以外，共产党还经常倡议政治倾向和信念不同的工人举行集会，选举职工的代表机构，这些以代表团形式出现的机构，在必要时可以变为行动委员会或罢工委员会。

这是工业无产阶级建立统一阵线倾向的最生动的证明。工业基础部门的工人在1932年内一次又一次地投入积极的斗争。在布加勒斯特、雷希察、蒂米什瓦拉和弗勒希察的冶金企业，在肖滕加、多伊切什蒂和阿尼诺萨的采矿企业，以及在纺织企业、石油企业、木材加工企业和码头，都发生了工人罢工和动乱。与此同时，劳动农民、小职

员、中学教师、小学教员、和大学生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全国工人群情激愤的情况下，崛起了铁路员工的强大行动。

为了组织所有铁路中心的工人斗争，1932 年 3 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人有共产党员、独立社会党员和无党派工人，他们讨论了铁路工人在革命斗争中应负的使命，制订了经济和政治要求的纲领，并选出以格奥尔基·乔治乌一德治为书记的中央行动委员会。中央行动委员会一成立，便发表了一项宣言，强调指出成立下层统一阵线的重大意义，鼓动工人组织集会和街头游行，并强调在一切铁路中心建立行动委员会的必要性。1932 年 10 月以前，中央行动委员会遵循共产党的指示，在各地组织了一系列的铁路工人大会，并在下层统一阵线的基础上选举了地区和地方行动委员会。在加拉茨、克鲁日、布加勒斯特、雅西、蒂米什瓦拉、奥拉迪亚、帕什卡尼等地都选出了这样的铁路工人行动委员会。同时，在许多地方建立了石油工人、冶金工人和矿工的行动委员会。

在建立地方行动委员会的工作中，1932 年 4

月和10月举行的罗共中央全会的指示起了重要作用。这两次全会还指示工人使用一种有效的斗争形式,即在举行罢工的同时,即行占领企业并以声势浩大的街头示威游行支持罢工。

到1932年底和1933年初，这样组织起来的工人斗争，特别是铁路工人的斗争获得了新的高涨。

399 **1933年1—2月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的英勇斗争**

在1933年的头几个月里,对人民群众掠夺措施的强化在工人中激起了愤怒的浪潮。尤其是政府在1933年初作出的降低工资、解雇大批职工、增加捐税以及一般来说变本加厉地向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攻的决定，致使全国组织起轰轰烈烈的工人斗争。

但铁路工人和石油工人的行动产生了最强烈的反响。在1933年整个一月份里，“奥里昂”、“罗马尼亚阿斯特拉”、“联合”和“罗美”等石油公司的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行动。在由共产党人指导的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下，普洛耶什蒂的一系

列石油企业的工人进行了反对厂主的名副其实的阶级搏斗。在普拉霍瓦河谷大动乱的推动下，地方行动委员会决定于1933年2月1日在“罗美”公司发动一次强大的罢工。普洛耶什蒂的几乎全部企业的职工都声援了这个大炼油厂的罢工者。在罢工那一天，在通往“罗美”公司的主要公路上，庞大的工人队伍举行了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并高呼革命口号。镇压势力的大规模的干涉没有吓倒罢工者，他们和其他企业的成千上万名工人一起，控制了普洛耶什蒂城的街道达一整天。这次阶级大搏斗同在普拉霍瓦河谷组织的其他罢工一样，以工人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而告结束。

除了石油工人的斗争以外，全国铁路工人，而尤其是“格里维察”工厂工人的斗争精神日益高涨。1933年1月底，这个罗马尼亚无产阶级堡垒的行动委员会决定宣布罢工，以争取实现下列要求：增加工资，支付原有的物价上涨和房租补贴金，停止解雇和恢复被解雇者的工作等等。为实现这些要求而进行的罢工从1933年2月2日开始。在有七千名铁路工人参加的一些集会上，选举产生了由三百五十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选举

罢工领导机构和组织自卫队标志着组织罢工的主要时刻。首都的一些企业和加拉茨、雅西、克鲁日、帕什卡尼、康斯坦萨等地铁路工厂的工人声援了“格里维察”工厂的罢工者。

“格里维察”斗争很有使尖锐的斗争形式扩展到一切铁路中心的趋势，政府在这种趋势的压力下暂时答应满足铁路工人的绝大多数要求，但后来背弃了诺言。行动委员会受了这些诺言的迷惑，下令停止罢工。

政府利用蛊惑人心的许愿策略得到了喘息，加剧了对工人的恐怖手段，2月4日在许多地方
400 实行戒严，并宣布一切革命组织为非法。《火花报》写道：“通过宣布戒严，资产阶级在工人群众波澜壮阔的斗争面前供认了自己并不强大，而是虚弱。”[1] 同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的期望相反，实行戒严后，无产阶级更加顽强地奋起斗争。1933年2月6日，“格里维察”工厂的铁路工人选出了一个由二百五十名工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次日，克鲁日铁路工人举行示威性罢工，同时在工厂管理处门前举行集会。强大的抗议示威在几乎所有铁

① 《火花报》，第4期，1933年2月。

路中心此伏彼起。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开始在全国进行大逮捕，并一笔勾销了2月2日布加勒斯特铁路工人罢工时对铁路工人许下的诺言。

为了对政府采取的措施给予应有的回击，中央行动委员会遵循共产党的指示，同各地方行动委员会成员取得联系，以便在全国主要铁路中心组织罢工。2月13日，由于厂方拒绝满足他们的要求和政府在前一天背弃诺言而被激怒的克鲁日铁路工人宣布了罢工。他们在厂里筑垒进行抵抗，被军队围困达两天。

当地的许多工人声援克鲁日铁路工人罢工，他们在工厂和大街上组织抗议集会。象克鲁日一样，雅西的铁路工人于2月14日占领了“尼科利纳”工厂，英勇自卫，反抗警察和当地的其他镇压势力。由于共产党组织、行动委员会和工会的努力，各铁路中心的许多企业都组织了罢工和抗议示威。在“格里维察”铁路工厂里，激昂的革命情绪早已达到顶点。“格里维察”的铁路工人工厂委员会根据共产党的指示，采取了有效地利用这种形势的措施。它于2月14日发表致该厂铁路工人的呼吁书，号召他们举行罢工。七千名铁路工

人响应工厂委员会的号召，于2月15日晨占领了工厂，宣布罢工。汽笛发出信号后，罢工者聚集在工厂大院里。罢工委员会确定了行动计划以后，在工厂各入口处布置了自卫纠察队。将在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史上写下英雄主义篇章的布加勒斯特铁路工人罢工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向四方。同2月2—3日一样，我国首都再次沸腾起来。从这次阶级大搏斗爆发的最初几小时起，布加勒斯特的工人络绎不绝地涌向罢工者筑垒自卫的“格里维察”工厂。《火花报》是这样描写那个无产阶级崇高的声援场面的：“工厂的汽笛开始鸣响了。它那清脆高昂的声音在围攻者上空震荡，传向格兰特区，传向这个区的工厂，传向工人住宅，唤起工厂四周的全体劳动人民。工人们懂得，这是报警信
401 号，这是铁路工人的战斗号召……，工人群众、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们象浪潮一样涌向‘格里维察’铁路工厂。”[1] 前来支援在工厂筑垒自卫的罢工者的人数超过一万二千人。罢工者从布加勒斯特职工那里获得了重要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援。尤其是“赫尔丹”、“玛拉克萨”、“垄断组织自治社”和“莫

① 《火花报》，第4期，1933年2月。

乔尔尼察”等工厂工人表现出来的援助精神尤为突出。铁路工人宣布罢工后，“格里维察”工厂厂方要求军队帮助。政府立即下令派出载有士兵、宪兵和警察的大卡车，把“格里维察”工厂周围的街道变成名副其实的兵营。来到阶级搏斗的现场的还有王室警官、检察官、警察局长和镇压机关的其他代表。在警察和工厂四周的工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有时冲突还很激烈，这扩大了工人对部分军队的影响，他们开始表现出不安，甚至奋起反抗他们的指挥官。政府在撤换了不可靠的军队之后，由于担心斗争的烈火将席卷首都，甚至其他一些城市的全体工人，便下令开始镇压罢工者。2月16日黎明，军队、宪兵和警察对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开了枪。“格里维察”工厂的铁路工人在这一天遭到残酷镇压。他们之中被枪弹夺去了生命的有：波帕·杜米特鲁、瓦西里·罗瓦伊特、扬·杜米特雷斯库、马耶尔·杜米特鲁、克里斯蒂亚·约内斯库、杜米特鲁·托比亚斯、格奥尔基·波佩斯库等。2月16日血腥镇压的结果，大批人被打伤，二千多名工人被逮捕。对布加勒斯特铁路工人的血腥镇压，在全国引起了一股巨大的抗议浪潮。

面对政府审讯铁路工人的最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专横行径，劳动人民更加义愤填膺。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的有：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基伏·斯托伊卡、东恰·康斯坦丁、杜米特鲁·彼特雷斯库、格奥尔基·瓦西里基，伊昂·梅齐乌、埃米尔·波帕、帕维尔·博让等。

此案于1933年在布加勒斯特得到审理，“格里维察”的英勇战士们被判处长期徒刑。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布加勒斯特的判决被撤销，但这一案件次年在克拉约瓦重审时，无辜的被告重新被判处重刑。

在审讯中，工人代表们面无惧色地昂首挺立，大无畏地控诉整个地主资产阶级制度及其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公平。铁路工人中央行动委员会书记说：“被告不坐在这些席位上。真正的被告在政府里……。你们要宣布的判决根本吓不倒工人，也远不能使他们从自己的道路上倒转回去，而将激励他们行动起来，进一步激励他们投入斗争。”

402 几乎全国所有社会阶层都有许多代表出庭作证，支持受牵连的人。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法庭和

整个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行动，同国外劳动人民的抗议交织在一起。

特别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报纸以整版篇幅报道了1933年1—2月罗马尼亚铁路系统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

这些斗争以其不寻常的规模、高度的组织性和非凡的战斗性，标志着经济危机期间罗马尼亚革命高涨的顶点，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它们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一场最激烈的搏斗。

法西斯危险增长时期的罗马尼亚

国际形势

在世界经济危机以后的时期里，国际形势日益恶化。资本主义大国之间从经济和政治上重新瓜分世界的矛盾达到了令人忧虑的尖锐程度。首先，以德、意、日为首的法西斯国家破坏凡尔赛条约、用武力掠夺新殖民地和摧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激烈的行动，加剧了总的形势的紧张。进一步恶化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的是，英、法、美之间各自为了保证自己在解决国际问题和掠夺势力范围中起主导作用而产生的争夺。

全世界的民主力量起来反对法西斯国家通过军国主义和战争的途径解决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反修订主义国家的外交，为建立一个由向往和平的国家间的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条约组成的集体安全体系作出了重大努力。

在这一行动范围内，1934年2月4日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旨在共同为维护巴尔干和平而斗争的巴尔干协约国公约，成员国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苏联和法国，作为集体安全政策的发起国，鼓励缔结互助条约的行动。

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过程由于1935年5月2日苏法互助条约和1935年5月16日苏捷互助条约的签订而得到新的发展。

当反修订主义国家的外交家们谋求建立一支保障各国人民安全的集体力量的时候，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却在进行着新的侵略活动，准备发动战争。

403 这样，1935年3月10日，希特勒德国宣布不

再遵守凡尔赛条约的条款，而一个星期之后又实行了义务服兵役制以扩充军队。法国和英国并未坚决反对这些侵略行动，而满足于在形式上加以谴责。

1935年10月初，法西斯意大利也走上了侵略道路，入侵阿比西尼亚，并于1936年春天完全占领了它。但国联对意大利侵略的经济制裁毫无效果。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战争刚结束不久，希特勒德国于1936年3月6日进犯了和约确定为非军事中立区的来因河地区。这一次，英法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坚决措施。

1936年7月，国际形势到达新的恶化时刻。这时，西班牙军国主义者发动了内战，以推翻人民阵线政府，建立法西斯专政。

在德国和意大利军队的帮助下，西班牙叛军于1939年初击败了共和国军队的英勇抵抗。

英、法、美等国政府对这一新的侵略行径采取了所谓不干涉政策，这再次证明这些国家已彻底走上了对侵略者让步的道路。

西班牙内战的发生表明，集体安全体系濒于崩溃。接着，法西斯国家加紧备战，结成侵略同

盟，同恶相济。在历史上称为“《反共协定》”的这个同盟是由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11月25日缔结的，次年法西斯意大利也加入了进来。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行径，英、法、美等国政府作出了新的让步。

社会、经济生活

1934—1938年间，罗马尼亚的整个经济生活明显地活跃起来。在国家的经济活动中，工业的比重日益增加，这主要是冶金、化学、建筑材料、动力和纺织部门加速发展的结果。从数量上看，1938年的工业总产量比1929年增长了约32%；而从价值上看，在同一时期仅增长23%。决定工业生产得到这一发展的主要是投资的大量增加，在1934—1938年期间投资额高达九十多亿列伊，其中绝大部分用于化学、冶金和纺织业方面。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投资的增加是靠保护关税法、国家定货和剥削工人群众得来的。

伴随着工业方面的迅速发展而来的是资本的急速积聚和集中。这就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的垄断化过程。例如，1937年仅加工工业就有约九十个

垄断协议。它们采用垄断资本的辛迪加、卡特尔 404
或康采恩的形式。最大的垄断组织有：石油辛迪加"分配"、"食糖销售公司"、"制呢工业联盟"、冶金托拉斯"蒂坦—纳德拉格—卡兰"、金矿康采恩"米加"、木材工业托拉斯"罗马尼亚木材公司"等。垄断组织根据它们的经济力量控制某些生产部门，给它们的产品规定了比非垄断组织的产品要高得多的价格，这就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尽管经济领域出现了活跃的景象，但这个时期也还有尚未利用的巨大生产能力。

农业从1934—1938年期间的经济发展中得益比工业少，它仍然是最落后的生产部门之一。这样，农业由于资金不足、机械使用的规模十分小、缺少化肥、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封建残余等原因而受损害。

尽管农业经历重重困难，但可耕地面积由1932年的一千二百六十万公顷增加到1938年的一千三百八十万公顷，这使农业产量得到了显著增长。

产量的增长自然导致国内外贸易的加强。外贸的结构同前一个时期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例

如，这些年，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料和越来越少的成品。同前个时期比较，罗马尼亚出口的产品数量增加了，但这些产品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保持在十分低廉的水平上，损害了民族经济。由于一系列的因素，1934—1938 年间，罗马尼亚同法国和英国的外贸额减少了，同时却加强了它同德国和意大利的贸易来往。

随着直接生产部门和贸易的发展，财政金融体系也相应扩大。这个经济部门的活动得到 1934 年 5 月的金融法的推动。该法令考虑到大经济企业的利益，鼓励建立和发展拥有雄厚资本的银行。这样，可以看到，银行的数目由 1934 年的八百七十三家减少到 1939 年的四百五十一家。其实，这些年，整个金融体系受着为数十分有限的财政实力雄厚的几家银行的支配。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联系变得日益强大，致使财政资本加速增长，同时也巩固了财政寡头的地位。本国的大财政资本虽然利用一系列经济的或法律的途径和手段扩大自己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但它仍然处于依赖外国资本的状态。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各个经济活动范围的发

展，未能减轻罗马尼亚资本对国际资本的这种依赖。

这样，罗马尼亚不是一个资本输出国，它没有 405
同资本主义列强一道参加从经济和政治上瓜分世界，因此，它的对外方针不具备帝国主义的性质。

国家财政出现严重困难，主要是由于非生产性开支和内外债务的增加。国家预算直到1936年连续出现庞大赤字，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两年才保持平衡。1937年下半年，在罗马尼亚经济中出现了若干危机现象，但只持续到1938年初，因此未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引起严重的混乱，也没有阻碍工业发展的速度。各个生产部门活动的加强，当然对劳动人民的状况有所影响。

生产活动的加强自然要广泛使用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1938年，产业工人的人数达到约八十万，而1930年只有四十五万人。这样，同前个时期比较，失业比例有了显著下降。随着就业工人越来越多对劳动剥削的措施也加强了。这就是剩余价值率从经济危机前夕的161%增加到1934—1938年间的187%的原因。

虽然在一系列部门中，工人通过斗争取得了

比前一时期较高的名义工资，但实际工资出现某种下降的趋势。至于八小时工作制，不是在所有企业里都得到遵守，这往往引起重大的劳资纠纷。同时，劳动群众必须负担直接所得税——有时这种税占工资的一大部分——，以及各种间接税，即日用消费品增值税。这些捐税同样也压在绝大部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身上。此外，农民还必须负担苛重的土地税，向银行和高利贷者借贷具有残酷剥削性质的利息的债款等等。农民的债务增加得如此之快，以致要清还这些债务是不可能的。政府害怕农民普遍起来反抗，于 1934 年实行农业债务减息法。农民还饱受土地分配不公正及把土地丧失给地主和富农之苦，这就把他们逐渐推入农业无产阶级的行列。农民无产阶级化过程大为加速，无地农民的人数从 1930 年的七十万增加到 1938 年的一百万。

在劳动农民肩上压着形形色色的负担，而地主、佃主、富农和粮食出口商却享有重大的特权，例如，减税、出口奖金等等。除了产业工人和劳动农民而外，一大部分职员、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也要同严重的贫穷和困苦作斗争。

内　政 406

在经济危机以后的岁月里，罗马尼亚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各政党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的剧烈动荡和分歧。

1934年2月召开议会时，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它们采用互相指控的形式，揭露了两党的一些头目对极右派，尤其是对铁卫团的姑息态度。

在这个时期，民族自由党内部，即纠合在该党主席迪努·布勒蒂亚努周围的自由党元老派和追随格·特特勒斯库的所谓自由党少壮派之间，始终表现出严重的不和。民族农民党也同样深陷于分歧的漩涡，这些分歧早已产生，或者表现在个人的权势问题方面，或者表现为对党纲持不同意见这一方面。民族农民党内的主要派别是尤利乌·曼纽和扬·米哈拉凯领导的右翼，他们力图使党沿袭传统的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早已形成了以尼·卢普医生和迪·多布雷斯库等人为首的左派。这一派主要为联合反法西斯力量和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斗争。纠合在阿尔曼德·克林内

斯库周围的那一派奉行接近左翼的方针路线，并同王室达成协议，对希特勒分子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但它没有呼吁人民群众的支持。

这些分歧的结果，从民族农民党里分离出一个派别，后来组成一个独立的团体，取名“罗马尼亚阵线”，奉行亲法西斯的方针路线。

作为极右派增强的表现，1935年7月“全国基督教保卫同盟”同民族农村党合并成民族基督教党，其思想基础是沙文主义、排犹主义和反共产主义。

在罗马尼亚法西斯政治组织和团体中，铁卫团对我国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对人民自由和我国的国家主权来说危险最大，这个组织从财政和政治上得到德国希特勒集团和罗马尼亚反动上层的支持。

铁卫团由沙文主义、排犹和反工人的各个组织，而主要是由亚·康·库扎和科尔内里乌·科德里亚努领导的“基督教国防联盟”逐渐组成的。1927年，科德里亚努脱离联盟，建立了自己的极端反动的神秘组织“天使长米哈伊尔军团”，它于1930年3月改为铁卫团。

铁卫团于1933年被解散之后，于1935年以“一切为了祖国”这个称号重新出现，并用这种形式一直活动到1938年2月自动解散为止。铁卫团的思想实质是反共产主义、蒙昧主义、排犹主义 407
和宗教神秘主义。为了在劳动人民阶层中搜罗信徒，铁卫团提出了蛊惑人心的口号，如：“每人半公顷土地”，“面包、和平、正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这些口号都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

在法西斯阵营内部也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分歧的结果，从铁卫团中分离出一个新的法西斯团体，以“罗马尼亚精神十字军”的名称从事活动，反动将军勒德斯库是它的支持者。

在这个时期，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为首的强大的民主力量面对着法西斯危险毅然屹立。加入民主力量行列的还有：社会民主党，统一社会党，社会党（波波维奇派）以及其他具有反法西斯民主倾向的政治党派。

资产阶级政党的分裂及其力量的溃散和名声的败坏，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经济和政治方面。国王卡罗尔二世的行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谋求削弱各政党，以便最后解散它们，建立他的个

人独裁。

资产阶级各政党内部的形势并没有象其他时期那样导致政府的不稳定。相反地，在1934—1938年间，政府的更迭相对减少了。这样，1933年11月，瓦伊达—伏耶伏德主持的政府下台后，伊·格·杜卡主持的自由党政府取而代之，执掌了国政。

伊·格·杜卡主持的政府虽然准备继承自由党的传统政策，但采取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于1933年12月解散了铁卫团。用犯罪和政治暗杀精神熏陶出来的铁卫团分子，于1933年12月29日在锡纳亚火车站枪杀了部长会议主席杜卡。在杜卡被暗杀后，康·安杰列斯库博士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仅为时数日。政府在全国主要地区实行戒严，并对报刊和一切出版物进行检查。

1934年1月2日，以格奥尔基·特特勒斯库为首的自由党内阁上台，一直执政到1937年12月28日。格·特特勒斯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它实施了保护民族工业法，这同大资产阶级和国王利害攸关。它鼓励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贯彻了使许多

农户免于破产但同时却阻碍了工农联盟形成过程的农业债务减息法。

同时，格·特特勒斯库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反对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打击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它经常保持戒严和书刊检查制度，甚至还扩大了这种制度。它主要依靠颁布法令执掌国政，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议会本身的活动，这届政府实施了一些反民主的法律，例 408
如，“保护国家秩序法”，根据这项法律，任何政治团体只要“危害政治和社会秩序”①，即可予以解散。

部长会议主席和国王卡罗尔二世对法西斯运动采取了姑息态度，企图驾御它，并最终利用它作为反对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急先锋。

1937年底，格·特特勒斯库政府任期届满后，举行了议会选举。参加这次选举的各政治党派中没有一个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从而组织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国王把民族基督教党的党魁奥克塔维扬·戈加主持的法西斯色彩的政府抬上

① 《法令和条例汇编》，1934年，1月1日—12月31日，第12卷，第1部分，布加勒斯特，1935年版，第65页。

台来执政。但是，新政府只执政到1938年2月初，国王便踢开了它，建立起他的个人独裁。

对外政策

从保卫和平是维护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首要条件这一需要出发，罗马尼亚在1934—1938年间继续遵循前一时期奉行的传统路线，积极参加国际生活。这样，罗马尼亚力求巩固它与这些国家的同盟，它们对作为防止任何侵略的途径之一的维护现状，表现出同样的关心。从1933年最初几个月起，罗马尼亚政府就支持苏联代表团在裁军会议上提出的通过一个侵略定义以明确规定什么叫侵略和在国际冲突中谁应被认为是侵略者的倡议。1933年7月初，罗马尼亚政府和其他国家一起，签订了两项关于侵略定义的协议，这一定义旨在为世界和平服务，旨在一丝不苟地尊重各国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在1934—1937年间，我国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致力于法国和苏联外交人士所倡议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1934年2月初，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土耳其和希腊共同签订了旨在把东南欧变成和平区的巴尔干公约。经过

罗马尼亚和苏联外交人士坚韧不拔的长期努力
之后，1934年6月，我国在相互尊重利益的基
础上同苏联恢复了外交关系。同时，我国还积极
支持1935年间缔结的法苏互助条约和捷苏互助
条约。罗马尼亚力求进一步加强向往和平国家的
阵线，力求保障反对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
侵略活动的斗争取得胜利，因此支持接纳苏联加 409
入国际联盟。在体现罗马尼亚的外交政策的行动
中，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起了首要作用。
尼古拉·蒂图列斯库热爱祖国，是一位精明的现
实主义的杰出政治家，尽管他从来没有放弃过资
产阶级观点，但他在对外政策中提倡了为罗马尼
亚民族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和平服务的先进思想。
他为巩固罗马尼亚的旧有关系和在国际上建立新
的联系而坚持不懈地奋斗。他最显著的努力之一
反映在为缔结罗苏互助条约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
谈判中。这次谈判的结果记载在罗马尼亚外交部
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和外交人民委员马·李维
诺夫于1936年7月21日草签的议定书中。这个
议定书包含着罗苏互助条约的基础，但未被批准。
1936年8月底，统治集团伙同国王卡罗尔二世把

尼古拉·蒂图列斯库排除出政府。

除了这些外交行动之外，罗马尼亚还和其他国家一起对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和修订主义的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罗马尼亚是最坚决地要求国联在1935年对法西斯意大利采取经济制裁并以此挽救遭受意大利军队侵犯的埃塞俄比亚的独立的国家之一。同时，我国不顾英国和法国政府的投降态度，屡次主张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希特勒德国的侵略行动。罗马尼亚遵循这一方针行事，抗议希特勒军队于1936年3月入侵来因河地区，两年之后，它还宣布不同意德国用侵略手段吞并奥地利。这个时期的罗马尼亚对外政策，象以往一样，受到国内大多数政治力量的支持，不论这些政治力量的对内倾向如何。为保卫我国民族独立和制止法西斯分子的任何侵略行动而斗争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特别有力地支持了这个时期罗马尼亚的对外方针政策。罗马尼亚其他工人政党和组织也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罗马尼亚共产党为制止法西斯危险和保卫人民利益而斗争

1934—1938年间的国内政治事态发展，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面前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为了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共产党同工人群众和重要的民主力量建立了新的联系，同时改善了自己队伍的社会和民族成分。共产党克服了重重困难，扩大了自己在数量上的力量，在这几年里，发展到约三百个支部，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工人中心。由于它自己的党员的努力和在它影响下的革命组织，如：共产主义青年团、红色援助会等的努力，共产党组织了一系列工人斗争，以制止法西斯主义的 410
上升和争取或捍卫劳动人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在1934—1938年这一期间，罢工行动连续不断，间隔很短，并且席卷了广大工人群众。据官方统计，仅在1935年全国就发生了七十八次罢工和约二百次劳资纠纷，参加者近七万七千名工人。

在工人行动过程中，结成以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纲领为基础的统一斗争阵线的趋势越来越突出。从1933年6月、1935年2月和1936年7

月历次中央全会的指示出发，共产党利用了一系列的途径和手段，建立了成为一切反法西斯和反希特勒力量的广泛阵线的脊柱的工人统一阵线。为此，罗马尼亚共产党一再向社会民主党领导以及其他工人政党和组织呼吁，建议在符合人民群众最切身利益的要求的纲领基础上，达成一项组织工人统一阵线的协议。共产党为实现工人的团结所采取的新措施是它1935年的决议。这项决议号召统一工会会员参加劳动总联合会。由于这项决议的贯彻执行，工会在组织上的分裂消除了，从而建立了一个有单一的中央领导的统一的工会，但它在1936年即告自动解散。共产党关于建立工人统一阵线的屡次建议，遭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一再拒绝。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许多普通成员表现了赞同建立统一阵线的强烈愿望。1934年，组织了旨在建立工人统一阵线的新行动。这些行动反映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就实现工人的某些目标和要求而共同行动的必要性所达成的议定书中，反映在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和劳动同盟与统一社会党所缔结的统一阵线协定中，反映在布加勒斯特、布拉索

夫、加拉茨、普洛耶什蒂、基希纳乌、雅西、土尔努—塞维林等一系列工业中心中属于各个工人政党和组织的工人之间缔结的地方性协定中。

这些协议和协定只不过是争取建立工人统一阵线斗争的局部的暂时的成绩，但统一阵线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建成。

无论是通过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团体的地方组织之间的直接接触，还是通过各工人政党领导之间的协议，建立工人统一阵线的必要性显得越来越迫切了，因为在这个时期实现工人的行动统一是一个轴心，必须围绕它建立旨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的民主力量的广泛阵线。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月）对
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大会 411
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制订了各国共产党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斗争战略和策略路线。这一路线将在建立保卫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形式下得到贯彻。

1935年2月和1936年8月的罗共中央全会决议规定了建立这样一个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任

务、作用和途径。根据罗共中央委员会1936年1月在致民族农民党信中所作的估计，这个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应该“保卫基本的民主自由并使为扩大它们而进行的斗争的力量高度集中；使抵制法西斯主义、粉碎其组织、逮捕其卖国阴谋头目的人民力量广泛联盟；为了保卫和平、民族生存、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对全体人民进行大动员”①。在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活动中，共产党和1933年作为农民的民主组织成立的、由彼得·格罗查博士领导的农民阵线之间的合作起了重要作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的合法的群众组织“保卫民主自由同盟”，以及1934年成立的、由特兰西瓦尼亚马札尔党的民主派组成的“马札尔劳动人民联盟”(马多斯)，也大多参加了这些活动。《火花报》、工人报刊《舞台》、《钟》、《新声》，以及我国各城市出版的各民主报刊，如：《黎明》、《火炬》、《自由言论》、《太阳》、《同盟》等，都广泛宣传了反法西斯民主阵线的必要性和目的。

民主力量联合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思想在

① 《罗马尼亚共产党历史文献(1934—1937年)》，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349页。

1935年秋天取得最初的成果。1935年9月24日，农民阵线和马札尔劳动人民联盟的代表在伯契亚（洪尼多阿拉县）签订一项反法西斯主义的合作协定。不久，特尔古—穆列什工会委员会也加入了这项实质上以反法西斯共同纲领为基础的协定。“保卫民主自由同盟”和社会党（波波维奇派）1935年11月26日在布加勒斯特签订的协定，在建立反法西斯民主阵线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这两个组织要求一切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呼吁，得到农民阵线和马札尔劳动人民联盟的热烈响应。这四个组织为争取民主自由和反对法西斯主义共同斗争的决定，记载在1935年12月6日在采比亚（洪尼多阿拉县）的阿弗拉姆·扬库陵墓和霍里亚的冬青槲旁签订的联合阵线协定里，从而赋予该协议以继承过去进行的争取我国人民自由的斗争的意义。

采比亚协定的签订掀起了工人、农民和进步 412
知识分子保卫民主自由和制止法西斯行动的一系列集会和示威游行。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共产党力求把民族农民党、激进农民党、保守民主党、民族自由党等政党中任何具有民主倾向的团

体、派别和个人都吸引到反法西斯民主阵线里来。

为了把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纳入反法西斯和反希特勒阵线，共产党建立了由各社会阶层人士参加的许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有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保卫民主自由同盟、民主联盟、大学生民主阵线、苏联之友、保护反法西斯者委员会、民主律师团等。在1934—1938年期间，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这些群众组织达二十多个。

共产党通过自己的机关报和这些群众组织的报纸，揭露法西斯主义对于工人运动、罗马尼亚人民的进步文化和罗马尼亚民族独立本身的危险。共产党开展的这一反法西斯行动吸引了罗马尼亚文化、科学和艺术界最优秀的人物。对于反对法西斯思想、保卫罗马尼亚的进步文化和科学的斗争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人士有：尼古拉·蒂图列斯库、彼得·康斯坦丁内斯库—雅西、尼·德·科恰、格·齐采伊卡、西·斯托伊洛夫、康·伊·巴洪、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图多尔·阿尔盖齐、尼古拉·约尔加、乔治·埃奈斯库、杜米特鲁·巴格达扎尔医生、尼·卢普医生、尼·托尼扎、斯卡尔拉特·卡利马基、格·马林内斯库医生、弗兰西

斯·拉伊内尔、亚历山德鲁·吉卡等人。

在全国民主力量反法西斯行动中引人注目的是有组织和无组织的群众举行的一系列集会、示威游行和广泛的示威活动。

共产党人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的鼓舞，发起了我国劳动人民声援世界各地民主力量反法西斯斗争的运动。我国组织了大规模群众行动，争取释放反法西斯战士恩斯特·台尔曼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支援于1934年2月发动反法西斯独裁的武装起义的奥地利无产阶级，支持遭受意大利法西斯军队入侵的埃塞俄比亚人民，而特别是支持反对佛朗哥分子叛乱以保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西班牙人民。数百名罗马尼亚志愿军不顾他们要克服的重重困难，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手拿武器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罗马尼亚志愿军中的一些人，如康·布尔克、米·阿尔德列亚努、尼·博迪亚努、什特凡·梅吉里等人壮烈地牺牲在西班牙革命战场上。

1936年2月，梅赫丁茨和洪尼多阿拉县的议会选举结果也表明，罗马尼亚存在着广泛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可能。在这些选举中，民主力

413 量联合起来挫败了法西斯候选人，保证自己的候选人取得了完全胜利。在1936—1937年期间，民主力量在县和乡的选举中也获得了类似的成功，在布加勒斯特、普洛耶什蒂、雅西、克鲁日和基希纳乌等一系列地区，成功地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从而击败了政府和法西斯组织的候选人。

至1937年底，在全国议会选举的竞选运动中，共产党加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民主阵线的行动。

共产党号召在选举中建立反法西斯民主阵线，但在其他工人政党的领导人中间没有得到有利的反响。这个号召遭到民族农民党头目们的敌视。民族农民党主席尤利乌·曼纽不同民主力量达成协议，而同铁卫团首领科尔内利乌·科德里亚努签订了“互不侵犯公约”。由于在选举中没有联合起来，民主力量没有能取得胜利。不过，参加选举的政党没有一个获得组织政府的多数票。

虽然1934—1938年期间的一系列政治时机显著地表明存在着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没有被利用。

阻碍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建立的原因有：工人

运动的分裂，政府对反法西斯力量施行的恐怖手段，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头目们对建立统一阵线的敌对态度，民族农民党的多数党魁激烈反对把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产党领导对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性质和倾向所作的夸张和错误估计。这些夸张和错误的根源既在于党被迫进行地下活动的弱点本身，也在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不符合罗马尼亚的实际情况。

国王独裁时期的罗马尼亚

(1938年2月—1940年9月)

国际形势

从1938年开始，国际形势日益紧张。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侵略事件层出不穷。希特勒德国利用英、法、美等国政府的姑息态度，进一步走上侵略道路。1938年5月12日，希特勒军队侵入奥地利，并用武力把这个国家并入第三帝国。德国对奥地利的侵略行径，遭到苏联和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一系列小国的严厉谴责。同年9

月，西方列强的统治集团谋图把希特勒侵略纳入
414 反苏轨道，背弃了他们原来的义务，在慕尼黑接受了德国政府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在德、意、英、法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到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完全占领和肢解。

在希特勒德国侵略行动的鼓舞下，意大利于1939年4月侵占阿尔巴尼亚，扫清了通往巴尔干半岛的道路。除了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的侵略行动以外，德国和意大利政府还支持佛朗哥分子反对西班牙共和国的叛乱。1939年初，西班牙共和国在法西斯武装干涉军的打击下被摧毁。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和英国担心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转向自己，便于1939年夏天同意与苏联就缔结互助条约进行谈判，但未能签订条约。1939年8月底，德国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德国利用西方列强的外交游戏——它们在那个阶段业已不只一次地表现出不想冒与侵略者直接较量的风险的倾向，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它。

由于对波兰的侵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波兰遭到进攻之后，法国和英国政府立即对德宣战，但到第二年才开始行动。

从希特勒德国方面来说，这是一场具有侵略性的战争，而从遭到进攻的国家方面来说，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保卫祖国的正义性。

1939—1940 年冬天，芬兰和苏联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冲突在短时间内就以芬兰军队的溃败而告终。

在侵略欲望的支配下，希特勒集团继续向西方扩大战火。这样，到 1940 年夏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等一系列国家在希特勒军队的攻击下一一陷落。由于这些国家沦陷在德国占领下，欧洲的政治战线崩溃了，尽管这个战线不是始终如一的，并且往往是不坚定的，但它曾为维护现状进行过斗争。在西方国家中，只有英国抵抗住了希特勒德国的猛烈进攻。所有被占领国家的人民奋起反抗希特勒侵略，从战争最初时刻起就展开了解放自己祖国的正义斗争。

经济和社会生活

自1938年起，地主资产阶级罗马尼亚的经济进入它发展的最后阶段。在这个持续到1939年底的阶段中，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发展达到了顶点。除石油工业、食品工业和另一些轻工业部门外，其他工业部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415 这种发展尤其反映在投资和工业总产量的增长上面，同1927年比较，1938年工业总产量的指数提高到了155%。

在这一工业的高涨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日益加速。特别是在工业部门，这一过程得到了迅速发展。渐渐地，大工业和银行垄断组织在罗马尼亚经济中占据了愈来愈巩固的地位，甚至开始完全控制若干生产部门。由于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益密切地相结合，以国王卡罗尔二世为首的财政寡头的实力增强了。玛拉克萨、奥斯克尼特、吉古尔图、莫乔尔尼察和其他巨头控制的财政寡头集团力图保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决定这个时期的政府采取由国家干预我国经济的措施。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采用给予大工业

优惠的形式，如：实行定货；统购商品，特别是军用品和出口商品；发放对大工业和金融公司有利的借款。

其实，支配罗马尼亚经济生活和指导国家全部经济政策的权利都授给了1938年成立的“最高经济委员会”，该机构的全部活动显然都是为大资本家效劳的。

尽管本国资本有所巩固，但是1938—1940年期间的罗马尼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受外国垄断资本控制。这几年，德国资本的比重迅速增长，尤其是在1939年3月罗马尼亚国家和第三帝国签订了主要是为希特勒德国的经济利益服务的经济条约之后。

工业和金融活动的高涨没有对农业产生任何有利的影响，农业仍然是罗马尼亚经济中最不够发达的生产部门。

这个时期，农业中还留存着封建关系的大量残余，如1940年制订的特别法令要求农民交纳什一税、服徭役。这些封建关系的残余同资本主义式的大农业垄断组织同时存在。用落后的方式耕种土地，农户无力购买农具和化肥，造成1940年

每公顷平均产量低于前几年的水平。

国内的经济需要和国际局势使粮食、石油和罗马尼亚经济的其他产品的出口大大增加，尽管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不断下跌。至 1939 年底，我国经济开始表现出明显恶化的迹象。国家的财政变得越来越脆弱，货币流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征兆。政府恢复国家财政平衡的尝试无济于事。

416 1939—1940 年间，国家财政不平衡是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的主要征候之一，这必然造成劳动人民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恶化。

其实，在 1938—1940 年这一整个时期里，广大人民群众承担着国家困难的最大部分。捐税一再增加，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房租增加，加之一般说来，公用事业费腾贵，这些都使工人群众不能从这个时期名义上的工资增长得到益处。

为了获得勉强能维持简朴生活的工资，工人往往必须每天工作八小时以上，而在某些工业部门，如军需生产部门，由于法律规定，工人甚至不得不放弃星期日休息。更有甚者，1940 年 2 月发布的一项命令规定，可以征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

人，强迫他们按军纪规定的定额工作。除所有这一切以外，还缺少保障劳动安全的措施，实际上缺乏医疗，而由于军队集结和征发用于曳引的牲畜，特别破坏了农户的经济力并导致他们的破产。随着形形色色投机商的猖獗的投机倒把和通货膨胀灾难而来的是产品的日益严重短缺，这种情况影响到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和小职员，使他们也过着朝不保夕的苦难生活。

国王独裁及其对内政策

卡罗尔二世利用财政寡头经济实力的增长、各资产阶级政党的虚弱无力和威信扫地、人民群众和国内政治集团对戈加—库扎政府的不满以及法西斯团体趁1938年初的选举运动之机制造的严重混乱，于1938年2月10日建立了个人独裁，这是他自从1930年6月登上王位以来就一直梦寐以求的。

以米隆·克里斯蒂亚主教为首的政府被任命接替戈加—库扎内阁。新政府的成员属于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他们绝大多数是由某个时期担任过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政界人士中招募

来的。在国王独裁时期，即从1938年2月到1940年9月，政府发生了一系列更换和改组。这样，在这段时期里，由米隆·克里斯蒂亚、阿尔曼德·克林内斯库、格奥尔基·阿尔杰沙努、康斯坦丁·阿尔杰托亚努、格·特特勒斯库和扬·吉古尔图主持的六届政府相继执政。国王独裁时期的历届政府都是大资本的代理人，它们采取了一系列缩小自由和民主权利范围、而同时有利于大商业、工业和银行资产阶级的措施。

这几届政府采取各种方式，而尤其是通过促进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实行保护性关税制
417 度，迎合了大垄断资本的财政利益，从而也就在战争前夕和战争最初几年世界经济发生严重混乱时保护了民族经济。

卡罗尔国王个人独裁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新准则，是与1923年通过的宪法不相容的。因此，作为执政的第一个行动，卡罗尔独裁制度废除了旧宪法，并于1938年2月通过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没有得到人民的批准，就规定国王有权掌管国家；它大大限制了公民自由；保留议会作为立法机关，但要服从君主的意旨；废除普选；授予国

王以国家的全部行政权以及作为军队最高统帅的权力。其实，国王卡罗尔二世可以通过法令行使全部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根据在卡罗尔统治下制订的法律，书刊检查愈来愈残酷无情，而地方权力则归已经接管了县领导权的军事机关。在废除1923年宪法后不久，卡罗尔国王就解散了一切政党，但容许这些政党的以前的头目们对国王独裁制度采取某些反对行动。通过缩小议会权限，通过分裂和解散各政党，国王破坏了各民族力量联合起来抵御威胁我国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危险的可能性。

卡罗尔国王在1938年12月建立了一个取名为民族复兴阵线的政治机构，替代各地主资产阶级旧政党。1940年他又把这一机构改为民族党，但未能因此而使他的独裁制度获得群众基础。

1938年底和1939年下半年，铁卫团开始公开行动，反对卡罗尔独裁，对国王进行威胁，并暗杀了阿尔曼德·克林内斯库总理。当这个法西斯政党在希特勒集团的帮助下准备夺取国家权力的时候，卡罗尔二世在敌视法西斯专政的政府多数成员的赞同下，采取了反对铁卫团的严厉措施，从

肉体上消灭了一大部分铁卫团头目。

民主力量支持国王和各种政治人物，如：阿尔曼德·克林内斯库和格奥尔基·阿尔杰沙努等反对铁卫团及其建立法西斯专政的企图的措施，但同时它们不同意，甚至反对卡罗尔二世和他个人独裁统治的政府所采取的专制的、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

对外政策

几乎在国王独裁的整个时期里，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继续奉行倾向法国和英国的传统路线。罗马尼亚实行这种对外政策是因为国王和一些重要的资产阶级集团原来就同法、英保持着经济和政治的联系，以及统治集团相信这种方针可以保
418 证我国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

在国王独裁时期，罗马尼亚在外交上的行动都是以维护和平和现状为目的。罗马尼亚政府为巩固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约国这两个旨在保卫中欧和东南欧和平的外交机构，作出了重大的努力。罗马尼亚采取了坚决反对希特勒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度。

1938年10月，罗马尼亚政府拒绝接受波兰提出的参与摧残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同时还表示赞成允许苏联空军通过我国领空支援捷克斯洛伐克的想法。一般说来，罗马尼亚在这一时期也力求同苏联保持正常关系。这种倾向在1939年夏天变得更加明显，当时，阿尔曼德·克林内斯库主持的政府试图通过土耳其，建议苏联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国王独裁政府里的一些成员，考虑到希特勒主义的向东扩张是对我国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一种威胁，在国内许多政治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行动支持下，试图抵制德国从经济和政治上控制罗马尼亚的措施。尽管如此，1939年初，由于法国和英国对它们同罗马尼亚的经济关系显然表现得越来越冷淡，由于亲德派在我国内政中抬头，米隆·克里斯蒂亚主持的政府开始走上向德帝国作出经济让步的道路。这样，在希特勒集团虚伪而又是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压力下，1939年3月23日，罗马尼亚政府和德国签订了一项经济条约。该条约规定罗马尼亚承担扩大生产德国所需要的农作物、加紧开采石油和矿石、允许一些罗德

混合企业在其领土上活动等等义务。同时，条约还规定德国承担供应罗马尼亚武器和军事装备、在我国建立军需库和粮仓的义务，这些库仓实际上也是为德帝国的经济利益服务的。

1939 年 3 月的经济条约以及后来签订的其他协定，逐步地使罗马尼亚经济从属于德国的侵略政策。

罗德经济条约签订后，得到我国内部的亲德派支持的希特勒集团，对政府和国王施加了新的压力，以改变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方针，并把它纳入德帝国政策的轨道。但是，罗马尼亚政府把经济让步方法同政治上的对抗措施结合起来，以维持它倾向法、英的老方针。1939 年 4 月，罗马尼亚接受了法、英早已向它提供的单方面保证，但由于害怕恶化同德国的关系而未承担任何义务。

419 法、英同样向波兰和希腊提出的那些同样的保证，正如波兰遭到希特勒德国进攻时所证明的那样，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德国军队侵入波兰后，即 1939 年 9 月 4 日，罗马尼亚政府宣布我国中立。尽管是中立国，罗马尼亚给予保卫自己祖国和经历着一场真正的民族悲剧的波兰人民以

巨大的援助。

在波兰被肢解之后的时期里，罗马尼亚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在罗马尼亚的主要盟国——法国于1940年5—6月遭到希特勒军队的侵略并被迫投降后，形势变得特别令人忧虑。

1940年6月26日，罗马尼亚政府接到苏联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随后，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便被划入苏联版图。

愈来愈紧张的国际局势，罗马尼亚倾向于同德国接近的政治派别的增加，希特勒主义的头目们对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强大压力，这些都导致我国对外政策方针的改变。

1940年7月初，吉古尔图政府背弃了法、英的保证，声明放弃原来的对外政策方针，并宣布罗马尼亚加入罗马—柏林轴心。同月，希特勒集团要求罗马尼亚政府同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开始谈判，以就这两国政府对罗马尼亚提出的领土要求达成协议。1940年9月在克拉约瓦进行的罗保谈判的结果，罗马尼亚把四边形地带割让给保加利亚。由于在土尔努—塞维林进行的罗匈谈判未获得任何结果，1940年8月29日，希特勒德国和

法西斯意大利迫使罗马尼亚在维也纳举行的会晤中把面积为四万三千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六十万——其中最大部分是罗马尼亚人——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割让给匈牙利。

在这国家命运危急关头，罗马尼亚人民孤立无援。通过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割让给霍尔蒂匈牙利[①]，罗马尼亚被抛入了希特勒德国的怀抱。同时，希特勒集团向霍尔蒂匈牙利保证，在即将发动的反苏战争中给以协作。

强夺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在全国引起了一股抗议浪潮。一连数日，罗马尼亚人民群情沸腾，愤怒反对不公正的指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参加了许多抗议游行。在共产党和其他爱国组织的号召下，数十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手工业者、士兵、军官等走上街头，要求废除维也纳指令并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归还祖国。克鲁日、布拉索夫、蒂米什瓦拉、布加勒斯特、康斯坦萨、巴亚—马雷等地组织的捍卫国家领土的示威游行产生了很大反响。

① 霍尔蒂为匈牙利的反动统治者，于1920—1944年摄政。——译者

人民群众在愤怒地起来反对维也纳指令的同 420
时，严厉谴责已经证明无力保卫我国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政府和整个卡罗尔独裁制度。

1938—1940年期间发生的国内外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摇摇欲坠的建筑物。1940年9月6日，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威信扫地的国王卡罗尔二世被迫让位给他的儿子米哈伊，而在几天之后不得不永远离开我国。随着卡罗尔二世的离去，罗马尼亚的国王独裁制度也土崩瓦解了。

国王独裁时期的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活动

国王独裁一建立，就把它的政治和司法措施的矛头对准工人运动、民主力量、特别是对准共产党。

在国王建立独裁统治后所产生的新情况下，共产党力求通过各种途径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接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象爱国联盟、马札尔劳动人民联盟、农民阵线等一些群众组织，遵照共产党的指示，转入地下。

通过共产党人指导的这些组织的努力，通过地下报刊，如《火花报》、《阶级斗争》，通过利用合法报刊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新世界》，共产党宣传了为维护自由和民主权利、保卫我国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必要性。

为了在人民群众中间，尤其是在青年中间扩大斗争和宣传反法西斯、反希特勒和反战思想的可能，共产党在1939年重建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使一系列文化和职业协会、俱乐部、民主政治团体展开活动。

1938年夏天，共产党通过许多手段和活动方式，成功地动员了广大工人群众起来反对国王独裁解散工会的措施。

国王独裁机构不顾工人的意志，于1938年9月取消了工会，并于同年10月成立了行会，其活动将在国家监督下进行，因为它们是作为实现工人和厂主之间的"阶级合作"的组织而设计出来的。

共产党指令自己的党员和所有早先参加过革命工会的人加入行会，并在那里根据工人阶级的

利益进行活动。确实，在行会里，共产党的工人党员同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工人党员一道进行活动，有时还成功地取得了国王独裁制度下的这些职业组织的领导权，并组织了广泛的工人行动。

除引导和领导各种合法的和地下的群众组织 421
外，共产党还力求巩固自己的队伍，并通过在一系列企业、行政机关、大学等单位建立新组织，在数量上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共产党在加强自己的活动能力的同时，站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中等阶层争取最切身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斗争的前列。在1939—1940年间，共产党组织并领导全国工人举行了一系列罢工、示威游行和示威活动。

为了给人民群众的斗争确定一个正确方向，共产党确定了国王独裁的政治含义。1939年1月24日的《火花报》指出，如果我们把当前反动的反人民制度同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把民族复兴阵线同法西斯主义的直接工具混为一谈，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同时，共产党明确指出，在罗马尼亚，主要的危险是希特勒主义的内奸——铁卫团，因此，人民群众必须把他们的斗争锋芒对准这些内奸。根据

1938年6月制订的共产党纲领，广大人民群众应当把自己的力量结成一个联合阵线，以恢复大部分被国王独裁的法律和措施所剥夺的权利和民主自由，重新给予议会以其原有的权力，反对解散工会和政党，反对书刊检查和戒严等。

在1939年头两个月里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地区代表会议和全国代表会议上，分析和确定了共产党人为维护罗马尼亚国家主权、争取实现经济和政治要求、制止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而斗争的任务。

特别是在1939年2月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了组织广泛的群众行动来保卫罗马尼亚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性。为了在希特勒主义和修订主义危险日益逼近的局势下确保国防，罗马尼亚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包括罗马尼亚人民的一切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在内的民族阵线的口号。在这一意义上，1939年6月罗共中央全会向共产党员提出了为建立统一阵线和一切决心反对希特勒主义和国王独裁的爱国力量阵线而斗争的爱国主义义务。

在一些国际事件使罗马尼亚形势更加恶化的

时候，共产党加紧努力动员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当希特勒军队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从而接近我国边境时，罗马尼亚共产党开展了广泛的群众行动，从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军队。在这一时刻，它要求进行坚决的斗争来反对法西斯侵略，保卫国家的独立和边界。罗马尼亚共产党在1939年3月发表的宣言中，鼓励人民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斗争。宣言强调指出："共产党人将手拿武器战斗在前列"。

共产党人组织了广泛的抗议行动，反对1939 422
年3月的罗德经济条约，而特别是反对维也纳指令。为了要求废除用强权从罗马尼亚夺走它的古老领土的一部分的不公正的指令，许多共产党人和在共产党人影响下的群众组织的成员，站在全国各城市举行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前列。

共产党争取把一切爱国力量结成反希特勒联合阵线的行动，遭到亲德政治集团的敌视。

同时，共产党还必须进行斗争，反对从共产国际机关那里接来的、实质上是削弱反希特勒斗争的力量的指示在自己队伍里造成的混乱和困惑。例如，1940年，共产国际机关非但不赞赏反希特勒战争的斗争的正义性，反而批评罗马尼亚共产

党人为保卫我国民族独立、反对德国侵略而进行的活动。

1939年底和1940年初，共产国际要求把保卫罗马尼亚边境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共产党成功地团结了广大爱国力量——作为亲英和亲法政策的继续来加以揭露。这样的指示在党内造成了混乱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妨碍了它的活动。

在国王独裁的年代里，罗马尼亚共产党尽管遇到重重困难，但成功地进行了保卫工人最切身的利益和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的斗争。

军事法西斯独裁和反苏战争时期的罗马尼亚

军事法西斯独裁及其后果

1940年夏末，罗马尼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的恶化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在国内，亲希特勒的政治集团，而特别是铁卫团正不可一世，伺机夺权。国际事态的进程，而尤其是德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增长也助长了它们的活动。德国和其

他法西斯国家一起，已经占领了一大部分欧洲国家，除了英国的武装抵抗以外，没有遇到坚决的顽强抵抗。

希特勒德国为了把战争扩大到东方并摧毁苏联，需要利用罗马尼亚的战略地位及其经济和军事潜力。因此，为把我国置于它的侵略利益和目的支配下，希特勒德国支持罗马尼亚的亲希特勒集团夺取国家政权。

罗马尼亚的法西斯和亲法西斯集团，利用希 423
特勒集团和国内反动上层在财政和政治上的帮助，迫使虽然已向德国作了经济让步，但仍未赢得它的信任的卡罗尔二世于1940年9月5日把扬·安东内斯库将军推上台来执政。

卡罗尔二世逊位后不久，即1940年9月6日，建立了军事法西斯独裁，十天之后又组成了法西斯政府，其绝大部分成员是从铁卫团中招募来的。

安东内斯库政府的组成得到了“历史性政党”的头目尤·曼纽和康·扬·康·布勒蒂亚努的赞同，而他们也在独裁者安东内斯库的默许下，作为一支政治后备力量从事活动，浮现在政治生活的

表面，以便万一战争以英、美获胜而告终时接管政权。

从它建立之时起，军事法西斯独裁就在国内推行反人民的政策，废止了最后一点自由和民主权利。

安东内斯库独裁政府建立了严酷的恐怖制度，来对付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而主要是共产党人。为了扼杀任何民主爱国活动，独裁者安东内斯库把九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战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的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战士遭受灭绝性的迫害。仅在1940年11月10日地震后倒塌的令人不寒而慄的“多弗塔纳”监狱墙下，就有十四名共产党员和反法西斯战士丧失了生命。在这里，在“多弗塔纳”的废墟下殉难的还有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伊利耶·平蒂利耶。

在以后几年里，军事法西斯独裁的有关机关，处死和枪决了许多共产党员，其中有：菲利蒙·塞尔布、科尔诺塞尔医生、阿达·马林内斯库、尼古拉·莫赫内斯库、潘内特夫妇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伊尔福夫组织书记彼得·格奥尔基。

在安东内斯库独裁时期犯下的一连串罪行中，还有在雅西发生的屠杀暴行，在这次暴行中有两千多人被杀害，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其他许多公民——不分民族，但尤其是犹太人——被关进劳动营，在这里，他们同样在肉体上遭到种种灭绝性的折磨。

同时，铁卫团还犯下了其他的强盗式的罪行。他们暗杀了共产主义战士康斯坦丁·达维德和奥奇科·特雷扎、享有国际声望的历史学家尼古拉·约尔加、前部长维尔吉尔·马杰亚鲁、格奥尔基·阿尔杰沙努将军和其他政界要人。

即使在那些支持他们的追随者心目中也声名狼藉的铁卫团，除进行恐怖活动和实施掠夺人民的措施外，为了把政权全部夺到手，还起来反对扬·安东内斯库集团。为此，他们在盖世太保的帮助下，于**1941**年**1**月**22—24**日发动叛乱。在这次叛乱中，他们结伙抢劫商店、企业和机关，捣毁房屋，犯下了大量残杀平民、军官和士兵的罪行。

在军队和不再把声名狼藉的铁卫团看作能够 424
领导国家的力量的希特勒集团的帮助下，安东内斯库集团粉碎了铁卫团的叛乱，把铁卫团排除出

国家领导，并组织了一个由军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新政府。这样，希特勒德国就确保自己有可能利用罗马尼亚的物力和人力资源为其侵略目的服务。

安东内斯库独裁制度把自己的命运同希特勒制度的命运彻底系在了一起。在对外方面，安东内斯库忠于德国，他始终把罗马尼亚的外交政策保持在这一方针路线上。决心满足德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军事法西斯政府，于 1940 年10月准许德军开进罗马尼亚，这些军队也将成为安东内斯库独裁的支柱。

希特勒德国通过这个途径，保障了自己支配罗马尼亚和掠夺它的经济财富的新的可能。

在安东内斯库独裁时期，罗马尼亚向德国供应了一千多万吨石油产品、将近一百四十万吨粮食、七万五千多吨牲畜和三百六十万吨以上的各种原料。同时，德国资本霸占了罗马尼亚市场，并有力地渗入各民族工业部门。希特勒军队的驻扎成为罗马尼亚人民肩上的真正负担，在安东内斯库独裁时期，为维持希特勒军队开支的费用高达六百七十多亿列伊。

纳粹德国从经济和政治上迫使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附属于它以后，其军事力量大大增长，于是它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同它的仆从国一起，发动了反苏侵略战争。

在战争第一阶段，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挫败了苏联军队的英勇抵抗，占领了大片领土。到 1942 年初，希特勒军队已经抵达莫斯科城下，在列宁格勒周围形成了一个火力包围圈，已经接近高加索山脉，并企图摧毁斯大林格勒。

苏联共产党动员了巨大的经济、军事和道义力量来抵抗希特勒侵略。在全体人民不惜一切的支援下，红军组织了大反攻，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战略要点的大战役中，得到游击队和平民支持的苏联士兵，英勇作战，赢得了迫使敌人退却的光辉胜利。苏联人民打败侵略军的顽强斗争，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在法、南、波、捷等一系列国家里开始了广泛的抵抗运动。但苏联人民站在消灭希特勒主义斗争的前列。

1942 年由苏、英、美、中、法和其他国家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在反对法西斯军事力量的伟大

战斗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425 在这些国家的同盟为粉碎共同敌人而进行的斗争中，苏联承受了最沉重的担子。苏军继续乘胜进攻，到1944年4月成功地肃清了几乎全部苏联领土上的敌军。

罗马尼亚也加人了反苏战争，尽管这场战争的侵略目的是与罗马尼亚人民完全背道而驰的。

罗马尼亚军队，同德军一道，参加了比萨拉比亚、敖德萨、克里米亚、顿河湾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罗军被驱使到远离祖国边境的地方，去为了不相干的目的而作战，遭受重大伤亡。二十多万人死亡、受伤和失踪，成为这场非正义战争的牺牲品，给无数家庭带来哀痛。同时，战火烧毁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给罗马尼亚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给罗马尼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困难。

人民群众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对军事法西斯独裁和反苏战争的斗争

军事法西斯独裁的建立及其给国家和罗马尼

亚人民带来的全部苦难，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万丈怒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手工业者以及身受德国资本对罗马尼亚经济的掠夺之害的广大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集团，奋起反对安东内斯库独裁和希特勒侵略者。

在争取从希特勒奴役下解放罗马尼亚和停止反苏战争的爱国运动中，工人阶级是最坚定、最富有斗争性的社会力量。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到无产阶级周围并把一切爱国力量结成共同斗争阵线是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事业。

扬·安东内斯库夺取政权后，共产党便立即明确了自己对军事法西斯独裁的立场。它于1940年9月10日出版了一本题为《我们的观点》的小册子，揭露安东内斯库的独裁，指出这个独裁政权对于人民群众生活和罗马尼亚民族利益所具有的危险。军事法西斯独裁者朝着使罗马尼亚从经济和政治上从属于德国利益的方向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受到共产党人的严厉谴责。

反苏战争爆发以前，共产党在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即1940年12月行动纲领和1941年1月行动纲领里，确定了它对国内外事件的观点。

1941年9月6日的行动纲领确定了共产党的斗争策略、行动目标和手段。这个意味深长地题为《罗马尼亚人民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斗争》的文件，明确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努力完成
426 下列目标：推翻军事法西斯独裁，停止反苏战争并参加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组织一个由一切爱国力量的代表组成的民族独立政府，解放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并废除维也纳指令，实行民主改革等等。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共产党宣布准备同一切政治力量进行合作，只要这些政治力量决心进行反对希特勒侵略者的斗争，直至把它们从我国驱逐出去。为了保证完成1941年9月6日纲领中规定的目标而提出的行动有：破坏军事生产，阻止往前线运输士兵和战争物资以及组织游击战。

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揭露希特勒主义的政策和军事法西斯独裁的广泛行动。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一行动中起了主要作用，它动员了企业、学校和机关的许多青年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受战争恐怖打击的青年们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行动，甚至拒绝上前线。一批拒绝拿起武器去反对苏

联人民的青年，遭到军事法西斯独裁镇压机关的枪杀。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很多属于某个政党或无党派的爱国者，冒着丧失自由和往往是生命的危险，组织破坏希特勒战争机器的勇敢行动。

反响最大的破坏行动有：火烧莫戈什瓦亚武器库，破坏伯尔拉德军械库，炸毁布泽乌城郊的军需库，火烧特尔戈维什特兵工厂，破坏锡比乌附近默尔沙军需工厂的炮弹等等。

虽然条件十分困难，但布加勒斯特、阿拉德、雷希察、加拉茨、布勒伊拉、普洛耶什蒂以及其他地方的工人组织示威游行、罢工和其他抗议行动，反对军事法西斯独裁和希特勒分子的专横行径。在这些反法西斯行动中，1940年11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打倒法西斯主义！»«打倒恐怖手段！»«我们要民族独立！»«占领军滚出去！»等口号下，在奥博尔广场组织的布加勒斯特劳动人民大示威，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抵抗运动把受捐税压榨和被迫承受战争重担的一大部分农民吸引了进来。

受到军事法西斯独裁和希特勒占领的经济和政治后果打击的许多科学家、教授、作家、大学生、

职员、医生、律师、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起来反对希特勒分子掠夺祖国的资产阶级重要集团，也以各种形式和手段参加反对希特勒的抵抗运动。例如，国民银行经理和采矿、石油、冶金工业的各个企业的领导人公开反
427 对纳粹德国把我国经济置于破产境地。全体人民的这种愤慨情绪为共产党于1943年6月成功地组织反希特勒爱国阵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拒绝参加反希特勒爱国阵线，这引起这些政党的一大部分普通党员的不满，甚至愤怒。“历史性政党”的头目们虽然没有参加这个反希特勒爱国阵线，但也开展了一定的抗议活动。

我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际事态的进程使安东内斯库独裁的垮台日益明显，这促使自由党的格奥尔基·特特勒斯库派同意就将来共同反对希特勒的合作问题同共产党进行某些接触。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文化发展

在以实现民族统一开始的这个时期里，我国

总的发展自然是与文化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实现罗马尼亚国家统一，大大促进了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发展，促进了科学和文学艺术创作的高涨，这不仅由于巨大的精神力量被解放了，而且也由于这种高涨得到了必要的环境。同时，当时的文化，通过深刻表现资产阶级反动集团的理论和最先进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所提倡的革命世界观和社会观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反映了社会和政治矛盾的尖锐化。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的特点在于进步的思想和文化同反动的法西斯思想和文化之间斗争的加剧。在法西斯主义暂时也在我国上台的时期里，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的强度达到了顶点。最重要的文化人士果敢地站在反法西斯斗争战线一边，他们之中有些人站在先进的立场上，促进了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罗马尼亚共产党反对世界主义和反动派，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人道主义珍品的忠实保护者。

许多大学生参加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斗，反对希特勒主义，而在军事法西斯独裁时期，他们采取了反对反苏战争的态度，有些人甚至在国内或在国外（法国等）参加了抵抗运动。数以千计的

知识分子被关进监狱和集中营。罗马尼亚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致安东内斯库的信是一个重要事件，他们在信中采取了主张罗马尼亚退出战争的立场。所有这些事件为罗马尼亚文化增添了光辉，并大大丰富了它的爱国的进步传统。

教　育

428 罗马尼亚的国家统一实现后，各级教育有了重大的发展，但还不能完全满足在它面前提出的要求。学校及其工作人员在实现罗马尼亚人民完全的民族统一中起了带头作用，并在1918年统一后的优越条件下，进一步发扬了这些传统；而对于这些传统的继承则恰恰表明了民族文化的连续性。人民群众热切地渴望学文化，促进了这一时期的教育的发展。

学校、教学干部和学生的人数大大增加。但文盲却是直到解放后才彻底扫除。这段时期实施了目的是在完整的国家的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教育的法令和其他规定，延长了初级义务教育的年限。但这一措施只部分得到实行，尤其是在农村。虽然初级教育得到很大的发展，但还不能使全体

学龄儿童都入学；同时，一年级的学生中，仅有约一半人读完四年级。

中等教育以质量优异为其特点，拥有许多杰出的教师，分科培养具有扎实的普通文化知识的毕业生。但广大人民群众能受这种教育的为数甚少(学费高，教科书贵，宿舍和食堂少)。

师范学校的数目也有显著的增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罗马尼亚的工业发展，必然导致职业教育（艺术学校和工艺学校、中等工业学校、商业学校等等)的重大发展。在组织职业学校方面，一些热心于发展国家经济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具有重大功绩。在1920—1939年间，学生和教学干部人数增加约三倍。我国的职业教育尽管有相当高的水平，但由于社会、政治的一般条件，还跟不上世界科学技术。

高等教育获得了特殊进步，这是由于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后大量需要专业人材。许多享有国际声望的学者保证了教学质量。在这个时期里，成立和改组了一些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例如：克鲁日大学(紧接着统一之后)、布加勒斯特和蒂米什瓦拉工业学院、建筑学院等等。大学生人数显

著增加，但大多数人上综合性大学，特别是法律系，尽管当时感到日益需要工程师，家境贫苦的青年是上不起高等学校的；就在上大学的人中也有很多人中途退学。宿舍和食堂的容纳量很小，而教材很贵。尤其是就业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性问题，毕业生壮大了失业者的队伍；当时的政论文
429 章用“黑衣乞丐”的说法来控诉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

一般来说，统治阶级赋予教育的使命是防止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的传布，根据资产阶级利益教育青年，但他们并不能完全达到这一目的。

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预算削减，学校关闭等），尤其在军事法西斯独裁时期，进步活动遭到监视和严厉镇压，教育状况显著恶化。

工人运动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为争取学校民主化、保障教程的科学内容和教育联系生活而奋斗。进步的教学人员站在发展教育的斗争前列，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忠心耿耿地开展工作。要求保障权利和职业的广泛请愿运动席卷整个教育界，他们组织成许多自己的协会，出版机关报刊，发表专业著作，举行代表大会，刚毅地表示常常是激进的

态度。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文化人士富有权威地主张必须革新教育，并把科学成果更迅速地引人这个领域。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尽管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给我国的教育造成了艰难的工作条件，但它仍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并在一些领域里取得了特殊的进步，从而对罗马尼亚文化的普遍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科　学

1918—1944年间，罗马尼亚科学突飞猛进。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是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密切相联系，在大学教研室和专门的研究所里进行的。然而，由于物质和社会条件，特别是由于落后的技术条件，许多科学家不得不到其他国家去完成他们的发明，他们同祖国保持着联系，乃是我国人民的创造性天才对世界科学和文化宝库的贡献。

罗马尼亚科学家出席了许多国际大会和其他国际活动。

在数学科学领域，格·齐采伊卡、特·拉列斯

库、迪·庞培伊、西米翁·斯托伊洛夫等学者的名字不仅闻名于国内，而且通过雅西和布加勒斯特的学校，对世界上的数学发展作出了贡献。物理科学由于什·普罗科皮乌、亚·普罗卡、赫·胡卢贝伊、埃·伯德勒乌等科学家的发明，显示出高度的国际水平。开发国家资源，研究罗马尼亚的石
430 油，发展化学工业——这些都是化学研究工作的重点，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中有格·斯帕库、埃·安杰列斯库、康·内尼采斯库等人的卓越活动。勘探矿藏，绘制罗马尼亚地质图，研究土壤，开采大盐矿、石油、天然气，地球物理学研究等等，是地质学方面的主要项目；在这个领域里作出非凡成绩的著名学者有：卢·姆拉泽克、格·蒙特亚努—穆尔戈奇、萨巴·什特弗内斯库、格·马科维伊。地质研究所的工作大大促进了这些研究的发展。格·佛尔桑、西·梅赫丁齐等人的著作科学地探讨了地理学问题，尤其是自然地理学问题。生物科学异常发达，这个领域的发明被广泛地运用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以及农业、医学等部门。埃·拉科维策（洞穴生物学的奠基人）、格·安蒂帕、迪·沃伊诺夫、保尔·布若尔等学者继续从

事着早在战前已开始的富有成果的研究，而伊·博尔恰、阿·波波维奇—伯兹诺沙努、亚·博尔扎等人通过他们的重要著作在这个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克鲁日植物园，布加勒斯特植物园，农业研究所，“巴斯德氏”研究所等科研单位大大推动了这些方面的研究。在农业科学领域，格·约内斯库—希舍什蒂、特·塞武列斯库、基里采斯库·阿尔瓦等人的名字受到人们的尊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罗马尼亚的医学有了重大发展。在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下保持在低水平上的人民的健康状况，是进步医学家们关注的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岁月里，优秀的学者维·巴贝什、伊·康塔库齐诺、格·马林内斯库进行了他们的最后一部分工作。康·伊·巴洪博士所创立的、并为什特凡·米尔库所继承的罗马尼亚内分泌学派驰名全世界，博得广泛的好评。我国对于病毒学（康·列瓦迪蒂、什·斯·尼古劳）、神经学（杜·巴格达萨尔）、内科学和外科学（达·达尼洛波尔）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医学领域中，许多优秀学者在我国各科学中心，如克鲁日和雅西等地从事活动。

社会科学。这个时期，社会科学也有特殊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动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观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罗马尼亚共产党对罗马尼亚社会最重要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革命观点。经济科学领域的研究趋于深入，出现了一般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著作以及经济史和经济思想论述等等。这方面的许多研究是在工商业研究院和布加勒斯特哲学研究所社会学部进行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试图分析时代的一些经济现象，如1929—1933年间的危机，研究了国家工业化、土地改革、贫困化等问题，但根据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社会阶级、集团和政党的利益，得出了各不相同的解决办法。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可以举出：维尔吉尔·马德吉亚鲁、彼得·安德烈、迪·古斯蒂、什·泽列廷、舍尔班·沃伊内亚、亚历山德鲁·克劳迪安、乔治·扎内、维尔吉尔·伯尔巴特。

431 罗马尼亚哲学经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尤其是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十分激烈的斗争。这一斗争由于对法西斯思想的批判而越来

越剧烈。有些哲学家尽管有其思想上的局限性，但批判了非理性主义思想的极端性，维护了人类理性的能力。这些哲学家是：彼·普·内古列斯库、米尔恰·弗洛里安，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康·勒杜列斯库—莫特鲁。有些哲学家，如阿塔纳塞·若扎、德·德·罗什卡、丹·伯德勒乌的活动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开始的。在这个时期，卢契安·布拉加抛出了他那浸透着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哲学观和美学观，遭到左派思想家的激烈批判。在美学领域里，欧金·洛维内斯库、图多尔·维亚努等人作出了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在罗马尼亚心理学方面，出现了米哈伊尔·拉列亚、什特弗内斯库—戈万格、尼·默尔吉尼亚努、迪·托多拉努和亚·罗什卡等人具有独创性的著作。

在同教育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教育学领域里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而在法学科学中，则进行了统一法制的重要研究。当代著名的法律学家有：尼古拉·蒂图列斯库（在国际法方面）、姆·德茹瓦拉和安德烈·勒杜列斯库等人。

尼古拉·约尔加的巨著在历史编纂学中占主

导地位。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科学界也博得特殊的好评。约尔加首先探讨了罗马尼亚历史。他在世界史、拜占庭学、文学史等方面留下了具有特殊价值的著作。约尔加所发表的文献集、商业史、教育史、军队史等著作、他的综合性巨著《罗马尼亚史》以及回忆录成为历史科学的基本著作。

约尔加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者、人道主义者、反法西斯战士、罗马尼亚人民民族自由的维护者的活动，招致了法西斯主义对他的刻骨仇恨，1940年11月，他遭到铁卫团的卑鄙暗杀。

在古代史和考古学领域里，瓦西里·珀尔万以他的著作《葛特部落》和1924年创办的《达契亚》杂志获得了声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里，历史研究得到了可观的发展，在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地方，特别是克鲁日（伊·卢帕什、西·德拉戈米尔、伊·莫加、阿·列佩达图等曾在这里进行过历史研究工作，康·达伊科维丘、什·帕斯库和达·普罗丹也曾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活动），成立了许多专业研究所，出版了许多史学性质的杂志，而且还在国外进行了考察和研究等等。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罗马尼亚历史编纂学中比较突出的新现象，是一些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基础的著作的出现，这些著作是当代研究的先驱。

罗马尼亚语言学也在其各个门类（方言学、修辞学、语法、语言史等）获得了重大进步。奠定了一些现代巨著——罗马尼亚语言分布图集、辞典等等的基础。在这个领域里，奥·登苏希亚努、亚·菲利皮德、塞克斯蒂尔·普什卡里乌继续进行着艰巨的工作；约尔古·约尔丹、埃米尔·彼得罗维奇、亚·罗塞蒂和亚·格拉乌尔等学者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而他们的事业将在后来，在社会主义年代里得到完成。

技 术 432

由于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家的剥削而受到抑制的我国，同其他国家比较，尽管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恶劣，但技术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其中有些是罗马尼亚人民的独特贡献，得到世界技术界的赞赏和采用。组织综合技术教育，工程师的数目增加，一些企业得到装备，这些都促进了发明创造精神的发展。有些发明是在国外的罗马尼亚学者

和工程师作出的。一些发明家，如亨利·科万德（喷气机的创始人之一）和乔治·康斯坦丁内斯库（在传声学方面）的名字已经进入世界技术发明家行列，进一步发扬了特拉扬·武亚和奥雷尔·弗拉伊库在这方面建立的传统。在国内，拉·埃德列亚努工程师在提炼石油的高级工艺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出现技术革新和一些巨著的主要领域是：冶金、机器制造、航空、电机、动力、石油和化学工业、采矿、建筑（房屋、公路、桥梁、铁路、隧道）、水利工程、造田等等。

报　刊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完结以后，报刊——现在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畅行无阻——根据它对于执政的或在野的各政党的隶属关系而日益分化。发行量大的报纸有《宇宙报》、《晨报》和《真理报》，后者是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的论坛。同时，还有许多重要的文化刊物（哲学、经济、历史、法律等），如《罗马尼亚生活》，以及科学杂志。全国各城市出版有大量日报、期刊、文学杂志等等。

同时还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报刊。报刊的技术和制版条件得到了改善，通讯手段也有所改进，例如，1928年全国开始了无线电广播；记者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职业、物质和政治利益。1935—1936年期间，各种名称的刊物达两千三百种左右。它们的内容和倾向当然是形形色色、不相一致的；而且，一般来说，刊物质量也并不令人满意。由于法西斯思想渗入报刊并日益嚣张，情况大为恶化。有些报纸，如《言论报》和《潮流报》，有些期刊，如《思想》，顽固地宣传反动的、沙文主义的、神秘主义的观点，而法西斯报刊则企图为德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的好战目的制造舆论。许多著名的学者，不顾书刊检查和当时的种种规章，在民主报刊上疾呼反对希特勒危险（如尼古拉·约尔加在《罗马尼亚民族报》上发表的文章等等）。国内反动上层的独裁建立后，报刊对国家的根本问题被迫保持沉默，并接受官方的内外政策观点。许多左派报刊和民主报刊横遭封闭。但这个时期的罗 433
马尼亚报刊史中最宝贵的因素是共产主义报刊的问世，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我国工人报刊、社会主义报刊和民主报刊最宝贵的传统，并把它

们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1921—1944年间，由罗马尼亚共产党出版或指导的合法的和地下的报刊将近有五百种。最重要的刊物是《阶级斗争》杂志（早在1920年就创办了），而在罗马尼亚共产党转入地下后，则是《火花报》（1931年）以及一批青年、工会的文化刊物和共居民族文字的刊物，其中许多是在我国各工人中心（布拉索夫、克鲁日、普洛耶什蒂、蒂米什瓦拉、雅西等地）出版的。具有高度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刊物《新纪元》（1936年）和《我们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影响。

罗马尼亚共产党创建并在完全处于地下的情况下加以指导的群众合法组织，如：民主联盟、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劳动同盟、反对偏见同盟、苏联之友、农民阵线、马多斯等等，出版了许多刊物。罗马尼亚共产党在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报刊上，也成功地插进一些文章和材料，向群众传达为自由而斗争的信息。这个时期的共产主义机关报刊有：《蓝工装》、《钟》和《无产阶级文化》。在这种出版活动中，亚历山德鲁·萨希亚体现了共产党员记者、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品德。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版的共产主义报刊，以真正的大无畏精神战

斗在我国伟大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前列。

在军事法西斯独裁的年代里，除了大量传单和秘密电台《自由罗马尼亚》的广播以外，还出版了同名报纸（1943年）——《自由罗马尼亚报》，在完全处于地下的情况下，它号召人民参加推翻安东内斯库制度的斗争，并报道了1944年8月23日起义胜利的消息。

文 学

罗马尼亚文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达到了真正的高峰。罗马尼亚国家统一的实现促进了这方面的繁荣景象，为全国的文学和艺术人材的成长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社会和政治矛盾随着国家的普遍发展而深化，这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得到了最生动的反映。就整体来说，罗马尼亚文化仍然沿着民主的轨道前进；最伟大的文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萨多维亚努、阿尔盖齐、雷布里亚努、约尔加、埃奈斯库、巴洪、蒂图列斯库、特·塞武列斯库等）始终不渝地为民主、进步与和平而奋斗。只有少数依附国内外反动上层的知识分子，堕落成为反动上层在文化、科

学生活中的代言人，而立即遭到公众舆论的抨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不仅出现于社会和
434 政治斗争舞台，不仅出现于阶级斗争在文化领域中的反映——激烈的思想论战中，而且还出现于文学创作本身。

在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时期里，散文有了十分令人注目的发展。这方面最伟大的创作家、我们的文学家的典范是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这时，他的作品攀上了创作的最高峰，如：《斧头》、《日德里兄弟》、《巨蟹宫》、《安库察客店》。他以无与伦比的技巧表现了人民昔日的欢乐与痛苦（特别是痛苦），歌唱祖国大自然的娇娆；他的长篇小说在以后的年代里被译成许多种外国语言。利维乌·雷布里亚努在著名的长篇小说《绞死者之林》、《起义》和《扬》中，创作了一幅幅巨大的社会壁画。这个时期另一位卓越的长篇小说家是切扎尔·彼特雷斯库（《黑暗》、《胜利大街》等）。此外，还有十分细腻和深刻的作家卡米尔·彼得雷斯库、斯拉维奇传统的继承者扬·阿格尔比恰努等等。在诗歌中，图多尔·阿尔盖齐以独创性和非凡的创作力见胜，他创作的诗集《和谐的词》，发掘了我国语言

新的丰富的表现力；通过他那著名的《鹦鹉信札》和《杂诗》，阿尔盖齐清晰地申述了自己对时代的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先进观点。另一位重要的作家是卢契安·布拉加，他是以深刻的生活感和十分细腻的艺术力为特征的哲理诗的作者。加拉·加拉克西翁、霍·帕帕达特—本杰斯库、格·托珀尔恰努、奥蒂利亚·卡齐米尔、扬·米努列斯库、扬·皮拉特、帕维尔·丹、恩·德·科恰等人的作品充实了两次大战间罗马尼亚文学绚丽多彩的图景。埃米尔·伊萨克表现出革新诗歌艺术的强烈趋势，他的活动是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从这时起，通过象亚历山德鲁·萨希亚——短篇小说和游记(《今日苏联》)的作者、精力充沛的记者，大诗人和报告文学作家乔·博格扎，以人民的苦难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家扬·克卢格鲁这样一些作家的作品以及光辉的政论家伊利耶·克里斯蒂亚的活动，开始形成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学。布勒伊拉的工人帕纳伊特·伊斯特拉蒂用法文创作了一组回忆传奇的过去的长篇社会小说。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如纳吉·伊斯特万、阿斯塔洛什·伊斯特万、阿道夫·梅申多

尔夫、阿尔弗雷德·玛古尔·施佩贝尔、奥斯卡·瓦尔特·西塞克等人的作品。罗马尼亚共产党出版和指导的报刊（《蓝工装》、《自由谈》、《新纪元》等）以及一些民主报刊（《真理报》、《明天的社会》、《罗马尼亚生活》等），为树立先进的文学作用观，为发表上述作家的作品，作出了贡献。有一些进步报刊的名字，象克鲁日出版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马札尔文报《我们的时代》（1926—1940年），以及一些文化人士、作家和战士，如加尔·加博尔、科什·卡罗伊、科尔文·山多尔、赛瓦提乌斯·耶讷、科瓦奇·杰奥尔吉、弗兰约·佐尔坦，雕刻家维达·盖扎和戏剧界的亚诺维奇·耶讷等人是特兰西瓦尼亚马札尔族创作家中最有名望的代表。

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中，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伟大人物的名字：加拉贝特·伊布勒伊列亚努、加尔·加博尔、乔治·克林内斯库、欧金·洛维内斯库、图多尔·维亚努和博格丹—杜伊克。由于具有自己的丰富的创作，由于各种不同的倾向和风格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罗马尼亚文学上升到了艺术表现的高度水平，可与

其他一些国家伟大的现代文学相媲美。 435

艺　术

建筑艺术在没有得到官方必要的全力支持这种相当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发展。这是一个进行大规模修缮和建筑的时代，特别是在首都，在这里，尤其是在市中心，耸立起在当时来说是现代化的大楼、公共建筑、政府各部和银行的办公大楼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突出成就有：部长会议大厦、军事科学院、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学院、布拉索夫阿罗旅馆、蒂米什瓦拉剧院和几所大教堂。建筑学家杜伊利乌·马尔库和彼得·安东内斯库由于他们先进的设计思想而著称，这种思想在雄伟的建筑整体和构成体里得到了体现。

罗马尼亚戏剧有不同的表现和倾向，但它们都不得不在同样十分困难的物质条件下成长。有几家民族剧院（布加勒斯特、雅西、克鲁日、克拉约瓦）和私人剧团；除了保守倾向和工人戏剧的萌芽以外还有现代派。一般来说，罗马尼亚的剧目是被忽视的。卡米尔·彼特雷斯库（《坚强的灵魂》、《丹敦》）和乔治·米哈伊尔·扎姆菲雷斯库（《纳斯

塔西亚小姐》)的社会剧，亚·基里采斯库(《唠叨多嘴的女人》)、图多尔·穆沙特斯库(《华尔兹舞大王》)、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最后一小时》、《无名星》)、维克托尔·扬·波帕(《塔凯、扬凯和卡德尔》)的喜剧，米哈伊尔·索尔布和其他人的杰出创作，丰富了民族的戏剧文学。他们的剧作在不同的程度上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了批判。苏联、德国和英国戏剧的进步思想被我国一些剧团所吸收。戏剧的社会使命在乔·米·扎姆菲雷斯库、维·扬·波帕和其他人发起的民间剧团和工人剧团的活动中得到进一步肯定和体现。在报刊上，包括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指导的报刊上，广泛讨论了戏剧创作问题。注意的中心是剧目问题以及导演、表演和舞台美术的作用。保尔·古斯蒂、扬·奥雷尔·马伊坎等一些导演的活动和以康·伊·诺塔拉、扬库·布雷齐亚努、扬·马诺列斯库、德米特里亚德、马克西米利安、斯托林、托尼·布兰德拉、卢契亚·斯图尔扎一布兰德拉、玛丽亚·菲洛蒂等人为首的艺术大师们的活动，给这个时期的戏剧增添了荣誉和光彩。

绘画的特征在于继承前一时期的古典传统，

寻找新的题材(例如,无产阶级生活)和表现手法。它保持并发扬了我们民族艺术的现实主义气质和深刻的人道主义价值。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画家有:特·帕拉迪、格·珀特拉什库、尼·托尼扎、让·斯特里亚迪、尼·德勒斯库、伊塞尔、汉斯·马蒂斯·托伊施、汉斯·埃德尔。在他们的画面上出现了城镇和贫民区的朴实世界、农民的痛苦形象、工人的预示着暴风雨的硬骨头精神(托尼扎、伊塞尔)以及童年的温柔和具有深刻感染力的静物画。装饰着经济学院大礼堂的切奇利亚·库采斯库一斯托尔克的巨幅作品《罗马尼亚商业史》,则是壁画的代表作。

雕塑获得特殊的发展,这首先是由于康斯坦 436
丁·布伦库希的创作。他的作品已经进人世界现代造型艺术最珍贵的作品宝库。他的著名作品有:《无限柱》、《沉默的圆桌》、《吻之门》、《神鸟》等等。布伦库希综合了我国民间艺术因素,并用感人肺腑的大胆精神和独创性使这些因素得到高度的、普遍的表现。他的艺术把罗马尼亚的艺术天才的声望传扬于世。奥·汉(科格尔尼恰努雕像)、罗·拉迪亚、迪·帕丘雷亚、科·梅德雷亚、伊·

扎列亚(纪念物雕刻)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罗马尼亚雕塑的成长。

在版画方面，继承了前一时期的战斗艺术传统，著名的有：日格维德、伊塞尔、雷苏、希拉托。

罗马尼亚的音乐艺术无论在作曲还是在演奏方面，都有重大进步。乔治·埃奈斯库的全面的天才，辉煌地展现出来。他的作品早已进入世界演奏节目，有些则是真正的杰作。他的作品是从我国民间音乐得到灵感而创造的，他不仅把民间音乐当作独特的语言，而且通过丰富的创作过程使它们升华为高级的艺术结晶，象这类的作品有：他的小提琴奏鸣曲、交响乐、室内音乐、《农村组曲》和他的创作高峰——开辟了世界抒情剧发展新途径的歌剧《俄狄浦斯》(1936年首次公演)。同时，埃奈斯库也是一位伟大的演奏家，作为小提琴家、指挥和钢琴家，他在世界各大舞台上都博得热烈的掌声。此外，还有他作为教育家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活动，当代国内外的许多音乐家把他们的艺术造诣归功于他。埃奈斯库在国内外坚定不移地传布了优秀的罗马尼亚音乐。

钢琴家、作曲家迪努·利帕蒂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家，可惜他死得很早。他的录音和创作具有特殊的表现力。

在这个时期，一些音乐团体的活动有了重大的发展，如布加勒斯特交响乐团（指挥乔·埃奈斯库和乔·乔尔杰斯库）、布加勒斯特和克鲁日的罗马尼亚歌剧院、广播交响乐团（特·罗加尔斯基）、卡门合唱团（杜·乔·基里亚克和扬·基雷斯库）、布加勒斯特音乐学院以及由我国的著名音乐理论家康·布勒伊洛尤和乔·布雷亚兹创办的民间音乐文库。米哈伊尔·若拉、迪·库克林、蒂贝里乌·布雷迪恰努、萨宾·德勒戈伊、马尔齐安·內格雷亚、保尔·康斯坦丁內斯库、泽诺·万恰、西吉斯蒙德·托杜策在创作方面显示了特殊的才能。在指挥艺术方面有：约內尔·佩尔列亚、阿尔弗雷德·亚历山德雷斯库、安东尼恩·乔兰等人。

电影艺术尽管困难重重，但仍在我国文化生活中为自己打开了一条道路，通过几部影片，给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一般来说，这个时期的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是罗马尼亚文化先驱们所建立的传统的继续；

同时也是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进行与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文化革命取得质的飞跃的前提。

问题和参考书目

437

为了了解罗马尼亚历史的现代时期，需要研究大量罗马尼亚和外国的史料所记载的十分丰富多彩的文献资料。反映1918—1945年这一时期在罗马尼亚社会内部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和过程的文献史料浩如烟海。研究这个时期的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出科学家们对同一个历史现象和过程采取了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观点。因此，读者在关于这个时期的著作中往往会遇到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只有等待以后的研究去加以彻底解决。当然，在这些有争论的问题中，绝大多数是有关我国历史的某些特殊方面的。至于研究祖国历史和探讨它的主要问题的总的方针路线，则已在党和国家的文件里找到了基本答案。这些答案和指示可在罗共九大文件、1964年4月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罗马尼亚工人党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的立场的声明、此后历次罗共中央全会通过的文件以及罗共十大文件中得到。

同时，乔治乌一德治在庆祝罗马尼亚共产党斗争三十周年和四十周年时所作的报告(见«论文和讲话集»，布加勒斯特政治出版社，1965年)、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在各种集会上的报告和讲话(已在题为«罗马尼亚在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一书中发表，布加勒斯特政治出版社，第1—2卷，1968年；第3卷，

1969 年；第 4 卷，1970 年），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对了解和理解这一方针都是重要的。

《罗马尼亚工人运动史文献》(1916—1921 年)，布加勒斯特政治出版社，1966 年。这是一部主要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资料集。1966 年出版的这部书，与早先出版的有关同一时期的文献集不同，显示了人们很少了解的罗马尼亚社会党活动的一些新的方面。

特别是这些文件说明了下列事实的真相，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里，社会党内部的革命派不断壮大，因此在1921 年5 月决定把社会党改为共产党。

对于了解 1918—1945 年期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来说，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和组织的报刊以及专业杂志中也
438 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如：《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附设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所年鉴》、历史《研究》以及关于这一题目的专著：《罗马尼亚无产阶级的罢工斗争史论文集》，第 1、2、3、4 卷，布加勒斯特，1960 年，1962 年，1965 年和 1970 年；《罗马尼亚工人阶级状况》，布加勒斯特政治出版社，1966 年。

关于这个时期罗马尼亚的经济发展问题，反映在一系列著作里面，其中有些是在地主资产阶级制度年代里出版的，另一些是在 1944 年 8 月 23 日之后出版的。从统计材料和对经济现象的评价来看，内容比较丰富的著作有：《罗马尼亚外国资本史论文集》，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0 年；尼·普·阿尔卡迪安：《罗马尼亚的工业化》，布加勒斯特，1939 年；斯·伊·伯伊科亚努：《罗德条约》，布加勒斯特埃克斯切肯尔出版社，1939 年；《罗马尼亚工业》(1930—1940 年)，布加勒斯

特，1940年；科斯丁·穆尔杰斯库：《1945年的土地改革》，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56年；维尔吉尔·马德吉亚鲁：《重农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经济学家"出版社，布加勒斯特，1936年；维尔吉尔·马德吉亚鲁：《世界大战后的罗马尼亚经济发展》，布加勒斯特，1940年；维·马埃夫斯基：《罗马尼亚国家财政史论文集》（1914—1944年），科学出版社，1957年。

这些著作阐明这个时期罗马尼亚经济的主要方面，叙述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罗马尼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并确定我国因为没有相应的财政手段，所以没有参加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世界。

关于罗马尼亚的对内政策，读者同样可以在发表于专业杂志中的文章和研究以及专著中，找到许多材料和文献资料。例如，尼古拉·约尔加：《罗马尼亚历史》，第9卷，布加勒斯特，1939年；康斯坦丁·基里采斯库：《罗马尼亚统一战争史》(1916—1919年)，第3卷，布加勒斯特教育之家出版社；卢克雷齐乌·珀特勒什卡努：《罗马尼亚的基本问题》，国家出版社，第3版，布加勒斯特，1946年；卢克雷齐乌·珀特勒什卡努：《在三种专政下》，布加勒斯特论坛出版社，第4版；什特凡·泽列丁：《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它的起源和历史作用》，布加勒斯特，1925年；尼·约尔加：《复辟的两年》，佛列尼—德—蒙特"罗马尼亚风俗"出版社，1932年。

为了扩大有关1918—1945年期间国际关系和罗马尼亚对外政策的知识范围，读者可查阅专业杂志，尤其是期刊《罗马尼亚历史评论》。为了同一目的还可以参阅研究罗马尼亚外交和

世界外交的著作，米尔恰·马利查：《外交》，布加勒斯特教育出版社，1970年；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和瓦西里·利维亚努：《历史和社会理论问题》，布加勒斯特科学院出版社，《罗马尼亚历史丛书》，第30册，1970年；康·塔什克：《罗马尼亚对外政策方针》，布加勒斯特，1938年；扬·姆·奥普略：《尼古拉·蒂图列斯库》，布加勒斯特科学出版社，1966年；扬·姆·奥普略：《罗苏外交关系史上一个富有成果的阶段》，布加勒斯特政治出版社，1967年；埃利扎·康普斯：《小协约国》，布加勒斯特科学出版社，1967年；尼古拉·蒂图列斯库：《演说集》，布加勒斯特科学出版社，1967年；尼古拉·蒂图列斯库：《外交文件》，布加勒斯特政治出版社，1967年；阿尔曼德·克林内斯库：《议会演说集》，布加勒斯特，1934—1937年。

这些著作和这里未提到的其他著作，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强调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方针是维护
439 各国人民的和平、捍卫本国的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同时，它们明确指出或勾划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反希特勒德国斗争期间罗马尼亚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进展。

同时要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罗马尼亚对外政策的方针得到国内大多数政治力量的支持。因为关于1918—1945年间罗马尼亚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史的大多数研究、论文和专题著作，有许多夸张的或者不符合实际的材料和评价，所以必须批判地利用这些资料，而且只有在把它们同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学所得出的最新结论加以严格对照后，才能利用。只有这样，它们才能真正有助于丰富读者所掌握的我们祖国历史的真实知识。

人 民 革 命

441 # 1944年8月23日全国反法西斯武装起义

在欧洲国家人民的历史中，具有罗马尼亚人民历史特点的不多：罗马尼亚人民在不利条件下形成为部族，在与热中于领土扩张的毗邻列强的战火中组成罗马尼亚诸封建国家，这些国家的巩固及其对奥斯曼入侵的抵抗，它们在四个世纪的时间中从属于奥斯曼帝国，争取统一和独立、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斗争。在这整个动荡不定的历史上，遭受的挫折虽不可胜数，但也取得了许许多多重大的胜利；胜利最终在每个历史阶段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决定了我国人民的进步。

在十八至十九世纪，近代罗马尼亚民族是在受毗邻三大帝国的多方面的压迫下诞生的；因此，它是作为被压迫民族，而不是作为统治民族形成的。罗马尼亚民族国家是这一争取独立的错综复杂斗争的产物。只有从这些前提出发，才能

理解1944年8月23日全国反希特勒起义的历史根源。

要理解在这个时候投入行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组合方式，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这样的事实：这些力量积聚的基础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业已奠定，当时，罗马尼亚共产党从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对社会结构和国家政治组织的分析出发，并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国际经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为组织一个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以阻止罗马尼亚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某些极端反动的上层所支持的法西斯力量掌握政权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这个目的虽然未能全部实现，但为统一工人力量、联合反希特勒的民主力量、利用地主和资产 442
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进行的活动（尤其是在1933—1938年期间），积累了许多政治和组织经验。

罗马尼亚共产党吸收了这一经验，特别是在1943—1944年期间；早从1941年开始（《七月决议》和《九月提纲》），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文件就十分清楚和正确地作出了对战争和党的任务的估计。

联合反法西斯政治力量的第一项成果就是1943年夏反希特勒爱国阵线的组成，这个阵线团结了共产党、农民阵线、爱国者联盟、马札尔劳动人民联盟(简称马多斯)、农民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地方组织。

从1943年开始，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就研究了推翻军事法西斯独裁政府、在我国建立民主制度以及罗马尼亚退出希特勒战争的方法；监狱、集中营和狱外的党组参加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行动计划的重要步骤。

党在完全处于地下的情况下进行着工作，终于在1944年4月与社会民主党组成了工人统一阵线，并于1944年6月20日组成民族民主同盟，参加该同盟的有罗马尼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

与此同时，同王宫集团和一些反希特勒的资产阶级派别建立了接触，其意义在后来显示了出来。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反对扬·安东内斯库的军事法西斯独裁制度、争取将希特勒军队赶出罗马尼亚和停止反对苏联及其盟国的非正义战争的广泛联盟。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罗马尼亚共产党之所以能促成各种反希特勒政治力量的这种广泛组合，首先是由于国内社会和政治条件的许可。共产党的伟大功绩恰恰在于它善于领导国内反希特勒力量去夺取胜利，并在推翻安东内斯库统治和解放祖国的斗争中赢得胜利。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卓越的报告中，对1944年8月23日武装起义的意义作了最明确和全面的概括，对国内因素的作用以及这个时期的国际条件给予了科学的评价：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在于，在这种严重的环境下，它成功地找到了争取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合作以推翻军事法西斯独裁、使罗马尼亚退出反苏战争并同反希特勒联盟站在一起、使国家得到民主发展的道路。这种政策的成果具体表现为工人统一阵线的建立、各民主力量的联合、与包括君主政体在内的军界的合作的确立。这样，武装起义就成了最广泛的全国政治力量、军队、爱 443
国部队的联合行动的果实，成了人民群众合力支持反法西斯斗争的果实。在实现这一对罗马尼亚

命运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行动中，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队罗马尼亚共产党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我们必须提到，1944年8月23日的伟大行动之所以可能，还由于有利的国际条件。我们首先注意到德国法西斯主义所遭到的失败、苏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苏军给予希特勒主义的越来越沉重的打击、反法西斯同盟中其他力量的斗争。大家知道，苏联，它的军队承担了战争的重担，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最大的物力和人力牺牲。罗马尼亚人民，象其他各国人民一样，对苏联各族人民及其军队对从法西斯奴役中拯救人类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怀着深切的感激。同时还必须提到其他盟国及其军队对战胜希特勒德国所作的贡献。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游击队员们的斗争——在他们的队伍中，工人阶级、共产党人起了重要作用——，是手拿武器起来反抗纳粹占领者、为争取自由和独立、为保卫其民族生存而斗争的被奴役人民的伟大史诗，它将作为最可歌可泣的牺牲和殉身的范例之一而永垂世界史册”。

1943年下半年和1944年上半年国家的经济

状况不断恶化。工业生产下降；日益强烈地感觉到原料匮乏。一些企业倒闭或遭轰炸破坏。数以百计的工人陷于失业。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为希特勒分子所强占。

军事法西斯独裁制度把战争的全部重担都转嫁到工人群众的肩上，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

在马拉克萨工厂、勒美特尔工厂、格里维察各工厂、环球金属工厂、普洛耶什蒂协和石油公司、布拉索夫和雷希察的罗马尼亚飞机制造厂、锡比乌兵工厂以及其他中心，爆发了工人的英勇斗争。农民的困苦状况也不下于工人，征兵，一再地征发曳引畜力，征收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这些都引起了农民群众对安东内斯库制度的不满的急剧高涨；这种不满转化为反抗在过往途中捣毁村庄、掠夺农村居民的德国部队的行动（例如，在雅西、罗曼、巴克乌、图托瓦诸县）。

处于艰难的经济境况下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受到德国占领军及其在我国的工具的某些行动的打击和侮辱；在这些知识分子中，产生并日益广泛地开展了对占领者的抗议运动。

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愈益恶化，列伊的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趋势上升，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价格日益严重地不断上涨，对居民的供应日趋恶化；所有这一切致使最广大的群众对把罗马
444 尼亚置于法西斯德国奴役下的安东内斯库政府的政策，对希特勒战争的继续进行和为了与罗马尼亚人民格格不入的利益而牺牲千万人生命的愤慨情绪高涨起来。

甚至在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也产生着分化。一大部分工业资本家不满德国的垄断。他们的一些重要集团过去曾经同法国、英国或美国资本的一些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德国的占领心不顺悦。

希特勒德国对罗马尼亚掠夺的加剧，希特勒德国的资本对一些重要工厂(马拉克萨、雷希察各钢铁工厂等等)，甚至对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石油工业)的占领，打击了这些罗马尼亚地主和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他们寻求旨在更换安东内斯库统治、消除德国占领和使罗马尼亚退出战争的解决办法的倾向。

热中于保持军事法西斯独裁、德国占领和反

苏战争的地主资产阶级上层的数目和比重在1943—1944 年间不断下降。

在各阶层和各阶级居民中滋长着的对政府的政治上的敌视态度在罗马尼亚军队中也有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罗马尼亚军队士兵和军官的精神状态，我们必须回顾到，在这次战争以前，罗马尼亚人在其动荡的历史进程中从未同俄国人交过战；相反，在 1877—1878 年和 1916—1917 年，他们还结成盟友，在同一条战线上并肩战斗。过去曾经具有亲法或亲英倾向的高级军官，对于罗马尼亚投入与希特勒德国为伍的战争，对在战场上牺牲数十万罗马尼亚士兵和军官是不满的。

即使曾经支持希特勒——安东内斯库 1941 年侵略的、以国王米哈伊为首的王宫集团，在希特勒及其盟国军队于 1942—1943 年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溃败之后，也发生疑问：战争的命运将如何？而在希特勒联盟的军事失败（也就是罗马尼亚军事失败）的情况下，王朝本身以及社会、政治统治集团的命运又将如何？

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被意大利君主派赶下台并逮捕，在罗马尼亚闻名的巴多里奥元帅政府

的组成，在王室集团中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而英、法、美军队于1943年夏天在意大利登陆，尤其是1944年夏天从法国登陆更发生了直接影响。罗马尼亚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甚至他们的广泛集团都希望也在巴尔干进行这种登陆，或者至少在罗马尼亚运进若干英美空降部队，其作用与其说是帮助推翻安东内斯库和赶走德军，不如说是保护统治阶级，对抗人民群众的斗争和社会革命。但是这种希望未能实现，因为前线的力量对比迅速发生了变化。

伏尔加河上斯大林格勒之战在罗马尼亚引起了最深刻的反响，投入这次战役的，除希特勒部队
445 外，还有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部队，而红军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意味着战争进程中的转折。

侵略军在伏尔加河、顿河和高加索之间整个地区的毁灭性溃败，不仅意味着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的破灭，而且促使德国的盟国领导集团权衡这种灾难性联盟的必要性以及继续同德国站在一起进行战争是否明智。

这样，“上层的危机”激化，因为对于他们来

说,战争中的失败可能意味着完全灭亡的危险。

在这期间,苏军的攻势有力展开,战事日益推近。

南翼苏军行动的成功,尤其是它们的政治影响,造成了东南欧军事形势的根本转折。

在毗邻的南斯拉夫,约·布·铁托元帅领导下的拥有数十万战士的游击战争,声势日大。

罗马尼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使1944年4月2日苏联政府关于在尊重罗马尼亚民族独立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势力的战争的声明,以及1944年4月12日苏联政府提出(得到英国和美国政府同意)的停战条件,得到广泛反响,但扬·安东内斯库政府拒不接受。

罗马尼亚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重要集团起来日益坚持要求退出希特勒战争并转到盟国,即转到苏、英、美同盟方面。

但与此同时,一些政界人士,诸如尤利乌·曼纽、扬·米哈拉凯、迪努·布勒蒂亚努、格奥尔基·布勒蒂亚努周围的某些集团,继续部分支持安东内斯库制度,要求他同反法西斯同盟停战。为了这一目的,于1944年初,巴尔布·什蒂尔贝伊和

康斯坦丁·维绍亚努还作为罗马尼亚领导集团的使者被派往开罗和安卡拉与盟国谈判；与盟国代表的会谈还通过斯德哥尔摩、日内瓦、里斯本、马德里及其他渠道进行。

这样一来，就爆发了政治危机和政权危机，并日趋尖锐化；罗马尼亚政治上层的各集团之间的潜在矛盾日益加剧，并变得越来越毒气熏天。

当领导集团进行着这种不会有什么卓著成效的政治谈判时，人民群众的斗争加强了。在一些重要企业，诸如布加勒斯特的马拉克萨、环球金属、列昂尼达、阿克塔等工厂和格里维察铁路机车修造厂，在油田区，在布拉索夫的罗马尼亚飞机制造厂，雷希察各钢铁厂，蒂米什瓦拉链条厂和铁路机车修造厂，康斯坦萨造船厂，巴克乌易燃品仓库，布加勒斯特兵工厂，都发生了多起怠工行动，航空通讯网和康斯坦萨、普洛耶什蒂、肯皮纳、布拉索夫地区的炮兵部队通讯网经常受到干扰。

446 怠工在工厂中同其他斗争形式，如：停业生产、在企业管理机构前示威、散发共产党和反希特勒的政治文件等相互配合。所有这一切增强了全体劳动人民迫切要求团结在反希特勒斗争中的

信心。

除了工人以外，对在战争中所遭受的人力伤亡、对希特勒的掠夺、对横征暴敛和压在他们头上的剥削深为不满的农民，也起而斗争。

在被霍尔蒂分子暂时占领（1940—1944年）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群众斗争的锋芒对准希特勒分子及其走狗霍尔蒂和萨拉查。克鲁日一些企业的工人、巴亚—马雷福埃尼克斯公司的工人、红谷、奥拉迪亚、锡盖特、卡雷伊、卢杜什和其他地方的矿山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发生了劳资冲突。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号召下，布拉索夫、锡比乌、蒂米什瓦拉、阿拉德、雷希察、雅西、巴克乌以及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和我国其他地区的罗马尼亚、马札尔、日耳曼工人参加了劳资冲突、罢工和反希特勒战争机器的怠工行动。即使在处于党卫军恐怖主义控制下的日耳曼居民中，也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形成了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

军事法西斯独裁制度的危机

1944年夏天，随着国家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恶

化，法西斯制度在国内外的景况也日趋严重。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不满和反抗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来。甚至在剥削阶级中，由于德国人对罗马尼亚资源的系统掠夺、全国经济被动员来为希特勒战争服务以及他们剥削人民群众所得的利润的下降，也造成了日益深刻的不满；除此而外，还有对经济困难的增长、市场商品匮乏、不断蔓延的饥荒和贫困可能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的恐惧。这一切使安东内斯库政府摇摇欲坠，促使支持他的领导集团迅速分崩离析。

革命形势业已产生。此时，人民群众对军事法西斯独裁制度再也不堪忍受，剥削阶级集团不能再通过安东内斯库政府来进行领导，对之不再寄予任何希望。

这些集团感到大难临头，开始寻求同反希特勒同盟中的大国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例如1943年秋天，通过爱德华·贝奈斯）。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共产党——格奥尔基·乔治乌一德治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解决了若干内部领导和组织问题（1944年4月4日）之后，有力地巩固了自己的组织，扩大了同工

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着手组织取名为反希 447
特勒爱国部队的自己的战斗队。于1944年4月末，组成了工人统一阵线，并在“五·一”节传单中发表了它的行动纲领。

在首都各主要企业，诸如格里维察、勒美特尔、马拉克萨、电力和电车公司、莫乔尔尼察、布加勒斯特电车公司以及国内其他许多企业和地方，都组成了爱国委员会，根据工人统一阵线制定的任务展开组织和宣传活动。在起义过程中，战斗部队应成为核心，把一切愿意拿起武器为反对法西斯制度和希特勒人侵者而战斗的爱国者组织在它的周围。在首都、普拉霍瓦河谷、奥尔特尼亚、巴纳特都组织了爱国战斗队。罗共各州委员会书记同时是爱国战斗队州指挥部的司令。

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支援点、军备和军需库。

同时，罗共领导通过卢克雷齐乌·珀特勒什卡努同王宫的反对派(反安东内斯库)集团建立了联系。

1944年的整个夏天，进行着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与军队和王宫代表之间的谈判。罗马尼亚共

产党代表坚持必须用武力推翻军事法西斯独裁并调转枪口反对希特勒匪徒。王宫集团方面则表达了以亲德的大资本家扬·纪古尔图代替安东内斯库的想法；忠于国王的人将进人纪古尔图政府，他们将掩过希特勒匪徒的耳目，为国家退出战争进行工作。

埃米尔·波德纳拉希以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名义驳斥了这个不现实的冒险计划，指出把这种计划付诸实施将导致国家解放斗争的失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提出了一项周密的计划，陈述了旨在实现反希特勒起义的观点和实际措施。

1944年6月15日，康斯坦丁·塞纳特斯库将军转达国王同意实行这一计划；于是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参加者有罗马尼亚共产党所支持的杜米特鲁·德默恰努上校以及军队的代表格奥尔基·米哈伊尔将军和康·瓦西里乌－勒什卡努将军。

民族民主同盟的其他党派被告知了关于进行某些政治会谈的倡议，但不知道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和王宫代表之间业已商定的推翻安东内斯库政府的计划和军事措施。地主资产阶级政党的党

魁们希望法西斯政府缔结停战协定，不断推迟必要的政治行动。

在7月27—28日夜间的会议上，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指出，如果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的党魁们继续拖延推翻安东内斯库独裁的行动，罗马尼亚共产党将取得它的行动自由；通过坚定的和毫不妥协的态度，罗马尼亚共产党推动了同它 448
合作的政治力量，在它周围聚集了一批军队代表，从而着手细致地准备决定性的进攻。

作为党所制订的军事计划基础的观点是，必须加强同军队中的爱国力量的合作，并由此出发达到把全部军队争取到反希特勒斗争方面的目的；与此同时，必须保证占领最重要的战略据点，保障布加勒斯特和全国行动的胜利。对首都和石油工业主要中心普拉霍瓦地区给予了特别注意。

1944年夏天，投入苏德战线南翼的德国部队总兵员增至约六十八万人，其中四十六万人在前线区，十五万七千人在兵站区，约六万人在内线区；这个数字还必须加上配合党卫军部队活动的日耳曼人种团体的准军事部队。

国内起义力量的任务由于1944年8月20日

苏军在雅西—基希讷乌战线攻势的开始而大大减轻；这一攻势给予了希特勒军以毁灭性的打击，封锁和瓦解了整个前线区。

罗马尼亚人民的反希特勒起义是于1944年8月23日通过逮捕军事法西斯政府成员而开始的。

已经谒见过希特勒并接受了希特勒关于在摩尔多瓦组织抵抗的命令的扬·安东内斯库，准备重新前往前线，以实施所确定的计划。临行前，他要求于8月23日午后到王宫进行一次拜会；在他研究了军事形势并申明不同意与同盟国缔结停战协定之后，国王按照与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在军事委员会中共同商定的计划下令将其逮捕。

同扬·安东内斯库同时被捕的还有他较亲近的同事米哈伊·安东内斯库，当天晚上，还逮捕了被召往王宫并被拘留的亲希特勒政府的其他成员。当各党派的技术人员把准备于当晚通过电台广播的国王宣言和其他文件录成唱片时，民族民主同盟的代表被召往王宫。

当天晚上，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同志与一个由八位同志组成的爱国战斗小队一起，接管了对被捕的安东内斯库政府成员的看守，并于夜间把

他们运至光明村的共产党的一处密室。

如果说逮捕安东内斯库分子及其帮凶的最初时刻具有开始推翻安东内斯库政府的意义，那末，把他们提出来押送到共产党的密室的第二步，则意味着把行动进行到底和避免驻在布加勒斯特的希特勒德国部队把法西斯独裁者们劫回去的危险。这样，通过共产党的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就排除了1943年发生的墨索里尼被捕后让希特勒的一个伞兵营劫走的事件重演的危险。由共产党人接管被捕者意味着承认共产党所具有的领导作用，意味着共产党代表着把行动进行到底的最坚决的力量，这对于保证起义的胜利具有重大 449
的意义。组成了一个在康·塞纳特斯库将军主持下的、由军人和技术人员组成的政府，民族民主同盟的四个政党代表充任不管部长（卢克雷齐乌·珀特勒什卡努、康·蒂特尔—彼得雷斯库、尤利乌·曼纽和康·伊·布勒蒂亚努）。

在逮捕安东内斯库政府成员后，军事部队和爱国部队开始占领国家主要机关并攻打和接管德军目标。

将布加勒斯特从希特勒部队手中完全解放出

来，然后将全国领土从德国占领者手中解放出来的持续战斗进行了八天。8月24日凌晨四时，罗马尼亚与德国断交，罗军奉命反对前盟国。罗马尼亚军事部队和爱国部队俘获了六千七百多名德军，其中有七名将军和三百五十八名军官。在普拉霍瓦河谷，起义力量俘虏了九千多名德军，其中有一百四十七名军官，一千一百三十一名士官。纳粹分子死一千五百多名，伤两千三百多名。我们在两个地区的伤亡人数相对说来较少。

多布罗加、蒙特尼亚、奥尔特尼亚、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罗马尼亚起义部队进行了重要行动。

驻在布加勒斯特地区和普拉霍瓦河谷的希特勒德国部队企图执行希特勒的重新控制首都和强行拼凑亲希特勒政府的命令。但他们的一切尝试均被粉碎；格斯登堡将军被俘，冯·基林格大使自杀。

罗马尼亚起义部队在同苏军部队接触的地方，都做到了密切合作和反希特勒匪徒的联合行动。

罗马尼亚军队转到了起义方面。

8月29日晨，罗马尼亚新政府派遣罗马尼亚代表团飞往莫斯科，与同盟国缔结停战协定，并于9月12日签署了停战协定。

8月30日和31日，苏军大部队通过已为反法西斯起义所解放了的我国首都。以共产党员为首的全城居民用鲜花和欢呼声欢迎苏军，政府和人民群众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慰问。

从8月24日起，罗马尼亚军队同苏军合作，直至胜利之日（1945年5月9日）在反对共同敌人——希特勒匪帮及其同盟者的斗争中表现出英勇忘我的精神。1944年8月28日苏联《真理报》指出，罗马尼亚退出轴心国的意义超出了罗马尼亚的范围；它不仅对这个国家，而且对巴尔干半岛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德国在东南欧的整个防御体系因此而土崩瓦解。法国《费加罗报》8月25日在谈到8月23日行动的巨大作用时写道："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给了第三帝国以最显著的打击之一"；《纽约时报》也强调指出，这 450
个行动将作为"整个战争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之一"而载入全部史册；同样，在1944年8月24日由伦敦电台广播的路透社的一篇评论中，突出

了8月23日行动在改变东南欧军事力量对比中所起的作用。

由于粉碎了内线区的希特勒部队，保证了各山隘口畅通，保持了南喀尔巴阡山和西喀尔巴阡山北部与西部的这个巨大的桥头堡，打开了多瑙河河谷的战略通道，使苏军得以自由地通向巴尔干半岛、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罗马尼亚对摧毁德国在巴尔干的整个防御体系，对缩短整个战争时间作出了贡献。德国前线的兵力减少了五十多万，在经济上则丧失了罗马尼亚的石油和食品资源。前线一个重要战区的反希特勒军队的力量却增加了罗马尼亚的全部军事和经济潜力。在这全部英勇斗争中，罗马尼亚得到了苏联人民的重大支持。

罗马尼亚投入的兵员达五十四万人，在反希特勒匪帮的斗争中损失了十七万士兵。在解放了祖国的领土（特兰西瓦尼亚西北部）后，罗马尼亚军队同苏军并肩作战，参加了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

推翻军事法西斯独裁和罗马尼亚参加反对纳粹德国的战争，不是改变前政府倾向的结果，不是

通过政变或幕后密谋来完成的，而是由于以自己的工人阶级为首的罗马尼亚人民的武装斗争、通过赶走希特勒占领者来实现的。

罗马尼亚军队的立场，即它完全站在人民斗争方面的原因在于反希特勒的情绪的高涨；罗马尼亚军队相信，8月23日起义完全符合罗马尼亚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1944年夏天，罗马尼亚完全具备了列宁在四十年前所提出的起义胜利的条件。

列宁说："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阴谋，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阶级。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转捩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①

历史条件虽然总是千差万别，但这些前提是社会革命成功所必需的。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4页。（此段语录原文漏掉一短语："**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译者）

综前所述，可以得出结论：1944年夏天，罗马尼亚人民的革命高潮以及对希特勒占领者及其工具的憎恨确实达到了最高度；工人阶级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列，它在工人统一阵线组成后，完全支持起义的思想，即用武力推翻军事法西斯政府的思想。

451 对各阶级和社会阶层在起义进程中所持的立场的分析，恰恰表明既有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的彻底革命的力量，也有三心二意、不坚定的朋友和同盟者队伍中存在着的动摇、徘徊以及敌人队伍中的犹豫。

在检查武装起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时，我们把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区别开来，强调指出它们是复杂而独特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对罗马尼亚的反希特勒起义的胜利、对我们祖国的解放都作出了贡献。

罗马尼亚共产党通过它的英勇斗争在准备和进行反希特勒起义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二十年的秘密工作（1924—1944年）后，走出了非法状态，成为国家的决定性政治力量、政府的参加者、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改造斗争的领导者。

因此，1944年8月的反希特勒起义标志着罗马尼亚人民革命的开始，打开了在我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

罗马尼亚参加反希特勒战争

从德国—霍尔蒂占领下解放全国

在解放蒙特尼亚、多布罗加、奥尔特尼亚、巴纳特、克里沙纳和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地区的起义胜利结束后，忠于人民意志的罗马尼亚军队继续进行了把希特勒和霍尔蒂部队从我国全部领土上肃清和彻底粉碎的战斗。罗马尼亚武装部队同苏军肩并着肩，投入它的全部战斗力为胜利服务。在反对敌人的艰巨战斗中，罗马尼亚军队得到了全体人民的不惜一切的支持。罗马尼亚人民懂得这个历史时刻的份量和重要性，响应了共产党的号召，的确做到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自起义时的战斗开始到1945年5月9日，罗马尼亚在反希特勒战争中投入的总兵员将近五十四万人。就经济方面的努力而言，据大致估计，罗

马尼亚对反希特勒德国战争的贡献高达七亿美元左右。

罗马尼亚对反希特勒匪帮所作的军事和经济上的努力既是为了巩固罗马尼亚人民的民族主权，也是为了国际大家庭的总事业。决定我国将其所拥有的全部力量与盟国一起投入反希特勒德国战争的，除了这些考虑以外，还有罗马尼亚士兵和全体人民为进行旨在给各国人民带来自由的正
452 义战争而战的觉悟本身。

罗马尼亚部队投入正规战的最初的军事行动是在1944年9月上半月于特兰西瓦尼亚进行的，这些战斗把祖国领土从希特勒—霍尔蒂部队手里完全解放了出来。在战斗的这个阶段，罗马尼亚军队挡住了德国—匈牙利的进攻，并同从国内源源抵达的苏军部队并肩转入了强大的反攻。罗马尼亚战士建树了真正的英勇奇迹，特别是在圣格奥尔基、图尔达、阿拉德、蒂米什瓦拉、奥拉维察等城市地区进行的战斗中。由于这些胜利的战役，罗苏两国军队于10月初抵达维也纳指令所强加给罗马尼亚的边境。

以推进到蒂萨河为战术目标的以后的战役，

使敌人在我国领土上进行的抵抗归于失败。这些战役以 1944 年 10 月 25 日最后两个罗马尼亚城市萨土一马雷和卡雷伊从希特勒一霍尔蒂占领下解放出来而告结束。为了表达罗马尼亚人民的欢乐，10 月 25 日作为一个永志纪念的日子载入了我国人民军队的史册，被宣布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武装部队日”。

解放我国领土的艰巨战斗再一次表明罗马尼亚战士的牺牲精神、英雄主义及其为祖国利益献身的品质。同时，这些战斗还体现了人民出生入死、赴汤蹈火、历尽千辛万苦为前线士兵服务、从而为保证最后胜利作出贡献的大无畏精神和忘我精神。在驱逐敌人的战火中，凝成了坚不可摧的军民团结。

解放我国领土上的八百七十二个村镇的这些军事行动，通过许许多多战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男人、妇女和儿童的流血牺牲换来了胜利。他们为了保卫共同事业，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前线或后方英勇地倒下了。约有七万名战士、军官和平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用他们的鲜血铭记了对入侵敌人的胜利。在圣格奥尔基战场上英勇牺

牲的图尔图里克·格奥尔基少尉的勇敢行为，在奥拉迪亚阵亡的“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师第二步兵团团长扬·布佐亚努中校、彼得·罗穆卢斯上尉和阿拉德的中学生维尔吉尔·约佛努什的英雄事迹以及为祖国而死的许许多多英雄的战斗业绩，将永远铭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同苏军一起投人白克里什河谷激战的伊内乌和巴克乌军官学校的学员们奋战克敌，以他们的指挥员安德烈·格里戈雷上尉和欧金·多布里勒上尉为首的许多人战死疆场；他们的这种勇敢精神也将在人民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453

罗马尼亚军队参加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战斗

在肃清我国全部领土上的敌军后，罗马尼亚和苏联军队投人了彻底粉碎法西斯主义的一系列新的大战役。在这一强大攻势中，罗马尼亚和苏联战士开始解放匈牙利领土。二十一万余罗马尼亚官兵，在布达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及前线其他地区进行的各个战役中英勇奋战。罗马尼亚军队以他们的英雄气概冲锋陷阵，连克比克、马

特拉和赫贾利亚等群山，强渡河流，摧毁大量工事，从而解放了匈牙利领土上的一千二百三十七个地方。

1944年12月下半月，罗马尼亚和苏联部队越过匈牙利西部边界，深入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继续追击仓皇后撤、溃不成军的希特勒军队。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士同苏联战士并肩作战，为解放捷克斯洛伐克、为最后打败法西斯主义洒下了鲜血。投入捷克领土上的罗马尼亚部队的兵力达二十四万八千人，他们冒着冬季的严寒，和补给方面的越来越大的困难，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成功地越过了亚伏林纳、小塔特拉和斯洛伐克梅塔利契山脉以及其他覆盖着森林和连绵起伏的群山，从而为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希特勒占领者手里解放出来作出了贡献。

对部署在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希特勒军的战斗延续至1945年5月12日。这样，自1944年12月至1945年5月的五个多月的时间里，罗马尼亚军队就解放了约一千七百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其中包括三十一座城市。

除了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这些地方以外，罗

马尼亚军队还配合苏军参加了解放兹沃伦、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克林姆尼恰等城市的战役。

罗马尼亚军队在历次激战中牺牲了五万五千名官兵，从而对挫败敌人的绝望抵抗作出了贡献；它在战争结束时已迫近布拉格。

在为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土而献出了生命的英雄榜上，罗马尼亚战士的名字有：在强渡蒂萨河时牺牲的埃夫蒂米·克罗伊托鲁，埃列娜·基里策，安盖拉凯·格奥尔基，扬·莫拉鲁，志愿奔赴前线的共青团中央委员康斯坦丁·戈迪亚努，他们象其他在不同战区牺牲的成千上万的青年的名字一样，将永远受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人民的崇敬。

罗马尼亚军队在反对希特勒主义的进军中，跋涉一千多公里，解放三千八百三十一个地方，俘虏和打死打伤敌人超过十万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荣业绩。约十七万罗马尼亚战士为这一英勇斗争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罗马尼亚战士由于他们的英雄主义，受到罗军和苏军指挥部的大量通令嘉奖，获得的奖章和勋章超过三十万枚。同时，罗马尼亚战士的英勇

斗争和我国全体人民对战胜希特勒德国所作的贡 454
献，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承认。罗马尼亚战士和苏联战士为把各国人民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共同洒下的鲜血，加强了罗苏友谊。

我国参加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解放战争是罗马尼亚人民历史上的光辉的一页。

共和国成立前人民革命的开展

起义胜利后的罗马尼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1944 年 8 月的武装起义在罗马尼亚历史上开辟了除旧图新的深刻变革的时代，标志着在它的第一阶段具有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反法西斯和反帝性质的人民革命的开始。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成了主要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的行动决定了事态发展本身。在那个时期里，民主力量面临着迫切任务，如：消灭农业中的封建残余和分给农民土地；政治生活的真正民主化；加紧进行反希特勒战争，以解放全部国土并参与旨在彻底打败纳粹德国的反希特勒同盟的共同行动；国家的经济恢复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

从其目标来说，人民群众的斗争旨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1944年8月23日以后，群众的政治活动是在新的条件下展开的。推翻安东内斯库独裁给了国内整个反动势力、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以强有力的打击。由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地位的不断削弱，以及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革命高潮的急风暴雨般的高涨，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不断的变化。

早在1944年8月23日当晚就建立了一个由康斯坦丁·塞纳特斯库将军主持的新政府，组成这个政府的有军事将领和技术人员、王宫的代表和构成民族民主同盟的政治力量的代表。

在这个政府中，虽然反动势力仍居多数，但它在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次包括了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为力量源泉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代表。

在有利于民主力量发展的新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塞纳特斯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使公众
455 生活民主化和保障公民自由的措施。废除了法西斯法律，恢复了1923年宪法；集中营被解散，对以前的政治犯实行大赦。广大人民群众在此时已开

始进行合法活动的共产党领导下，利用法律所授予的民主自由，投入了旨在挣脱压迫和剥削、争取建立能满足人民的切身利益的真正民主制度的伟大战斗。

在人民与反动势力对垒的急风暴雨般的革命斗争的日子里，历史舞台上出现了决心要彻底改变我国社会面貌本身的社会政治力量：影响和威望与日俱增的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组织——社会民主党、统一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农民阵线、爱国保卫同盟、爱国者联盟、马札尔劳动人民联盟、妇女组织、各创作协会等等。

罗马尼亚人民所面临并急需解决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由希特勒的占领和掠夺、战争的破坏加上当时反动派的怠工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灾难性的状况。确实，同希特勒德国的所谓“合作”给罗马尼亚经济带来的损失高达四亿四千六百多万美元，而截止 1944 年 10 月 25 日在罗马尼亚领土上进行的军事行动、希特勒和霍尔蒂部队在撤退中造成的破坏以及战争造成的其他损失高达三亿五千五百多万美元(按1938 年的比率)。

就整个工业而言，1944 年的生产只有战前水平的约 40—50%，铁路运输能力下降至 1943 年的 30%。农业由于希特勒匪徒战时的征发和战争的破坏而耗尽，以致到 1944 年末，粮食生产下降至不足 1939 年生产的一半。经济状况由于不断的通货膨胀，由于国民经济所欠缺的原料供应特别困难，由于罗马尼亚的通货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到冻结而更加恶化。国家所负的战争债务，因 1944 年 8 月前参加希特勒战争而应支付的赔偿，大大增加了罗马尼亚经济的负担，并痛苦地影响到劳动群众的处境。除所有这一切外，反动派利用国家困难所造成的困苦从中渔利，囤积大量物资，进行投机倒把，也给经济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根据 1944 年 8 月 23 日以后罗马尼亚存在的情况，罗马尼亚共产党指出了爱国力量面临的急迫任务，说明了反法西斯民主斗争和争取恢复国民经济斗争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党肩负起指出我国人民应走的道路的任务，遵循着它早在
456 1944 年 8 月 24 日所作的声明："工人阶级的政党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在争取赢得

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中，代表包括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城市阶层在内的全体罗马尼亚人的利益，代表全体罗马尼亚人民的利益”。

作为引导群众走上革命变革道路的领导力量的共产党，为了解决它所面临的重大任务，于1944年8月23日后立即着手改组其活动，以适应合法状态。党依靠在它领导下进行过地下斗争的数以万计的党员和同情者，在短期内成功地在主要工业企业、在农村、在文教机构和国家机关里组织了自己的力量。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威望和力量还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反映出来，即它脱离地下状态仅仅几个月，党员人数就超过了十万。

罗马尼亚共产党对组织工人阶级——人民中最先进、最富战斗性的、团结着其他一切关心国家进步的力量的、革命的主要社会力量——给予了特别重视。

在1944年8月23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工人统一阵线基础上开始恢复了工会运动，1944年9月1日成立了罗马尼亚联合工会运动组织委员会，并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了工会运动的目的、组织原则和任务。工会统一的实现，标志着共产

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联合行动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对革命的领导作用。工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指导下，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组织了自己的活动，成功地吸收了大量青年群众，动员他们上反希特勒前线去战斗并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对组织无产阶级同盟军，特别是农民基本群众，给予了很大重视。构成国家居民的绝大多数、深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禁锢在黑暗和贫困中的农民，对实现民主改革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是一支巨大的革命后备军。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指导下，由于农民阵线所开展的活动，组织了农民委员会，其作用是动员和组织农民为实现土地改革、为支援反希特勒战争而斗争。

工人阶级及其主要同盟军农民的组织起来，在其他阶层的居民中产生了强烈影响。城市小资产阶级队伍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参加了
457 爱国者联盟和爱国保卫同盟这两个反法西斯性质

的群众组织。马札尔劳动人民的民主组织——马札尔劳动人民联盟(后来改名为马札尔人民联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承认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这些群众组织,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开展活动,保证了它们符合人民利益、符合革命的前进方向。

民族民主阵线的建立

面对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变革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反动派加紧了反抗,企图阻止民主果实的巩固和扩大。剥削阶级企图为此目的利用其在政府中以及在存在着大量反动分子,甚至法西斯分子的其他一些国家机关中所拥有的地位。因此,很清楚,最初采取过一些旨在肃清国内的希特勒和霍尔蒂部队、废止法西斯法律和确立公民自由的积极措施的塞纳特斯库政府,不再适应迅速发生着有利于民主的变化的新的力量对比,它转变成了革命进程道路上的一种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尼亚共产党致力于联合一切关心国家真正民主化的力量。于是,以1944年9月24日发表的一个行动纲领为基础组成了民族民主阵线。9月24日提纲包括了绝大多数

人民迫切要求实现的目标：全力支持反希特勒战线；没收地主财产并把土地分给无地、少地农民；国家民主化；惩办战犯；恢复经济和改善各阶层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罗马尼亚人民与各共居民族权利平等、友好等等。

共产党提出的行动纲领产生了广泛反响，社会民主党、工会运动组织委员会、农民阵线、共产主义青年团、爱国保卫同盟、马札尔劳动人民联盟、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爱国者联盟以及其他民主组织都表示拥护。1944 年 10 月 12 日组成了包括所有拥护行动纲领的政治组织和群众组织代表的民族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

在国内既存的新的力量对比的基础上，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参加民族民主阵线的其他民主组织要求一个由各政党和政治团体代表组成的政府代替军人和技术人员政府，以表达社会政治力量的实际状况。

为了吸引一切人民力量投入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工人统一阵线的两党还同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举行了谈判，以便他们参加新政府的组成，但民族民主阵线的各组织必须在新

政府中占有与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相适应的地位。

由于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党魁们的消极 458
态度,(因为他们希望保持处在他们控制下的现存政府)谈判破裂。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认为在现政府范围内进行合作已不再可能,于是退出政府,号召群众为加强争取国家民主化和实现民族民主阵线行动纲领的其他目标而斗争。人民象一股巨浪一样,在全国掀起要求撤换塞纳特斯库政府,成立民族民主阵线倡议的政府。

人民群众斗争的声势以及随着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辞职而爆发的政府危机,迫使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的领导接受了民主力量关于成立一个由民族民主同盟各政党的代表组成、以新纲领(其中包括民族民主阵线行动纲领中的若干目标)为活动基础的联合政府的建议。在1944年11月4日组成的、仍由康·塞纳特斯库将军主持的新政府中,民主力量拥有广泛得多的代表,占有了部长会议副主席、六个部长和三个副部长的职位。虽然在这个政府中大多数部仍然归资产阶级政党代表掌握,但这并不反映政治舞

台上的实际对比，民主力量不仅通过群众的行动，而且在政府内部也扩大了对反动势力斗争的可能性。由于代表民族民主阵线各党的部长们所开展的活动，采取了促使轰炸期间被炸坏或疏散的一些工业企业重新投产、恢复交通运输、支援农业的措施。

这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关、经济、文化机构和企业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的法律。与此同时，工人和农民群众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在全国展开了撤换反动市长、县长的紧张活动，并往往通过对反动派的激烈斗争建立了一些代表人民利益的地方行政机关。1944 年 11 月末，通过民主力量的革命斗争而就职的县长和市长在三十个县中行使着行政领导的职责。

同时，许多村庄的农民，特别是民主县长和市长业已就职的那些县的农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用暴力夺取了逃亡地主和破坏分子的土地。正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所指出的："在争取国家民主化、改组国家机关和实行土改的革命行动的烈火中，凝成并巩固了工农联盟——决定人民革命发展、决定夺权战斗的命运的主要动力。"

国家机关和企业的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农民用暴力占据地主土地，加强了民主力量的地位，越来越削弱了反动派施展阴谋的能力。为了夺回行将丧失的阵地，民族农民党、民族自由党的反动领导人以及王宫集团企图把民主力量的代表，尤其是共产党员，排挤出政府。但他们的企图未能得 459
逞，在 1944 年 12 月 6 日成立的、由尼·勒德斯库将军主持的新政府中，民族民主阵线保持，甚至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尼古拉·勒德斯库不得不作出关于实行土改、国家机关民主化等一系列诺言，这些诺言虽然没有兑现，但证明人民已经成为反动派不得不予以考虑的政治力量了。

民主政府的建立

共产党的不断巩固及其在群众中影响的增长、民族民主阵线作用的扩大和群众越来越振奋的激情，促使力量对比不断发生有利于民主的变化。罗马尼亚共产党加强了旨在使一个民主政府执掌国家政权的斗争，于 1945 年 1 月 28 日发表了民族民主阵线执政纲领。这个纲领包括了 1944

年9月民族民主阵线提纲的最重要的规定，并增加了若干新的项目，其中有：军队的改组和民主化、遣返在苏战俘、同苏联及其他友好邻邦建立贸易往来。

纲领把实行土改列为急迫任务，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同时，纲领还规定了若干经济措施：支持手工业者、小商人和一切决心在恢复企业、改组和提高生产方面老老实实地进行合作的工业家，以便把一大部分资产阶级吸引到民主力量方面来一起参加国家的经济恢复事业。

在这一基础上，民族民主阵线取得了由格·特特勒斯库领导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由安东·亚历山德雷斯库领导的民族农民党一个派别的合作。

民族民主阵线的执政纲领在群众中间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在争取建立民主政府的斗争中赢得了新的支持。

对加强工人阶级并确立它在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事件是联合工会第一次总代表大会（1945年1月26—30日）。这次会议决定成立罗马尼亚劳动总联合会。举行代表

大会时，全国有十二个工会联合会，包括五百一十三个工会，约五十一万九千名会员。工会运动的基础是工人运动的统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

1945年2月初，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倡议下，农民阵线提出了农民用暴力占据地主土地的口号，这使夺取土地的斗争席卷全国，同争取成立民主政府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一起。农民们有时冒着派来保护地主的宪兵的枪弹，在工人的支援下，着手分配土地，不再等待反动部长们无限期拖延 460
的土地法。仅仅三个星期，分配庄园便成为席卷全国的普遍现象。这样，农民确信，他们的梦想，只有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并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反对地主和整个反动派，才能实现。

同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继承了民主和进步传统，公开表明站在人民力量方面。1945年2月，为数众多的一批大学教授发表呼吁书，要求撤换勒德斯库并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全国一切进步力量和立即实施民族民主阵线的执政纲领的民主政府。这份呼吁书的签名者中有康·伊·巴洪博士、西米翁·斯托伊洛夫、达·巴格达萨尔博士、

米·拉列亚、特拉扬·塞武列斯库以及科学和文化界的其他知名人士。

共产党在军队中所开展的政治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使军队越来越站到了民主力量的立场上来。部分将军和高级军官于1945年2月26日发表的声明也表现了这种精神状态，他们之中有伊利耶·克雷楚列斯库将军、康·瓦西里乌一勒什卡努将军、杜米特鲁·德默恰努上校及其他人。他们谴责勒德斯库利用军队反对人民的计划。这样，反动派就日益陷于孤立了。

1945年2月底，全国举行了强大的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建立民族民主阵线政府。参加2月24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群众大会的有六十多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和军人。根据勒德斯库的命令，几队宪兵向示威者开了火，示威队伍中死伤多人。但想用武力阻挡群众热潮的企图没有达到目的。数十万人一天接着一天涌上街头，汇成一股反动势力阻挡不住的洪流，群众坚定地表明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政府、他们自己的革命民主政权不建立，就不停止斗争。

反动派利用军队反对人民的企图失败了，绝

大多数由农民和工人组成的军队越来越声援民主力量。

在革命浪潮的压力下，勒德斯库不得不辞职，其后不久，国王只得接受由民主力量提议并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这样，城乡人民群众终于赢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于**1945**年**3**月**6**日建立了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和农民的代表在其中占优势的民主政府。热忱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彼得罗·格罗查博士主持了这个政府。进入这个政府的，除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代表以外，还有在格·特特勒斯库领导下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若干代表。民族民主阵线占了部长会议主席和十四个部长的职位，特特勒斯库派获得了副主席和三个部长的职位。

第一个民主政府的组成是群众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向实施我国社会的民主、革命变革纲领过渡。

革命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劳动人民将利用国家政权来彻底粉碎反动派，保卫和扩大民主权利和民主自由，彻底实现具

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

巩固民主制度，实行土地改革

1945年3月6日以后，在共产党和组成联合政府的其他力量面前提出了由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恢复和发展生产力、巩固民主制度的需要产生的新任务。

在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处于特别困难的状态。经济中的主要阵地掌握在剥削阶级手里，在工业部门、商业和银行中，外国资本占有很大比重。工业产量下降至不足1938年水平的一半，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大部分瘫痪。由于反动资产阶级的破坏，原料的缺乏更显严重。由于希特勒的掠夺、征发和战争而耗尽的农业，又遭到1945年和1946年侵袭我国的严重旱灾的打击，也处于特别困难的境地。市场上食品和其他日用必需品的奇缺，导致物价猛涨和货币严重贬值，这痛苦地影响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经济恢复成为巩固民主制度的基石。

在努力克服国内存在的困难的同时，民主力

量不论在经济或政治方面都还必须对付一系列外部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敌视革命变革和对它们在罗马尼亚曾经占有过的阵地行将丧失感到担忧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干涉内政的企图而造成的。

恢复国民经济、保障生产力的发展和逐步提高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要求全体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作出巨大的努力。

民主政府在它建立后立即实施的主要措施是颁布土地改革法。依据1945年3月23日法令，没收了一百四十六万八千九百四十六公顷属于法 462
西斯分子、与纳粹德国合作分子、战犯和造成国难的罪魁的土地，并没收了其他地主的超过五十公顷的农田。

土地完全归农民所有，不给地主任何赔偿；首先分给无地农民，其次分给少地农民、战争中的孤儿、寡妇以及对希特勒匪徒进行过斗争的人。同土地一起，还分配了农具。所有这一切说明土地改革具有深刻的民主性。

通过革命途径、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完成的土地改革的主要成果是消灭了罗马尼亚最反

动的阶级——地主阶级。通过土改和颁布土地改革法，解决了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在土地斗争的烈火中，建立了工农联盟。同时，土改本身在农村社会结构和经济生活中也引起了重大变化，贫农的比重大大降低，中农的作用随之增长。四十万以上的无地农户建立了家业，其他约五十万农户加强了经济实力。国家给予劳动农民的物质援助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土改的实现和国家的民主化是在资产阶级反动政治集团和王朝的激烈反对的形势下进行的。反革命势力利用王室的特权，并得到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支持，组织了反对民主政府的多次行动。这样，1945 年 8 月，国王断绝了同彼得罗·格罗查博士政府的任何接触，并拒绝签署法令，指望造成政府辞职，而且还为此目的呼吁列强进行干涉。但是，民主政府依靠人民的信任，继续进行工作，挫败了反动派的企图，于是国王不得不于 1946 年 1 月重新同政府共事。

在同一时期，所谓"历史性"政党的头目们，特别是尤利乌·曼纽力图破坏民主政府的地位，制造政治骚动和社会混乱，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加紧

投机活动和怠工。1945年11月8日他们还组织了一次这样的行动：在保皇派进行示威游行的幌子下，法西斯暴徒袭击了公共机关、工会会址，焚烧了民主报纸，制造严重混乱，结果造成许多公民死亡，其中包括几名士兵和民主组织的积极分子。

但是，无论是反动派处心积虑煽动反政府暴乱还是外国帝国主义集团干涉内政的企图，都改变不了政府和人民群众保卫和巩固民主果实的决心。在首都和全国许多中心，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表达了人民对反动派策划的这类挑衅的反对态度和对民主政府的政策的同情。

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463

1945年10月16—21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对巩固民主制度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针，具有重要作用。

会议活动的基础是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所作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报告对罗马尼亚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国家民主发展的宏伟纲领。

会议确认,"国家恢复和重建工作的基础必须是重工业的恢复和发展",重工业"是整个经济在新条件下围绕其发展的轴心"。会议驳斥了那种把罗马尼亚视为注定只能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方列强的农业殖民地地位的"纯农"国的反动观点;明确指出我国的进步"是同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直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我们国家的独立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工业化的发展。

在这一基础上,会议提出了一个恢复冶金和钢铁工厂、合理开发动力资源和国家电气化、勘查和开发新的原料矿藏、合理使用劳动力、人民的才能和创造力的宏伟纲领。

会议规定了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措施:完成土地改革,组织租借机器和拖拉机中心,用民族工业生产的新设备装备农业,增加农业生产并扩大耕地面积,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等等。

对恢复和发展运输、改组信贷体系、制止通货膨胀和财政混乱给予了特别重视。

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号召群众努力工作,指出"我国一切积极的、奋发的、有能力的因素都应该对实现这个恢复和发展我国的

计划作出贡献”。

除了经济问题以外，会议十分重视从政治上巩固民主制度、加强国家在我国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加强对反动派的斗争、民主力量在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的胜利、继续加强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和工农联盟、罗马尼亚劳动人民与各共居民族劳动人民的兄弟团结等问题。

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把通过加强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统一阵线内部的合作，通过逐步创造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统一的条件，实现工人阶级政治和组织上的统一这个问题，作为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提了出来。

全国代表会议选举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464
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国劳动人民，罗马尼亚人、马札尔人、日耳曼人以及其他民族的劳动人民响应党的号召，为完成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制定的纲领、为恢复国家的经济和加强民主制度，展开了广泛的活动。

民主力量在1946年议会选举中的胜利

早在1945年12月，就战后世界的组织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当时，在美国和英国代表的坚持要求下，会议要求在民主政府中包括民族农民党和民族自由党代表各一名，以此作为这两个西方国家承认这个政府的条件，并要求在最短时期内组织议会选举。反动派指望这样将巩固或至少保持其在政治生活中依然占有的地位。民主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深知广大人民群众会给予它全力支持。接受这些要求的结果是，国王被迫恢复了同政府的关系，此后不久，美国和英国则承认了在罗马尼亚建立的制度——这有助于政府地位的巩固。

继此之后的时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争取在定于1946年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打败反动势力并夺取胜利的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共产党为把一切民主力量组合成一个单一的同盟并在选举中提出共同名单而奋斗。

为此，罗马尼亚共产党制定了一个向其他民

主力量提出的提纲。提纲包括了一项兼顾到关心国家继续进步的一切社会阶级和阶层的要求的施政纲领。

在这一基础上，首先同社会民主党，然后同农民阵线、民族人民党、民族农民党（安东·亚历山德雷斯库）以及民族自由党（特特勒斯库）订立了在选举中合作并以共同名单参加的协定，从而于1946年5月17日组成了民主党派同盟，在这个政治同盟里，各党派保持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独立性，但在挫败反动派和巩固民主制的斗争中联合行动。

为了保证人民群众广泛参加投票，制定了新选举法，对当时有效的宪法在国会组织方面作了重要修改。确定保留一个议院——众议院，取消参议院这个最反动的立法机构。选举法给予年满二十一岁的全国公民，不论性别、民族、财产、宗教信仰和文化程度，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权，只有战犯、国难的罪魁、法西斯独裁的旧国家 465
机关的上层分子以及曾经为希特勒匪徒卖命的其他分子除外（不得参加选举和被选举）。

1946年11月19日，举行了议会选举，约有

七百万公民参加。在这次选举中，民主力量取得了对曼纽和布勒蒂亚努领导的“历史性”政党的绝对胜利，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所依靠的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说明反动资产阶级政党的声名狼藉和脱离群众。

选举的结果，建立了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个民主议会，民主力量在四百一十四个席位中占了三百七十八个。

同时，政府进行了改组，结果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罗马尼亚人民在1944年8月23日以后时期取得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为加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一方面，1947年所采取的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早在1946年12月底，议会就投票通过了把罗马尼亚国民银行收归国有，这使自由党的这个财政大本营变成了掌握在民主政府手中、为国家的普遍进步服务的强大的经济杠杆。1947年4月，国民经济部改组为工业和商业部，拥有监督、控制生产和商品流通、

原料和信贷分配的权利(包括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企业在内)。接着又建立了工业局,国家通过这个工具积极地参与组织和协调生产与分配，以达到恢复国民经济、符合劳动群众利益的目的。对于资本主义企业建立工人监督和国家监督，有效地挫败了资产阶级怠工和投机的倾向。

1947年6月，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建议下，政府采取了一整套关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发一些新的原料资源、使财政和信贷活动、商业和居民供应正常化来改善国家经济和财政状况的措施。

在贯彻罗马尼亚共产党所提出的措施中，1947年8月15日的币制稳定化具有重要作用，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打击了投机商人和高利贷者，促进了群众物质状况的改善和国家经济独立的巩固。

政府经济政策的成果到1947年底开始表现出来。这样，1947年9月，基础工业的生产约占1938年生产的80%，而1945年只占45%；到这年末，铁路干线已经重新通车，95%的商船业已复航。在经济恢复过程中，制止了投机倒把，并逐步

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

466 1946、1947这两年罗马尼亚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巩固，这是与调整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希特勒德国的前卫星国战后状态的和平会议的准备和举行联系在一起的。我国人民深切希望和约的条文能符合他们要求进步、和平与福利的愿望，能使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得到巩固。

在1946年7月29日至10月15日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罗马尼亚代表团保卫了国家的民族利益，陈述了罗马尼亚不论在经济或军事方面为打败希特勒德国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代表团还强调指出了罗马尼亚人民所进行的民主变革——这也是愿意对创造和平与国际合作气氛作出自己的贡献的罗马尼亚在对外关系方面获得有利发展的保证。经过长期谈判，于1947年2月在巴黎签订了和约。

和约虽然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承认罗马尼亚在反希特勒战争中作为共同交战国的地位，但为我国确定了独立的、同其他国家权利平等的、能在完全平等基础上同它们缔结经济、政治和文化协定的国家的地位。同时，和约肯定了既有现实，而

且也在法律上规定废除维也纳帝国主义指令，并把罗马尼亚和苏联军队英勇斗争从希特勒—霍尔蒂占领下解放出来的特兰西瓦尼亚北部重归罗马尼亚。

在缔结和约后，罗马尼亚越来越坚决地作为争取建立和扩大国际合作关系、争取巩固和平的积极战士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由于民主制度的加强和发展，由于保卫和平、发展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坚定不移的政策，至1947年末，罗马尼亚同二十三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二十六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在同苏联和其他友好邻邦，如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和匈牙利缔结的双边协定的基础上，1947年，罗马尼亚同这些国家进行了绝大部分贸易。

除了经济关系以外，罗马尼亚还同邻国建立和发展了文化和科学联系，进行了友好互访。

在实现人民革命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中，国际形势——从苏联那里得到的多方面的支持以及在一系列国家中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这一事实，产生了有利的影响。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

开展资产阶级民主变革的斗争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在工人阶级面前提出了同
467 盟军问题。如果说在反法西斯和反封建性质的变革过程中，除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以外，还有资产阶级集团参加，那末现在，在采取若干具有越来越鲜明的反资本主义性质的措施的情况下，这些集团便激烈地反对民主力量倡议的变革，反对新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了。

民族农民党的领导人眼看自己已被群众唾弃，便抛开了正式的政治活动，诉诸于玩弄手段和破坏。民族农民党的一伙头目指望外国援助，企图于1947年7月逃出国境，以建立流亡政府。由于这一破坏国家法律并走上叛国道路的行动，民族农民党被解散，犯罪分子受到审判和惩治。同时，民族自由党甚至在它过去的追随者的队伍中也已得不到支持，自行停止了活动。格·特特勒斯库领导的自由派在革命没有直接触动资产阶级利益时曾同政府中的民主力量合作过，此时也越来越反对进步，逐步变成敌视民主制度并力图把

罗马尼亚拖回帝国主义阵营的资产阶级各派的汇集中心。格·特特勒斯库甚至企图在民主党派同盟内部施展阴谋，以破坏民主力量的团结和孤立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11月6日议会对特特勒斯库派所进行的活动投了不信任票，结果，资产阶级的最后代表被排除出政府。这一行动标志着国家政权性质的根本改变，同时为着手消除政权性质和君主制的国家形式之间的矛盾创造了有利条件。

确实，在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问题直接摆在面前的新形势下，同王室的合作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王宫已成为国内反动势力的中心和同敌视民主制度的外国帝国主义集团联系的主要渠道。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准备废除君主制时考虑到，虽然君主制和反动派在整体上已被大大削弱，但它们还能诉诸足以引起混乱乃至流血的冒险行动。为了避免这样一种可能性，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组织方面的措施，其中包括对党和工会积极分子、爱国部队和军事部队进行动员。首都和外地的战略据点、文化机构、广播

电台、邮局、电话局均实行警戒。面对这种形势，米哈伊国王眼看自己在国内已经孤立，而从国外也没有得到他所指望的支持的保证，不得不同意逊位。这样，君主制于 1947 年 12 月 30 日就被推翻了，城乡劳动人民的国家——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学者和爱国主义者康·伊·巴洪博士当选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彼得罗·格罗查博士则继续留任部长会议主席。

468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标志着同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阶段宣告结束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君主制的推翻和共和国的宣告成立，是罗马尼亚社会的进步力量所进行的争取自由、独立和进步的长期斗争的结果，它标志着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反对国内反动派和外国帝国主义集团的胜利。

469

社会主义制度
（在罗马尼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实现工人阶级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社会上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起着领导作用。要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工人阶级必须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统一，必须有一个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基础上的、由于其磐石般的团结而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

但是，我们知道，自从1921年罗马尼亚共产党创立以来，我国工人运动就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其原因是反对建立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前社会党右翼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的分裂给劳动人民造成了巨大危害，便于剥削阶级施

展分裂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政策。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翼代表为消除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和缔造无产阶级的行动统一而奋斗。这一斗争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1944年5月1日工人统一阵线的建立，这便利了工人阶级争取武装起义胜利以及后来争取成立1945年3月6日民主政府的统一行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44年8月23日以后不久就恢复活动的工会运动也为争取统一而奋斗过。

劳动人民在工人统一阵线内为争取国家的经济恢复、争取民主、为夺取国家政权而进行的共同斗争和联合行动，促使两个工人政党的党员日益接近，促使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影响增大，这为实现工人运动的完全统一，为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已有的协议的基础上建立工人阶级统一的革命政党，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7年11月，两党领导通过了一个共同纲领，筹划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统一工人阶级，进而建立新的工人政党的统一的地方组织。两党逐步的、不断的接近过程，共产党员和社会党员间的

共事在 1948 年 2 月 21—23 日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圆满完成，这次大会建立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后来，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 470
把党改名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决议，因而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

实现罗马尼亚工人阶级的完全统一不是两个工人政党机械合并的结果，而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统一的有机过程的完结。罗马尼亚工人党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阶级的原则性、工人运动的有机的统一性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它的全部工作中，罗马尼亚工人党继承了罗马尼亚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最优秀的传统，继承了罗马尼亚共产党所开展的英勇活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我国消灭人剥削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罗马尼亚工人党成立大会是工人阶级活动和罗马尼亚整个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工人运动中对改良主义的完全的彻底胜利。

工人阶级在其强大的先锋队的领导下，同劳

动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盟，把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劳动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坚定地开始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事业。

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方针。其目标是消除经济落后状态，把罗马尼亚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以便不断提高劳动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1949年3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倡议和领导下，组织了工厂、农村、学校和其他机关的青年的革命组织——劳动青年联盟。劳青盟员继承了共青团的光荣斗争传统，以共产党员们的斗争和工作为学习榜样，成为党的干部的主要后备军。后来，于1965年，根据罗马尼亚工人党也在名称上发生的变化，劳动青年联盟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罗马尼亚共产党，是我国社会的政治领导力量，指导并领导着一切群众组织：工会、共青团、人民会议、妇女组织等等的活动。

党越来越有机地成为国家整个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不断加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参加

罗马尼亚共产党队伍的是我国社会最先进的成员、争取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坚定战士。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劳动人民的国家 471

君主政体的废除和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与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我们国家以人民共和国命名表明，与资产阶级类型的其他共和国不同，在罗马尼亚，权力完全属于自由的、掌握着自己命运的人民。新国家所肩负的任务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事业中成为工人阶级、全体劳动人民手中的主要工具。

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和地方机关：大国民议会和人民会议（在1948年宪法中后者称为人民委员会，现在又重新使用这个名称）。

为建立大国民议会，1948年3月28日进行了普选，在这次普选中劳动人民选派了他们自己

的代表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大国民议会所实施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制定我国第一部民主宪法——1948年4月13日通过的宪法。这部宪法写进了罗马尼亚人民迄至当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全体公民——不分民族所享有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同时规定了我国将来的结构。

尔后，于1950年12月3日，选举了国家地方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它们的使命是在国家的总的法律基础上行使州、区、市和乡的权力。在罗马尼亚、马札尔、日耳曼和其他民族劳动人民群众的广泛代表基础上组成的大国民议会和人民委员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广泛民主制的表现。

在国家的组织过程中，旨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行政机关的建立具有重要地位。这样，成立了若干前所未有的中央机关，诸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开展了建立新军队的过程——早在人民革命的最初年代业已开始的过程，并为了镇压阴谋、破坏和其他针对劳动人民利益的敌对行动，于1948年建立了国家安全机关。1949年初设立了公安局这个负有维持公共

秩序和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使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代替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年代里早已变成令人憎恶的机关——警察局和宪兵队。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472

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的工人阶级取得全部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在创建新制度的宏伟事业中领导着全体人民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利用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并将其转为国家所有制——全民财产。

对解决这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一个时刻，是1948年6月10—11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全会采取的、后由大国民议会于1948年6月11日投票通过的把工业、矿山、银行、保险、运输等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革命行动。

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八千五百多家钢铁和冶金企业、造船厂、私有铁路以及石油、化学、纺织等企业转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

国有化消灭了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经济权

力，排除了在我国的外国资本投资，在罗马尼亚经济中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部门，对于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国有化企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新的社会主义关系所代替，永远消灭了对工人的剥削。这样，社会主义部门就成了社会主义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获得胜利的可靠的经济前提。

通过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工业、运输、银行、保险公司中实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协调一致，解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国民经济中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部门的建立，同时使着手实行计划经济成为可能。

最初，制定了1949年和1950年的两个年度经济计划，这两个计划旨在完成国家的经济恢复，以便进而实行远景经济计划。

1949年度国家计划完成了108%，1950年度国家计划则完成了104.3%。在实行计划经济的两年里，在国家工业化方面，包括在工业的决定性部门——重工业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到1949年底，在整个工业中消除了落后于战前时期

的状态，1950年我国工业总产量超过1938年水平47%，从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了初步成绩。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同苏联建立的经济合作关系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也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组织对外贸易，成立了对外贸易部，并设立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协会。

在两个年度经济计划范围内取得的成就成为 473
向远景计划经济过渡的准备时期。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的事业中，引导劳动人民为生产力的强大发展而努力奋斗。罗马尼亚共产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从我国具体实际出发，依靠罗马尼亚人民的创造性的努力，依靠对国家自然资源的利用，把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列为它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作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我国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整个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我国的客观需要，这尤其是由于剥削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集团政策的结果，罗马尼亚在当时拥有的是技术陈旧的不发达的工业，其中占优势的是不合理地分散在我国

领土上的小企业。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部门，如电力生产工业、机器制造工业、冶金工业等等，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只占很小的比重。农业同样也是落后的，技术装备很差。罗马尼亚共产党从对这种状况的现实主义估计出发，把着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确定为国家工业化的主要方针。

高水平地利用国家的自然资源，合理使用劳动资源，开发国家的一切地区，巩固民族独立，消除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积极地参与国际贸易，这些都是同国家工业化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政策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具体地表现在相继通过的各个远景经济计划中。这样，1951—1955 年的经济计划使工业生产比 1950 年增长一倍。在着重发展机器制造工业的同时，对其他工业部门，例如化学、石油、食品等工业也给予了必要的重视。对于过去被遗弃的地区——多布罗加、奥尔特尼亚和摩尔多瓦的发展，表现出了特殊的关怀。

因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需要电力生产有重大的增长，罗马尼亚共产党讨论并制定了十年（1951—

1960年）电气化计划。在贯彻这个计划中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一系列电站投入了生产，其中有：多伊切什蒂（登博维察县）热电站、奥维德二号（康斯坦萨县）热电站、博尔泽什蒂热电站和比卡兹"弗·伊·列宁"大型水电站。

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1955年12月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为1956—1960年时期的新的经济计划制定了指示。

劳动人民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所作的努力凝结成了具体的重大的成果。工业配备了具有高 474
度技术水平的装备，除了用现代化设备装配的大量工厂以外，还修建了新的企业。在雷希察和洪尼多阿拉建立了新的高炉，在罗曼兴建了一个大型钢管厂，在雅西建造了一个大型制药厂，在塞维内什蒂建立了合成纤维和合成丝大型化学联合企业。这样，罗马尼亚在1938年须全年完成的工业生产，到1960年只要十一个星期即可完成了。

同时，实行国家电气化十年计划的活动继续进行着，这无论对工业发展——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还是对提高实现了电气化的农村的生活水平，都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在贯彻执行1960年6月20—25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指示的过程中得到了新的推动。

代表大会分析了至当时所取得的成就，认为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业已建立；大会通过了关于1960—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指示，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完成在整个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以全面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六年计划期间，生产力得到了新的、强有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高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进步。

由于1962年农业合作化这个农民生活中的深刻的革命的完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普及于整个经济。社会主义在城市和农村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样就永远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工人阶级、罗马尼亚人民那么多最优秀的儿女为之奋斗、流血牺牲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在六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工业生产1965年比1959年增长了1.24倍，每年平均增长14.4%，这是我国经济实力和活力的雄辩

的证明，是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和工人阶级创造能力的雄辩的证明。已经取得的成绩使国民收入得以比1959年增长将近65%，对外贸易额则在同一时期增加了1.3倍。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确定了在下一个五年（1966—1970年）内罗马尼亚发展的方针，以便在更高阶段上继续一切活动领域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使我们祖国全面繁荣。

代表大会确定，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依然是党的政策的中心。工业化决定着生产力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发展、技术成果的广泛采 475
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整个经济的高涨。大会强调指出有必要有计划地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和流通费用，推广机械化和自动化，在各工业部门推广技术成果。在此基础上，保证增加职工和农民的收入，扩大物质基础和发展社会文化活动，改善居住条件，提高文明水平，以使我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公民在生活中日益强烈地感觉到社会主义的好处。

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在开展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的同时，罗马尼亚共产党着手解决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罗马尼亚社会最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农业问题。

确实，从能力有限的小农生产转为社会主义大生产是农村生活中一场深刻的革命，为国民经济的这个重要部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1949年3月3—5日的罗共中央全会上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全会对农民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社会结构作了详尽的分析。全会强调指出，虽然中小劳动农户在1945年土改后生活条件已经有所改善，但它们毕竟还不能超越农村特定的落后阶段，因为技术装备差的小农所有制不能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方法，不能保证获得能够满足农户需要和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的工业需要的较好收成，不能满足供应城市居民农畜产品的需要。

因此，社会主义建设要求把小商品生产向

社会主义大农业（通过农业的集约经营以保证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的过渡，视作革命的客观需要。共产党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是一个不断地、逐步地开展的较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受能够给农业提供必要的拖拉机和机器的工业的发展，用科学方法指导农业的农艺技术干部
的培养以及系统地说服劳动农民相信社会主义大 476
农庄的优越性的工作进程所制约的。

1949年3月中央全会着重指出，农村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通过中小单干户自愿地联合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贯彻执行给农民物质鼓励以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的原则来加以建立。

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轨道的最容易被接受的形式是农业共耕社，这是使农民逐步相信在大面积土地上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方法进行共同劳动的好处的最好学校。在十年内，有一百七十六万七千个农户加入了农业共耕社。共耕社使农民心悦诚服地转向农业合作化的高级形式——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初称为集体农庄）。

由于党所进行的说服工作以及国营农场的榜

样所产生的吸引力，早在1949年就开始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其数目逐年增加。

罗马尼亚共产党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建立能够使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率日益提高的技术基础。这样，仅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努力建立能用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装备农业的强大的机器制造工业的同时，给农业投资超过二百三十亿列伊；同时，还发展了肥料和其他化学生产工业。社会主义国家为农业合作化单位购买牲畜、兴建畜厩、购买良种等提供了大量贷款。农业机器和拖拉机始在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中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国营农场，它们是提高整个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水平的强有力的推动和重要杠杆。

党的机关和组织所进行的政治工作，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劳动农民的援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业共耕社所取得的越来越良好的成绩，合作社社员收入的增加，这些都对农民的觉悟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加快了农业合作化的速度。

但是这个过程不是风平浪静的，农村的阶级斗争不会不表现出来，在那里，富农企图反对劳动

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共耕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鉴
于这种情况，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富
农的经济力量和消极政治影响的措施，从而保护
了劳动农民的利益。共产党和政府在实行限制富
农的剥削可能性政策的同时，批判了对这种政策
的曲解、滥用权力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给
予富农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进行经济活动的可 477
能，以达到增加农业产量和用农副产品供应市场
的目的。正是由于实行了限制富农剥削的政策，
1959 年 3 月 28 日的大国民议会主席团法令才得
以贯彻。通过这项法令，消灭了农村中人剥削人
的最后形式。

根据这项法令，属于富农的超过其劳动能力的土地转归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其他社会主义农业单位使用，留给以前的富农以能自耕的土地，同时给予他们同其他劳动人民一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的可能。我们国家解决把富农作为阶级来消灭这个问题的方式成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具体情况的一个范例，它同时促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在增加农业生产的情况下进行。

在1961年6月30日至7月1日的罗共中央全会，尤其是在1961年12月合作社农民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农业轨道的行动具有了群众性；结果，到1962年初，绝大多数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从而为国民经济的这一主要部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农业合作化的完成意味着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过程的一个重大胜利，标志着劳动农民摆脱了被剥削的包袱，成了自己劳动果实的主人。这样，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不仅在城市，而且也在农村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建立在两个友好阶级的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工农联盟，并把它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自农业合作化完成以来，特别是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采取措施之后，社会主义农业所拥有的巨大能力和潜在力显示了出来；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不断增长，保证了居民食品、供应工业和出口商品的需求，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同时，农业合作化促使构成我国入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合作化农民

今天成为受到共同利益鼓舞的、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繁荣、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社会阶级。它永远把自己的生存同社会主义、同现代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对祖国的繁荣作出自己重大的贡献。

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有可能得到不断的提高。由于党和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到1965年，实际工资比 478
1950年增加了1.2倍，农民的实际收入则在同一时期增加了1.4倍。

在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基础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在1970年11月罗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了关于改进对农业的组织、计划和领导的措施。实现这些措施将导致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全面发展、农村的普遍兴旺和城乡生活条件的逐步接近。

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国家的作用不断增

长，它在组织、计划和领导国民经济以及在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职能扩大了。

与过去不同，那时国家是统治阶级借以行使权力和保证它们剥削群众的主要工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时政权第一次属于劳动人民，工人阶级作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利用国家来消灭人剥削人，保卫革命成果和全体人民的利益，保卫祖国的独立和主权。

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向前发展，国家的职能也根据社会的越来越复杂的要求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演变。指导整个国家活动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一切力量联合起来致力于一个目标：经济、科学和文化的不断繁荣，整个社会生活的高涨。

我国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扩大、群众参与讨论我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和国家的唯一立法机构——大国民议会，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体现，人民群众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在这里制定国内和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时表达他们的意志。根据宪法规定，大国民议会批准国家计划和预算，

决定国家的对外政策，组织国家的中央机关，并监督它们和整个国家机构的工作。

在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条件下，大国民议会及其内部选举产生的各个常设委员会的职权大大扩大。

为了保证国家权力的连续性和处理大国民议
会闭会期间的问题，最初设立大国民议会主席团，479
从1961年开始设立国务委员会——从大国民议
会代表中选举产生的集体机关，对大国民议会负
责行使其应有的职权。

大国民议会主席团第一任主席是康·伊·巴洪博士。1952年，彼得罗·格罗查博士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在他逝世后，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于1958年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1961年，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在他逝世后，基伏·斯托伊卡同志于1965年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1967年12月，根据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大国民议会决定选举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兼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也表明罗马尼亚共

产党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一切活动领域中的领导作用得到确认。

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委员会在我国具有特殊的作用。它们进行着责任重大的工作：管理县、市、乡，管理地方经济，指导教育、文化和卫生工作，发掘和发挥公民的首倡精神，广泛地吸收群众参加对公共事务的领导。

与绝大部分由剥削阶级的代表构成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旧议会不同，选进大国民议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是人民最著名的代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是我国社会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气勃勃的力量，是同祖国的全面进步、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繁荣血肉相连的。

执行我国党和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部长会议，在我们国家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它保证法令的执行，领导、协调和监督各部工作和其他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作为集体机关的部长会议及其每个成员进行的全部工作均对大国民议会负责。

我们共和国的第一任部长会议主席是彼得罗·格罗查博士。1952 年，当他成为大国民议会

主席团主席时，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

1955年，大国民议会选举基伏·斯托伊卡同志为部长会议主席。从1961年开始，部长会议主席是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和1967年1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强调指出了不断改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工具的我们国家的活动的必要性。正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 480
志所指出的，沿着社会主义全面发展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不断前进，“要求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远景中把国家在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到质量上更高的水平上”。

使社会主义民主深化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通过1968年11月《组织条例》建立社会主义团结阵线。

社会主义团结阵线是一个常设的政治机构，其中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领导力量罗马尼亚共产党以外，还有主要群众组织、公众组织、职业组织以及各个共居民族的劳动人民委员会的代表。社会主义团结阵线还从组织上体现工农联

盟，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一切力量的团结。

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1969年3月2日的大国民议会和人民委员会代表的选举，标志着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候选人的辉煌胜利，特别有力地表明了我国全体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

罗马尼亚共产党——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政治领导力量

在解放以来的二十五年中，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考虑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和向人类文明的顶峰、向共产主义的逐步过渡，社会的前进在我国全体人民的领导力量——罗马尼亚共产党面前，提出了越来越重大的任务和责任。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在1965年7月19—24日召开的罗马尼亚共

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和通过了在高级阶段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纲领，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生活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所作的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对国家整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对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领域中所展开的丰富活动，作了深刻的科学分析，着重指出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人对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具体情况和特点的马克思列宁 481
主义基本真理的坚定不移的忠诚。

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工业化今后仍然是党的经济政策的中心目标，同时强调指出有必要更加重视发展农业，增加农、畜产品的产量。

考虑到我国拥有大面积的农田，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因素，大会指出农业可以而且应当对人民的福利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第九次代表大会从社会主义已在我们祖国彻底地取得胜利，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业已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深刻变革这一考虑出发，向大国民议会提出了我国取名为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议，这个名称完全符合我国社会的当前发展阶段。

大国民议会于1965年8月会议上通过了这一建议，并投票通过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在这部《宪法》里写进了我国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国家的统一性；人民自主地掌握全部政权；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工农联盟，知识分子积极参加我国人民所进行的全部劳动；祖国的全体公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永世亲如兄弟，并共同组成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大家庭。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全体公民的权利完全平等，这反映在各民族劳动人民的代表参加决定关系到国家的今天和未来的问题的国家权力机关上。

在也有共居民族居住的县和地方，保证他们在教育、出版、艺术机构和行政机关中使用本民族语言。

考虑到罗马尼亚共产党已在它全部活动过程中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信任，《宪法》把罗马尼亚共产党在我国社会一切活动领域中具有领导作用

这一原则写进了它的篇章。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下，国家的作用在增长，国家根据我国全体人民的繁荣和福利的利益，组织、计划和管理国民经济的职权大大扩大。同时，代表大会通过了将党的名称由罗马尼亚工人党改为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决议，因为后一个名称完全符合我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符合党的当前发展阶段，符合它的最终目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根据代表大会的指示和决议，会后采取了一 482
系列经济建设、国家组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措施，保证劳动人民群众日益积极地参与国家领导，参与解决公共事务。在这一基础上，群众的首倡精神增强了，并正在不断增强，他们的智慧和丰富经验通过把集体工作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一切领域而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掘。同全体人民商讨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的方法越来越有力地加强着党和群众的联系，促使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保证改进一切国家机关的工作。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特别重视拨出大量资金用于工业、农业、运输以及教育、科学、

文化和保健等社会文化活动。

经济的高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国民收入的增长，从而导致我国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自罗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这个时期是以富有成果的创造性的跃进和一切活动领域的显著成就为特征的；今天可以说，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确实开辟了我们党、社会制度和国家发展的新阶段。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1967年12月举行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工作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罗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对党和国家在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全面的、具有科学根据的分析，同时对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在罗马尼亚发展的新阶段发生的质和量的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给予了解答。

1966—1970年间的罗马尼亚的发展

在1966—1970年期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都获得了蓬勃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善导致国民财富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技术、科学、文化和教育等事业的显著进步。

由于贯彻了罗共第九次党代会的指示，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作为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逐年加速。近五年来，约有一千五百项工业设备和项目建成并投产，一大批原有的项目得到了发展和现代化；通过新建项目的比较合 483
理的布局，改善了全国领土上的生产力分布状态。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8%，五年计划最后一年所描绘的图景则表明工业发展的水平：这一年仅在二十二天内达到的工业产量就等于1938年全年的工业产量。

在这个时期，在改善生产力地区分布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数目超过一百五十个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许多全国性工业项目投入了生产。

国民收入以7.7%的年平均速度增长。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即70%拨作消费基金。这个时期达到的积累基金（30%）使国家有可能拨出必要的款项用于发展物质生产部门（23%强），用于建筑住宅和保证社会文化活动基础。

农业生产虽然增长比较缓慢，并在自然条件不利的年分有所减少，但比前几个五年有所提高（增长24%）。

整个经济纳入了现代化和臻于完善的新轨道。

保证分配额和所付出的劳动之间比较密切的相互关系的新工资制度业已推广。这样，平均工资增加了28.7%，购买力则提高了20%。

全国人口在这五年内增加了一百三十万，到目前已达两千零四十万人。人口的平均增长比这个五年初加速了一倍。

由于国家的普遍发展，产生了城市化现象不断加强的过程。到1970年底，居住在大都市、城市和市郊的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41%。同时，职工人数也增加了，到1970年，上升至五百一十万。

近五年内，农村居民建筑了二十六万多间住房，全国五分之四的农村实现了电气化。

对改组经济形式和社会形式以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措施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在把党和国家的全部活动牢固地置于民主和公正原则基础，置于领导接近群众、提高公众组织的作用、贯彻集体领导工作原则基础方面，采取了重要措施。对创造适合于公开表达意见、适合于意见交锋的气氛，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党客观地分析和揭示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表明对自己工作的深刻批判态度和党的领导所应有的高度责任感。国家机关和整个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的领导的改进和精简，经济法制的改善，使群众的主动创造性得以广泛表现，使社会主义民主深化。

经济现代化过程是同不断提高文化水平的过
程齐头并进的。十年制教育的普及、职业技术教 484
育的发展和大专院校的发展，也导致了群众文化的普及，造就了成千上万的专业干部。教育网及其物质基础得到了不断发展。

文化的传播是通过出版社、书店、报刊、广播、电视等进行的。在这几年中，出版了将近一万九

千种书籍和小册子，总发行量达三亿四千八百万册。1970年，报纸的发行量比1945年增长14.3%，杂志和期刊的发行量则增长39.6%。

文化和科学工作在这五年内获得了巨大的高涨。

由于上述一系列因素，罗马尼亚人民和各共居民族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了相应的提高。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上升到文明和文化的新阶段。

两次代表大会之间阶段的特征是作为整个社会主义民族的生命力的党的领导作用的加强。现在，罗马尼亚共产党拥有来自最先进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队伍的两百万党员。在全体党员中，工人占44%，农民占26%，知识分子和职员占23%；88.80%的党员是罗马尼亚族，8.4%是马札尔族，1.3%是日耳曼族，1.5%属其他民族。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不断巩固是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繁荣的决定性因素。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1969年8月6日至12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由于大会进行期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由于大会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意义，由于它是在将罗马尼亚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并标志着反帝的人民革命开始的1944年8月历史性事件完成二十五周年这个光辉节日前夕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成为党和全体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并具有特殊的国际反响。大会回顾了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对我国社会进行革命变革和永远消灭剥削阶级的斗争中，在争取社会主义在罗马尼亚胜利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总结了党和全体人民为贯彻以前的决议所做的工作，制定了1971—1975年期间社会主义罗马尼亚全面发展纲领以及截至1980年的国家发展指导方针。

大会对中央委员会以及党的机关和组织为实现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进行的广泛活动给予了

485 高度评价，特别强调指出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为改进我们祖国的经济和社会工作的计划和领导、为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所采取的措施的重要意义。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特点在于：本着对党、国家、人民利益、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深切关怀探讨了我国社会的基本问题。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指出："可以正确无误地说，当前的党代表大会标志着我们党的发展、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一个质量上更高的新阶段。"

大会深刻地、全面地反映了党制定国内和国际政策的科学方式，有力地证明了党的钢铁般的团结，证明了党作为全民族领导力量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大会代表们深信：尤其是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显得特别清楚的我们今天生活的最重大的成就的取得，是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他以革命战士和政治家的卓越品质，以对人民的高度忠诚而著称——的活动和品格、工作能力和思想能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大会代表们

一致选举他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罗马尼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全面发展，使它对世界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作出了更多贡献，为我国立足国际舞台并参与解决当代重大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加强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同盟和合作是对外政策的中心，把我们同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是同样的社会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同目标。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始终不渝地积极声援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声援民族解放斗争，声援从殖民奴役下赢得了独立的国家。罗马尼亚人民为一切争取自由、民主、和平与社会进步、争取尊重各国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斗争的反帝力量、结成同一条阵线而奋斗。同时，我国本着和平共处的精神进行活动，发展同一切国

家——不论其社会政治制度如何——的经济、科
学技术和文化关系，认为在互利基础上的不带政
治条件、没有限制和歧视的多方面交流有助于国
486 际紧张局势的和缓，有助于各国人民间的接近，有
助于加强世界和平。罗马尼亚主张在尊重民族独
立和主权、不干涉内政、大小国家权利一律平等的
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

在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时期，罗马尼亚是倡导这些原则的积极因素。

从 1955 年开始，我国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在联合国及其各种机构内，我国代表过去和现在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活动，提出了许多旨在加强国与国之间联系和合作的建议。1967—1968 年，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担任了联大主席。

践踏别国主权、搞阴谋和进行危及世界和平的活动的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行径，是同建立各国人民间的谅解和合作气氛、同各国的自主和独立背道而驰的。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国过去和现在都全力声援各国人民保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人民积极声援英雄的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现在和今后都将给予他们

政治上、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全力支持，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同时，罗马尼亚共产党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一切争端问题，主张消除世界紧张局势的策源地，主张建立消除战争危险而首先是使用核武器危险的地区。基于这一路线，罗马尼亚政府在1957—1959年间向巴尔干各国政府提出了关于缔结一项旨在保障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地区和平的协定的倡议；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提出了关于为改善属于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欧洲国家间的睦邻关系而进行地区性活动的倡议。

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所提出的关于在青年中提倡和平、各国人民相互尊重和谅解的思想的措施的建议，也是为了追求同样的目的，这项建议旨在使各国青年更好地相互了解和接近，这是改善国际气氛的途径。

我国的新制度，是在存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以及这个体系的各国之间同志般的互助合作——对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步起着积极影响的因素——的有利形势下建立起来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罗马尼亚过去和现在都十分重视发展同所有

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和经济、科学技术的交流。本着这一精神，作为经互会——为了有助于协调国民经济计划和生产专业化以提高各会员国人民的福利而于1949年建立起来的——的成员
487 国，罗马尼亚主张在双边和多边协定的基础上，在互利和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利益的基础上加强这种合作。

协作的改进不应通过建立损害国民经济计划的超国家机构，而应在自愿和每个国家对参加这种或那种协作形式感到兴趣的基础上来实现。

我国在为保卫和平、缓和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局势而斗争的同时，特别重视加强自己的防御能力，重视训练和装备我国武装部队，以便抗击任何损害祖国独立、损害人民的革命成果和世界和平的企图。作为华沙条约（1955年缔结的）组织的成员国，我国始终不渝地履行着根据章程和基本原则——它们规定这个组织的活动旨在用联合力量对抗帝国主义集团所推行的侵略政策——所应承担的义务。

在1966年7月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会议上，华沙条约参加国主张取消北大西洋侵略公约，并

与此同时，取消华沙条约，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创造合作与和平的气氛。但是，只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存在一天，就有必要保持华沙条约，罗马尼亚决心在这个组织内作出它的全部贡献，发展我国军队与这个条约成员国军队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军队的友好关系。

我国的国际合作政策的另一个表现，是同罗马尼亚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由1947年的二十三个扩展至现在的九十四个，并且我国同一百多个国家建立了经济和科学技术联系。

1969年3月于布达佩斯举行的华沙条约参加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条约参加国致所有欧洲国家关于加紧努力以加强欧洲安全与和平的呼吁书。

呼吁书同时主张就欧洲的安全和合作问题召开一次欧洲会议。

正如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所着重指出的："我国人民是从这样一个信念出发的：同苏联，同社会主义邻邦——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和同盟关系是一种客观需要，必须经常致力于加强这种关系，以利

于加深我们各国间的全面合作，以利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

罗马尼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对维护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所作出的积极贡献，使她今天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国家，并由于她为改善国际气氛、提倡各国人民间的合作和信任所作的建设性努力而受到赞扬。

488 解放后罗马尼亚文化的发展

解放在我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引起深刻的社会改组的革命变革时代，也标志着文化领域中的巨大变革的开始。

一般说来，介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的丰富和珍贵的文化遗产，是罗马尼亚文化的先驱者们开创的先进的、进步传统的继续；是同我们祖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道路上发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密切联系着的、1944年8月23日后进行的文化革命所取得的质的飞跃的前提。

站在人民革命前列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欢迎民主知识分子、忠于人民斗争的进步作家和文化人

士，给他们指出了为建立新文化作出贡献的道路。

在与以往时代不同的思想气氛中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文化，在二十多年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划清思想立场、同各种敌对倾向斗争、批判形形色色的反动理论的长期的复杂过程。

已经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思想给予人民最先进的传统以新的生命，并促进了它们的发展。

众所周知，在1944年8月23日以前，进步的文化要同落后的文化、同便利法西斯思想渗入的民族主义倾向进行斗争。党的斗争当时针对资产阶级的反动上层代表，他们否定人民和热爱人民的创作家们所创造的文化、文学和艺术的伟大价值；党为具有丰富的先进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文化而战斗。

当时的共产党报刊和进步报刊保卫了杰出的知名人士，如：康・伊・巴洪、乔・埃奈斯库、米・萨多维亚努、图多尔・阿尔盖齐、加拉・加拉克西翁、乔・克林内斯库等人的民主立场，回击了那些相信存在着一种“文化危机”的人，指出替反动的、亲法西斯集团服务的“文化”必将无情地消亡，而真正的文化必将得到愈来愈有力的发展。

罗马尼亚文化坚定不移地进一步发扬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伟大进步的、民主现实主义传统，走过了一段上升的路程，成功地取得了质的飞跃，以它为人民物质和精神进步服务的内容证明了自己的优越性。新文化已经诞生，它是同工人阶级休戚与共，为丰富劳动人民的文化知识、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方向、为培养和发展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服务的。在最广大的群众中传播文化，是罗马尼亚共产党在缔造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争取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489 我们党和国家对各个领域的创作、对在越来越广泛的范围内传播文化，给予特殊的关怀。报刊、文化设施、学校、印刷厂、出版社、图书馆、展览会、广播、电视、剧院、电影院、博物馆、文化宫、文化馆和工人俱乐部成为传播科学知识、普及文学艺术的伟大珍品、提高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觉悟的、越来越受广大群众欢迎的经常性渠道。

文化创作在社会主义社会已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获得了得以大为繁荣的条件；国家用于文化需要的费用年年增加，这说明

了成为人民财富的文化的现状。

罗马尼亚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遵循的新道路，吸引罗马尼亚族和各共居民族队伍中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积极和自觉地参加进来。这样，就建立了一种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激励的、受党指引的、为共同目标奋斗的统一的文化。罗马尼亚族和少数民族的代表们在一切文化领域中的密切合作和共事，促使各共居民族的文化在解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出现了值得注目的繁荣。

教　育

罗马尼亚共产党始终为争取实现民主教育——实行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招收尽可能多的劳动人民子女上中等学校而进行斗争。

各级教育，是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我国革命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拥有比较良好的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条件。

这样开始了对国家的整个教育的改组。需要一种教育来保障人民群众学习文化，保障训练和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所必需的干部。

1948年的教育改革把学校建立在组织和指导教学的新的原则基础上，使教育具有新的结构，具有民主性、人民性和科学的现实主义性质。教育成了一个全国性问题，教育对全体青年——不分性别、民族和宗教信仰，都敞开大门，他们能免费享受。考虑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需要，教育接受了科学唯物主义的方针，用和平的理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各国人民间的谅解的精神教育青年。但在教育改革中犯了一系列错误，其本质在于对罗马尼亚的教育状况缺乏切实的研究，机械地生搬硬套一些不适合我国条件的陈规旧套，低估了本国的教学经验。尽管犯了这些错误，学校的进步（内容上、群众性上）仍然是巨大的。

490 国家用于发展教育的基金逐年增加，保证了越来越良好的学习条件。学校、教室、中小学生、大学生和教学干部数量的增加，突出表明我国各级教育的发展规模以及党和政府对于通过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关怀。

由于数以万计的教学干部的热情工作，过去的沉重遗产——大量的文盲已逐渐减少。目不识丁的现象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已消灭。

每年有四百万中小学生，十五万大学生，拥有一百九十二个系的四十九所高等教育机构（1938年仅有十六所高等教育机构，三十三个系），这说明解放二十五年多来我国教育的巨大飞跃。

党和政府鼓励和激励了教职员工的充满忘我精神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理解自己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接班人的崇高使命；社会主义新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文学家、技术人员、工程师、教师、医生，而这些人又成为社会和文化进步的倡导者。

普通文化教育在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1964年秋天，完成了向八年制普及教育的过渡，这是罗马尼亚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障国家全体公民具有扎实的文化基础，从而在教育方面进入了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1968年4月22—25日的罗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改进教育的重要决议：国家的全体青年最少应受十年制教育；考虑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职业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数目将增加，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也将扩大；组织了

技术员教育；根据经济和文化的当前需要和远景需要，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和学制更加多样化，改进了对青年学生的公民道德教育。

中等教育在“8.23”后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学校和学生数目增加了。学校网在拥有大量就学人口的工人中心和农村中大为扩大。中等教育在祖国解放后成为人民的教育，它的内容通过增加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课时、通过设置科学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基础课程，得到了逐步改善。

根据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当前需要，中等教育内容必须适应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这就提出了向十二年制普及文化教育过渡的要求。因此，开设了旨在扩大文化视野的课程，如：高等数学、普通生物学、世界文学史、艺术史等等。

491 城乡劳动人民可以在普通文化夜校和函授学校中充实自己的学业。这一教育的发展有力地表明党对提高全体人民文化水平的关心。

三分之二的普通学校毕业生在普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以及职业学校中继续学习，这对我国教育的发展也是有意义的。约有三分之一的中等学校毕业生在高等学校中继续学习。

用各共居民族语言进行的教育有了不断的发展。这些民族的学生如果愿意，可以在用罗马尼亚语教学的学校中就学，在这里他们也可以学习本民族语言；他们还可以选择在多科学校或民族学校就学。

党和国家不断努力发展学校的教学物质基础。校舍面积扩大了，教育单位的设备改进了，实验室得到了较好的装备和教学器材。1960—1965年间，兴建了将近两万四千个教室，扩大了普通文化教育的寄宿容量。全部教育的免费制得到了保障。

在音乐、美术、舞蹈、体育学校中，也为具有特殊才干的学生创造了发展他们才能的条件。

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导致了职业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工业、经济、农业中等学校），以造就能掌握现代技术的中等技术干部和熟练工人。

党和政府在改组工人、技术员、技师的培养体制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导致建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这种教育的内容将与我国国民经济干部的实际需要相适应。

在不久的将来，只有普通教育的十年级毕业生才能进入职业学校，这将使普通文化教育和专业技术文化教育都得到显著提高。同时，用各共居民族语言教学的科系和班级也将进行改组。

高等教育在解放后获得了特别的发展，成为造就一切活动领域中的专门干部和培养新知识分子的主要环节。教学内容，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要求以及当代科学技术水平，作了重大的改进。与此同时，它的物质基础——高等院校的新建筑、学生宿舍和食堂也有增加。具有扎实学识的教学干部导致教育不断改进，并提高了它的声望。我国教育在国外享有的声望，可以从世界上六十多个国家的大量留学生在罗马尼亚各高等教育机构中学习这一事实得到证明。

成为培养和提拔教学人员的一个主要条件的科研活动，也是高等教育对实现我国文化革命的
492 宝贵贡献。教育干部继承了罗马尼亚科学界前辈的值得赞扬的传统，把教学工作同科研活动和谐地结合起来。他们的科学发现和创造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都具有新的价值。

由于罗马尼亚科学的声望在世界各地的增

长，越来越多的高等教学干部应邀出席世界性科学集会。

在解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国各级教育不断提高，教学内容和方法也丰富起来，对扩大和提高罗马尼亚文化的声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复杂事业中，各级教育的任务正在加重；而改进教育内容使之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仍然是一切教育工作者的首要课题。

1969 年 2 月举行的教学干部全国代表会议——我国首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是罗马尼亚教育和教育工作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会议全面地讨论了在当前发展阶段和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取得普遍进步的条件下改进各级教育并使之现代化的问题，对如何贯彻执行 1968 年 4 月党的指示和同年的教育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会议同时还通过了大国民议会批准的教学人员条例草案。

科　学

在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科学活动达到了越来越高的水平，党和政府给予它经常性的关注。今

天科学是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和实现文化革命的一个首要因素。

在越来越有利的条件的推动下，罗马尼亚的研究工作者、科学家和学者在一切科学活动领域中都取得了成就，其中许多人对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声望作出了贡献。

数学继承了在数学界得到好评的我国传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如：与西·斯托伊洛夫院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复杂变数函数理论研究，以及微分几何学研究、积分方程式研究等等。

在函数分析、微分方程式、概率论研究和数理统计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关于在自动化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自动装置的研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从国内和国外出版的各种专业刊物中也可以看到取得的成果。有六十多部著作（论文集、
493 专著）获得国家奖金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奖金，这证明我国数学科学的进步。格·弗伦恰努教授、米隆·尼科列斯库、丹·巴尔比里安、格·莫伊西尔、蒂贝里乌·波波维奇（克鲁日）等学者的名字早已超越国界并为数学学派争光。

今天具有广阔前景的物理学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大量工厂实验室建立起来并用现代仪器加以装备,研究工作者数目的增加,研究工作同生产越来越密切的结合，这些都导致在物理学方面取得良好的成果。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原子物理研究所的建立，开辟了在现代物理学方面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广泛可能。通过霍·胡卢贝伊、欧·伯德勒乌和伊、乌尔苏等一些学者的著作，物理科学也达到了世界水平。

在化学领域中，科学研究也比过去有了重大得多的发展。

在无机化学方面取得了具有实践价值的成果，而在有机化学领域中，同构成石油化学基础的碳化氢化学有关的研究工作是值得注目的。在塑料领域中，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拉·切尔纳特斯库、格·斯帕库、欧·安盖列斯库、康·内尼采斯库、伊·穆尔古列斯库等享有盛名的教授光荣地代表我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提出了价值卓著的科学著作和学术报告。

生物科学向着撰写我国植物志和动物志大部头著作的方向发展。生物学、农业生物学和生

物化学的研究取得了可嘉的成果。特拉扬·塞武列斯库院士领导的农学研究所展开了广泛的科学活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植物学地图和许多综合性著作业已完成。

在地质学和地球物理学领域中，在亚·科达尔恰、弗·扬诺维奇、萨巴·什特弗内斯库、米尔恰·索科列斯库、康·穆尔杰亚努、丹·朱什克等教授的领导下，研究工作者的使命是为发现新矿藏以发展国民经济所需的原料基地作出贡献。在格奥尔基·马科维伊指导下绘制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地质地图是既实用又有价值的著作。

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中，对于技术科学领域的研究也给予了注意，其研究方向是解决国家技术计划的各种问题(计算方法、改进实验工具等等)。最近,这项任务已由国家科技委员会承担。

医学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在解决有关公共卫生的若干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由于发扬了我国医学科学的传统,在内分泌学、病毒学、内科学、神经学、生理学及其他领域中均有所成就。

随着我国科学活动的普遍水平的提高，成功

地做到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者的接近，并获得了积极的效果。

在哲学领域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各个 494
领域和方面都受到了特殊的重视。在对哲学史的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撰写了罗马尼亚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史论著。

在对我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哲学家中，尤为出众的有阿·若扎、康·古利安、德·德·罗什卡（克鲁日）、加尔·埃尔讷、亚·特纳塞、丹·伯德勒乌、德·博特扎图（雅西）等人。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以及我们党的文献的广泛传播，社会科学在我国解放后得到了特别的发展。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内，对工业化过程、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经济问题、社会主义各国关系问题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尼亚·曼内斯库、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亚·伯尔拉德亚努、瓦西里·马林斯基、巴·扎哈雷斯库、伊·拉赫穆茨、罗·莫尔多万的研究和论著，对阐明和解决对我国经济

具有实际意义的若干问题作出了贡献。

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领域中，卢克雷齐乌·珀特勒什卡努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1945—1946年发表了《社会动荡的一个世纪（1821—1907年）》、《罗马尼亚的基本问题》、《在三种专政下》、《罗马尼亚哲学流派和倾向》等著作。

罗马尼亚历史编纂学高度发扬了我国丰富的古老传统。《罗马尼亚史》（论文集）、《特兰西瓦尼亚史论丛》、《多布罗加史论丛》等集体撰写的大部头著述以及其他综合性重要论著业已完成。

我国的解放为历史科学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建立了布加勒斯特和克鲁日历史研究所以及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所。康·达伊科维丘、彼·康斯坦丁内斯库（雅西）、安·奥采蒂亚、达维德·普鲁丹（克鲁日）、康·康·朱雷斯库等历史学家撰写了关于我国历史的有价值的著作和论文。

考古学同史学一起得到了发展，提供了了解我们祖国古代历史所必需的基础资料。

语言学研究继承了我国的丰富传统，获得了十分卓越的发展。这些年来，在语法和辞典编辑领域中出版了大部头著作，如：《罗马尼亚语语法》

（两卷本）、《现代罗马尼亚语词典》（四卷本）、《近代罗马尼亚语词典》以及其他早已感到需要的论著。在语音学问题上，许多研究工作者在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布加勒斯特和克鲁日语音实验室中从事着实验研究。《罗马尼亚语言学地图集》这部巨著标志着研究工作者在熟悉罗马尼亚方言方面的劳动成果。

关于文学语言的研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者。《十九世纪罗马尼亚文学语言史论文集》和《米·埃米内斯库诗歌语言词典》等著作只是这个领域中有价值的著作的几例。

有些专家还致力于对罗马语的研究：古典语
言学和罗马语言学。约尔古·约尔旦、埃米尔· 495
彼得罗维奇、亚·罗塞蒂等学者闻名于国内外，并
且声誉卓著。

一般说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这个国家最高学府，在科学、科学研究的发展中发挥了根本作用，为倡导科学研究与生产密切结合作出了积极贡献。

最近，成立了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院、医学科学院和农业科学院，它们将给我国科研工作以新

的推动。

今天我们已拥有大量的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数千名研究工作者在那里从事各个科学领域和部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等科研工作。

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引起的科研工作的加强以及这个领域中的活动形式的改进，提出了新的装备和协调问题。

在各部门的研究所、工业中心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和实验室，在从事与本企业的生产问题直接有关的研究工作的工厂实验室中，也进行着科研活动。

在各县首府开展着越来越广泛的科研活动，尤其是在克鲁日、雅西、蒂米什瓦拉、克拉约瓦、锡比乌、布拉索夫、普洛耶什蒂、阿拉德等城市。

* * *

解放后，在我国开展的复杂过程——文化革命中，罗马尼亚新文学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无论是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继续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所开展的活动的主要代表，如米·萨多维亚努、图·阿尔盖齐、米·拉列亚、乔·克林内斯

库、加拉·加拉克西翁、卡米尔·彼特雷斯库、扬·克卢格鲁、乔·博格扎、亚历山德鲁·菲利皮德、扎·斯坦库、米·贝纽克、欧·热贝列亚努、米·拉·帕拉斯基维斯库、玛·巴努什、拉·博乌里亚努等，还是青年一代的代表，都表现出这一点。

文学家的新态度通过当代的刊物：《人民论坛》、《世界》、《视野》、《文学评论》等传达给群众。解放后在党的支持下出版的这些报刊由一些有声望的作家，如：乔·克林内斯库、尼·迪·科恰、萨沙·帕纳、米·拉·帕拉斯基维斯库等人领导。罗共中央机关报《火花报》发表指导思想生活、指导作家、作曲家、美术家活动的文章。

同时，出版了各种共居民族文字的重要刊物和出版物；文学之间的接近和相互渗透日益加强。

思想战线由于《同时代人》这个由最著名的作家为它撰写稿子的刊物于 1946 年出版和马札尔文的刊物《我们的时代》于 1956 年复刊而得到加 496
强。作家们于 1945 年组织了作家联合会，1949 年这个组织的活动由作家协会代替，米·萨多维亚努是第一任作协主席。

文　学

文学在发展；新作家们用艺术形象表达我们祖国生活的新内容。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回顾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和颂扬新生事物等主要主题，逐渐丰富着罗马尼亚文学的内容。

米·萨多维亚努在《米特里亚·柯柯尔》和《铁喙》中描写了农民的生活，并以杰作《尼古拉·马蹄铁》(1952 年）这部历史小说丰富了这个时期的文学，这部作品是他艺术上成熟的证明，是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的证明。

在诗歌领域中，语言大师图·阿尔盖齐写了歌颂人类命运、人类进步的长诗《人的颂歌》以及关于 1907 年农民起义的长诗《1907 年》，《绿叶》、《新歌》、《节律》等诗集则着重表现出他深刻的思想和举世无双的诗歌技巧。

著名的散文作家和戏剧家卡米尔·彼特雷斯库把回顾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历史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人》献给了我们时代的文学。这部史诗是

一幅描述整整一个时代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壁画，对一些重要人物，如：尼·伯尔切斯库、安娜·伊珀特斯库、戈列斯库兄弟等人作了复杂的、卓绝的描绘。

乔·克林内斯库，作为长篇小说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以高度的艺术力在《可怜的伊昂尼德》、《黑色的衣柜》——对几十年间的罗马尼亚社会进行广泛批判的图画——中继续了自己的创作活动。在《物颂》中，乔·克林内斯库是一个对宇宙寄于广阔遐想的诗人。

扎哈里亚·斯坦库在解放后写了一系列长篇小说，抨击在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下对农民的剥削以及农民的苦难生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赤脚》(1948年)，已译成三十多种文字。继此之后又写了《猎狗》、《苦根》、《拚命》(1962年)和《疯狂的森林》(1963年)等作品。

诗人和报告文学家乔·博格扎早在解放前就写了《石头之国》以及关于矿工、石油工人、制革工人的水深火热生活的感人肺腑的现实主义报道，继《摩尔多瓦的战迹》(1946年)之后，他又写了报告文学集《日乌河谷中的人和煤》(1947年)

以及表达对祖国新生活的欢乐和热情的《当代漫笔》。他的旧作选集《反抗的年代》是罗马尼亚革命的新闻报道的顶峰。《在巴比伦的独白》（1967年）是杰出的古典诗人亚历山德鲁·菲利皮德的杰作。

欧·热贝列亚努的诗集《献给为自由而牺牲的人们》是一曲颂歌，在《利迪切》中，诗人则痛斥战争及其后果。《广岛的微笑》（1959年）是他表达伟大的人道主义思想信息的诗歌创作的杰作。

497 诗人米哈伊·贝纽克把他诗人的信念凝聚在《铭刻在花岗岩上》的诗句中。作为“新时代的鼓手”，他主要在诗歌领域中进行了丰富的、硕果累累的活动。《期待日出的人》（1946年）、《诗行》（1949年）、《路旁的苹果树》（1954年）、《共产党人，带头》（1954年）、《万世长存》等诗集收入了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浓郁的抒情色彩的诗歌。

玛·巴努什在强烈呼吁和平的长诗《美国，我对你说》中表现出了她在艺术上的成熟性。女诗人今天继续在写作献给妇女、人类尊严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感情细腻的诗句。

维尔吉尔·特奥多雷斯库是一位出色的、敏

感的抒情诗人，而埃米尔·博塔通过《诗集》(1971年）继续了他战前时期的伟大创作。以艺术形象表达我们祖国生活新内容的作家新人辈出。在解放后的具有巨大才能的青年作家中间，尼古拉·拉比什、马格达·伊萨诺什、安娜·布兰迪亚娜、阿·埃·巴康斯基、尼娜·卡西安、亚历山德鲁·伊瓦秀克、杜米特鲁·波佩斯库、维隆尼卡·波隆巴库、马林·索雷斯库、尼基塔·斯特内斯库尤为出类拔萃。

蒂图斯·波波维奇以长篇小说《异乡人》和《渴望》为处女作，赢得了文学声望。《渴望》这部长篇小说是献给投身新的革命行动——从地主手里夺回土地并实行土改的农民的。马林·普列达（著有《莫罗米特一家人》）和欧金·巴尔布（著有《北方公路》、《洼地》、《王子》)是杰出的、生气勃勃的长篇小说家。

马札尔语作家纳吉·伊斯特万开辟了写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的道路，写出了《最强度》这部真实和深刻的长篇文学作品。

解放后，除了纳吉·伊斯特万以外，各共居民族的其他作家也加入了我国新文学的行列，如：科

瓦奇·杰尔吉著有长篇小说《竭尽全力》，奥斯卡尔·瓦尔特·契塞克写有长篇小说《烈火》——对特兰西瓦尼亚农奴斗争的悲壮的回顾，以及乔治·舍尔格和费·利布哈德。在诗歌中，霍瓦特·伊姆雷和塞姆莱尔·费伦茨把他们的城市观感凝结成为诗行。

在散文、诗歌、戏剧各个方面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我国文学为一些优秀人材的成长提供了机会。战前定居在法国的一些罗马尼亚文学家，如诗人特里斯坦·察拉和伊拉里·沃隆卡创立了世界文学界著名的流派，另一些人则是大剧作家，如：欧金·约内斯库。

象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文学批评和文学史通过战前时期的主要代表的活动而得到表现，通过新的一代的文学批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工作者的成长而得到发展。乔·克林内斯库、图多尔·维亚努、米·拉列亚、佩尔佩西丘斯、舍尔班·乔库列斯库、保尔·乔治斯库、奥·克罗赫默尔尼恰努、乔治·伊瓦什库、杜米特鲁·米库及其他许多人对发掘文学遗产、推动现代文学活动作了特殊的贡献。

解放以来二十多年的美术工作，同样是硕果累累。为艺术工作创造的有利气氛使“8.23”以前就开始活动的一些艺术家以及充满热情和对新生事物敏感的青年一代能够不断成长。

享有盛名的画家代表有：马里乌斯·布内斯 498
库、科尔内利乌·巴巴、亚历山德鲁·丘库伦库、什特凡·塞尼、奥雷尔·丘佩、奥克塔夫·安盖卢策及其他许多人；雕塑家代表则有：杰扎·维达、康·梅德里亚、罗穆尔·拉迪亚、格·安盖尔等。这些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证明他们才干的完全成熟。通过组织艺术学校，通过国家给予文化艺术的关怀，美术工作正在大踏步地前进，声誉日高。

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音乐文化继承了过去作曲家和音乐家们的伟大传统，得到了发展。新的音乐艺术出现了蓬勃高涨，尤其是在作曲家协会成立以后(1949年)。

经常保持清新的并得到精心培育的罗马尼亚民间音乐，过去和现在都成为最著名的罗马尼亚作曲家们的创作源泉，他们的作品在国外也享有盛誉。

乔·埃奈斯库、特·罗加尔斯基、保尔·康斯

坦丁内斯库、格·杜米特雷斯库、亚·门德尔松、扬·杜米特雷斯库、西吉斯孟·托杜策、蒂贝里乌·奥拉赫、安纳托尔·维耶鲁、马·索科尔及其他主要代表，把罗马尼亚音乐文化提高到新的高峰。除卓越的作曲家外，我国还拥有重要的演奏家。

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在普及音乐作品和培养劳动人民的音乐鉴赏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戏剧运动最近二十多年来也有了发展，把剧目问题和演出问题提到了首位。奥雷尔·巴兰加、米哈伊尔·达维多格卢、霍里亚·洛维内斯库、保尔·埃维拉克、杜米特鲁·拉杜·波佩斯库等剧作家正在成长，他们的作品受到观众的欢迎。此外，还有大批优秀的演员。

还年轻的罗马尼亚电影取得了初步成就，正在专心于扩大题材范围和积累艺术经验。拍摄优秀影片的物质条件越来越优越。

罗马尼亚文化对世界文化宝库的贡献

罗马尼亚文化的国际声望在多方面表现出

来。它那先进的珍品，罗马尼亚作家撰写的文艺作品、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著作中所包含的真理和强烈的人道主义，越来越广泛地进人世界文化宝库。早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有些学者、科学家和作家的著作已名扬国外，进人了世界文化的行列。在历史和哲学著作方面具有独创性的第一位作家迪·康特米尔，是那个时代罗马尼亚文化最重要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他的作品深受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影响，是对罗马尼亚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并且闻名国外，御膳房总管康斯坦丁·康塔库齐诺这位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在罗马尼亚国文化上享有盛名的代表、外交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是1700年于帕多瓦用希腊文刊印的罗马尼亚国地图的作者。

“1848年”这一辈的作家对于在国外传播罗 499
马尼亚文化和文学也作出了贡献。瓦西里·阿列克山德里的《民歌》被译成法文，引起了作家普罗佩·梅里美的兴趣；《罗马尼亚之歌》是阿列库·鲁索在巴黎写作和发表的；尼古拉·伯尔切斯库用法文刊印了他的卓越著作《多瑙河诸公国经济问题》；米哈伊尔·科格尔尼恰努、亚·迪·克塞诺

波尔和尼古拉·约尔加也用法文发表了他们关于罗马尼亚人历史的重要的综合性论著；我国的大史学家们用世界通用的各种语言出版了理论性和文献性的卓有价值的著作。

«罗马尼亚生活»、«新纪元»、«我们的时代»等杂志，注意到“我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不够”，力求促进我国文化向着世界水平迈进。

乔·埃奈斯库、米·埃米内斯库、伊·卢·卡拉迦列、米·萨多维亚努、利维乌·雷布里亚努、图多尔·阿尔盖齐、迪努·利帕蒂、康·布伦库希等大师们在世界上的卓越著作，促进了罗马尼亚文化声望的提高。

一些罗马尼亚学者(在前一章里我们已提及)在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人文科学领域中的贡献，不断增大。

我国解放后，为在世界上传播我国文化珍品创造了最有利的气氛。

在工人阶级政党的目标指引下，同全体人民的伟大意愿血肉相连的罗马尼亚科学、文学、艺术在世界文化和文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罗马尼亚科学家的卓越著作，我国罗马尼亚、

马札尔、日耳曼等民族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外名望日盛，其中有些已被译成国际通用语言。

我国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越来越多地闻名于世界。我国组织的、有世界各国广泛参加的世界性会议、讨论会、学术会议，科学院之间的协定，经验交流，文化协定，这些都提高了正在不断繁荣和丰富的罗马尼亚文化珍品的声望。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指导下，罗马尼亚学者和艺术家正以具有独创性和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对世界社会主义文化和进步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500

关于现代时期的问题、资料和参考书目

自罗马尼亚从法西斯奴役下得到解放以来的这个时期，虽然年数比较少，但从事件上说是极为丰富的，这些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社会结构和面貌本身。对于当前继续在我们眼前展开的这些过程的研究，是罗马尼亚史学家的一项首要任务，他们必须分析在经济中、人民的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复杂的变革。

在对这个时期的研究中，主要的历史资料是，党和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变革阶段以及后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开展革命过程的文献。

关于1944—1965年时期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最重要的材料，包括在1945年10月罗共全国代表会议，罗共第六、七、八次代表大会上罗共中央的报告中，并已发表于格·乔治乌—德治的《论文和讲话集》。对于了解自罗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以来所发生的革命变革，党的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在罗共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罗共中央报告以及在两次大会上进行的讨论，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这些材料已发表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政治出版社，布加勒斯特，1965年版)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政治出版社，布加勒斯特，1969年版)这两本文件汇编里。关于改进国民

经济的领导和计划、改善罗马尼亚行政区划组织的问题，以研究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在1967年12月6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为最重要。

与我国工人运动发展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活动有关的问题，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已在罗共建党四十五周年和五十周年的讲话中作了科学的和广泛的分析，这些讲话已分别在1966年和1971年由政治出版社出版(布加勒斯特)。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已在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的大量报告、讲话和文章中作了分析，这些材料已收集于政治出版社出版的五卷集《罗马尼亚在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布加勒斯特，1968年、1969年、1970年和1971年版)。

我们党和国家的政策也在罗共领导人的其他一些讲话和文章中得到阐发。关于罗马尼亚人民在我们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二十年中所走过的道路的分析，见诸于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在1967年12月29日的大国民议会庆祝会上的讲话：《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一书(政治出版社，布加勒斯特，1968年版)。

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在1967年7月的大国民议会会议上 501
得到了讨论，其材料已发表于《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对外政策》一书(政治出版社，布加勒斯特，1967年版)。

专业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大量论述和文章可供我们了解罗共党史中的某些时期和建立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斗争。

在专栏中经常发表这类论文的刊物有：《罗共中央历史和社会政治研究所年鉴》、《阶级斗争》、史学刊物《研究》、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科学和语言科学协会刊物《历史研究和论文辑》、《文献评论》、《罗马尼亚史学评论》、《雅西亚·迪·克塞诺

波尔历史和考古研究所年鉴》、《克鲁日历史研究所年鉴》、《历史文汇》等。这些论文中的一部分已汇编成集，其中有：《罗马尼亚共产党党史的各个时期》（政治出版社，1966年版），《罗马尼亚现代史论丛》（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罗马尼亚历史丛书中的《现代史论文集》（两卷本）。

同时还发表了一些专著性质的作品，如：《反希特勒战争中的罗马尼亚（1944年8月23日—1945年5月9日）》（军事出版社，1966年版）；《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统一》（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8年版）等。为了向世界科学界进行报道，科学院"罗马尼亚历史丛书"编辑部，在院士康·达伊科维丘教授和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教授的领导下，进行了广泛的活动；迄今，用法文、俄文、英文和德文出版了三十多种罗马尼亚历史书籍。

正在编写中的《罗共党史》将是了解罗马尼亚革命运动——是同我国社会的整个历史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它将展示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在地主资产阶级制度的艰苦岁月中和在社会主义的光辉灿烂年代里所走过的斗争道路。

附录一　罗马尼亚国、摩尔多瓦历代君主谱和特兰西瓦尼亚历代总督、大公、长官谱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梅尔库里乌，“大公”，1111—1113年 勒斯塔基乌（欧斯塔基乌），总督1176年 列格福鲁斯1199—1200年 埃特1200年 尤拉1201年 贝内迪克特（第一次当政）1202—1206年 斯马拉格德1206年 贝内迪克特（第二次当政）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1208—1209 年
		米哈伊尔 1209—1212 年
		贝尔托尔德·德·梅拉尼亚，1212—1213 年
		尼古拉 1213 年
		尤拉 1214 年
		西米翁 1215 年
		伊波赫 1216—1217 年
		拉法埃尔 1217—1218 年
		内乌卡 1219—1221 年
		保尔 1221—1222 年
		波乌萨 1227 年
		尤拉·拉托特 1229—1231 年
		迪奥尼西 1232—1234 年
		安德烈 1235 年
		波乌萨 1235—1240 年

		劳伦齐乌 1242—1252年
利托伏伊 奥尔特尼亚和哈采格国总督 1247年以前，约至1277年	奥拉哈 1247年(?)	
塞内斯拉乌 阿尔杰什总督 1247年		
		埃尔尼·阿科斯 1261年
		拉第斯拉夫 1263—1264年
		尼古拉·盖雷杰 1263—1270年
		马特伊·恰克 1270—1272年
		尼古拉·盖雷杰 1272—1273年
		约翰 1273年
		尼古拉·盖雷杰 1273—1274年
		马特伊·恰克 1273—1275年
		拉第斯拉夫 1275年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乌格林·恰克 1275—1276 年
		马特伊·恰克 1276—1277 年
伯尔巴特 奥尔特尼亚总督 约 1277—1290 年		尼古拉·波克 1277 年
		芬塔·阿巴 1278—1279 年
		什特凡 1280 年
		罗兰德·博尔萨 1282 年
		阿波尔 1283 年
		罗兰德 1284—1285 年
		莫伊塞 1289 年
蒂霍米尔—托戈梅尔 奥尔特尼亚总督 约1290—1310年		罗兰德 1288—1293年
		拉第斯拉夫·康 1294—1315 年
巴萨拉布 罗马尼亚国君主 约 1310—1352 年		尼古拉 1315—1318 年

尼古拉—亚历山德鲁 1352—1364年	德拉戈什　约1352—1354年	多扎·德·德布勒森 1318—1321年
	萨斯　约1354—约1358年	托马·德·赛切尼1322—1342年
	巴尔克 1359年	尼古拉·德·希罗卡 1342—1344年
	博格丹一世 1359—1365年	什特凡·拉克菲1344—1350年
	拉茨库　约1365—约1374年	托马·乔尔 1351年
弗拉第斯拉夫—弗拉伊库 1364—1377年	马尔加雷塔　约1374—1377年（摄政女王）	尼古拉·康特 1351—1356年
拉杜一世约1377—约1383年	彼得一世　约1374—约1392年	安德烈·拉克菲 1356—1359年
丹一世　约1383—1386年	罗曼一世　约1392—约1394年	迪奥尼西·拉克菲 1359—1367年
老米尔恰 1386年9月23日—1418年1月31日		尼古拉·拉克菲 1367—1368年
		埃梅里克·拉克菲 1369—1372年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什特凡·拉克菲 1373—1376年
	什特凡一世约1394—1399年	拉第斯拉夫·德·洛尚茨 1376—1391年
	尤加1399—1400年	埃梅里克·贝贝克 1392—1393年
僭主弗拉德1394—1397年	善人亚历山德鲁1400年2月11日—1431年12月30日	弗兰克·德·赛切尼 1393—1395年
米哈伊尔1418—1420年		
丹二世1422年8月—1431年2月(有间断)	伊利亚什1432—1433年	
	什特凡二世1433—1435年	
昏君(或糊涂虫普拉斯纳格拉瓦)拉杜二世(有间断)1421、1423、1424、1426、1427年	伊利亚什与什特凡二世(联合执政)1435—1442年	斯蒂博尔·德·斯蒂博里茨 1395—1401年
		尼古拉·恰基与尼古拉·马尔

		察利 1401—1403 年
亚历山德鲁一世(阿尔迪亚) 1431—1436 年		约翰·塔马希与亚科布·拉克菲·德·山特乌 1403—1409 年
	什特凡二世与彼得二世（联合执政）1444—1445 年	斯蒂博尔·德·斯蒂博里茨 1410—1414 年
		尼古拉·恰基 1415—1426 年
魔鬼弗拉德 1436、1442、1443、1446 年	什特凡二世 1445—1447 年	拉第斯拉夫·恰基 1426—1435 年
米尔恰　魔鬼弗拉德之子 1442 年	彼得二世与罗曼二世（联合执政）1447 年	拉第斯拉夫·恰基与彼得·切赫 1436—1437 年
巴萨拉布二世 1442—1443 年		
弗拉第斯拉夫二世 1446—1456 年	罗曼二世 1447—1448 年	彼得·切赫 1437—1438 年
		德西德里乌·德·洛尚茨 1438—1440 年
		拉第斯拉夫·亚克什 1441 年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与尼古拉·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德·乌伊拉克1441年3月7日—1446年
		埃梅里克·贝贝克 1446—1448年
	彼得二世 1448—1449年	埃梅里克·贝贝克与尼古拉·乌伊拉克 1447年
	博格丹二世 1449—1451年	埃梅里克·贝贝克与洪尼多阿拉的扬库 1448年
	彼得·阿隆 1451—1455年（有间断）	
		尼古拉·乌伊拉克与约翰·德·罗兹戈尼1450—1457年
弗拉德·采佩什 1456年4月—1462年11月	亚历山德列尔 1452—1455年（有间断）	
美男子拉杜 1462—1475年		塞巴斯蒂安与约翰·德·罗兹戈尼 1458—1460年

巴萨拉布—拉伊奥特 1473—1474年	彼得·阿隆 1455—1457年	
弗拉德·采佩什 1476年	大什特凡 1457年4月14日—1504年7月2日	塞巴斯蒂安·德·罗兹戈尼与尼古拉·德·乌伊拉克1460年
巴萨拉布—拉约特1476—1477年		
小采佩什·巴萨拉布 1477—1481年		塞巴斯蒂安·德·罗兹戈尼与拉第斯拉夫·德·康尼日阿1460年
米尔恰 1481年		
修士弗拉德 1481年		尼古拉·德·乌伊拉克与约翰·庞格拉茨·德·丁德略格 1462—1465年
小巴萨拉布 1481—1482年		
修士弗拉德 1482—1495年		西吉斯孟·德·森特焦尔吉、约翰·德·森特焦尔吉与贝尔托德·埃列尔巴赫1465—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1467年
大拉杜 1495—1508年	博格丹三世(瞎子) 1504—1517年	
恶棍米赫涅 1508—1509年		约翰·庞格拉茨与尼古拉·丘波尔·德·莫诺斯洛 1468—1472年
米尔恰 1509—1510年1月		
小弗拉德(弗勒杜茨) 1510—1512年		布拉西乌·马札尔 1473—1475年
涅戈埃·巴萨拉布 1512—1521年		约翰·庞格拉茨 1476年
特奥多西 1521年	什特弗尼策 1517—1527年	彼得·盖雷布·德·文加尔德 1478—1479年
修士弗拉德(德拉戈米尔) 1521—1522年		什特凡·巴托里 1479—1493年
阿富马茨的拉杜		拉第斯拉夫·德·洛尚茨与巴

1522—1529年(有间断)		尔托洛梅乌·德拉格菲 1493—1495年
弗拉第斯拉夫三世 1523—1525年(有间断)		巴尔托洛梅乌·德拉格菲 1495—1499年
		波得·德·森特焦尔吉 1499—1510年
拉杜·伯迪卡 1523—1524年	彼得·拉雷什 1527年1月(14日之后)—1540年9月18日	约翰·扎波利亚1510—1526年
莫伊塞 1529—1530年		彼得·德·佩雷尼 1526—1529年
溺水者弗拉德 1530—1532年	什特凡·勒库斯特 1538—1540年	什特凡·巴托里 1529—1533年
斯拉蒂纳的弗拉德·文蒂勒 1532—1535年	亚历山德鲁·科尔涅 1540—1541年	埃梅里克·齐巴克省长 1533—1534年
拉杜·帕伊西(阿尔杰什的彼得)1535—1545年	彼得·拉雷什 1541—1546年	什特凡·马伊拉特 1534—1539年
	伊利亚什二世·拉雷什 1546—1551年	什特凡·马伊拉什与埃梅里克·巴拉萨 1539—1540年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牧羊人米尔恰 1545—1559 年（有间断）		
	什特凡·拉雷什 1551—1552 年	约翰·西吉斯孟和伊萨贝拉大公 1541—1551 年
拉杜·伊利耶 1552—1553 年	伊昂·若尔迪亚 1552 年	哈布斯堡朝的斐迪南 1551—1556 年
	亚历山德鲁·勒普什涅努 1552—1561 年	约翰·西吉斯孟与伊萨贝拉 1556—1559 年
		约翰·西吉斯孟 1559—1571 年
善人珀特拉什库 1554—1557 年	暴君伊昂（海拉克利杜） 1561—1563 年	
	什特凡·托姆沙 1563—1564 年	
小彼得 1559—1568 年	亚历山德鲁·勒普什涅努 1563—1568 年	

	博格丹·勒普什涅努 1568—1572 年	
	勇敢的伊昂—伏德 1572 年 2 月—1574 年 6 月	
亚历山德鲁二世·米尔恰 1568—1577 年		
	跛子彼得 1574—1591 年(有间断)	什特凡·巴托里 1571—1583 年
		克里斯托福·巴托里总督 1576—1581 年
	伊昂·波特科阿佛 1577 年	西吉斯孟·巴托里大公 1581—1599 年
	萨克逊人扬库 1579—1582 年	
土耳其崽米赫涅1577—1583年		
		安德烈·巴里托1599 年
		勇士米哈伊 1599 年 11 月 1 日—1600 年 9 月
彼得·切尔切尔	暴君阿隆 1591—1595 年(有间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1583—1585 年	断）	
土耳其崽米赫涅 1585—1591 年	恶棍亚历山德鲁 1592—1593 年	西吉斯孟·巴托里 1601—1602 年
聋子什特凡 1591—1592 年	哥萨克彼得 1593 年	巴斯塔将军、省长 1602—1603 年
恶棍亚历山德鲁 1592—1593 年	什特凡·勒兹万 1595 年	莫伊舍·赛凯伊大公 1603 年
	耶雷米亚·莫维勒 1595—1600 年	格·巴斯塔将军、省长 1603—1604 年
勇士米哈伊1593 年 9 月—1601 年 8 月 9 日	勇士米哈伊 1600 年 5 月—9 月 27 日	
		什特凡·博察凯大公 1604—1606 年
	耶雷米亚·莫维勒 1600—1606 年	
	西蒙·莫维勒 1606—1607 年	

西蒙·莫维勒 1600—1601 年	米哈伊·莫维勒 1607 年	
拉杜·米赫涅 1601—1602 年	康斯坦丁·莫维勒 1607—1611 年	西吉斯孟·拉科齐 1606—1608 年
拉杜·舍尔班 1602—1611 年	什特凡二世·托姆沙 1611—1615 年	加布里埃尔·巴托里 1608—1613 年
		加布里埃尔·贝特兰 1613 年 10 月 23 日—1629 年 11 月 15 日
拉杜·米赫涅 1611—1616 年	亚历山德鲁·莫维勒 1615—1616 年	
加弗里尔·莫维勒 1616 年	拉杜·米赫涅 1616—1619 年	
亚历山德鲁·伊利亚什 1616—1618 年	加斯帕尔·格拉齐亚尼 1619—1620 年	
加弗里尔·莫维勒 1618—1620 年		
拉杜·米赫涅 1620—1623 年	亚历山德鲁·伊利亚什 1620—1621 年	
公子亚历山德鲁	什特凡二世·托姆沙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1623—1627年	1621—1623年	
	拉杜·米赫涅1623—1626年	
	米隆·巴尔诺夫斯基—莫维勒 1626—1629年	勃兰顿堡朝的卡特琳娜 1629—1630年
亚历山德鲁·伊利亚什 1627—1629年	公子亚历山德鲁 1629—1630年	什特凡·贝特兰1630年
列昂·托姆沙1629—1632年	莫伊舍·莫维勒 1630—1631年	格奥尔基·拉科齐一世 1630年12月1日—1648年10月11日
拉度·伊利亚什1632年	亚历山德鲁·伊利亚什 1631—1633年	
马特伊·巴萨拉布1632年9月—1654年4月9日	米隆·巴尔诺夫斯基—莫维勒 1633年	
	莫伊舍·莫维勒 1633—1634年	
	瓦西里·卢普1634—1653年	格奥尔基·拉科齐二世 1648

		年10月11日—1660年6月7日
	格奥尔基·什特凡1653年	
	瓦西里·卢普1653年	费伦茨·雷德伊 1657—1658年
	格奥尔基·什特凡 1653—1658年	阿卡齐乌·巴尔切 1658—1660年
康斯坦丁·舍尔班 1654—1658年	吉卡格奥尔基· 1658—1659年	约翰·凯门尼1661年
米赫涅三世·拉杜 1658—1659年	康斯坦丁·舍尔班1659年	
吉卡·格奥尔基 1659—1660年	什特弗尼策·卢普 1659—1661年	米哈伊尔·阿帕菲一世 1661—1690年
吉卡·格里戈雷 1660—1664年	康斯坦丁·舍尔班1661年	
拉杜·列昂1664—1669年	什特弗尼策·卢普1661年	
	欧斯特拉蒂·达比扎 1661—1665年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格奥尔基·杜卡 1665—1666 年	
	伊利亚什·亚历山德鲁 1666—1668 年	
	格奥尔基·杜卡 1668—1672 年	
波佩什蒂的安东尼 1669—1672 年	什特凡·佩特里切伊库 1672—1678 年	
吉卡·格里戈雷 1672—1673 年	杜米特拉什库·康塔库齐诺 1673 年	
格奥尔基·杜卡 1673—1678 年	什特凡·佩特里切伊库 1673—1674 年	
	杜米特拉什库·康塔库齐诺 1674—1675 年	
	安东尼·鲁塞特 1675—1678 年	

	格奥尔基·杜卡 1678—1683年	
舍尔班·康塔库齐诺1678年11月—1688年10月28日	什特凡·佩特里切伊库 1683—1684年	
	杜米特拉什库·康塔库齐诺 1684—1685年	
康斯坦丁·布伦科维亚努1688年10月28日—1714年3月24日		
	康斯坦丁·康特米尔 1685—1693年	埃梅里克·特克利 1690—1691年
	迪米特里·康特米尔1693年	格奥尔基·班菲(一世)省长 1691—1704年
	康斯坦丁·杜卡 1693—1695年	
	安蒂奥赫·康特米尔 1695—1700年	
	康斯坦丁·杜卡(杜库列茨)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1700—1703年	
	米哈伊尔·拉科维策 1703—1705年	
	安蒂奥赫·康特米尔 1705—1707年	弗兰齐斯·拉科齐二世大公 1704—1711年
	米哈伊尔·拉科维策 1707—1709年	
	尼古拉·马弗罗科尔达特 1709—1710年	
什特凡·康塔库齐诺 1714—1715年		
尼古拉·马弗罗科尔达特 1715年12月20日—1716年	迪米特里·康特米尔 1710年11月23日—1711年7月11日	
扬·马弗罗科尔达特 1716—1719年		
尼古拉·马弗罗科尔达特		

1719—1730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30年	尼古拉·马弗罗科尔达特 1711—1715年	
米哈伊尔·拉科维策 1730—1731年	米哈伊尔·拉科维策 1715—1726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31—1733年	吉卡·格里戈雷二世 1726—1733年	
吉卡·格里戈雷二世 1733—1735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33—1735年	格奥尔基·班菲(一世)省长 1691—1708年
	吉卡·格里戈雷二世 1735—1739年	
	吉卡·格里戈雷二世 1739—1741年	什特凡·哈雷国家议会议长 1709—1710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35—1741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41—1743年	
		什特凡·韦舍莱尼国家议会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议长 1710—1713 年
米哈伊尔·拉科维策 1741—1744 年	扬·马弗罗科尔达特 1743—1747 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44—1748 年	吉卡·格里戈雷二世 1747—1748 年	西吉斯孟·科尔尼斯省长 1713—1731 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48—1749 年	
	康斯坦丁·拉科维策 1749—1753 年	什特凡·韦舍莱尼国家议会议长 1731—1732 年
	吉卡·马特伊 1753—1756 年	
吉卡·格里戈雷二世 1748—1752 年	康斯坦丁·拉科维策 1756—1757 年	弗兰西斯·安东·瓦利斯、政府主席 1732—1734 年
吉卡·马特伊 1752—1753 年	吉卡·斯卡拉特 1757—1758 年	
康斯坦丁·拉科维策 1753—1756 年	伊昂·特奥多尔·卡利马基 1758—1761 年	扬·哈雷省长 1734—1755 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56—1758年	格里戈雷·卡利马基 1761—1764年	弗兰西斯·文切斯拉夫·瓦利斯政府主席 1755—1758年
吉卡·斯卡拉特 1758—1761年		
	吉卡·格里戈雷三世 1764—1767年	拉第斯拉夫·凯门尼省长 1758—1762年
	格里戈雷·卡利马基 1767—1769年	
		阿道尔夫·布科夫政府主席 1762—1764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61—1763年		
康斯坦丁·拉科维策 1763—1764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 1769年	安德烈·哈迪克政府主席 1764—1767年
什特凡·拉科维策 1764—1765年	吉卡·格里戈雷二世 1774—1777年	
吉卡·斯卡拉特 1765—1766年		卡罗尔·奥顿内尔政府主席 1767—1770年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吉卡·亚历山德鲁·斯卡拉特 1766—1768 年		
吉卡·格里戈雷二世 1768—1769 年		马丽亚—约瑟夫·奥埃尔斯彼格政府主席 1771—1774 年
伊曼努尔·贾尼—鲁塞特 1770—1771 年		
亚历山德鲁·伊普西兰蒂 1774—1782 年		萨米尔·布鲁肯塔尔政府主席 1774—1777 年;省长 1776—1787 年
尼古拉·卡拉佳 1782—1783 年	康斯坦丁·莫鲁齐 1777—1782 年	
米哈伊尔·苏楚 1783—1786 年	亚历山德鲁·康·马弗罗科尔达特 1782—1785 年	
	亚历山德鲁·伊·马弗罗科尔达特 1785—1786 年	
	亚历山德鲁·伊普西兰蒂	

	1787—1788 年	
	伊曼努尔·贾尼—鲁塞特 1788—1789 年	
尼古拉·马弗罗盖尼 1786—1790 年		
米哈伊尔·苏楚 1791—1793 年		
亚历山德鲁·莫鲁齐 1793—1796 年		
亚历山德鲁·伊普西兰蒂 1796—1797 年	亚历山德鲁·莫鲁齐 1792 年	
康斯坦丁·汉格尔利 1797—1799 年	米哈伊尔·苏楚 1792—1795 年	
亚历山德鲁·莫鲁齐 1799—1801 年	亚历山德鲁·卡利马基 1795—1799 年	
米哈伊尔·苏楚 1801—1802 年	康斯坦丁·伊普西兰蒂 1799—1801 年	
亚历山德鲁·苏楚代君主	亚历山德鲁·苏楚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1802年	1801—1802年	
康斯坦丁·伊普西兰蒂 1802—1806年	亚历山德鲁·莫鲁齐 1802—1806年	
亚历山德鲁·苏楚 1806年	斯卡拉特·卡利马基 1806年	
康斯坦丁·伊普西兰蒂 1807年	亚历山德鲁·莫鲁齐 1806—1807年	
伊昂·格奥尔基·卡拉佳 1812—1818年	亚历山德鲁·汉格尔利 1807年	格奥尔基·班菲（二世）政府主席 1787—1822年
亚历山德鲁·苏楚 1818—1821年	斯卡拉特·卡利马基 1807—1810年	
斯卡拉特·卡利马基 1821年	斯卡拉特·卡利马基 1812—1819年	约翰·约希卡政府主席 1822—1834年
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革命运动领袖 1821年3月，5月14日	米哈伊尔·苏楚 1819—1821年	

土军占领期间 1821—1822 年

吉卡·格里戈雷·迪米特里 1822—1828 年	扬·桑杜·斯图尔扎 1822—1828 年

俄军占领期间 1828—1834 年

吉卡·亚历山德鲁 1834—1842 年	米哈伊尔·斯图尔扎 1834—1840 年
格奥尔基·比贝斯库 1842—1848 年	
临时政府 1848—1849 年	
巴尔布·什蒂尔贝伊 1849—1856 年	吉卡·格里戈雷·亚 1849—1856 年

斐迪南·戴斯特政府主席 1835—1837 年

约翰·科尔尼斯省长 1838—1840 年

约瑟夫·泰勒基1842—1848年

埃梅里克·米科政府主席 1849 年

路德维希·伏尔格穆特省长 1849—1851 年

卡尔·布·施瓦尔岑贝格政府主席 1851—1858 年

罗马尼亚国	摩尔多瓦	特兰西瓦尼亚
奥军占领期间 1854—1856 年		
俄军占领期间 1853—1854 年		
吉卡·亚历山德鲁代君主 1856—1858 年	特奥多尔·巴尔什代君主 1856—1857 年 尼古拉·沃戈里德代君主 1857—1858 年	
		弗里德里希·冯·利希滕斯坦因 1858—1861 年 埃梅里克·米科政府主席 1860—1861 年
三人督政府 1858—1859年 { 扬库·曼努；伊曼诺伊尔·伯列亚努；伊昂·菲利佩斯库 }	三人督政府 1858—1859年 { 什特凡·卡塔尔朱；瓦西里·斯图尔扎；阿纳斯塔塞·帕努 }	路德维希·福利奥特·德·克伦内维勒政府主席 1861—1867 年

罗马尼亚联合后的大公和国王

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 1859—1866 年
霍亨索伦王朝的卡罗尔一世 1866—1914 年
斐迪南一世 1914—1927 年
米哈伊一世(皇后摄政) 1927—1930 年
卡罗尔二世 1930—1940 年
米哈伊一世 1940—1947 年

1948 年后共和国历届主席

康斯坦丁·伊·巴洪博士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 1948—1952 年
彼得罗·格罗查博士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1952—1958 年
扬·格奥尔基·毛雷尔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1958—1961 年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1961—1965 年
基伏·斯托伊卡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会员主席 1965—1967 年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1967 年—

附录二　罗马尼亚历史年表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　界　历　史　事　件
约公元前60万年	我国领土上出现人 旧石器时代始初	约公元前60万年	旧石器时代始初
约公元前1万年	中石器时代始初	约公元前7000年	近东的新石器时代始初
约公元前5500年	新石器时代始初	约公元前3500年	埃及形成国家
约公元前1900年	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始初	约公元前2000年	克里特岛形成国家
约公元前1700年	青铜时代始初	公元前1600年	迈锡尼形成国家
公元前700年	第一代铁器始初	公元前8世纪	雅典国家出现；希腊大殖民始初
		公元前753年	罗马的奠立
		公元前621年	雅典德累科法
公元前7世纪末	希斯特里亚殖民地奠立		

约公元前 600 年	斯基特人深入特兰西瓦尼亚	公元前594年	雅典梭伦改革
公元前 514 年	大琉士远征斯基特人及葛特人的抵抗	公元前509年	雅典克来斯忒尼斯改革。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
		公元前492—449年	希波战争
		公元前431—404年	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 339 年	葛特人对阿提亚斯之战		
公元前 335 年	亚历山大·马其顿征略多瑙河	公元前336—323年	亚历山大·马其顿
约公元前 300 年	第二代铁器始初	公元前 3 世纪初	古希腊诸主要国家建成
	凯尔特人深入特兰西瓦尼亚。在德鲁米凯特斯领导下的部落联盟及其与莱辛马卡斯之战		
		公元前218—201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
		公元前148年	马其顿变为罗马行省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　界　历　史　事　件
公元前 2 世纪初	赖马克索斯、奥罗勒斯和鲁博博斯特斯的部落联盟	公元前133—121年	提·格拉古和盖·格拉古兄弟的活动
公元前82年	布雷比斯塔登位	公元前82—79年	苏拉的独裁
公元前74年	罗马军队（库里奥）出现于多瑙河畔	公元前73—71年	斯巴达克起义
公元前72—71年	卢库卢斯征略多布罗加		
公元前60(59)年	布雷比斯塔与凯尔特人之战	公元前60年	罗马的前三头
公元前55年后	布雷比斯塔占领黑海沿岸	公元前58—51年	恺撒征服高卢
公元前48年	阿科尔尼翁奉命往见庞培	公元前48年	庞培失败并被杀；恺撒出任罗马独裁官
公元前44年	布雷比斯塔被杀	公元前44年	恺撒被杀
公元前44—？	特兰西瓦尼亚达契亚国家的德凯尼乌王朝　科提索、科松、狄科梅斯、罗勒斯、达皮克斯和齐拉克塞斯建于达契亚其他地区的部落	公元前43—31年	罗马内战。屋大维于阿克提乌姆之役的胜利（公元前31年）

	联盟或小国		
公元前28年	克拉苏斯征服多布罗加		
公元前1世纪末—公元1世纪初	特兰西瓦尼亚达契亚国家的科莫西库斯朝	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	奥古斯都王朝
公元11—12年	卡图斯征略蒙特尼亚平原		
公元29(?)—69年(?)	特兰西瓦尼亚达契亚国家的斯科里洛王朝		
		公元14—37年	提贝里乌斯
公元46年	多布罗加并入美西亚省		
		41—54年	克劳狄乌斯
公元69(?)—87年	特兰西瓦尼亚达契亚国家的杜拉斯—狄乌尔帕尼乌斯王朝		
公元85—86年	达契亚人攻入美西亚	81—96年	多米提亚努斯
公元87年	德凯巴鲁斯登位。达契亚诸部落重新统一		
公元87—89年	德凯巴鲁斯与多米提亚努斯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之战		
		98—117年	图拉真
公元101—102年	图拉真的第一次达契亚战争。罗马人占领达契亚部分领土		
公元105—106年	图拉真的第二次达契亚战争。德凯巴鲁斯自杀，达契亚国家的废除与达契亚省的建立(106年)	114—117年	图拉真的帕尔提亚战争
公元108—110年	建立奥古斯都达契亚乌尔皮亚—图拉真城(殖民地)(后来也称萨尔米泽杰图萨)		
公元118年	罗马达契亚的改组：建立上达契亚省和下达契亚省	117—138年	阿德里亚努斯
公元124年	建立波罗利森达契亚	138—161年	安托尼乌斯·拔乌斯
公元167—170年	玛尔科曼尼战争蔓延至达契		

	亚境内或其边界		
公元168年	通过上、下达契亚合并建立阿普伦达契亚	161—180年	玛尔库斯·奥列里乌斯
公元169年	在巴纳特建立马尔文达契亚省	166—180年	玛尔科曼尼战争
公元170年	科斯托博契部落侵入多布罗加		
2世纪末—3世纪初	构筑边界(limes transalutan)	180—192年	康莫都斯
		193—211年	塞普提米乌斯·谢维路斯
		211—217年	卡拉卡拉
		212年	公民权敕令(Constituo Antoniniana)
公元222—235年之间	建立三个达契亚省议政会议。萨尔米泽杰图萨取得京都称号	217—218年	玛克里努斯
		218—222年	埃拉伽巴路斯
		222—235年	亚历山大·谢维路斯

日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期	世界历史事件
公元242年	打退卡尔皮部落对下美西亚和达契亚的攻略	235—238年	玛克西米努斯·色雷斯人
		238—244年	戈尔狄亚努斯第三
公元245年	打退卡尔皮部落对达契亚的攻略		
		244—249年	菲利浦·阿拉伯人
		249—251年	戴克优斯
		251—253年	特列波尼亚努斯·伽路斯
公元271—272年	罗马行政机关和军队撤离达契亚。先封建时期开始	253—268年	伽里耶努斯
		268—270年	克劳狄乌斯第二·哥特人
公元4世纪初	多布罗加脱离下美西亚省并变为名为斯基提亚的独立行省	270—275年	奥列里亚努斯
		284—305年	狄奥克列齐亚努斯。君主制（多米那特）的建立

		306—307年	康士坦提努斯
公元4世纪初	罗马帝国再度占领多瑙河北部一个地区		
公元4世纪上半期	西哥特人深入特兰西瓦尼亚		
		395年	罗马帝国分裂
公元5世纪初	匈奴人征略罗马尼亚领土		
		410年	西哥特人国王阿拉里克洗劫罗马
公元5世纪中叶	东哥特人深入特兰西瓦尼亚		
公元6世纪	斯拉夫人深入外喀尔巴阡山地区以及格庇第人深入特兰西瓦尼亚	476年	西罗马帝国陷落
		527—565年	查士丁尼
公元6世纪末	阿瓦尔人深入特兰西瓦尼亚		
公元602年	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占领多布罗加	634—650年	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
公元7世纪中叶	斯拉夫人深入特兰西瓦尼亚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公元679—680年	保加利亚人深入多瑙河南岸	771—814年	查理大帝
公元7—9世纪	罗马尼亚部落和罗马尼亚语形成	9世纪（末期）	马札尔部落居留于埃特尔克兹
9—10世纪	特兰西瓦尼亚的诸罗马尼亚—斯拉夫人总督辖区	896—900年	马札尔部落居留于潘诺尼亚
9—10世纪	德伯卡堡和比哈里亚堡		
		约900年	萨勒诺医科学校建立
9世纪（末期）	佩彻涅格人居留于我国领土		
		906年	基辅公爵奥列格征略拜占庭
10世纪（初期）	马札尔部落深入特兰西瓦尼亚及其与罗马尼亚—斯拉夫人总督格拉德，梅努莫鲁特和杰卢的战争		
		910年	克柳尼修道院建立
943年	多布罗加的迪米特里老爷	911年	诺曼底公国奠立
10世纪（下半期）	下多瑙河的诸政治形态	919年	萨克逊王朝的亨利（捕鸟者）

969—976年	拜占庭统治扩展至多瑙河
10世纪	建于四世纪初的康斯坦齐亚居留地（阿尔杰什河流入多瑙河处）
10世纪	拜占庭的太阳之城珀库尤堡（多布罗加）
10—11世纪	莫里塞纳“城——”切纳德（巴纳特）
1002—1003年	巴纳特总督阿赫图姆和特兰西瓦尼亚总督季拉与圣什特凡大帝（匈牙利国王）之

	当选为法兰克人国王
955年8月10日	马札尔人败于勒克河
962年	鄂图一世登极为帝
966年	斯维亚托斯拉夫公爵征伐拜占庭
966年	法蒂玛王朝征服埃及
972年	开罗穆罕默德大学建立
987年	于果·卡佩当选为法兰西国王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战		
		989年	弗拉基米尔大公皈依基督教
1018年	拜占庭管区帕拉杜纳冯或帕里斯蒂隆（多瑙河畔）建立	994年	开始建筑奥格斯堡圆顶大教堂
		1018年	拜占庭消灭保加利亚王国
11世纪（中叶）	库曼人居留于我国领土	1028年	丹麦人征服挪威
1068年	匈牙利国王索洛蒙与佩彻涅格人的基拉列什之战	1066年	哈斯丁斯会战。诺曼人征服英格兰
11世纪（末期）	马札尔国家的统治扩展至特兰西瓦尼亚	1070年	坎特伯雷大教堂奠基
		1071年	拜占庭在意大利统治的结束
		1075—1122年	教廷与德意志帝国的第一次战争（授职权斗争）
11世纪（末叶）	多布罗加的诸酋长——塔托斯（或称卡利斯）、塞斯拉	1077年1月25—28日	亨利四世在卡诺沙堡向教皇忏悔

	夫和萨家与拜占庭人的斗争		
		1084年	亨利四世皇帝占领罗马
		1086年	《末日审判》(《Dornesday Book》)英格兰《土地调查清册》
12世纪(初叶)	开始建筑阿尔巴—尤利亚教堂		
约1150年	塞凯伊人定居于特兰西瓦尼亚和萨克逊人移居特兰西瓦尼亚	1096—1099年	第一次十字军
		1100年	《罗兰之歌》编成
		1119年	波伦亚大学建立
12世纪	特兰西瓦尼亚总督辖区组成	1122年	窝姆斯协定
		1143—1155年	罗马人民起义(由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尔多领导)
1161年	贝尔拉德的军队围攻第聂伯河上的奥列西亚堡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147—1149年	第二次十字军
1164年	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人抓住逃亡者安德洛奈卡·康乃奴	1155年	开始建造克里姆林宫
		1161年	德国诸城市的汉撒同盟的发端
		1163—1320年	建造巴黎圣母院
1166年	曼努伊·康乃奴皇帝军队中的多瑙河畔罗马尼亚人	1163—1193年	埃及统治者萨拉赫哀丁（萨拉丁）
		1176年	开始建筑塞维利亚的阿尔卡扎尔教堂
		1176—1493年	建造斯特拉斯堡圆顶大教堂
		1185年	保加利亚—瓦拉几亚人的反拜占庭起义；第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王国
1208—1235年	包括盖有火印的审判纪录的	1189—1192年	第三次十字军

	《奥拉迪亚审案录》		
		1197年	条顿骑士团建立
		1202—1204年	第四次十字军
		1204年	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
1210年	锡比乌郡守约瓦基姆率罗马尼亚人、塞凯伊人、萨克逊人和佩彻涅格人组成的军队援助维丁王阿桑·鲍利勒	1204—1261年	东拉丁帝国
		1206年	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人大可汗
1211年5月7日	条顿骑士移住伯尔萨国	1212年	儿童十字军
		1215年	牛津大学建立
		1215年	巴黎大学建立
1222年5月7日	弗格拉什国的罗马尼亚人国家(terra Blachorum)	1215年	英格兰自由大宪章
		1217—1221年	第五次十字军
1222年12月19日	摩尔多瓦南部的布罗德人国	1218年	蒙古人占领中国西部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家		
		1222年	匈牙利国王安德烈二世的黄金诏书
		1223年	俄罗斯人与蒙古人的卡尔卡河会战
1224年	授予萨克逊人的安德烈敕书	1225—1274年	圣托马斯·阿奎那
1225年	条顿骑士被逐出伯尔萨国	1225—1274年	建造维也纳圣斯蒂芬圆顶大教堂
1227年7月31日	建立摩尔多瓦南部的库曼主教区	1228—1229年	第六次十字军
		1229年	剑桥大学建立
1241年(以前)	史料提及阿尔巴—尤利亚、锡比乌、克鲁日和奥拉迪亚诸城		
		1238年	鞑靼人占领弗拉基米尔
1241年	鞑靼—蒙古人大入侵		

1241年	内格鲁—罗马尼亚人国的米斯切拉乌和利图阿国的贝泽雷姆班与鞑靼人的战斗		
		1241年4月11日	鞑靼—蒙古人与马札尔人的莫希之战
		1243年	金帐汗国建立
1247年	奥拉哈公爵朝见金帐汗		
		1252年	俄罗斯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1247年	开始重建阿尔巴—尤利亚大教堂	1260年	马木留克集团在埃及的统治的开始
1247年7月2日	约翰骑士敕书提及的罗马尼亚诸政治形态：塞维林国、约翰和弗尔卡什公国、利托伏伊和塞内斯拉乌总督辖区	1265年	英国开始实行议会制
		1265—1321年	意大利诗人阿利吉里·但丁
		1271—1292年	马哥孛罗游历中国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277年	罗马尼亚人总督利托伏伊和伯尔巴特与匈牙利国王库曼人拉第斯拉夫军队之战		
1277年	摩尔多瓦北部的罗马尼亚人与鲁特尼亚人之战		
1288年6月8日	文献首次提及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议会		
		1291年	瑞士诸古邦联盟
		1296—1421年	建造佛罗伦萨圆顶大教堂
		1301年	阿尔帕德王朝覆灭
1300年	肯普隆镇（Longo Campo）和巴亚镇(Civitas Moldaviae)		
		1300—1389年	波斯诗人哈菲兹
		1302年	召开法兰西三级会议
1300年1月6日	马拉穆列什国	1304—1374年	意大利诗人佛朗西斯科·佩

			脱拉克
1307年	摩尔多瓦北部的罗马尼亚人国家(Wlachenlandt)	1309—1442年	建造威尼斯执政宫
1317年	老巴萨拉布与查理·罗伯特国王发生冲突		
1330年10月	查理·罗伯特国王的军队攻袭阿尔杰什堡	1317—1375年	意大利作家乔凡尼·薄伽丘
1330年11月9—12日	巴萨拉布与查理·罗伯特的波萨达之战		
1342—1359年10月21日	马拉穆列什总督博格丹进行反对匈牙利国王的斗争		
1346年	多布罗加的领袖巴利卡与拜占庭发生战争		
1352—1353年	摩尔多瓦“马克”首领、马拉穆列什总督德拉戈什	1337—1453年	英法百年战争
1359年	博格丹转入摩尔多瓦并被推举为该国君主	1347年	科拉·迪·里恩洛领导的罗马起义
		1348年	布拉格查理大学建立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359年5月	设立罗马尼亚国大主教区		
1364—1365年	摩尔多瓦赢得独立	1354年	土耳其人占领加利坡利城
1366年	多布罗加“王”多布罗提奇	1358年	法国扎克雷起义
		1359年	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顿斯科伊
1368—1459年	建筑克鲁日圣米哈伊尔教堂		
		1364年	克拉科夫大学建立
1369年8月	弗拉第斯拉夫—弗拉伊库对阿姆拉什和弗格拉什的统治		
		1365年	维也纳大学建立
1373年	克鲁日雕刻家马丁和格奥尔基的作品圣格奥尔基雕像完成	1376年	约翰·威克里夫的改革开始
		1378—1417年	英国教会中的大分裂
1376年11月9日	保存于特兰西瓦尼亚的最早		

	的行会条例		
		1381年	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
		1386年	海得尔堡大学建立
1387—1388年	科齐亚修道院教堂	1389年	土耳其人与塞尔维亚人的科索沃原野之役
1388年	老米尔恰统治多布罗加	1390—1441年	佛莱米画家让·望·耶克
1390年12月10日	老米尔恰与波兰国王弗拉第斯拉夫·雅盖洛缔结卢布林条约	1394年	瑞士诸邦赢得独立
1394年10月10日	老米尔恰取得罗维内之战的胜利		
		1396年	土耳其人与“十字军”的尼科坡里之战
1394—1396年	僭主弗拉德觊觎罗马尼亚国君位的活动		
1395年3月7日	老米尔恰与卢森堡朝的西吉斯孟签订同盟条约		
		1400—1468年	哲学家、发明家约翰·哥敦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堡
		1402年	蒙古人与土耳其人的安卡拉之战
1405年	特兰西瓦尼亚的许多城市兴建城墙		
		1402年	布拉格的教授扬·胡司
		1410年7月15日	摩尔多瓦人参与的波兰与条顿骑士的格吕瓦尔德会战
1412年	土耳其人占领多布罗加并将其划为桑札克	1412年	波兰、匈牙利和立陶宛的卢布林条约
		1414—1418年	康斯坦萨教务会议
		1415年	扬·胡司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1415年	老米尔恰向土耳其人纳贡		
		1415年	英法阿金库尔战役
1417年	土耳其人占领上尔努和朱尔		

	朱拜将共划为拉亚		
1417年	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的农民起义	1418—1428年	布鲁涅勒斯奇建造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大圆顶
		1419—1434年	胡司战争
		1422年	摩尔多瓦人参与的波兰与条顿骑士的马里恩堡战役
		1431年	女英雄贞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1436—1476年	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雷吉奥蒙坦努斯
1437年(春)	博伯尔纳起义		
1437年9月16日	“三民族联盟”	1437年	《圣经》首次译成马札尔文
1438年1月	博伯尔纳起义结束		
		1439年	土耳其人占领塞尔维亚
		1441年	佛罗伦萨图书馆开放
1442年3月18日	土耳其人与洪尼多阿拉的扬库的森丁布鲁会战		
1442年3月22日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于锡比乌		

日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期	世界历史事件
	附近大胜土耳其人		
1442年9月2日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于雅洛米察击败土耳其人		
1443年7月22日—1444年1月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长驱直入巴尔干半岛	1443—1468年	乔治·卡斯特里奥特·斯坎德培领导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奥斯曼斗争
1444年11月10日	瓦尔纳之战		
1446年6月5日—1452年9月4日	匈牙利摄政王洪尼多阿拉的扬库	1445年	约翰·哥敦堡于美因兹建立印刷所
1448年10月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与土军的科索沃原野大战		
1452年	建筑洪尼多阿拉宫堡	1452—1519年	意大利艺术家列奥纳多·达·芬奇
1456年3—5月	摩尔多瓦君主彼得·阿隆向土耳其人纳贡	1453年	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
1456年7月22日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于贝尔格	1455—1485年	英国红白玫瑰战争

	莱德胜土军		
1456年8月11日	洪尼多阿拉的扬库逝世		
1459年9月20日	文献首次提到布加勒斯特人	1459年	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建立
1462年6月16日	弗拉德·采佩什于特尔戈维什特胜土军	1463—1494年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1465年1月25日	大什特凡攻占基利亚和白堡		
1466年7月10日	建造普特纳修道院	1466—1536年	人文主义者鹿特丹的爱拉斯谟
1467年12月14—15日	大什特凡于巴亚战胜马特伊·科尔文	1469—1527年	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弗利
1470年8月20日	大什特凡于利布尼克战胜鞑靼人	1473—1534年	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
1475年1月10日	大什特凡于瓦斯卢伊胜土军	1475—1564年	伟大的意大利艺术家米开兰基罗·博纳罗蒂
1475年7月12日	大什特凡与马特伊·科尔文签订同盟条约	1478年	德国皇帝腓特烈三世与马特伊·科尔文的奥尔米茨和约
1476年7月20日	土军于战地村战胜大什特凡	1478—1535年	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　界　历　史　事　件
			尔
1479年10月13日	阿尔迪亚尔人于珀伊内原野战胜土军	1479年	奥斯曼统治阿尔巴尼亚
1479年	«杜布尼克编年史»(«Cronicon Dubnicense»)	1485年	马特伊·科尔文占领维也纳
		1488—1523年	德国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登
1484年6月14—16日	土军占领基利亚和白堡并将其划为拉亚	1492年	格拉纳达从阿拉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
		1492年	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往美洲的首次探险
1493—1508年	罗马尼亚血统的伟大人文主义者尼古拉·奥拉胡斯		
1495年			
		1494—1553年	人文主义作家弗朗苏瓦·拉伯雷
1495年	布拉索夫斯凯伊的罗马尼亚	1495—1508年	萨服纳罗拉领导的反对教廷

	学校		的起义
1496年	《魔鬼—伏德记事》	1495年	安东·邦菲尼的著作:《匈牙利王国之衰落》(Rerum Hungaricarum decades)
1497年10月26日	大什特凡于科斯明森林打败波兰军	1496—1497年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最后的晚餐》
1498—1542年	伟大的特兰西瓦尼亚人文主义者约翰·洪特鲁斯	1497—1498年	华斯哥·达·加马游历印度
1499年7月12日	大什特凡与波兰国王约翰·阿尔贝特签订条约	1499—1500年	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远征
15世纪末、16世纪初	最早的罗马尼亚文译作	1501—1504年	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旅行
15世纪末、16世纪初	摩尔多瓦宫廷编年史及其五种改写本:《无名氏纪事》、《普特纳纪事》、《摩尔多瓦—德国编年史》,《摩尔多瓦—波兰编年史》和《摩尔多瓦—俄国编年史》	1501—1504	米开兰基罗的雕像:《大卫》

日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期	世界历史事件
		1506年	布拉曼特关于圣彼得大教堂的最初计划
1508年	印刷术传入罗马尼亚国，我国第一部印刷品（《弥撒经》）	1508年	教皇，德国皇帝和法国国王的康布雷同盟
1510—1574年	阿尔迪亚尔的人文主义者加斯帕尔·赫尔泰		
1514年4月16日	教皇列昂十世宣布组织反奥斯曼十字军	约1515年	拉斐尔的画：《西克斯丁圣母》
1514年5月15日	格奥尔基·多扎领导的起义开始	1516年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
1514年10—11月	布达国会通过将农民附着在土地上的法案，以惩罚农民参加起义		
		1517年	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

1517年8月17日	阿尔杰什宫大教堂列为圣地	1517年	韦尔伯齐的《三部法》在维也纳印刷
1525年	锡比乌的一所高等学校建立(Studium generale)	1519—1522年	麦哲伦的环球旅行
1525—1529年	阿富马茨的拉杜与多瑙河地区土军的十九次战斗	1519年	查理第五被选为德皇
1526—1527年	约凡·内纳达领导下的反奥斯曼、反封建的起义	1524—1526年	德国农民战争
1529年6月22日	摩尔多瓦军队于费尔迪瓦拉战胜哈布斯堡军	1524—1585年	法国诗人皮埃尔·龙沙
约1530—1583年	助祭科雷西	1525—1526年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矿工起义
1530年	印刷术传入特兰西瓦尼亚(锡比乌)	1526年	土军与马札尔军的摩哈兹会战
1531年8月22日	波军于奥别尔丁打败彼得·拉雷什	1528年	萨文黎学说在伯尔尼得到承认
1535年	布拉索夫印刷所建立	1529年	康布雷和约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535年	土军占领布勒伊拉并将其划为拉亚	1530年	士马尔卡登新教同盟
1535年	彼得·拉雷什与哈布斯堡朝的斐迪南签订同盟条约	1532年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写作《霸术》
1538年2月24日	约翰·扎波利亚与哈布斯堡朝的斐迪南签订奥拉迪亚和约	1534年	英国宗教改革的开始
1538年	土军占领提吉纳并将其划为拉亚	1534年	耶稣会团成立
1539年	西尔维斯特尔·亚诺什的《拉丁—马札尔语词典》	1536年	让·加尔文的神权政治共和国
1541年	特兰西瓦尼亚自治公国形成	1541年	土军占领布达并将匈牙利中部划为土耳其巴夏辖区
1541年	阿尔迪亚尔人与哈布斯堡朝的斐迪南的季勒乌协定	1541—1614年	希腊血统的西班牙画家埃尔·格雷科
1544年	以罗马尼亚文印刷的第一部		

	书。锡比乌的《教理问答》		
1545年	克鲁日的新教学校建立		
1550年	克鲁日的加斯帕尔·赫尔泰印刷所建立	1546—1576年	建造巴黎罗浮宫
1551—1556年	哈布斯堡占领特兰西瓦尼亚	1548—1600年	意大利唯物主义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
1552年7月26日	土军占领蒂米什瓦拉并将巴纳特的一部分划为巴夏辖区	1551年	索西努斯的学说在波兰传播
1556年	一神教派主教大卫·费伦茨	1561—1626年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
1558年	路德教派在特兰西瓦尼亚获得承认	1562—1598年	法国宗教战争
1561年	迈利乌斯·尤哈斯·彼得的传道	1562—1635年	西班牙剧作家洛普·德·维加
1562年4月	塞凯伊人起义	1564—1616年	英国剧作家威廉·沙士比亚
1562年	暴君—伏德建立科特纳里拉	1564—1642年	意大利物理学家加利列奥·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丁语学校		伽利略
1564年	罗马尼亚文的最早文学作品：《讲道书》	1568—1639年	意大利哲学家托马斯·康帕内拉
1565年	特兰西瓦尼亚一所大学院的建校蓝图	1569年	波兰和立陶宛重新合并（Reczpospolita Polska）
1569年	格奥尔基·克勒琼领导下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起义	1571年	反奥斯曼同盟勒庞托之战获胜
		1572年	巴黎圣巴托罗缪之夜
		1572—1573年	马特伊·古贝茨领导下的斯洛文尼亚农民起义
1574年4月24日	伊昂一伏德于日利什特战胜土军	1577—1581年	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环球旅行
1574年6月14日	土军于罗什卡尼打败伊昂—伏德	1577—1640年	佛来米画家保罗·彼得·鲁本斯
1575年	加斯帕尔·赫尔泰的著作：《马札尔编年史》	1579年	乌得勒支反西班牙同盟

1581年	什特凡·巴托里建立克鲁日耶稣会大学	1581年	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占领葡萄牙
1594年	勇士米哈伊的反奥斯曼战争开始	1581年	荷兰独立
1595年5月10日（20日）	勇士米哈伊的使臣与特兰西瓦尼亚大公西吉斯孟·巴托里签订阿尔巴一尤利亚条约	1588—1679年	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
		1588年	西班牙“无敌舰队”覆没
1595年8月13日（23日）	勇士米哈伊于克卢格雷尼战胜土军	1590年	称为“基督教同盟”或“神圣同盟”的反奥斯曼同盟组成
1595—1596年	罗马尼亚国的将农民附着于土地上的法令	1596—1650年	法国哲学家勒奈·笛卡儿
1598年	土耳其人承认罗马尼亚国独立	1598年	南特敕令——法国的宗教自由
1599年10月18日（28日）	勇士米哈伊于舍林伯尔战胜安德烈·巴托里	1599年	托马斯·康帕内拉领导的卡拉布里亚起义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599年11月1日	勇士米哈伊进入阿尔巴—尤利亚，成为特兰西瓦尼亚大公	1599—1641年	佛来米画家安东尼·宛—戴克
1600年5月	勇士米哈伊攻占摩尔多瓦	1600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0年9月18日	勇士米哈伊于米勒斯勒乌战役失利		
		1602年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
1600年11月	勇士米哈伊在罗马尼亚国与波兰人作战中失利		
		1605—1615年	塞万提斯的作品《堂·吉诃德》
1601年8月3日（13日）	勇士米哈伊于古鲁斯勒乌战斗中获胜	1606—1684年	法国剧作家皮埃尔·高乃依
1601年8月9日（19日）	勇士米哈伊于图尔达附近被巴斯塔部下刺杀	1608年	新教同盟成立
		1608—1647年	意大利物理学家埃万杰利斯

			塔·托里彻利
1603年7月17日	拉杜·舍尔班于布拉索夫附近战胜莫伊塞·赛凯伊	1608—1674年	英国诗人约翰·密尔顿
1607—1608年	西部地区的绿林好汉起义	1609年	天主教同盟成立
		1618—1647年	三十年战争
		1619年	美洲的第一个代议制议会
1611年7月8日	拉杜·舍尔班于布拉索夫附近战胜加布里耶尔·巴托里	1621—1695年	法国诗人让·拉封登
		1622—1673年	法国剧作家莫里哀
1622年	阿尔巴—尤利亚学院建立	1623—1662年	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布列兹·帕斯卡尔
1622年	加布里耶尔·贝特兰与哈布斯堡签订尼科尔斯堡和约	1624—1642年	黎塞留统治法国
		1626年	新阿姆斯特丹(纽约)的建立
1628年1月16日（26日）	摩尔多瓦的将农民附着在土地上的法令	1632—1677年	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沙
		1632—1704年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628—1629年	加布里耶尔·贝特兰建立达契亚王国的计划	1635年	法兰西科学院成立
		1639—1690年	法国剧作家让·拉辛
1639年5月6日（16日）	雅西三圣教堂举行圣礼		
		1640年	葡萄牙脱离西班牙
1639年11月	马特伊·巴萨拉布于奥若杰尼和内尼绍里之间战胜瓦西里·卢普		
		1640—1652年	西班牙“收割者战争”
1640年	雅西“瓦西里学院”建立	1642—1658年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642—1647年	格里戈雷·乌雷凯撰写《摩尔多瓦国纪事》	1642—1727年	英国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
1643年	瓦尔拉姆的《传道书》于雅西出版	1642—1666年	波斯阿拔斯二世沙法维王朝

1646年	法典《罗马尼亚训谕》于雅西问世	1644—1711年[1]	清朝
1646年	特尔戈维什特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学校”建立	1646—1716年	德国哲学家哥·威廉·莱布尼茨
1648年	马特伊·巴萨拉布充任主角的反奥斯曼同盟成立		
1648年	什特凡·西蒙主教翻译的《新约》于伯尔格拉德（阿尔巴—尤利亚）出版		
		1648年	威斯特发利亚和约
1650—1665年	乔治·克劳斯写作《特兰西瓦尼亚编年史》	1649—1660年	不列颠联邦
1652年	《法律规范》杂志在特尔戈维什特出版	1651年	“航海条例”
1653年5月17日（27日）	马特伊·巴萨拉布于芬塔战胜瓦西里·卢普	1652—1654年	英荷战争

① 原文有误，应为1911年。——译者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653年	阿帕蔡·柴雷·亚诺什的《马札尔百科全书》出版		
1653年	《特兰西瓦尼亚法律审编》问世	1653—1658年	克伦威尔的护国政府
1654—1655年	罗马尼亚国和摩尔多瓦的莊丁队人民运动	1653—1659年	克罗地亚农民起义
1655年	罗马尼亚三国联盟	1651年①	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
1657年1—7月	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灾难性的向波兰进军	1654—1660年	波兰—瑞典战争
1658年	奥斯曼进军特兰西瓦尼亚		
1659年9月12日	罗马尼亚国君主拉杜·米赫涅的反奥斯曼起义		
1660年5月22日	土军与拉科齐·格奥尔基二世的弗洛雷什蒂之战		
1660年8月28日	土军占领奥拉迪亚并建立奥拉迪亚巴夏辖区	1661—1676年	艾罕默德·科普柳留的维齐尔执政

1661年	奥地利将军蒙特库科利征略特兰西瓦尼亚	1661—1689年	建造凡尔赛宫
1663—1664年	约翰·贝特兰的著作《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四篇文辑》	1661—1683年	法国的让·巴·科尔伯执政
		1662年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
1669年	《特兰西瓦尼亚法律大全》出版		
		1664年	法国东印度公司成立
1670年	马蒂亚斯·米勒斯的著作《特兰西瓦尼亚守护神》		
		1664—1667年	英荷战争
1671—1672年	摩尔多瓦的农民和市镇居民反对杜卡—伏德的起义		
		1667—1668年	路易十四征略比利时
1675年	米隆·科斯丁写完《摩尔多瓦国纪事》	1670—1671年	斯捷潘·拉晋领导的农民战争

① 原文有误，应为1654年。——译者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675—1678年	尼古拉·米勒斯库撰写《亚洲写实》和《中国游记》	1672—1678年	法荷战争
1684—1690年	沃尔夫冈·贝特兰的著作《特兰西瓦尼亚人的历史》问世	1673—1679年	法奥战争
		1675—1710年	建筑伦敦圣保罗大教堂
1686—1691年	米隆·科斯丁撰写《摩尔多瓦人血统》	1676—1683年	卡拉·穆斯塔法的维齐尔执政
1687年10月27日	米哈伊尔·阿帕菲与哈布斯堡人签订布拉日条约	1679年5月27日	英国的人身保护法
1688年5月9日	特兰西瓦尼亚国会接受哈布斯堡统治	1682年	俄国火枪兵起义
1688—1716年	御膳房总管康斯坦丁·康塔库齐诺撰写《罗马尼亚国史》	1682—1725年	彼得大帝朝
		1683年	土耳其围攻维也纳

1690年	康·布伦科维亚努于泽尔内什蒂打败哈布斯堡人	1684年	反土耳其人的“神圣同盟”建立
		1685—1750年	德国作曲家约翰·赛·巴赫
1691年12月4日	哈布斯堡统治期间的特兰西瓦尼亚“宪法”——利奥波德敕书	1689—1755年	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
		1691—1756年	日本诗人竹田出云
1694年	维也纳的特兰西瓦尼亚枢密院成立	1694—1778年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
1694年	布加勒斯特“圣萨瓦学院”建立	1696年	沙皇彼得大帝占领亚速夫
		1697年9月11日	森塔之战
1698年	克鲁日耶稣会大学建立		
1698年10月7日	特兰西瓦尼亚的部分罗马尼亚人与罗马教廷联合	1699年1月26日	土耳其人与奥地利人签订卡洛维茨和约
1702年	布伦科维亚努建筑莫戈绍瓦亚宫	1701—1713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　界　历　史　事　件
1703—1711年	弗兰西斯·拉科齐二世领导下的反哈布斯堡战争	1702年	英国创立第一份日报
1709—1711年	米哈伊·柴雷撰写他的著作《历史》	1703年	圣彼得堡城建立
1711年4月3日（13日）	迪米特里·康特米尔与沙皇彼得大帝签订卢克条约	1707年5月1日	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命名为大不列颠
1711年4月30日	库路茨与奥地利人签订萨土—马雷和约	1709年	俄国人与瑞典人的波尔塔瓦战役
1711年7月18—22日	俄国人与土耳其人在普鲁特河上的斯特尼列什蒂之战。普鲁特和约	1711—1765年	俄国学者米·瓦·罗蒙诺索夫
1711年9月16日	摩尔多瓦的法纳里奥特王朝的开始		
1713年	土耳其人占领霍廷并将其划为拉亚	1712—1778年	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
1714—1716年	迪米特里·康特米尔撰写	1713—1784年	法国哲学家德尼·狄德罗

	《奥斯曼帝国史》		
1715年12月20日	罗马尼亚国的法纳里奥特王朝的开始	1713年4月11日	"国事诏书"
1717年	萨米尔·克莱舍里的著作《罗马达契亚的金矿》问世	1716年	土耳其人与俄国人的彼特罗瓦拉丁之战
1717年	蒂米什瓦拉从土耳其统治下获得解放	1716—1718年	奥土战争
1717—1723年	迪米特里·康特米尔撰写《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人古代编年史》		
1718年	迪·康特米尔撰写《摩尔多瓦写实》		
1718年	哈布斯堡统治巴纳特		
1718年	奥地利人占领奥尔特尼亚	1718年7月21日	土耳其人与奥地利人签订巴萨罗维茨和约
1722年3月30日	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国事诏书	1723—1790年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1726年	巴亚—斯普里耶矿工暴动	1724—1804年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　界　历　史　事　件
1728—1744年	伊诺钱齐乌·米库主教就职及其为罗马尼亚人争取政治和民族权利的活动		
1733年	巴纳特矿工暴动		
约1733年	伊昂·尼库尔切撰写《摩尔多瓦国纪事》	1736—1795年	乾隆皇帝朝
1735年4月23日	彼得·塞盖丁纳茨领导下的阿拉德地区的起义	1737—1739年	土奥俄战争
1737—1738年	巴纳特农民反对哈布斯堡人的起义	1740—1786年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朝
1739年9月1日（12日）	奥地利人与土耳其人签订贝尔格莱德和约	1743—1794年	法国化学家安·罗·拉瓦锡
1741—1742年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宪法”	1744年	塞尔维亚民族会议
1744年	修士维萨里昂·萨拉伊领导下的反天主教暴动	1746—1828年	西班牙画家弗·伊·高亚

1746年8月5日	康·马弗罗科尔达特在罗马尼亚国废除农奴制	1746年	维也纳"铁列西亚"学院成立
1749年4月6日	康斯坦丁·马弗罗科尔达特在摩尔多瓦废除农奴制	1749—1827年	法国数学家皮·西蒙·拉普拉斯
1754年	布拉日的学校建立	1749—1832年	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1757年	迪米特里·欧斯塔蒂耶维奇写作《罗马尼亚语法》	1751—1780年	《法兰西百科全书》
1759—1761年	修士、乔瓦拉的索弗罗尼耶领导下的特兰西瓦尼亚农民起义	1754年6月19日	阿尔巴尼协定
1762—1763年	特兰西瓦尼亚边防团成立	1756—1763年	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七年战争
1763年5月10日	讷塞乌德的罗马尼亚边防军暴动	1756—1791年	德国作曲家沃·阿·莫扎特
1763年12月—1764年1月	丘克的塞凯伊边防军起义	1762年	"瑞士协会"成立
1765年11月2日	特兰西瓦尼亚升格为大公国	1762—1797年	叶卡德琳娜二世王朝
		1765年	美洲各殖民地的"印花税法"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　界　历　史　事　件
		1765年	北美英属殖民地的“权利和自由宣言”
1766年	彼·博德的百科全书《马札尔文库》出版		
		1768—1774年	俄土战争
1769年	特兰西瓦尼亚经济协会成立		
1769年11月11日	铁利西亚发布“若干指令”调节农民与贵族的关系		
		1770—1831年	德国哲学家乔治·威廉·黑格尔
1771年	蒂米什瓦拉的《知识报》出版		
		1772年	俄、奥、普鲁士第一次瓜分波兰
1774年7月10日（21日）	俄土库楚克—凯纳吉和约		
1775年5月7日	奥地利强夺布科维纳	1775—1783年	美国独立战争

1775年	克鲁日外科学院建立	1775年	叶麦良·普加乔夫领导下的俄国农民大起义
1777年	学校法《教育法规》	1776年	通过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诞生
1778年6月6日	巴纳特并入匈牙利	1778—1779年	奥法争夺巴伐里亚的战争
1780年	萨·米库和格·欣卡伊的著作《达契亚—罗马语或瓦拉几亚语基础》问世		
1780年	《法典》出版	1780—1790年	约瑟夫二世王朝
1780年	奥拉迪亚科学院建立		
1781年	学校法《皇家典章》	1781年	奥地利废除世袭产权上的农奴制
1782年	建立达契亚王国的计划		
1784年	锡比乌出版《特兰西瓦尼亚报》	1783年	美国与英国的凡尔赛和约
1784年1月31日	约瑟夫二世皇帝的征兵制		
1784年11月1日	霍里亚起义爆发		
1785年2月28日	霍里亚和克洛什卡受车磔	1789年3月4日	美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785年8月22日	特兰西瓦尼亚废除人身奴役	1789年4月30日	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总统
1787年	伊昂·莫尔纳尔·皮乌阿里乌的《德—罗词典》出版	1789年5月5日	法国三级会议的召开
		1789—1794年	法国大革命
		1790年2月7日	反对法国革命的赖亨巴赫协定
1787—1792年	俄奥土战争	1791年8月4日	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的西斯托夫和约
1789年	克鲁日出版《特兰西瓦尼亚马札尔信使报》	1792年2月7日	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反对法国革命同盟
1791年3月	《申诉书》呈交奥地利宫廷	1792年9月20日	法国革命军与保皇派同盟的瓦耳米之战
1792年1月9日	俄土雅西和约	1793年	第二次瓜分波兰
1792年	克鲁日戏剧协会成立	1793—1794年	法国的雅各宾专政
1793年	特兰西瓦尼亚马札尔语研究	1795年	第三次瓜分波兰

	协会成立		
1795年	阿尔迪亚尔大公国罗马尼亚人哲学协会成立	1796—1797年	拿破仑·波拿巴进军意大利
		1796—1804年	中国的农民战争
		1797年10月18日	康波福米奥和约
		1797—1798年	拿破仑远征埃及
		1799年11月9日	拿破仑政变
		1799—1856年	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
1802年	摩尔多瓦地主把建立一个“贵族民主”共和国的计划呈交拿破仑	1799—1837年	俄国诗人普希金
		1799—1850年	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
1806年	萨·米库的著作《罗马尼亚人的历史、事件和轶事》完成	1802—1885年	法国小说家雨果
		1804年5月18日	拿破仑称帝
1806—1812年	俄土战争	1804年8月1日	罗马—日耳曼帝国灭亡，奥地利帝国建立
1808年	格·欣卡伊的著作《罗马尼	1805年10月21日	特拉法尔加战役

日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期	世界历史事件
	亚族及其他民族编年史》完成		
1811年	锡比乌神学院建立	1805年12月2日	奥斯特里茨战役
		1805年12月25日	拿破仑与奥皇的布拉迪斯拉发（普列斯堡）和约
1812年	彼得·马约尔的著作《达契亚罗马尼亚人起源史》	1806年	拿破仑的大陆封锁
		1807年7月7日	拿破仑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提尔西特和约
1812年	约翰·布达伊—德列亚努完成长诗《茨冈人之歌》	1808—1814年	拿破仑的西班牙战争
		1809年	拿破仑占领维也纳
1812年	阿拉德“师范学校”建立	1809年	瓦格拉姆战役
		1809年	维也纳和约
		1809—1882年	英国生物学家查理·罗伯特·达尔文

1812年5月12日	俄土布加勒斯特和约	1810—1826年	拉丁美洲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
1812年	比萨拉比亚并入沙俄	1812—1814年	美英战争
		1812年	拿破仑进军俄国
1813年	格奥尔基·阿萨基创立雅西工程学校	1813年10月16—19日	莱比锡战役
		1814年4月6日	拿破仑逊位
		1814年	希腊希梯里亚同盟成立
		1815年3月1日	拿破仑百日王朝
1816年	格·拉泽尔开始教工程学	1815年	巴黎和约
		1815年6月	维也纳会议
1817年	卡利马基的《法典》	1815年6月18日	滑铁卢大战
1818年	《卡拉佳法规》颁布	1815年9月26日	以“神圣同盟”闻名的欧洲反动派同盟
		1818—1883年	卡尔·马克思
1818年3月6日(18日)	格奥尔基·拉泽尔创办圣萨瓦皇家学校	1820—1823年	西班牙、葡萄牙、那不勒斯、彼蒙特起义
		1820—1895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820年	《罗马尼亚文选》杂志在切尔讷乌茨出版	1821—1848年	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当政
1821年	《罗马尼亚文库》杂志于布达出版	1821—1829年	希腊独立战争
1821年1月23日	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的革命运动开始	1821—1822年	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巴西宣布独立
1822年	“烧炭党人”备忘录于摩尔多瓦起草	1823年	“门罗主义”
1826年	西米翁·梅赫丁齐亚努和基策·库楚伊领导的奥尔特尼亚起义	1825年9月25日	英国铺设世界上第一条铁路
		1825年	俄国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
1829年	《罗马尼亚信使报》和《罗马尼亚蜜蜂报》出版	1825—1826年	玻利维亚、阿根廷宣告成立共和国
1831年	罗马尼亚两公国实行《组织规程》	1827年	签订阿克尔曼协定

1835年	“米哈伊学院”创立	1829年9月14日	缔结阿德里安堡和约
1835年	在普拉霍瓦的斯克耶尼建立第一个法伦斯特	1830年10月4日	比利时宣布独立
1838年	《特兰西瓦尼亚报》出版	1830年7月27—29日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1838年	拟定扬·肯皮内亚努领导的民族派宣言	1831年11月21日	里昂工人起义
1839年	在摩尔多瓦策划“联邦阴谋”	1837—1848年	英国宪章运动
		1839年	印度鸦片战争
1840年	米蒂克·菲利佩斯库领导的具有革命性质的秘密会党建立	1840年7月30日	“全国宪章运动协会”建立
1841年	在雅西建立第一所机器磨坊；格·阿萨基的造纸厂投入生产	1844年	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1843年	秘密政治会党“兄弟会”成立	1846年	克拉科夫起义
1846年	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国缔结关税协定，该协定将促成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两个公国于1848年1月1日废除两国间的关卡		
		1847年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8年1月	巴勒莫起义
1846年	“爱国协会”成立	1848年2月	《共产党宣言》出版
1848年3月24日	要求承认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是有政治权利的民族及要求废除农奴制的声明发表	1848年2月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1848年3月27日	摩尔多瓦革命运动的开始（雅西会议）	1848年3月	柏林、维也纳、佩斯、米兰等地爆发革命
1848年4月30日	第一次布拉日大会		
1848年5月2日（14日）	西·伯尔努齐乌于布拉日大教堂发表演说		
1848年5月3日	布拉日附近的自由原野上的		

（15日）	集会		
1848年5月12日（24日）	在布拉索夫拟定名为“我们改革祖国的原则”的纲领		
1848年6月	沙皇军队越过普鲁特河以扼杀革命		
1848年6月9日	伊兹拉兹宣言		
1848年6月11日	布加勒斯特爆发革命		
1848年6月13日（25日）	格奥尔基·比贝斯库大公逊位		
1848年6月14日	临时政府于布加勒斯特成立	1848年6月	巴黎无产阶级起义
1848年6月15日	菲拉雷特自由原野上的人民大会		
1848年6月19日	击溃第一次反革命阴谋		
1848年6月29日	挫败第二次反革命阴谋		
1848年7月19日	土军于朱尔朱渡过多瑙河		
1848年7月	以扬·埃里亚德、尼·戈列斯库和克·特尔为首的公国督政府组成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848年8月	“产权委员会”内展开辩论		
1848年8月	在切尔讷乌茨拟定名为“摩尔多瓦民族派的愿望”的纲领		
1848年9月6日	在布加勒斯特焚烧《组织规程》和《贵族谱》	1848年9月12日	瑞士宣布成为联邦国家
1848年9月13日	以尼·伯尔切斯库为首的革命领袖在科特罗切尼军营被捕		
1848年9月13日	斯皮里坡上的罗马尼亚消防队员的英勇抵抗		
1848年9月13日	以康·康塔库齐诺代君主代替公国督政府		
1848年9月15日	沙皇部队越过米尔科夫河抵达蒙特尼亚		
1848年9月15日	第三次布拉日大会	1848—1852年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1848年9月28日	勒乌雷尼（佛尔恰）军营解散		
1849年4月	缔结巴尔塔—利曼尼亚协定		
1849年7月14日	签署“绥靖草案”		
1849年8月13日	马札尔革命军于希里亚投降		
1852年11月28日	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尼古拉·伯尔切斯库在巴勒莫去世	1850—1864年	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1853—1856年	克里米亚战争
1857年	部分革命流放者回到两个公国		
		1856年	巴黎和会
1857年7—10月	进行临时议会的选举		
		1857—1859年	印度士兵大起义
1958年11—12月	进行“大选议会”的选举	1858年8月7日	签署巴黎协定
1859年1月5日	雅西“大选议会”选举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为摩尔多瓦君主	1859年	法意奥战争
1859年1月24日	布加勒斯特选举议会，选举	1859—1861年	意大利通过革命进行统一的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为罗马尼亚国君主		第一阶段
1860年	在巴黎设立第一个罗马尼亚代办处		
1860年	雅西大学建立		
1861年12月11日	奥斯曼帝国承认两个公国完全联合	1861年	俄国土改
1861年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民文化协会(Astra)建立	1861—1865年	美国内战
1862年1月24日	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统一国民议会并组成罗马尼亚首届政府		
		1863年1月1日	美国废除奴隶制
1864年5月2日	通过解散反动议会进行政变	1864年9月28日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创立
1864年8月14日	颁布土地法		

1864年	布加勒斯特大学创立	1864年	普鲁士与奥地利联合对丹麦宣战
1864年	颁布地方行政改组法令		
1865年11月25日	投票通过国民教育法		
1865年	刑法、民法和通商法生效	1866—1870年	意大利统一
1866年2月11日	亚历山德鲁·伊昂·库扎退位		
		1866年	普奥战争；在普鲁士庇护下北德意志联邦诞生
1866年5月10日	霍亨索伦王朝的卡罗尔—西格马林根亲王登上罗马尼亚王位		
1866年5月	边防军与多瑙河平原农民的起义		
1866年6月	国民议会通过国家宪法		
1867年	通过法律建立国家币制	1867年	奥匈二元帝国建立
1867年	罗马尼亚科学协会成立	1868年	日本资产阶级革命
1869年	巴纳特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		

日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期	世界历史事件
	的罗马尼亚人民族党创立		
		1869年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创立
1870年8月	普洛耶什蒂的反王朝运动	1870年	法国在与普鲁士战争中战败；德意志统一于普鲁士周围
1871年3月	布加勒斯特的共和派运动		
1871—1872年	最早的社会主义小组建立	1871年3—5月	巴黎公社
1872年	“罗马尼亚劳工总协会”创立	1871年	俄国废除巴黎和约(1856年)
1875年	与奥匈帝国缔结商约	1875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创立
1877年4月4日	缔结罗俄协定	1876年	第一国际自行解散
1877年5月9日	罗马尼亚宣告国家独立		
1877年7—8月	罗军越过多瑙河		
1877年8月30日	开始对普列文发动总攻；占领格里维查一号碉堡	1877年	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
1877年11月9日	罗军占领拉霍瓦		

1877年11月28日	普列文的土耳共守卫部队投降		
1877年12月—1878年1月	攻占维丁的战役；斯默尔丹之战		
1878年1月19日	缔结圣斯特法诺停战协定	1878年6—7月	柏林和会
1881年	罗马尼亚国民银行成立	1881年	法国占领突尼斯、撒哈拉、马达加斯加等
		1882年	英国开始统治埃及
		1882年	三国同盟（德国、奥匈、意大利）形成
1881年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党创立	1883年	卡尔·马克思逝世
1881年	《同时代人》杂志创刊	1885年	柏林殖民会议；德国取得多哥、喀麦隆及东非、西非的其他领土
1883年	罗马尼亚参加三国同盟		
1884年	激进党建立	1885—1896年	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战争
1886年	最早的工人小组建立	1886年5月1日	芝加哥总罢工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　界　历　史　事　件
1887年	通过名为“扶助民族工业的总措施”的法令	1889年7月	在巴黎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决定宣布5月1日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的节日
1888年3月20日	爆发农民起义		
1890年	第一批工人俱乐部诞生	1890年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创立
1890年	文化同盟创建于布加勒斯特	1891年	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建立
1892年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备忘录》呈交维也纳宫廷	1893年	法俄结成同盟
		1893—1898年	美国占领夏威夷岛
1893年	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创立	1894—1895年	中日战争
1894年5月	在克鲁日开庭审判备忘录党人案件	1895年	印度国大党成立
1895年	切尔纳伏德的多瑙河大桥竣工	1895年	弗·恩格斯逝世

		1898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
		1898年	美国占领波多黎各、菲律宾
1899年	罗马尼亚工人社会民主党暂时解散	1899—1902年	英国与布尔人的战争
1899年	雷希察工人罢工	1900年	中国义和团起义
1899年	森塔纳农民起义	1901年	日本社会党创立
1902年	社会主义小组“劳动者的罗马尼亚”创建并出版同名刊物第一期	1903年	布尔什维克党创建
		1903年	召开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成立大会
1903年	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刊物《真理报》第一期出版	1903年	美国占领巴拿马地区
		1904年	通过英法盟约建立“协约”
		1904—1905年	日俄战争
1905年	加紧将工人组织进工会的活动	1905—1907年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日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期	世界历史事件
1905年	《罗马尼亚生活》杂志创刊	1906年	美国占领古巴
1906年8月	罗马尼亚工会总委员会成立	1906年	英国工党建立
1907年2月8日	爆发农民大起义	1907年	缔结俄法英三国协约
1908年	塔克·约内斯库领导的保守民主党成立	1908年	“土耳其青年党人”政变
		1908年	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1908年	保加利亚宣告独立
1910年1—2月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建立	1911年	意土战争；缔结洛桑和约
		1911—1913年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者宣告成立民国
1912年	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12年	巴尔干联盟建立；第一次巴尔干战争
1912年	制定新的鼓励工业法		
1913年	签署布加勒斯特和约	1913年	克里特并入希腊
		1913年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

		1914年	巴拿马运河竣工
		1914年	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
		1914年7月15日（28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5年	齐美瓦尔德(瑞士)社会党国际会议
1916年5—6月	日乌河谷矿工罢工	1916年	昆塔尔(瑞士)社会党国际会议
1916年6月13日	加拉茨工人展开大规模行动		
1916年8月4日（17日）	罗马尼亚与协约国在布加勒斯特签订盟约和军事协定		
1916年8月14日（27日）	罗马尼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6年12月6日	外国入侵者占领布加勒斯特		
1917年7—8月	默勒什蒂、默勒舍什蒂和奥伊图兹大战	1917年2月	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专制
1917年7月	匈牙利社会民主工党罗马尼亚支部恢复活动		
1917年12月	缔结福克夏尼停战协定	1917年10月25日	彼得堡起义开创了伟大的十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1月	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8年4月24日	签署布勒斯特和约		
1918年10月18日	在布达佩斯议会宣读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克里沙纳和马拉穆列什的罗马尼亚人自决宣言	1918年10月31日	匈牙利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18年10月31日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建立	1918年11月1日	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二元帝国解体
1918年10—11月	法、美、英、意正式承认罗马尼亚民族的正义事业。罗马尼亚侨民的活动		
		1918年11月3日	奥匈与协约国签署停火令
1918年11月13—15日	罗匈布拉德谈判失败		
1918年11月15日	召开阿尔巴—尤利亚国民议会	1918年11月11日	协约国与德国订立停战协定

1918年12月1日	宣告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联合		
1918年12月	通过选举改革法	1919年1月18日	巴黎和会开幕
1918年12月9日	罗马尼亚社会党发表《原则声明》	1919年	凡尔赛和约
1918年12月13日	布加勒斯特工人大游行	1919—1920年	协约国分别与德国每个盟国签订条约
1918年12月16日	颁布土地改革法令	1919年3月	共产国际建立
1919年6月28日	签订凡尔赛和约	1919年9月10日	签订圣日尔曼和约
1919年6月28日	罗马尼亚作为发起国之一参加国联		
1920年10月20日	罗马尼亚爆发总罢工	1919年11月27日	签订讷伊和约
1921年5月11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	1920年6月4日	签订特里亚农和约
1921年5月	通过关于组织工会的特兰库一雅西法	1920年8月10日	签订色佛尔和约
		1921年	“小协约国”成立
1922年	召开罗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普洛耶什蒂）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921年	缔结罗波同盟条约
1923年3月	通过罗马尼亚新宪法	1922年11月	洛桑会议开幕
1923年9月	召开克鲁日工会总代表大会		
1923年10月28—30日	罗马尼亚统一工会成立		
1924年3月	维也纳罗苏会议		
1924年4月	罗马尼亚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		
1924年4月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924年8月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维也纳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1925年10月	洛迦诺国际会议
1926年6月	缔结罗法同盟条约		
1926年10月	民族农民党成立		
1927年8月	由于卡罗尔亲王出奔法国而成立摄政府		
1928年6月	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哈尔科夫	1928年8月27日	签订白里安—凯洛格公约

	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9年2月9日	缔结苏联、罗马尼亚、波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间的莫斯科议定书		
1929年4月	召开蒂米什瓦拉统一工会代表大会		
1929年8月5日	卢佩尼矿工罢工		
1930年3月	“铁卫团”成立		
1930年6月8日	卡罗尔自法国返回并成为罗马尼亚国王		
1931年3月	铁路工人、石油工人、矿工全国代表会议		
1931年	第一批工人议员进入罗马尼亚议会		
1931年8月	《火花报》创刊		
1931年12月	罗马尼亚共产党于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	1931年9月	日本占领满州(东北)
1932年3月	铁路工人全国代表会议	1932年2月	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开幕

日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期	世界历史事件
1933年2月1日	普洛耶什蒂罗美石油公司石油工人罢工	1933年1月30日	希特勒独裁政权在德国上台
1933年2月2日	布加勒斯特“格里维察”各工厂铁路工人罢工	1933年1月	通过“日内瓦计划”
1933年2月15—16日	布加勒斯特“格里维察”各工厂铁路工人罢工	1933年2月16日	通过改组小协约国的协定
1933年12月	“铁卫团”解散	1934年2月4日	巴尔干协约国成立
		1934年2月	维也纳无产阶级起义
		1935年5月2日	缔结苏法互助公约
1934年6月9日	罗马尼亚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	1935年5月16日	缔结苏捷互助公约
		1935年7月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1935年10月	法西斯意大利军队侵入阿比西尼亚
		1936年3月6日	希特勒军队侵人莱茵区
1936年6月21日	缔结关于罗苏互助公约议定	1936年7月	西班牙内战爆发

	书		
		1936年11月25日	德日缔结“反共”协定
1938年2月10日	罗马尼亚建立国王独裁政权	1938年5月12日	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
		1938年9月	慕尼黑会议决定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3月23日	缔结罗德经济条约	1939年3月	希特勒德国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1939年4月	法西斯意大利侵入阿尔巴尼亚
		1939年8月22日	德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9月1日	希特勒德国通过进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12月	苏芬战争爆发
1940年6月	缔结四边形地带划入保加利亚版图的协定		
1940年6月	罗马尼亚依附罗马—柏林轴心		
1940年8月29日	从罗马尼亚夺走特兰西瓦尼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亚北部的维也纳指令		
1940年9月6日	卡罗尔二世国王逊位，扬·安东内斯库的军事法西斯独裁上台		
1941年1月22日	“铁卫团”叛乱		
		1941年6月22日	爆发反苏战争
1941年9月6日	罗共发表纲领性提纲	1941年9月	苏美英建立反希特勒同盟
1943年6月	反希特勒爱国阵线成立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
1944年4月4日	工人统一阵线成立	1941年12月8日	美、英对日宣战
1944年5月1日	《工人统一阵线宣言》	1941年12月11日	德、意对美宣战
1944年6月13—14日	罗共代表、高级军官代表、王宫代表举行会议拟定武装起义计划	1942年11月—1943年2月	斯大林格勒大战
		1942年	日本占领菲律宾、香港、缅甸、印度尼西亚
1944年6月20日	民族民主同盟成立		

1944年8月23日	罗马尼亚举行武装起义。调转枪口反对希特勒德国	1943年	库尔斯克战役
1944年8月23日	康斯坦丁·塞讷特斯库主持的首届政府组成	1943年9月8日	意大利投降
1944年8月23日	罗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居民参加反对希特勒军队的斗争	1943年11月	德黑兰会议
1944年8月24日	《自由罗马尼亚》转为公开后出版第一期	1944年6月6日	英、美军队在法国北部海岸开始登陆
		1944年	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各国人民的抵抗运动规模日大
1944年8月26日	我国首都从希特勒军队占领下解放出来		
		1944年8月25日	巴黎从希特勒占领下获得解放
1944年8月28日	首都近郊从希特勒军队占领下解放出来		

日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期	世界历史事件
1944年8月30日	苏军先头梯队进入布加勒斯特		
1944年8月26—30日	组织首都和其他企业工人举行最早的一些集会，以在统一的基础上恢复工会运动		
1944年9月1日	以工人统一阵线为基础建立工会运动组织委员会		
1944年9月3日	共青团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建立青年统一阵线		
1944年9月12日	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	1944年9月9日	保加利亚人民起义——社会主义革命开始
1944年9月21日	罗共中央机关报《火花报》转入公开后出版第一期		
1944年9月24日	罗共中央拟定并向一切民主		

	力量提出的民族民主阵线行动纲领草案		
1944年10月8日	首都群众大会，十多万公民要求塞纳特斯库领导的、反动分子占多数的政府辞职并建立一个民主力量的政府		
1944年10月11日	罗军和苏军解放克鲁日市		
1944年10月12日	一切民主组织拥护民族民主阵线行动纲领，民族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成立		
1944年10月16日	工人统一阵线代表退出政府；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宣布废除民族民主同盟（1944年10月19日）		
1944年10月25日	由于罗军和苏军在全国人民支援下所进行的英勇战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斗，全国领土从希特勒—霍尔蒂占领下完全解放		
1944年11月4日	塞讷特斯库第二届政府组成，民主力量在其中赢得了重要阵地		
1944年12月6日	尼古拉·勒德斯库主持的政府组成，民主力量在其中保持并甚至巩固了既得阵地		
1945年1月26—30日	罗马尼亚统一工会第一次总代表大会；建立劳动总联合会	1945年1月	苏军在自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的广阔战线上发动强大攻势
1945年1月28日	民族民主阵线执政纲领发表	1945年2月4—13日	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6日	通过《民族宪章》	1945年4月25日	苏军与英美联军会师于易北河上的托尔高

1945年2月10日	农民阵线发表宣言，号召农民通过革命道路实现土改。加强民主改革的总斗争		
		1945年5月9日	希特勒德国被反希特勒各国盟军打败
1945年3月6日	建立彼得罗·格罗查博士主持的、广泛民主集中的政府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	联合国成立
		1945年7—8月	波茨坦会议
1945年3月23日	制定土改法		
		1945年8月6日和9日	美国空军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
1945年10月16—21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45年8月8日	苏联对日宣战
1946年11月19日	在议会选举中民主力量战胜反动势力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1945年9月2日	日本投降
1947年2月10日	在巴黎签订和约（该和约将于同年9月生效）		
		1945年11月20日	在纽伦堡开始审判德国主要战犯
1947年6月14日	通过罗共关于国家经济和财政恢复工作的建议	1946—1947年	巴黎和会
1947年11月6日	格·特特勒斯库领导的资产阶级集团被排除出政府		
1947年12月30日	废除君主制，宣告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1948年2月21—23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统一大会，建立罗马尼亚工人党		
1948年3月28日	在选举的基础上建立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大国民议		

	会		
1948年4月13日	通过我国第一部民主宪法		
1948年6月11日	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革命行动		
1948年8月3日	教育改革法		
1949年3月3—5日	罗共中央全会，讨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949年4月4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集团建立
1955年12月23—28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9年5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1955年	罗马尼亚加入联合国	1949年10月1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
1957年	罗马尼亚政府提出采取加强巴尔干地区各国间关系的若干措施的建议	1949年10月	中国革命胜利
		1950—1953年	朝鲜人民的解放和统一战争
1959年3月28日	大国民议会关于在罗马尼亚	1955年5月14日	华沙条约组织建立

日　期	罗马尼亚领土上的历史事件（过程或现象）	日　期	世界历史事件
	废除人剥削人的最后形式的法令		
		1959年1月1日	古巴革命胜利
1960年6月20—25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1964年4月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声明		
1965年6月19—24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1961年4月12日	人进入宇宙
1965年8月	大国民议会通过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我国更名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议	1965年①5月15日	签订奥地利建国条约
		1965年	越南人民开展反对美国侵略的英勇抗战
1967年12月	罗马尼亚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1969年6月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国际会议

1968年10月	社会主义团结阵线建立	1969年6月21日	人登上月球：首批地球上的人踏上月球(阿波罗11号远征)
1969年8月	罗马尼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1970年10月	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访问美国	1970年10月14—24日	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大会
1970年10月	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参加联合国庆祝大会		

① 原文有误，应为1955年。——译者

后　　记

《罗马尼亚通史简编》的这个新的版本（第二版），对初版作了若干修订。

试举共中最重要的几处：

1）关于1944年8月反希特勒武装起义的章节（954—977页）已全部重新编写，并与法文版的《罗马尼亚历史》相一致，共执笔者不同于罗马尼亚文初版；

2）对补充和核实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材料给予了特别重视；本着这一精神，对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时期作了简短的介绍（第1036—1047页）；

3）根据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在马札尔族和日耳曼族劳动人民委员会上所作的指示的精神，对有关各共居民族历史的段落作了订正；

4）本书序言经过了补充，对读者提出的关于

罗马尼亚历史上的贡税制生产方式及近代初期的若干问题，给予了解答。

最后，作者对全书都重新审阅和补充过。我们相信，这样它将更加一丝不苟地解答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并无负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人们对这本《简编》所表现出的关心；本书初版的印数，其实相当大，但在几周内就销售一空了。

作　者

人 名 索 引

(按译名首字的汉语拼音次序排列。条目中的数字是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印在本书正文页边的数码。)

a

ai

an

bai

bao

bei

ben

bi

cha

chu

da

dai

dan

dao

de

ha

hai

han

he

heng

hong

hu

huo

ji

ken

lai

lan

lun

luo

ma

man

mao

mei

men

ming

miu

mo

mu

na

pan

pang

pei

pi

ping

po

pu

qi

sai

shu

si

ta

tai

te

wan

wei

weng

wo

wu

xi

yong

yu

yue

ze

zhu

zuo

地 名 索 引

ba

bo

deng

di

du

dun

duo

e

fa

fei

gai

gao

ge

ken

ku

lun

luo

pang

pei

peng

pi

qia

qiao

qie

qin

qiu

ri

ru

rui

sa

te

tuo

wa

wai

xiao

xiong

名 目 索 引

bei

ben

bian

bo

bu

fan

fei

fen

feng

fu

gai

lun

luo

ma

shen

sheng

shi

shou

shu

si

su

suo

ta

tai

te

ti

wen

wo

wu

xi

xian

xiao

xie

xin

《罗马尼亚通史简编》各章节执笔者目次

前言: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康斯坦丁·达伊科维丘，什特凡·帕斯库

罗马尼亚史资料: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什特凡·帕斯库，哈德里安·达伊科维丘

上古时代: 哈德里安·达伊科维丘

古代: 哈德里安·达伊科维丘

向封建主义过渡时代: 康斯坦丁·达伊科维丘，哈德里安·达伊科维丘

中古时代: 什特凡·帕斯库

近代: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什特凡·帕斯库，特拉扬·隆古和阿·波尔齐亚努

资本主义制度: 特拉扬·隆古，阿·波尔齐亚努，格·斯马兰达凯

现代: 扬·奥普里亚，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和阿·波尔齐亚努

人民革命: 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扬·奥普里亚，阿隆·佩特里克

社会主义制度: 阿隆·佩特里克，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